
中國古代簡史
主编 孙思恩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简史

主　编　张思恩

副主编　张中政　杨冬生
　　　　陈正奇　高长天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古 代 简 史

主 编 张思恩

副主编 张中政 杨冬生

陈正奇 高长天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莲湖区友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0.5印张 4 插页 52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1579—2/K·221

定价：7.80元

序

张岂之

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最好形式之一。历史知识应当在全民中普及，这才是增进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由张思恩同志主编的《中国古代简史》，就是本着这个精神编写的。这部书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是令人高兴的事。这部书由江苏、天津、江西、河南、山西、河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十省区的二十多所院校参加编写。各参编院校都很重视本书的编写，派出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参加。大家互相尊重，亲密协作，在承担繁重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埋头苦干，如期完成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为历史教材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感受到成功后的欣慰和喜悦。

这部教材是为了解决高等院校文科、师专和教育学院等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编写一本好的教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但在内容上要科学化、系统化，而且在写法上要突出重点，文字简洁规范。对高等院校来说，特别是对师专、教育学院及文科公共课来说，历史学方面的教材，字数不宜太多。如果篇幅太长，学生读起来吃力，效果反而不好。《中国古代简史》符合上述的要求，它简明扼要，仅以五十多万字的篇幅，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重要历史事件、过程及有关内容的阐

述。同时，对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和明清时期，则给以比较详细的阐述。对一些无关大局的事件、时代则相对简略，从而显示出本书重点突出的基本特色。此外，这本教材还力求吸取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新成果、新资料。参加本书撰稿的同志，大都是在大专院校长期从事古代史教学的老教师，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都有各自的科研成果。这部教材就是他们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结晶。这部书中还加重了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技发展史方面内容的叙述，适当弥补了以往同类教材的缺陷和不足。书中还注意了与最新出版的中学历史新教材的配合，为师范院校学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和普及历史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本书中插有重要历史地图十六幅，每章后还附有重要名词及思考题，对学习时掌握重点、难点，复习思考都有很大的好处。

这部教材是在《简明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简明中国古代史》于1988年10月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受到社会欢迎，国内许多高等院校以《简明中国古代史》作为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1989年，陕西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于今年春召开编写会，然后由参加的各方分头编写修订。八、九月间在西安讨论改稿，并进一步统一全稿。许多学者为此书的重新编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从而使全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作为在大学工作的历史工作者，急盼这本教材能够很快出版，以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要。同时，我还希望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们，再接再励，精益求精，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编写一套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为高校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1990年10月12日于西北大学

目　录

第一编　原始社会

第二编 奴 隶 社 会

第三编　封　建　社　会

第一编　原始社会

（约17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

第一章　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群

第一节　中国的猿人

根据考古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材料证明，人类是由古猿演化而来的。大约在1400—800万年前，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森林中，生活着一种被称为腊玛古猿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可能就是猿人的祖先。腊玛古猿的化石，在我国云南开远、禄丰等地均有发现。1980—1981年，还在禄丰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证明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摇篮之一。

在从猿到人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人类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工具的问世，标志着人类终于脱离了动物界。大约到距今约300多万年前，人类就形成了，这就是早期猿人。到了距今约200万年至30万年前，又发展为晚期猿人，通常称为直立人。他们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类。我国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有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

一、元谋人、蓝田人

元谋人 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属于直立人类型的两枚男性猿人门齿化石，据古地磁法测定，已距今约170万年左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在同一地层中，还出土了大批动物化石和十余件石器，其中有几件尖状器和刮削器。这几件石器虽然都比较粗糙和简单，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敲打的痕迹，说明元谋猿人已能打制石器工具。在元谋人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炭屑和烧骨，说明元谋人可能已经知道用火了。

蓝田人 蓝田人的遗骸化石是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经近年用最新研究方法测定，距今约110—115万年。所发现的化石有头盖骨一具，上下颌骨各一具和牙齿十余枚。蓝田人的头盖骨骨壁极厚，前额低平，眉骨粗大，吻部前伸，牙齿硕大，脑容量较小，约为780毫升。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在蓝田人生存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剑齿虎、剑齿象、水鹿、丽牛等动物化石及打制石器。

二、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 北京人的化石及其文化遗存，1927年开始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中。从那时起，在这里发现了6枚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还有许多头骨碎片及肢肢骨、牙齿等，属于40具以上男女老幼的不同个体。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少量骨器、大量用火遗迹以及一百多种伴生动物的化石。这是我国资料最丰富的猿人遗址，也是世界上同时期猿人遗址所无法比拟的。

北京人的体质特征 北京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人类。其体质形态比蓝田人有所进步，已基本具备了人的特征，但还保留了

若干猿类的特征。由于长期的直立行走和劳动实践，他们的双手变得日益灵巧，上肢骨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下肢骨也接近于现代人。北京人的头骨则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如前额低平，眉骨突出，吻部前伸，没有明显的下颏，脑壳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比现代人小，平均为1059毫升（现代人平均脑量为1400毫升，现代猿平均脑量为415毫升）。因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右手比左手使用得多，北京人大脑的左边略大一些，根据脑膜上语言区部位隆起的现象分析，北京人可能已经有了语言，而语言是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北京猿人身体各个部位发展的不平衡，说明劳动对于人类体质发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充分证明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一伟大真理。

北京人的经济生活 北京人使用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和三角形的尖状器等。这些石器，都是选用砾石、石英石等坚硬的石料，用多种方法打制而成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猿人就是利用这些粗糙的石器，制作木棍、砍砸野兽、挖掘根块和劈割果、肉等，与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斗争，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

在北京人洞穴中厚达6米的灰烬堆积层中，有烧过的石块、兽骨和树籽等，说明北京人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不仅使用天然火，而且已经有意识地保存火种。火使人类变生食为熟食，促进了他们体质的进化，尤其是大脑的发展，火又能照明驱寒，给阴暗潮湿的洞穴带来光明和温暖，从而改善了居住条件，扩大了生活领域。火还可以驱逐猛兽，增强了人类的自卫能力，火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北京人的社会组织 在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周口店一带气候温和湿润，丛林遍山，猛兽出没，环境险恶。为了生存，北京人不

①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08页。

得不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集团，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群居生活。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俟原始群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①在这样的社会组织里，杂婚现象虽仍然存在，但较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原始群团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开始排除了不同班辈之间的杂交关系，只是在年岁相若的兄弟姐妹之间实行群婚。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分享着十分贫穷的生活资料。由于生活极其艰苦，北京人一般寿命很短，在40多具遗骸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14岁左右。北京人在艰苦的劳动和斗争中，改造自然，锻炼自己，创造了早期的原始文化。

第二节　中国的智人

一、早期智人

到了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中国猿人逐渐发展到了早期智人阶段。这一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境内发现的这一阶段的人类化石有：陕西大荔县的大荔人、广东韶关马坝乡的马坝人、湖北长阳县的长阳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的许家窑人和山西襄汾丁村的丁村人等。其中以生活于距今10万年前的丁村人最具有代表性。

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　经过几十万年的长期劳动，早期智人的体态已与现代人相似。如马坝人的头骨比猿人薄，前额增高，脑容量加大，平均为1225毫升；丁村人的齿根和齿冠较猿人细小，门齿呈铲状，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早期智人的腿部弯曲度变小，手也变得更加灵活。但他们仍具有一些原始体质特征，因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0页。

而又被称为“古人”。

早期智人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 早期智人时生产工具有了改进。以石器为例，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北京人进步，除了进行直接打击碰砸之外，还使用交互打击法进行再加工，加工技术逐渐趋于精细。石器类型有：单边刃或多刃的砍砸器、大型三棱器、小型尖状器，还有供狩猎用的球形投掷器（飞石索）等。这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的表现，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新胜利。

早期智人时期的婚姻关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早期智人的婚姻关系也在逐步地发生变化。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血缘近亲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殖，因而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杂交婚姻，逐步向族外婚过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血缘家族开始遭到破坏，氏族制度逐步萌芽了。

二、晚期智人阶段的文化和氏族公社的产生

距今约5万年前，早期智人发展为晚期智人，即新人。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晚期智人的体态原始性已经消失，并因受居住地区环境长期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于是，现代人开始形成了。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晚期智人遗址遍布各地，主要有广西的柳江人和麒麟山人，四川的资阳人，山西的峙峪人，内蒙古的河套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而以山顶洞人最具有代表性。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山顶洞人是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洞穴里发现的。有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与一些头骨残片、肢骨及牙齿化石，分属于8个不同的男女个体，距今约18000年，山顶洞人的头骨更薄，前额倾斜度较小，眉骨低平，吻部后缩，脑容量接近1400毫升。体态与现代人基本相同，且明显地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证明我国是蒙古人种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山顶洞人制造工具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掌握了挖空和初步磨制的技术。在洞内发现的一根骨针，长达82毫米，最粗直径3.3毫米，针尖圆锐，针孔窄小，系精心磨制刮挖而成。骨针的出现，说明当时已会用兽皮缝制衣服，增强了防御寒冷保护身体的能力。

因为较长时间钻孔磨擦而引起燃烧，这样就导致了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从山顶洞里发现的堆积很厚的灰烬来看，大约这时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我国古代有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①的传说，正是掌握这一人工取火方法的反映。

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是狩猎和捕鱼。他们使用球形投掷器和在木棒尖端绑上石矛用于投掷，不仅可以追杀走兽，而且可以射击飞鸟。他们还能捕捞约一米长的大鱼。

由于生产工具制作的进步，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和渔猎技能的提高，使山顶洞人的生活资料比过去大为丰富了。

在山顶洞内还发现不少装饰品，其中有穿孔的兽牙、兽骨和砾石，有磨制的鸟骨、鱼骨和石珠，还有雕刻成纹理的骨管。有的装饰品还涂上红色。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出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

山顶洞人居住的自然山洞，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公共住处，下层是公共墓地。在墓地发现的二女一男的骨架上，都佩带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迷信观念。

氏族公社的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要求人们结合成比较固定和持久的生产集团，并保持集团的某种经济联系，以便进行较大规模的采集和渔猎活动。而这种联系在当时只能通过婚姻的形式来实现。于是，氏族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

---

①《韩非子·五蠹》。

了。

氏族公社已经排除了远古的“血缘婚姻”，而实行“族外婚”，即一氏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氏族的一群姐妹交互群婚。氏族内不得通婚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死后归葬本氏族。在这种情况下，血统只能按母系计算，同一始祖母生下的若干后代组成一个氏族公社，这就是母系氏族公社。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山顶洞人当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初期。

第二章 氏族公社

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与繁荣

一、母系氏族公社的文化分布

我国母系氏族公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以后，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到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之间，进入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其文化遗址分布于祖国各地，迄今已发现6000余处。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广大地区有“仰韶文化”（1922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有“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有北方的红山文化（1935年首先发现于辽宁赤峰红山而得名），以及由东北北部起经内蒙、宁夏、青海直到新疆、西藏的辽阔草原地带广泛散布着的细石器文化（以细小石器为其文化特征）；还有分布于江南的马家浜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得名）和河姆渡文化等。其中半坡遗址与河姆渡遗址是母系氏族公社全盛时期的两个典型代表。

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半坡村，是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遗址略呈椭圆形，总面积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居住区位于遗址中心，周围有一条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是保护性设

施。居住区有许多窖穴，是公共仓库。居住区排列着四五十座小房子，是氏族成员的住处；中间有一座方形的大房子，面积约为160平方米，可能是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住房有圆形与方形两种，大都是半地穴式结构。沟外的东边是窑场，北边是公共墓地。整个遗址构成一个典型的氏族村落。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距今约七千年左右。遗址出土了各种生产工具几千件，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较丰富的房屋建筑遗址，墓葬群，还有一口浅水井，这是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其房屋多为“干栏”式建筑，用桩木打基础，其上架梁以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上面再立柱、架梁、盖顶。整个房屋高于地面之上，呈半巢居状，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自然条件，表明当时已具有相当成熟的木结构建筑技术。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

劳动工具 到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劳动工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使用的工具，已从过去打制的粗糙石器，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细的石器，其中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等耕耘与收获农具以及杵臼、石磨盘、石磨棒等粟类加工工具。这类石器的制造需要经过复杂的加工过程。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石料，打成石器的雏形，再放在砺石上加砂蘸水，精细研磨，制成准确适用刃口锋利的石器。少数工具还要给钻孔装柄或穿绳，便于掌握使用。还有用锉与磨的技术制成的蚌镰、骨镞、鱼叉、鱼钩等骨器，如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耜就是用于耕作的主要工具。

弓箭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到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有了弓箭，狩猎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由于磨制石器和弓箭的普遍使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除了采集和渔猎之外，还出现了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原始手工业。

原始农业 在由采集经济转向锄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中，发现植物种子落地来年萌芽复发的现象，逐步加以培养种植，从而发明了原始农业，对原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初期的农业生产，主要由妇女来承担和领导。当时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先民们以石斧砍伐树木，放火烧荒，然后用石铲、石锄、木耒、骨耜等疏松土地，再行播种。这与我国古代神农氏"斫木为耜、揉石为耒"，①"始教民播种五谷"②的传说是一致的。农业的发明，使当时人们得以利用自然条件进行社会生产，从而扩大了生活资料的来源，对原始人类定居生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半坡遗址的窖窑、房屋和墓葬中，发现有碳化的粟和粟壳，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之一。在一个陶罐里还发现有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籽，说明我国种植蔬菜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谷、稻杆、稻叶等，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的水稻，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

家畜饲养 动物的驯养和繁殖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由于狩猎技术的发展以及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为动物的驯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于是，人们把吃不完的活禽兽饲养起来，经过长期驯养逐渐成为家畜。

较早饲养的是狗。因为狗具有易驯养、灵敏、快速的特

---

①《易·系辞下》。

②《淮南子·修务训》。

点，是人们狩猎活动的有力帮手。在河姆渡，半坡等遗址都发现有狗的遗骨，证明我国是狗的起源地之一。

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农业部落，除饲养狗以外，还驯养了猪、羊、牛以及鸡等畜禽。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了48种动物遗骨，其中有不少为家畜。由此可知，当时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不过家畜的饲养还处在较原始的阶段。

原始手工业 随着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渔猎和采集等多种经济的发展，原始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当时的原始手工业有石器、木器、骨器制造，还有纺织、编织和陶器生产。陶器生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一项新兴手工业，也是氏族制度形成后的一项重要成就。因为以前的手工业只能改变材料的形状，不能改变其性质，制陶的发明，人类才第一次利用火的威力，制造出新的产品来。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一般都留下了陶窑遗址。西安半坡集中在居住区以东的陶窑就有6座。先民们选用粘性度质地较细的泥土，淘掉其中的杂质，做成细泥陶，或在陶土中掺进适量的砂子，制成夹砂细陶。制坯以手工为主，有的经过慢轮修整。为了美观，还在器物上描以彩绘。在上彩之前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陶衣，使彩绘更加鲜艳夺目。烧窑温度一般较高，估计可达摄氏一千度左右。所制陶器种类甚多，有饮食器以及汲水用的尖底小口瓶等。河姆渡遗址中大部分陶器为夹炭黑陶，器形为釜、钵、罐、杯等。器物表面磨光，有绳纹或描绘出动植物形象的花纹。定居农业促进了制陶业的发生与发展，“神农耕而作陶”①的传说，正反映了两者的密切联系。

在制陶业出现的同时，我国的先民们还发明与掌握了纺织和缝纫技术，当时，妇女剥取野麻纤维，用陶轮或石轮捻成细线，织成

---

①《太平御览》卷833。

面窄质疏的平纹布。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发现的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根，当是一种粗麻布，那时人们已知道鞣软兽皮，使之舒适美观。有了麻布和兽皮，而且还有骨锥骨针，这样就能缝制象样的衣服了。

三、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关系

社会组织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既是社会组织，又是经济单位，从半坡遗址建筑布局来看，一个氏族集中在一起构成一个母系大家族，形成一个氏族村落。在氏族公社内，男女老少之间有一定的分工。狩猎、捕鱼和制造工具等较强的体力劳动，一般由青壮年男子担任；而妇女的主要任务是养老育幼，守护住所，加工皮毛，缝制衣服，烧烤和分配食物，主持整个公社事务，并带领小孩进行采集活动等。后来，她们成为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及原始手工业等经济部门的主持者和主要劳动者。

由于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担负主要任务，因而居于支配地位。每个氏族都形成以妇女为中心的共同体。氏族有自己的首领，其职责是管理氏族日常事务。他们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受氏族成员的信任和委托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也不脱离劳动，与氏族成员完全平等。氏族大事如推选或更换首领，决定血亲复仇和收留养子等，都由首领召集全体成员共同议定。氏族首领有女有男，军事首领大都是男的，但整个氏族的主持人则由妇女担任。氏族的一切活动都按照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办事，谁破坏了它，谁就要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惩罚，甚至被驱逐出氏族。这就形成了团结全体氏族成员，维护氏族利益的力量。

氏族公社中的财产，诸如土地、树林、草场、河流、家畜、住房、陶窑和其它生产资料都为氏族所公有，个人占有的只是工具、武器和日常生活用品。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资

料，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制生活。这种原始共产制经济生活的情况，在当时的墓葬习俗中得到了反映。氏族成员死后都埋葬在公共墓地里。墓葬一般排列比较整齐。每座墓葬里，都有数量大体相等的随葬品（除男女因劳动分工而显得有些差异外），主要是陶制生活用具，也有少数装饰品和生产工具。这种墓葬习俗反映了氏族成员生前集体平等的社会关系，说明那时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更没有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

婚姻关系 从山顶洞人开始的族外群婚制，成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主要姻婚形态。在这种群婚制下，"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①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男女分区单人葬、男女分别合葬、男子二次迁移集体葬和母子合葬墓，却没有一对成年男女合葬或父子合葬墓。这种葬俗正反映了母系氏族制以妇女为中心的族外婚制的基本特点。

由于一氏族的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这样就使每个氏族同与它保持通婚关系的氏族结成了血缘关系。随着氏族公社的不断扩大，从原来的氏族中又分化出新的氏族，若干氏族又组成有血缘关系的胞族，若干胞族又组成部落，几个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

随着原始经济和氏族群婚的发展，到了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禁止血缘近亲通婚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许通婚的类别越来越多，于是，族外群婚发展为对偶婚。所谓对偶婚，就是男子到另一氏族去通婚，在众多通婚女子中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主妻"；同样，一个女子在与另一氏族众多通婚男子中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主夫"。对偶婚仍未摆脱群婚的残余，但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配偶关系，因此，对偶婚是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时代的过渡阶段。

---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3页。

四、图腾崇拜和原始艺术

图腾崇拜 在氏族社会中，人们相信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和保护神，因而他们把它作为本氏族的名称，也就是本氏族的族徽，或称为图腾，加以崇拜，这就是图腾崇拜。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鸟、鱼、鹿、蛙和人面鱼纹，很可能就是某些氏族的图腾。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是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法理解和在自然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图腾崇拜不仅仅是消极迷信，它在当时起着维护氏族组织、团结氏族成员的作用。①

原始艺术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的艺术创造力也有了提高。当时人们用赤铁矿和氧化锰作颜料，在陶坯上画各种几何图案，大部分为动物形象，如驰鹿、飞鸟、游鱼以及人头像等，纯朴逼真，形象生动，是原始艺术的珍品。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塑人头、陶山羊头、陶家猪以及各种装饰品，如发笄、蚌耳环、蚌质项饰、指环等，显示了我国原始造型艺术的成就。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钵口沿有符号二三十种，据研究是当时人们为了记事而刻划的，当与我国汉字有深远的渊源关系。

第二节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母系氏族公社晚期，农业和畜牧

---

①《试析原始宗教的历史地位》，《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且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而渔猎则逐渐下降为社会的辅助性生产。于是，身强力壮的男子，就开始从渔猎活动中逐渐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占据了原来由妇女从事的经济活动，而妇女则转向家务劳动，在经济上退居次要地位。

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财产属于氏族公有，属于个人的物品数量不多，物主死后就落入母方血缘亲属之手。当男子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之后，他们同时也就取得了对财产的支配权。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家庭积累的私有财富也愈益增加。对偶婚大体上处于这一阶段，男子开始能确认自己的子女，子女也已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女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①于是，男子要确保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将它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必须废除母权制”。②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废除带有浓厚群婚色彩的对偶婚，实行丈夫对妻子的独占同居。于是，旧的婚姻形态起了变化，女子到夫方居住，并成为男子固定的家庭成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

二、父系氏族公社的文化遗址

大约从四、五千年前开始，我国境内的一些母系氏族公社先后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是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

---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页。

金石并用时期。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的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山东和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①

大汶口文化遗址 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主要分布于鲁西南和苏北一带。其早期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中晚期属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氏族公共墓地，各墓之间随葬品的多寡悬殊。晚期墓葬中且有男女合葬现象，典型地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情况。据碳—14测定，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公元前2500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遗址 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已发现的遗址约在千处以上，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地区性差异很大，很可能与东西两部分继承的文化不同有关。一般称山东龙山文化为“典型龙山文化”，它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分布以山东为主，北到河北北部与辽东半岛，南到江淮平原。称河南陕西龙山文化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它继承和发展了仰韶文化，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和河北南部，前者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2000年之间，后者年代为前2800年—前2000年之间。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出土了薄而有光泽的黑陶，因此也曾被称为“黑陶文化”。

江汉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亦由于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与龙山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长江下游钱塘江口的良渚文化则是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的，又受到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些文化遗址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表明各地众多的氏族部落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联系。

---

①因分别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甘肃广通齐家坪，山东泰安大汶口，湖北京山屈家岭，江苏淮安青莲岗和浙江余杭良渚，故名。

三、父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

锄耕农业的新发展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锄耕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农业生产新发展的首要标志，是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这时，农具的种类增多，制作精细，结构也比以前科学，更适合于耕作的要求。如石斧既大又厚，便于砍伐；石铲既薄又平，利于启土；人拉三角石犁便于深耕。还有各式石锄、蚌锄等中耕农具与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在太湖流域还出土了竹干篰（戽水和埝河泥的工具）；在江苏吴兴县澄湖、昆山县、嘉兴县等良渚文化遗址，河北、河南的一些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水井，除一方面提供生活用水外，也可用于小块地的灌溉。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施肥与水利等耕作技术。

在农作物栽培方面，北方仍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这时除了原有的籼稻外，又出现了粳稻新品种。在南方一些地区还出土了芝麻、蚕豆、甜瓜子等种籽，说明经济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

农作物的收获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各遗址中发现的收割农具成倍地增加，窖穴容积和数量增多，盛装粮食的大型陶瓮以及村落遗址和墓葬中大量谷物的出土，都是粮食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的明证。同时大汶口文化遗址还出土陶盉、陶杯等饮酒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家畜饲养业的兴盛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相应兴盛起来，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北方地区饲养黄牛和马，长江流域饲养水牛、鸭和鹅。饲养量和品种大幅度增加。河南陕县庙底沟26个龙山文化灰坑所出土的家畜骨骸比168个仰韶文化灰坑出土的还多，其中尤以猪骨为甚。由于家畜饲养量的增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这时，饲养业已成为重要

的谋生手段，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手工业的进步 农业和饲养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龙山文化的陶器生产所采用的快轮制作法，借着陶轮的快速旋转，所制陶器形状规则，厚薄均匀。陶窑结构有了很大改进，火堂加深，火口缩小，提高了烧窑的温度。在高温和陶窑密封下，使陶坯中所含铁素能够充分还原，烧成的灰陶或黑陶，质地坚硬而紧密。此外，还选用高岭土烧成表里白净的陶鬶。这些技术成就，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铜的冶炼与加工是这一时期生产领域中的一项突破成就。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铜锥、铜凿、铜环、铜匕等。这些铜器经鉴定，有的用红铜制造，有的用青铜制造；有冷锻，也有冶铸。虽制作比较粗糙，技术也较原始，但却突破了原始社会漫长的制石工艺，为后来青铜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它手工业如玉石加工，竹藤编织及木制品等手工业工艺也有较大进步。特别是这一时期纺织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有不少苧麻织物和丝织物。其苧麻织物有平纹细布，经纬比较过去的粗麻布要稠密得多。丝织物有绢片，丝带和丝绒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我国江南地区就已经有了养蚕缫丝业。我国丝织物的发明，是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一大贡献。

转轮制陶业与冶铜业的出现以及其它手工业的发展，逐渐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四、父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关系

社会组织 父系氏族公社，是在母系氏族公社解体后出现的

范围较小的社会组织，后来又发展为分散的个体家庭。在父系氏族公社里，原来母系氏族时妇女对生产和消费的支配权已让位于男子，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成了男子独占的生产事业，而妇女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从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120多座墓葬里的随葬品看，女性多是纺轮和装饰品，男性则多为生产工具，说明男耕女织的分工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父系氏族公社中，父系大家长拥有对生产进行指挥和监督的权力。但是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是在没有破坏氏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原来的氏族部落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在开始时一直延续下来。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由于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的提高，农、牧、手工业的分离，原来氏族成员集体从事的劳动，这时只要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就能胜任，个体家庭便取代原来的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于是，出现了氏族公有制和家庭私有制交织的局面。

婚姻关系 在父系制确立的同时，婚姻形态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世系以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妻子到夫方居住，成为父系氏族公社的主要标志。当时的墓葬制反映了这种婚姻制度。群男合葬、群女合葬的习俗消失了，而盛行单人葬，并出现了一对男女的合葬墓以及个别一男二女的合葬墓和父子合葬墓，反映了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确立的情况。甘肃临夏秦魏家等齐家文化的16座男女合葬墓中，普遍的是男子仰身直肢居中，女子侧身屈肢拱向男子。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的一座3人合葬墓，男子仰卧正中，女子侧身屈肢位于左右两侧，皆面向男子。这说明男子已居于统治地位，女子处于屈从的依附地位。

五、私有制、阶级的出现　原始社会的解体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增加了，逐渐出

现了剩余，遂产生了最初的商品交换。开始是不同部落或氏族间的产品交换，交换方式为物物交易，后来发展为用某些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如猪、玉器、贝壳等。我国古代“日中为市”、“祝融作市”的传说，就是这种交换活动的反映。在频繁的交换中，氏族首领利用职权之便把一部分交换所得的剩余产品占为私有，于是出现了私有财产。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劳动逐渐代替了以氏族为单位的共同劳动，各个家庭使用的牲畜、工具等也逐渐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于是，私人占有财富的范围和数量迅速扩大，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大汶口遗址少数大型墓葬，墓坑很大、墓具讲究，随葬品多达160多件，其中有精美的陶器，精致的石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而有些墓葬则迥然不同，墓坑窄小，随葬品极少，甚至一无所有。这是贫富分化现象在墓葬方面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劳动的出现，原来具有血族复仇性质的流血斗争，现在则发展为具有掠夺性质的战争，战俘也不再被杀死而被保留下来，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成为战胜者的奴隶。一些贫穷的氏族成员因偿还不起债务，也被迫充当奴隶。与此同时，氏族内部出现了压迫奴隶的显贵，氏族成员之间平等民主利益的关系遭到破坏。这样，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与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①原始社会迅速瓦解了，我国历史已临近文明时代的门槛。

六、部落联盟和联盟之间的战争　关于原始社会的传说

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氏族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奴隶、财富

---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与领地而发生战争。在战争中一些利害与共的部落联合起来，结成部落联盟。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组成联盟议事会，由议事会选举部落联盟首领，决定重大事件并负责组织指挥战争。

传说四、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中下游有黄帝和炎帝部落联盟；下游有太昊和少昊部落联盟；黄河以南有九黎族部落联盟，其首领叫蚩尤。它们为扩张势力和掠夺土地发生了几次大战。先是蚩尤部落势力向北发展与炎帝部落发生战争，炎帝失利，求援于黄帝，炎黄结成联盟，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南），蚩尤战败被杀。后来，炎黄联盟破裂，双方大战于阪泉（在河北境内），黄帝获胜，并合并了炎帝部落。从此，黄帝势力日盛，成为不断融合中原各地众多部落的核心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帝被尊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后世把许多发明创造如文字、历法、舟车、宫室、蚕桑、衣服等等都集中到黄帝的身上，正说明了黄帝代表着一个时代——由野蛮向文明转化的急剧变革的时代。

黄帝之后，先后出现了尧、舜、禹三个军事酋长。他们都同南方的三苗部落发生过战争。传说尧年老时，推举舜为继位人，得到四岳十二牧会议同意。尧让位给舜。后来舜又以同样的方式让位给禹。四岳十二牧是一些部落首领，四岳十二牧会议就是部落联盟会议，历史上称这种推选继位人的方式为“禅让”，称尧、舜、禹时期为“禅让”时代，实际上就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禹即位后，逐渐扩大职权，部落联盟首领开始向世袭国王转化，原始社会终于走到了尽头。

重要名词：

北京人　丁村人　山顶洞人　氏族公社　仰韶文化
半坡遗址　图腾崇拜　龙山文化　黄帝　禅让时代

思考题：

1．我国出现了哪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

2．北京人体质有什么特征？从北京人的体质特征说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3．以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为例，说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与婚姻关系的状况。

4．父系氏族公社有那些文化遗址？为什么说父系氏族公社是氏族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5．列举我国原始社会的著名文化遗址。

第二编　奴隶社会

（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第一章　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夏、商

（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第一节　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

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夏朝的建立　夏是十多个大小近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在尧、舜时期，定居于大河(黄河古称)之南的嵩山之下。当时，洪水泛滥，威胁着中原各族。尧派夏首领鲧前去治水，鲧用堵塞法治水失败，被舜放逐而死。接着，舜派禹前去治水。禹接受教训，改用疏导法，使洪水归于大海，且“尽力乎沟洫”，①变水患

①《论语·泰伯》。

为水利。这样，中原各族才安定下来，从事畜牧、渔猎、耕播。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①由于禹的努力，赢得了其他各部落的支持和拥护，继舜之后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在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期间，征伐并打败了南方的三苗，很多人被掳掠沦为禹的奴隶，加强了他的地位和权力。这样，禹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县郜城镇），后又迁阳翟（今河南禹县）。相传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执玉帛为贡品来朝者有"万国"之多。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九州的首领叫"九牧"，九牧负责向禹缴纳贡赋。禹东巡到会稽，会诸侯。防风氏没有按时到会，被禹杀死。②禹的所作所为，俨然是一位权势显赫的国君了。

禹年老时，部落联盟议事会曾推举伯益为他的继承人。禹死后，禹子启杀了伯益，继承了禹的地位，建立了夏朝，自立为王。从此废除了禅让制，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王位世袭制，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从此产生了，这标志着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启继位后，西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起兵反抗。启率军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河南洛阳附近），有扈氏族被"剿绝"了，③启巩固了他的地位。这表明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启死，长子太康继位，夏内部发生内讧。先有太康兄弟间的争位，后有贵族们的叛乱，削弱了统治力量。太康本人也昏庸无能，沉醉饮食歌舞。东夷有穷氏酋长后羿乘机取而代之，夺得了夏政权。但后羿也"不修民事"，只顾田猎游乐，把政事交给寒浞管理。寒浞用献媚逢迎的手段取得后羿的信任，杀死后羿，取得了政权。太康失国，与弟仲康一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国语·鲁语下》。
③《尚书·甘誓》。

同逃往西方，不久死去。仲康子相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即位，依靠斟灌及斟鄩等东方诸侯。寒浞杀羿，大力消除亲夏势力，灭掉斟灌和斟鄩，又攻杀了相。相妻出逃，当时已有身孕，后生子少康。少康成人后，联合夏的贵族和余众，终于灭掉寒浞，并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前后经历了大约40年左右，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才最后确立。

国家机构 夏朝建立的机构已具备了国家的特征。夏王把国家疆域划分为“九州”，②进行统治，派遣“九牧”去进行管理，而“九牧”则是统治一方的地方长官。另外，还设立掌管农业生产、畜牧、膳食和车服等官职。夏王建立军队，设立六卿掌管军事。制定刑法，修建监狱。相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③《禹刑》则是夏代刑法的总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刑法。与此同时，称作“圜土”和“夏台”的监狱也产生了。作为供养统治阶级之用的捐税即“贡赋”开始征收。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④《孟子·滕文公》也说：“夏后氏五十而贡”。以上事实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在夏朝已经形成。

二、夏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 根据文献和考古证明，夏王朝活动中心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这里是黄河冲积的地带，土壤肥沃，宜于农耕，非常有利于人类的生息。据考古发现，在代表早商的郑州二里岗型文化层下面，叠压着二里头型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下面是代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经碳—14测定距

①《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
②《禹贡》分“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③《左传》昭公六年。
④《史记·夏本纪》。

今约4000年，正好与夏相当。从分布上看，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与文献记载夏的活动范围基本吻合。从而确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以镰、刀、斧、铲为主，质料以石器最多，骨器、蚌器次之。在一些房基和墓葬的土壁上，发现了木耒的痕迹，说明木制工具也是当时重要的农业用具。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出土农具数量已大大超过龙山文化，而且收割农具比垦殖工具大为增加，表明农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产量有所提高。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能够提供比从前更多的粮食，从而使一部分人有条件由农业部门转向手工业生产。夏代手工业主要部门是烧制陶器，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陶器，有炊煮用具、食器、容器和大批酒器。代表夏代手工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的是青铜冶铸业。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制作的生产工具、武器和礼器，如锛、凿、刀、爵、镞、铃等。青铜是铜、锡、铅溶在一起冶炼出来的合金，硬度高，可以铸造大型器物。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整铜、锡、铅比例，便可冶炼出不同硬度的合金，这是一项复杂的冶金技术，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化　夏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夏书》中有“辰不集于房”的记载，①就是说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日食。这次日食，天文界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②

干支记日的方法，夏代已经开始使用。夏朝最后几个国王，胤甲、孔甲、履癸等，都是以天干命名的。

夏历是根据北斗星斗柄的旋转，以确定一年十二个月份，以

---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561页。

斗柄指向寅的正月为岁首，即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古人认为“夏数得天”，①就是说夏历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运行规律，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②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行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书中有些内容可能属后人的增添，但多少反映了夏人历法知识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

三、夏朝的灭亡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转入后期。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③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夏王朝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孔甲三传到桀，桀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为了享受，大肆“作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④建造了许多豪华宫室台榭。桀又发动对有缗氏的战争，劳民伤财，耗费大量人才、物力。《尚书·汤誓》中说夏桀“率竭众力”，“率割夏邑”。《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民对于桀的暴政，愤怒的高喊：“时日曷丧？予及女(汝)偕亡！”⑤这时，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以讨伐夏桀的虐政暴行为号召，发动了灭夏战争。夏桀势孤力穷，战败逃亡，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夏从禹到桀，共传14代，17王，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享国约500年。

---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论语·卫灵公》。
③《史记·夏本纪》。
④《竹书纪年》。
⑤《尚书·汤誓》。

第二节　商朝奴隶制国家的发展

一、商朝的建立和盘庚迁殷

商的兴起　商族是黄河下游古老的部落。起源于东方的夷人氏族。契是这个部落的始祖，他被舜"封于商，赐姓子氏"。①"商"是这个部落的居住地(在今河南商丘)，"子"是这个部落成员的共同姓。商族与夏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契曾协助大禹治理洪水。不过，夏朝建立时，商族还处在父系氏族公社的阶段，是夏东边的一个方国。

契的孙子相土时，夏发生了后羿寒浞之乱，相土乘机扩展势力，"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②相土把商的势力发展到东海之滨。《世本》记载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说明商人已掌握了役使畜力的方法，并用于交通和生产。亥是相土的曾孙，相传他赶着牛群到河北去贸易，被有易氏首领绵臣所杀，运载物资的牛群也被夺去。亥的儿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武装，战胜有易氏，杀死了绵臣。进而将商的势力发展到黄河之北。上甲微时期，是商人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

经过近500年的发展，汤时商已成为东方地区强大的方国。与此相反，桀统治的夏王朝正走向衰落，东方地区众多小国纷纷叛离夏桀。

成汤灭夏　汤即位以后，以亳（今河南商丘）为新都城，大力争取附近众多小邦的归属。任用很有才干的伊尹为相，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在这一形势下，汤率其部众逐步展开对夏的攻势。首先灭了夏在东方属国葛（今河南宁陵），接着又征服了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濮阳）三个夏

---

①《史记·殷本纪》。
②《诗·商颂·长安》。

桀属国，翦除了夏的羽翼。从此。商控制了广大东方地区。接着汤兴兵伐夏，两军战于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东)，桀师败绩，逃亡南巢，夏朝灭亡。汤在亳正式建立了商王朝。

盘庚迁殷 汤死后，经太甲到太戊，商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太戊以后，十传至盘庚。其间只有祖乙时，王朝比较安定。其它时间“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而王朝首都，也先后迁徙了四次。他们分别是：仲甲迁嚣(郑州)、河亶甲迁相（河南内黄)、祖乙迁邢（河北邢台)、南庚迁奄（山东曲阜）。迁都原因，有各种可能，如征伐异族，逃避内乱，洪水冲击等。多次的迁徙，使人心不安。盘庚即位，由奄迁殷，行汤之政，奠定了商后期的统治基础。至纣灭，273年间，殷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不过商人自己始终自称商，“殷”是后来的人对商含有贬意的称呼。②

二、商朝的阶级结构和国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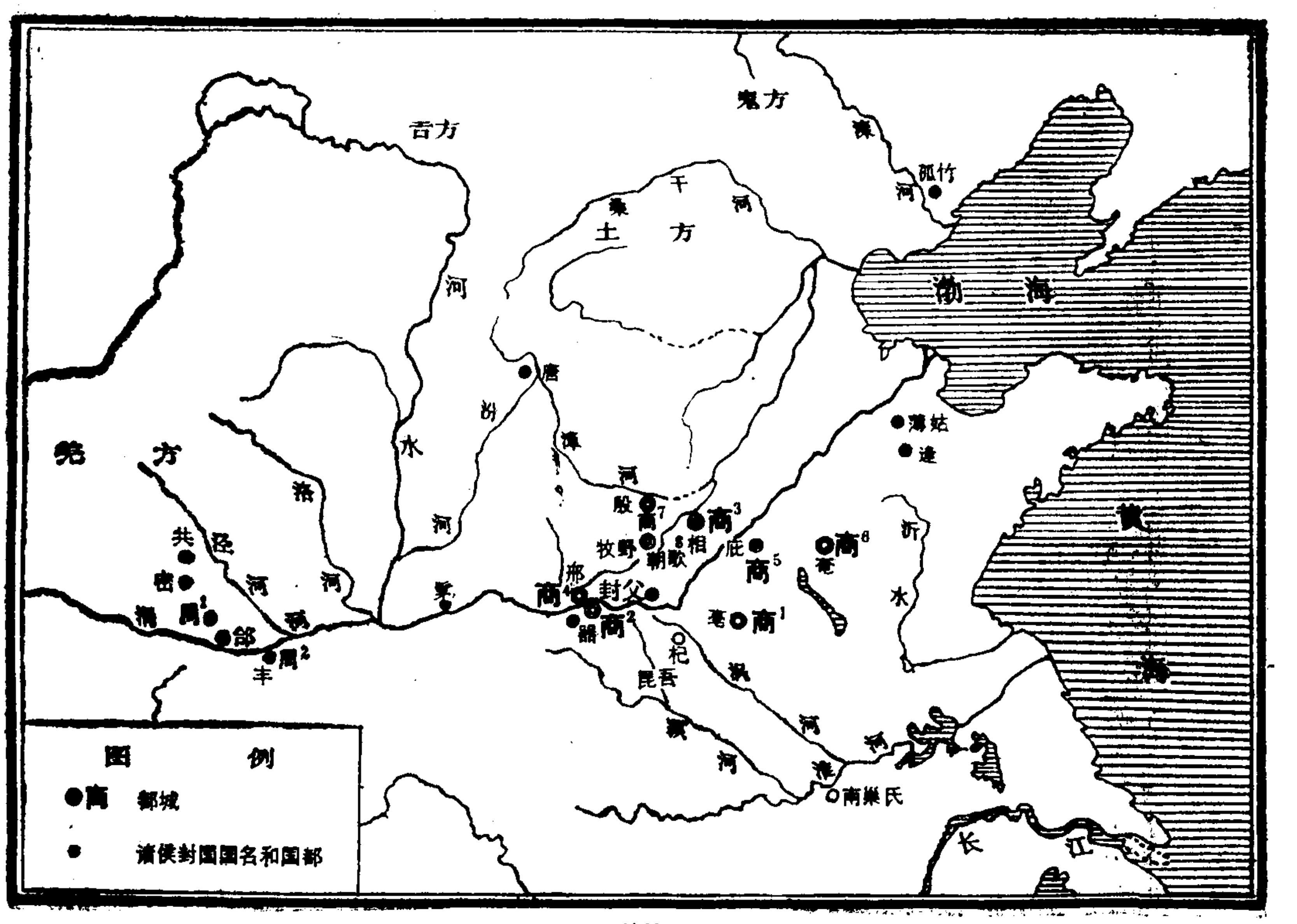
阶级结构 奴隶和奴隶主是商代两个最主要的阶级。由于不断对外进行战争，大量的俘虏以至战败的整个邦国或部落都沦为奴隶。当时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他们世代终生为奴。

商代奴隶的名目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用于农业的奴隶被称之为“畜民”或“众”、“众庶”。甲骨文众字的形状，象众人在烈日下劳动；用于畜牧业的奴隶称为“刍”或“牧”、“皂隶”；用于手工业作坊里的奴隶称为“工”这些人有专门技艺，地位稍高一点；用于奴隶主家内生活各方面的奴隶称为臣、妾、僮、仆、宰、奚等。

介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平民，被称为“小人”。他们是商

---

①《史记·殷本纪》。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图例
商 都城
诸侯封国国名和国都
鬼方
𢀛方
舌方
土方
孤竹
渤海
黄海
长江
唐
殷 商7
商3
牧野
朝歌
相
庇
商5
商6
亳
商4
封父
商2
嚣
商1
杞
昆吾
南巢氏
薄姑
逢
共
密
周1
邰
周2
丰
沂水
汾河
洛河
泾河
淮河
颍河
漳河
易河

商朝形势图

人中的下层劳动人民。他们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要承担纳贡、服兵役和劳役，生活十分困苦。一旦触犯了贵族的法律或负债而无法偿还，也要沦为奴隶。

国家机构 在夏代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商代的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商王自称“余一人”，独揽一切大权。王位的继承，由夏到商基本上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相结合。商时，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才逐渐确立。商王之下，地位高、权势大的有冢宰或师尹，他们是辅佐商王的百官之长；仅次于冢宰的官吏为卿士，有司徒、司空、司寇、司马等，他们是分掌朝政的政务官；而在他们之下还有具体分掌各项事务的小官吏，如管理农业的“小耤臣”，管理众人的“小众人臣”等；另外还有巫、祝、宗、卜、史等宗教巫职机构。官僚体制相当庞杂。

军队和刑法在商代明显地加强了。甲骨文中有：“王作三𠂤（师）：右、中、左”的记载。这里所谓的“三𠂤”，是商王直接统辖的军队，可能也是商代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据甲骨文记载，每有战事发生，商王还要另外“登人”，即征兵。动辄三、五千人，最多曾达到万人。车战是商代的主要作战方式。车上有甲兵。车下有徒(步)兵。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不少武官的名称。如“多马”、“多亚”、“多射”。商王的兵源中，主要是平民，也吸收部分奴隶参加。

史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①《汤刑》比《禹刑》有所发展。荀子说：“刑名从商”。②说明商代的刑法条目已渐趋完备。相传商的刑罚残酷，有流放、砍头、活埋、炮烙、脯醢等。甲骨文中的“刖”（yuè，月）刑就是砍脚，有一片甲骨文说：将要对一百人实行刖刑，问神是否可以？③可见刖刑的规模

①《左传》昭公六年。

②《荀子·正名》。

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87页。

是十分惊人的。商代的监狱叫“圉”。甲骨文的“𡴘”(幸)字，形似手铐。把“幸”字放在方框里面，就成了“圉”字，这就是监狱的形象。

利用宗教统治人民更是商代的一大特点。巫职机构在商代政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事无大小，都要通过占卜，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把政治和鬼神迷信结合起来，麻痹和愚弄人民。

三、商朝的社会经济

农业 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甲骨文关于农事的记载非常多，几乎包括了与农业有关的一切方面。“受年”，“受禾”、“受黍”就是卜问农作物的丰歉，祈求粮食的丰收。这些活动都由商王亲自主持，足见对农业的重视。

商代的农作物品种已经相当繁多。甲骨文中最常见的是禾(谷子)、黍(黄米)、稷、粟、麦、菽、稻等，这些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考古发现大量贮藏粮食的窖穴和酒器，文献记载商人酗酒成风，都说明当时农业已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生产主要工具是石器、骨器、蚌器。考古发现最多的是石铲、石镰，其次是蚌铲、骨铲、蚌镰、石斧等。木质工具不容易保存，可以肯定商代曾大量使用木质工具。在殷墟的许多窖穴壁上，发现了清晰的木耒痕迹。尽管商代青铜冶铸业相当发达，目前发现的青铜农具还是十分稀少，表明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不是青铜器。

甲骨文把田字写作“田”、“囲”“田”等形。表明在广阔的平原上，分布着大片规整的方块田。井田制是商代基本的土地制度。井田上的劳动者是“众人”。他们在“小耤臣”、“小众人臣”等奴隶头目监督之下从事耕作。其耕作方式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甲骨文中有“王大令众人曰：劦田，其受年”①的记载，

①《殷墟书契续编》2、28、5。

就是有力的证据。

畜牧业 商人素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商王对畜牧业更是十分重视。甲骨文中就有商王武丁曾亲自去巡视养牛情况的记录。牲畜的饲养和管理，有专门的官吏“宰”、“臣”。饲养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数量十分惊人，除食用外，大量用于祭祀、驾车、作战和田猎。尤其是祭祀“用牲”的数量，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三、四百头，甚至上千头。

手工业 商代手工业生产发达，青铜冶铸业是其主要部门。青铜与纯铜比较，有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质稳定和易于铸造等优点。由于铜、锡比例的不同，其特性又有差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了不同器物的不同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剂……”。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经过化学分析，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与《考工记》所谓钟鼎之剂，大体相近。说明商代冶铸工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青铜的冶铸工艺。殷墟冶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发现陶范4千多件，炼炉、炉渣、木炭等，规模宏大。出土的青铜器物种类繁多，常见的是礼器、酒器和用具，如鼎、鬲、甗（yǎn演）、簋（guǐ鬼）、爵、盘、觚（gū孤）、斝（jiǎ甲）、盉（hé合）、盂、壶等；其次是兵器、工具等。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标志我国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高峰。在当时条件下，冶铸这样大的鼎，估计需要二、三百名工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商代手工业门类繁多，除青铜冶铸外，还烧制陶器、制造骨器、玉器、车辆等。

商代陶器产品一般为灰陶、红陶和黑陶，代表当时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是以高岭土作胎，釉施于器表及口沿的原始瓷器。这种瓷器，釉色光亮，以青绿为主。它证明最迟在早商，我国已

经发明了瓷器。这种瓷器，质地坚硬，造型优美，色泽皎洁，目前仅在殷墟中有所发现，是和青铜器同样名贵的工艺品。

商代麻、丝织业也很发达。在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卷麻布，是大麻纤维织造的。另外还发现青铜容器和武器上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殷墟遗址有丝绸残片，有平纹、菱积花纹的暗花绸，说明当时的织机可能有了提花装置，标志商代丝织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商业 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畜牧、手工业发展基础之上的。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出土成批海产品，如海贝、海蚌、鲸鱼骨，以及占卜用的大龟，这些都是海洋边的物产。制玉器的玉料则盛产于新疆一带，总而言之都来自远方。商代以海贝为货币，十贝为一“朋”。贝既是流通手段，也是财富的象征。1960年在安阳发现了祭祀坑中有54具人骨架，其中七具带有贝，少者一枚，多者达300枚左右，或含在口中，或藏于胸前，或压在股下。1976年安阳小屯村北发掘的武丁妻子妇好墓，竟有贝6800多枚。贝的广泛殉葬，反映了商业的发展。此外，还发现有石贝、骨贝、蚌贝、铜贝等，而铜贝的发现，应当是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

《尚书·周书·酒诰》载：周公对康叔说殷人中有一部分人，农事毕后，他们就赶上牛车，到远处去从事贸易，用赚得的钱财孝养他们的父母(“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由此可见，商业也是商人重要的经济活动。

四、商朝的灭亡

人祭和人殉 人祭和人殉是商王朝政治活动的一大特色。奴隶主为了加强政权的神圣色彩，频繁地举行各种祭祀，以人为牺牲贡献给上帝、百神。现存的有关人祭的甲骨文为1350片，记载了用于人祭的奴隶人数有13052人之多。殷墟考古发现的人

祭，触目惊心。1976年，发掘了470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地排列着250个祭祀坑，约有2000具人骨。其全貌估计有祭祀坑上千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是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延续时间很长，大约从武丁直至商末。

人殉是用奴隶为死去的奴隶主殉葬，一般中小奴隶主，用1至2人殉葬。山东益都苏埠一地方贵族大墓殉48人。安阳武官村一贵族墓殉79人。安阳侯家庄一商王陵殉157人。墨子揭露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①看来是言之有据的。

暴虐的奴隶主统治与残酷的人祭、人殉，加剧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不堪虐待和奴役的奴隶利用逃亡、怠工、破坏工具以至纵火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甲骨文中有"丧众"、"王途众人"等文字，就是指奴隶逃亡与奴隶主派人追捕奴隶的记录。武丁时期王室奴隶集体逃跑，武丁下令追捕，用了15天时间，才追回一部分。

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是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相配合的。平民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也占有少量奴隶，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被贬为奴隶。武丁以后商代贵族奴隶主，大都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②的寄生虫，加重了对一般平民的迫害，"小民方兴，相为敌仇"。③他们与商王和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商朝的灭亡　武丁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日益尖锐复杂，商王朝逐渐出现衰乱的现象。商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纣即位后，加速了商王朝的毁灭。他上台以后，把都城扩大到朝歌等地，大建

①《墨子·节葬》。
②《尚书·无逸》。
③《尚书·微子》。

离宫别馆，恣意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欢。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大肆搜刮钱财，“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①为了镇压反抗和不满，纣王又滥施酷刑，用“炮烙之法”、“醢”、“脯”等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纣王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奴隶和部分贵族的愤怒。为了转移视线，他又发动了对周边各族的战争，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社会局面，就象盛夏时节众蝉在噪鸣，也好似鼎沸的一锅热汤②，呈现出一幅民怨沸腾，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景象。连商统治阶级内部也发出“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③的哀叹。

此时，兴起于渭河流域的周族日益强大，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兵败自焚，商王朝灭亡。从公元前16世纪初到公元前11世纪中，商王朝由汤到纣，传17代，30王，约600年左右。

五、商朝的文化艺术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和兽骨上的文字，因其内容多是记录占卜之事，故又称甲骨卜辞。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如人写作⼉，象侧面人形；羊作羊，象羊头；月作☽等等。有些意思无法象形，就出现以会意、形声、假借来表达。目前发现有4672个甲骨文字④，已有约2千字可以释读，其主要内容，是记录商人向上帝、鬼神卜问吉凶或祈求指示的经过和结果。它为我们保存了当时有关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

天文历法 由于农事对季节的敏感，古人十分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对历法的掌握。甲骨文中记载了不少星名，如大火、新星、鸟星等，还有日食、月食的记录。

---

①《史记·殷本纪》。
②《诗·大雅·荡》。
③《尚书·微子》。
④《甲骨文编》。

商人的历法为阴阳合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以月亮圆缺一次为一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为了与太阳运行同步，有时在一年12个月之后加一个月，称"十三月"，说明商人已懂得置闰月。

艺术 商代艺术最为突出的是造型艺术。用作祭祀的青铜礼器，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铜器的表面多饰以动物：饕餮、夔龙、虎、羊、牛、鹿、蝉、鱼……这些动物形象与器形巧妙配合，令器物神秘莫测，威严庄重。湖南宁乡出土一件四羊方尊，把四只羊与方尊四棱肩部结合起来，构成一件神奇的艺术品。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象和石牛，显示出很高的石雕艺术水平。

商代音乐已具有相当的水平。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①直到周代师氏一直是王室专职乐师。安阳武官村出土一件青白大理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制作精美，敲击之声悠扬清越，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大型乐器。

重要名词：

二里头文化　　商汤灭夏　　盘庚迁殷　　人祭与人殉　司母戊鼎　　甲骨文

思考题：

1、夏朝是怎样建立的？为什么说夏朝是奴隶社会？

2、商朝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如何？为什么说它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

---

①《史记·殷本纪》。

第二章　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第一节　西周的建立及其统治

一、周朝的建立

周的兴起　周人是活动于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民族。始祖后稷，名弃，善稼穑，被尧、舜举为农师，并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姓姬氏。后世奉弃为农神。传说后稷母姜嫄在野外见巨人足迹，践之怀孕，生后稷。说明周人的历史追溯到这里只剩下"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传说了，也反映了后稷是周人由母系氏族转化为父系氏族的开始。

后稷三传到公刘，公刘率周人迁至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重新发展农业经济，丈量土地，寻找水源，营造房舍和宗庙，周人开始兴旺起来。

公刘之后九世，古公亶父为周人首领。周人所居之豳，经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毅然率众渡过漆水（今陕西横水河），翻越梁山（今陕西永寿梁），来到岐山之阳，找到一大片平原安居下来，开沟筑垄，整理土地，修建了宗庙，设置了百官，这里后来就被称为"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周人的历史

从此揿开了新的一页。

古公亶父死后，幼子季历继位。他继承了古公亶父之道，“积德行义”，并展开了对戎狄部落的斗争，解除了来自西北的威胁，并开始扩张势力，“奄有四方”。①国势日益强大。

季历死，子姬昌继位，这便是著名的周文王。他在位50年，他的主要功绩是为“翦商”事业做好了准备。《史记·周本纪》说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结果“士以此多归之”。此时商纣王暴虐，诸侯西顾，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都拥戴他，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②史称“西伯（姬昌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商的属国虞（今山西平陆北）、芮（虞国之西）争地，不去商却入周，请文王评断。二国君入周之后，见周人彬彬有礼，皆惭愧，遂以所争之地为闲田。也说明周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商的优势。

虞、芮归附的第二年，周人在文王的领导下开始了“翦商”的事业。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打败黎国（今山西长治）、邘国（今河南沁阳）和商王属下的大国崇（今陕西西安沣河西），又在沣水西岸崇之故地作城，称丰邑，并从岐山迁都于丰。此举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文王在迁都丰邑的第二年死去，其子姬发继立，即为武王。这时，周人灭商大势已基本形成。

武王伐纣　武王继位，尊姜尚为“师尚父”，负责军事；以诸弟中最有才干的姬旦为辅佐，负责政务。姬旦采邑在周，故称周公；还任命召公姬奭、毕公姬高等人为助手。接着又迁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武王继位第二年，率兵东进到达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不期而会于孟津者有“八百诸侯”。诸侯皆

---

①《诗·大雅·皇矣》。

②《论语·泰伯》。

曰："纣可伐矣"。①但武王十分谨慎，认为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决定退兵。这次行动实际上是对商的一次武力试探。

孟津之会后二年，纣王的暴虐愈来愈甚，亲小人，弃贤臣，迷信武力，根本不听劝谏。大小官吏为非作歹，酗酒成风，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统治核心严重分裂，纣王叔父比干被杀，从兄微子逃奔国外，贤臣箕子佯狂为奴。加之"东夷叛之"，②纣王正集中主力对付东夷，国中空虚。于是武王下令出师，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③遂亲率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伐纣。各路诸侯也纷纷参加。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直奔商都朝歌。纣王匆忙组织了70万大军，双方军队在商都城南郊牧野（河南汲县西南）展开战斗，结果纣兵倒戈以迎武王。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王宫，登上鹿台，带着珠宝自焚而死。至此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　克商之后，武王在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上，采纳了周公的建议，让殷人依旧居其宅，种其田，维持原有家族组织，用仁德怀柔他们。又将殷王畿之地分为三国，称邶、鄘、卫，分别由武王之弟霍叔处、管叔鲜、蔡叔度进行统治，令纣王子武庚居商都殷，以控制商民。这样便于管、蔡、霍三叔监督武庚及殷遗民。随后，罢兵西归。

两年后，武王病逝。年幼的太子诵继位，即周成王。周公为了稳定政局，代替成王行政当国，史称"周公摄政"。但管、蔡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④有夺取王位，代替成王的企图。武庚乘机串通管、蔡，联络商人的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

---

①③《史记·周本纪》。
②《左传·昭公四年》。
④《尚书·金縢》。

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等邦国，起兵叛变。一时，新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周公面对不利形势，首先对姜尚和召公解释，维护王室核心的团结；接着率兵东征，经过三年苦战，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制服了殷人，相继平定了淮夷、奄等东方诸侯。王朝统治基本稳定下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又命令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镇抚东方，后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邑为"宗周"。

二、分封制与宗法制

分封制 周王朝的疆域与商王朝相比，是空前地扩大了。它以中原和关中为中心，北到河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南到江南和四川，东至大海，西及陕、甘。为了加强对广大地区的统治，周初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周王把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和先朝贵族等，分别授与一定范围的土地和奴隶，建立诸侯国，达到拱卫王室中央的目的。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封建，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周初分封国主要有：卫国，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鲁国，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齐国，功臣姜尚的封国；燕国，召公姬奭的封国；宋国，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等等。据荀子讲，周初分封了71国，而姬姓53国。②实际上，周初分封国数字还不止于此，夏商时期保留下来臣服于周而称诸侯的小国就更多了。

周王分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王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其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宣布封疆的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臣民一起赐予受封者。此外，受封者还要接受周王赏赐的官爵、奴隶、礼器和仪仗等。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

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荀子·儒效》。

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朝聘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更重要的在于捍卫王室、以蕃屏周。

诸侯在其封国内，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有权将分得的土地和辖区人民、奴隶再分封给他们的属下，受封者称为卿大夫，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有权以同样的方法分封其属下为士，封地称为食地。诸侯、卿大夫、士都是世代相袭。这种层层分封，使统治者建立起上自周王，下到士的一个奴隶制贵族的统治体系，从而也就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发展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对边远地区的开发，起了积极的作用。

宗法制 宗法制是从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是把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统治制度。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征。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① 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周王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其余诸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根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他的诸弟被分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卿大夫也在各自的采邑内，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内也是大宗，其余诸子则为"士"，是为小宗。士的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总之，始祖的嫡系后裔均为大宗，从周室的王位到诸侯、卿大夫，都必须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形成"世卿世禄"的特权制度。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种关系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等级的阶梯，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制度。

---

①《公羊传》隐公元年。

三、奴隶制国家的强盛

国家机构　西周王朝在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加复杂的统治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周王是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王以下是重要的辅弼之官，有太师、太保、太傅，称“三公”。他们总揽军政大权，地位显赫。三公之下是“六卿”：太宰、太宗、太士、太史太卜、太祝，分掌王室财务和奴隶，贵族事务，司法，册命和祭典，祭祀祈祷、卜筮。另外还有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等，分别管理农业、手工业、军赋、爵禄和刑罚。还有师氏、臣、旅等，是统兵作战的。这些官吏均由贵族担任，以采邑作奉禄，职位和采邑世代相袭。

礼制与刑法　商王朝治国的法宝是利用鬼神，而周人治国的主要工具则是“礼”。①礼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制度，大至天子诸侯废立，小至士人君子一言一行。后世儒家将礼分为五类，称“五礼”，即吉（祭祀）、凶（丧葬）军（军旅）、宾（宾客），嘉（冠婚）。在行礼的仪式上，要依不同的礼而演奏不同乐章，故有“制礼作乐”的说法。西周统治者充分利用礼，以维持“贵贱有等”的统治秩序。在“礼”之外，就是刑法。《礼记·典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贫困而忙碌的下层群众是谈不到讲“礼”的，礼只适用于上层人物，大夫以上的人犯法另有处置。刑法是为庶民而制定的。周代有所谓“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剕（刖足），宫（破坏生殖机能）、大辟（杀头）。此外还有鞭刑和流刑等。据《尚书·吕刑》讲，五刑条目已有三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1975年，在陕西古周原遗址中发现窖藏青

①《礼记·表记》。

铜器群，其中一件青铜器𠑇匜，记载了牧牛上告其上司师𠑇而受处分。这是一份诉讼判决书，涉及鞭、墨、赎等刑法，是西周存在成文法和刑法制度的可靠证据。可以和古文献相印证。

军队 西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王室的军队，除禁卫军外，还有宿卫宗周的“西六师”，宿卫成周的“殷八师”。《周礼》记载，一个师为1万人，14个师共14万人。如果再加上各诸侯的军队，那就更多了。

第二节 西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井田制度

井田制起源 “井田”二字连用，是出现在井田制崩溃以后人们的追述之中。标准的井田是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把土地分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形似“井”字，故称“井田”。井田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土地公有、定期在各家庭间重新分配制度在阶级社会里的遗留。它形成于夏商，繁荣于西周，衰落于春秋，它是古代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基本土地制度，也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

井田制度 西周的井田制，周王实际上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①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生动写照。国王凭借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各级贵族又是封国和采邑土地、臣民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奴隶主阶级把代表它那个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叫做“公”，因此，这种土地被称为“公田”，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

①《诗·小雅·北山》。

而在“公田”之外所开垦的荒地，则属于“私田”。

井田制下，土地分配各家使用，一夫受田百亩（约合今31.2亩），是当时通行的标准。随着农夫年龄，人口的变化，井田的土地要定期重新分配。《周礼·地官·遂人》说：“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岁时”，即定期之意，“稽其人民”，就是清查劳力变化。其具体时间是“三年一换主易居”。①

井田上的剥削方式，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周人百亩而彻”。周人的“彻”法，历来解说不清。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②赋就是贡。野人用助法，国人用贡法，这可能就是周人的“彻”法。所谓“国人”就是指居住在城邑中的奴隶主贵族和为他们服务的工商业者以及一些平民，而居住在城郊以外广大地区的庶民，则是“野人”。西周时期对广大庶人的剥削，主要还是“助”法，即借民力而耕公田。国人只是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

井田上的劳动者——野人，长年居于田中茅庐，他们的人身完全被束缚。在劳动时，要受到奴隶主贵族派遣的工头和爪牙的监督，饭食由妻儿送到田间。直到冬天农事完毕，他们才能从野中回到邑里。不过这时，野人还要为主人田猎、酿酒，他们的妻儿还要集中起来，夜以继日地为奴隶主纺织，一个月要干45天的工作。井田制度为奴隶主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 周人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周人之“周”字，甲骨文中象田地中谷物。

西周的农具，仍以木、石、骨、蚌器为主，但也有所改进，出现了金属农具。主要有钱、镈、铚、耒耜等。《诗经》中有

①《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②《孟子·滕文公上》。

“畟（cè）畟良耜，俶载南亩”，“有略其耜，俶载南亩”的记载，形容当时农具的锋利。钱即今之锹；镈即今之锄；铚为镰刀；耒耜是翻土的工具。近年出土的青铜镰，青铜铚等，均系西周器物，说明西周已有金属工具用于农业生产。

西周的劳动方式主要是二人合力而耕的“耦耕”。《诗经》中有“千偶其耘”，“十千维耦”的诗句，是大规模集体垦殖、耕耘的反映。这种耕作方法，在当时有利于农业生产。

就农业生产技术而言，当时周人已采用休耕制以息养地力，并注意灭虫、除草、施肥以提高产量。《诗·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这是指除虫。《良耜》说：“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杂草腐朽了，庄稼就长得好，说明周人已懂得绿肥壮田的道理。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黍、稷、稻、麦、菽及桑麻、瓜果等。丰收的粮食颇为可观，《诗·周颂·良耜》写道：“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丰年》中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描述了奴隶们的辛勤劳动，打下粮食，装满了奴隶主的粮仓。

手工业 西周手工业生产仍以青铜冶铸业为主。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拥有自己的青铜作坊及其它行业作坊。在这里劳动的，是世代相袭的手工业奴隶。西周的青铜器分布很广，远非商代可比。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大大超过了商代，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器物，如匜、戟、剑等，这是商代所没有的。西周青铜器与商代不同，大都铸有长篇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长达497字，字体严谨、整齐；铜器的纹饰变得轻松、粗犷、简朴，显示了高度的铸造水平。

西周的原始瓷器较商代又有进步，吸水性更小，胎质更细，釉层厚而均匀，接近于后世瓷器水平。原始瓷器的制作范围也扩大了。西周瓷在陕西、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

《诗经》中有许多采桑养蚕和纺绩的描写。如《豳风·七

月》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说明周人不仅织绢帛，也能织锦。1979年，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村出土西周时白、黄、红色丝绸残迹，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丝织物。同时也说明周人的纺织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建筑业在西周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近年来在周原上发现的凤雏村、召陈村遗址，代表了西周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凤雏遗址是早期宫殿（宗庙）遗存。全部建筑座落在整片夯土台基上，是一个封闭性的建筑群。它以殿堂为中心，采取南北中轴的对称布局，结构严谨，井然有序。凤雏遗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个严格对称布局的高级建筑群。该建筑群的墙壁用夯土版筑而成，说明当时建筑技术水平之高。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屋顶已经使用了瓦。召陈村的建筑群基址属于西周中、晚期。这时屋顶已经全部施瓦，瓦有板瓦，筒瓦，每种都分大中小三种型号。瓦的发明和使用，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巨大进步。后来的"秦砖汉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西周的制骨、琢玉、舟车和漆器等手工业部门比商代也有所发展，表明了西周工匠们高度的工艺水平。

商业 同手工业的情况一样，商业也垄断在王室及诸侯手中，商人与手工工匠一样，也属奴隶，故称"工商食官"。在当时的通都大邑中，设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市，并设有专职官吏——"质人"，负责监督交易的进行。交易的货物有牛马、兵器、珍宝和奴隶等。老百姓往往到市上出卖自己纺绩的丝织品，换回需要的日用品。《诗·卫风·氓》就说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这种民间贸易的写照。

西周货币仍然是贝。周代的一些墓葬中发现很多贝。如河南浚县辛村的一座卫墓，殉贝就达2915枚之多。铜器铭文常有

"锡贝"的记载。此外，青铜也可作为货币行使，其使用单位是"寽"。

第三节 西周的衰亡

一、西周后期的社会危机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西周昭、穆两代开始，由于一些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农业生产的经营，使得田地荒芜，奴隶逃散，积蓄耗尽，开始趋于衰落。而一些原来地位较低的贵族，锐意经营农业，招抚流散的奴隶，千方百计地谋求扩大耕地，形成新的暴发户。加之政治上的升降，引起贵族集团内部的波动，各种矛盾不断加深，社会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混乱现象。趋于衰败的贵族，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将自己的田地作价转让给暴发户。1975年，岐山董家村出土裘卫四器，其中铭文记载：共王三年，裘卫用价值100朋的瑾璋（玉器）、赤玉琥、鹿皮披肩等，换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共王五年，裘卫又从邦君厉手中换得四田；共王九年，裘卫用一辆好车和车马用具等，换取矩伯的一块林地。这几起土地的交换、转让都得到王廷有关官员的认可，并由他们亲自踏勘现场。这样土地转让，还远非自由买卖性质，但"田里不鬻"的格局，显然已被突破了。

到了西周后期，失势的贵族越来越多。他们占有土地不少受到兼并，奴隶也几乎逃散了，"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①就是这一情景的写照。

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周人以"西土之人"自居，境内外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其总称。周王朝与他

---

①《诗经·大雅·瞻卬》。

们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的地方经济也不断发展，部分少数民族也开始兴盛起来。他们与周王朝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周昭王时，曾亲自率军出征南方的楚国，在渡汉水时，船身解体，昭王落水而死，从此，失去了控制南方的力量；东方徐奄诸部也曾西伐宗周，虽遭到失败，但周王朝付出了很大代价，大大削弱了对东方的统治。此外，犬戎、鬼方等少数民族也在不断威胁着中原。

奴隶的悲惨生活及反抗斗争 奴隶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而自己却只能过着"我取其陈"，①"采荼薪樗"②的生活。可见，供奴隶们裹腹的不是贵族粮仓里的腐烂积谷，就是田间的野菜。西周的奴隶被称为"臣"、"鬲"、"人鬲"等，周王常将他们成十成百，甚至成千的赏赐给贵族。康王时的《大盂鼎》记载了奴隶主盂得到了"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的赏赐。西周已出现了奴隶市场。《曶鼎》记载了奴隶主曶从市场上买来五名奴隶，其价格为"匹马束丝"。说明了奴隶的买卖和其价格远不如牲畜。另外，西周还存在着野蛮的人祭、人殉制度，其数量比商代已经大大减少。但奴隶遭屠杀的危险依然存在。在陕西沣西发掘的西周早期的一些中小墓葬，发现殉葬的奴隶，有一墓4人的，有一墓一、二人的。四个车马坑，都有一名驭人殉葬。广大人民群众对奴隶主贵族的残酷掠夺，发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咒骂贵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③为了摆脱奴隶主的统治，奴隶逃亡的现象更为普遍。他们向往自由的乐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④不

①《诗经·小雅·甫田》。
②《诗经·豳风·七月》。
③《诗经·魏风·伐檀》。
④《诗经·魏风·硕鼠》。

过这种乐土是不存在的。于是，离乡背井的奴隶们群聚在山林薮泽之中，开展武装斗争，被统治者呼之为“盗”。其实，这种“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①的局面完全是统治者激起的。

二、厉王专利和国人暴动

厉王专利 周厉王姬胡是一个贪婪、暴虐的统治者。他任用不识治国大体的荣夷公为卿士，对原属公有的山林川泽实行“专利”。原来井田之外的山林川泽，国人都可以自由牧渔樵采。“专利”触犯了国人利益，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国人不满厉王专利，厉王又委任卫巫，让他监视国人，有诽谤者一律处死，至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②国人怨恨日积，终于爆发了武装暴动。

国人暴动 由于厉王弭谤，国人不敢说话达三年之久，公元前841年，镐京的国人与工匠、军卒联合起来攻入王宫，厉王狼狈出走，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暴动之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③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从这一年开始。共和元年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三、宣王中兴和西周灭亡

宣王中兴 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是为宣王。宣王力图效文、武王之遗风，整顿内政，周王朝一度“中兴”。但由于社会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所谓“宣王中兴”是十分短暂和不稳固的。其主要标志是征伐四方，令诸侯以周为宗主。宣王先后派人对北方的猃（xiǎn）狁（yǔn）、南方的荆楚、东方的徐淮征讨。尽管都取得了胜利，但也消耗了周的国力。宣王三十九年，王师与姜氏之戎大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王师败绩”，接

①《周易·系辞上》。
②③《史记·周本纪》。

着，精锐的“南国之师”又全军覆没。面对一时无兵可征的局面，宣王不得不在太原“料民”，①所谓“料民”就是由王室直接清查人口，搜罗民户。这充分暴露了王室的空虚和势力的衰败，与此同时，宣王还取消了“籍千亩”的传统仪式。所谓“籍千亩”是井田制度下，每年春季由周王率群臣在千亩作象征性的耕作，以此鼓励农业生产。可是，随着奴隶逃亡，集体耕种公田的办法已难以继续，井田遭到破坏，于是，宣王索兴把事实无法继续的“籍千亩”仪式废除了，史称宣王“不籍千亩”。从此，井田制的危机加剧王室日益衰弱了，西周政权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西周灭亡 宣王死，子幽王宫涅继位。幽王昏暴，宠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又任用善臾好利的虢石父为卿，不仅加重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而且还掠夺贵族的财产，加之当时发生强烈地震，使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攻幽王。诸侯救兵不至，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申侯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开始。西周共传12世，13王，280余年。

重要名词：

古公亶父　周文王　武王伐纣　周公东征　分封制　宗法制　井田制度　国人暴动　共和行政　五刑

思考题：

1. 西周的社会经济情况怎样？为什么说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强盛时期？

2. 谈谈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的情况。

3 说明西周灭亡的原因。

①《国语·周语》。

第三章　奴隶社会的逐渐瓦解
——春秋

（公元前770—前476年）

第一节　诸侯争霸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历史上称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因鲁国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关于春秋时期的上下限划分，学术界意见不尽一致。但春秋上起于公元前770年，却为史家们所公认，止于何时，分歧甚大。我们采取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

一、王室衰微与诸侯争霸局面的出现

西周后期，周王室日渐衰弱，至幽王举烽火诸侯救兵不至。平王东迁以后，事事更加依赖诸侯。大小诸侯不再听命于周天子，更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和述职。春秋时期，周王室还拥有今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和北部的一大片地区。但在周天子的“赏赐”和大诸侯国不断侵夺下，到春秋中期以后，周王室实际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已经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差不多了，甚至在政治和

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诸侯国。

据文献记载，春秋初期约有诸侯国140多个，较为强大的有晋、楚、齐、鲁、秦、宋、卫、陈、蔡、郑、燕等。这些诸侯国初封时地方不过数十里或数百里，但随着国力的强盛，它们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产，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陆续吞并周围的弱小国家，不断开拓疆土。战争中，胜者“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①于是，出现了大国相继争霸的局面。

二、霸主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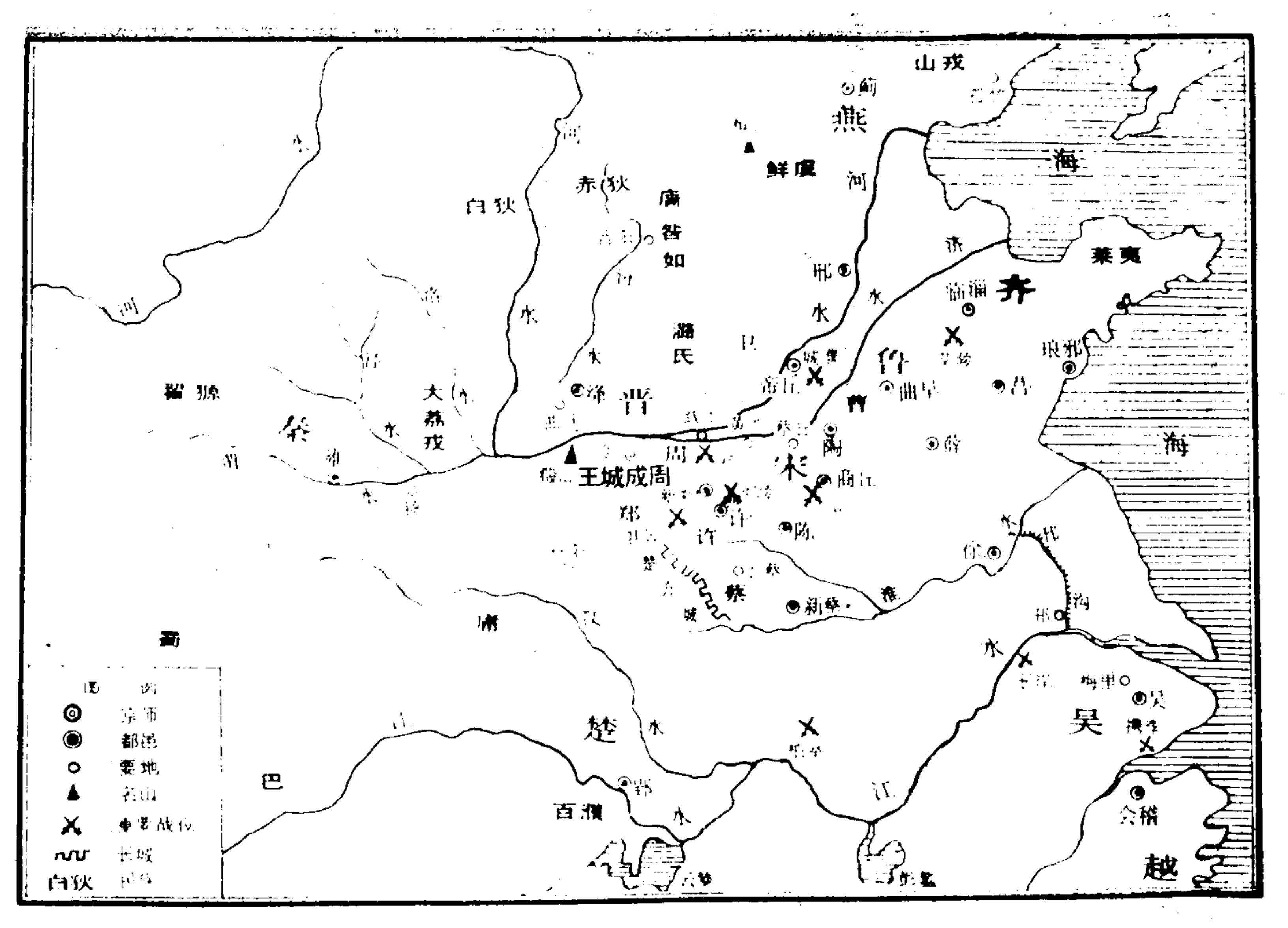
根据史书记载，在长达300年的兼并战争中，强大的诸侯国不仅吞灭小国，扩大领土，而且争当盟主，相继称霸。所谓称霸，就是取得胜利的诸侯国召开会议，强迫其它诸侯国承认他的首领地位，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春秋时期，先后出现过五个霸主，历史上称为“春秋五霸”。关于五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及宋襄公；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前一种说法中的秦穆公仅独霸西戎，宋襄公欲霸未成。所以，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在五霸迭兴之前的春秋初年，郑武公因护平王东迁有功在王室担任卿士。其子庄公袭为卿士，遂以王命讨伐诸侯，雄心勃勃，四邻不安。后因庄公多行不义，“周郑交质”发展为“周郑交恶”，双方战于繻葛，王师败绩。郑国势力强大一时，但庄公死后，其诸子争位，国力随之衰弱。东方的齐国开始强大起来。

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85年，齐国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齐公子小白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他委政管仲，实行改革。

---

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山戎
燕
鲜虞
海
莱夷
齐
琅邪
赤狄
白狄
晋
王城成周
郑
许
陈
蔡
新蔡
商丘
曲阜
鲁
宋
大荔戎
楚
吴
越
会稽
巴
蜀
百濮
江
水
河
淮
潞氏
都邑
要地
长城

春秋形势图

1． 经济方面：管仲采取了“相地而衰（cuī，音催，等差之意）征”的措施，按土地好坏，分等级征税。这一措施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收到了“通货积材，富国强兵”①的效果。

2． 行政方面：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乡三、商乡三、士农之乡十五，士农工商分区而居，不许杂处，职业世袭，以利老传少习，安心生产，保证了社会安定。

3． 军制方面：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②的政、军合一制度，即寓兵于农，平时进行生产，农闲时定期操练。将全国十五士农之乡，组成三军。既扩大了兵源，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4． 用人方面：管仲规定乡和属都都要推举人才，否则就以“蔽贤”之罪论处。还规定士人须经三次审选，可提拔为“上卿之赞（辅助）”。出身低下的宁戚，后被管仲任用为大司田（农官）。

经过几年的改革，齐国国势强大起来，连续灭了谭（今山东历城）、遂（今山东宁阳）等小国，扩充了国土。齐桓公看到那时候周王室不被尊重，周围的少数族又不断向中原进攻，便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发展自己势力。以此笼络民心，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出兵伐戎，保住了燕国。公元前662年，狄人侵邢（今河北邢台），齐又出兵救了邢国。公元前660年狄人侵卫，杀死卫懿公，齐桓公出兵伐狄，使卫免遭亡国之祸。

在齐国强大的同时，南方的楚国也发展起来，吞并了一些小国，威胁中原的安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

①《史记·管晏列传》。
②《国语·齐语》。

双方实力相当，楚国被迫承认了不入贡的罪名，最后在召陵（今河南郾师）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齐国这次出兵，虽未交战，但打击了楚国的气焰，暂时遏制了楚北向中原的锋芒。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约会诸侯，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参加会盟。史称“葵丘之盟”。齐桓公遂成为中原的霸主。由于齐桓公称霸没有先例，故史称“齐桓公始霸”。

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宋襄公图霸，公元前638年与楚国战于泓（今河南拓城），大败，襄公身受重伤，不久死去。宋襄公霸业未成，一时中原无主，楚军北进。

公元前636年，62岁的晋公子重耳在国外流亡19年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国原是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晋献公时，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①兼并和控制了数十个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已扩大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引起内乱。公子重耳在流浪期间，备尝艰险，了解民情，献公死后回国，在狐偃、赵衰(cuī催)等人辅佐下改革内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也富强起来。

公元前632年，楚国攻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在未开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三十里为一舍），诱敌深入至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晋文公会同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了会盟。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在晋文公称霸之前，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也强大起来。在秦

---

①《韩非子·难三》。

穆公率领下，发动了袭郑的战争。结果遭到晋国的伏兵袭击，全军覆没。此后，不得不转而向西发展。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在西方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楚庄王的霸业 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只在南方蚕食中小国家，不敢贸然北上。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继位。当时内有贵族间的争斗，外有晋、戎族庸人、百濮的进攻。庄王观察了3年，不发号令，然后听政，诛奸臣，进贤者，国人大悦。当年即兴师灭庸（今湖北竹山）。公元前606年，楚伐陆浑戎，在周境陈兵，问鼎中原，意在取而代之。此后数年，庄王灭舒、破陈、围郑。郑臣服于楚。公元前597年夏，晋军救郑，晋楚战于邲。晋军号令不齐，接战后溃不成军。庄王饮马黄河，雄视中原。前597年秋，楚围宋，晋不敢救；次年夏，宋与楚结盟。庄王之霸业，至此鼎盛。

吴、越争霸 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以制楚，吴之国力遂日益强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用楚亡臣伍员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楚国得到秦国的援救，越又乘机攻吴都城，吴被迫撤兵。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于公元前494年吴伐越，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连接江淮，通粮运兵。前482年，又与晋、鲁及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这时，越王勾践率兵进攻吴国，夫差只好把霸主的地位让给了晋定公。回师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夫差兵败自杀，吴亡。

勾践灭吴以后，使越国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滕县），成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

三、弭兵运动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十分激烈，江、河流域的所有诸侯国几乎都卷入战争，兵连祸结，民无宁日。中原各国所受战争灾难更为严重。在七、八十年间，郑国遭到战祸70多次，宋国遭到战祸40多次。许多小国既要从楚，又要从晋，因此，十分厌战。晋楚两国势均力敌，疲于攻伐，各有内忧，于是都想暂时休战。“弭兵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华元弭兵 弭兵运动是由经常处于四战状态的宋国发起的。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向晋、楚两国提出倡议，双方勉强响应，各派代表会于宋国，订立盟约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Zāi）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zhì至；礼物）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① 但是，这种无实际意义的盟约，只维持了3年就被楚国撕毁了。楚北侵郑、卫，宣告了华元弭兵的结束。

向戌弭兵 公元前575年，晋、楚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大败。当时晋国内有六卿之争，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无暇他顾。楚东受制于吴，不敢北进。此时，宋大夫向戌再次提倡召开“弭兵会议”，很快得到大小诸侯的响应。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十四诸侯再会于宋，决定以晋、楚两国为盟主，除齐、秦两大国不作从属国看待外，其他原从属于晋、楚的诸侯国都要互朝晋、楚，承担晋、楚两国强加予他们的任务。

这次会盟以后，晋楚间4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很少。这种形势对恢复和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安

---

①《左传》成公十二年。

定人民的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诸侯争霸战争的影响

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间，列国进行的战争达483次之多。这些战争对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当然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对社会进步及历史发展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各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完善起了良好的作用。

2．争霸战争中，过去维护奴隶主统治的一些制度遭到破坏，奴隶主贵族集团受到削弱，这就为新制度的建立与新兴地主阶级掌权扫清了道路。

3．各个大国疆土扩大，国力增强，成百的小国被逐个吞并，基本上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4．大国在争霸战争中，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出现了大迁徙、大交流的局面。尽管战争是痛苦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频繁，从而加速了民族的大融合。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

一、铁器、牛耕的出现与生产的发展

铁器和牛耕　我国铸造并使用铁的时间可能较早。秦襄公时的《诗经·秦风·驷驖》中有“驷驖孔阜”的句子，“驖”即铁字，以铁来形容马的颜色，可知铁已为秦人所熟识。《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前513年）载："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也是春秋时期有铁的见证。近年经过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湖南长沙、常德、江西九江、河南洛阳、江苏六合等地都发现了春秋时的铁制农具或铁铸器。春秋时期的铁器在许多地方都已得到使用。铁器坚硬锋利，它的使用，是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

牛耕的使用，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如《国语·晋语》（九）曰："夫范，中行氏……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牛耕二字联用，绝非偶合，亦非孤例，它说明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当无疑义。

土地的垦辟 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使许多荒芜的土地得到开辟。西周末年，今河南新郑一带还是一片"蓬蒿藜藿"的荒原，郑国迁此后，这里遂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东方齐国原是一个"地泻卤"的不毛之地，经过春秋年间的垦辟，成了"膏壤千里宜桑麻"②的好地方。晋国南面一向为"狐狸所居，豺狼所嗥"③的荒野，后来在姜戎人民的开发下变成了良田。至于诸侯国境间的旷土隙田，也都陆续垦耕，成为"庐田庑舍。"

水利事业的发展 促进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水利建设。春秋时期各国大都重视水利工程。著名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bēi），"陂经百里，灌田万顷"，④为楚国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吴国开凿的邗沟，南起邗城(今江苏扬州)，北至末口(今淮安)，沟通江淮。它全长150公里，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对沿岸的农田灌溉和排水以及江淮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

①范氏，吉范射；中行氏，中行寅，即荀寅、都是晋国卿。畎即沟；亩即垄；畎亩在此泛指田间。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左传》襄公十四年。

④《后汉书·王景传》李贤注

二、土地私有的出现和井田制的瓦解

土地私有的萌芽 土地私有的萌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通过以下的途径进行的。

1. 垦草辟荒，据为己有。不少奴隶主和外逃奴隶私自开垦荒田。这些被垦植的土地都成了不向国家纳税的私田。

2. 诸侯、贵族相互劫夺土地，占为己有。《左传》成公十七年记载，楚国"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子黑要，而分其室"。"室"指以土地为主的家资。

3. 通过赐予，化公田为私田。《国语·晋语》记载，晋公子夷吾赐给他的臣属"汾阳之田万顷"，"负蔡之田七十万"。《左传》襄公二年记，赵简子曾下令："克敌者……士田十万"。

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时期，奴隶们在公田上消极怠工，或结伙逃亡。《诗经·齐风·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即公田。"维莠骄骄"和"维莠桀桀"都是形容野草繁盛的样子。可见井田上一片荒芜，井田制已不利生产的发展了。奴隶们的怠工和逃亡行动，是井田制瓦解的重要因素。

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 春秋时期，一些贵族占有大量私田之后，逐渐采取新的剥削方式，把土地全部或部分地让奴隶或平民耕种，从中收取一定数额的产品，这种方式与后来的田租性质相类似。这样，原来的奴隶主贵族逐渐变成了封建地主，劳动者变成了佃农。《管子·乘马》记载，齐桓公时实行的"均地分力"和"与之分货"制，就是把田地分给耕者，以家户为单位，个体经营，土地占有者和耕者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产品。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晋败于秦之后，把旧地分给耕者，使他们"自在其田，不复易姓。"这样以来，劳动者都能"夜寝早起，为而

不倦”，从而收到了“则民尽其力”的效果。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一面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一面增强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

初税亩 私田一开始，因不被国家承认，也不向国家纳税。私田越多，向国家纳税的土地就愈少，私田主则愈来愈富。这样，公室（诸侯）的收入大大减少了，经济日益困难。于是，就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各国诸侯们为了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先后进行了赋税改革。最著名的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①初税亩是诸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标志，它规定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纳税，税率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比鲁国改革早的有齐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前期，就实行“按田而税”了。晚于鲁国的有：楚国于前548年“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于前538年“作丘赋”，②秦国于前408年“初租禾”。③这些国家的税收名称各异，但实质相同。赋税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诸侯国的税源，充实了府库，但奴隶主赖以生存的井田制度却日益瓦解了。

三、工商业的发展和私营手工业者的活跃

由于农业经济领域内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工商业必然产生影响。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新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门类的增多和技艺的进步两个方面。当时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有铸铜业、木器业、漆器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等，此外还有制盐和铸铁。就铜冶业而言，西周的青铜器数量少，又多为王室和王臣的器物，而春秋时诸侯的青铜器大增，且品种繁多，多数器具造型精巧，花纹精细，有的还错以金银，工艺水平很高。

---

①《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史记·六国年表》。

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鹤吐舌举爪，引颈展翅，且配以动态禽兽为装饰，堪称为春秋青铜器中的珍品。湖北发掘的越王勾践剑，出土时期明洁如新，令人赞叹不已。

春秋时期的制盐业也相当发达。齐国产海盐，晋国产池盐，都是用樵薪“煮沸水为盐”。当时以官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也出现了民营。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商品市场的活跃。以经营商业谋生的人增多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具资本进行商业活动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虽不是贵族，也没有一点俸禄收入，但由于财力的雄厚，就敢与同诸侯分庭抗礼，甚至干予政治。郑国在西周末年开辟新郑地区时，就是贵族与商人合作进行的。郑桓公还和商人订立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①的盟约，彼此都信守不渝。弦高用12头牛救了郑国，其地位在郑国可想而知。

春秋后期，大商人更多，活动范围更广。如协助勾践灭吴的越大夫范蠡，后隐居埋名，以经商为业。居陶（今山东定陶），称“陶朱公”。在19年间，“三致千金”，②成为著名的大富商。司马迁认为：“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易彰者乎！”③这就是说孔子有如此大的名气，和他弟子大商人子贡是分不开的。大商人的出现，意味着“工商食官”制度已频临崩溃。

随着商业的发展，原来用作货币的海币已不适宜使用，金属铸币开始增多。据文献记载，周景王（公元前544年——前520年）时就铸造大钱。在山西侯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春秋末年晋国铸造货币的作坊遗址，出土有大批大型空首布。金属货币的使用，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③《史记·货殖列传》。

第三节　反抗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

一、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

旧贵族的腐朽统治　奴隶制越接近崩溃，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压榨就越残酷，他们的统治也越腐朽。

《左传·昭公三年》记，齐国的统治者征收赋税极其繁重，使得“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国家聚敛的财物用不完，以致腐烂发霉，而80岁以上的老人却挨饿受冻。刑罚极其严酷，动辄砍掉双脚，造成“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奇怪现象。《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齐景公用法无常，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止，他的宠妾，搜刮于城乡，所求得不到满足，便治人以罪。结果“民人苦病，夫妇皆诅”。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苛征暴敛，一次厨师烹熊蹯不熟，他便将厨师杀死，而且让女宫人抬着尸体过朝示威。

小国的统治者与大国的奴隶主贵族争相奢侈。卫国懿公喜欢玩鹤，为表示对鹤的尊宠，竟为鹤配备只有大夫才能坐的车子。到春秋末期，卫灵公冬天穿狐裘，却叫百姓凿水池以供玩赏，有臣劝阻说“天寒起役，恐伤民”，他莫名其妙地问：“天寒乎？”①

奴隶主生前奢侈无度，死后还要屠杀奴隶殉葬。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从死者六十六人”。②前621年，秦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春秋时期，

①《吕氏春秋·分职》.

②③《史记·秦本纪》.

奴隶与平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动摇了奴隶制度。

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 春秋后期，奴隶们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消极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最后发展成为武装斗争。

春秋末年，北方爆发了跖（zhí）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当时，"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①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

春秋时期租税越来越重，平民的生活也每况愈下。

《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553年），郑国执政子孔飞扬跋扈，子展、子西二人率国人攻杀子孔而分其室，然后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以后郑国兴旺了一个时期。公元前523年，郑执政伯有骄横好酒，被国人杀死在羊市场。

奴隶和平民反抗隶奴主贵族的斗争，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基础。这些斗争是推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强大动力。

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春秋晚期，随着诸侯国家内卿大夫势力崛起，"私家"与"公室"的斗争异常激烈。"公室"指各诸侯国的政权，代表奴隶主的势力；大都是旧制度的保守派。"私家"指卿大夫，大部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随着他们经济势力的增涨，要求扩大政治权势，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大夫专权与公、私争民 在鲁国，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史称"三桓"。他们是新兴势力的代表。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文公死，大夫襄仲杀嫡，立庶子宣公倭。三桓乘机发展势力，各自在封邑筑城。出现"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特别是季孙氏在费（mì）邑争取了不少民众作为自已的

①《庄子·盗跖》。

"隐民"和"私属徒"。《左传·襄公十一年》记，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备有其一"。三桓势力增强虽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但从鲁昭公起，鲁国的政权实际上操纵在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手中。

三家分晋 春秋中期以后，晋之政权操在六卿手中。所谓六卿，就是赵、韩、魏、知、范、中行（简）六家大夫。赵、韩、魏先联合起来经过艰苦战斗，消灭了范、中行的势力。后来，赵、韩、魏三家又联合起来，消灭了知氏，晋国的政权就控制在这三家手中，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也在他们控制之下。赵氏占据晋的北部地区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都城；韩氏占据晋的中部地区，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都城；魏氏占据晋的南部地区，以安邑（今山西夏县）为都城。①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今山西翼城东和闻喜）两小块地，"反朝韩、赵、魏之君"。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至公元前377年，赵、韩、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②晋亡。

田氏代齐 齐国的田氏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子完在齐桓公时，因避陈内争，逃奔齐国，姓田氏，③任齐"工正"。春秋中期，田氏势力逐渐强大，在向贫苦民众放贷时，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入的方法收揽人心，又免关市之征，平价买卖，民众很拥护他。公元前490年，齐景公死，贵族国氏、高氏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荼（tú途）为国君，田氏乘机发动武装政变，打败了国氏、高氏，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阳生为国君，是为齐悼公。田乞为相。

田乞死后，其子田常（田成子）继续为相。前481年，田常又

---

①《史记·晋世家》。

②赵于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今属河北）、韩于前375年迁都新郑（今属河南），魏于前361年迁都大梁（今属河南开封）。

③陈与田，古同音通用。

发动武装政变，把几家强大的贵族如鲍氏、晏氏等全部消灭，并杀死了齐简公，另立简公之弟骜（aò奥）为国君即齐平公。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中，国君实际成为傀儡。到田常的曾孙田和时，借口齐康公荒淫废政，于公元前391年废康公，自立为国君，完成了田氏代齐的过程。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诸侯。

第四节　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

一、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生卒年不详），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做过周朝的史官，曾管理王室藏书。从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周礼史实看，知其生活在春秋末年。他的主要著作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实际是其后学追记其言论，战国时才成书的。1973至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文字和通行本《老子》略有不同，编次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它为研究老子及其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核心是"道"。老子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道是第一性的，各种事物是第二性的。老子最大的贡献是继承了春秋以前的辨证法，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首先认为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他列举刚与柔、荣与辱、胜与败等对立的概念都是互相依存的，若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了。其次指出事物都会向它的相反方向转化，《老子》五十八章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名言，说明祸与福是可以转化的。更为可贵的是，老子还初步涉及到量变引起质变的理论。《老子》六十三章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说明任何质的变化，都要从量开始，

只有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变化。

老子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的世界，这显然不是进步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他主张统治者“无为而治”，即反对统治者的过度剥削，也反对战争。把“无为”当作人的最高德性。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老子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消极的思想。

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前551年—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思想理论的核心是“仁”。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要求人们遵守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他反对春秋后期贵族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主张改善政治，“使民以时”。②

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制度，兴办私学，广招门徒，开创了古代私人办学之先河。为了实践其“仁”的政治主张，他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其教育方法的许多地方都是值得后人借鉴的。他治学严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教育学生学习态度要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方法上，“循序渐进”；“温古而知新”等。

相传孔子曾删定“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除《乐》已佚外，其他“五经”尚存，系儒家的主要经典。孔子的言论，由其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

孔子遗留给后世及世界文化史以无比丰富的思想和丰硕的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给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①《论语·颜渊》.
②《论语·学而》.

三、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

五经三传 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的总称。由于《春秋》仅用2万余字就记录了242年的史事，过于简略，故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对《春秋》加以解释，合称春秋三传。

《诗经》 又称《诗》，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古代采诗官收集的诗篇很多，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①经孔子删定的这些诗绝大多数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作品。《诗经》主要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风"主要是民间歌谣，共15国，160篇。它是《诗经》的精华。"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基本是西周时期王畿的作品，大部分出自贵族之手，且以记事为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等，共40篇。

《诗经》中的民歌，描绘了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情景，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抒发了人民内心的痛苦和悲愤，具有清新、明快、生动、朴实的艺术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的贵族诗歌，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和矛盾斗争。

《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它不仅有较强的思想性，也有较高的艺术性，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尚书》 也称《书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由史官所记作为档案编集而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清人《十三经注疏》所收经文58篇，其中25篇为伪作，另外33篇是东

---

①《史记·孔子世家》。

周史官追记的西周史实。它是研究我国古代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也是一部散文集。因此，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周易**》 又称《易》，也叫《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占卜用书。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传”是解释“经”的。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但作为先秦作品，无可非议。《易经》从整个世界的复杂现象中抽象出阴（— —）、阳（——）两个爻，又称两仪。以此推衍，“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八卦又两两相重，成为64卦，每卦由六爻组成，共384爻。每爻都有特定含义并与其他爻相联系，这就是足以应付复杂的人事了。更为可贵的是，《易经》强调变，强调阴阳的交感作用。其本身就含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解释《易经》的《易传》虽有一些科学思想，但未能摆脱神学体系，所以，仅有的哲学观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会陷入不能解脱的矛盾之中。

《**春秋**》 也称《春秋经》，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简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间242年的史事。《春秋》记事简练，对人物和事件各有褒贬，史料价值十分重要。还记录了当时科学家对日蚀的观测和地震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四、《孙子兵法》

孙子，姓孙名武（生卒年不详），齐国人，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兵家的始祖。曾任过吴国的将军，善于练兵，在他训练下，吴国很快成为春秋时期的军事强国。公元前506年，孙武和伍子胥率领吴军大败楚军，攻入楚国都城郢。孙武及其后学写成的《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优秀军事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①《周易·系辞上》。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约6000余字。它对战争的地位予以充分的估计，认为作战要从实际出发制订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对敌我双方的了解："知己知彼，百战百殆"，认为要战胜对方，必须"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中，还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孙武认为，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所以说，《孙子兵法》是一部军事哲学著作也不过份。

《孙子兵法》还强调要赏罚分明，主张对军士既要加强教育，又要严格纪律，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五、科学技术

数学 西周时，"数"已成为六艺之一，说明数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在洛邑东郊筑城，动工前晋国士人弥牟将城的长度、高度、厚度、沟洫的深度计算好，再算出土方数量、运程的远近、然后计算出人工数，甚至将材料、粮需数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因此，工程才得以提前完成。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不仅已懂得加减乘除，而且掌握了几何学知识。

天文历法 西周时，天文学已有相当发展。在《诗经》中，有火、箕、斗、牛、室、昂（卯）、毕等星宿名称。1978年湖北随县发现战国初期曾侯大墓出土的漆箱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说明二十八宿体系在春秋时期大体形成。《诗经·小雅》记载了周幽王六年（前776年）的一次日蚀，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明确日期的日蚀记录。《春秋》一书还记录了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日蚀37次，其中32次都被后来证明是可靠的。而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是天文学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

的哈雷慧星的记录。①

西周的历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春秋时，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左传》载，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我国最早关于冬至日的记录。

医学 周朝时，政府设有医官，医生们明确分为内科和外科等。当时，不仅有兽医，能给家畜治病，而且掌握了阉割技术。春秋时，已出现著名的相畜家。齐国的宁戚善于相牛，秦国的伯乐能相千里马，而伯乐的朋友九方皋的相马本领更在伯乐之上。当时的医药卫生已相当发达，有医缓、医和等著名医生。鲁成公十年（前581年），晋景公病了，秦国医缓出关为其治病，医缓查看病情后认为，景公的病在“肓（huāng）之上，膏之下”（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用药物已“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了。不久，晋景公果然病死了。医缓虽未能治好景公的病，但却准确地诊断出景公患了不治之症，第一次提出“膏肓”的概念。以后，“病入膏肓”就成为不治之症的代名词。秦国的另一位名医和掌握了“六气”（风、寒、暑、温、燥、火）与疾病的关系，奠定了我国病源学的基础。

重要名词：

春秋五霸　管仲　葵丘之会　城濮之战　邗沟　弭兵之会　秦穆公　初税亩　五经三传　《春秋》　《孙子兵法》

思考题：

1．齐桓公、晋文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称霸的？他们为什么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

---

①《春秋》鲁文公十四年。

2．春秋末年，吴越是怎样争霸的？

3．弭兵运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过程怎样？有何意义？

4．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何表现？

5．井田制是怎样瓦解的？土地私有是如何出现的？

6．春秋时期，各国进行了怎样的赋税改革？有何影响？

7．略述“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经过。

8．为什么说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政治主张是消极的？

9．列举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科技成就。

10．略述孔子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

第三编　封建社会

（公元前475—公元1840年）

第一章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形成

（公元前475—前221年）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和封建集权制度的形成

一、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

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史称战国时期。①战国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

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增长，公元前475年左右，他们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握了权力，经过长期兼并战争，

①战国本指"战国七雄"。西汉末年，刘向编《战国策》时，才把它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固定下来。关于战国开始的时间，一说从公元前476年起；一说从前475年起；一说从前403年起。

逐渐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其余几个小国也岌岌可危。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奴隶制经济基础日益瓦解，正在形成中的封建制度仍不完备，奴隶制的旧传统还有很深的影响。各国掌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经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增强对外兼并的力量，纷纷在国内开展变法运动。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而以商鞅变法的效果最为显著。

李悝变法 魏文侯（名斯，前424—前396年）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也是魏国的建立者，他继位以后，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有：

1. 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按照“食（sì，四）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①的原则，把禄位赏赐给于国有功的人。取消那些无功于国的贵族世袭特权。又主张严格执行赏罚政策。从此以后，世卿世禄制大大削弱，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封君只能从封国收取一定数量的租税作为俸禄，不能役使封国内的人民，封君还要严格遵守国家法令（封国称为食邑、采邑、采地）。

2. 为了富国强兵，主张“尽地力之教”②，提倡农民勤谨耕作，“尽地之利”。李悝通过具体的核算对比，使农民认识到，如果“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③。鼓励农民勤谨耕作，提高粮食产量。

3. 实行“善平籴”。李悝认为：“籴甚贵，伤民（士工商）；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④由国家设立

①刘向：《说苑·政理》。
②③④《汉书·食货志》。

常平仓，丰年平价收购粮食，保证农民利益不致损害。荒年平价出售粮食，保证粮价平衡，稳定人民生活。

4. 制定《法经》，确立封建法制。《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6篇，其目的在于防范农民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保护地主阶级所有制，镇压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它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因此，李悝被列为战国法家的始祖。

李悝变法，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

吴起变法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在魏国协助李悝变法，任西河守。魏文侯死后，吴起因受大夫王错的排挤，由魏入楚。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国家的相），主持变法。他认为楚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①，因此变法时规定：

1. 凡贵族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的，收回爵禄，与王室血缘关系疏远的贵族，取消按公族资格所享受的特权。

2. 明审法令。精简机构，裁减冗官，用节省的开支来训练士卒，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3. 禁止贵族互相勾结，干预国家政令的执行。

4. “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②即没收奴隶主贵族的部分土地，强令他们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

吴起的变法，重视明审法令，从政治上、经济上给旧贵族以沉重的打击，加强了楚国的实力。曾大败魏军，诸侯震惊。但因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很大，新法推行困难。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贵族乘机发动叛乱，围攻吴起，吴起走避悼王尸旁，终被射杀。楚肃王即位，把射吴起而中王尸的旧贵族70多家，全部处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

①《韩非子·和氏》。
②《吕氏春秋·贵卒》。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以前，秦在各大国中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旧贵族势力很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同时，秦国内部封建因素也在缓慢的发展。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①政府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租率约为产量的十分之一。它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用人殉葬的恶习，“初行为市”，“为户籍相伍”②，建立了五家为一伍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四个县，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一些特权。但秦在当时与列国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继承献公遗志，进行改革，发布求贤令，商鞅自魏国入秦。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人，姓公孙名鞅，又称卫鞅，因在秦变法有功，封于商，历史上称为商鞅。他是战国法家的著名代表，年青时在魏国学习，总结了李悝、吴起等的法家理论和变法经验，前361年，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以强国之术，取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封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前350年，秦国两次发布变法的命令，主要内容是：

1．废除井田制度，“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奖励垦荒，由国家按土地多少征税。它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因而成为秦国封建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国君宗族没有建立军功的，不得列入贵族属籍，不得享受贵族特权。军功以在战斗中杀敌的多少来计算，共分20级，最低为公士，最高为彻侯。按军功大小授予相应的爵位，根据爵位的高低赏给数量不等的田宅、臣妾，担任一定官职，从而形成封建等级制。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新法规定，凡努力耕

①《史记·六国年表》。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凡弃农经商或因怠惰而贫穷无力交纳租税的，全家没收为官府的奴婢。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男子成年兄弟不分居者，要加倍纳税。

4. 普遍推行县制（孝公以前，虽已设县，但未成制度）。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成县，划全国为31县，①设令丞管理政事，令丞由国君直接任免，使县成为直属于中央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要互相监督，有告发“奸”人的责任，知“奸”不告的，腰斩，告奸的与杀敌同赏，藏奸的与降敌同罚。什伍要同罪连坐。

5. 革除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焚毁儒家经典《诗》、《书》等，彰明法令，禁止游说，在秦国内统一度量衡，还颁布了度量衡的标准器。上海博物馆现藏有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制造的商鞅量（方升），是珍贵的实物证据。

商鞅变法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拚命反对。变法前，就发生过关于“法古”和变法的争论。变法中，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商鞅不畏权势，不避亲贵，按照新法规定，对他们二人处以黥和劓刑。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县）的一批守旧分子攻击新法，商鞅把他们看作“乱化之民”，强迫他们迁到边疆去开荒。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掌权19年，新法得到比较彻底的执行。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公子虔等诬陷商鞅谋反，把他车裂而死，但新法仍继续执行。

商鞅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变法使秦国奴隶制迅速瓦解，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分封制，大大加强了国

---

①县的数字，一说31县，一说41县。《史记·商君传》与《秦本纪》说法不一，可能前者为新建数，后者为共有数。

君的权力，封建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加强，秦国从此“兵革大强，诸侯畏惧”，①成为七国中最富强的国家，为秦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其他国家的改革 战国时期，赵、韩、齐、燕也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任用公仲连为相，政治上选贤任能，经济上节财俭用，使赵国的统治趋于稳定。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实行以“术”治为主的方针，提高君主地位，论功行赏，量才授官，加强了君主集权。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从相国邹忌的讽谏中得到启发，广开言路，慎选官吏，提倡节俭，严明赏罚，罢黜“奸吏”，从重惩治阿谀奉承的坏作风，使齐国力量强盛。燕昭王为复国雪耻，召纳贤士，励精图治，重用乐毅等有才能的人，经过多年努力，使政局得以稳定。以上各国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政治情况，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封建集权制度的形成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实质上是用地主阶级专政取代奴隶主阶级专政、用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总的来说，通过变法，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主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了“因能授官”的俸禄制，剥夺了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②的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建立君主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废除了奴隶主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封建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通过变法运动，封建集权制在各国先后确立起来。一、各国相继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官僚机构。辅佐国王

①《战国策·秦策》（一）.

②《商君书·画策》.

的最高长官是相和将，文武分职。相为“百官之长”，是国王的最高辅佐者，又称相邦、相国、丞相（楚为令尹）。其下有御史、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官，分理事务。将为武官之长，叫将军（楚称柱国或上柱国），是专职军事的长官。地方郡县与中央一样，也实行文武分治。二、郡县制代替分封采邑制。春秋初期，秦、晋、楚在新兼并地区开始设县，由国君直接管理，以加强边防。春秋末年，晋在边地设郡，地位比县为低。战国时期，由于边地发展，郡下开始设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机构。郡有守，县有令，郡县长官由国王直接任免，不能世袭。它便于国王集中权力，战国时进一步得到推广。县下有乡里，乡里中设有什伍组织，把个体农民编制在户籍上。三、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征兵制和常备兵。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农民，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常备兵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中选者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租税。全国军权集中于国王手中，军队统帅由国王任命，调动军队，以国王的“虎符”为凭。调兵时，合符无误，才能发兵。四、适应封建政治的要求，出现了一套反映封建君臣关系的官僚制度，如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俸禄制即官吏由国王任免，以粮食作为官吏的俸禄，用封邑作官禄的办法逐渐取消。符玺制包括兵符和玺印。兵符即虎符，玺即官印。对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发送公文也必须用玺来封泥，作为凭信。上计制是年终考核制。每年年终，臣下要向国王汇报自己的政绩，接受检核，根据检核结果，决定对官吏的升降和任免。这一系列官僚制度，使统治权力集中在国王的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形成，这就为秦汉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战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大

部分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农民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可以支配自己一部分劳动产品，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加以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一、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铁农具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战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解放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原来七国统治的地区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其中有犁铧、锄、镢、锸、镰、斧等农具。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墓中，一次出土了铁器160多件，其中有铁农具58件。① 河北石家庄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该遗址出土全部工具的65%。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工具的85%。铁农具在工具中的比例增大了。河北兴隆县燕国冶铁遗址，发现了战国后期铸造铁器的铁铸范共51副87件，其中属于制造农具的铁范共28副51件。占全部铁范60%。② 使用铁范可多次铸造，提高了工作效率。各国使用农具的类型也渐趋一致。从农具种类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犁田、中耕、除草、收割等，几乎都已使用铁器。

在铁农具普遍使用的同时，畜力耕田得到进一步推广，铁犁铧与畜力牵引相结合，为深翻土地，精耕细作创造了条件。

水利工程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为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了富国强兵，各国统治者也很重视水利的发展。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他破除河伯娶妇的陋俗，征发人民开凿了12条渠道，引漳水灌田，把大片盐碱地变成良田，使农业增产。秦昭王时，蜀守李冰父子，在四川灌县

---

①《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考古通讯》，1956年1期。

治理泯江，修成了一个灌溉、防洪综合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用“都江鱼嘴”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灌溉，用宝瓶口、飞沙堰来控制内江进入灌溉区的水量。既消除了岷江水患，又能灌溉农田300万亩，使川西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是我国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至今仍然继续造福人民。

郑国渠是秦在关中修筑的著名水利工程。公元前246年，韩国派水工郑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抵秦，秦命他主持开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hù户）口为渠”①，引泾水入于北洛水，全长300余里，可灌田4万余顷，使关中成为沃野，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此外，凿井灌溉在当时已比较普遍，人们用杠杆原理制成汲水工具，以利灌田。

生产技术的提高 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耕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人们对深耕的优越性已经有了认识，知道这样可以松土、除草、减少虫害，禾苗兴旺。其次，当时人们很重视施肥，已经知道使用粪肥、绿肥、草木灰等，并懂得用肥拌种；土壤知识较前丰富，知道如何对土壤进行分类。战国时期的作品《尚书·禹贡》和《周礼·草人》，记载了各区土质的情况及宜于种植的作物品种。《管子·地员》中把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又细分作30小级。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业专著。《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4篇，都是有关农业的内容。其中《任地》讲述了使用土地，整地作畦，中耕保墒和除草等生产经验，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战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有

---

①《史记·河渠书》.

了提高，李悝说战国初年，魏国农民种田一般每亩可产粟一石半（一亩相当于今天三分之一亩，一石相当于今天二斗），最好的年成，可增加4倍，即6石，最坏年成只能得3斗。

二、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种类 战国时，手工业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行业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有了进步。当时的手工业，按经营方式可分为三类：一是各国封建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为统治者和贵族服务，主要有采矿、冶铁、铸钱、制造武器、煮盐、纺织等。生产者有官奴婢、刑徒和征调的工匠。二是富有者经营规模巨大的作坊，主要有开矿、冶铁、煮盐。生产者有依附贫农、雇农和奴隶。他们有的富比王侯，① 三是大量存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由手工业奴隶或农民转化而来，占有少量生产资料，进行个体劳动，自产自卖维持生活。

冶铁业 冶铁业是战国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主要制造农具、手工工具、铁制武器和用具。冶铁遍布全国各地，各诸侯国都有冶铁中心，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楚国的宛、韩的新郑、棠溪等。冶铁规模大，临淄冶铁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人们用木炭作燃料，用皮囊鼓风提高炉温。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好几百人。有的地方在冶铁中已学会炼钢，还掌握了淬火技术。考古中发现的铁器和大量铁范，证明当时已懂得运用“高温液体还原法”。冶炼生铁和使用金属作范，是我国人民对世界冶铁术的巨大贡献，比欧洲各国早1600多年。

铸铜业 战国时期，青铜制造又有了发展。解放后，有大量战国的青铜器出土。冶铜规模扩大，主要有礼器、兵器、农具、乐器、车具、马饰、货币等，复杂的器物，已使用熔铸和焊接技

---

①《史记·货殖列传》。

术。青铜器的型体已趋向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还出现了镂刻、金银错、镶嵌、鎏金等新技术。当时对制作技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制造不同用途的物品，要使用不同比例的铜锡。这些配料比例至今仍合乎科学道理。从考古发掘来说，近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青铜编钟，充分显示了战国青铜器制造的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

纺织业 战国的纺织业以齐国和楚国最为有名。当时已有锦、绢、帛、绣、绸、纱等名目。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巧最为有名，产品行销各地，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① 近年来，楚国的丝织品出土很多。长沙左家塘战国中期的楚墓中出土的20多块丝织品，有用各色丝线织成的对龙、对凤和多种花纹，色泽鲜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楚墓中出土了比较完好的衣衾19件，有锦、帛、罗、纱及各种丝织物，种类繁多，色泽绚丽，花纹生动多样，有一件织物，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密度为160×70根。它们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刺绣织锦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

漆器制造 战国中期以后，漆器开始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许多家具、饮食器具、日用容器、兵器、乐器、丧葬用具等都经过髹漆。战国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胎质轻薄，有的附加有金属部件，既可以增加防腐性能，而且使器物成为一种很好的工艺美术品。

此外，与冶铁并称的煮盐业也很发达。以齐、燕两国最为有名。魏国安邑一带的池盐、巴蜀的井盐都闻名于世。随着铁制工具的进步，车船的制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献记载，战国车的名称有数十种之多，用于运输和作战。

---

①《史记·货殖列传》。

三、商业和都市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日趋活跃，交换的范围也因各地联系密切而不断扩大，参加交换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加了，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兴盛。

货币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货币的流通数量和范围也不断扩大，金属货币已广泛使用，各国货币种类繁多，形式不一，有些货币上还铸有造币的地点和币值。当时货币的主要类型有：一、镈币，又称布钱（镈，本为铲状的工具）。其式样大同小异，有平首布、空首布、尖足布、方足布等。主要用于韩、赵、魏三国。二、刀币，形状如兵器刀，主要用于齐、燕两国，赵国也用刀币。三、园钱，四周园形，中有方孔或园孔，是周、秦的的主要货币。园钱有东周、西周两种字样。秦钱铭文有“重一两十二朱”，“重一两十三朱”等。（朱即铢，为重量单位，24铢为一两）。四、蚁鼻钱，又称“鬼脸钱”，是仿海贝的一种铜贝；此外还有“郢爰”，是以黄金铸成的板块，上有小方块印记，又称印子金。各国货币形状和币值的不同，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

都市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盛，战国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封建城市，它们是各国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贵族、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集的据点。战国都市比以前有较大的发展，《战国策·赵策》引赵奢的话说古代的大城市不过300丈，居民不过3000家。“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当时著名的城市有宋的陶、齐的临淄、赵的邯郸、楚的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周的洛阳、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等。有的大都市有人口几十万。战国苏秦曾说临淄有7万户，“临淄之途，车毂（gū骨）击，人肩摩，连衽成帷（wéi唯），举袂（mèi妹）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①这不仅反映了

①《战国策·齐策》（一）。

临淄热闹、繁华的景象，而且也说出了当地人民的精神风貌。虽有夸张，但并非虚构。据考古发掘，临淄故城周长21433米，折合40多华里，据说街道上经常交通阻塞，车碰车，人挤人。魏"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① 此外，宋的陶是主要的交通中心，魏的大梁、秦的咸阳，也是著名的都市。

随着工商业的繁盛，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战国的白圭，为魏惠王大臣，长于治水，又会经商，他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法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获得厚利，富比王侯。有的大商人交结诸侯，干预政治，甚至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阳翟大贾吕不韦贩贱卖贵，家致千斤，仍不满足经营珠宝生意的百倍利润，依靠投机钻营的本领和雄厚的财富，参与秦、赵间的政治斗争，终于使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国继承君位，他自己也当上相国，得洛阳10万封户，后又被秦王政尊为"仲父"，权倾中外，威震诸侯。在他的门下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的奴隶有一万多人。商人的权势，可以想见。

四、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地主阶级的形成 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彻底瓦解、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各国的变法运动，是促进这种变化的强大推动力，自由买卖土地已成为合法的、正常的现象。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构成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贵族地主。最早的地主，是从贵族转化而来的。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成为私田，在私田上采用封建的租佃剥削方法，使自己转化为封建地主，他们拥有许多政治特权。二、在兼并战争中建

---

①《战国策·魏策》（一）。

立军功，得到大批赏赐的田宅，而成为地主。魏将公叔痤，因有军功，得魏王赏赐土地140万亩。由于他的奏请，魏王又赐吴起后裔田20万亩。①秦大将王翦出兵征战时，向秦王政奏“请美田宅园甚众”。②他们是军功地主。当时各国都奖励武功，实行按军功赏田的措施。使军功地主成为战国地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商人地主。土地自由买卖加速了土地的兼并，一些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把所赚的钱，又用来兼并土地。他们趁井田制瓦解之机，以拥有的钱财购买土地，进行出租。他们是商人，也是地主。执行了所谓“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③的方针，这个阶层在当时人数不多，占有土地较少，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权。军功地主和商人地主，是新兴的地主阶级。

农民 农民有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以自耕农数量最多，他们大部分从庶人或国人转化而来，受封建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每家占田约100亩，每户约5人左右，男耕女织，过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活。国家用什伍制度把他们编制在户籍上，不准随便迁徙。自耕农要向国家交纳土地税，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还要交纳户税（户口税）及其它苛捐杂税，如“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等。自耕农的生活一般都很困难，往往因沉重的赋税、徭役征发而破产，失掉土地，被迫逃亡，沦为地主的佃农。

与地主阶级同时产生的是佃农。他们与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这种租佃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不再具有政治统治的性质。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破产逃亡奔匿他乡而“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役的人。他们基本上有独立人格，从地主手中佃耕一小块土地，地租

①《战国策·魏策》。
②《史记·王翦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以交纳实物为主，一般为亩产量的50%。《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就是佃农们地租极为沉重的写照。

还有些破产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甚至连生产资料和种籽也无力购买，只好为人庸耕，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农，他们主要为地主和富裕农民所雇佣，从事田间劳动。他们即史书上所谓"卖庸而耕"的"庸夫"或"庸客"，与主人的关系主要只是经济关系。这些人的地位更加悲惨，甚至因还不起债务，被迫将自己或全家卖为奴隶。

由于战国封建社会刚刚建立，仍然存在着大量奴隶制的残余。有官奴，也有私奴，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秦相吕不韦家僮万人，蜀地卓氏"富至僮千人"。战国时的市场上，又有把奴隶与牛马和其他物品列市出卖的现象。

封建制的确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

第三节　兼并战争和秦统一中国

战国时期，各国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也不断加强，从而使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各诸侯国的封建兼并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齐魏争雄；秦齐对峙；秦统一中国。

一、齐魏争雄和徐州会盟

魏国的强大　李悝变法后，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在对外战争中接连获胜。公元前413年，魏侵占了秦的河西地区，又灭掉北方的中山国，接着联合赵、韩，打败齐国。前

403年，周王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公元前391年，魏又联合韩、赵，向南攻楚，占据了楚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和襄陵（今河南睢县）。这为以后迁都大梁提供了条件。

公元前362年，秦趁魏与赵、韩、楚有矛盾之机，出兵攻魏，俘魏将公叔痤，占领庞城（今陕西韩城东）。魏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河西筑长城防守，前361年，把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主要精力经略中原。

桂陵之战 公元前356年，齐与赵联盟，赵又进攻魏的属国卫，魏派将军庞涓攻赵，围攻邯郸，赵向齐求救。齐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领兵救赵。田忌采用孙膑避实击虚的战略，率兵奔袭魏的国都大梁，魏被迫撤军自救，当行至桂陵（今河南长垣西，一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时，遭到齐军伏击，魏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后，秦、楚乘机攻魏，占据了魏的少梁、安邑等处。前352年，魏联合韩国，在襄陵打败齐、宋、卫的联军，后又与齐、赵结盟，交还邯郸，同时又向西攻秦，收复了失地。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宋、卫、秦、赵等12国在逢泽（今开封南）会盟，这是魏国的鼎盛时期。

马陵之战 韩国拒不参加逢泽会盟，又和齐亲近，遂引起魏的不满。公元前342年，魏派庞涓、太子申带兵攻韩。韩向齐求救，齐再次任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领兵攻魏救韩。庞涓领兵由韩回魏，以10万之众迎击齐军，孙膑采用"退兵减灶"的方法迷惑庞涓，诱其追赶。庞涓轻兵疾进，追至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天黑道险，陷入重围。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这次战役使孙膑名扬天下。

徐州相王 马陵之战后，公元前340年，商鞅领秦兵攻魏，大败魏军，虏魏将公子卬（áng，昂），夺取了魏的河西地区。

魏国连遭失败，不得不调整对中原各国的政策，寻求对付秦国的办法。这时的齐国也不愿与魏为敌。公元前334年，魏惠王率属国国君朝见齐威王，齐、魏两国在徐州会盟，魏尊齐为王，齐也承认魏的王号。两国的矛盾得以缓和，史称“徐州相王”。后来，公孙衍出任魏将，号为犀首，他采取“合纵”策略，于公元前323年发起“五国相王”，参加五国相王的是魏、韩、赵、燕、中山。① 这样，关东各国的矛盾进一步缓和，魏国削弱下去，齐成为东方的强国。

二、“合纵”与“连横”的斗争

“合纵”与“连横” 魏国强盛时，东方的齐，经过齐威王的改革，迅速强盛起来；西方的秦，在经过商鞅变法后，力量也不断增长，积极谋求向东方扩张。马陵之战后，魏国削弱，出现了秦、齐两个大国遥相对峙的局面。两国彼此展开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斗争，韩、赵、魏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出现了“合纵”与“连横”的结约活动。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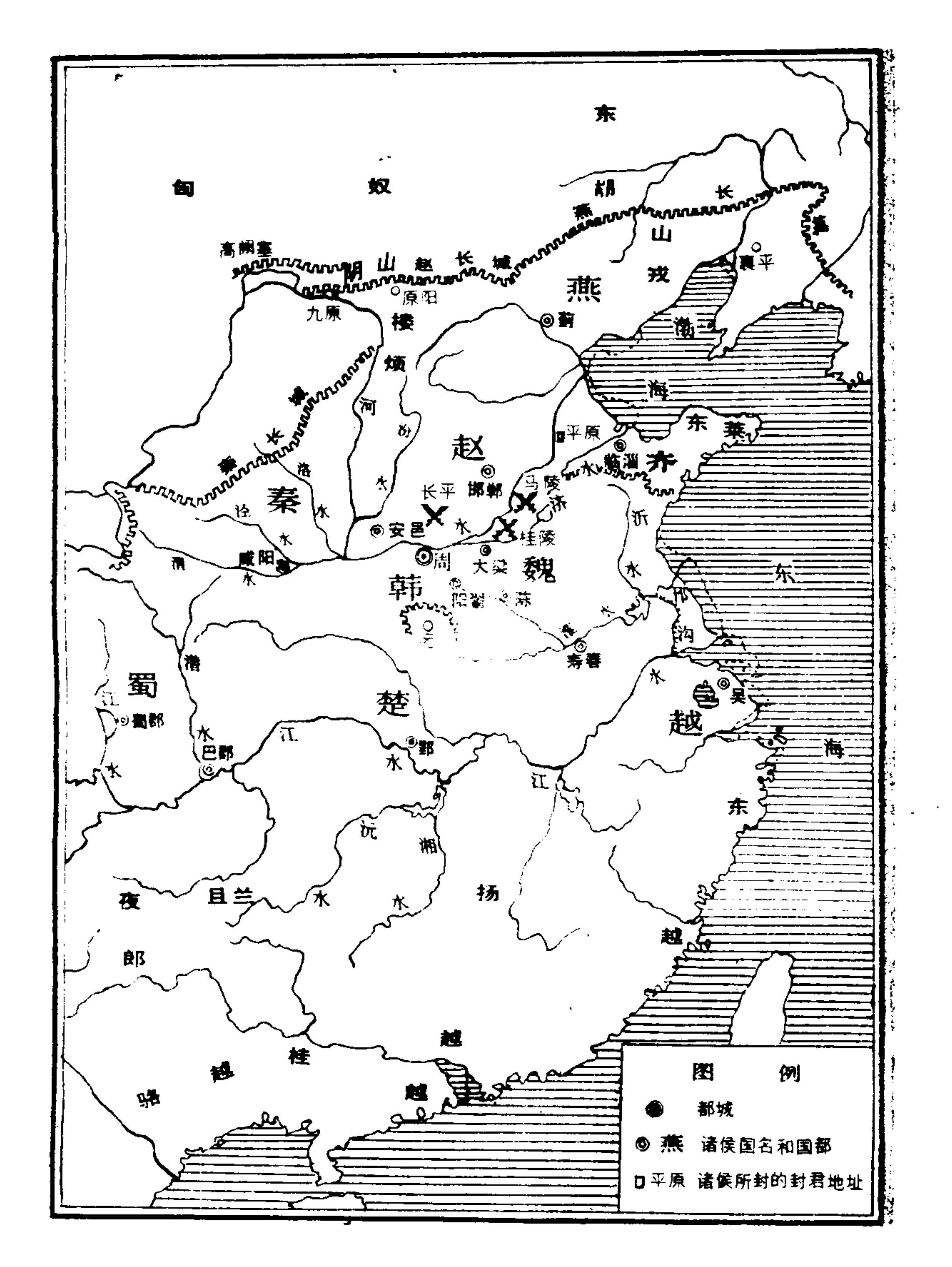
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胁迫弱国追随它进行兼并的策略。秦、齐对峙时，各国的“合纵”和“连横”，一般都是针对或围绕它们而进行的。齐国衰落后，秦便成为“合纵”者对付的目标和“连横”的中心。

在“合纵”与“连横”的斗争中，一批游士或食客，取得发言的机会，他们讲究权变，善于分析形势，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奔走效忠，历史上把这些人称为纵横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等最为著名。

---

①《战国策·中山》，又见杨宽：《战国史》第322页。

②《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苏秦约纵，张仪连横，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



东
匈
奴
胡
燕
长
城
高阙塞
阴
山
赵
长
城
原阳
九原
楼
烦
河
水
洛
水
泾
水
渭
水
秦
咸阳
赵
邯郸
长平
安邑
周
韩
魏
大梁
桂陵
马陵
济
水
山
戎
燕
蓟
襄平
渤
海
平原
东
莱
临淄
齐
沂
水
东
寿春
蜀
江
蜀都
巴郡
江
水
楚
郢
越
吴
海
东
江
沅
水
湘
水
扬
夜
郎
且兰
越
桂
骆
越
越
图
例
都城
燕
诸侯国名和国都
平原
诸侯所封的封君地址

战国形势图

张仪相魏　“徐州相王”后，关东六国共同抗秦。秦惠王在公元前322年派张仪入魏，张仪作了魏相，劝魏王背约亲秦，魏惠王不听。秦施加军事压力，出兵攻魏，夺取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平周（今山西介休西）等地，又大败韩军，斩首8万，迫使魏国背弃纵约，与秦连横。

公孙衍合纵伐秦　秦魏连横，对关东六国非常不利，为了对抗秦国，公元前319年，魏国反秦势力在齐、楚、赵、燕、韩的支持下，驱逐了张仪，任公孙衍为相国。前318年，公孙衍联合楚、燕、赵、韩共同伐秦。但由于各国利害并不一致，被推为纵约长的楚怀王，却未出兵，魏国也出兵很少。前317年，韩、赵、魏三国出兵与秦交战，结果在函谷关为秦打败。秦又接连对魏、韩发动进攻，迫使两国屈从，合纵瓦解，形成了秦、魏、韩的三国连横。

丹阳之战和楚国的衰落　在秦、齐的对峙中，又发生了秦楚之间和齐燕之间的斗争。

秦与韩、魏连横时，齐与楚两国也联合起来，与之对抗。秦为了拆散齐、楚的合纵，派张仪使楚，以商于（今河南淅川西南）之地600里为诱饵，劝说楚怀王背齐亲秦，楚怀王昏庸无能，不听屈原忠告，与齐绝交，派人随张仪入秦求地。结果，张仪说当初只允地方6里，怀王大怒，于前312年，出兵攻秦，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楚军大败，死亡甲士8万人，将军屈匄、逢侯丑等许多人被俘，汉中也被秦军占领，楚怀王又调集大兵，进攻蓝田（今湖北省钟祥县西北），又遭失败。由于楚破坏合纵，齐与魏也联合攻楚，夺取了楚的宛、叶以北大片土地。后来，秦昭王约怀王至秦会盟，怀王受骗被俘，最后死于秦。楚国开始衰落下去。

齐燕之间的斗争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攻入燕都蓟，杀燕王哙。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广招贤才，吊死

问孤，增强国力，准备报仇。

公元前298年，齐与韩、魏合纵攻秦，攻入函谷关，秦国求和，被迫归还韩、魏一些被秦侵占的土地，齐成为东方的盟主。前286年，齐灭亡了宋。宋国地处中原东部，与齐、赵、魏、韩、楚为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立即引起其它国家的震恐。秦国策划与燕、楚、韩、赵、魏共同攻齐。这时，燕昭王经过28年的努力，国势复振，派乐毅为上将军，统各国联军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破齐军。乐毅率燕军继续进攻，攻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等齐城70余座，齐湣王逃莒，为楚人所杀，齐城未下者仅莒与即墨。燕昭王死，惠王即位，齐国即墨守将田单，巧妙利用燕惠王与乐毅的矛盾，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了国土。但是，齐国也从此衰落，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①。

三、长平之战与赵国的衰落

远交近攻　齐国的削弱，为秦国远交近攻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拜范雎为相，范雎总结秦与各国斗争的经验，向昭王提出“远交齐楚，近攻三晋”，还要注意“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这种“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强调对已经削弱且地区较远的齐、楚暂置不顾，把进攻重点放在离秦较近的韩、赵、魏三国。这个策略既可破坏东方各国的“合纵”，又可巩固所占的土地。

三晋中以赵为最强。三家分晋后，赵武灵王（公元前325—299年在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大力改革军政制度，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在北方开拓了千里国土。儿子惠文王（前298—266年）时，继续整顿内政，重用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有才能的人物，国力强盛。

---

①《史记·乐毅传》；《史记·田单传》。

长平之战 秦赵之间多次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公元前262年秦按"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兵攻韩，又为争夺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上党）和赵国发生了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之战，白起领兵进攻长平，赵国大将廉颇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消耗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秦用范雎的反间计，派间谍贿赂赵王左右，故意扬言："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中计，派赵括为将，替换廉颇。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一反廉颇的策略，改守为攻，全线出击。赵军被秦军切成两段，围困46天，粮尽援绝，赵括亲自带兵突围，被秦军射杀，40多万人投降后被全部坑杀。①长平之战是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战争，赵国失败，军事主力损失殆尽，失去了和秦国争夺天下的条件 秦国独霸的军事优势从此形成。

后来，秦兵围攻邯郸，两年不下，赵向魏求援。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打败秦兵，但由于赵国在长平战役中的惨重损失，始终无法改变军事上的被动形势。

四、秦统一中国

秦灭二周 战国时，残存的周王室保留着洛阳附近一带地方。公元前367年，周王朝又分裂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前256年，秦灭了西周，周赧王同年死去。前249年，秦灭了东周，又攻下韩的成皋、荥阳，连同东、西周的土地，设立了三川郡。从此打开了东进的门户。

嬴政即位 公元前246年，秦庄襄王去世，13岁的儿子嬴政即位，国家大权操在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lào，劳）毐（ǎi，矮）的手中。前238年，秦王政加冠亲政，他镇压了叛乱集团，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吕不韦不久服毒自杀。秦王夺回了

---

①《史记·廉颇传》。

权力，重用李斯、尉缭、王翦等人，积极筹划统一六国的事业。

秦灭六国 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国展开了对六国的进攻。当年，秦灭韩。前227年，王翦等攻破赵都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郡(今河北蔚县)，自立为王。同年，燕派荆轲刺秦王未成。第二年，秦兵攻破燕都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到辽东。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魏都大梁，魏王投降。前223年，秦派王翦率60万大军攻楚，虏楚王，楚亡。前222年，秦军攻燕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虏代王嘉，燕、赵最后灭亡。秦军灭燕后，移兵南下攻齐，前221年，俘齐王建，齐国灭亡。这样，秦终于兼并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

秦统一中国的原因 秦所以能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是与战国时期出现的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分不开的。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日趋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发展。可是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各诸侯国壁垒森严，关界阻隔，交通不便，各国货币不同，度量衡不一，商品交换困难。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旱时截流自灌，涝时“以邻为壑”，周王室内部也出现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①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②《史记·秦本纪》所记各国间的13次战争，杀了138万多人。关东六国受战争的祸害最为深重，使社会生产无法进行。同时，春秋以来，形成了各族人民的初步融合，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

---

①《战国策·东周》。
②《孟子·离娄上》。

此，消除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结束混战状态，已成为社会各阶级共同的愿望，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统一事业由秦国最终完成，这是因为秦国具备了实现统一的条件。在政治上，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的铲除了奴隶主贵族的旧势力，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秦国封建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经济上，秦国长期推行奖励耕织的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高；而且在秦的关中、汉中、巴蜀都建有水利工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的增产；同时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这就为统一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军事上，由于秦国采用奖励军功的手段，使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战斗力强。在斗争策略上，秦善于根据六国的矛盾和弱点，运用远交近攻、“连横”等策略，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地理条件的优越，秦的统一事业就是在这些有利因素下展开的。在领导统一六国的战斗中，秦王政确是一位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施展政治才能的卓越人物，他以坚毅果敢的手段，不失时机地向六国进军，终于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等，都发生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

一、诸子百家

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溃、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各阶级、阶层的社

会地位和利益也随之变化，劳动人民、新兴地主阶级、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等，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当时剧烈的社会变动，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同时，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兴办私学，打破了以前“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文化教育逐步普及到民间，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有识之士，积极要求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也注意礼贤下士，招揽人才，养士之风盛极一时。数量众多、品流复杂的士人，各自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积极奔走于各国君主之间，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物，进行钻研探讨，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批评其它学派，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参与争鸣的各派，有墨、道、儒、法、名、阴阳、兵、纵横、农、小说、杂11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墨、道，儒、法等几家。

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他学过儒学，创造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墨子死后，其领袖称“巨子”，信徒称“墨者”。《墨子》一书，是墨翟和他的后学言论和思想的集录。

墨子的中心思想是“兼爱”和“非攻”。他主张对所有的人“兼爱”，反对儒家提倡的只注重贵族之间的“仁爱”。痛斥奴隶主贵族残杀和压迫奴隶的暴行，希望改变现实生活中小生产者被奴役、被歧视的地位，主张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助社会。因此，他又倡导“非攻”，反对“交相害”和以强凌弱的掠夺兼并战争。

墨子的政治理论是“尚贤”与“尚同”。“尚贤”即强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举用贤才，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反对儒家提出的等级制度。“尚同”即要求上下都“同”于代

表“天志”的统治者，以统治者的意志作为辨是非、定赏罚的标准。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要求葬礼从俭，节约开支，反对贵族的腐化生活和厚葬风俗，重视生产劳动，反对不劳而食。

墨子提倡“非命”，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但他相信鬼神和天的存在，企图以有意志的天来劝说统治者实行善政，“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认识论上，墨子主张以三表（即前人经验、当前群众的反映、实际效果）作为判断是非真伪的标准，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要求提高政治地位，希望在政令统一的政权下，过安定生活的愿望。因此，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但是，由于他的“兼爱”思想抹杀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墨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学说同被称为“显学”。战国以后，由于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墨家思想趋于衰落。

道家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是战国时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为漆园小吏，后来隐居，著《庄子》一书。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对道的解释更为神秘，认为“道”是超越感官的、“无为无形”、不受时空限制、“自古以固存”的宇宙本体。他把老子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看法引向极端，认为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陷入不可知论。

庄子痛恨当时社会战乱残杀和剥削压迫的不平等现象，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社会现实大力揭露。但又感到在社会和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思想消极，鄙视富贵利禄，不计较自己的毁誉，敌视社会进步，反对有任何作

为。道家的思想，反映了奴隶社会崩溃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思想和悲观情绪，在历史上常引起没落阶级的共鸣。但是，他们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包括了对儒墨学派所尊奉的“先王”的否定，在客观上又起了某种冲破思想束缚的作用。

儒家 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孟子（约前390—前305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孔丘的孙子子思，自认为是儒家学派的正宗，曾周游列国，向魏、滕、梁等国国君发表政见，一度为齐宣王客卿，他的言论被汇集为《孟子》一书。

孟子主张“兴王道，行仁政”。认为要“平治天下”，必须遵奉“先王之道”，他反对暴君污吏兼并土地的行为，反对用“法治”和暴力来维护统治。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的“仁政”说。他的仁政学说，以重民思想为基础。其仁政的内容是：恢复井田制，让人民有一定的土地，注意照顾农民劳动时间，减轻赋税，减省刑罚，使人民有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得以供养父母、妻儿。还要用孝悌伦理道德去教育民众。

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德服人”的箴言。极力反对暴力，反对争霸战争，因而主张“善战者服上刑”。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是“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不过这种本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这实质上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孔子唯心主义思想的发展。

孟子的仁政思想，反对激烈的社会改革，适应了当时守旧势力的需要。但他反对暴政，反对兼并战争对人民的祸害，重视人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

①《孟子·尽心》下。

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是战国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曾在齐稷下学宫为祭酒，访问过秦国，在赵国讨论过兵法，应春申君之请为楚兰陵令。晚年居家著述，著有《荀子》一书。

荀子虽然出自儒家，但他又对儒家各派作了猛烈的评击，特别是他在稷下时间较长，在这儿受各派思想影响很大，他吸收了其它各派学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首先，在哲学思想方面，他在总结批判先秦诸子思想中，把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推向高峰。他认为天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自然和宇宙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反对天命鬼神的传统说教。又认为天地的运行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不受社会政治好坏的影响，“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①。他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能正确的认识，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他还认为，人们能够从实际中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即“知天”），人可以征服自然，使天地万物为自己控制和利用，即“制天命而用之”，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影响。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孟子的“法先王”，主张“法后王”，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应当效法当世改革的君主，按实际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法令，这就为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次，在认识论上，荀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是性恶的，主张用“起礼仪、制法度”，使人性由恶改善。实际上是要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制裁，为巩固新兴的封建秩序服务。“性恶论”虽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增强人的个性可以改造，强调环境和学习对改造个性的作用，以及批判“性善论”的天赋道德观念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荀子提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学习方法，认为刻苦学习，可以后

①《荀子·天论》。

来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胜）于蓝”，成为勉励人们上进的格言。荀子还注意到人民力量的重要，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①把国君与人民的关系看作水与舟的关系，这种思想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法家　法家是强调用封建法治和暴力来巩固统治的政治思想派别。李悝是法家的始祖，韩非是最著名的代表。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出身韩国贵族，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屡次上书韩王，要求选拔贤能，改革政治，不被接受，于是发愤著书，写成《韩非子》22卷。书传入秦，嬴政看了《五蠹》和《孤愤》，大为赞赏。发兵攻韩，索求韩非。公元前233年，韩王派韩非入秦，秦王对他的政治主张极为重视。后受李斯诬陷，死于秦国狱中。

韩非继承了荀况的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主张按照实际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废先王之教”，反对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反对天命和鬼神迷信。这种历史进化论成为他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

韩非总结了以前法家的经验（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主张法、术、势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办法和主张，把法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法”，就是商鞅等人制定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各种法令和制度。强调要实行严刑峻法，用强力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术”，就是郑人申不害（后任韩相）强调的国君驾驭臣民的权术，如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韩非强调文武官吏必须选拔有实践经验的人来担任，“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按才能授给官职，按功劳给爵位。“势”，就是

---

①《荀子·王制》。

赵人慎到主张的君主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他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①这反映了君主集权的要求。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密切结合，一切权力集中于君主，君主凭自己的权势，用术并通过法来统治人民，巩固统治。

韩非的思想，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到秦王政的赏识。秦统一以后的政治措施，就是其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兵家 战国时期，军事学已发展成专门的学问，主要代表人物是孙膑，他是齐国人孙武的后代。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著有《孙膑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这部巨著失传了一千多年，1972年4月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当时著名的兵法著作还有吴起兵法、商鞅兵法、庞煖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缭子等。

二、史学与文学艺术

史学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编年史。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所著。它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也有对以前历史的记述。本书长于记事、记言，叙事明晰，繁简得当，文笔生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文学名著。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以国分类，以记言为主，分别记叙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春秋列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征犬戎，下至晋智伯失国，是研究先秦历史的主要文献。

《战国策》是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词和权变故事的汇编，也以记言为主，书中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

---

①《韩非子·扬权》。

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记事简洁，文笔生动，但也有许多夸张虚饰之处，是战国时的基本史料。西汉刘向定为此名。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西晋时从魏襄王墓中所发现，是魏国史官辑录的从夏朝至魏襄王时的历史资料。因书于竹简而得名。史料价值很高。该书宋朝时失传。现有王国维编成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战国纵横家书》是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有27章，除11章已见于《战国策》、《史记》外，其余16章为失传的佚书，历史价值极为重要。如其中有关苏秦的书信和谈话记录，可以纠正以前有关苏秦历史记述的错误，补充和校正这一部分战国史实，真实可信。

文学艺术 战国时期文学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主要表现有：

诸子散文：战国时的散文有很大成就，《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历史散文的名作。诸子散文以孟轲、庄周、荀况、韩非为代表作家，他们思想开阔、议论风生、语言丰富、文辞多采、逻辑性强、含意深刻、比喻形象生动，有的还富于想象，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文学价值很高。

屈原和楚辞：屈原（约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号灵均，战国末年楚国人，出身贵族，学问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主张革新政治，联齐抗秦，振兴楚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官封左徒（副宰相），但因楚王昏庸，政治腐败，屈原在权奸的迫害下被两次放逐。公元前278年，秦军攻下郢都，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一生被两次放逐，过了20多年的流浪生活，他看到人民的苦难，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楚国的没落和自己的不幸遭遇，也激起他极度悲愤的心情，促使他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

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25篇，而以《离骚》为最著名的代表，全诗373句，2490字，诗中表达了诗人远大的政治理想、邪恶势力对他的迫害，以及他坚持美好理想的信念和决心，充满了他热爱人民、眷恋国家、嫉恶如仇的思想感情和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是我国古代最宏伟壮丽的抒情诗。

屈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楚辞》，它是屈原吸收楚国民歌的精华发展起来的，诗中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大量采用楚国方言和方言里的词，句子长短参差不齐，形式比较自由，运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又采用大量的象征、比喻、神话和传说，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又增强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后来，人们把屈原和受屈原影响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统称为《楚辞》。

屈原的作品，为我国文学史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的作品又流传到世界各地。《离骚》就有英、俄、法、德、日、意等各种文字的译本。我国纪念屈原的风俗，早已传到朝鲜、日本、越南、马来亚等地。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进行纪念，充分显示了世界人民对伟大诗人屈原的崇敬。

绘画 战国的绘画艺术有所发展，在壁画方面，屈原的《天问》是在楚国宗庙大型壁画前的作品，可以使人想象出壁画规模的宏大和内容的丰富。帛画是画于丝帛上的绘画，著名的有：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两幅帛画的重点都是人物，大意都是由神物引导灵魂升天的景象，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体态神情和遨翔天际的"动"的意境，笔调刚劲简洁，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生动，说明绘画艺术已有了很大进步。

绘画艺术也反映在青铜器、漆器的纹饰上。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上，刻铸图范40组，人物多达92人，

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送行等种种姿态。四川成都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高40厘米，腹径26.5厘米，上面刻画着宴乐、采桑、射箭、狩猎、攻城、水陆交战等场面，画面上有200多个人物，形象生动，各有特色，表现出高超精湛的艺术水平。有些铜器和漆器的纹饰，已从单纯的图案发展为重视写实的趋向。

音乐　战国时期，音乐也有重大发展。近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琴、瑟、笙、排箫、竹笛等8种124件乐器。其中的全套编钟，有大小铜钟65枚，钟架呈曲尺型，中下层横梁均以铜人相托，稳定性强，容纳量广，铜钟按大小和发音的高低分作三层，依次悬挂在钟架上，钟上有龙形花纹和错金铭文，按铭文指示的部位敲击，每个钟能发出两个乐音。小钟声音清脆嘹亮，大钟深沉宏远。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广阔，音律科学，变化音比较完备，能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这样发达的艺术水平和科学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不愧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三、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　战国时的天文历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研究天文的学者和著作。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8卷，魏人（一说齐人）石申著《天文》8卷，后人把这两部书合编为《甘石星经》。较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120个恒星的方位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已能观测火、金、木、水、土5个行星的运行及其规律。他们测定的关于恒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比希腊的古星表早约200年，可惜失传。

这时的历法，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叫做“夏正”。①夏正

①春秋时，各国使用三种不同历法，冬至月为夏历十一月。以冬至月为正月，叫“周正”；以冬至后一月为正月，叫“殷正”；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夏正”。“夏正”也叫“夏历”。

比较符合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更便于农业生产。战国时，夏历被普遍采用。基本上保存了夏历的“夏小正”也在战国时成书，它按月记载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保存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物候知识，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战国时，人们已知利用磁石指极性的原理，制造了“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指南针的起源。

医学 战国时的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扁鹊是最著名的民间医生，原名秦越人。他周游列国，为人治病，精通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的医疗技术，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治病采用针灸、按摩、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名闻天下”，人称神医。

《内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因假托为黄帝所作，又称《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篇。书中论述了人体内脏的部位，记载了最早的人体解剖知识和血液循环的概念。它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对世界古代医学是一个巨大贡献。《内经》中大量关于针灸的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针灸疗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建筑技术 战国时期，建筑技术不断进步，各国都城的城垣及宫室建筑得高大、坚固和美观。鲁国的公输般是著名的建筑大师，又称“鲁班”。他不仅能建筑宫室桥梁，而且能制造攻战防守的工具。又在生产工具上作了许多发明创造，被后世木工尊为“祖师”。

《考工记》约成书于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工程技术史上的重要著作，记载了许多有关城市房屋的建筑设计及生产工具、兵器、乐器等的制作工艺。汇集了有关工匠的数学、力学、声学等方面的知识。此外，《墨经》中记载了有关物理学方面的一些成就，成书于战国。《尚书·禹贡》记述了九州各地的土壤、矿产和动植物资源，是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

重要名词：

战国七雄　李悝　《法经》　孙膑　商鞅　徐州相王　合纵与连横　马陵之战　长平之战　远交近攻　都江堰　郑国渠　燕昭王　屈原和《楚辞》　《甘石星经》　编钟　扁鹊　百家争鸣　《黄帝内经》

思考题：

1. 试述商鞅变法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作用。

2. 简述战国冶铁业发展的主要史实和铁器使用的情况。

3. 战国时有哪些主要阶级？土地占有的情况怎样？

4. 战国时有哪些著名的水利工程？指出修筑的主持人及其所属的国家。

5. 分析“合纵”、“连横”的含义及其作用。

6. 秦何时统一中国？评述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及其意义。

7. 说明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主要派别及其著名的代表人物。

第二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公元前221——前207年）

第一节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并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封建大帝国。根据统一国家的需要，秦王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措施，同时，还对六国的贵族及其他反秦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短暂的秦王朝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依照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模式，吸收了六国一些适用的制度，在调整、完善、系统化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

皇帝至尊　战国以前，最高统治者一般称“王”，表示天下归心的意思。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认为自己完成的事业是前无

古人的，“王”的称号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成功，也不能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便下令臣下“议帝号”。臣下建议采用古代“三皇”中最为尊贵的“泰皇”为号，秦始皇不满意。经过一番的考虑，他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①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认为下代皇帝为上代皇帝定谥号不可取，下令取消谥法，自称“始皇帝”，他说：“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传之无穷”。②

为了表示皇帝与众不同，秦始皇规定了一套新的制度：皇帝的命令称为“制”、“诏”；自称“朕”（先秦为第一人称，常人皆可用）；大印用玉雕刻，称作“玺”（以前一般人的印也称玺）；此外，还用一套服饰制度和繁缛的礼仪制度，显示皇帝的尊贵和封建等级的森严；还规定了臣下向皇帝上书建言，均自称“昧死言”，以示诚惶诚恐之意。这样，把皇权的至高无上制度化。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他们对皇帝负责，按皇帝的意志办事。军权也集中于皇帝手中，凡要调动兵卒50人以上者，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否则，就是严重违法。

三公九卿制 战国以来，封建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的重要支柱。秦王朝的中央政府，是原秦国中央政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官职名称和职权有一些变化。

中央政府在皇帝之下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丞相是文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③秦设左、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百官公卿表》。

右丞相，以右为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主管监察。三公互不统属，均对皇帝负责。

“三公”以下设“九卿”(实际数目不止于九)，大部分是秦国原有，少数是统一后增设的。“九卿”是：常奉（掌宗庙祭祀）、郎中令（掌侍卫皇帝）、卫尉（掌宫门守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宗正（掌理皇族家务）、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少府（掌管皇帝需用的山海池泽收入和手工业制造）、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财政开支）、廷尉（掌管刑罚）。

三公和九卿，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处理日常工作。大事由丞相与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郡县制 秦统一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公元前221年初灭六国时，分天下为36郡，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设九原、南海、桂林、象四郡，总数40郡。郡的长官是郡守，掌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掌军事；监御史，为中央御史大夫府派遣，监察官吏和百姓。

郡下设若干县，主要长官有：县令(不满万户的县为县长)，掌全县政务；县尉，掌全县军事；县丞，掌文书、刑法等。

郡县两级官吏是中央在地方的政治代表，不能擅权自立，必须对朝廷负责。朝廷对地方官吏实行年终考核制度，根据任职情况决定升降留免，以督责地方官按皇帝旨意行事。

县以下有若干乡、亭、里基层政权组织。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司法和税收；游徼负责治安。亭与乡同级，往往设置于交通要道或人口众多的集镇，有亭长。乡、亭下有里，里有里正(典)。每里均有严密的什伍组织。乡、亭、里小吏不由皇帝或官府任命，按规定由地方推择当地富庶人家的适龄人员充当。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国家是依靠地主士绅为其全部统治基础的。

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结合的这一套完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职能是不言自明的。但它也

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历史上，这一制度对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对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制度的模式，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沿用。

二、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度，采取了许多措施和政策。

统一法律 秦统一后，随即宣布废除六国法律，一律以《秦律》为纲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在《琅邪刻石》中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避）"，就是强调统一法律的重要性。《秦律》原文已佚失，散存在史书中的记载也不多，无法窥其全貌。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秦简千余枚，其中大部分是秦灭六国后第五年以前的法律文书。律文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关于盗、贼、囚、捕、杂、具等律文及其解释，这是秦朝的基础刑法；第二种是关于农田、粮仓、货币、贸易、徭役、狩猎、度量衡方面的律令，第三种是其它方面的律令及治狱案例。从以上内容看，《秦律》是保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和残酷压迫农民的工具。

建立军制 秦朝以武力统一天下，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军制也在战争中不断走向完备。秦军分正规军与地方部队两种。正规军战士称为"锐士"，地方军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和预备队。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秦军有步（徒）、车、骑、弩四个兵种。根据陕西临潼始皇陵东侧兵马俑坑的军阵排列，军阵为各兵种混合排列。在一号坑六千人的方阵中，徒兵列队，手中执矛秉戈，弩兵或蹲射，或挽弓挟箭观察，车、骑则分别插入军阵一定部位，互为依托，互相支援配合和保护。这是当时一种比较先进的阵法。坑内兵俑姿态各异，气宇轩昂，显示了秦军强大的战斗力。

迁徙富豪，收缴兵器 秦统一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

前221年），将全国各地富豪12万户迁到咸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迁徙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此外，还迁徙少数富豪及六国贵族于南阳和巴蜀。这是因为这些富豪在本土根深蒂固，宗族组织盘根错节，是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秦朝中央抗衡的力量。迁徙后，就使他们远离本土，切断其与宗族联系的可能，置于秦政府的监视控制之下，使之失去聚众反抗的条件。同时，迁富豪于关中，也有借其经济力量或经营经验，促使关中经济发展的用意。

秦灭六国时，六国的许多兵器或流散于民间，或被藏匿转移。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和人民利用这些兵器进行反抗，下令各郡各县强制收集流散的兵器，集中到咸阳，加以销毁，铸成铜人12个，每个重24万斤，置于宫中，作为装饰品。

决通川防，修治驰道 战国长期战争中，各国都修筑了许多堤防工事。秦统一后，这些堤防工事有可能为潜在的反秦势力所利用。于是，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初，就下令拆除旧城险阻和壅塞河道的堤防。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为了调动军队和运输物资的方便，秦王朝征发民力，修筑驰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至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南至今湖北、湖南，西至今甘肃东部，北至今山西及河北北部。驰道宽五十步，用铁锤夯筑，路面平整宽阔。为了北防匈奴，还修建了直道。南起关中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经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草原，直达九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堑山湮谷”，长约1800多里。另外，还修筑了沟通巴蜀与西南夷的“五尺道”，修筑了沟通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新道”。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曾五次沿驰道巡游各地。这些道路的开通，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使黔首自实田”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始皇下令

"使黔首自实田"。①"黔首"，是秦朝对不当官的地主和普通劳动者的称呼。"自实田"，是令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登记占有土地的数量，以便政府按亩数征税。这是秦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它第一次使土地私有法典化。这项法令，有助于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统一货币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的当年，下令废除形状不一、币值各异的六国货币，颁行新的统一货币。新的法定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有重二十两和重二十四两两种说法）为单位；铜钱为下币，圆形方孔，铸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又规定除官府铸币外，严禁私铸。全国范围内货币的统一，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制复杂而造成的商业交换的困难，为商业的发展和赋税的征收提供了方便。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自成体系，非常混乱。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已在国内统一了度量衡。前221年，秦政府下令废除六国原有度量衡制，以原来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及标准器。当时为此发布的诏书说："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左相隗状，右相王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足见秦政府很重视此事。据传世度量衡器实测：商鞅方升一升约合今200毫升。②秦一斤约合今256.25克。③秦一尺约合今0.23米。秦政府还规定，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检查。度量衡的统一，对于全国的经济交流，对政府的赋税征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统一车轨 战国时，各国车辆轨距各不相同，地面形成的车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曰。
②《文物》1957年第12期天石《两汉度量衡略说》。
③《文物》1964年第9期。

辙宽窄也不一样，各国车辆往来很不方便。秦统一后，规定全国车辆轮距皆宽六尺，约合今1.38米，史称“车同轨”。这样，就便利了车辆通行全国，对发展交通运输业起了促进作用。

统一文字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及其它历史原因，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文字的形体、读音不一，对国家政令的推行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不利。秦始皇有鉴于此，命丞相李斯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比较方便的“小篆”（也叫“秦篆），由李斯书写《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书写《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书写《博学篇》，作为规范化文字样本，推行全国。从此文字实现了统一。后来，由于政务、官狱文书繁多，狱吏程邈又依据民间已行用的更简便的新字体造出了“隶书”。云梦秦简书体说明，当时地方基层官方文书已使用隶书。汉代更通行这种书体。文字的统一，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博士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神灵明圣”，实现了海内为一统，“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②博士淳于越则提出“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的主张，③以巩固秦朝政权。丞相李斯给淳于越加上“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④的罪名，说这种“道古害今”的议论，都是由于“私学”的“非法教”所致。他向秦始皇建议：（一）、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博士官的藏书外，凡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一律限三十日内焚毁，逾期不交者，黥为城旦；（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三）、

①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③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严禁私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这就是“焚书”事件。我国先秦古籍遭到空前浩劫。

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一向重用方士，为他求长生不老药，花费巨万，而终不得药。方士卢生、侯生和一些儒生方士对秦始皇不满，私下议论秦始皇“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①等等。卢生、侯生逃走。秦始皇认为这些议论“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将一些议论者逮捕。并让御史严加追查，先后逮捕460多人，全部坑杀于咸阳。当时始皇长子扶苏谏阻，始皇不听，“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②

“焚书坑儒”宣告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结束，法家被定为一尊。秦始皇主观上企图以此强化君主专制和政治统一，但是，它杜塞了言路，使秦始皇闭目塞听，完全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加深了他的统治危机。它窒息了文化的发展，开创了我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先例，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自商周至春秋战国，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周边的各个部族，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为华夏族。他们既包括中原的商族和周族，也包括东方沿海的诸夷，南方的三苗、九黎、于越、荆蛮，西北部诸戎一部及杂居于中原北方的狄族等。秦灭六国，军锋所至，还进占了与楚、秦、燕、赵等国有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的民族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郡县，从而为我们伟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版图的确定打下了基础。

北逐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是居住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

①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古老的游牧部族，是古代胡族的一支。殷代称它为“鬼方”，周代称“荤粥”、“猃狁”，后称“胡”，战国时始称“匈奴”。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强悍善战。战国初，进入奴隶制初期，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进入中原骚扰和抢掠，秦、赵、燕各筑长城防守，多次给匈奴以沉重打击。约在秦灭六国之际，匈奴各部归于统一，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首领是头曼单于。当时，中原各国忙于兼并战争，北部边防空虚，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秦统一后，派蒙恬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秦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地区设置了34个县（一说是44县），并立九原郡，迁内地人民去建造城堡，屯田戍边。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蒙恬又利用地形，修缮和增补了旧秦、赵、燕长城，并将其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上经河套以北，依阴山山脉蜿蜒东行，沿燕山山脉东至辽东郡鸭绿江，全长万余里，史称“万里长城”。在当时，它作为一条军事设施，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扰，保障了内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长城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它象征着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是我们国家的宝贵遗产。

统一岭南，开凿灵渠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居住着大量的越人。他们族属不同，语言各异，各自独立，不相统属，被称为“百越”。其中居住在今浙江南部者，称东越；在今福建一带者，称闽越；在今两广东部一带者，称南越；在广西西部、云南东部者，称西瓯。战国前期，楚国势力逐渐扩展到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越人大部分纳入楚国的统治之下，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较快。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军占领了楚的江南地区，东越和闽越首领降秦。秦先后在其地置会稽郡和闽中郡。后来，

继续向岭南进军。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南越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三郡。秦征发中原50万居民到岭南定居，这些居民带去了铁器和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向南进军中，秦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横在湘、桂、赣、粤间的南岭山脉的阻隔，秦军把山间小路开凿成“新道”，以供士卒和辎重的通行。为了解决向今广西境内运粮问题，秦始皇派监御史禄负责在今兴安县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湘、漓二水上游相距不远，水面海拔高度相差不大，开凿者截断了湘水上游，另开两条分渠，一条较短，为北渠，引水七分，绕道再入湘江；另一条长达33公里，为南渠，引水三分，另入漓水。南渠就是著名于世的灵渠，又称兴安运河。运河上分段修建了许多闸门，闸门间的河道叫水陡，水位可以调节，船只可以历水陡上下，互相往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水闸，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对于促进中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都起了积极作用。

通西南夷 西南夷是指分布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至西部、四川西部西北部及西藏东部的不同族属、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部族。战国时期，先进的楚文化到达这一地区，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秦灭六国后，派将军常頞，征调巴、蜀士卒，自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线，劈山开岭，开五尺宽的道路，称“五尺道”，通西南夷，并在一些民族地区设置了行政机构，沟通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这样，到公元前210年，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它的疆域，“东至海（指勃海至南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指今甘肃、青海交会处），南至北向户（指今岭南至北部湾一带），北据河为塞（指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临河一带），

并（沿着）阴山至辽东”。①在这广大的疆域内，秦政府行使着行政管辖权，各族人民相互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他们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共同贡献。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行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青年时代，就把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方针。13岁当国王，在秦国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夺得了权力。22岁亲政后，选拔贤才，多谋善断，继承了先世的良好基础，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施展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攻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为人民安定生活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他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为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提供了蓝图；他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经略南越，戍守五岭，使统治地区空前扩大，初步奠定了我国版图的基础，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他主持修建的一些著名工程，长期发挥了效益，造福后代。但是，秦始皇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完成统一以后，他逐渐变得骄傲自大、迷信权力、专横独断，用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进行残暴统治。他不顾人力物力条件，企图在短期内完成各种规模巨大的国家事业，造成国力的极大消耗；他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欲望，大兴徭役，修筑陵墓和宫殿，寻求仙药，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他焚书坑儒，扼杀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把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付之一炬，造成了严重损失。总之，秦始皇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秦始皇对中国古代社会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历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应该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

第二节　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一、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秦朝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完成统一仅14年，却被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导致秦迅速覆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秦的暴政。具体来说表现在：

繁重的徭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集权专制的思想不断发展，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欲壑，大量征发徭役，修陵墓，建宫殿，开驰道，筑长城，戍守边疆，转输军饷等都压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统一前后，他在函谷关内外大造离宫别馆700余所。史载渭南上林苑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宽500步，南北50丈，殿上可坐万人，殿内可以树立5丈高的大旗。①他给自己在骊山修建坟墓，高50丈，周围5里，"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机相灌注，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借以表示他死后仍对整个国家拥有统治的权力。修陵工程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征发劳动力70万人，近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三个兵马俑坑，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有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7千多个，真马大小的陶马700余匹，战车130余乘，这个埋藏地下的秦陵警卫军阵，规模之大为世界所仅有。证明当时消耗的人力物力确是难以估计的。

秦朝人口约2000万，每年被征发服役的在200万以上，男子不足，又征丁女，出现了"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②的惨相，据《通考》记载："北筑长城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严安传》。

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骊山、阿房宫役各七十余万”，再加上修筑驰道，各种转输压得人民难以喘息，当时的民谣说：“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① 繁重的徭役征发，远远超过了人民能够承受的限度。

沉重的赋税 秦朝在征发繁重劳役的同时，又向人民重征暴敛，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而税一，此外还有口赋。后来，秦的赋税征收量却增加到占农民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淮南子·兵略训》说，秦“收泰半之赋”。同时，政府又专盐铁之利，征收山林川泽之税。残酷的压榨，造成“男子疾耕不足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以盖形”。迫使人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② 沉重的赋税剥削，使广大农民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残酷的刑罚 秦朝刑罚严酷，主要表现在摇手触禁，轻过重罚，什伍连坐，株连面广。见于秦简律文所载的肉刑名目就有赀、笞、迁、耐、髡、饿、黥、劓、膑、斩左趾、宫等。处肉刑后，还得长期为“刑徒”服苦役。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凿颠、定杀（投入水中淹死）、抽肋、绞、剖腹、镬烹、车裂等。还规定了极为残酷的具五刑（黥、劓、斩左趾再笞杀、枭首、菹骨肉于市）。更有夷三族和连坐等。往往一人犯死罪，父、母、妻族都得处死，叫“族诛”；一家犯法，邻里都要受牵连，叫做“连坐”。秦朝法律规定，逃避兵役和徭役者，处以笞刑；盗不足一钱者，罚徭役三十日，盗马者死，詈敌以恐者戮，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无限制的强化法制，结果造成“割鼻盈蔂，断足盈车，”③“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④的惨相，“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秦的残暴统治，迫使人民起来反抗。前211年，有人在东郡

①《水经注》卷3引。
②《汉书·食货志》。
③《盐铁论》卷10。
④《史记·李斯传》。

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话，秦始皇下令将附近居民全部杀掉。许多人难以自存，被迫结伙逃亡，对官府进行武装反抗。骊山刑徒英布，聚众于江中，彭越聚集徒众于巨野泽中，沛县（今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同被押送的刑徒一起在芒砀山（今河南永城县）起义，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也积极活动起来。韩国贵族张良，收买力士，在博浪沙（今河南阳武）邀击秦始皇，误中副车，张良逃匿下邳，待机再举。焚书坑儒中所形成的不满情绪，也伺机发作。

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沙丘后，随行的中车府令赵高，与秦始皇幼子胡亥，胁迫利诱丞相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诏书，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专权，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暴。秦始皇入葬时，把后宫无子女的宫人全部殉葬，为怕暴露陵墓机密，把修陵工匠数千人全部幽闭墓中，又征调武士5万人屯戍咸阳，豢养大量狗马珍禽，游乐嬉戏。“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① 秦二世杀死扶苏、蒙恬、蒙毅及秦始皇子女20多人，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秦的残暴统治，使大批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促使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

二、大泽乡起义和农民政权的建立

大泽乡起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等900名贫苦农民，在两名秦尉押解下，被征发赴渔阳（今北京怀柔）戍守，路经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时，适逢大雨，道路不通，即使赶到渔阳，也要误了报到日期。按秦法，戍卒误期当斩。在死亡的威胁下，陈胜、吴广等密谋起义。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雇农出身。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贫农出身。陈胜指出“天下苦秦久矣”，一旦起事，定会得到群众的响应。他们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发动群众，并利用楚地群众的地域心理，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预言。他们杀死了押解戍卒的两个秦尉，“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张楚农民政权的建立 起义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随即进占蕲县（今安徽宿县），队伍迅速扩大。不久，攻下陈县（今河南淮阳），时有兵车六、七万乘，战马千余匹，士卒数万人。于是，陈胜在陈县称王，以吴广为假王，①建立“张楚”政权，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农民起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②一时楚地以千余人为一支的起义军，不可胜数。刘邦杀了沛县县令，发动起义；楚国旧贵族项梁与侄项羽，杀秦会稽郡太守，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原魏国名士张耳、陈余和儒生孔鲋（孔子的八世孙）也参加了起义军，起义军声势浩大，但成分也更加复杂。

六国旧贵族的复国活动 陈胜起义爆发后，六国旧贵族也纷纷起兵，相继恢复旧国。武臣从陈胜处领得三千士卒北伐，至赵地，在原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支持下，建立赵国。武臣为王，张耳为丞相，陈余为大将军。他们抗拒陈胜支援西征军的命令，脱离张楚政权。武臣派将军周市收复魏地。他略定魏地时，立故魏公子咎为魏王，自为丞相。旧贵族复国势力虽然与农民起义在反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恢复旧国的活动却分散了反秦的力量。

西征失利与陈胜遇害 张楚政权建立后，陈胜派出四路大军

①假，兼任、代理之义，署理王事。

②《史记·陈涉世家》。

向秦王朝发动进攻：吴广向西进攻秦的仓储重地荥阳；武臣、张耳和陈余北渡黄河攻取赵国故地；邓宗南向攻九江郡；魏人周市北向收复魏地。

吴广久攻荥阳不下，与秦军相持于荥阳。陈胜又以周文为将军，率军直取关中。周文攻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已有战车千乘，士卒数十万，一直打到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东)，距咸阳不过百里，秦都震动。秦以少府章邯为将军，赦骊山陵刑徒，编为军队，反击周文军。周文孤军深入，又缺乏战斗经验，作战失败，退出关中，又被章邯追击，周文战败自杀，西征失败。吴广因不听部将田臧分兵支援周文的劝谏，为田臧所杀。田臧率军迎击秦军，为章邯击败战死。章邯进逼陈县，义军兵力单薄，作战不利，陈胜率军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御者庄贾所杀，庄贾降秦。后来，陈胜部将吕臣反攻收复陈县，处死叛徒庄贾。但起义军因连遭失败，士卒散亡，吕臣后与其他义军结合，继续坚持反秦斗争。

三、项梁、项羽起兵与巨鹿之战

项梁、项羽起兵　陈胜、吴广牺牲后，由他们点燃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反秦运动中两支最大的力量是项羽和刘邦。

原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九月响应陈胜起义，杀会稽郡守，起兵反秦。陈胜牺牲后，陈胜的将军召平渡江，以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上柱国，要他领兵攻秦。项梁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北上，又收英布等起义军，吕臣、刘邦也受他节制，兵力有六、七万人。项梁立战国末年客死于秦的楚怀王之孙名叫心的为楚王，仍号楚怀王，以为号召，都盱眙（今江苏盱眙）。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在定陶（今山东定陶）与章邯所率秦军作战，兵败牺牲，起义军遭受第二次重大挫折。项羽、刘邦、吕臣等各率人数不多的三支部

图例

郡城
郡治
城镇
关隘
起义爆发地点
陈胜进军路线
刘邦进军路线
项羽进军路线
陈胜起义军都城

秦末农民起义图

队，互为犄角，相互支持，守卫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待重新发展的时机。楚怀王也由盱眙迁都彭城。

巨鹿之战 定陶之战时，秦政府调回戍守长城的王离20万大军进攻赵国。章邯在定陶之战杀项梁取得胜利后，认为黄河之南义军已不足为忧，因此，率军北渡黄河，配合王离攻赵。此时的赵王歇和张耳、陈余丢弃都城邯郸，北逃巨鹿（今河北平乡），为王离军所围困。赵军食尽兵少，非常危急。赵王歇请求各反秦势力救援。燕、魏、齐派军至巨鹿外围，筑垒壁守，不敢与秦交战。

这时，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军七万救赵。宋义军至安阳（今河南安阳东南），迟滞46日不进兵。项羽杀宋义，楚怀王封项羽为上将军，掌握兵权。二世二年（前208年）深秋，项羽率军北渡漳水，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①以示若不战胜，就不生还的决心。起义军与王离军大战于巨鹿城下，九战九捷，生俘秦军统帅王离，杀将军苏角，将军涉间自焚，秦军被歼，巨鹿围解。当时战斗十分激烈，义军呼声动天，战士无不以一当十，那些不敢出战的旧贵族军，藏在壁后观战，个个心惊胆颤。项羽破秦军后，被推为“上将军”，成为反秦联军的领袖。秦军失败后，章邯率部退至殷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章邯20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怕降卒有变，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全部坑杀，然后引兵西进关中。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最激烈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起义军消灭了秦军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为最后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四、刘邦入关与秦朝的灭亡

刘邦起兵与胜利进军 刘邦，丰（今江苏丰县）人，原为秦

---

①《史记·项羽本纪》。

的泗水亭长。秦末，他奉命押解刑徒到咸阳，路上刑徒多有逃亡，他看到无法交差，也逃入芒砀山（今安徽砀山）中。陈胜起义后，他与沛县（今江苏沛县）县吏萧何、曹参等杀沛令，举行起义，自称沛公，后归项梁节制。

楚怀王遣军解救巨鹿时，与项羽、刘邦约定，谁先入关灭秦，当为"关中王"。项羽进军巨鹿时，刘邦奉命西击秦。刘邦率数千人，一路收编沿途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他避实击虚，破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下宛城（今河南南阳），经过一年迂迴作战，于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攻入武关，九月，破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军抵蓝田。

秦朝的灭亡 在农民起义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秦朝统治集团的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先是中车府令赵高与秦二世勾结，杀掉李斯。不久，当起义军逼近关中时，赵高又杀掉秦二世，废皇帝称号，立二世的侄儿子婴（一说是二世的堂兄弟）为秦王。子婴不愿为赵高所挟制，计杀赵高。前207年十月，刘邦军至灞上（今西安市东）。看到大势已去并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素车白马，以绳系颈，捧着符玺，至灞上向刘邦投降，刘邦率军进入咸阳，秦亡。

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陈胜吴广首义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参加起义的农民在百万以上，席卷或波及了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推翻了第一个封建专制集权的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地主阶级，调整了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陈胜吴广敢于用革命暴力反抗封建统治，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中国人民是一种鼓舞，并形成传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五、楚汉战争与西汉的建立

"约法三章" 刘邦进入咸阳后，宣布他为"关中王"。又

接受张良、樊哙等人的建议，撤出秦宫，封闭宫室、珍宝、府库、图籍，然后还军霸上。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①刘邦还要秦朝原有的下级官吏照旧工作，并派人与秦官吏一起，到各县邑宣传"约法三章"。刘邦的这些措施，表示他不愿重蹈亡秦的覆辙，对恢复与稳定关中社会秩序很有好处，因此，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同时，由于他维护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地主豪绅们也拥护他，"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②

项羽的分封 项羽收降章邯后，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率40万大军冲破函谷关，进军至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当时，刘邦仅有兵力10万，自知不敌项羽，接受张良的建议，亲赴鸿门，卑辞言好，表示恭顺。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使秦焚书后藏于咸阳宫府的先秦典籍彻底毁灭，他佯尊楚怀王为义帝，但又将其迁往今湖南，派人路上将其刺杀。他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又以盟主身份，分封随他入关的将领和秦的降将18人为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今陕西汉中），领汉中、巴、蜀。又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渭北），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在关中形成屏障，阻挡刘邦北进。项羽封王之后，就东归彭城。

楚汉战争 项羽分封导致了分裂割据，同时也埋下了战乱的祸根，所封18王中，有新王，也有旧王，有的旧王迁新地，旧地却又封新王，有的反秦有功却未得封王。由于分封不公，所以在项羽归彭城不久，新、旧王及未得封王者，便联合彭越，杀逐项羽所封齐地三王。张耳、陈余也趁机起兵。项羽派兵镇压，东方大战又起。刘邦乘机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迅速击败章邯等关

---

①②《史记·高祖本纪》。

中三王，略定三秦，作为根据地。

前205年四月，刘邦乘项羽主力在齐地作战之机，一举攻下彭城。项羽迅速回师反击，刘邦兵败。此后，两军长期相持于荥阳、成皋（今河南巩县）一带。前203年11月，刘邦遣韩信由关中东渡黄河，破井陉，越太行，战齐鲁，灭魏、赵、代、燕、齐等国。彭越也与刘邦协同，在项羽腹背之地往来作战，断其粮道。项羽逐渐丧失优势，处境不利，要求与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和约签订后，项羽率兵东归，刘邦用陈平、张良计，尾击项军，并与韩信、彭越会师于垓下（今安徽灵璧），项羽兵败，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浦）边自刎而死。前202年2月，刘邦即皇帝位，国号汉，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

楚汉战争是两个封建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历时三年另五个月(前206年八月至前202年十二月)。汉胜楚败的结局不是偶然的。刘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他革除秦政弊端，善于争取人心；他善于用人，不拘出身，不计小节，赏罚分明，团结了大批人才，使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他的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又有稳定后方，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兵员与粮草。他以正面作战牵制项羽主力，派兵迂回到敌侧后作战，不断削弱敌人力量。项羽虽在反秦斗争中立有大功，但秦亡以后，他成为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思想守旧，眼光短浅，搞分封，导致纷争和战乱；他残暴异常，坑杀降卒，多次屠城，丧失民心；他又刚愎自用，心胸窄狭，不善于团结人，使自己陷于孤立；他迷信武力，战略战术刻板，又无稳定后方支持，常常陷于被动，以致由强变弱，最终失败。

重要名词：

秦始皇　三公九卿制　郡县制　焚书坑儒　灵渠　秦陵兵马俑　小篆与隶书　使黔首自实田　万里长城　族诛与连坐　大泽乡起义　张楚　巨鹿之战　约法三章　楚汉战争

思考题：

1．试述秦始皇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及其历史意义。

2．试述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3．简评秦始皇。

4．何谓“楚汉战争”？分析楚汉战争的性质及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

第三章　西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公元前206—公元25年）

第一节　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于定陶，继迁都洛阳，后又采纳娄敬的建议，移都长安。建国号为“汉”，史称“西汉”。

一、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秦的残暴统治，继又进行了四年之久的楚汉夺权战争。到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急剧减少，大城名都的户口才只有十分之二、三，国家财政十分困难，“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一般老百姓更没有丝毫的积蓄。为了稳定封建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复员兵士，优待军吏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颁布诏令，复员兵士，规定入关灭秦的关东战士，留居关中的，免服徭役12年，愿回关东的，免服徭役6年。还规定，复员的军吏卒，未获爵位，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大夫

①《汉书·食货志》。

以上的加爵一级，并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诏令又规定，位在七大夫以上高爵的复员人员，更要"先与田宅"，并且赏赐食邑。这一复员和优遇军吏的工作，既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又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

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 在复员军吏卒的同时，刘邦下令号召聚集山泽的流民，还归本土；并规定"复故爵田宅"。即承认战争年代出逃小吏和地主的旧有地位和权力。这就使国家名籍以外的户口重新成为政府的编户，而且用恢复原爵位和土地的手段，为王朝培植新的社会支柱。

释放奴婢 诏令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①这实际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含有和地主阶级争夺劳动人手的意义。

重本抑末与减轻田租 刘邦继承了秦的"重本抑末"政策，实行一系列抑商重农的措施。对工商业主另立市籍，明令有市籍者不许穿绸挂缎，不得乘车骑马，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任职做官；并加倍征收商人的赋税，迫使"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与此同时，刘邦还采取减轻田租的政策，实行"什伍税一"。与秦的"收民泰半"之赋相比，是个很大的变化。

以上的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刘邦以后，政局日趋稳定，黄老政治逐渐取得统治地位。

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文景之治 刘邦在位期间，出于巩固西汉政权的需要，与大臣们一再探讨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他们认识到"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亟"②的缘故，于是力主"反秦之弊，与民休息③"。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

---

①《汉书·高帝纪》。
②陆贾：《新语》。
③《汉书·循吏序》。

开始为西汉统治者所接受；到惠帝、吕后时期，由于相国曹参的提倡，黄老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曹参，沛（今江苏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反秦，曾在担任齐相期间，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取得成效。后继任中央相国，他谨守高祖、肖何成法，举事无所变更，时有“肖规曹随”的美誉。以后几位从政者，都行无为之政，政治上除秦“挟书律”、“三族罪”和“妖言令”，缓和阶级矛盾；经济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并放松对工商业的控制，因此，出现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②的局面。

文、景时代，黄老之学更是风靡一时，统治阶级进一步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法令趋于宽松，如除收帑相坐的律令，废肉刑，减笞刑等，“约法省禁”的措施；取消过关用传（过关凭证）的制度；田租减至三十税一，一度还豁免租税，徭役也有所减轻。尽管这些措施，没有改变地主阶级统治的性质，但百姓从中还是多少得到一点好处。从而出现了“刑罚用稀”，“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③和“流民既归，户口亦息”④的政治经济形势。正是由于文、景之治，到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达到“都鄙廪庾尽满，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⑤的程度。农民生活多少有所改善，不过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和大商人。他们乘机扩大财富，兼并之风随之而盛行起来。

二、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①《史记·平准书》.
②《史记·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刑法志》.
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⑤《汉书·食货志》.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飞速的进步。

农业 西汉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铁农具的推广与进步，牛耕的普及与提高，生产技术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铁农具的推广与进步 西汉时，铁农具已广泛使用。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如甘肃、新疆等地，都使用上了铁农具。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铁器推广更为迅速，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冶铁业。铁农具种类较前代增多，仅铁犁，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及大型犁铧之分。特别是山东、河南及陕西西安、咸阳、礼泉铁犁壁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西汉时期已结束了战国时代划土破沟犁的历史，犁壁起到了翻土和碎土及深耕的作用。欧洲直到11世纪才发明此项技术，晚于我国1000余年。

牛耕技术的普及和提高 西汉时期，牛耕比以前更加普遍。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为了促进牲畜繁殖，汉政府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盗牛、盗马者处以重刑。政府又在北方边疆设苑养马，广大农民更重视饲养和爱护牲畜，因而畜力耕作（牛耕为主，马耕为辅）在黄河流域普遍推广。武帝时赵过根据大型犁，推广二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法。汉末在山西、陕西北部已使用二牛抬杠式耕作法，以牛鼻圈控制牛犁方向，这大大节省了劳动力。甘肃武威出土汉末牛犁模型明器，用一牛挽一犁①，表明当时已有单牛犁耕。

耕作方法的改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的抗旱经验，推广了代田法，即把一亩地分成三甽和三垄，年年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代田法配以精巧农具，精耕细作，每亩产量“超出常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②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出了

①《文物》1972年第2期。

②《汉书·食货志》。汉代一斛约等于120斤，一斤约合250克。

"区田法"，这是园艺式耕作法，把土地划成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赵过发明耧车，即三足耧犁，由一牛犁引，同时播种三行。解放后在辽宁、北京均有汉末铁耧脚出土，山西平陆王莽时墓葬画像中有三足耧画像，证明西汉确已广泛采用耧犁播种。武帝也曾下令工奴制造这种农具，并组织农民学习操作方法。耧车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我国古代耕作技术已进入了新阶段。

水利工程的兴修 西汉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黄河的治理和在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泛滥，从公元前132年到前109年，装帝多次治理黄河。特别是前109年，武帝征发数万民工，亲自巡视工地。经过这次整治，黄河80余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水患。装帝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灌溉渠，形成了一个水利网。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的叫漕渠，长达100多公里，主要用于转运关东粮食，并灌溉沿岸万余顷土地。与此同时，还开凿了灵轵渠、成国渠、沣渠和白渠，其中以白渠最为有名。白渠长200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利淤泥足以肥田，故民谣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洛水旁的龙首渠在开凿中，劳动人民采用凿井方法，"井下相通行水"，叫"井渠法"②。后传至新疆，发展为"坎儿井。"除此之外，在山东引汶水，在甘肃引黄水，安徽引淮水灌田，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耕地面积的扩大与人口的增殖 由于政府鼓励垦荒，奖励生殖；在广大人民辛勤劳作下，西汉王朝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长。到西汉末年平帝时，全国耕地面积约827万余顷，人口约为5959万余口，比战国时增加了2倍有余。

---

①②《汉书·沟洫志》。

手工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主要手工业部门有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等。

冶铁业在西汉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初允许私人冶铁，蜀郡卓王孙、南阳孔氏等乘机而起，以冶铁起家而致数千金。武帝时代，官府垄断冶铁业，虽在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比较广泛。加以长期对匈战争，装器需要量大，使冶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县冶铁遗址在15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18座炼铁炉，已经具备了从采矿到炼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据金相学分析，西汉铁器中已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术。金属组织相当良好的高碳钢、中碳钢及锻铁制作的兵器已大量使用。据对巩县铁生沟一件铁镢化验，表明其不仅有良好的球状石墨，而且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达到了现行球墨铸铁国家一类A级石墨标准①。高效先进的“炒钢法”技术也在西汉中后期应用于冶铁业。

此外，铜器铸造业随着冶铁业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设计之科学，工艺之精巧，令人惊叹。现存上海博物馆的西汉透光铜镜，其镜面承受日光时，就会由应力作用而产生透光现象，墙上会反映出与镜背相对应的图像。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科技水平和工艺制造技术。

纺织业是我国传统的手工业。西汉时，分为官营、私营和农家个体经营几种形式。西汉纺织业以丝织和麻纺为主，在战国基

---

①《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长安和临淄为全国纺织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专为皇室织造各种用品。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有大规模官营作坊，役使数千织工，并设工官管理。巨鹿人陈宝光妻子长于锦绫的纺织，据《西京杂记》载，每织一匹，价值万钱。1972年，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轪侯利苍妻墓中，发现大量丝织品，有完整的服饰，有整幅或不成幅的丝绸，共100多件。其种类有绢、罗、纱、锦、绣、绮等，有青、朱、白、灰、茶、绛红、浅黄、黄棕等颜色，使用绘、织、绣等多种制作技术，创制出多式多样的花纹；如各种动物纹、云纹、卷草纹、变形云纹、菱形几何花纹等。有一件素色禅衣，重量只有49克，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为丝织业中难得的珍品。

纺织品质量的提高与纺织机械的推广分不开，不仅纺车使用普遍，而且织布机已经出现，斜织机在黄河长江流域都已使用。农村广泛使用脚踏提综式织机，提花机也很常见。据对马王堆绒圈锦结构分析，西汉织造工艺上已经使用分组的提花束综装置。印染技术较前代有显著的提高。随着西域的开通，西汉的丝织品大量经销西亚、中亚，并转销到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中国开始成为名符其实的“丝绸之国”。

漆器是汉代上层贵族豪家的生活奢侈品，需要量大，种类繁多。有耳杯、盘、壶、盆、盒、勺、枕、奁和屏风等，工序精细，有素工、髹工、上工、黄涂工、画工、洀工、清工、造工等工种。在蜀郡和广汉等地官府设工官监造。马王堆出土漆器184件，另有2具彩绘大漆棺，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仍完整无损，色彩鲜艳。这些漆器纹饰富丽，造型优美，制作精细。

除此以外，汉代的煮盐、造船、酿酒、建筑和制陶等手工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汉代的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初对商人曾采取限制的政策，但是，社会的需要

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刺激商业活动的发展。惠帝、吕后以后，抑商禁令逐渐解除，地方诸侯王又优遇商人，因而，商人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经济势力。洛阳师史运载货物车辆以百数，转返郡国，家产达7000万；山东刁间役使工奴，"逐鱼盐商贾之利"，成为拥资数千万的暴发户。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10倍，富埒关中。当时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①的谚语。这些以末致财的大商人，已懂得"用本守之"的道理，他们无不规陂池、求田宅。汉代这种由"抑商"到"宽商"的政策变化，便利了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进程。富商巨贾因其富厚，交结王侯，助长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终于导致了汉武帝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批商业大都会。长安、洛阳、临淄等全国有名的城市，人口达10万以上。长安街市整齐，除东西市综合贸易中心外，还有牛市、酒市类的专门行业性质的小市，号称"长安九市"。这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中外商人，货物云集，贸易兴隆。此外，南阳的宛城，河北的邯郸，江淮地区的江陵、合肥，南海的番禺，巴蜀的成都，也逐步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西汉政府在各都市设置市令或市长，以管理工商业和征收货物税。各大都市"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②在交易中已出现了驵会（牙行），向买卖双方索取1/5到1/3的佣金。

中外贸易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也逐渐发展，当时的陆路交通路线主要有：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远达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由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往东南亚和印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食货志》。

度。一条由南海（今广州）出发，经苍梧（今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交趾、九真、日南等地。一条东北至蓟，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达朝鲜半岛。

海上贸易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向东，由齐东渡渤海，达朝鲜半岛和日本；一条向南，自徐闻、合浦沿印支半岛近海南行，达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西达印度洋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

三、西汉的赋役制度

汉初，从高祖刘邦到文景时代，在实行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措施的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制度。

编户制度　在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和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标准。汉初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对广大人民的控制。早在刘邦攻下咸阳时，萧何就把秦的档案、律令和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从秦户籍中掌握了全国土地和人口状况。西汉政权建立后，下令逃散在外的农民一律返回本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建立起了周密的户籍制度。西汉户籍称为“名数”，户籍登记以“里”为单位，详细记载了个人的出生地、年龄及身材、肤色等。汉代编户制度非常严格；户籍迁移需申请并征得批准，在新地则要重新登记注册，如果丢掉户籍流亡，抓获后将被发往边疆戍边或没为官奴婢。

赋税制度　严密的编户制度为国家向人民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刘邦开始，汉朝的赋税主要分为三大类：

1. 田赋：即土地田亩税。汉初曾实行过十五税一、十税一、三十税一和临时免收等办法。田赋的减免对于荒地的开垦，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恢复无疑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由于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和官僚手中，因而实际上得利最多的还是地主阶级。

2．口赋：即人头税。这是汉初最主要的赋税。口赋按年龄不同分为二种。一是算赋：凡编户齐民年龄在15岁到56岁之间，不论男女，每人每年向国家缴纳120钱，称为一算。商人和奴婢加倍。惠帝时又规定女子15到30岁尚未出嫁的要分五等加征，每等加一算，到30岁未出嫁则要交税五算。算赋规定用来治库兵车马，是国家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二为口钱，亦称口赋或口算：凡年龄在3至14岁未成年男女，年纳20钱供宫廷费用。武帝时加3钱供补充车骑马匹之用。元帝时改为7岁起征。汉末，个别地方改为1岁起征。

3．献费：名义上是诸侯王、列侯及地方官吏敬奉皇帝的礼品费用，最初无定数，后刘邦规定按所辖地区的人口数，平均每年每人出63钱献给皇帝。

以上是西汉政府向人民征收的主要赋税，除此以外，人民到山川园池里采矿、打柴、捕鱼、煮盐，都要交纳租税。算赋分多次征收，实际超过了120钱的定额。再加上封建地主的盘剥，农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

徭役制度 汉朝规定成年男子都要应役。徭役负担有兵役和力役。西汉应役年龄，景帝以前无明文记载，景帝时定为20岁，武帝以后改为23岁应役，56岁免役。西汉徭役主要有三：

1．正卒：即正式兵役，服役期一年。役期满后，遇有军事需要，还得随时应征。

2．戍卒：即到边疆守边或到京师做卫士，役期开始不定，后也定为一年。不亲自服役的需交纳“过更”银300钱，由政府雇人戍边。戍卒徭役繁苦，若遇战事，政府随时延长服役期限。

3．更卒：即到所在郡县服役。最初规定隔几年一次，每次五个月。文帝时改为一年一次，为期一月，称为“更”。主要职责是兴修道路和桥梁，修筑城堡和治理河渠，还需担负运送军粮

及地方警卫的任务。亲自服役者称“践更”，出钱代役的称“过更”，后者需交纳100至200钱不等，由政府雇人服役。

以上是西汉统治者向人民征发的主要徭役。实际上农民所受剥削远不止此。由于徭役和赋税由地方官吏征调，他们中饱私囊，狼狈为奸。加上汉初田税可减，而人头税很少减免，因而大量赋税都通过人头税压到了广大农民头上。所以到武帝时代，田租虽为三十税一，但“加之以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①

第二节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汉承秦制”

刘邦在恢复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秩序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那时，基本上沿袭秦朝的体制，同时又根据新朝的需要，有所发展和改革。

中央官制 汉初，中央仍沿用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只是名称时有变更，职权亦有些调整。丞相仍为位极人臣的万石高官；高祖时，改称相国，哀帝时更名大司徒。太尉，武帝时称大司马，职权渐在司徒之上。御史大夫，成帝时改称大司空，监察大权旁落。九卿中除少府、太仆名称依旧外，其余都有更易，但其职掌仍如秦制。

汉中央建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三公之职最初至为

①《盐铁论·未通》。

尊崇，武帝以后，相权渐为削夺，成为外朝庶务总署；二是九卿中少府的一些机构属职获得充分发展，特别是尚书一职，甚为皇权所依重，渐发展为内廷机枢。

地方建制 汉沿袭秦的郡县制，但又实行分封，形成郡国并行的地方建制。这是汉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为了争取那些拥有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先后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7人为王。西汉建立后，这些异姓王渐次被铲除。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还分封一批功臣为侯。这些王国和侯国，在等级上虽如同郡县，但实际上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形成统一政权中的割据因素。

军制 汉初在长安设有南北两支驻屯部队，守卫京师。南军由卫尉统领，由各郡屯兵轮番充任，担任宫城警卫，是皇帝的近卫军。北军由中尉指挥，征发三辅青壮组成，分为材官、骑士两个兵种，保卫京师安全。南北二军是中央直属部队。另外，地方设有轻车、骑士、材官和楼船等兵种，郡由郡守、郡尉统领，王国由中尉指挥。

法制 刘邦进入关中，就曾宣布废秦苛法，同时“约法三章”以稳定关中。取得全国政权后，他认识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①，遂令肖何等依据秦律，加以损益，制定了汉律九章（即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律）。以后，叔孙通以作注疏的方式，对《九章律》进行补充、发挥，成《汉律傍章》18篇。这些法律，无疑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在汉初黄老思想的支配下，较秦代法制有所宽松。如秦“夷三族”、“具五刑”、“挟书律”和“妖言令”等苛法相继废除。特别是武帝时，封建法制大大强化，以礼入法，刑德并用，成了后来封建王朝的立法和司法原则。

---

①《汉书·刑法志》。

二、中央集权的初步加强

异姓王与同姓王　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握有重兵的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政权形成严重威胁。汉中央政权与异姓王之间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爆发。

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迁都长安，7月，燕王臧荼叛，刘邦大军讨伐，9月俘臧荼，封太尉卢绾为燕王。韩信改封为楚王后，巡行县邑，出入陈列兵仗。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纳陈平议，逮捕韩信，改封淮阴侯，使居长安。公元前197年，边镇实力派陈豨在代地反，刘邦亲征。韩信与陈豨谋反计划败露，肖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彭越部将谋反，彭越犹豫被逮捕，发配蜀地，后为吕后谋杀。公元前196年7月，英布公然叛乱，刘邦带病亲征，英布败逃被乡民所杀。与此同时，燕王卢绾与陈豨勾结事败露，刘邦派樊哙、周勃将兵击卢绾，卢绾率几千兵逃入匈奴。公元前202年，赵王张耳死，子张敖嗣立为王，娶刘邦女为妻，后因赵相贯高谋反，受到牵连，被贬为宣平侯。至此，异姓王仅剩势小力弱的吴芮。刘邦先后用了七年时间，削平了主要异姓王国，解除了汉初分封割据的祸害，巩固了西汉的统一。

在削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亡秦孤立之败"，又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实际上以同姓王取代了异姓王的地位，欲以宗族子侄为羽翼屏卫汉室。刘邦还召集诸王、大臣"刑白马而盟"，立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①的祖训。

刘姓子弟封王，功臣部将也要分肥。刘邦为缓和矛盾，封曹参为平阴侯，张良为留侯，陈平为户牖侯。到公元前195年，先后封侯143人，大者食邑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为限制列侯权力，规定其封邑的行政权归于郡县，列侯只是"衣食租税"而

①《史记·吕太后本纪》。

已。

平定诸吕之乱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生性懦弱，母后吕雉秉政。惠帝在位只7年便死去，吕后深惧同姓王与功臣难驭，竟违背刘邦当年非刘氏不得封王的“白马之盟”，擅封外戚吕姓子侄为王。其兄子吕台为吕王，控制京师卫戍部队；兄产为梁王，官拜相国；吕禄为赵王，拜上将军。这样，握有国柄的诸吕集团与刘姓诸王及朝廷元老功臣形成对峙局面。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矛盾立刻激化。诸吕欲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在此紧急关头，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当机立断，将吕氏一网打尽，又迎立刘邦儿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削藩”政策与“七国之乱” 文帝时，刘姓诸王势力日强，觊觎帝位的野心日益膨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全国39郡，诸侯王竟占15郡之多。齐王领73座城池，操齐语皆属齐。吴王刘濞占50余城，楚王据40余城。在这广大的地盘上，他们组织私属武装，养士结党，截收赋税，铸造钱币，甚至矫诏抗旨，驻跸称制。如吴王刘濞敢称病不朝，淮南王刘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①。文帝即位之后，正值诸吕变乱刚刚平定，政权尚不巩固，加之文帝以藩王承继大统，只得对诸王采取优容姑息政策，这更加助长了王国势力的发展。

对于诸侯王威胁中央的割据态势，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深感忧虑。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指出当时形势是：“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②。即言王国势力过分膨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③。文帝非常重视贾谊的建议，只是当时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③《汉书·贾谊传》。

还无力加以实施。公元前164年即贾谊死后四年，齐王死，无子嗣，文帝乘机将齐故地一分为七，接着又将原淮南故地一分为三。随后，文帝将自己的儿子封在齐越之间，建梁国作为京师屏障。

公元前157年，文帝死，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景帝继位后，立即任用文帝时力主削藩的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针对诸王将反的严重局势，上《削藩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①景帝纳晁错所议，于公元前154年，削楚、赵、胶西三王之二郡六县。景帝和晁错还欲议吴王刘濞罪，削夺他的会稽和豫章二郡。早已图谋反叛的刘濞以此为导火线，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六国发动叛乱。

开始，叛军在军事上一度得势，直打至河南东部，形势异常危急。景帝此时平叛削藩的决心曾发生动摇，竟听信谗言，捕杀晁错，乞求叛军退兵。但，刘濞非但不予退兵，反公开要夺取皇位，继续进军。叛军至梁国(今河南商丘)，为景帝弟梁王刘武所阻。此时，景帝才下决心平定叛乱。朝廷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窦婴率大军东征，只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刘濞逃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尽，七国随之废除。

平叛后，景帝乘势颁布一系列法令，取消诸侯王在王国里的治民行政权，只能"衣食租税"而已，王国的所有行政权及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王国机构缩减，等级降低。诸侯王只有爵位而无实权。从此，诸侯王国虽还存在，但实质上已与普通郡县相差无几，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单位。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势力的削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

①《史记·吴王濞列传》。

三、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景帝之后即位的是武帝刘彻，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英武天子。在他执政的半个世纪里，继续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抑削相权，增重皇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多有改革建树，将汉王朝推向鼎盟时期。

改革中央体制 西汉前期，三公例由功臣列侯充任，位高权重，有“震主之嫌”。文景时，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已有所显露，至武帝时，矛盾已相当尖锐。如丞相田蚡，身为皇戚，内外用人除吏大权，集于一身。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绝不能允许的。为了增重皇权，武帝有意裁抑相权。他一反成法，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布衣士人中，先后选拔了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入侍禁中，冠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名号，随时听候皇帝召唤，出入宫廷，顾问应对，参与决策。这些士人与原先少府中的尚书结合，成了皇帝的高级侍从班子。这样的班子称为“内朝”、“中朝”或“内廷”，相对的，三公九卿等原先的府署，成了“外朝”。内朝奉旨出令，外朝执行成命。大臣如不加“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则不能参预中枢。同时，改太尉为大司马，冠以将军之号。“大司马大将军”职显位尊，俨然在丞相之上。为提高尚书地位，武帝又让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三署郎中选用有才干的郎官掌握尚书具体事务，政府机要文书直接送交尚书台。武帝还先后罗织罪名，处死丞相6人，御史大夫5人。这样，相权被摧抑削割，而皇权大大增重，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改革军制 武帝改革汉初军队分散于地方的“番上”制度，在首都长安重新组织了侍从皇帝和警卫首都两支军队。侍从军有三支：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期门军，由侍中、常侍和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组成，共1000余人，由郎中令掌管。因经常侍

从武帝，期待于殿门而得名。

羽林军，选六郡良家子700余人组成。因宿卫于建章宫，又称建章营骑。羽林，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的意思。

羽林孤儿，是武帝选前方战死将士子孙养于羽林军中，教习战射，故有此名。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统属于原先的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各统700余人，士兵系职业兵，全由政府招募而来。这是中国古代募兵制之始。汉武帝的军制改革，使国家军队主力掌在天子手中，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这种“内重外轻”的军队配置办法，也就成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建军原则。

推恩令和附益法　武帝时，诸侯王虽不象以前那样强大，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终究为中央政权心腹之患。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即王死后，除嫡长子继位外，其他子弟也得分割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地位与县相当，归郡管辖。慑于国家政权的威力，“推恩令”下，诸王“支庶毕侯”。这实际上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的发挥，即用和平的手段肢解了王国势力。当时，诸侯王中盛行养士之风，不少文学、方士荫附于王侯，成为王国重要依靠力量。公元前122年，武帝借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一案，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者达数万人之多。接着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①。规定王国官为左官，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在中央供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笼络人才。“附益法”限制政府官员和士人交游诸侯，为诸王谋财致富者，以“附益法”论罪，为诸侯王谄媚者，以“阿党法”处置。这样，

①《汉书·诸侯王年表》。

以法律手段使诸侯王陷于孤立。

王国问题解决后，全国尚有列侯百余。公元前112年，武帝又以祭宗庙时列侯所献酎金份量不足、成色不纯为借口，下诏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和土地。此后，又以各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王国与侯国的数目大大减少，汉初以来的“削藩”问题彻底解决。

严刑峻法，打击豪强 汉初，地方豪强势力有很大发展。他们交结权贵，武断乡曲，藐视法度，横行不轨。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刘邦时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至长安、茂陵等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①。另一方面，武帝任用一批以严酷著称的官吏锄诛不法豪强。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杀河内豪强，株连数千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②。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张汤为御史大夫，杜周为廷尉，专以武帝意执法，摧抑豪富。刺史设立后，巡行郡国，“六条问事”中首条针对的就是“强宗豪右”。

在诛杀豪强的同时，武帝令张汤、赵禹等人修订刑法，对《九章律》作了较大改动。律令增至359章，大辟之罪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之判例13,472事。改动后的法律显然更为繁苛。这一方面是为了惩治豪右不法，另一方面也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加强监察制度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其余五条都针对郡国守相。刺史只是六百石官，但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出刺时，“以卑临尊”，常常使地方二千石大员望风慑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又在首都设司隶校尉，专掌纠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南、河

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② 《汉书·酷吏传》。

内)及弘农郡。刺史和司隶校尉之设，使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察权得以延伸，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刺史只掌监察，不理民事行政，与地方官员互相制约，正如后世史家所评："大小相制，内外相维"①，起到了强干弱支、加强集权的显著作用。

整顿经济，改革财政 汉武帝"勤边事"，连年用兵，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的府库积蓄挥耗已尽。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秩序混乱，富商大贾作梗其间，屯积居奇。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支持对外战争，改善国计民生，武帝厉行经济改革。主要措施有：

1．改革币制。西汉建国后未建立统一的币制。文帝时又废除盗铸钱令，结果郡国、私人盗铸如云，货币五花八门，杂行于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政府铸行白金币、三铢钱，并严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②。次年，改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郡国铸币，中央专设水衡都尉总督铸币事，下辖钟官、辨铜、技巧三官，分工负责五铢钱的铸造。这三个机构被称为"上林三官"，因此五铢钱又名"三官钱"。这种周廓分明、重如其文、质量上乘、便于流通的铜币，一直沿用到隋代。货币的统一，是汉政府有效地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

2．盐铁官营。盐与铁，是关乎国民生活和生产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物资。汉初，煮盐和冶铁有国家、地方、私人三种经营方式。富商巨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③。武帝下令把盐铁收归国营。中央大司农之下置盐铁丞，总理其事。诸侯王国原先的盐铁业统由新的盐铁官接管。西汉盐官遍及28郡国的35处，铁官遍及40郡国的48处。即使那些不

---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9《刺史》。

②③《汉书·食货志》。

产铁地区，也设小铁官，负责收废铁、铸农具。另外，国家还实行了“榷酤”政策，即由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

通过盐铁官营，国家控制了社会主要生产和流通部门。当时所用的盐铁官全系商贾巨头，这就打破了以前禁止事末业者为官的规定。但由于具体经营中的问题，民间也出现过淡食和重新使用木农具的消极现象。

3．均输与平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纳桑弘羊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法，就是调剂和调度天下物资运输。中央在各地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各地征发来的租赋财物，直接运往京师或就近地方。这就消除了过去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①的弊端。平准法，即平抑物价。在长安设平准官，将均输官运至京师的物资留足国用外，其余“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节供需，节制市场，打击私商牟利，增加国库收入。

4．算缗和告缗。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缗，提穿钱的绳子，汉代货币计量，每千文为一缗。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规定：商人财每值二缗抽税一算(120文)，手工业者，财产每值四缗抽税一算；非三老和北地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车抽税一算。瞒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财产治罪。但令下后，富商大贾竭力抵制，“终莫能分财佐县官”②。武帝遂下告缗令，号召鼓励检举揭发。凡告发属实者，没收财富之一半奖给告发人。杨可主持告缗时，全国告缗风行，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矣”，政府“得民财产以亿计”。③算缗、告缗含有明显的抑商优农用意，为封建中央政府增加了重要的财政来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时，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已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

①《盐铁论·本议篇》。
②③《汉书·食货志》。

想便应运而生。武帝曾接连3次下诏策问治乱之道，名儒董仲舒3次上书应对，主张“天人合一”，“国以君为本”①，“主好恶喜怒，天之春夏秋冬”②。因此建议在文化学术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政治统治方法上要刑德并用，“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③。

依董仲舒之议，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郡国亦设郡国学，以儒学教育培养人才。儒家纲常伦理道德成了国家教育的基本内容。

与此相适应，汉王朝在选官用人制度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汉初，除了功臣封爵拜官外，选用官吏主要有“任子”和“赀选”两途。任子制是世袭制的残余；赀选，即以捐给国家资财获得荫子任官资格。武帝时，又创行“察举”和“征辟”制度。察举，即按儒家道德标准，由地方向中央考察举荐孝廉、贤良文学之才，经考核合格，即授官任职。征辟，就是征召那些才学优异而又隐逸不仕的“非常之人”出任官吏。那些学业优秀的博士弟子可直接补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仕途上的门第、财产限制，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史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④。

武帝时期，定儒学为独尊，并以此规范文化教育和选举用人制度，大大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西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秦末及楚汉战争期间，匈奴头曼单于又出兵侵占了河套以南

①《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③《汉书·董仲舒传》。
④《汉书·公孙弘传》。

地区。其子冒顿单于时，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占领了东接朝鲜，西抵塔里木盆地的北方广大地区，领土分为三大部分，代郡（今河北蔚县）和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以北单于直辖区，以东为左贤王辖区，以西为右贤王辖区，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①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匈奴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国到文景时的“和亲”阶段；汉武帝时大规模的战争阶段；汉元帝“昭君出塞”以后的友好相处阶段。

“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 西汉建立时，正值匈奴冒顿单于的强盛时期，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派兵南侵，袭扰汉境，烧杀抢掠，严重破坏沿边一带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生命安全。

公元前201年，匈奴出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前200年匈奴发兵南侵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刘邦领大军32万迎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陷入匈奴重围，连续7昼夜无法解脱，史称“白登之围”。后用陈平计，重贿单于阏氏才得脱险。刘邦自知军力衰弱，被迫采纳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送宗室女儿作公主，做为单于的阏氏，并赠送丰盛嫁妆及粮酒、绢帛等物。从刘邦到景帝60多年间，先后与匈奴和亲七次，又在边界上与匈奴“通关市”，但匈奴仍扰害不已。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领骑兵入侵上郡，逼近长安，文帝派丞相灌婴领兵8万迎击，自己到甘泉宫（今陕西淳化）督战，打败匈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领兵14万进袭，杀北地郡尉（今甘肃固原），前锋到达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长安一时震动。政府调集10万大军保卫首都，匈奴被击退。有鉴于此，景帝时，晁错建议“徙民实边”，加强边疆防务，实行生产建设与军事保卫结合、“和亲”与备战并举的方针。这标志着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

---

①《史记·匈奴传》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大大加强，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西汉力图从根本上解除匈奴贵族对中原的威胁，于是，开始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

马邑之谋揭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公元前133年，西汉使马邑富翁聂壹以献城为名，诱匈奴入塞。同时调大兵30万，埋伏于马邑附近山谷中，准备伏击。匈奴10万人入塞，发现破绽，迅即退去。汉军追至边塞，无功而返。马邑之谋虽未实现，却成为西汉由消极退让的和亲政策转变为对匈奴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西汉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收复河南地。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市怀来、密云一带），杀辽西太守、渔阳太守，又“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将军卫青、李息领兵三万，出云中至陇西，卫青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打败匈奴。收复了河南地，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五原(今内蒙五原)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从内地募民10万迁居朔方，修建堡寨，屯田实边，建立反击匈奴的基地。匈奴受打击后，南侵报复。公元前124年，汉朝又派卫青等多次出兵反击，打败匈奴反扑。

第二次：夺取河西地区的斗争。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青年将军霍去病，率精骑万人，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深入千余里，大败匈奴，俘虏匈奴浑邪王子、相国、都尉等多人，夺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从而控制了祁连山和河西走廊。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一次出征，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大破匈奴，杀俘匈奴三万余人。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解除了匈奴从西方对长安的威胁，割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西域的道路，也促使匈奴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化。

河西失守，匈奴单于加罪浑邪王、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密谋降汉。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渡过黄河，接受投降。这时休屠王反悔，浑邪王杀了休屠王，收编了他的部队。休屠王部下军兵将惊散溃逃，在这关键时刻，霍去病飞马进入匈奴兵营，与浑邪王开诚相见，下令斩杀了企图逃走的匈奴兵将，与浑邪王领四万人渡过黄河，回归汉朝，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亦称"五属国"。这次战争以后，"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①

第三次：消灭匈奴主力，彻底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公元前120年，匈奴又从右北平、定襄一带南下报复，杀掠人民。为了彻底打败匈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选拔骑兵十万人，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带领，分路出击。西路军卫青从定襄北进，越沙漠千余里，和匈奴伊稚邪单于短兵相接，经过激烈拼杀，匈奴单于率数百骑兵落荒远遁。卫青乘胜追到窴颜山赵信城，烧其粮食辎重而返。东路军霍去病从代郡（今河北蔚县）北进，深入匈奴千余里，在激战中，消灭了左贤王精锐七万骑，俘匈奴王侯、将军、相国、都尉83人，直抵狼居胥山，庆功祝捷，凯旋而归。

经过三次战役，西汉打败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②战争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掠夺，保卫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因此，抗击匈奴的战争，是反击匈奴贵族残暴掠夺的正义战争。卫青、霍去病的抗匈斗争，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他们为解除匈奴贵族对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压迫，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

①《汉书·张骞传》。
②《汉书·匈奴传》上。

昭君出塞 由于匈奴在与汉战争中连遭失败，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匈奴贵族统治集团又不断发生内讧。昭帝时，有五单于并立，互相攻杀，各不相让。后来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打败，被迫到五原塞（今内蒙五原）向西汉称臣。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亲临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①汉元帝时，郅支单于在西迁中为汉军所杀，匈奴全部归呼韩邪单于统治。公元前33年，他复至长安通好，并请与汉通婚。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单于为阏氏，号"宁胡阏氏"，元帝改元"竟宁"。单于上书汉朝，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史称"昭君出塞"。从此以后，结束了汉、匈之间百多年来的武力冲突。在汉朝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②的景象。包头市附近近年发现的"单于和亲"瓦当，其文曰："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是汉匈关系友好的见证。这就为汉、匈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记载，王昭君在中原的兄弟，在匈奴生的子女及其后裔，有三代人曾为汉、匈之间的友好交往做出过贡献。

二、西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三十六国 西域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它是我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惯用名称。西汉初年，西域主要指现在的南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③中间塔里木盆地是广阔的沙漠，沙漠南、北的大

①《汉书·匈奴传》上。
②《汉书·匈奴传》下。
③《汉书·西域传》上。

小绿洲上，分别有南、北两条商道。南道（昆仑山北麓）有楼兰（后称鄯善）、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北道（大沙漠以北、天山以南）有车师、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最大的龟兹有8万人，最小的依耐（今莎车西南）仅670人，一般为几千人到二、三万人。另外在北疆的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气候湿润，水草肥美，宜于畜牧，有乌孙、车师、蒲类、且弥等国。其中最大的乌孙有人口63万，军队18万。葱岭以西的大宛，有人口30万，军队6万。西汉初年，西域总称三十六国，多是依托绿洲之上的城廓国家，大部分从事农业或畜牧。由于匈奴的攻掠和各国之间的斗争，国家不断发生分化，后变成50余国。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在其地设立僮仆都尉，以控制、掠夺人口，勒索贡税，把西域变成进攻西汉的战略基地。

张骞出使西域 汉初，匈奴人曾打败在祁连山一带的月氏人，月氏人被迫西迁塞国（今新疆伊宁一带），后又遭乌孙攻打，远迁葱岭以西，建立大月氏国。汉武帝从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匈奴与月氏人的仇怨，想联合月氏人夹击匈奴，以切断匈奴右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出榜招贤，汉中城固人、郎官张骞慨然应募。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张骞率堂邑父（甘父）等一百多人出使西域，中途为匈奴人俘虏，拘禁十年，后乘机逃脱，继续西行，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当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活已获安定的大月氏人，不愿东返与匈奴为敌。张骞没有达到联合的目的，只好东返，归途中又为匈奴俘虏。公元前126年，乘匈奴内乱，和堂邑父返回长安。他向武帝详细陈述了西域的情况。为制订打败匈奴的计划和发展东西方交往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

公元前119年，由于汉对匈奴战争取得巨大胜利，汉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去联络乌孙，共抗匈奴。张骞率领300多人的使团，每人备马两匹，带牛羊1万头，以及大量金、银、丝绸礼品"价值千巨万"，张骞顺利到达乌孙，受到国王昆莫的热情接待。由于乌孙国内意见不一，联络乌孙东返夹击匈奴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从此建立起来。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去大宛、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国，送礼通好。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张骞同乌孙国王使者几十人回到长安，这是西域到达中国内地的第一批使者。公元前114年，张骞去世，他派往西域各国的副使，也先后返回长安。汉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终于建立起来。

汉对西域的经营 匈奴对汉与西域的交往也密切注意。乌孙与汉通好，匈奴多方阻挠。欲击乌孙，又常截杀汉使。汉也采取对策积极经营西域，在对匈奴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巩固通往西域的要道，史称"河西四郡"。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打败了亲附匈奴的楼兰（今新疆罗布淖尔西北）、姑师(今吐鲁番盆地)，俘虏了楼兰王。①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西汉与乌孙和亲，以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王。细君死，公元前101年，汉又以楚王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续嫁，解忧和侍者冯嫽在乌孙五十年，巩固和发展了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他们为汉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辛苦工作。冯嫽被各国尊称为冯夫人。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征伐大宛，3年结束，得汗血马3千匹，最终摧毁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打通了东西方的商道。

为了便利交通，从敦煌到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立驿站，在轮台、楼兰、渠犁等地派兵屯田防守，屯田士卒最多时达60万

---

①《史记·大宛传》。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图。

人。①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派郑吉为西域都护，统领和管理西域诸国，这是西汉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②从此，汉在西域的统治才完全确立，汉在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发粮草。这证明远在二千年前，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 西汉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为促进西汉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张骞通西域后，从首都长安起，过河西走廊，新疆境内，通向西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商路终于打通。西汉的丝织品和其它物品，先运到安息(今伊朗)，然后再转运到西亚、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欧洲的大秦。这条商路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经常奔驰在这条大道上。当时，汉朝遣使者去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等国。一年中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一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近的二、三年，远则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汉朝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如凿井灌溉、冶铁炼钢、制造各种生产工具，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丝绸、铜镜、玉器、漆器等传到西方，促进了各国生产事业的发展。大宛自中国学会凿井术、炼钢术，即其例证。西域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技术成果，如繁殖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随着汗血马、骆驼、苜蓿、葡萄、蚕豆、西瓜、石榴、胡桃、大蒜、胡萝卜、豌豆等传入中原，为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在文化方面，汉朝封建文化传到西域，对各国发生了重要影响。西域的乐器、乐曲、舞蹈，印度的佛教文化，希腊的绘

---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西域都护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

画艺术，后来也由这条道路陆续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丝绸之路的开创中，张骞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凿空”事业的探险精神，是我国人民宝贵精神财富，两千多年来，成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一种强大鼓舞力量，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西汉与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

汉与西南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滇、邛都、冉駹、白马较大，他们早与巴、蜀地区的人民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往来。秦统一全国后，西南与中原联系加强了，汉武帝时更有广泛接触。汉武帝曾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使者十多起到西南诸国。汉破南越后，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越嶲（今四川西昌市东南）、沈黎（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今四川茂汶）、武都（今甘肃武都）、益州等郡。公元前109年，汉派军入滇，滇首领降汉，受封为滇王，汉赐其“滇王之印”（该印1958年在云南晋宁出土）；从此，西南夷直接归属于西汉政府，西南各族与汉族联系日益增强。

汉同南方及东南各族的关系　西汉将今浙江南部少数民族称为东瓯，福建境内各少数民族称为闽越，两广地区则称为南越。汉初先后封闽越首领无诸、南越首领赵佗、东瓯首领摇为王。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求汉出兵，后又请求内迁。汉武帝准其迁往江淮地区。公元前135年，闽越攻南越，闽越王弟余善乘机杀其兄郢归汉。武帝立无诸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公元前111年，武帝因余善自立为帝并诛杀汉使，派将军韩说、杨仆等四路出击，越繇王居股杀余善，率部降汉。汉又徙闽越于江淮之间。

南越地区广大，吕后时实行铁器和耕牛禁运政策，赵佗乘机称帝，并不时攻打长沙。文帝时为缓和与西南关系，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去帝号称王。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使臣韩千秋宣谕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入朝，"比内诸候"。丞相吕嘉杀赵兴、王太后和汉使，次年，汉武帝派大将路博德及杨仆率10万大军讨伐，吕嘉被俘，汉在南越故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东瓯、闽越和南越地区归属于西汉，越族的内迁和汉族的南移，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代，我国东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有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

乌桓和鲜卑都属于东胡族，汉初，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保乌桓山的一支称乌桓，依据鲜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一带）①的称鲜卑。他们都过着畜牧和打猎的生活。汉初，乌桓受匈奴奴役，霍去病击败匈奴左部后，迁乌桓人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居住，汉政府专设护乌桓校尉统辖。乌桓南迁后，鲜卑也向南移动，西汉后期分布在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

鲜卑的东面，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居住着夫余人。夫余东北，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有挹娄人。夫余南面居住着高句丽人。夫余和挹娄经营农业和畜牧业，西汉时夫余已进入奴隶社会，挹娄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高句丽主要经营农业，西汉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夫余、挹娄和高句丽与汉族人很早就

①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发现的鲜卑石室，洞内石壁上刻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祭祖祝文，证明此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先祖的石室，是鲜卑族的发祥地。

有往来。武帝时，先后设立玄菟、临屯、乐浪、真番四郡，统辖各族。此后，东北各族与汉族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第四节　王莽改制和绿林赤眉起义

一、西汉后期社会危机的加剧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及至元、成、哀、平四朝，西汉的统治江河日下，逐渐衰落。

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土地兼并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期，汉初，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皇室、贵戚、官僚、豪强通过购买、请赐、讹夺等手段，大量兼并土地。武帝时，虽曾严厉打击商人势力，但却不可能将其彻底摧毁。昭、宣时期，由于抑商政策的松弛，通过贵族、官僚的商人化和商人地主的官僚化，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密切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大肆掠夺田地。如成帝丞相张禹在泾、渭河边买沃田400顷，亩值一金（1万钱）。丞相翟方进以势强占民田未遂，竟毁坏汝南鸿隙陂。红阳侯王立占南阳草田数百顷，又以高价转让政府，从中渔利。土地兼并的表象是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内在实质却是自耕农的日益佃农化，引发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国家租赋收入的减少和财政的困难；以及流民、佃农、奴婢的不断增加。

奴婢数量激增　西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婢，其来源不外乎五种：农民因贫困饥饿自卖为奴；农民为豪家所掠卖；由“赘子”转化为奴；罪犯没官为奴；奴产子。西汉奴婢虽有官私之别，但二者可互为转换，总计数量当在30万左右。西汉后期，因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纷纷破产，许多人沦为奴婢；政府对奴婢限制

的放松，使之数量日增。他们饱受虐待，地位远低于一般农民。奴婢数量的增大，也使封建政府丧失了大量的劳动人手和赋税来源，因而在土地兼并之外，奴婢问题又成为西汉晚期的另外一大社会问题。

政治的腐败 西汉晚期，政治黑暗。一方面是外戚的登台。成帝时，其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同时封侯，世称"五侯"。他们霸占良田，苛剥人民；斗鸡走狗，游观射猎，百姓为之歌曰："五侯初起，曲阳（王根封曲阳侯）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白虎"。①外戚弄权，群小日进，于是贪污腐化，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是吏治的败坏。各级官吏纷纷贪污受贿，急征暴敛。许多人日以田宅园池为事，过着"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②的奢侈腐化生活。面对这种现状，连成帝本人也慨叹："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哀帝时，大臣龚胜指出，当时"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③鲍宣更尖刻地指责哀帝："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④

政治的腐败，统治阶级的急征暴敛，农民的纷纷破产，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成帝时，人祸之上更加天灾，大风、暴雨、水灾、旱蝗、山崩、地震，年年不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只好拿起刀枪，揭竿而起。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起义。公元前18年，广汉郑躬起义。公元前14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280人起义。其时，"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西汉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

①《汉书·元后传》.
②《汉书·成帝纪》.
③《汉书·龚胜传》.
④《汉书·鲍宣传》.

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朽　面对着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汉末最高统治者的生活却更加荒淫腐朽。元帝刘奭（公元前48—33年在位），好儒术而优柔寡断，当时宫廷开支耗费惊人，他却仍坚持要用粟米来喂养他用于游猎的万匹骏马，性好游乐而怠于政事，"日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①成帝刘骜（公元前32—7年在位）时，西汉已走上崩溃的道路，他却大兴土木，营建"霄游宫"、"飞行殿"、"云雷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个人生活荒淫腐化，时常微服出游："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即成帝宠臣中郎将张放）家人"。②性嗜酒，更好色，先后纳赵飞燕姊妹于后宫，宠幸无比，竟为之而废掉皇后许氏。哀帝刘欣（公元前6—1年在位），较之成帝更为荒淫，他宠爱恋童董贤，竟以国库钱财为之修建邸宅，先后赐董贤钱合计达43万万，并封董为大司马、卫将军，甚至还要让位于董贤，③可见发昏到了何种地步！平帝刘衎（公元1—5年在位），九岁即位，西汉大权开始旁落。

限田限奴与易姓受命　当西汉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之时，一些封建官员为稳定西汉统治，一再提出改革方案，主张限田限奴。早在武帝时，董仲舒就曾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④及至西汉晚期，土地、奴婢问题越来越严重，大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哀帝时，左将军师丹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又联合提出限田限奴的救急方案。它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一般地主占田不得超过30顷；诸侯王占奴婢以200人为限，列

---

①荀悦：《汉纪》卷22。

②《资治通鉴》卷31成帝鸿嘉元年二月。

③《汉书·董贤传》曰："上在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④《汉书·食货志》。

侯、公主100人，关内侯、官吏、一般地主不得超过30人。终因外戚、权臣、勋贵的反对，而难以实行。

如何挽救西汉统治的危机？地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分岐和矛盾。一部分地主、官僚开始发出"易姓受命"的呼声。其理论依据，是董仲舒"君权神授"说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早在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符节令眭弘上书建议"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结果以大逆不道而伏诛。成帝时，北地太守谷永又建议："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①其实质是许多人对刘汉王朝深感绝望，妄图以谶纬迷信欺骗人民，借助神灵和改朝换代的举动来挽救统治的危亡。

由于"易姓"主张者屡遭汉室镇压，故许多人转而提出由刘汉皇帝"更受命"、"再受命"的主张。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②其弟子夏贺良也对哀帝大讲"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好处。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哀帝下诏改年号为"太初元年"，不称汉帝，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③以符天意。这表明，皇权天命威信在许多官僚心目中，已丧失了往日的显赫声势，西汉政权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外戚王莽开始了夺权代汉的活动。

二、王莽改制

王莽代汉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其家族在西汉末年地位十分显赫，有九人封侯，五人任大将军。正所谓"群弟世权，更持国柄"，这为王莽以后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条

①《汉书·谷永传》。
②《汉书·李寻传》。
③《汉书·哀帝纪》韦昭注："意为敷陈圣刘之德"。

件。王莽父王曼，早死，因而他在王姓中地位很低；但他早年发愤读书，谦恭俭朴，深得叔叔王根的器重。长大以后，王莽曾作过小官，王根告老时，推荐王莽为大司马。哀帝即位，王莽失势。由于王莽的家势，结交了一批官僚，执政时曾弹劾过定陵侯淳于长和红阳侯王立骄佚奢僭，下野后地主官僚纷纷上书，为他鸣冤。

哀帝死后，年幼的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这时，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了实权，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①很快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王莽又恢复了汉宗室和功臣后裔的封爵，给以优厚的生活待遇，扩充太学，增设地方学校，增加博士和太学生名额，从而得到了汉宗室和地主阶级士人的广泛支持。为了巩固地位，又将女儿嫁于平帝，皇后赏赐他新野土地，王莽拒而不受。公元2年，郡国发生旱蝗灾害，王莽献田30顷、钱百万分给贫民。这样以来，王莽获得官僚地主和一部分贫民的拥护，于是由"安汉公"到"假皇帝"，公元8年，终于废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新"。西汉王朝从此结束。

王莽改制　代汉而起的新莽王朝，面临着重重困难，土地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奴婢问题是当时社会核心问题。王莽继位后，曾力图解决这些矛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改制，主要内容包括：

王田制和私属制　公元9年，王莽仿照《周礼》所载井田制，改天下民田为王田，不许买卖。规定男子不满8口之家，占田超过一井（900亩），分余田于九族、邻里无田之人，按一夫一妇百亩授田。同时改私家奴婢为私属，不许买卖。

王田制和私属制颁布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改变私人土地所有权，也不是要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

---

①《汉书·王莽传》。

卖，借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婢化的进程。法令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对8人以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官僚没有涉及，广大自耕农失去土地后，被迫卖身为奴婢，现在生路又被断绝。由于官僚、地主、商人和贵族无视法令，土地兼并依然如故，而原先对土地抱有幻想的农民在希望破灭后也起而反对新法。在地主官僚和农民联合反对下，王莽终于在公元11年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买卖，勿拘以法”，①因而王田私属令基本废除。王莽泥古设法，力图解决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五均、赊贷与六筦 公元10年，王莽在经济上实行了五均赊贷与六筦制度。这一制度是汉武帝某些财政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五均即在京师长安及全国主要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下置交易丞5人、钱府丞1人。司市师在每季中月定出标准价格，物价高过市平，五均官则按市平出售谷物、布帛；低于市平，则按市平进行收购或“听民自相与市”。赊贷即国家拿出一部分钱，对无钱祭祀、办丧事的人进行救济，过一定时期需按本归还。另对工商户也实行低利贷款。五均赊贷制度是王莽工商政策的一项创造。六筦、指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山泽之税，合称“六筦”。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本身虽无可指责。但因实际执行政策的人与大商人、官僚地主勾结，肥己营私，给人民造成了灾难。

改革币制 从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王莽实行过四次较大的币制改革。公元7年，王莽摄政期间，先推行上林三官钱，后仿周代旧制，铸造大钱，重12铢，面值50文。又行契刀（500文）、错刀（5000文）、金错具文，四种同行。公元9年，王莽废五铢钱、契刀、错刀，保留大钱。废五铢钱在于改朝换代，又因“刘”字

---

①《汉书·王莽传》。

有金，刀作偏旁，刀币犯忌，因而废弃。公元10年，王莽又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黄金、银、泉货、龟宝、贝、布）共28品，名目繁多，换算不易，难以使用，因而不到一年又废弃，仅留大小钱。公元14年，王莽废大、小钱，发行货布和货泉，货泉重5铢，货布重25铢，但1个货布却兑换25货泉。王莽的币制改革，违背了货币经济规律，名目繁多，货面复杂，且朝令夕改，给流通造成极大的困难。

政治制度改革 为了附会西周官制，在政治制度上，王莽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和地名。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军（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和前将军）。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政府。改郡太守为大尹、卒正、连率等。县令、县长统称为宰。改变郡县划分和名称，有的地方连改5次，最后又恢复原名。此外，王莽还恢复了五等爵制，滥加封赏。

在与周边民族关系上，王莽强迫各族接受“新”国印玺，又降低他们地位。如改钩町王为钩町侯，高句骊为下句骊，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等。这种无理作法引起了周边各族的反抗，于是王莽又接连发动战争。这样，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王莽是在西汉政权极端腐朽的情况下，为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厉行改革的。他抓住了土地兼并这一核心问题，实行了王田制和私属制，采取了限制高利贷的工商政策。这些无疑表现出了他个人的政治见识和才能。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及法令本身的陋弊和个人的政治野心的影响，没能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残酷的刑法，使得百姓日不聊生，“悉起为盗贼”，①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①《汉书·王莽传》。

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三、绿林、赤眉、铜马农民起义

早在公元7年，王莽摄政期间，都城长安附近就爆发了赵明、霍鸿领导的起义，茂陵以西十三县响应，聚众达10余万人。公元15年，五原农民起义。公元17年，吕母在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西）起义，自称将军，发展至万余人。同年会稽郡民田仪起义。

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按地区可大体分为：湖北西北绿林军、山东东部江苏北部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河北以铜马为主的数十支起义军。

绿林军　公元17年，荆州饥荒，饥民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为领袖，聚众数万人劫富济贫，除霸安民，数月间发展至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今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

公元21年，绿林军击败荆州2万官军，乘机扩大地盘，队伍发展至5万人。次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义军兵分两路，颍川人王常、成丹一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匡、王凤北入南阳，称新市兵。7月，新市兵与平林人陈牧的平林兵联合，起义军迅速壮大。

赤眉军　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百余人在莒县起义，以泰山为根据地。次年，逄安、徐宣、杨音义军数万人开赴泰山。吕母死后，其义军也归并樊崇。为与官兵区别，义军皆涂眉为赤色，因而称为“赤眉军”。

赤眉军绝大多数为农民，无文书、旌旗、号令，以言语相约束，共守“杀人者死，伤人偿创”① 的军纪。义军无森严等级，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长官称三老、从事和卒史，士兵彼此称为“巨人”。

公元22年，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打败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统率的10余万官兵，队伍发展至10余万众，活跃在山东、河北、河南、安徽交界地区。

铜马等义军 绿林、赤眉起义时，北方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在河北一带，义军大小数十部，众至百万人。著名的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义军，其中以东山荒、秃上和淮况为首的铜马军最为强大。他们到处捕杀官吏，镇压豪强，给王莽政权以沉重打击。

“昆阳之战” 公元22年，绿林军三路大军汇合，在泌水（今河南泌阳）西大破官军，势力大盛。为了将形势引向深入，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南阳豪强刘玄趁机利用农民革命的力量，于公元23年2月，在淯阳称帝，建元“更始”。

在义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王莽被迫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大兵镇压，号称百万。公元23年5月直逼义军重镇昆阳城。王凤、王常率八、九千义军坚守昆阳，派刘秀等突出重围，到定陵、郾城等地请求援兵。刘秀率精兵3000与王凤等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杀死王寻，王邑率轻骑仓皇出逃，史称这一战役为“昆阳之战”。

昆阳大捷将全国农民起义推向高潮，王莽在全国各地的统治土崩瓦解。刘玄杀死企图夺取帝位的南阳豪强、大司空刘縯，并将其弟刘秀调往河北。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直逼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攻武关，直捣长安。9月，王匡攻下洛阳，西路大军直抵武关，都尉朱萌投降，关中大震。10月1日，起义军攻破长安宣平门。长安市民起兵响应，王莽被杀，新朝结束，更始政权从宛迁都洛阳。公元24年春，又由洛阳迁都长安。

农民军内部的纷争 当刘玄移都洛阳时，赤眉军正在濮阳一

带活动，樊崇曾亲去洛阳，愿与更始政权合作。刘玄对他反应冷淡，樊崇愤而返营，从此，两支起义军结下怨仇，在地主分子方阳挑拨下，赤眉军分兵两路讨伐刘玄。樊崇、逄安为一路，进攻武关；徐宣、杨音为一路，进攻陆浑关。公元25年春，两路军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连败刘玄军，队伍发展至30余万人，继续向长安挺进。当队伍到华阴时，在地主和巫师操纵下，加之樊崇等农民领袖未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在天命皇权思想影响下，拥立据说是朱虚侯刘章后裔的15岁牧童刘盆子为帝，樊崇为御史大夫，徐宣为丞相。建立政权后，赤眉军继续西进。

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后大封汉宗室，重用旧贵族。自己沉溺酒色，丞相赵萌也威福自用，诸将日益不满。张印、王匡等力劝刘玄放弃长安东归，但刘玄不愿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诸将准备劫持刘玄东归，刘玄竟杀掉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将领，王匡、张印等在长安城与刘玄发生武装冲突。经过一个月激战，王匡等败退长安，率部在高陵与赤眉军联合。公元25年9月，联军攻入长安，刘玄先逃后降，最后为义军所杀。

四、东汉建立与统一中国

公元23年10月，刘玄派刘秀以“更始”政权使者的名义，到黄河以北进行招抚活动。当时河北到处是农民起义力量和地主武装割据势力。刘秀率部四出活动，后得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上谷(今河北怀来)太守耿况、渔阳(今北京密云)太守彭宠的支持，灭掉最大割据势力王郎，首先把地主武装统一起来。随之又镇压了铜马、高湖、重连等起义军。他利用分化瓦解等手段收编了部分农民军，军队扩充至几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根后，刘秀一面派邓禹尾随赤眉入关，一面派冯异监视洛阳。公元25年6月，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县)称帝，是为光武帝。仍国号汉，史称东汉。后来移都洛阳。

绿林、赤眉联军重入长安后，遭到长安周围地主势力的抵抗。他们囤积粮食，组织武装坚壁顽抗。加之“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①，因而长安城中发生饥荒。农民军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除地主坞壁，致使百万大军陷入困境，后在刘秀的镇压下，相继失败。刘秀又用了十几年时间，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到公元40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再度统一。

重要名词：

无为而治　　汉承秦制　　郡国并行制　　文景之治
治安策　　晁错　　七国之乱　　推恩令　　均输与平准
董仲舒　　卫青　　霍去病　　丝绸之路　　昭君出塞
西域都护　　编户制度　　昆阳之战　　白渠

思考题：

1．说明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

2．试述西汉反击匈奴战争的简单经过和影响。

3．简述汉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

4．评述汉武帝的政绩。

5．说明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及其作用。

6．王莽改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有何主要内容？为什么会失败？

7．西汉时期边疆地区有哪些少数民族？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

8．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列出几支主要起义军的名称及其领导人。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第四章　东汉的统治和黄巾起义

（公元25—220年）

第一节　东汉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东汉初年，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刘秀主张："解王莽之繁密，还汉家之轻法"，[①]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一、加强中央集权制

鉴于西汉末年权臣当政，外戚篡权，地方势重，皇权旁落的教训，刘秀全力强化专制集权制度。

封退功臣　东汉政权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时有"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之说。刘秀为了总揽朝纲，对大多数功臣削其实权，不委重任，但赐给他们以封地、爵位和厚禄。仅高密侯邓禹等极少数人参预军国大事，就连邓禹等也深知刘秀"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因而不敢过分染指朝政，皆"避荣宠"，"远名势"。如司空李通，本

①《后汉书·循吏列传·序》。

是刘秀妹夫，称病不视事；贾复返归家乡，闭门谢客；邓禹虽封高密侯，也只修整家门，教养子孙，唯唯诺诺而已。与此同时，刘秀有意抬高那些没有出仕王莽政权的人，认为他们无功可恃，容易控制，又熟悉封建国家政治制度，有高尚情操，遂委以要职。同时，鉴于王莽代汉的教训，刘秀对于外戚的控制比较严厉，不让干预政事，授官仅以九卿为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的阿附藩王法，严禁宗室诸王结交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又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刘秀“退功臣进文吏”和防外戚的政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加强尚书台 关于中央行政机构，刘秀作了明显变动，在汉武帝建立“中朝”，重用尚书令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尚书台，又提高尚书台的权力，扩大尚书台的组织，以尚书令（一千石）、尚书仆射（六百石）为正副长官，下设尚书六人（六百石），分掌六曹。三公曹主管对州郡官员的考察，吏曹主管选举任用和祭祀，民曹主管官吏上书及修缮功作，客曹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二千石曹主刑法诉讼，中都官曹负责治安。每曹又设丞、郎若干人，助理事务。此后，一切事务不再经过三公管理，经尚书台而总揽于皇帝，使尚书台从秦代主管殿中传达诏令的卑微小职，逐渐变成“出纳王命，敷奏万机”①的中央办事机构。尚书台的设立，使三公权力大为削弱，变成名誉职位，大将军或三公只有加上“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能参与中枢决策。朝中政权集中于尚书台，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尚书台的设立，是东汉吏治的重要特点，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东汉政治家仲长统说得清楚：“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备员而已”。②

①《通典》卷22。

②《后汉书·仲长统传》。

加强监察机构 东汉监察机构主要有三种，即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刘秀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察，改西汉御史府为御史台，并扩大其权力。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其权力仅次于尚书令。下设治书御史2人，负责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中央百官及京师附近的三辅、三河及弘农七郡，它既为地方官，又是京官。其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①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其它十二州部，各州设刺史一人，巡行所辖郡国，检查刑狱情况，考察郡县官吏政绩，年终直接向皇帝奏报。而不再象西汉那样经三公审核。州下郡县不变。于是，秦、西汉以来的郡县两级地方制度，就变成了三级。这些机构的恢复和加强，对加强皇权起了巨大作用。

改革军制 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下诏先撤消了地方领兵的郡国都尉，将兵权并归郡国守、相。随后又取消了郡国守、相的军权。后来还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地方军队和一年一度的都试制度（每年八月郡国集中演武）。这样郡国剩下的少数地方军，一般不能作战，全国武备和对外征战，全由京师卫军担当。与此同时，刘秀扩大和加强中央军队。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由卫尉统率，负责宫廷警卫；北军由中侯统率，护卫京师的安全。如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南北军也可以出征。驻在地方的中央军队有两支部队：一为黎阳营，因驻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南）而得名，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因驻雍(今陕西凤翔南)而得名，守卫西汉皇陵所在的三辅地区，是洛阳西面的屏障。边防军由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匈奴中郎将等统率，均由中央管辖。

---

①《通典》卷32，《职官十四》。

察举与征辟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开始推行此项制度。刘秀为了获得官僚士大夫的拥护，很注意从儒生中选拔统治人才。除了通过太学培植统治人才以外，还沿袭西汉的察举制与征辟制，广泛网罗人才。察举孝廉，按郡国人口每20万人荐举一人，每年选拔，向朝廷推荐，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是由皇帝特下诏书，征召地主阶级中的名流到中央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国守相可以自行启用僚属人员。刘秀要求被荐举人的才能必须符合"德行高妙"、"明达法令"等标准。否则荐举者和被荐举者都要治罪。刘秀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放了入仕之路，吸收了一大批有才识的人。这对于扩大东汉政权的社会基础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恢复生产的措施

西汉末年和王莽统治期间的长期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光武帝从巩固统治政权出发，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释放奴婢囚徒 奴婢问题曾是西汉末年的严重社会问题。农民战争期间，虽有不少奴婢获得解放，但奴婢问题始终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的12年间，先后九次颁发释放奴婢和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其中六次下令释放奴婢，规定"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①；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规定"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②并废除了在法律上歧视奴婢的规定，把释放的奴婢编户齐民，分给土地，象普通人一样劳动。同时，刘秀还多次下令释

①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放大批囚徒，增加了社会劳动力。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轻徭薄赋 轻徭薄赋，尽量不劳民力，以保证农民趋时务农。史称“吏无百里之徭，民无出门之役”。①战争期间因用度不足，施行什一税，经过屯田，稍有储备。即令“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②使西汉文帝开始实行的三十税一制重新得到恢复，这固然有利于豪强地主，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安抚流民 西汉末年，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刘秀采取安抚措施，首先通过赐爵，稳定自耕农的社会地位。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宣布“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③此后，又两次重申此令。其次，“假民公田”，就是把国有荒山苑囿、山林川泽租给农民耕种，三、五年内免除田租，继后纳租四成。假民公田之举近20次。再次，实行赈济饥民，使背井离乡的百姓，返回家园，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精简机构 东汉初户口减少，刘秀决定合并郡县，裁减冗员，降低薪俸，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史载当时裁并了10个郡国，400多个县，相当于刘秀控制县数的1/3。大小官员减少数万人。另外还大量复员军队，减少开支，增加了社会劳动力。

度田及其失败 土地问题是西汉遗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汉哀帝和王莽统治时期都未能解决。刘秀统一全国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州郡清查已垦田亩的数量，核定户口、年龄。其目的是为了限制豪强地主的兼并和清查登记农村人口所占土地，以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征发徭役，称为度田。由于度田不利于豪强地主，于是引起“田宅逾制”④的豪强的不满，他们与地方官吏勾结，反对清查，继而进行武装反抗。同时，农民因在度田中往往连房舍、里落都被作为田地进行丈量，深受

①②③《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后汉书·刘隆传》。

其害，也参加了反度田斗争。史载“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①这就是著名的“度田事件”。刘秀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取安抚分化政策，动乱虽然平息了，但度田也就不了了之。东汉政府所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一直未能达到西汉的最高数字，经济基础一直比较脆弱，这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和人口有着直接的关系。相反，豪强地主势力却大大膨胀，大地主田庄经济迅速壮大。

总之，刘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各项措施，除度田失败外，其它方面都多少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作用。这些政策大体上为以后的明、章帝所继承。经过劳动人民五、六十年的辛勤劳动，又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宁、生产逐渐发展的兴盛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三、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东汉封建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农业 东汉牛耕农具得到改进，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②。这种工具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时使用的铁犁刃端角度逐渐缩小，更加坚固耐用。全铁制农具种类也有所增加，出现了中耕工具曲柄锄和专用收割的大农具钩镰，使生产效率提高。铁工具已经推广到云、贵、粤、桂、甘、内蒙等边远地区。

在水力利用和灌溉工具方面，也有了较大进步。灵帝时，宦官毕岚创制了翻车和渴乌。翻车是河边汲水的水车，渴乌是洒水的曲筒。这时还出现了水碓，即利用水力推动木轮并带动石碓舂米，效率比脚踏碓高出许多倍。东汉时期，在全国各地还修了一些新的水利灌溉工程。其中著名的有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至安徽

①《后汉书·刘隆传》。
②《陕北东汉画像选辑》，文物出版社。

临泉间）的鸿隙陂、鲖阳渠，庐江的芍陂（今安徽六安北），会稽的镜湖等。水利工程方面最突出的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黄河决口，改道南流，下游几十个县被淹没。公元69年，明帝派水利专家王景，率领数10万民工修治黄河，按照地势，开凿山阜，疏浚河道，建立水闸以控制水势。然后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海口筑堤千余里，使河（黄河）、汴（汴河）分流。收到防洪、通航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经过这次修治，在以后的800多年间，黄河没有改道，两岸淤土被开为良田，造福百姓。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垦田数在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达到732万余顷。人口数从光武帝时的2100万增加到5300万。史载明帝年间，"天下安平"、"牛羊被野"、"百姓殷富"、"户口滋殖"。

手工业 农业的发展，铁制工具需要量增加，冶铁技术大大改进。南阳太守杜诗总结当地生产经验，发明水排（水力鼓风炉），从而提高了炼炉温度和炼铁质量。比战国时人力鼓风的皮橐有了很大进步。这种水力鼓风炉在欧洲，直到12世纪才开始应用，比我国晚了1100多年。

早在2000多年前，四川的井盐工人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到东汉时，井盐生产技术发展很快。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方法既简便，又高产，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

东汉时期的纺织工艺，有了较大的提高。已能用织花机织锦。蜀锦驰名全国。襄邑（今河南睢县）、齐（今山东临淄）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经考古证明，新疆的丝织品和毛织品，工艺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商业 刘秀比较重视商业的发展。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下令重铸五铢钱，对商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洛阳成为商业中心，成都、临淄、南阳等都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此

外，汉同各少数民族的商业交换频繁。如同匈奴、羌、乌桓、鲜卑等族都有定期的贸易活动，增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西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已逐渐扩张。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强地主。在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中，他依赖南阳、颍川、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发展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部下的功臣元勋，多为豪强地主。东汉政权建立后，特别注意保护豪强地主的利益，赐予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许多特权。因此，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们凭借着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大肆兼并土地，盘剥依附农民。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大体可分两大类：一是一般豪强地主。它包括食封贵族、官僚地主。食封贵族地主指以血缘或军功而受封的王侯，其封地一般是一个郡或几个县，他们坐收租税，剥削农民。二是世族地主亦称世姓、郡姓、名门、门阀、阀阅等。这是东汉豪强地主中的重要阶层，其特点为：一、世代为官；二、比一般豪强地主占地多；三、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较大的政治势力。

大地主的田庄 在豪强地主的巧取豪夺下，形成了聚族而居以封建庄园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其剥削对象是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很强的依附性。豪强地主的田庄特点有：

一、规模宏大、占地很多。东汉豪强地主建立起来的田庄一般占地几百顷甚至上千顷。如刘秀的舅父樊宏的庄园，"东西十里，南北五里"，"广占田土三百余顷"。①皇后阴丽华娘家有700顷，超过樊氏的一倍，但比起济南王刘康的800顷田庄却显得

①《后汉书·樊宏传》。

稍有逊色。而东汉末年的大将军梁冀的林苑，东起荥阳，西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南达鲁阳（今河南鲁山），北到黄河，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二、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徒附”。“徒附”是庄园的主要生产者和剥削对象。《昌言》中说庄园里“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这些徒附绝大多数是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或因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的流民。他们主要靠租种田庄土地生活，受庄主的经济强制，世代相袭，不得随意离开，其身份近似西方农奴。“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②其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三、自给自足，封闭性强。田庄采取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形成“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的经济状况，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田庄内部生产的详细分工，有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农业包括粮食、蔬菜、麻类和果树种植；手工业分为养蚕、纺织、酿酒、制酱、磨面、冶铁、农具制作等。可见其经营的各种物品，主要是满足豪强地主的享受，而不是用于交换的。这种庄园生产经营分工愈细，其封闭性就愈强。

四、建立坞堡，拥有私人武装。一座座的封建庄园，就是一座座能攻可守的坞堡。四角有警楼，四周有高墙，墙外还有深沟环护。守卫都是些剑侠、刺客和徒附。这些私人武装称为“家兵”或“部曲”。他们的职能就是保护主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或镇压庄园内外的农民反抗。实质上是封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种补充。

东汉初期的统治者在经济上对豪强地主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豪强地主的田庄就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经济势力的膨胀，他们进一步要求政治权力，利用“察举”和“征辟”制度，相互勾

①《后汉书·仲长统传》.
②崔寔，《政论》。

结，互荐亲属故旧，把持地方各级政权。一些中小地主又以“门生”、“故吏”的名义发展势力，形成一个个地方政治集团。而那些大豪强地主更是凭借着他们是皇亲国戚、勋贵大臣，世代为官，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大权。如刘秀的姐夫邓晨一门，有侯29人，公2人，大将军以下13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小吏不可胜数。开国功臣耿弇一家，有两个大将军，9个将军，13人为卿，19人为列侯，中郎将、校尉、刺史、太守有数百人之多。这种情形与东汉的历史相始终。

第二节　东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对外关系

一、南匈奴和北匈奴

东汉初年，国力尚弱，匈奴又一度强大起来，一再南下侵扰北部边疆，构成对东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刘秀无力反击匈奴，一面在长城沿线“筑亭候，修烽燧”①，加强防御，并徙幽、并边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造成“边陲萧条，无复人迹”的局面，一面采取“赂遗金币，以通旧好”②的羁縻政策。不久，匈奴遭受旱蝗灾害，赤地千里。东面的乌桓乘机向匈奴进攻，迫使匈奴北徙。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单于舆死后，匈奴贵族内部爆发了争夺单于继承权的内讧。结果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原呼韩邪单于之孙）向东汉称臣，表示“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③，接受汉的封号，后来又遣子入侍汉庭。南匈奴并陆续向塞内迁徙，这对其逐渐汉化和加强东汉北方边防起了积极作用。东汉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南匈奴与汉族逐渐融合了。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③《后汉书·南匈奴传》。

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后，北匈奴继续侵扰河西及北方郡县，迫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①。光武帝时继续采取和好安边政策。到明帝、章帝时期，东汉政府曾多次反击北匈奴的扰害。公元73年，窦固、耿忠等八将领率军四路出塞，打败匈奴呼衍王部，进至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公元89年，窦宪率4万余骑，出塞3000余里，大破北匈奴单于，一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返。公元91年，汉出居延塞，进军金微山（今阿尔泰山）。至此，北匈奴在塞北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南迁受汉管辖，另一部分北匈奴主力向西迁移，以后辗转进入欧洲。四、五世纪时，西徙的匈奴便出现在欧洲的匈牙利平原上。匈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二、班超出使西域

在王莽篡汉期间和东汉建立之初，匈奴再次控制了西域部分地区，致使西域各国与汉廷的关系一度中断。西域当时分裂为50多个政权，由于不堪忍受匈奴的统治和奴役，西域大部分国家纷纷请求东汉出兵保护，恢复在那里的行政机构，驱逐匈奴势力。光武帝以力量不足，没有同意出兵。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当明帝派窦固击败匈奴之际，西域大部分国家向汉，少数屈从匈奴，窦固遂命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字仲升，班彪之子，班固之弟，早年有大志，后来投笔从戎，奉命打通西域南道诸国。班超率领吏士36人到达鄯善（今新疆若羌），袭击匈奴使者，控制了鄯善国。接着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使于阗王脱离匈奴，归服东汉。接着进兵疏勒(今新疆喀什)。驱逐了依附于匈奴的疏勒王(龟兹人兜题)，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此后班超又降服莎车王，西域南道各国的匈奴势力被驱逐。就在这时，西域北道却出现了新的态势。永平十

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死，在北匈奴贵族的迫使下，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联军攻击东汉在龟兹的都护府，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也发兵助匈奴。刚继位的章帝派兵击败了车师，救出残存的吏士。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团结于阗、疏勒、康居等国，与乌孙通好，重新稳定南道的局势，于永元二年（公元90年），又征发南道诸国击退了越过葱岭的大月氏的7万军队。之后北道诸国相继归附东汉。于是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在龟兹。公元94年，焉耆等国也归顺于汉。班超又控制了西域北道。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①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又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到达安息西界（波斯湾），因受波斯湾风浪所阻未能如愿。这是中国使者远至波斯湾的最早记录。

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的班超因为年老，被召回洛阳，不久病逝。班超是我国历史上继张骞之后，为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又一杰出人物。他在西域的活动，对于加强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立下了丰功伟绩。

班超被召回后，北匈奴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迫使东汉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军抵御匈奴，屯军柳中（今吐鲁番）。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大破匈奴，降其余部2万多人。至此，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全部肃清。班勇长期留居西域，把他所闻撰成《西域记》一书，为后来范晔写《后汉书·西域传》提供了资料。

①《后汉书·班超传》。

三、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羌族是我国西北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今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北部一带。以西海郡（青海东）为中心。西汉初，羌族归附匈奴与东汉政府对抗。东汉初，大将军马援在陇西一带击败羌人。此后羌人陆续内附，迁至陇西、扶风、天水三郡。长安以西成为羌汉杂居的地区。羌人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各部互不统属。为防止迁居内地的羌人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羌族联系，东汉政府在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汉羌双方保持平静状态数十年。

东汉后期，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羌人，多次激起羌人的反抗。羌人曾前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第一次起义发生在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政府下令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今甘肃东南部)的羌人随征西域，激起羌人的反抗，多次击败东汉地方军队。居住在陇西、定安、北地、上郡等边郡的汉族人民，为反抗东汉政府强迫他们内迁的种种暴行，与羌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东汉政府的残暴统治。东汉王朝用了11年时间，花费240亿钱，才镇压了起义。第二次发生在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战争主要在武都、关中一带，公元145年起义失败。第三次起义是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起义地区扩展到三辅及并、凉二州的广大地区。东汉军队以血腥手段镇压起义群众，公元169年，起义最后失败。

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先后延续了五、六十年。对东汉王朝是个沉重的打击。东汉王朝用于镇压人民反抗所耗军费达数百亿，促使了东汉王朝的日益衰落。

四、乌桓、鲜卑和东北各族

乌桓和鲜卑最初活动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

带，是东胡族中两个最强大的部落。他们的语言风俗大同小异。西汉末年，归属于匈奴。东汉初年曾跟随匈奴贵族侵扰汉的东北边境。匈奴分裂后，乌桓各部摆脱了匈奴控制，向东汉臣服，后乌桓大人（贵族）郝旦率领各部首领至洛阳朝贡，与汉通好。汉在上谷宁县（今河北宣化附近）置护乌桓校尉，兼领乌桓、鲜卑互市等事。东汉末年，其势力更强盛。后为曹操所破，余众大部被迁入内地。

鲜卑族位于乌桓东部。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族遣使通好。东汉后期，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各部，占据匈奴旧地，成为蒙古草原上代匈奴而起的强大民族。其统治区域东起兴安岭，西至准噶尔西的乌孙，绵延万余里。檀石槐死后，鲜卑内部分裂，势力由此削弱。

在东北地区，还有夫余、高句丽、挹娄等族。夫余、高句丽在东汉初年已进入奴隶社会，并先后臣属于东汉。挹娄人比夫余、高句丽落后，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挹娄人名义上臣属于夫余，但保持着相对独立。东汉在辽宁沈阳东设玄菟郡，进行军屯并节制各族。

五、南方及西南各族

东汉时，在今两湖、四川、两广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为蛮族。因居住的不同，其名称也不统一。在湖南境内有武陵蛮、零陵蛮、长沙蛮、澧中蛮等；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是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在四川北部及汉中地区，居住着板楯蛮诸部。秦汉以来，在蛮族居住地区就设置了郡县，而各蛮族内部又保留着部落组织。西汉末年，又有许多汉族人流入湖南等地，与蛮人杂居。东汉时，由于官府不断压迫追逼，被迫使这些少数民族起而反抗，虽遭统治者多次镇压，但反抗斗争的烈火却一直连绵不断。

云南澜沧江流域哀牢山地区居住着哀牢人，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当地人民又长于织绣技术。汉明帝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汉朝，东汉政府在哀牢地区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后隶属永昌郡。

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市东北）西南面居住着掸族，这时也和东汉发生联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王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和帝赐以金印和钱帛。安帝时，封掸王为“汉大都尉”。至此，永昌西南地区也归入汉的版图。汉武帝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汶山等郡，汶山郡以西的白狼等部约130万户、600余万口，在东汉明帝时，自愿归附汉朝。汉文化传入这里后，提高了当地经济、文化水平。

六、东汉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早在秦汉之际，我国与邻国已发生了联系，到东汉时期，这种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东汉与朝鲜的关系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半岛南部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国。这些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相继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机构和各项制度，开始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东汉与日本的关系　在日本国土上居住着倭人，存在着一百多个政权。西汉时通过朝鲜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往来日益密切。东汉向他们输送了铁、铜制品；农业和养蚕技术地相继传入日本。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人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及冠带。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上出土，印文为“汉委（倭）奴国王”，成为中日交往的历史见证。

东汉与越南的关系　汉武帝时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并于该地建立学校，教以先进的耕作技术，传播先进文化。但设郡之后，多次激起越南人民反抗。尤以王莽时期为

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越人征侧、征贰姐妹的起义。得到九真、日南等地的响应。攻下65城，征侧自称女王，历时 4 年，不久为东汉马援将军的军队所镇压。起义被平定后，东汉政府废除了残暴的“越律十条”。并在该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越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地区也先后走上封建化道路。

东汉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应汉使者的邀请到洛阳。明帝为他们修建了我国第一个佛寺——白马寺，请他们翻译经典。佛教传入中国后，天竺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双方文化交流起着巨大的作用。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帝国）商人来到中国，以其王安敦的名义，赠给东汉皇帝象牙、犀牛、玳瑁等礼品。此后，双方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章帝元和四年（公元87年），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伊朗）王两次派使者到中国，赠给东汉狮子、驼鸟等物。桓帝时，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翻译了30多部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一、外戚与宦官的专权

东汉和帝以后，皇帝大多是幼年即位。太后怀抱幼主处理朝政几乎成为通例，她们和长大后的皇帝为了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需要一批人辅佐自己。而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两种人，一

种是外戚即太后的父兄；另一种是家奴，即宦官。因而东汉后期的政权主要由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交替控制，成为政治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各谋私利，互相残杀，使东汉后期政治更为黑暗，社会矛盾愈趋激化，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导致东汉王朝彻底瓦解。

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始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大的交锋有四次，均以外戚失败，宦官胜利而告终。宦官势力日益骄横，独揽大权。

诸窦的败亡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死，年仅10岁的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她以兄窦宪、弟窦笃、窦景、窦瑰等并居要职，执掌朝廷大权。窦宪为侍中，后为车骑将军，北击匈奴后拜为大将军，权势更盛。窦氏子弟，亲朋故吏都因此而飞黄腾达，官居高位，"刺吏、守令多出其门"。①窦氏的奴客也"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②和帝稍长便不能再容窦氏专权横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依靠宦官中常侍郑众等，诛杀了窦氏集团，窦宪及其弟笃、景被迫自杀，贬瑰出京师，后自杀。窦太后被迫还政于和帝。郑众因功被封为鄛乡侯，东汉宦官从此得势，开始参与朝政。

宦官势力的增长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和帝死，25岁的邓太后废太子刘胜，立百日婴儿为帝，即殇帝，殇帝一岁即亡，邓太后又立和帝侄，13岁的刘祜为帝，即安帝，朝政仍由邓太后掌握，其兄邓骘辅政。邓太后颇有政治才能，在她听政的十几年中，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首先她能汲取窦氏的教训，对外戚邓氏严加管束，不使他们过分骄横；其次，在政事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同时，起用名士杨震等一批有才识的士人做官，借以取得大官僚地主的支持。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后，

---

①②《后汉书·窦宪传》。

为争权夺利，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等诬告邓骘兄弟及宦官蔡伦图谋废立，邓骘、蔡伦被迫自杀，邓氏势力被铲除。安帝亲政以后，宦官李闰、江京均升任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掌管宣达皇后旨意，管理宫中事宜。阎皇后兄弟阎显等也居卿校之位，掌管禁兵。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死，阎皇后想长期控制政权，将太子保贬为济阴王，并与阎显、李闰、江京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即少帝，不足一年少帝死。阎皇后想再立一小儿。事尚未成，另一派宦官孙程等19人，捕杀了阎显、江京，迁阎太后于离宫，迎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是为顺帝。孙程等19人因功皆封列侯，宦官权势大大增强。

"跋扈将军"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皇帝只能依靠他们一方的力量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成了傀儡。顺帝亲政后，面对日益增长的宦官势力，只能依靠外戚势力来与之抗衡，相继拜梁皇后之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历冲帝（刘炳2岁）、质帝（刘缵8岁）、桓帝（刘志15岁）四朝，使外戚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虽也任用宦官，扩充太学，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但大权仍在梁冀手中，他的权力越来越大，9岁的质帝"少而聪慧"，曾言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他毒死。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一党坚主拥河间王之子，梁冀的妹夫15岁的孩童刘志为帝，李固坚持己见，因此触犯梁冀，被诬陷致死。刘志继位，即桓帝。此后，朝廷中事无大小，都要经过梁冀决定，才能执行。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的郡县，官吏升迁任免，都要先向他谢恩送礼，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都要先把上等品送给梁冀，次一等的进献皇帝。梁冀和他妻子孙寿，穷奢极侈，修建了极其豪华的住宅，又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兴修苑囿，又在河南城西修建兔苑连绵数十里，到处调活兔，"刻其毛以为识，

人有犯者，罪至刑死。”①一个西域商人误杀苑中一兔，连累而死者竟有十多人。他们还虏取几千口民间子女做奴婢，称为“自卖人”。梁冀当政时期，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10倍，人们不堪忍受，怨声四起，到处流传着“梁氏灭门驱驰”的咒骂声。梁氏一门前后7人封侯，出了3个皇后，6个贵人，2个大将军，尚公主3人，其余任卿、相、尹、校的有57人。

“五侯”逆行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五人合谋以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迫使梁冀及其妻孙寿自杀，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皆弃市。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300人，一时，“朝廷为空”。抄收梁冀家产出卖后，得钱30多亿，等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单超等五人因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并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比三公。从此，东汉政权为宦官集团所垄断。他们执政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②狐假虎威。单超早死，其他四侯，专横更甚，民间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③可见气焰之嚣张。他们的“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④桓帝死，窦太后临朝，立13岁的刘宏为帝，即灵帝，窦太后以其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在宦官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陈蕃等密议，准备剪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同意。不久，机密泄漏，宦官曹节等抢先行动，将窦太后幽禁于南宫，杀死陈蕃，窦武自杀。灵帝时，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张让、赵忠等把持朝政。灵帝称“张常侍（让）是我公，赵常侍（忠）是我母”。⑤宦官专权达到极点。东汉政权也在宦官、外戚的争权斗争中瓦解。

---

①《后汉书·梁冀传》。

②③④⑤《后汉书·宦者列传》。

二、清议与党锢

清议 宦官、外戚的轮流专政，使整个东汉政权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要求改革政治，反对宦官外戚的专权，力图维持摇摇欲坠的东汉政局。于是形成了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代表，以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为主体的社会政治集团。由于宦官、外戚的党羽充满各级政权，堵塞了他们的政治出路，引起这些人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宦官、外戚进行猛烈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清议”。当时的郭泰、许劭、许靖等人，善于清议，被誉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清议之风起初在地方上流行，后来传入太学，太学遂成为议论抨击的阵地，太学生成为主力军，以有影响且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和王畅为自己的首领。当时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①的说法。实际上是太学生们在树立自己领袖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清议者们敢于“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②多少起到了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

官僚、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外戚，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太学生曾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七月，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听说后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千人到皇宫前上书皇帝，为朱穆申辩。并说：“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③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

①②《后汉书·党锢列传》。
③《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

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悺向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因此诬陷皇甫规侵没军响“货赂群羌，令其文降。”①也要输作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与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到皇宫前上书皇帝，为皇甫规申辩。皇甫规亦被赦免。一些官吏也起而反对宦官，据史载，杜密为北海相，刘祐为河东太守都剪除了一批所属县令长官中的宦官党羽，济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路衢。南阳太守成谱与其功曹岑晊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用势纵横”的商人地主张汎。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了宦官侯览老家的资财，控告侯览“残暴百姓，所为不轨。”②并控告侯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③东海相黄浮逮捕了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太尉杨秉、司空周景等，奏免宦官亲党中罪恶彰著者，自将军、牧守以下50人。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衣冠望族，他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畏罪躲进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从合柱中搜出处死。由于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声名自高。”④许多宦官惧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士大夫如能得他到的接待，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称之为“登龙门”。由于他敢于同宦官势力作斗争，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宦官们利用权势对反对宦官集团的人们进行一系列的迫害，终于酿成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与宦官交往甚密，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正值此时，国家有赦免令，而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竟案杀之。”⑤宦官遂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

---

①《后汉书·皇甫规传》。
②④⑤《后汉书·党锢列传》。
③《后汉书·宦者列传》。

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①桓帝听信宦官之言，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寔等200余人被捕入狱。后经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求情，桓帝才于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虽遭禁锢，但他们却获得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如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车）。”②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他们与宦官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立。窦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总结先前外戚、宦官两集团斗争的经验，认识到联合较多的豪族、士人的必要，于是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准备剪除宦官势力，但因宦官势力太大，没敢骤然下手。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劫持太后，矫诏发兵攻窦武，窦武兵败自杀，窦氏宗族亲戚几被杀光。陈蕃等被捕杀。宦官侯览使人诬告曾打击过宦官的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复遭捕系，死于狱中。因牵连而被杀、流放、废禁者六、七百人。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又一次搜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灵帝下诏州郡，凡是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及五服以内亲族都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灵帝接受宦官吕强的建议，才下诏解除了“党锢”。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在宦官专权、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

---

①②《后汉书·党锢列传》。

况下，敢于挺身而出，与邪恶的宦官势力进行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了社会的同情，因此在张俭被追捕时，许多人“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①使他得以逃亡塞外。还有许多人自愿追随被贬党人到流放地服役。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但他们反宦官，也只是为了缓合阶级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不可能提出任何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因此不可能改变混乱和黑暗的局面。

三、桓灵的腐朽统治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土地兼并 东汉自和帝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例如缯侯刘敞，曾侵占民田、官田无数；宦官侯览，曾夺人土地118顷。桓帝时，贵族、官僚、商人、地主几乎占有了全国的土地，而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好沦为农奴、奴婢或流民。由于外戚、宦官专权，以及长达11年的对诸羌的用兵，封建国家向农民征发的赋税、徭役、兵役也越来越重。致使“弃农桑、疲苦徭役”，“兵役连年，死亡流离”，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统治集团的腐朽 桓、灵统治时，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桓、灵二帝都有宫女数千人，每日的日食之费，就需数百金（一金为一万钱）。桓帝时，国库已空虚，下令加征田税，每亩税10钱，又经常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之需。还公开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绮、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③灵帝时，公开卖

---

①《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后汉书·质帝纪》。
③《后汉书·桓帝纪》。

官，二千石官2000万，四百石官400万，大小不同的官，就有不同的定价。县令（长）当面议价，按该县田土肥瘠定价。买官者可交现钱，也可暂欠，到任后加倍偿还。因买官的人多，所以实际价格要高于定价。曹嵩买太尉花了1亿钱，比定价高十倍。既然官可买，贪污也就是合法行为，官吏一到任，就拼命搜刮。政府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一个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百姓苦不堪言。灵帝还下令，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官吏升迁，要交"助军钱"；南宫失火，令天下田每亩纳税10钱，作为"修宫钱"；郡国向中央交租税贡献，先抽一分交宫中，谓之"导行钱"。

农民的反抗斗争 广大农民身受政府和豪强地主的残酷剥削，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更难生活。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有32个郡县遭到水、蝗灾，逃荒流民达数十万户，冀州出现人相食的惨象，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道。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豫州发生大饥荒，饿死者十有四、五，"至有灭户者"①，灵帝时，"河内（今河南武陟）人妇食夫，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夫食妇"②。

为了生存，流亡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从安帝到灵帝的80余年间，见于记载的大小起义将近百余次，规模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十几万人。有些起义还和少数民族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息。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③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

①《后汉书·桓帝纪》。
②《后汉书·灵帝纪》。
③《太平御览》卷976引崔寔《政论》。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一、张角与太平道

太平道　黄巾大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太平道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是原始道教中的一支，以黄帝、老子为教主，故又称黄老道，约产生于东汉中期。顺帝时，琅琊人于吉造了一部《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为家（宗），而多巫觋杂语”①，在江苏、山东一带传道，被贫苦农民所信奉。后来此书为张角所得，他就以此书传道，故称太平道。

太平道的思想体系是唯心的。但它的教义的某些部分，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可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太平清领书》早已失传，但在《道藏》的《太平经》中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的记载。如：“积钱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其先人之体”，②都是人生六大罪之一。还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③主张人人平等。这些言论反映了农民反对土地兼并、财富集中和地主阶级不劳而食的思想，很容易被农民所接受。

“黄天当立”　张角以“符水”治病，利用太平道组织人民，吸收了很多弟子，再派他们在各地传教。十几年间，道徒发展到30多万人，活动地区扩展到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又按地域把道徒依军事编制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

---

①《后汉书·襄楷传》.
②《太平经》卷67.
③《太平经》卷112.

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统归张角领导。并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的口号，预示着要用“黄天”的太平农民政权，取代“苍天”的东汉地主政权。还派人到京师洛阳及各州郡，在官府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作为进攻目标。大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黄巾大起义

起义的爆发 张角原定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即甲子年三月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义，并派大方渠帅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教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集中，配合冀州道徒攻打洛阳。马元义亲到洛阳活动，并收买了宦官封谞、徐奉作为内应。但由于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马元义被捕牺牲，并杀害洛阳道徒千余人。东汉政府连夜下令冀州官吏搜捕张角。张角决定提前于二月间起义，于是，36方同时并起，“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②起义者头包黄巾，故称“黄巾军”。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巨鹿的黄巾军。其它地区的起义有：颍川（今河南禹县）的波才，汝南（上蔡）陈国（淮阳）的彭脱，南阳的张曼成，东郡的卜巳，扬州的戴风。此外，幽州、益州等地都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统治者十分惊慌，急派大将军何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同时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军镇压颍川黄巾军。命卢植、董卓镇压冀州黄巾军，下令解除党锢，起用党人，对付起义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组织武装与起义军相对抗。

起义的失败 黄巾军对东汉官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3月，张曼成率领的南阳黄巾军攻克郡城，斩太守褚贡。4月，波才率

---

①②《后汉书·皇甫嵩传》.

领的颍川黄巾军击败朱儁，并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冀州黄巾军在张角兄弟的率领下，捉获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又打败了卢植、董卓率领的东汉军队。汝南、广阳的黄巾军也击败了当地的东汉军队，杀死了一批当地的官吏。几个月内黄巾军连战告捷，声威大振，各地人民从者如流。

但是，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颍川黄巾军包围皇甫嵩军主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近草扎营。被皇甫嵩夜袭火攻击败，又遭到朱儁、曹操、皇甫嵩的三部联合夹击，再次失败，最后被追至阳翟（今河南禹县）战败。接着汉军东进，击败汝南、陈国黄巾军。东郡起义军被皇甫嵩镇压，黄巾军首领卜已被俘牺牲。6月，南阳起义军首领张曼成阵亡，部众推赵弘为帅，攻占宛城，多次与朱儁、秦颉作战，赵弘牺牲，部众又推韩忠为帅，后战败投降被杀。余部在孙夏统帅下，坚持战斗，后散为几支小股部队，活动在豫鄂边区。

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军后，又率军北上，向冀州黄巾军主力发动攻击。正值决战的关键时刻，黄巾军的最高统帅张角病逝，部众在张梁率领下，与皇甫嵩军血战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一带，官军连连败北，使皇甫嵩入守营壁不敢出战。但起义军终因缺乏军事斗争经验，被皇甫嵩偷袭，激战一天，张梁及8万起义军壮烈牺牲，张宝退守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11月，在官军围攻下，10万余人阵亡，张宝战死，冀州黄巾军主力失败。

黄巾军主力经过9个月的英勇战斗，先后失败了。统治者对起义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将张角的棺木挖出剖棺暴尸，传首京师。在下曲阳皇甫嵩将千余具农民军的尸体堆积封土，筑为“京观”恐吓农民。但分散在各地的黄巾军余部，同其他农民军重新组织起来，不断地举行起义，打击东汉反动统治，有的坚持斗争长达20年之久。

三、黑山黄巾与青徐黄巾

黑山黄巾 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失败后仅3个月，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在常山、赵郡、上党等地的农民又纷纷起义。有20多支，人数达百万，他们的部属很多，名称各异，有黑山、黄龙、左校、李大目、张白骑、丈八、飞燕、雷公等。这些称号，大多是以各自的领袖绰号而命名。各部大者两、三万人，小者六、七千人，彼此有一定的联系，由于黑山军实力最强，共推黑山军首领张牛角为帅，故称“黑山军”或“黑山黄巾”。张牛角战死，又公推常山张飞燕（原姓褚）为帅。转战于河北诸郡十余年，杀死了许多郡守、县令（长）和地主，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张飞燕为公孙瓒所利用，进攻袁绍，被袁绍击败，张飞燕率部投降曹操。

青徐黄巾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10月，黄河以南的青州和徐州一带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称作“青徐黄巾军”，提出“汉行已尽，黄家当立”的口号①，他们攻城略地，诛杀官吏，很快发展到百万人。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青徐黄巾军20万人在张饶率领下，大败北海(今山东昌乐)相孔融。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青徐黄巾军30万人进攻泰山郡，为郡守应劭所败，转攻勃海，欲与冀州的黑山黄巾军联合作战，结果在东光为公孙瓒所败，②死伤被俘达数十万人。青徐黄巾军在河北失利，可在河南的部队战斗力仍很强。次年夏，青徐黄巾军以百万之众攻入兖州，杀任城(今山东济宁)相郑遂、刺史刘岱和济北(今山东长清)相鲍信。由于起义军随军家属太多，给养供应不足，曹操又乘机诱降，终因双方实力悬殊，被曹操镇压。曹操将其中的精锐人员

---

①《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②《后汉书·献帝纪》。

30余万收编为“青州兵”，增强他自己的军事力量。①黄巾起义基本结束。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初，黄巾军余部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起义，号称白波黄巾军，人数多达十余万，曾攻打太原、河北等郡，给董卓以很大的威胁。6月，益州黄巾马相、赵祇在绵竹（今四川德阳）起兵，部众数万。这些黄巾军后来都相继被镇压了。

四、汉中的农民政权

五斗米道是原始道教中的另一教派，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他在蜀郡（四川成都）组织五斗米道，传道医病，受治的病人出米五斗，并成为道徒，故称五斗米道。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张修是五斗米道的另一重要首领。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修、张鲁亦在巴郡、汉中起义，人民纷起响应。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张修率兵攻汉中，杀太守苏固，消灭了赵嵩、陈调等豪族武装，多次打败益州牧刘焉的进攻。后张鲁杀了张修，出兵攻占巴郡，建立了以汉中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张鲁自称“师君”，不设长吏，初入道者称“鬼卒”，首领称“祭酒”，更高者称“治头大祭酒”，以祭酒兼管政事。诸祭酒于大道边设义舍，内储米、肉，供行者量腹取食。犯罪者，轻者修路百步，重者“三原，然后乃行刑。”②张鲁奉行这些措施的结果，“民夷便乐之”，③流民来归者，前后数万家。张鲁政权巩固之后，便逐渐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张鲁本人也成为东汉政府的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的官爵，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投降了曹操。

---

①《三国志·武帝纪》。
②③《三国志·张鲁传》。

五、黄巾起义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起义特点 黄巾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与前两次相比，有明显的新特点：

第一、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经过他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把包括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等地区内的几十万农民发动起来，按大、小方加以编制，进行了周密地布置，有计划地进攻，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对广大农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因此，起义一爆发，就出现“八州并起，遐迩动摇”的形势。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也为后来的农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二、提出了“平均”的斗争口号。黄巾起义以太平道为组织形式，参加起义的农民也多是道徒。《太平经》曰“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①。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比较直接地反映农民“平均”思想的最早记录。也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的反映。“平均”口号的提出，是我国古代农民战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对后代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利用宗教组织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为后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失败原因 黄巾起义军的阶级成分是比较单纯的，完全是被剥削的农民，但它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一些具体的因素。

第一、张角等的策略不正确。张角在起义一开始就准备直接进攻统治者的心脏洛阳，是脱离现实的冒险行为。而且他寄希望于

---

①《太平经合校》卷48三合相通诀。

宦官，把宦官作为进攻洛阳的内应，是错误的。东汉后期的宦官，特别是他的上层，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核心部分，联络他们去攻打洛阳，说明张角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是不明确的。

第二、利用宗教组织进行革命斗争有消极作用。农民战争利用宗教组织联系和发动群众，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作为宗教，本质是宣扬唯心论的，又有束缚人民的思想，削弱人民战斗力的消极一面。使农民看不清自己的敌人。如青州黄巾由于曹操摧毁过庙寺，便错误地视为自己的同盟者，结果被曹操瓦解和镇压。

第三、反动武装比较强大，又有较丰富的军事经验。当时，除政府军外，还有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强于农民军。如公孙瓒、董卓、曹操、刘岱、朱儁、皇甫嵩都是地主武装或东汉地方武装及官军，他们就是靠镇压黄巾军起家的。

第四、缺乏统一的指挥。起义爆发后，各郡的农民军，只知道杀本郡的脏官，烧本郡的官府，占本郡的地盘，不懂得怎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如皇甫嵩进攻河北时，多次与起义军张梁战斗，而附近的黑山军却坐视不理，结果被东汉军各个击破。

历史意义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基本上推垮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其名存实亡。《后汉书》说："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①可见黄巾起义对东汉地主阶级及政权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第二、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黄巾起义后，土地兼并暂时缓和下来，许多官僚、贵族和地主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较前减轻，生活比较稳定，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①《后汉书·党锢列传》.

第三、发扬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在黄巾起义过程中，起义领袖们如张梁兄弟、张曼成、波才、张牛角等及广大义军群众，不畏牺牲，浴血杀敌。这种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世受压迫的穷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和宗教

今文经与古文经　今文经是指用通行的汉隶书写成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是由口头传授再书写而成。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在太学教授弟子。凡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今文经。当时今文经学较为盛行。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墙壁里发现《尚书》、《礼》、《论语》、《孝经》等都是用秦、战国时期流行的篆文写成的，这些经书被称为“古文经”。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刘向整理图书，刘向的儿子刘歆在帮助父亲校书时，又发现了用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尚书》等，刘向死后，哀帝命刘歆代替父职，继续整理。刘歆对古文经极为推崇，便建议朝廷在太学设学官传授古文经，但遭到了今文经学派的反对，未被采纳。平帝时，王莽辅政，为了利用古文经改制篡权，重用刘歆，提倡古文经学，并将《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立为学官，每经置博士5人，从此确立了古文经在官方的合法地位。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各学派对经义的解释及学术思想源流、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派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穿凿附会，望文生意，以迎合统治阶级的

政治需要，在学术上无甚建树。而古文经学派则按字的形、音、义解释经文，注重章句训诂，不凭空臆造，学风正派，学术价值较高。两派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两派往往因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相持不下，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初年，取消了古文经博士，官方承认的仍是今文经学。

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官，但研究者较多，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兼通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大师，如贾逵、马融、郑玄、许慎等。许慎博通经籍，为反对今文经派依隶书经典曲解经文，用22年时间，撰著《说文解字》一书，收字9353个和古文籀文1163个为重文，并对字的形、音、义都依据六书作了解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典。郑玄混淆家法，遍注群经，学术成就很高，成为东汉后期古文、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郑学的出现，说明东汉末年今、古文两派已趋于合流。东汉以后千百年来的经学主要是综合学派。

谶纬神学　西汉末年，在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家思想基础上，谶纬神学发展起来。谶即图谶，是巫师方士制作的一种宗教隐语，作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的符验或征兆。纬是儒生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与经相对而得名。谶纬的内容除包含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怪诞荒唐的迷信和“天人感应”一类的胡说。王莽曾利用图谶作为复古改制的合法根据。刘秀建立东汉后，对谶纬更加崇信，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都要以谶纬作根据，临终前还“宣布图谶于天下”。①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谶纬神学更为盛行。

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东汉章帝主持了由诸儒参加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并对不同意见作出裁决。会后班固将会议内容整

---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白虎通义》。这部书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迷信融合在一起，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并用谶纬解释五经，形成了谶纬经学化，经学谶纬化。它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

东汉末期，谶纬逐渐衰弱，但直至隋炀帝正式禁毁以前，仍继续流行。

王充与《论衡》 王充（公元27—100年前后）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他自幼刻苦读书，上过太学，博通百家之言，学识渊博。曾做过几年州郡官吏，但因愤世疾俗，常与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他一生的精力，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埋头于著书立说，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成了《论衡》一书。

《论衡》一书共85篇（今存84篇），20余万字。它是一部反对谶纬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学的不朽作品，也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古代哲学著作。

在《论衡》中，王充否定了“上天”创造万物，主宰人类社会的说教，批判了“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天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日月星辰的运行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天神意志的表现；云雨霜露也不是什么天神使命的征兆，而是自然现象。他指出：天没有意志，是“于物无所求索”①的实体。因此，天并不能谴告人世，不能有目的地去干涉人间的事情。

在《论衡》中，王充批驳了鬼神迷信思想，给人的生命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否定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思想，指出：精神依附于形体而存在，无形体即无精神，人死而形

①《论衡·自然篇》。

体腐朽，精神也就不存在了。并肯定地作出结论：“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① “夫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②

王充在《论衡》中还阐明了自己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他认为，人们的知识是通过感官与外间接触后才获得的，那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先知是不存在的。并进一步指出：凭感官获得的知识，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深化提高，才是比较可靠的知识。即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论衡》中所表现出的王充认识论的局限性，在于否定了人们认识的不断发展，总是用“宿命论”来解释人世的吉凶祸福和国家的治乱兴衰。故其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的。

佛教的传入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城（今尼泊尔境内），教徒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西汉时，佛教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西汉末年传入内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王派使臣伊存到长安，口授浮屠经，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了传授，此后佛教逐渐流传开来。但一开始，佛教只是在统治阶级中流传。

东汉初年，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明帝时，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回来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东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供翻译佛经使用，中国开始有了汉文本佛经。东汉后期，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和月氏僧人支谶等相继到洛阳译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预翻译。从此，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佛教是外来宗教，统治者为了使它发挥麻醉剂的作用，便让它和黄老道教结合起来共同流传。当时佛教的教义主要是：宣传

①《论衡·论死篇》。
②《论衡·订鬼篇》。

灵魂不灭，生死轮回，行善积德，因果报应；慈悲为本，清心寡欲，而归于无为等。佛教的教义，比儒家的"天人感应"和原始道教的长生不老更具欺骗性。无论穷苦人民，还是想永保富贵尊荣的统治者，都能从中得到慰藉。因此东汉后期，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

二、史学、文学、艺术

史学 中国古代史学在秦汉时飞跃发展，这时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35年——公元前93到87年之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学识渊博，著《论六家要旨》，并立志编撰通史，撰述未竟，便因病而亡。司马迁自幼聪慧，受其父影响，熟读经史。20岁时游历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大部分地区，并以"郎官"身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饱览名山大川及名胜古迹，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形势物产，访问著名人物，考察少数民族。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国家藏书，为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共订太初历，并于同年开始写《史记》。5年后，又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入狱，惨受宫刑。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写作，先后约用了10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学巨著。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52万余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为五部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中心部分。《史记》通过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较全面

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

《史记》体系完整，取舍精当，创造了纪传体这一新体裁，为以后两千多年的正史编纂者所效仿。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虽说是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提供历史经验，但在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神学化统治思想领域的当时，他能公然声明要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寻求历史变化的法则，从而建立自己独家的学说，可以说，这是一种勇敢的挑战行为，表现出他不同世俗的叛逆精神。因此，司马迁用进步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和论述历史事件时，按自己独特的标准，有褒有贬，爱憎分明。他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贪婪、暴虐、愚昧，大胆讥笑汉武帝迷信求仙的荒诞、无聊，抨击刘邦贪财好色，诛杀功臣的流氓无赖习气，指斥一些暴君酷吏的罪恶。同时，对农民领袖给予极高的评价，为陈胜作"世家"使之与诸侯并列，并肯定陈胜的首创精神。特别是，司马迁治史态度严谨，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对许多历史人物都是善恶并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遂使《史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而且《史记》叙事条理清晰，语言通畅，善于刻画人物，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司马迁在《史记》中突出了帝王将相，宣扬了唯心史观，从史实记述上看，也还存在某些缺漏和错误。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作《史记后传》65篇。班彪死后，班固继承父业，潜心20余年，写成《汉书》100卷。后受窦宪谋反案牵连，死于狱中。

①《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临终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后由马续补写了《天文志》，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了八表。所以《汉书》的作者实际上包括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

《汉书》记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的体例仿照《史记》，只是改“书”为“志”，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规模宏大，记事丰富，补《史记》之漏缺，在传记中增加了很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奏疏、议论，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汉书》的十志比《史记》的八书博大丰富，其中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为班固所新创。

《汉书》的缺点是封建正统思想严重。书中一味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改入列传。班固还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①而且《汉书》中，“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②失掉了《史记》的批判精神，体现了班固的明哲保身思想。

两汉时期史学上的成就除《史记》、《汉书》外，还有《汉纪》，它是东汉末年荀悦所写的编年体西汉史，共30卷。《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本朝纪传体史书，原134卷，今存24卷，为后世编写后汉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当时还产生了记载春秋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越绝书》（东汉袁康撰），这两书是我国最早的民族史和地方志。

文学 秦汉时期文学有很大发展，文学形式主要是散文、赋和诗歌。

秦到西汉初年出现了许多语言生动精炼，议论明白，说服

---

①《后汉书·班固传论》。

②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425页。

力强的政论文章。其中以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王符的《潜夫论》等为主要代表作。当时散文最高的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书中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人物形象，还采用大量的口语、歌谣、谚语、俗语来生动地表现人物性格，寓爱憎于叙事中，鲁迅先生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

赋是两汉时最盛行的一种文学形式，从楚辞发展而来。汉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骚体赋，汉初较盛行；一种是散体大赋，形成于汉初，兴盛于武、昭、宣之世，并取代了骚体赋，是汉赋的代表。汉初骚体赋的主要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等，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为主，且开了散体赋的先河。西汉中叶，汉赋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这时的汉赋虽也有一点讽刺统治阶级的意味，但基本上是用华丽的辞藻，较长的篇幅，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内容空泛枯燥，文字铺陈堆砌。西汉末年，汉赋走向衰落。

东汉时期，辞赋大多为模拟之作，没有独特的风格。不过也有一些篇幅较短，意境清新，反映现实的小赋。如张衡的《思玄赋》和《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都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宦官专权、官场腐败等社会现象的不满，也表现了作者愤世疾俗的反抗精神和对人民贫困生活的一定同情。

秦汉时期的诗歌以《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乐府"原指国家设立的音乐专署，始见于秦，到汉武帝时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并开始采集民间诗歌配以音乐来诵唱，称为《乐府诗》。《乐府诗》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②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且感情浓郁，风格清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逐渐形成了五言古诗的文学形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②《汉书·艺文志》。

式。

五言诗萌于西汉，形成于东汉，到建安时代进入兴盛时期。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已正式形成。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诗中表现了下层文人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为寻求出路，背井离乡，长期不归的离愁别绪，流露出诗人消极颓废，内心苦闷的情怀。《古诗十九首》为五言新体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艺术 秦汉时期的艺术水平主要表现在绘画和雕塑两个方面。

绘画艺术在西汉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体可分为壁画、帛画两类。当时许多宫殿、贵族官僚的邸宅、坟墓墙壁上都有巨幅壁画。其中著名的是鲁恭王刘余在曲阜修建的灵光殿内的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可惜未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反映了汉代绘画艺术水平。这幅画内容分三部分：上部左右分别绘有日中金乌和嫦娥奔月两个神话故事；中部绘有墓中女主人的贵族生活；下部绘有海中怪兽巨人等，线条流畅，色彩丰富，人物情态自若，是古代人物画的杰作。东汉的绘画，其类型、内容与西汉相同。

雕塑艺术在秦汉时也有发展。1974年发现的秦兵马俑坑，就是一座雕塑艺术宝库。坑中的陶俑分为步、车、骑几个兵种，各执弓、箭、弩及青铜戈、矛等兵器，或负弩前驱，或御车策马，造型优美，神态逼真，形象各异，表现了秦代陶塑艺术的发展。

汉代的雕刻艺术与绘画相辅而行。西汉石雕的代表作，是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有“马踏匈奴”、“怪兽食人”以及卧马、跃马、卧牛、伏虎、石羊等。这些石雕多半是依石材原样顺势加工而成，刀法雄健，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其中的“马踏匈奴”，造型美观，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雕刻的。

东汉雕塑以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一组铜车马俑为代表。其中的一匹飞腾铜马，三足高举，一足踏飞燕龙雀，造型生动，是古代雕塑艺术的珍品。以其为蓝本的侧视平面图形，已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此外，东汉时期用于垒砌墓壁和石阙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是一种雕塑艺术。其技术分阴刻的浅画和阳刻的浮雕两种。其内容极为丰富，有官吏出行、宴饮、狩猎、战争图；也有耕作、纺织等劳动生产的画面，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浮雕艺术。另外，蔡邕刻造的“熹平石经碑”，既是石刻艺术，又是书法珍品。

三、科学技术

算学 秦汉时期算学逐渐发展起来。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算学著作。此书主讲天文历法，但书中已有了周密的分数运算和开平方之法，并用商高回答周公旦提问的方式最早提出了勾股定理。较《周髀算经》稍晚的《九章算术》，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到东汉初年的数学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全书分九章：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等。其内容包括了对各种面积、体积的算法，应用勾股定理测量、开平方、开立方、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正负数加减法则、一次方程组解法等，在数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中的负数、分数计算、一次方程组解法等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

天文 汉代天文学高度发展，对天象的记录极为丰富。《汉书·五行志》中精确地记载了河平元年（前28年）三月十八日太阳黑子出现的位置、时间，这是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有关太阳黑子的正式记录。比欧洲黑子记录早了800多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星占》，记载了秦汉之际70年间木、金、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

汉代对天文学的研究极为盛行。关于天体的结构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宣夜说（已失传）；二是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为代表，认为天象一个盖笠，地象一个复盘；三是浑天说，认为天大地小，天在外如蛋壳，地在内如蛋黄。持浑天说的有落下闳，耿寿昌、张衡等人。落下闳在西汉武帝时造浑天仪，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用水钟测定二十八宿的位置。东汉安帝时，张衡在落下闳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即用水力转动布列了星宿的球体仪器，转动时反映出来的现象，完全与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相符合，成为天球仪的鼻祖。张衡总结当时天文学最新成就，通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研究，写成了天文学巨著《灵宪》。书中探讨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并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日蚀月蚀的成因，作了我国最早的科学解释。张衡还于公元132年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余年。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圆径八尺（今1.84米），形似酒樽；内有立柱，与分指八方的机械相连；外有八龙口衔铜丸分布八方，下有八个蟾蜍，张口向上承接。哪个方向发生地震，中心柱侧向那方，那个方向的龙口便张开，吐出铜丸入蟾蜍口中，发出音响，于是就知道那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地动仪准确的测出了离洛阳几千里的陇西发生的地震，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录。

历法 天文学发展的同时，历法也不断改进。秦统一后，颁行《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一年为 $365\frac{1}{4}$ 日，一月为 $29\frac{499}{940}$ 日，闰在九月之后。经过100多年使用，到西汉中期，《颛顼历》和天象很多不合，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①的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命司马迁、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于太初元

①《汉书·律历志》上。

年（前104年）编成《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了有利于农业的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西汉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作《三统历》，推算一年为$365\frac{335}{1579}$天，一月为$29\frac{43}{81}$天，十九年有七个闰月。这个成就，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东汉末年，刘洪编制《乾象历》，采用定朔法来推算日食月食，并考虑到了月球运行的不均匀，编制了月球运动速度表，为后来编制历法打下了基础。

医学 秦汉时期，中国完整的医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西汉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治疗；还出现了专讲治疗处方的医学理论著作《内经》。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淳于意，号仓公，精通脉学，医术高明，“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①他在治病过程中，对病人的病情诊断及治疗结果都记录下来，是我国最早的病历创始人。

东汉时期，医学又有新的发展。著名的医学家是张仲景和华佗。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河南南阳人。自幼学医。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为给人治病，他精心钻研《内经》、《难经》等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16卷。书中记录了三、四百个药方，有许多至今仍广泛使用；还归纳出了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原理和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法则；并总结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这部书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第一部有理论、有实践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代中医引为准绳，称为“医经”。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

---

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华佗（约公元141年——203年）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精通各科医学，尤其擅长针灸和外科手术。他发明麻沸散，在做手术时，让病人用酒冲服，全身失去知觉，再进行腹腔手术或清洗肠胃，然后缝合涂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恢复正常。这使我国麻醉学和腹腔手术遥居当时世界前列。此外，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创作"五禽戏"来锻炼身体。"五禽戏"能让人体各部分得到适当的运动，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

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备的药物学著作。书中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其中关于用麻黄治气喘、海藻治甲状腺肿等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至今在临床上仍有疗效。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 纸出现以前，我们的祖先用甲骨、竹木简、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但简重帛贵，甲骨不易保存，都不能适应日益广泛的书写要求。西汉时期，在宫廷中使用一种用丝絮制成的薄而小的丝质纸，叫做赫蹏。近年来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数处西汉古墓中出土了西汉古纸残片，尤其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早期汉墓发现的纸，质软而薄，平面光滑，且绘有地图，当为最早的纸。这说明，造纸术最晚也在西汉中期发明，只是没有大规模的推广，所以西汉时书写材料仍为简帛等。

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民间造纸经验，改进造纸方法，用树皮、麻布、破鱼网等为原料制成了一种植物纤维纸。公元105年，蔡伦将自己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和帝，受到和帝称赞，被封为龙亭侯。此后，全国普遍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这种纸称为"蔡侯纸"。造纸术经过200多年发展，渐趋完善，到晋朝，植物纤维纸完全代替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中国的造纸术约在公元六、七世纪传入朝鲜，后传入日本。公元8世纪传到中亚阿拉伯等国，后又传入北非和欧洲。1690

年传至美洲。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公元前2世纪——公元18世纪初两千年间，我国的造纸术一直居世界先进水平。在技术、设备、加工等方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套完整工艺体系。世界各国沿用我国传统方法造纸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重要名词：

光武中兴　尚书台　王景治河　度田事件　察举与征辟　清议和党锢　班超　徒附　张鲁　王充　华佗　杜诗与水排　地动仪　今文经与古文经　《伤寒杂病论》　《史记》　《汉书》　太平道

思考题：

1．简述东汉初年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2．说明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
3．宦官与外戚斗争的情况怎样？它对东汉政治有何影响？
4．试分析黄巾起义的原因和特点。
5．综述我国造纸技术发明、改进和传播的情况。

第五章　三国鼎立与西晋的短期统一

（公元220—316年）

第一节　三国鼎立及其政治经济

一、军阀混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军阀混战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权显得软弱无能，地方州郡官吏和豪强地主武装集团，趁机以平黄巾为名，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成为各霸一方的军阀。这些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和控制中央政权，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外戚何进仗势立他的外甥刘辩为帝（少帝），并与世族地主袁绍密谋，命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企图诛杀宦官集团。董卓应召还未到洛阳，事泄，宦官先发制人，将何进杀死。袁绍等又率兵攻入宫中，诛杀宦官两千多人，结束了为时数十年的宦官专权局面。不久，董卓也带兵进入洛阳，他自恃官高权大，废杀少帝，另立年仅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董卓又逼走袁绍，自称相国，独揽朝廷大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关东各割据势力，不满董卓的专权横行。公元190年正月，自动结成军事联盟，史称“关东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董卓自知失道寡助，便挟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纵兵“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①强行驱赶洛阳周围

①《三国志·董卓传》。

几百万百姓西行，造成积尸满路，“数百里中无烟火”。公元192年，王允收买董卓部将吕布，合谋杀死董卓。接着董卓部将李傕(jue决)、郭汜（si寺）又逼死王允，赶走吕布，劫夺了献帝。后来李、郭又在关中相互火并。董卓西逃后，关东联盟也随之瓦解，各割据势力互相攻杀吞并。

经过七八年的混战，全国形成几个比较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占据冀、并、青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陶谦占据徐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袁术占据扬州一部分，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无固定地盘的刘备，先后依附于公孙瓒、曹操、袁绍，后又投奔刘表。

军阀混战历时20多年，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原来经济繁荣的中原地区呈现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②的悲惨景象。陷入痛苦深渊的广大劳动人民渴望实现国家的统一。

曹操势力的发展 军阀混战中，黄河中下游的袁绍和曹操，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两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其中，曹操的势力发展得最快。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宦官的养子，曾任东汉太尉。曹操20岁时，任洛阳北部尉，后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升任济南相，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占据兖州。在这里他收纳了李通、任峻、李典、许褚等豪强武装，在镇压黄巾军过程中，又收编了30万青州黄巾军，更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大军阀。

曹操采纳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③的建

①曹操：《蒿里行》。
②王粲：《七哀诗》。
③《三国志·毛玠传》。

议。公元196年，他带兵把汉献帝劫持到许（公元221年，改名许昌），并受封为丞相，从此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①的政治优势。曹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采纳了部下枣祗（zhi知）的建议，召募流民屯田，加强了经济实力。他注意招收和提拔人才，提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可以做官。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象荀彧、荀攸、郭嘉、乐进、于禁等人，都云集在他的帐下听候调遣。嗣后，曹操依靠优越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物质力量，一批文韬武略的人才，先后大破张绣、刘表联军，击败袁术，擒杀吕布，占领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成为北方唯一能和袁绍抗衡的力量。

官渡之战 袁绍（公元?—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大族。他于公元199年消灭公孙瓒，遂兼有青、冀、并、幽四州，占据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他自恃地广兵多，想借灭公孙瓒之余威，率兵南下，一举灭掉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公元200年，他亲率精兵10万，劲骑万余匹，长驱南下，企图消灭曹操，独霸中原。袁绍虽兵多粮足，但他粗野少谋，刚愎自用，内部矛盾重重，军纪松弛，军心涣散。曹操用于迎击袁绍的士卒虽不过两、三万人，军粮也远不如袁绍，但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在双方交战中，曹操先用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等战术，连连挫败袁军。接着，曹操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又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方针，主动退军，屯驻官渡。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达半年之久。同年10月，曹操接受许攸的建议，亲率精兵5千，打着袁军旗号，插入敌后，偷袭乌巢，把袁绍的1万多车粮草全部烧毁。袁军得此消息，弃甲曳兵，不战而溃。他又乘势以精兵万人，大破

---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

袁军于官渡。袁绍仅带800余骑逃回河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战役，经此一战，曹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为他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乘胜北进，袁绍忧愤病死。接着，曹操又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等残余势力。公元207年曹操又率军北征，击杀了与袁氏勾结的乌桓王蹋顿。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在回军途中，他写下了“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①的名句，表达了他要继续实现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

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孙权在江东的扩张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同时，孙权也在江东扩展自己的势力。

孙权（公元182—252年），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江南一大土豪。其父孙坚镇压过黄巾军，被封为乌程侯，曾举兵讨伐董卓。192年，孙坚率军进攻刘表，被刘表部下射死。长子孙策继统其众，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击破了淮南刘勋，控制了江东地区。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立。他善于招揽英俊豪杰，聘求谋士，把张昭、周瑜、鲁肃、程普等一批士族豪强地主，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攻灭了不服从命令的李术，打败了盘据夏口（今汉口）的黄祖，镇压了山越人的反抗，孙权在江南的力量得到了迅速扩张。

刘备势力的兴起和隆中对策 刘备（公元161——223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少年丧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刘备少年有志，后得大商人张世平等

①《宋书·乐志》三魏武帝《碣石篇》。

资助，逐渐有了一支人马。关羽、张飞这时归依了刘备。因镇压黄巾军有功，曾被任命为安喜尉，任过县丞、县令等职。在军阀混战中，因势力小，经常四处奔波，寄人篱下。他曾先后辗转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

刘备颇具才能，也善于笼络人心。为了发展自己势力，他多方礼贤下士，寻求人才。公元207年，在荆州名士徐庶的推荐下，他“三顾茅庐”，请出了比自己年轻20岁的诸葛亮。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自幼孤苦，跟随叔父到荆州（今湖北襄阳）避难，后隐居隆中，躬耕读书，常以管仲、乐毅自比。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相会，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拟定对策。他说：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刘表无能，刘璋暗弱。他要刘备占据荆、益二州做根据地，“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时机成熟，再北进中原，统一全国。①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策”。刘备十分赏识诸葛亮的才能，委以重任。后来诸葛亮帮助刘备争取到了荆襄地主的支持。庞统、马谡、廖化等举家、举族从军，扩大了武装力量。至此，刘备虽还没有固定的地盘，但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军事集团了。

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7月，曹操挥师20万兼程南下，企图夺取荆州，占据江东，一举平定南方，统一全国。曹军兵临荆州，刘表病死，其子刘琮请降。依附刘表的刘备在曹军的追逐下，自樊城南奔江陵，行抵当阳（今湖北当阳），被曹军击溃，刘备只得放弃奔江陵的计划，退兵夏口，进驻樊口（今湖北鄂城），并派诸葛亮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联吴以抗曹军。

---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

官渡之战图

公元200年初

图例

袁绍进军路线及溃逃方向

曹操进军路线

袁绍军屯地粮

主要战场

赤壁之战图

公元208年

图例

曹操进军路线及溃逃方向

刘备待南撤却路线

周瑜进兵路线

孙刘联军进攻路线

主要战场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图

荆州一战，曹军声势大振，当年冬，曹军分水陆两路自江陵东下，屯兵于赤壁(今湖北蒲圻县)。在曹兵压境下，孙权一时举棋不定。后采纳周瑜、鲁肃等人的抗曹主张。值此，诸葛亮来到柴桑，劝说孙权联刘抗曹，遂坚定了孙权的决心。孙权派周瑜、程普、鲁肃等带兵3万，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军。公元208年，曹操率20多万大军，号称80万，兵临长江，与孙刘联军会战于赤壁。孙刘联军只有5万人。曹军虽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曹军在士气、战斗力和战略上有许多不利因素：长途行军，“远来疲惫”；刘琮降众，“尚怀狐疑”；“舍鞍马，仗舟楫”，舍长用短；将士不习水土，军中疾疫流行；距后方较远，补给困难；荆州人心不服，韩遂、马腾盘踞西北，有后顾之忧；胜兵南指，骄傲轻敌。而与此相反，孙刘联军数量虽少，但他们兵精粮足，以逸待劳，勇于水战，以长击短，补给容易，士气旺盛，加之利害攸关，孙刘将领能团结一致。

孙刘联军与曹军初战获胜，曹操引船舰停靠于北岸，与联军隔岸相峙。周瑜部将黄盖，以诈降为名，火烧曹营。一时“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①联军乘势水陆并进，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遂率残部退回北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它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曹操看到自己一时难以统一全国，便将重点转向内部的改革和整顿；刘备先后取得荆、益两州，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其力量。孙权也解除了外部压力，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赤壁之战，三个集团鼎立局面的政治形势已基本确定了。

三国的建立 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经过短期准备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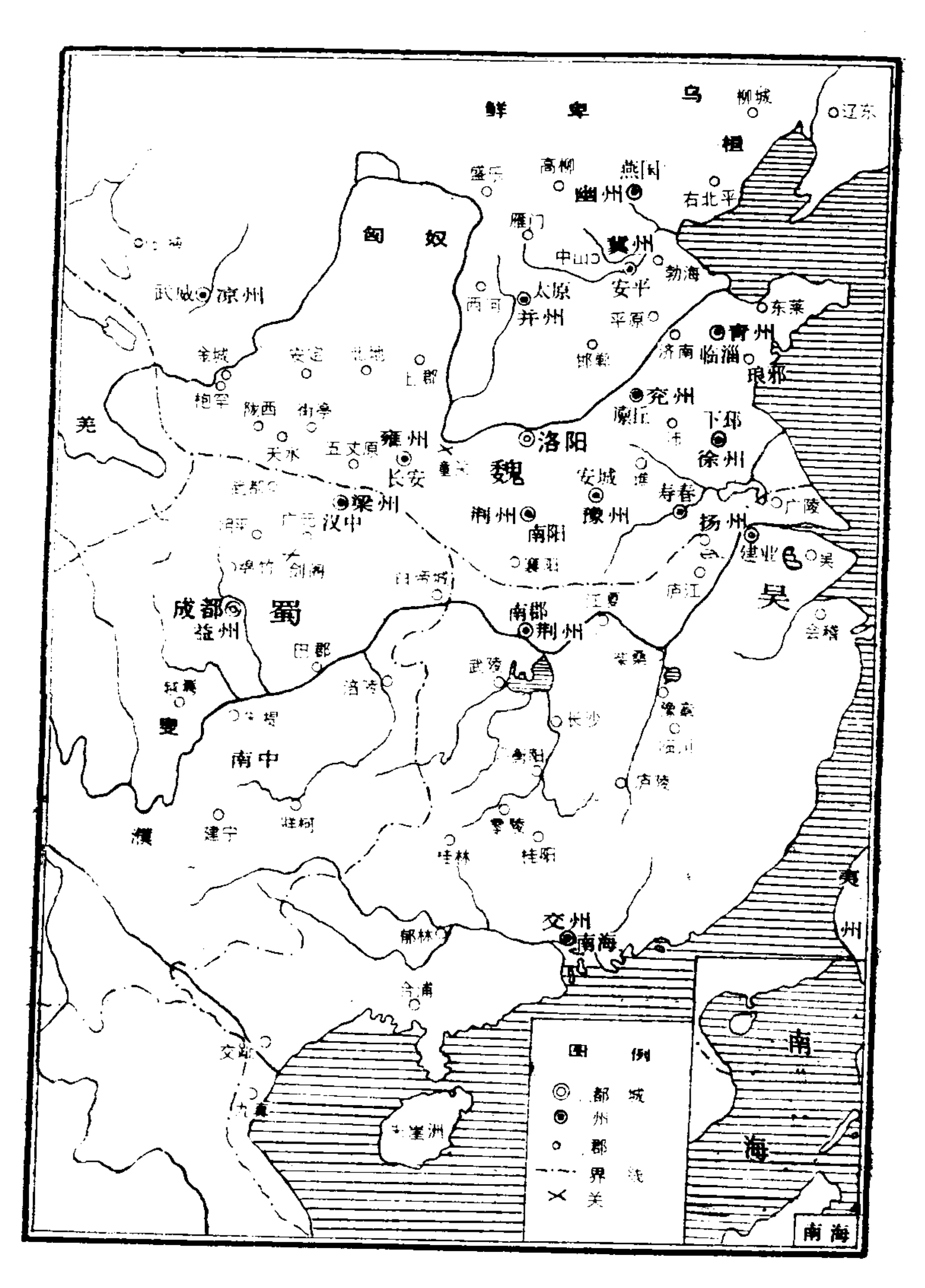
①《三国志·周瑜传》。

公元211年进兵关中，击败韩遂、马超，占据凉州（今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公元215年，进军汉中，张鲁投降。公元216年，曹操受封为魏王，不久又削平了代郡乌桓，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是为魏文帝，建都洛阳。

刘备在赤壁战后，向西南扩张，他占有刘璋的益州，借了孙权的荆州，又从曹操手中夺了汉中鱼米之地，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是为昭烈帝。因地处蜀，史称"蜀汉"，或"蜀"。

孙权在赤壁战后，重点向南发展，占据岭南。孙、刘之间对荆州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公元219年，孙权乘刘备留守荆州的关羽北上与曹操作战之机，命吕蒙乘虚袭取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为了夺回荆州，对孙权大举进攻。孙权任陆逊为大都督，率5万士卒，以逸待劳。公元222年，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用火攻战术，大败蜀军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刘备败遁白帝城。此后，蜀只能偏处西南益州一隅。公元222年，孙权称王。229年改称帝，都建业（今南京），国号吴，史称"孙吴"。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经济上，北方失去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江南和巴蜀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因而在全国形成了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成为三个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各集团都有当地有力的社会势力为其政权的支柱，曹操团结了中原的地主豪强，孙权依赖长江南北的世家豪族，刘备靠西南地主的支持。各个政权在互争生存中，又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内政革新，因之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着势均力敌的状态。军事上，曹操占有广大的北方，但因战争的破坏，一时还缺乏统一的物力和人力。吴蜀联合，攻虽不足，守则有余。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蜀有剑阁、三峡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这种地


鲜卑
乌桓
柳城
辽东
盛乐
高柳
燕国
幽州
右北平
匈奴
雁门
冀州
中山
勃海
武威
凉州
西河
太原
并州
安平
东莱
平原
青州
安定
北地
上郡
济南
临淄
琅邪
陇西
兖州
羌
天水
五丈原
雍州
洛阳
下邳
徐州
长安
魏
安城
寿春
梁州
汉中
荆州
豫州
扬州
广陵
南阳
建业
吴
成都
蜀
益州
南郡
荆州
江夏
庐江
会稽
巴郡
武陵
长沙
南中
零陵
桂阳
建宁
桂林
交州
南海
郁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珠崖洲
图例
都城
州
郡
界线
关
南海
南海

三国形势图

理上的自然险阻，有利于区域割据。三国鼎立虽属分裂局面，但与东汉末年相比，是一个历史进步，这种局部的统一，有利于在三个相对安全区域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曹魏的政治和经济

曹魏的政治经济情况在三国中一直是较好的。其主要原因，一是曹操在与群雄斗争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和措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曹魏统治较迅速地稳定下来。曹操采取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创"霸王之业"的战略方针，实际是一个打击豪强，消灭割据，发展生产，统一中国的进步方针。二是黄巾起义给予北方的豪强地主以沉重打击，改变了原来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提供了条件。三是中原地区开发较早，虽遭到战争破坏，但人口、生产经验和物质基础都比吴、蜀地区优越。

"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 曹操退回北方后，为了加强朝廷权力，积极刷新内政，延揽人才，一方面对豪强地主采取抑制政策，他先后杀了世家大族中的孔融、崔琰、杨修等人，同时又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是选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他的选官准则是"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①曹操多次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打破了汉末以来按照门第高低任用官吏的传统，宣布重用那些出身门第低下、虽有偏短而有专长的人。他知人善任，在三国中，得贤才独多，"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

①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①曹操具有政治家的风度，他宽以待人，不咎既往。陈琳曾为袁绍作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归顺后怕被治罪，而曹操却是“爱其才而不咎”。②他发下狠心，贤才聚集得越多越好，“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③

曹操统治时期，虽然在政治、经济上给豪强地主以限制，但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得不照顾豪强的一些利益，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随着豪强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渐上升，到曹丕称帝时，不得不对豪强让步。公元220年(黄初元年)，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亦叫“九品官人法”，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一种选官制度。这就是选择所谓贤能和有见识的中央一些官吏，兼原籍所属州郡的“中正官”，由他们负责察访品评本州郡有才能的士人，综合他们的门第、德才，定出“品”和“状”。“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定品虽也考虑士人的德才，但主要是依据世家官位的资历，即所谓“计资定品”。“状”是根据士人的德才行为下一个简短评语。品状写好后呈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

曹丕初创九品中正制时，比较重视“状”，这与其父的“唯才是举”的原则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的作用。史载“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④但是，世族地主毕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特定产物，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由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实质上是曹魏政权对世族地主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对全

---

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王粲传》。

③《昭明文选》李善注卷27.

④《宋书·恩幸传》。

州、郡人士进行品状，绝非中正官一人力所能及，那些社会政治势力强大、盘根错节的名门望族和高门华阀，决不允许中正官对他们作出任何客观的评价。同时，吏部既以品状决定各品人士的官职，于是谋求高品者竞相奔走于中正之门，营私舞弊，假公济私。再加能够担任中正官的无疑又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这样，上品者无非是官僚贵胄，下品者则为寒门庶族。愈到后来，“状”愈是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选官用人全凭门第高低了。这样，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地主垄断选举、把持政权的工具。它为门阀政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屯田 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经济破坏严重，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生计无着，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封建秩序，解决军粮极端缺乏的困难，发展生产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曹操指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汉）孝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①当时曹魏政府既控制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又有一定的人力物力，于是从公元196年起，便召募流民实行屯田。

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是把农民按军事编制严密组织起来，在屯田官吏的管理下，开垦荒地，不许农民随便离开。屯田客每年向国家交纳地租，“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②

军屯是让士兵及其家属参加屯垦。兵士之家，另立户籍，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兵士逃亡，家属抵罪，士兵死，其妻由政府配嫁。他们的身份比屯田客要低，隶属性更强。

屯田制是在封建国有土地上，用军事强制手段，把农民和士兵束缚在土地上生产，由国家直接进行地租剥削的一种封建土地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屯田军民不服徭役，“专以农桑为

①《三国志·武帝纪》。
②《晋书·慕容皝载记》。

务”，①对保护和促进北方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和劳动力的争夺。史载屯田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②到曹魏末年，“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③农村又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了。

改革赋税制度 曹魏时期，自耕农的土地总和多于屯田土地；自耕农仍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因而对自耕农的赋税征收，仍是曹魏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此，曹操集团在赋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即实行了租调制。规定田租每亩每年纳粟4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纳绢2匹，绵2斤，正式废除了汉代征收的口赋、算赋。由于租额固定，自耕农的负担比东汉时相对减轻。

曹魏政权在推行屯田制和租调制的同时，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先后开凿和整修了许多沟渠陂堰。较大的有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马渠、戾陵堰、芍陂、茹陂、太寿陂、睢阳渠，其中芍陂灌田万顷之多。灌溉工具翻车也经马钧改革，更为轻便适用。水利的发达，使大量的旱田改造成水田。

由于曹魏政府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改革，经过农民数十年的辛勤劳动，经济终于从极度残破中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这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对于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也起了重大作用。

四、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夷陵之战后不久，刘备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忧郁病死，临终前将蜀国的军政大权完全托付给他。刘禅继位后，诸葛亮承担起了辅助幼主治蜀的重

---

①《三国志·司马芝传》。
②《三国志·任峻传》。
③《晋书·食货志》。

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①他治蜀的基本措施是：

治理内政　政治上，为了加强集权和对人民的统治及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秩序，诸葛亮首先严明法令。法制的核心是赏罚公允。他要求执法者必须做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②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③他以身作则，街亭之战失败，对随刘备入蜀的功臣、自己的亲信马谡，按军法处死；对有功的王平，破格擢拔；他不诿过于人，主动请求身贬三级。他守规纳谏，不置私产，为群臣作出了榜样。所以有人说他“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④诸葛亮任人唯贤。他认为：“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⑤他把择人任贤提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他对出身低微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都是按“为官择人”的原则提拔起来的。军事上，他主张兵减将精，加强训练，注意兵器改进，实力有所增强，连他的敌手司马懿也“畏蜀如虎”。经济上，重视发展生产经济。诸葛亮及其部下认识到“为政以安民为本”，⑥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⑦的政策，在汉中一带屯田，派1200名兵丁维护都江堰工程，保证农田灌溉。手工业中的盐、铁、织锦等在当时都享有盛名。

平定南中　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三国时称为南中。那里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当地民族关系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诸葛亮注意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刘备死后，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豪强雍闿勾结益州彝族首

---

①③《三国志·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张裔传》。
④《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
⑤《诸葛亮集·举措》。
⑥《三国志·蒋琬传》。
⑦《三国志·后主传》。

领孟获叛蜀，诸葛亮于225年率兵亲征，雍闿为部下所杀，孟获成了叛军统帅。诸葛亮采取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①的建议。经过对孟获的“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诚心降服。南中全部平定。诸葛亮对南中实行羁縻政策，撤出外地人，任用本地或本民族的首领为地方官，以使“夷汉粗安”；任孟获为蜀的御史中丞，监察朝廷官吏；民族关系有所改善，南中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诸葛亮注意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那里推广汉族先进技术。诸葛亮的南征及其南中政策，虽有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客观上有利于打破闭塞状况，加强了夷汉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南中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了西南地区的和平局面，并促进了民族融合。

东联孙吴 彝陵之战，吴蜀联盟一度破裂。但客观形势要求吴蜀联盟必须立即恢复，才能共拒曹魏。刘备死后，诸葛亮派邓芝使吴。孙吴这时也必须联蜀，因之与蜀联合。自此，双方聘使常相往来，并互致物品，吴蜀复归和好。

北伐曹魏 南中的平定，不仅消除了蜀的后顾之忧，还为出征曹魏，提供了一定的人力物力。随着东联孙吴的成功，为诸葛亮北伐曹魏创造了条件。

诸葛亮先后六次出兵，北伐曹魏。228年，第一次出兵祁山（今甘肃西和县祁山堡），关中大震。由于前锋马谡违背节制，败于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蜀兵退还。后又进行了五次北伐，虽不无小胜，但多劳而无功。公元234年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中，因积劳成疾，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军中逝世。从此，蜀逐渐衰落。衡量蜀魏力量，蜀汉远不及曹魏。可是诸葛亮不计成败，连年用兵。究其原因，一是蜀汉始终以复兴汉室为职责，在“王业不偏安”的思想指导下，连年劳师远征，出兵讨魏。二

---

①《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

是魏蜀力量对比悬殊，蜀不攻魏，魏也要出兵攻蜀，与其坐待败亡，不如先发制人，力战求存，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方针。但是志大力小，难以成功，只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死后，姜维等人虽继续北伐，力不从心，也以失败告终。

五、孙吴对江南的开发

江南的进一步开发 江南地区，早在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已有一定的发展。到孙吴时，更有了新的发展。其一，军阀混战，大量中原人民避祸南迁，同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其二，吴国境内大量的山越人，居住深山，不仅拒服兵役徭役，且时出劫掠，成为吴国一大隐患。孙权掌握政权后，对山越人一面进行掠夺性征战，一面又招劝抚慰。在两、三年之间，约有10万多人被迫陆续迁出大山，吴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虽然山越人从此陷入被奴役的地位，但他们的出山及其与汉人广泛地杂居，不仅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和汉人一道，为开发江南作出了贡献。其三，孙权集团为巩固政权，关心经济的发展。他们在长江沿岸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江南土地因此得到大量开垦。那时不只吴的农业发展快，手工业也发展很快。金属冶炼业非常发达，煮盐业、纺织业、制瓷业的产量品种都有所增加。战争和水上交通事业促进了吴造船业发展，东吴的水师在三国中可算是首屈一指，有战船5000多艘，大船上下5层，非常壮观，可载3000多人。海船大者长20丈，高出水面两、三丈，远望如同楼阁。随着造船业的进步，航海的规模也很大，东南海中的夷洲（今台湾），早在东汉前就与大陆有贸易往来。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海巡视，到

---

①《三国志·陆逊传》。

达夷洲。这是古代典籍中大陆人民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从此以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越加密切了。

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孙吴政权是在南方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既没能象曹魏那样对豪强加以限制，也没能象蜀汉那样严明法令，抑制豪强势力，而是极力优待他们。随着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江南豪族的经济、政治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了，他们的特权得到了吴政府的充分保障。他们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掌握了大批土地，大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吴实行了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所谓世袭领兵制，就是由政府赐予将帅们，或由将帅们自己招募一定数量的兵员，国家承认其为世袭的私人部曲。孙吴将帅死后，大都是子弟继领父兄兵马。如朱桓死后，其子代领父兵。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领逊众5000人。所谓赐田复客制，就是国家将若干编户、屯田户赐予功臣、将帅。如：吕蒙被赐予屯田客600户，吕蒙死，其子袭爵，又被赐予"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① 蒋钦死，"以芜湖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② 这些赐户不再向国家负担赋役。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使江南豪强的经济、政治势力急剧的膨胀起来。江南大量土地和人口被豪强分割。所以大地主田庄也就为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助长了南方世族门阀势力的形成。由于江南豪强势力进一步发展，使担负繁重租税徭役的农民，生活更加悲惨，"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③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屡屡发生。终于在各种矛盾结集下，结束了孙吴的割据政权。

---

①《三国志·吕蒙传》。
②《三国志·蒋钦传》。
③《三国志·骆统传》。

第二节　西晋的短期统一

一、西晋统一中国

司马氏灭蜀代魏　三国鼎立局面持续了50多年，随着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国力量日益强大，三国均势已不能维持，统一时机逐步成熟。司马懿是一个智多谋广的战略家。他在对蜀吴的征战中，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军权，在政治上的威信也提高了。239年曹睿临死，命其和曹爽协力辅助他的儿子曹芳。司马懿又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内政大权。公元249年，他发动政变，铲除曹爽及其党羽，自为丞相，实际上已成了曹魏的独裁者。251年，司马懿病死，其长子司马师继位。254年，司马师废曹芳，另立年幼的曹髦为帝。255年，他又相继镇压了反对他的曹氏旧臣毌丘俭、文钦等人。不久，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承袭其位。公元257年，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昭，司马昭发兵击杀了诸葛诞。回军后，魏帝封司马昭为晋公。司马昭的权势，由此更大。军政大权，进退百官，都由他掌握。魏帝曹髦，不胜愤慨。公元260年，他对大臣王沈、王经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①他率宫中卫士僮仆数百人，前往攻打司马昭，结果被杀。司马昭为掩人耳目，又另立曹操之孙曹奂为帝，朝中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蜀汉后期，因姜维屡次对魏用兵，国力削弱；宦官黄皓等人得宠用事，政治日益腐败；蜀汉初期的文臣武将大多死去，人才缺乏；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时起反抗。司马昭也看到蜀汉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②公元263年，司马昭

①《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
②《资治通鉴》卷78，魏纪10，元帝咸熙元年。

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等率大军10多万，数路伐蜀，直趋成都。刘禅率臣下降魏，蜀汉灭亡。灭蜀第二年，司马昭晋封为晋王。正当他准备夺取帝位时，公元265年病死。其子司马炎继立为晋王，当年年底，代魏称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西晋灭吴统一中国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整顿军备，修治弊政，积极做灭吴的准备工作。

吴国自公元252年孙权死后，政治日益黑暗腐败。宗室和大臣之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在孙皓统治时期，政治更加昏暗。他专用一批黄门郎寻找大臣的过错，如每次宴饮群臣，必令他们喝得烂醉，群臣醉后忘情，未免失礼，孙皓就令黄门郎牵出，或剥面皮，或凿眼睛，甚至锯头，大臣、宗室几乎被杀光。他暴戾恣睢，淫侈无度，甚至下令禁止百姓结婚。由于人民受压过重，起义不断发生。孙吴政权已在摇摇欲坠之中。

蜀汉亡后，吴国失去了长江上游的屏障。为了加强对长江上游的防守，吴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江南人民为统治者溯江供应财物，劳苦异常，阶级矛盾加剧。当时有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①孙皓为保其皇位，不得不还都建业。从此，上游的防御更加松弛了。

公元279年，晋武帝派杜预、王濬等发兵20万，六路进攻吴国，吴军傲惰，不战自溃，许多吴将望风投降。公元280年，晋军攻下建业，孙皓身面涂泥，自缚，抬着棺材，投降了晋武帝。至此，三国分裂局面结束，全国复归统一。

二、西晋的政治和经济

占田制 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到曹魏后期遭到破坏，许多

---

①《三国志·陆凯传》。

屯田被豪强据为私有。屯田客身份比编户低，所受剥削又不断加重，屯田客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低落。因此，司马昭在264年，曾决定“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①西晋建立后，266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②废除屯田制度，大量的屯田客转化为国家的编户农民。

屯田制废除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整齐划一编户齐民和原屯田客的赋税负担，便于封建政府统治和管理；为了使逃亡隐匿的人口回到荒芜的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也企图稍稍限制豪强地主、官僚占田数量。于是，公元280年西晋颁布了占田制，这是西晋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占田课田、户调和品官占田荫亲荫客制。

（一）占田课田：民丁占田包括占田和户调两个内容。民户占有的土地分为占田和课田。规定男子1人可占田70亩，女子1人可占田30亩。其中丁男（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课田50亩，丁女课田20亩，次丁男（13岁至15岁、61至65岁为次丁）课田20亩，次丁女和老小没有课田。所谓占田，是指农民按人口可占有的土地数额法定指标，国家并不给予授田的保证，因此没有实际意义。占田无年龄之分，意在鼓励人民多开荒。课田则是政府对农民督课的耕田数量，不管农民是否占有规定的亩数，甚至是否耕种着达到课田数目的土地，都必须按课田标准向政府交纳租税。

（二）户调：调就是户税，户调就是按户纳税。占田制除田租之外，还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输绢3匹、绵3斤作户调；丁女或次丁男当户者，户调减半。诸边郡纳2/3，远郡纳1/3。少数民族每户纳赍布3匹，边远地区纳1丈。

---

①《三国志·陈留王纪》。
②《晋书·武帝纪》。

（三）品官占田荫亲荫客制。它是西晋政府保障贵族官僚按品级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的特权制度。它规定：一品官占田50顷，以后每差一品，减田5顷，到九品占田10顷。还“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①又可荫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荫衣食客3人，七品、八品2人，九品荫1人。第一品和二品可占佃客50户，第三品10户，第四品7户，第五品5户，第六品3户，第七品2户，第八、九品1户。被荫的人户不在官府登记户籍，变为私家佃客，不再向国家承担租税和徭役，而成为品官、高门士族的依附人口，受其剥削、奴役。

西晋的占田制，是一种加重对人民压榨和保证官僚、士族特权的经济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剥削率超过曹魏，曹魏时自耕农田租每亩为4升，西晋则为8升，超出1倍；曹魏户调每户绢2匹，绵2斤，而西晋则为绢3匹，绵3斤，超一半。曹魏的田租按亩计算，而西晋却是每丁按固定的田亩计算，但每丁能否达到规定数字的占田，国家并不考虑。官吏、士族贵族按品位占田，荫亲荫客，品位愈高者愈多，他们还可以免除租税和赋役负担。

占田制颁布初期，对于鼓励人民垦荒，扩大耕地面积，起了促进作用；当时官吏占田数字尚有限制，因而对社会生产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农民占田无保证，剥削量又重，广大人民仍十分贫困。随着西晋统治的腐朽，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社会上无衣无食的流民日益增多。正如《晋书》所载：“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

门阀制度的形成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它萌芽于东汉，形成于魏晋，鼎盛于东晋，衰弱于南朝。其特点是按门第等级来区别地主阶级内部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不同地

①《晋书·食货志》。

位。门阀士族在各方面都有特权。士族又称世族、势族、望族、高门等，它与一般地主（庶族）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是历史渊源长久的世家门第；有显著的郡望（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有谱牒为根据；垄断着地方和中央的政权，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贵族特权阶层。不能把当时属于土豪一类的地主看成门阀士族，门阀士族是有势力的豪族，但豪族不一定是门阀，也不能单纯地以占有土地的多寡来区别士族与庶族，士族中也有土地比庶族少者。门阀制度不仅标志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别，而且还标志着统治阶级中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别。

门阀士族的出现，是东汉豪强地主世家势力及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结果。东汉世族地主，在经济上是“田亩连于方国，”“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在政治上是“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甚至出现“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他们还事实上享有免除赋税、察举官吏等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随着他们势力的发展，魏晋之际，又把这些特权作了法律上的肯定。魏行九品中正制，后来九品中正制实质上变成了依据门第高低的“门选”；再加上租牛客户制，领兵复客制；晋的品官占田、荫亲荫客制等，由于这一系列保护门阀士族特权利益的作法，门阀世族制度终于得到形成和发展。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无特权的庶族保存着严格的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显望重的高官，不受资历限制，升迁很快，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的局面，等于权力世袭，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经济上按品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不与庶族（又称寒门）地主通婚和同乘共坐。庶族地主

①《晋书·刘毅传》。
②《晋书·王沈传》。

要做官、免役，就须通过行贿、请托依附于他们，否则便一生沉滞，得不到晋升，发出“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钱），不异藏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①的感叹。总之，门阀制度确立后的地主政权，主要是士族集团的专政。门阀制度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治集团的腐朽 西晋门阀士族集团，享有种种特权，他们朋比为奸，贪暴恣睢，胡作非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在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

晋武帝司马炎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搜刮。公元273年，他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少女入宫。其后他又下诏天下禁断婚姻，强选民女5000人入宫，一时稍有姿色的少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②灭吴后，又收吴宫美女5000人，日夜沉醉在声色宴乐之中。他每天乘着羊拉的辇车，任羊在宫中信步走去，拉到那里就在那里宴饮和寝宿。晋武帝奢侈荒淫，大臣、士族群起效法，一个个贪婪无比，甚至公开抢劫，他们既视钱如命，又以奢侈为荣。石崇作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③太傅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其子何劭更奢侈，“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两万为限”。④外戚王济用人乳喂小猪，蒸食之。晋武帝支持其舅王恺与石崇斗富，王恺用米酒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做成40里步障，石崇就作锦布障50里以敌之；石崇用香椒泥涂屋，王恺泥墙则用赤石脂；王恺拿出晋武帝赐给他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故意用铁如意将它打碎，王恺正要发怒，石崇则命人取出自己的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让王恺挑选，结果王恺甘

①《晋书·鲁褒传》。

②《晋书·武元杨皇后传》。

③《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

④《晋书·何曾传》。

拜下风。

这些人不仅挥金如土，而且还拥有大量奴婢，视奴婢生命如儿戏。石崇每次请客，必令美女劝酒，客人饮酒不尽，就把美女当场杀死，有些刁恶豪客，故意不饮，看他杀人，有一次竟连杀3人，以示豪气。

西晋统治集团的贪奢淫逸，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痛苦，加剧了阶级矛盾。一些正直的大臣，已预见到隐伏的亡国危机，傅咸就上书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①

三、八王之乱

分封宗室 司马炎称帝后，鉴于曹魏宗室诸王有名无实，王室孤立，很快灭亡的教训。他接受了刘颂等人的"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②的主张，实行分封宗室的政策。分封了27个同姓王，皆以郡为国。各封国内皆可自选文武官吏，继而又允许自置军队，以藩王为都督，镇守长安等军事重镇，以代替异姓将帅的势力。各封国的藩王，既掌握军权，又掌握财权民政，还有一群党徒。藩王在中央任职者，军政大权也由其直接掌握。这样他们成了既能割据一方，又能控制中央朝政的势力。随着藩王势力日重，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就种下了西晋王朝内部分裂的祸根。

八王之乱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死，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他在华林园听到虾蟆叫，询问左右，虾蟆叫是为公，还是为私？天下荒乱，百姓饿死，他竟说，为什么不吃肉糜！其痴可想而知。惠帝即位，由其外公杨骏辅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勾结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挟惠帝下诏，于公元291年杀了独揽大权的杨骏，逼死杨太后。随后贾

①《晋书·傅玄传》附傅咸传。

②《晋书·刘颂传》。

后又相继除掉司马亮和司马玮，自己独揽大权。公元300年，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起兵杀掉贾后，301年废惠帝自立。激起了宗室的不满，齐王司马冏（jiong窘）、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ong）联合起兵攻赵王伦，伦兵败被杀。后来河间王司马颙又联合长沙王司马乂，对司马冏发动进攻。齐王冏兵败被杀，长沙王乂掌握了政权。303年，司马颙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司马乂，打败了司马越，控制了中央权力。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再次起兵攻打司马颙。司马颙联合司马颖反击，结果战败逃走。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又接回洛阳。同时司马颖、司马颙先后被司马越的势力杀死。后来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司马越独掌晋朝大权。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力而发生的一场内乱斗争。诸王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数十万人死于战祸，许多城镇被焚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流民出现。诸王互相残杀，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为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下，西晋终于走上灭亡的道路。

四、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与西晋的灭亡

西北各族的内迁 西晋时期，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各族居住布局比两汉时有了新的变化。从东汉以来，由于汉族地主为加强对各族的统治和补充内地劳动力的不足，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常进行军事征服、招诱；同时，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西北各族对中原经济文化的向往；到魏晋时朝，西北各少数民族大批向内地迁徙。当时内迁的各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史称"五胡"。大量少数民族内迁的结果，不仅是沿边"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就是汉族文化中心的

关中，也出现了“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的局面。这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新发展，它有利于内迁各族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

匈奴族：东汉初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5000余人在并州以北居住。东汉末年，尤其在军阀混战时期，匈奴族逐渐向南移动，曹操将并州等地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5部，以其贵族为5部帅，派汉人为5部司马，进行监督。西晋时，晋武帝改5部帅为5部都尉，左部居太原郡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居祁（今山西祁县），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在这前后有塞外匈奴人数10万先后内迁，分布在今山西、陕西、甘肃及内蒙南部。

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东汉中后期，逐渐内迁到蒙古等地，并开始陆续内迁。西晋初，形成互不统属的几部。迁居于辽西，今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及青海等地，其中拓跋部迁至代郡、定襄、云中及其以北一线（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内迁的鲜卑族在十六国和北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羯族：原是中亚细亚人。羯人高鼻、深目、多须，信仰波斯的祆（xian）教。东迁后，一部分人随匈奴人内迁，故被称为“匈奴别部”，散布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武乡、榆社）及太行山一带。

氐族：居住于我国西部的陇蜀一带，曹魏时东迁。到西晋初，氐族主要分布于扶风（今陕西泾阳）、始平（今陕西兴平）、京兆（今陕西西安）等地，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多懂汉语，其姓氏也同于汉人，如苻坚8岁从师学汉文化，后来，他统治黄河流域，对儒学、佛学等都予以提倡。

羌族：东汉时散居在今陕西、甘肃各地，与汉人杂居，以农

---

①《晋书·江统传》。

耕为主，后逐渐集中至陕西，到西晋时，关中一带居住着大量的羌人。

各族内迁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对内迁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强迫他们纳租调、服力役，充当佃客，当兵打仗。如“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奴客，多者数千”。①还掠卖胡人为奴隶，并州刺史司马腾派兵大捉胡人，“两胡一枷”，羯族小贵族石勒也在掠卖之列。少数民族对汉族地主的敌忾，达到了“怨恨之气，毒于骨髓”②的程度，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种情况使西晋统治阶级感到忧虑和恐惧。因此郭钦、江统等人根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提出“徙戎”的主张。强令他们“各附本种，反其旧土”。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偏见。因西晋统治者需要将少数民族充作劳动人手、奴役对象和兵源；加之胡人久居内地，难于骤迁；同时，“徙戎”又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阻碍了民族融合的步伐，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徙戎”的主张一直未能实行。

“徙戎”主张既不能实行，又别无妥当措施。而统治者的剥削又日益加重，于是各族人民酝酿已久的反抗斗争，终于爆发了。

各族人民起义 西晋惠帝永嘉时期（公元307—312年），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北等省遭受严重蝗灾，“草木及牛马毛皆尽”。③又继之瘟疫流行，人民多卖妻鬻子和自卖为奴，或游食远方。山西最为严重，存留本乡的汉人不满两万户。加之统治集团又对各族人民压榨和屠杀，出现了“流尸满河，白骨蔽野”④的悲惨情景。西晋末年倍受摧残的农民，就由流徙斗争转变为武装

①《晋书·王恂传》。
②《晋书·江统传》。
③④《晋书·食货志》。

起义了。这时期起义主要有：

李特起义：西晋末年，战乱和饥荒迫使略阳、天水、扶风等6郡饥民，经汉中流入四川就食，巴氐族首领李特亦随流民入川。这些流民与巴蜀地主发生了矛盾。西晋政府派罗尚为益州刺史，并派兵迫令流民限期还乡，流民因要待秋后雨止，积些路费再走，故李特等人再三乞留缓期，罗尚不许，并派兵攻打李特。公元301年，李特被迫率领愤怒的流民，在绵竹起义。这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军屡败官军，攻下广汉（今四川广汉），李特自称益州牧，与蜀人"约法三章"，受到百姓拥护。后来，李特攻成都不克，兵败牺牲。其子李雄继续领导斗争。李雄率军击败罗尚，攻克成都，公元304年，自称成都王，306年，李雄称帝，国号"大成"，都成都。农民政权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地方政权。李雄死后，李特侄李寿继位，改国号为汉，历史上又叫成汉。成汉统治蜀地40多年，直到347年东晋桓温率兵入蜀，成汉灭亡。

公元303年，义阳"蛮"人张昌领导流民在江夏郡安陆（今湖北安陆）起义；公元310年，王如领导关中一带流民在汉沔流域起义；公元311年，杜弢领导流民在荆湘等地起义。

上述反晋斗争，主力都是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的流民，所以就其性质说，是流民起义。这次各族人民的联合反晋斗争时间长、人数多。参加斗争者成分较为复杂，虽绝大多数是流民，但也有一些失意的官吏和无权势的地主、贵族参加，并成为领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斗争中动摇或乘机夺取政权，削弱了起义力量。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给西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崩溃。

西晋的灭亡　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使西晋统治摇摇欲坠，这时，北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等起兵最早。

刘渊出身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匈奴贵族，是500年前冒顿单于的后裔。由于汉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并相约为兄弟，因而内迁的匈奴族认为是汉朝的宗室，故而改为刘姓。刘渊是内迁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当各族人民反晋斗争蜂起，晋皇室诸王混战之际，匈奴贵族认为"复邦兴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共推刘渊为大单于，准备起事，公元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开始起兵。并州一带胡汉人民身受西晋之苦，纷纷响应，不到20天，聚众5万，刘渊称汉王，都于左国城。刘渊起兵的目的是想做中原的皇帝，但他担心"晋人未必同我"，所以打起了"尊汉"旗号，以争取汉人。这时，山东、河北许多地主、贵族，如王弥、石勒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带兵相投。刘渊攻城略地，连克太原、上党、平阳等郡。公元308年，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国号汉。公元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刘和继位。公元311年，羯族起义首领石勒在苦县（今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了太尉王衍率领的10余万晋军主力，晋军元气大伤。同年刘聪派刘曜、王弥等率兵攻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杀"百官士庶"3万余人，洛阳化为灰烬。晋在关中的官僚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都于长安，是为愍帝。316年刘曜率军围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共传3代4帝，历时52年。

重要名词：

军阀混战　曹操　屯田制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九品中正制　户调制　门阀政治　卫温　八王之乱　流民起义

思考题：

1. 试述三国时期的著名战役及其历史意义。

2．试分析曹操统一北方的原因。

3．如何评价诸葛亮?

4．分析门阀世族形成的历史条件。

5．西晋占田制的内容和特点有哪些?

6．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原因和特点是什么?

第六章 十六国和东晋

（公元304—439年；公元317—4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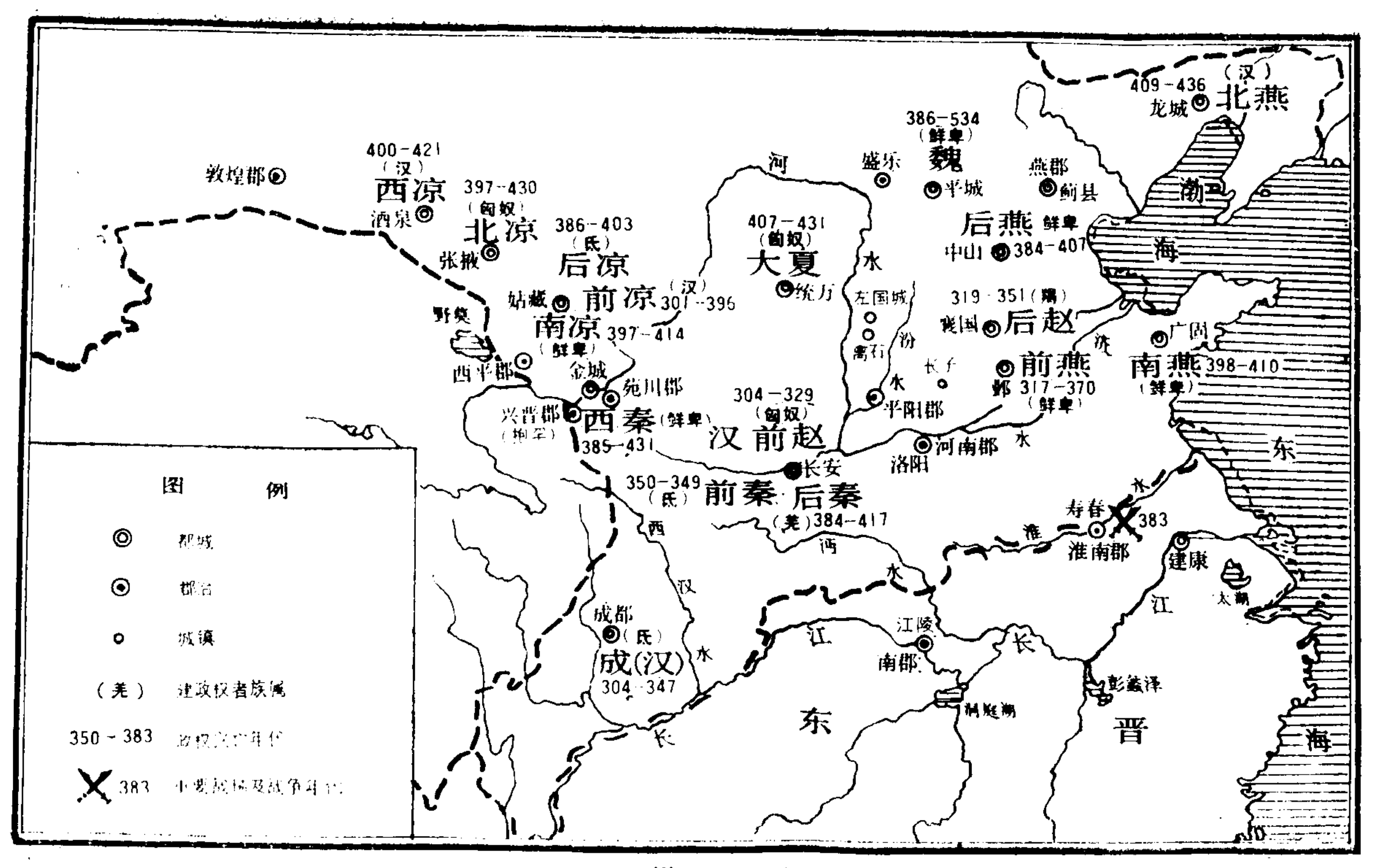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北方各族的割据政权

一、十六国时期的混战

十六国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北方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从刘渊建立汉国到北魏统一北方（公元304年—439年）的130多年间，各族贵族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十六国时期。①这十六国是：一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一夏。这十六国政权是由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所建立，故称"五胡十六国"。②实际上除"五胡"外，还有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还有代国、冉魏、西燕等。十六国时期的历史，以秦、晋淝水之战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① "十六国"由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而得名。
② "胡"是古代汉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五胡"含有民族歧视的色彩。


北燕
(汉)
409–436
龙城
魏
(鲜卑)
386–534
平城
盛乐
燕郡
蓟县
后燕
鲜卑
中山
384–407
渤海
西凉
(汉)
400–421
酒泉
敦煌郡
北凉
(匈奴)
397–430
张掖
后凉
(氐)
386–403
前凉
(汉)
301–396
姑臧
南凉
(鲜卑)
397–414
西平郡
金城
苑川郡
西秦
(鲜卑)
385–431
兴晋郡
大夏
(匈奴)
407–431
统万
汉 前赵
(匈奴)
304–329
后赵
(羯)
319–351
襄国
前燕
(鲜卑)
317–370
邺
南燕
(鲜卑)
398–410
广固
左国城
离石
长子
平阳郡
河南郡
洛阳
长安
前秦
(氐)
350–349
后秦
(羌)384–417
成(汉)
(氐)
304–347
成都
寿春
淮南郡
383
建康
太湖
江陵
南郡
洞庭湖
彭蠡泽
东晋
东海
河
水
汾
济
淮
渭
西汉水
长江
图例
(羌) 建政权者族属
350–383

五胡十六国图

匈奴汉国的统治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国，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这是北方最先出现的割据政权。公元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即帝位。刘聪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一是按“户”（户口）统治汉人，设置左、右司隶，各领20余万户，每1万户置一内史，共统治40多万户汉人；一是按“落”（部落）统治“胡人”（包括匈奴人在内），设置单于左右辅，每辅统治“六夷”①10万落，每一万落置一都尉，共统治20余万落的少数民族人民。实行胡汉分治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匈奴贵族，控制和利用其他胡人贵族，对汉族和各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

刘聪做皇帝，专事享乐，沉溺酒色，大修宫殿，穷兵黩武，浪费极大的民力和财力。匈奴贵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排斥，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各族人民不堪忍受残暴的统治而大量反抗逃亡。都城平阳“流叛死亡，十有五、六”，②汉国统治基础极不稳固。

前赵、后赵 刘聪死后，大臣靳准发动政变，尽诛聪子孙。一些官吏逃出平阳，拥立坐镇长安的刘曜（刘渊侄）为帝。公元318年，刘曜派兵族灭靳氏，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19年，原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也称赵王，史称后赵。

前赵建国后，对氐、羌、巴氐、羯等族进行了长期的征服战争，并强迫被征服的各族人民30余万迁到长安，以加强控制。仍然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注意选拔汉族地主做官，采用封建租赋制度，传习汉族文化，使其统治勉强稳定下来。

后赵建立者石勒，由于受过汉族官吏的残酷压迫，所以在起兵初期，捉住汉族2千石以上的官吏往往全部杀死，在战争中还

---

①“六夷”指匈奴、羯、鲜卑、羌、氐、巴蛮。

②《晋书·前赵·刘聪载记》。

大量屠杀汉族的降卒和人民。当时，各地的地主豪强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建立坞堡，即设防的地主庄园。大量汉族人民投靠坞堡，以躲避战乱，反抗“胡”人贵族的屠杀和掠夺。汉人的抵抗给石勒造成极大的困难，迫使他不得不改变滥肆杀掠的政策。后来他攻降了许多坞堡，把一些坞主封为将军、都尉，扩大了军力。

后赵政权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称为“国人”，以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禁卫军作支柱，胡人的诉讼设专官管理，他人不得干涉。对汉族地主，逐渐由屠杀转向笼络和利用，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张宾总掌朝政，修改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为汉族地主参政广开门路。制定租调制度，核实户口，奖励农业生产，大力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尊崇佛教，以此做为思想统治的工具。

后赵对前赵及各地割据政权攻战频繁，公元 328 年，石勒攻占洛阳，刘曜战败被杀。不久，石勒攻入关中，公元329年灭前赵。公元 330 年，石勒称帝，后赵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以淮水襄樊为界，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333年石勒死，子石弘继位。公元335年，石勒侄石虎杀石弘，自立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石虎极端残暴荒淫，他征调40多万人建宫殿40余座，抢夺民女 3 万人置于后宫。又连续发动对东晋、前秦、前凉的战争，强迫成百万的农民当兵，规定每户有 3 个壮丁的出 2 人，有 5 个壮丁的出 3 人，士兵要自备粮、绢、车、牛，违者处斩，因此百姓被迫自杀的极多。石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

公元348年，石虎诸子争夺皇位互相残杀，太子石宣杀石韬，石虎杀石宣，又把东宫卫士10余万人发配凉州，其中 1 万多人行至雍(今陕西凤翔)，推举梁犊为首领发动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攻占长安、洛阳、荥阳等地，后赵军连战皆败。公元349年，石虎动用氐、羌兵力把起义镇压下去，但石虎也因惊悸而病死。

冉魏和前燕 公元350年，石虎养孙汉人冉闵乘石虎死后子孙混战的机会，夺取了后赵政权，建立魏国，史称冉魏，仍都于邺。冉闵利用汉族人民对羯族统治者的仇恨，下令大杀羯人，不分贵贱和男女老少，共杀20余万人，激化了民族矛盾。石虎庶子石祗据襄国称帝，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投奔。石祗联合鲜卑族慕容儁、羌族姚弋仲夹击冉闵。公元351年，后赵的刘显杀石祗，投降冉魏，后赵亡。公元352年，慕容儁杀冉闵，冉魏灭亡。

前燕的建立者是鲜卑族的慕容氏。公元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建立了前燕。公元342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按照魏晋制度实行屯田，重视传习汉族文化，注意发展文化教育，加速了慕容部的汉化进程。公元348年慕容皝死，第二子慕容儁继位。公元349年，攻后赵，夺得幽州，遂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慕容儁灭冉魏后，自称皇帝，5年后又迁都于邺。

前燕占据了北方东部的广大地区，而北方西部又分裂为四个政权：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占据今陕西省；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占据今甘肃东南部；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占据今甘肃西北部；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代，占据今内蒙西部及山西北部。北方又成为五个政权并立的分裂局面。

前秦统一北方 氐族的首领苻洪是前秦的建立者，公元349年自称三秦王，据关中地区，次年死。子苻健继位，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秦，建都长安，史称前秦。苻健死后，子苻生继位，苻生极端残暴，公元357年为苻坚所杀。

苻坚重视人才和法制，重用出身寒微的汉人王猛改革内政，严厉打击氐族豪强樊世等20余人，使其改革措施得以推行，加强了中央集权；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关中水利，奖励开荒，发展交通运输；广立学校，提倡儒学，移风易俗。这些政策的推行，加强了前秦的统治力量，使关中地区的经济文化呈现了十六国以来少有的复兴景象。史载前秦“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

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①政治经济的进步，为前秦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

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公元376年灭前凉和代，不久，又夺取了东晋的益州，控制了西域，至此，前秦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当时，东北的肃慎与新罗，西北的于阗、大宛、康居、天竺等62国，都派使臣向前秦贡献方物，建立了友好关系。②

前秦统一了北方，疆域辽阔，具有一定的实力。但是，由于统一的时间短，民族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前秦的政权并不稳固。王猛在临终前，建议苻坚首先要巩固在北方的统治，不要急于南下伐晋。可是苻坚日益骄矜，听不进劝阻的意见。383年，调集了87万大军进攻东晋，企图一举统一中国。淝水一战，前秦惨败。原来归附他的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385年，羌族首领杀了苻坚，北方又陷于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而东晋乘胜收复了黄河以南的许多失地，进一步稳定了在江南的统治。

二、淝水之战后的北方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衰竭，北方又陷于分裂。从公元384年到公元439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又先后建立了12个政权，分布在关东、关中与河西走廊地区。

关东地区有：鲜卑族慕容垂建立的后燕、慕容冲建立的西燕、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这个地区原是汉族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先后进入这一地区的各少数族人民受汉族的影响，封建化进程较快，社会生产还有所发展。

关中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也比较激烈，先后有：羌

①《晋书·苻坚载记》。
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5。

族姚苌建立的后秦、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

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更加复杂，先后有：鲜卑族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

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的120多年间，北方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和汉人所建立的23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实际上是7族23国。这个时期，各个政权间不断地进行兼并和混战，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社会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但由于内迁各族与汉族人民长期杂居相处，在经济文化上互相接触，民族界限逐渐缩小，从而为北方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东晋

一、“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建立　西晋八王之乱后，掌握军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于公元307年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江南扬、江、湘、交、广军事。司马睿在琅邪（今山东临沂）大族王导等人偕同下，由下邳移镇建业（今江苏南京）。公元316年，匈奴汉国大将刘曜攻占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建康①称晋王。公元31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

“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素无重望，他立足江南并取得帝位，主要依靠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南土著士族的支持，其中，王导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

①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

六七。"①王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司马睿采纳王导的建议，以渤海刁协、颍川庾亮等百余人为掾属，称为"百六掾"。这些北方士族大地主，为了立足南方并继续保持其当权地位，就积极拥护和支持南渡的司马睿政权。仅有北方南迁士族的合作还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江南土著士族的支持。而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士族地主，早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司马睿初到江南，他们的态度很冷淡。王导尽力笼络南方士族，协调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竭力保护江南土著士族的封建利益，请江南大族顾荣、贺循、纪瞻等出来做官，在这些士族的带动下，江南土著士族纷纷出来拥护司马睿。同时，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置侨州、郡、县，安置北方迁来的士族和民众，保障南迁世家豪族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样，司马睿终于取得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

由于士族已经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并且又掌握兵权，出现"主弱臣强"的局面。东晋政权实际上为南北士族所把持，形成了皇权与士族结合的门阀政治。王导不但把100多有名望的北方士族辟为属官，而且又以丞相之尊，安排王氏家族20多人在京任职，王导的堂兄王敦为大将军、荆州刺史，掌握重兵。所以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以致司马睿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佯作恣态，让王导"升御床共坐"，时称"王与马，共天下"。②

王氏以后，依次出现了庾、桓、谢等大族掌权的形势，所以，整个东晋一代，可说是士族垄断政权的格局，它是西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

士族内讧　东晋门阀士族阶层的内部，矛盾尖锐复杂。在士族中有南、北之分，北方士族垄断政治，南方士族经常受到排

---

①②《晋书·王导传》。

斥；在北方士族中又有渡江早、晚之分，渡江晚的北方士族往往受到歧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较低，于是士族之间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火并，相互攻杀的事件层出不穷，皇帝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已。史载“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① 可见东晋政治是极不稳定的。

周玘、王敦与苏峻之乱 南方义兴郡（今江苏宜兴县）大族周玘，因受北方士族排斥，准备发动兵变，事泄，周玘忧愤而死。其子周勰纠集江东的豪强大族，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反司马睿失败。司马睿怕激起南方士族的敌视，没有深究，但是周勰后来还是被王敦所灭。

晋元帝以王氏兄弟权势太盛，重用刁协、刘隗、周顗、戴渊等参赞军政大事。公元322年，王敦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周顗、戴渊等，晋元帝忧愤而死。王敦退回武昌后，加紧谋划篡夺司马氏政权。公元 324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下令讨伐王敦。王敦让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兵3万再次进攻建康，不久，王敦病死，王含兵败被杀。

王敦叛乱平息之后，公元327年又发生了苏峻之乱。苏峻，长广掖县(今山东掖县)人，西晋末年，纠合数千家结垒自守，后率众南渡，仕东晋。因平定王敦叛乱有功而骄横，为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②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马衍（成帝）继位，年幼，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庾亮想解除苏峻的兵权，调峻为大司农。苏峻便以讨庾亮为名，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于公元328年攻破建康，纵兵大掠，废黜百官，专擅朝政。庾亮遁逃在外，依靠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的联军，于元公 329 年打败苏峻，收复了建康，东晋政权才暂时安定下来。

---

①《晋书·姚兴载记》。

②《晋书·苏峻传》。

二、东晋的北伐

东晋曾几次北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祖逖和桓温领导的北伐活动。

祖逖北伐 祖逖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的大士族，他年轻时与好友刘琨一起立志报效国家，每天拂晓“闻鸡起舞”，苦练杀敌本领。公元311年洛阳被刘曜攻占后，他带领宗族、部曲数百家南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他认为北方民心可用，北伐有希望成功，在东晋建国前，他就向司马睿请求率兵北伐，司马睿正忙于建立东晋偏安政权，根本无意北伐，只给他豫州刺史的空衔和1000人的粮饷，3000匹布，让祖逖自己召募军队和制造兵器。

公元313年，祖逖率领自己原来的部曲数百家北上，渡江时，他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①他在淮阴铸造兵器，召募士兵。在谯城（今安徽亳县）、雍丘（今河南杞县）一带，一面屯田，一面作战。祖逖勤劳节俭，不蓄私产，与将士同甘苦，军纪严明，深得北方人民的支持。他又团结各地坞堡主和民间武装力量，连破后赵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正当祖逖积极准备向河北进军时，王敦之乱行将爆发，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派南方豪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坐镇合肥，以防御王敦并处处节制祖逖。祖逖知北伐难成，忧愤成疾，公元321年病死于雍丘。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占河南，晋军被迫退到淮南，祖逖北伐的成果完全丧失。

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公元345年任荆州刺史，继庾氏掌握长江上游兵权。347年率军入蜀，灭李氏的汉国（即原来的成国），声望很高。桓温北伐先后共三次。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率步骑4万，击败前秦军队，驻军长安城东的灞上。关中人民争持牛酒相迎，有的老人流着眼泪

①《晋书·祖逖传》。

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①后因前秦芟苗清野，晋军乏食，被迫退军；公元356年，第二次北伐，击败羌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多次请求东晋政府还都洛阳，但由于南渡的世家大族在江南产业已丰，无心北归，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②纷纷反对。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又被前燕攻占。公元369年，第三次北伐，桓温统率步骑5万，击败前燕军队，进军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但因孤军深入，粮道被断，在退兵的途中遭前燕袭击，晋军死伤3万多人。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符合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东晋统治者的牵制和阻挠，都以失败而告终。

三、淝水之战

北府兵的建立 桓温北伐失败后，专擅朝政，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在位2年死，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公元373年，桓温病死，谢安执政。谢安是继王导之后较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坚持"戮力王室，克服神州"③的方针，极力加强中央权力，保持内部安定，深得朝野的拥护。是时，前秦占领了益州，威胁东晋的安全。谢安封桓温子桓玄为南郡公，任命桓冲（桓温弟）为荆州刺史，桓冲把扬州让给谢安，自己专镇上游，防御前秦。谢安又任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让他在长江下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召募士兵，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因晋人称京口为北府，所以这支军队称"北府兵"。北府兵虽然只有10万人，但士兵主要来自徐、兖的北方流民，他们对北方少数民

①《晋书·桓温传》。
②《晋书·孙绰传》。
③《晋书·谢安传》。

族贵族的仇杀欺凌怀有极大的愤恨，有抵御前秦、保卫江南的决心，因此战斗力很强。

淝水之战 淝水战前，前秦用了1年时间才攻下东晋的襄阳、彭城两大军事重镇，秦军“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①公元382年10月，苻坚召集群臣商议伐晋之事，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东晋“君臣和睦，上下同心”，不可轻举妄动。但是苻坚却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统一了北方，有“强兵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②东晋乃“垂亡之国”，战则必克。他甚至连东晋皇帝、宰相在被俘虏后的官号、住宅都安排了。

公元383年7月，苻坚下诏大举伐晋，8月苻坚从长安启程，秦军步兵60万，骑兵27万，号称百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从各地一齐向南进发。前锋苻融率25万人首先到达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又分兵5万屯住洛涧（今安徽怀远）。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任命谢安为征讨大将军，全面指挥战争。谢安沉着冷静，派弟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职务，指挥前线军队，派侄谢玄为前锋都督，共率北府兵8万人迎击前秦军队。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千夜袭洛涧成功，歼灭秦军1万5千人。晋军乘胜前进，直抵淝水东岸与秦军隔岸对峙。苻坚登寿阳城楼，见晋军队伍严整，又遥望淝水东面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抚然有惧色”。③谢石派人到秦营，请其略向后移，待晋军渡过淝水，在淝水西岸决战。苻坚部下皆不主张后移，但苻坚企图在晋军半渡时发动突然袭击，便下令士卒稍退。由于秦军内部不稳，队伍顿时大乱，这时被前秦俘虏的晋军将领朱序④在阵后连呼秦军败了，秦军信以为真，溃散奔逃。苻融想重新整顿阵势，结果

---

①②③《晋书·前秦·苻坚载记》。

④朱序原为东晋梁州刺史，镇守襄阳，与秦军作战，城破被俘。

马倒被杀，苻坚也被流矢所中，单骑北逃。晋军乘胜追击，秦军在溃逃的路上，人马自相践踏，“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①苻坚逃到洛阳，收集溃兵败将，只剩10余万人。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公元385年，苻坚被羌族首领姚苌擒杀，前秦统治随之瓦解。

淝水之战，兵力上占压倒优势的秦军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内部的不稳，民族矛盾重重；统一全国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苻坚伐晋不得人心，违反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汉族人民的意愿；几十万军队是临时强征而来，成份复杂，各怀异志，貌合神离，士气不高；苻坚骄傲轻敌，对双方力量估计错误，缺乏周密而正确的指挥，失败是必然的。东晋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所缓和，所谓“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北府兵决心保卫江南，收复中原，将士用命，指挥正确，战斗力较强。

淝水之战后，东晋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由于战争的胜利，南方避免了一场大的混乱和破坏，经济文化得到继续发展，使南北对峙的局面长期地延续下来。

四、门阀政治的腐朽与农民起义

士族地主的残酷剥削 士族地主是东晋政权的支柱，他们在政治上拥有特殊地位，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实力。从晋初执政的王导到后来的谢安，为政都务求清静，力图协调南北士族地主的矛盾，不干预他们的掠夺行为。在东晋政府的庇护下，世家大族疯狂地兼并土地，到处建立田庄园墅，甚至还“封山占水”，使劳动人民不仅无地可耕，连打柴、捕鱼、割苇都无去处，使大量人民沦为部曲、佃客和奴婢。称霸京口地区的大地主刁逵，“有田

①《晋书·前秦·苻坚载记》。

万顷，奴婢数千人”。①王、谢家族也在浙东会稽等郡建立许多庄园、别墅。《宋书·武帝纪》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东晋政府对自耕农民的剥削，比西晋时期还重。公元330年起，废除课田制，实行度田收租制，即清丈土地，按亩收租，但立即遭到士族地主的反对。公元377年又改为按人交税，规定除在役者外，王公以下每口税米3石，到公元383年又增加到5石。从度田收租改为按口税米，对地主十分有利，而对于只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农民来说剥削是极为残酷的。此外，徭役也非常繁重，名目多得惊人。晋穆帝时，丹阳尹庾和曾上表要求废除杂役60多项，没废除的不知有多少。晋孝武帝时范宁上表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自戕身体）、剪发（削发为僧侣），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②

激烈的土地兼并，苛重的租税徭役负担，迫使农民大量破产逃亡，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政治黑暗腐朽 士族官僚地主非常腐朽，他们安于享乐，沉湎酒色，专尚“清谈”，自鸣清高。他们利用门阀制度垄断政权，“平流进取，坐至公卿”。③只要门第高，就可以做大官。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个不辨寒暑的白痴。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问他：“卿署何曹？”答：“似是马曹”。又问他管儿马？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他马近来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④由此，政治腐败可见一斑。士族官僚横行不法，贪污成风，京城的仓米被豪将偷盗多达

①《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
②《晋书·范汪传附范宁传》。
③《南齐书·王俭传》。
④《晋书·王羲之等传》。

100万斛，朝廷不敢追究，反而滥杀管仓库的小吏来搪塞此事。①地方官贪污比京官还厉害，京官不能满足贪欲，常常请求去当县令，可见人民受害之深。

内争的加剧 淝水之战后，东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又尖锐起来。谢安因功倨傲，引起孝武帝的猜疑，谢安被排斥到广陵，不久抱恨死去。孝武帝之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独揽军政大权，他起用太原大族王国宝等参掌朝政。公元397年，兖、青二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以杀王国宝请王恭退兵。次年，王恭二次起兵，殷仲堪与杨佺期（雍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广州刺史）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派子司马元显率兵征讨。不久，王恭败死。桓玄占据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刘牢之控制长江下游江北地区，高雅之控制淮南，这些地区都成为独立王国。东晋朝廷的辖区只有东南八郡而已。②

东南八郡是南北士族集中的地区，人民的负担本来就很沉重，这时，东晋政府又把赋税、兵徭等加在这八郡人民身上，再加上内战的破坏，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江南农民只有起义这一条出路了。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 公元399年，司马元显当政，他为了与握有重兵的桓玄、刘牢之等人抗衡，决定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的军队，下令征发东南八郡的"免奴为客者"③去充兵役，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时，孙恩正在沿海岛屿以五斗米道组织反晋力量，他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领百余人登陆，在浙东发动起义。各地应征的奴客和破产农民纷纷响应，不到十天，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东晋政府急派北府军前往镇压。孙恩率领起义

①《晋书·庾亮传》。

②东南八郡：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

③"免奴为客者"即已免除奴隶身份的佃客，称为"乐属"。

军四次从海上登陆，前后数十战，历时两年多，多次取得胜利，杀死北府军将领谢琰和地方大吏王凝之、袁山松等。东晋政府竭尽全力进行镇压。公元402年，孙恩攻临海失利，投水自杀，余部由其妹夫卢循统率。

公元403年，卢循率领起义军攻入福建。次年又由海道攻占广州。公元410年，卢循与徐道覆分兵两路北上，分别攻占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兵败自杀，两路起义军胜利会师，顺流而下，直逼建康。东晋政府忙派太尉刘裕统兵镇压，起义军失利南撤。公元411年，卢循和徐道覆再次攻广州未克，卢循向交州（今越南北部）转移，战败投水自杀。

孙恩、卢循起义，坚持斗争12年，活动遍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冲击了大地主的庄园，杀死许多士族大官僚，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加速了东晋腐朽统治的覆灭。

东晋的灭亡 孙恩起义失败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趋激化。402年，割据长江中游的桓玄再度起兵，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称丞相，掌握了东晋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帝，国号楚。桓玄又杀了北府军将领刘牢之。次年，北府军另一将领刘裕攻入建康，桓玄退回江陵，在入蜀的途中被杀。刘裕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刘裕讨灭了桓玄，镇压了孙恩、卢循起义，保住了东晋政权，又进行了两次北伐：公元410年攻灭了南燕；公元413年攻灭割据益州的谯纵（谯纵于公元405年称成都王）；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北伐，灭后秦。通过这些活动，刘裕成为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受封为宋王。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是为宋武帝，国号宋。东晋灭亡，共传4代11帝，历时103年。

重要名词：

“王与马，共天下”　　祖逖　　北府兵　　淝水之战　　王猛　　桓温北伐　　谢安　　封山占水　　刘裕

思考题：

1．“五胡十六国”主要指哪些民族和国家？

2．试述前秦的统治政策及对苻坚、王猛的评价。

3．分析淝水之战中双方胜负的原因及这次战争的历史意义。

4．简述孙恩、卢循起义的情况及历史意义。

第七章　南朝和北朝

（公元420——589年；公元439——581年）

第一节　宋齐梁陈的更替

一、宋齐梁陈的更替

宋的统治和南北战争　刘裕祖籍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来流寓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出身寒门，是南朝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刘裕（宋武帝）执政期间，政治上集权于中央，对反对他的门阀士族，毫不留情地打击。著名的高门士族王愉、谢琨等，都被处死。对归顺的士族，给他们高官厚禄，但并不给实权。刘裕主要依靠北府兵将领和刘氏宗室。凡荆州、扬州及南徐州等政治经济中心与军事重镇，皆由宗室近戚出任，并使其兼任录尚书事，参预中央朝政。经济上，下令禁止士族豪强隐藏户口，推行"土断"，增加政府赋税收入和徭役对象。此外，还严惩贪官污吏，招抚流亡农民从事生产等。

以后，文帝刘义隆即位，改元元嘉，继续实行刘裕的政策，社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史载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

不夜扃。”①史称“元嘉之治”。

当刘宋国力逐渐发展时，北魏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并不断向南进攻。公元450年刘宋与北魏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战，宋军败退，魏军乘胜南下，渡过淮河，兵临瓜步（今江苏六合），准备夺取建康。在这种危急局面下，建康附近的丁壮全部参加防御，沿江六七百里严加戒备。魏军后方不稳，加之人马饥乏，只好退兵。但临行前却在江淮地区烧杀虏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②刘宋经过这次浩劫，国力大大削弱。公元467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失掉淮北四州及淮西之地，南北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北强南弱局面开始出现。

刘宋从文帝以后，朝廷陷入骨肉相残、君臣猜疑的一片混乱之中，各地又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在统治集团力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统帅禁军的中领军萧道成乘机夺取了刘宋政权。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萧齐。刘宋自公元420年刘裕建国，至公元479年灭亡，传4代8帝，历时60年。

南齐的兴亡　萧道成原籍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市峄城镇)，后侨居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出身“布衣素族”，依赖大族王俭与褚渊等大族的支持上台。所以，大族在南齐一朝的地位，比刘宋时略有上升。但南齐主要依靠的还是以军功起家的勋门新贵和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如出身狗屠的王敬则，不识书的张敬儿、陈显达等，都坐镇重要地方，中书舍人茹法亮握有朝廷大权。

萧道成即位后，大力整顿户籍。东晋、刘宋以来，江南人口迅速增加，但国家户籍册上的编户却不见增多，除了大批农民成

①《宋书·孔秀恭传论》。
②《资治通鉴》卷126。

了士族的隐户，或流浪于山泽之间，以逃避赋税外，还有许多假冒免役的士族和僧侣。为了扩大赋役征收范围，萧道成设置了校籍官，严令整顿户口，经检出的伪冒户籍，称为“却籍”，要被罚远戍。但在却籍过程中，由于贪官污吏作弊，“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①导致更多的农民逃亡，公元485年终于爆发了唐寓之起义。唐寓之率众攻下钱塘后称帝，国号吴，江南一带却籍户纷纷响应，众至3万余人。起义后来虽然被镇压，但南齐政权不得不对却籍户让步，停止检籍，允许戍边的却籍户返回原籍，并恢复以前的籍注，使许多诈入士流的却籍户获得了免役的权利。

萧齐政权从武帝以后，宗室之间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残杀，8年之内竟换了5个皇帝。由于大批宗室被杀，齐王朝统治实力削弱，地方集团势力乘机而起。公元501年，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第2年称帝，改国号为梁。南齐自479年建立到502年灭亡，传4代7帝，历时23年。

梁的统治和侯景之乱 梁武帝萧衍是萧道成的族弟，也是侨居兰陵的庶族，靠军功起家。他对士族的政策，基本上承袭前朝，但主要还是依靠庶族地主，给他们更多的参政权利。萧衍鉴于宋、齐两朝宗室皇族相互残杀的教训，对于宗室诸王非常优待，把兄弟子侄派往各重要地区镇守，废除了宋、齐两朝派典签监视宗室的办法，给宗室诸王以实权。同时，萧衍用放任宗室恣意聚敛的办法来实行“骨肉恩爱”。萧衍的六弟萧宏有装满银钱物资的库房百余间，仅现钱就有3亿多。有人密报萧宏私藏武器，萧衍亲自去搜查，一看是财物而非武器，知他没有政治野心，更加放心。

萧衍还大力提倡佛教，作为统治的思想工具。他三次舍身同

①《通典》卷3《食货》。

泰寺，诡称要当和尚，每次都由群臣用巨额钱财把他赎回来。梁朝佛教盛行，佛寺尼庵多达600多所，僧尼10余万人，僧收白徒，尼收养女，都不入户纳税，南方人口几乎隐没一半，负担全转嫁在劳动人民身上。

梁武帝统治后期，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投降梁朝，驻军寿阳（今安徽寿县）。公元548年，起兵反叛，很快攻下建康，次年攻入台城，萧衍被软禁，最后活活饿死。公元552年，梁朝大将王僧辩和陈霸先攻入建康，侯景企图出海逃命，在船上被随从杀死。侯景之乱是南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残暴的侯景军在江南地区烧杀抢掠，繁华的建康城被烧掠一空，富庶的三吴地区也遭到惨重破坏。加之萧衍诸子孙为了称帝，分别以北朝政权为后盾，展开激烈的争夺，西魏军队在江陵进行灭绝人寰的杀掠，江南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乱后，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为东魏所占。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归西魏所有，北强南弱的局面最后形成。经过侯景之乱，南方的士族门阀受到毁灭性打击，士族因为“骨脆肤柔”、“体羸气弱”，在战乱中，不堪行步，不耐寒暑，不知死掉多少。公元557年，陈霸先自立为帝，废梁王萧方智，国号陈。梁自公元502年建国到公元557年灭亡，传3代4帝，历时55年。

陈朝的兴亡 陈霸先（陈武帝），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出身寒微，曾任下级军官，后官至太守。侯景之乱时，他在广州起兵讨伐，平叛建功，因而称帝。陈是南朝最后一个政权，比起梁来“西不得蜀、汉，北失淮、淝”，统治范围最小，只限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而且自侯景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不听号令，经常发生内战，政局一直不稳。公元573年，陈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一度占有淮、泗之地。北周灭北齐后，吴明彻再次北伐，兵败被俘，陈军主力覆灭，南朝力量更弱。

陈在文帝、宣帝时期，较注意发展生产，整顿户籍，再行“土断”，江南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公元583年，后主陈叔宝继位，荒淫无道，不理政务，大修宫室，耗费大量钱财，刚恢复的经济又遭破坏。陈后主自作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在与妃嫔饮酒作乐时恣意演唱，“玉树歌残王气终”，形象地说明了陈朝在逸乐中消亡了。公元589年隋文帝从北方兴兵伐陈，陈后主从后宫的一眼枯井中被吊出来，成了隋军的俘虏，陈亡。陈从公元557年建立到公元589年灭亡，传3代5帝，历时33年。

南朝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宋，至公元589年陈为隋所灭，历时170年。

二、南朝的阶级关系

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 南朝虽是庶族地主做皇帝，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但是，由于士族地主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南朝时期逐渐丧失了统治能力。“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宫九燕，则假手赋诗”。①穿着用香料熏过的衣服，头戴高帽，足蹬高跟木履，擦粉点红，纵情声色，出门坐长檐车，装得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走路要人扶，不敢骑马。梁时，建康令王复，一听马叫就吓得要死，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

由于士族丧失了统治能力，更不能担任武职，掌握军事，于是庶族便以武职为升官的阶梯。南朝四个开国之君，都出身庶族，先掌握军权而后取得政权。

庶族出身的皇帝，开始提拔大批庶族官吏为自己的辅佐，任命他们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职。南朝时全以寒人典掌机要，处理政务。东汉时政事归台阁（尚书台）；曹魏时权力集中到中

---

①《颜氏家训·勉学》.

书监令手中；南朝时权力又集中到中书通事舍人手中。权力移归近臣，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中书通事舍人原是九品小官，南朝时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甚至专断政务，成为煊赫一时的人物。南朝的通事舍人多由寒人担任。如宋中书舍人巢尚之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商贩出身，凡官吏的选拔、升降、赏罚，宋孝武帝都与他们商量决定。南齐时的刘系宗、茹法亮，梁的周舍、朱异等，皆“权倾天下”，皇帝对他们特别赏识。齐武帝曾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①士族王俭身居太尉，却慨叹地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②

南朝寒人担任的另一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方镇势强，威胁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为州镇长官，但又用寒人为典签进行控制。典签主管文书案卷，职微权重，州镇要事，须典签签署方能实行。典签每年数次向皇帝报告，“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③

庶族地主地位的上升，反映出门阀士族的衰落。而士族越是感到自身危殆，也就越要极力维护其特权，越要与庶族划清界限。他们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通过婚姻、任官、修家谱三个途径，把自己与庶族区别开来。士族把自己的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的范围内，并极力排斥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被视为婚姻失类，受到排抑和诋斥。南齐时，士族王源因把女儿嫁给富阳满氏，御史中丞沈约上章弹劾他，请求皇帝对王源免官禁锢。④士族以官位自固的办法，是独占清流美职，视寒人和他们所居之官为浊流浊职，把清

①《南齐书·刘系宗传》。

②《南史·茹法亮传》。

③《南史·巴陵王子伦传》。

④《文选》卷40沈约《奏弹王源》。

浊两途严格区分开来。清流美职主要是那些职闲廪重，可以无所用心的职位。宰辅中的文职，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务，自然是士族首先独占的对象。其余官职清浊虽大致有定，但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份高下而发生变化。南朝官吏从浊职转为清职，胜过品秩的升迁，反之则甚于降黜。为适应士族出仕需要，秘书郎、著作郎等职，虽品秩低，但却被士族独占，作为入仕阶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迁。有民谣讽刺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只要乘车不摔下来，就可以任著作郎，会写几句身体如何问候的话，就可以任秘书郎职务。士族保持身份的另一个办法是编撰家谱，把士族的世系渊源明确地记载下来，以备查考。贾弼之撰《十八州士族谱》共700多卷。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也都有谱学专著。政府取士，必稽查族谱而考其真伪，以防庶族假冒。宋、齐以后，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谱局"，找那些精通士族谱学的人司其职。于是谱牒百氏之学竟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兴盛起来。

在平时生活中，士族也自矜门等，鄙薄寒流，故意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庆之的孙子路琼之，拜见王僧达，王故意用侮辱性的话问他：从前在我门下做过扈从的路庆之是你家的什么人？并把路琼之坐过的床烧掉。路太后对孝武帝哭诉。孝武帝说：琼之年纪小，没事过王僧达家，受侮辱是理所当然的。士族严格排斥庶族寒人，使两者地位身份相差悬殊，连皇帝也难为出身卑微的皇亲贵戚撑腰。

士族尽管使用种种手段拼命维护昔日的显赫，但仍无法挽救其衰颓的命运。经侯景之乱，"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① 盛极一时的高门士族，至此土崩瓦解，更趋衰落了。

---

①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

佃客、部曲、奴隶、门生义故 南朝时期，江南的士族和庶族地主对土地兼并都非常热衷。一些大地主不但掠夺大量农田，还侵占山林、川泽、湖泊，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庄园。由于官府私家竞相争夺，大地主的田庄在江南普遍发展。

士族地主的庄园规模庞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单位。它以农业为主，兼营园林、畜牧、养鱼以及多种手工业生产。田庄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佃客和部曲，佃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府依官品赐给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诱的。东晋南朝的给客制规定，第一、二品官，佃客无过40户，以下每品递减5户，至第九品占5户。这一部分佃客无独立户籍，而是登记在官僚地主的户籍上，即"客皆注家籍"。他们不给国家交租调，服力役，交纳50%的地租给官僚地主。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①私招的佃客是很多的。他们不上户籍，称为隐户，不向国家纳税服役，而受豪族地主剥削。部曲在西汉是指军队的编制，到东汉为军队的泛称，东汉末年以后又指家兵，东晋时的部曲，主要为主人作战，有时也种田，到了南朝，就普遍用在农业生产上了。部曲与佃客身份差不多，没有人身自由，完全受地主的奴役和剥削。到了南北朝，佃客这一名称，在史料中逐渐减少。《唐律》不提佃客只提部曲，这是因为佃客这一名称，已包括在部曲范围之内了。

南朝还有相当数量的奴婢。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可以抵押或买卖。奴隶处境极为悲惨，为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梁萧正德"蓄奴僮数百，皆黥其面。"②就是典型一例。

大族地主门下还有一些称做门生故吏的依附者。门生原指受业弟子。后汉经学盛行，著名经师门下往往有许多弟子。这些弟子真正受业的不多，多数是通过行贿买个名义，以便获得庇护免

①《晋书·颜含传》。

②《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附萧正德传》。

役或荐举做官的好处。以后，不仅经师门下，一般世家豪族门下也有这种依附者，称为门生义故。这些门生义故的身份和地位并不一样，有的和佃客、部曲相仿，要为主人从事各种杂役，有的则是主人的帮凶和打手，最受赏识者还可以被推荐做官。

兵户、吏户和百工户 属于封建国家的依附民有兵户、吏户和百工户。兵户即魏晋以来士家制的延续，世代相袭，承担沉重的兵役，身份低下，有时与奴隶并称，但自孙恩、卢循起义以后，部分兵户已开始被解放。吏户是指在中央及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服务的依附户。为官府从事各种杂役，有的还代佃公田，吏籍也与民籍分开，隶属性质很强，因不堪重压，经常逃亡。百工是世代束缚于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工匠，官府对他们控制极严，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卑下，处境极为悲惨。百工户不断逃亡，迫使南朝政府先后实行"番假"、"雇借"、部分纳钱代役和年老退役不再订补等措施，他们的地位才略有提高。

自耕农 自耕农有户籍，称为编户百姓，是封建国家榨取的主要对象，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

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5石。户调宋孝武帝时规定每户岁输布4匹。征收时，事先评出户赀，定出户等，然后再依户等高低分派。但刘宋的地方官在评户赀时，桑长1尺，田进1亩，都计在资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农民因为怕提高户等，"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①到梁初，租调制又有了改变，"其课：丁男调布、绢各2丈，丝3两，绵8两；禄绢8尺，禄绵3两2分。租米5石，禄米2石。丁女并半之。……其田，亩税米2升"。②

①《宋书·周朗传》
②《隋书·食货志》。

户调变成丁调，虽然避免了“评赀”时产生的流弊，但它仅有利于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对贫苦农民则剥削更重。田租不仅增加了按丁增收的禄米两石，而且又增加了“亩税米 2 升”的田税。陈代的租调剥削，大体与梁相同。

南朝的杂税，名目繁多，有的税重得惊人。如齐时曾向浙东 5 郡收丁税1000钱，这1000钱当时能买10石米，为每个丁男向国家交纳田租的一倍，许多贫困农民被迫质妻卖儿，以完此重税。此外，自耕农还担负着各种徭役，由于徭役沉重，当时农民斩断手足以求避役，在社会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沉重的剥削压榨，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大地主的佃客和部曲。

三、江南经济的发展

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一直落后于黄河流域。东晋建立之初，长江流域尚存在着“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① 耕作技术原始，生产落后的现象。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原因：一、建康是六朝的都城，自三国以来300年间，一直是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有利于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二、南北分裂对峙，总的来说，南方战乱较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三、人口大量南迁，据统计，自西晋永嘉之后，至北魏拓跋焘攻宋，前后出现 6 次人口迁徙高潮，总数不下百万人口。②大量人口南迁，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四、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

①《隋书·食货志》。

②《燕京学报》15期载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

农业　农业的发展特别显著，水利的兴修、水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表现。南朝境内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推荆、扬二州。扬州的会稽、吴、丹阳诸郡，已成为当时最繁盛的地区。荆州发展也很快，田土肥美，农植殷富。沈约形容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①江南原来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开发的交、广地区，稻米一年两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②土地的大量垦辟，使南方农业在全国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以致有人认为超过北方，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③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这一时期在南方有很大发展。东晋时，在曲阿（今江苏丹阳）兴建新丰塘，灌溉田地8万多亩；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兴建荻塘，灌溉农田10万亩。刘宋时在乌程筑吴兴塘，灌溉田地20多万亩。齐时筑赤山塘（今江苏句容西南）。梁时在豫州苍陵（今安徽寿县南）立堰，灌溉田地10万多亩。宋、齐、梁三代都修整过芍陂（安徽寿县南），灌溉田地100多万亩。

手工业　东晋南朝时，纺织业比较发达。永嘉郡（今浙江温州一带）养蚕有一年八熟者。丝、绵、绢、布是南朝政府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业是民间普遍的副业。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的妇女，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④织锦业在益州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绫作服

①《宋书·孔秀恭传论》。
②《水经注·温水注》。
③《宋书·周朗传》。
④《隋书·地理志》。

饰，锦作屏障，甚至用锦缘席边已是常见的事。

在冶铸业方面，我国古代使用铁，经历了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春秋以前有熟铁，春秋前期有生铁，战国时已有钢，不过是锻钢，费工太大。南朝时炼钢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产生了一种杂炼生（生铁）鍒(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溶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等。

这一时期的造纸业也有很大发展，造纸的原料除破布、麻和树皮外，还开始用藤皮造纸称作“藤纸”，会稽郡的剡县（今浙江嵊县）是藤纸的著名产地，王羲之曾把会稽郡库存的9万张纸送给谢安，可见纸的产量很大。因此，桓玄掌权时，曾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造船业在孙吴原有的基础上，也有较大发展。今福建的建瓯和闽侯等处，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东晋末年一次风灾，仅在建康下停泊的船只，据说损失1万艘，可见船只之多。孙吴时，海船最大不过装万斛，而梁时，大船可载两万斛。当时生活在北方的人，甚至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大船。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

南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发展的重要阶段，制造的青瓷器，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清莹，造型美观。不仅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产量激增。近代从六朝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很多，墓葬不论大小，差不多都有青瓷出土。青瓷烧制的主要地区在会稽郡一带，会稽是春秋越国所在地，所以，这里的瓷窑被称为越窑。

商业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

①《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伪事》。

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南方的商业和都市也繁华起来。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今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两汉时不过是丹阳郡的一个县，梁武帝时已有28万多户，若以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可达140万人，这里“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和洛阳）。”①建康以外，最大的城市是江陵，这里与成都一带有密切的商业往来，著名的川马和蜀锦，都经此转运江南各地。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襄阳，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②番禺是当时最富裕的城市，贪官都把任职番禺看成是肥缺，以至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三千万”③之说。

东晋南朝都很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地区，因为是对外贸易中心，所以“全以金银为货。”④

南方经济的发展，是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学习，直接促进了民族融合。于是，一向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赶上了黄河流域的水平，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齐头并进，为以后的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的社会经济繁荣奠

---

①②《隋书·地理志》。

③《南齐书·王岷传》。

④《隋书·食货志》。

定了基础。

第二节　北朝黄河流域的各族大融合

一、北魏的建立与统一北方

北魏的建立　鲜卑人的先民被称作东胡，秦末汉初被匈奴打败，一部分逃入乌桓山，被称为乌桓人，一部分逃入鲜卑山，被称为鲜卑人。历时300多年，大漠南北的匈奴人，先后南迁西移，鲜卑人也走出高山深谷，游牧于蒙古大草原。东汉末，又迁往内蒙古一带，分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秃发部、乞伏部，在长城内外分布散居。

公元338年，拓跋部首领什翼犍，建立代国，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吸收汉族文化，使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设官分职，“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①进一步摧毁了氏族制的残余，确立国家制度。376年，代国为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以后，前秦统治瓦解。386年，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恢复了代国。不久，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后魏、元魏，仍都盛乐。次年，魏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又攻破邺（今河北临漳），拥有黄河以北之地。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

北魏统一北方　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受中原封建制的影响，在经济上重视农业，用征收田租的办法向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招纳汉族地主参加统治集团，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等著名汉族豪强成了拓跋珪的得力谋士，还命邓渊制定官制，董谧制礼仪，王德修制律令，采用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拓跋珪统治时

①《资治通鉴》卷96，咸康四年。

期，北魏逐渐强盛起来，至其孙拓跋焘继位时，擢用汉族大地主范阳卢玄、博陵崔绰等数百人担任官职，形成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北魏的政治、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先后向北方的其它政权进攻。公元431年，北魏属国吐谷浑灭夏，执夏王送北魏。北魏又先后灭掉北燕和北凉，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改革的社会背景 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12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一个文化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它的统治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仍非常尖锐。

北魏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负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北魏前期沿袭两晋租调制，实行"九品混通"的赋税制度，规定每户纳帛 2 匹，絮 2 斤，丝 1 斤，粟20石。由于征收户调是"九品混通"，宗主督护在评定户等时"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抬高一般人民户等，压低豪强大族户等，从而把一大部分租赋摊到一般人民身上。北魏初期官吏没有俸禄，全靠贪污搜刮。在征收租调时，他们有的用大斗、长尺、重秤变相加重剥削量，北魏政府还经常向农民调发绢帛、粮食等，农民的实际负担极其沉重。

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更为残酷，在军事征服过程中，它把大量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各族人民还常被迫充当步兵，打仗时在前面冲锋陷阵，鲜卑骑兵在后面督阵，如果步兵不前进，便被骑兵踏死。

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445年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领导的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10余万人。盖吴先后两次派人与南朝刘宋联络，并提出结束"九域分崩"，以实现"五州同盟"的愿望，表达了北方各族人

民统一全国的要求。先后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汉、卢水胡、氐、羌等许多少数民族，有力地震撼了北魏的统治，起义最后被拓跋焘镇压。

在统治阶级内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差异，拓跋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北魏统一北方后，由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军事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婢，而北方的汉族大地主早在十六国时期，往往率领宗族、部曲建立坞壁，被称为“宗主”，北魏为了笼络汉族地主，承认宗主的统治，督护百姓，并在大部分地区把它作为基础政权组织，这样，北方的汉族大地主，又以宗主督护的名义，控制着许多“荫户”，直接影响北魏的租调收入。尤其是一些汉族士族地主，保持着汉魏以来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传播为士族统治服务的文化。在一定时期里，这和鲜卑贵族格格不入。北方士族代表人物崔浩，在北魏三朝任职，维护士族的利益，推荐了许多士族出身的人在朝廷当官。一次，要任命几十名士族当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他就和太子力争，结果还是照他的意见办了。崔浩还宣传西周的封建五等制，希望北方的世家大族能够对鲜卑统治者保持独立的统治地位。这一切都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崔浩终遭杀身之祸，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汉族门阀也都遭灭族之灾，被杀达2000多人，这种矛盾也影响了北魏政权的稳定。

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北魏统治者必须进行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改革的条件这时也已成熟，鲜卑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部分汉族地主，构成了当时的革新势力，冯太后、李冲、孝文帝是其代表人物。改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开始，主要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是冯太后当政时进行的。第二期是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社会习俗，是在孝文帝亲政后进

行的。因为都发生在孝文帝在位期间，史称“孝文改制”。

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孝文帝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大力整顿吏治，改变以前地方守宰一律任期6年的规定，任期按治绩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制定俸禄制度，取消官吏自筹禄俸的旧制，改由国家统一筹措，即在户调之外，每户增收帛3匹，粟2石9斗，由政府按官员品第高低定期发放，不许官吏自筹。又制定严禁贪污的办法，凡贪污帛1匹及枉法者，一律处死。经整顿后，吏治状况大为改善。

经济上，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其主要内容有：

一、男子15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40亩，休耕一年的加倍，休耕两年的再加倍。年老免课，身死将田交还官府。此外，男子受桑田20亩，不宜栽桑地区，受麻田10亩，桑田永为农民所有。

二、妇女受露田20亩，加倍或加两倍受田，以备休耕。无桑田，所受露田身死或年满60岁后交还官府。在宜于种麻的地方，另受麻田5亩为世业。

三、奴婢受田与农民同，但土地归奴婢主人掌握。

四、壮牛一头受露田30亩，休耕者倍田30亩，每户受田的牛只限4头。

五、露田、桑田都不准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六、地方官吏在任职的地方受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6顷。离任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实行均田制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在颁布均田制的同时，又规定了一套与它相适应的户籍和

租役制度，主要有三长制和户调制。

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国家必须掌握精确的户口。因此，北魏政府又颁布了三长制。三长指邻长、里长、党长。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审定户籍，分配土地，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的建立，废除了宗主督护制，加强了中央的权力，有利于巩固对地方的统治。

户调制：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实行新的租调制。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交纳田租粟2石，户调帛1匹。年15岁以上未婚男女4口，从事生产的奴婢8口，耕牛20头，均交纳与一夫一妇相同的租调。

均田制基本上是一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除桑田外，一般的耕地都属于国家所有，私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由于奴婢和牛都可以受田，而且对受田奴婢的数量没有限制，租调又比一般农民为轻，所以并不损害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更没有触动土地所有制。但在当时地旷人稀的条件下，分配给农民一块土地，使荒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它扩大了北魏政府的赋税来源，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均田制是影响相当深远的一项重要措施。从北魏开始，经北齐、北周至隋、唐，一直沿用这一制度。在我国广大地区不同程度地推行，持续了近300年之久，直到唐中叶才最后崩溃。

迁都洛阳与汉化政策：北魏初期国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统一北方后，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已经南移。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也为了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公元493年，孝文帝不顾旧贵族的反对，以南下灭齐为名率几十万军队进驻洛阳，然后宣布迁都于此。反对迁都的旧贵族包括太子在内，都遭到了严厉制裁。此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

一、易服：改换鲜卑服为汉人服装。

二、禁鲜卑语：当时鲜卑语称“北语”，汉语称“正音”，要“断诸北语，一从正音”，① 改说洛阳话。但30岁以上的人，并不强求。

三、改汉姓：把鲜卑姓的复姓都改为音近的汉族的单姓。首先从皇室实行，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他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共改118姓。

四、通婚：北魏孝文帝先纳汉族大姓卢、崔、郑、王、李之女以充后宫，又为他的5个弟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妃，其他鲜卑人都可按同等门第与汉族通婚。并把公主嫁给汉族大姓，范阳卢氏一家就娶了3位公主。

五、建立门阀制度：除皇族元氏外，鲜卑贵族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高，在这以下又分为若干等级，并按门第等级来定官职的高低。

六、禁北葬：凡迁到洛阳居住的鲜卑人都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阳，不许葬在代北。

七、尊孔崇儒：北魏孝文帝曾亲自到曲阜祭孔子庙，封孔子宗子为崇圣侯，又下令立学校、修学堂、筑灵台。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和鲜卑族封建化的结果，也是北方内迁各族和汉族融合的一次总结，还是落后的征服者被先进的被征服民族所同化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指出：“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② 孝文帝的改革，正体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改革家，

---

①《魏书·咸阳王禧传》。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

他所推行的改革事业，对北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一、均田制、三长制、户调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也有助于吸引广大农民回到土地上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对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二、北魏政府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严禁官吏贪污枉法，对改造封建政权，加强北魏统治有积极作用。三、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因此，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各族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变动，内迁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经过大约四个世纪的发展，通过和平交往，也通过战争，逐渐接受了汉族先进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文化，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民族融合的表现，从少数民族来看，除在经济、文化上封建化以外，在语言、姓氏、服饰、风俗习惯上，都实现了汉化。少数民族贵族都从跃马弯弓的武士而士大夫化，如史书载孝文帝元宏本人就“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①虽有夸大，亦足见其汉文学修养程度。北齐武将厍(di音狄)干不会写字，签名字，“干”字的一竖从下向上写，被人嘲笑为“穿锤”，因此，他的子孙也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北方这一历史变化，连南方人士都感到惊讶。陈庆之就曾对朱异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②

从汉族来看，吸收了新的血液，汉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经济、文化中吸收了不少胡族的优秀成分。如经济中的畜牧

①《魏书·高祖纪》。
②《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

业生产经验；物质生活中的胡服、胡食（胡饼、胡饭）、胡床等；精神生活的胡乐、胡歌、胡舞等，正是由于汉歌与胡歌的结合，才出现《木兰辞》和《敕勒歌》那样优美动人的民歌。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中积极的历史现象，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痛苦过程，但由于汉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增加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比之以前更加兴盛。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隋唐封建国家，就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

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压榨下，阶级矛盾较前突出，并随着北魏政治的日益腐败而愈来愈尖锐。北魏后期，鲜卑贵族在优裕的生活中完全腐化了。如高阳王元雍一顿饭要花数万钱。①河间王元琛派人到波斯国购得名马，用银做马槽，用金做马的锁环。②朝廷公开出卖官爵，吏部专以卖官为职务，人称"市曹"。北魏后期，赋役也越来越沉重，许多官吏在征收租赋时都用大斗、长尺、重秤加重剥削。北魏佛教兴盛，建寺造塔，极尽壮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佛寺多时达3万所，僧尼多达200万人。寺院地主侵夺人民，广占田宅，许多农民成为寺院的依附农户。在统治阶级的搜刮下，人民不堪压迫，反抗北魏统治的斗争遍及北方各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 北魏初年，为了防备柔然侵扰，在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的地带修筑了2000多里的长城，在长城的要塞处建立了一些兵镇。其中重要的有沃野（今内蒙古磴口县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武川（今内蒙古武

①《洛阳伽蓝记》卷3《高阳王寺》。

②《洛阳伽蓝记》卷4《开善寺》。

川县西南）、抚冥（今河北张北县西）、柔玄（今河北张北县）怀荒（今河北沽源县）六镇。镇将都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则是"国之肺腑"的拓跋部人，所以开始地位很高。孝文帝改制以后，重视门阀，卑薄武人，六镇的鲜卑贵族地位下降，一般镇兵地位也下降，受镇将的奴役。还有那些由各族罪犯分配来的镇民地位更为低下。镇将对镇兵、镇民的压榨具有军事上的强制性和奴隶制残余的落后性，表现十分凶残。再加上土地贫瘠，连年旱灾，这里的矛盾十分尖锐。有六镇镇将、镇兵、各族人民与北魏统治者的矛盾，也有镇将与镇兵、镇民之间的矛盾。

公元523年，柔然兵进攻北魏，怀朔镇兵民要求开仓放粮，以便于守御，遭到镇将于景的拒绝，愤怒的兵民杀死于景，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也聚众起义，杀死镇将，其它各镇兵民也纷纷加入，北边诸镇都被起义军占领，北魏政府除派大军镇压外，又转而勾结柔然兵进攻六镇，并用欺骗手段分化瓦解起义者。公元525年，起义军20余万被俘，破六韩拔陵牺牲。

河北人民起义　北魏政府镇压了边镇起义后，将被俘获的20多万起义者押送到冀（今河北冀县）、定（今河北定县）、瀛（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以便瓦解他们的反抗力量。公元525年，被分散"就食"的一部分六镇兵民，因无法生活，在柔玄镇兵杜洛周领导下，在上谷（今河北怀来）揭起造反大旗。鲜于修礼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也举行起义，原怀朔镇将葛荣参加了这支起义队伍。后来鲜于修礼被叛徒杀害，葛荣杀掉叛徒，继续领导斗争。公元526年，葛荣称天子，建国号"齐"。葛荣和杜洛周两支起义军共90万人，占领河北大片地区。但义军发生分裂，葛荣袭杀杜洛周，并其部众，528年8月，他率军围攻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由于作战轻敌，为掌握北魏军政大权的尔朱荣所杀。起义军余部在韩楼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到529年才最后失败。

关陇起义　在边镇起义的鼓舞下，关陇地区也爆发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公元524年，秦州（今甘肃天水）人民以羌人莫折大提为首发动起义。莫折大提病死，子莫折念生继续领导斗争，自称天子，国号“秦”，并一度占领潼关。莫折念生为叛徒杀害，鲜卑人万俟（mo qi末其）丑奴继续领导斗争。公元530年，义军战败，万俟丑奴被俘牺牲。

河北大起义期间，山东青州地区也发生了由邢杲领导的流民起义，部众发展到10多万人，最后被北魏政府所镇压。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前后持续9年(523年—531年)席卷了今内蒙古、河北、关陇等广大地区。参加这次起义的有鲜卑、匈奴、氐、羌和汉族等各族人民。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但是各族人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给予北魏政权严重打击，使其不能维持旧的统治，从而加速内部分裂。经过这次起义的扫荡，北方士族门阀势力开始走向衰落。各民族在共同的斗争中，加速了融合的历史进程。这次起义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北魏的分裂与北周统一北方

河阴之变和北魏的分裂　各族人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腐朽统治，促使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公元528年，胡太后毒死孝明帝，立3岁的元钊为傀儡皇帝。契胡酋长尔朱荣以此为借口，乘机进军洛阳，沉胡太后和元钊于黄河，立孝庄帝，又在河阴之陶渚（今河南孟县）围杀北魏王公大臣2000余人，史称“河阴之变”。汉化的鲜卑士族在这次事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尔朱荣专断朝政，引起孝庄帝不满，公元530年，孝庄帝诱杀尔朱荣，荣侄尔朱兆起兵复仇，攻陷洛阳，杀死孝庄帝，立节闵帝。尔朱荣的部将高欢利用尔朱氏的内讧起兵，于公元532年又攻入洛阳，杀尔朱兆和节闵帝，另立孝武帝。高欢自任大丞相，

总揽朝政，孝武帝不愿受高欢控制，公元534年逃出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同年，高欢立孝静帝，迁都邺，史称东魏。宇文泰杀死孝武帝，立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宇文泰自为大丞相，专断朝政。北魏至此分裂为两个政权，东魏据洛阳以东原北魏领土，西魏据洛阳以西原北魏领土。

东魏与北齐　掌握东魏大权的高欢，是怀朔镇鲜卑人，出身下级军官，曾参加六镇起义，后来叛投尔朱荣。他收容了葛荣部众20余万人，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建东魏以后，自己由大丞相进位相国，总揽大权。公元547年，高欢死，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齐，仍都于邺。

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主要是由六镇鲜卑和河北汉族地主组成，但重要职位皆由六镇贵族担任，边镇鲜卑人汉化程度差，一反北魏汉化政策，推行鲜卑化政策，歧视汉人，因此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加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豪强长期争权夺利的斗争，所以东魏、北齐统治阶级内部"胡"汉斗争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高欢曾想调和矛盾，他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耕地，妇女为你们纺织，供给你们粟帛，使你们得到温饱，为什么还要欺侮他们？"又对汉人说："鲜卑是你们的雇客，得到你们1斛粟1匹绢，为你们击贼，使你们得到安宁，为什么还要憎恨他们？"①实际上，"胡"汉矛盾并没有解决。北齐时，100多个将相大臣，鲜卑人和鲜卑化的各族人占了90%。高洋曾问汉族士大夫杜弼，治国当用什么人。杜弼回答，鲜卑人只会骑马坐车，治国当用汉人。高洋听了很不满意，不久就杀了杜弼。北齐也曾几度起用汉族人士作宰相，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暂时的权势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结果

---

①《资治通鉴》卷157。

往往受到猜忌，以被逐被杀而告终。

东魏和北齐前期，土地兼并严重，北齐武成帝高湛时，对均田制作了新的调整。均田令规定：一夫受露田80亩、妇40亩，受田数比北魏加重，是为了休耕。又每丁给永业田20亩为桑田，规定用来种植桑榆、枣树等，不在还受之列。奴婢受田的人数，按官品的高低限制在300人到60人之间，这表明当时地主官僚占有很多奴婢和土地，政府企图加以限制。北齐均田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定是：邺城30里内皆为公田，按等差分配给六镇鲜卑，这对他们进一步封建化有重要作用。由于王公贵族、地主豪强势力强大，北齐这次整顿均田收效甚微，土地兼并仍很严重，"肥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农民贫困不堪，直接导致北齐的军力衰弱和统治的不稳定。

西魏与北周 西魏的建立者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出身武川镇兵，曾参加六镇起义，葛荣失败后，他投靠尔朱荣，高欢灭尔朱荣后，他据长安与高欢对抗。宇文泰在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军事上实行了鲜卑部落兵制与中原征兵制相结合的府兵制。以府为军事编制单位，每个开府各领1军，共24军，分属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12个大将军又分属大柱国，全国置8柱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只挂个虚名，而宇文泰则是名符其实的全军统帅，因此，直接领兵的实际为6柱国。府兵另立军籍，免征租调，但要自备部分衣甲兵器，，因此只有较富裕的农民才能担当，地位高于过去的军户。

在政治上，为了与高欢对抗，宇文泰极力把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汉族大地主的利益揉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武川军事贵族、汉化胡族大族和汉族大族3部分构成，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府兵系统中的8柱国、12大将军，是这一集团的宝塔尖。8柱国中，除宇文泰外，如柱国大将军李虎，是李渊的祖父。柱国大将军独孤信，长女为周明帝的皇后，第四女为李虎的儿子李昺的妻子（李

渊的母亲），第七女为隋文帝的皇后。可见，北周、隋、唐三朝的创业皇帝，都和关陇集团有血缘关系，将相大臣很多都是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后裔。

在经济上，宇文泰继续实行均田制，减轻赋役，奖励生产。并把江陵俘获的10万余口男女分赐给贵族地主，发展他们的庄园经济，经过这一番整顿，使它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556年，宇文泰死。第二年，其子宇文觉废掉西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仍都长安，历时23年的西魏灭亡。

北周初期，宗室大臣宇文护专权，他废掉宇文觉，改立宇文毓，以后又改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是为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杀宇文护，自己亲政。在北周统治的24年中，武帝的统治占18年，是继魏孝文帝以后又一个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皇帝，在鲜卑统治者中，也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首先改革了府兵制，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改称兵士为侍官，使他们成为直辖于皇帝的禁卫军。作战时，临时命将配兵，24个开府将军的权力被削弱。府兵的最初来源为六镇鲜卑族人，后来不断扩大征募范围，广募关陇豪右及其部曲、家兵，给这些豪强加上帅都督、大都督的官号，把他们的部曲纳入府兵系统。以后，又征九等户中六等以上户"家有3丁者，选材力1人"①以充府兵，把府兵扩大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周武帝时，又募包括贫下户的"百姓"以充府兵，征募对象进一步扩大到一般农户。兵士逐渐以汉人为主，进行经常的训练，战斗力较强，这支军队是北周统一黄河流域和隋统一中国的军事基础。

其次，周武帝还推行了毁佛运动。北魏时期佛教盛行，到北周时，在其统治区内就有寺院万余所，僧侣约百万，严重影响政

①《玉海》卷138《兵制》。

府的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①公元574年下令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并选拔其中一部分壮丁编为府兵。灭掉北齐以后，又把灭佛政策推到北齐境内。这是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废佛后又一次废佛运动，北魏太武帝杀了不少僧侣，周武帝没有杀人，而废佛效果更为广泛。

此外，周武帝还下诏释放部分奴隶为平民，又下令放免杂户：“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②使北方的奴隶和杂户显著减少。

通过一系列改革，“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③为灭北齐奠定了基础。

公元575年，周武帝率军东进，第二年，攻克北齐重镇晋阳，公元577年，一举攻陷齐都邺城。传3代8帝、历时28年的北齐灭亡，北方又归于统一。“自北魏内乱以来，只有这一次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战争”。④隋唐重新统一中国的第一步是由周武帝迈出的。

周武帝攻灭北齐以后，又派大军攻南方的陈朝，取得长江以北全部土地。正当他准备统一全国时，却于公元578年病死，终年只有36岁。周武帝的统一事业虽未实现，但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581年，外戚杨坚废周静帝自立，改国号“隋”。传3代5帝，历时25年的北周灭亡。

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统一北方，至公元581年北周灭亡，历时143年。

---

①《广弘明集》卷24。
②《隋书·刑法志》。
③《广弘明集》卷10。
④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第615页。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与宗教

玄学与反玄学的斗争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

玄学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儒学自西汉后期以来日趋烦琐迂腐，无力解决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加上黄巾起义对东汉政权的打击，致使儒学独尊的地位发生动摇，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争斗残酷激烈，一部分人地位沉浮不定得失无常，一般士人上进无路，且时有生命之虑，因而思想消沉，趋于虚无淡泊，以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于是，玄学应运而生。

当时，士大夫把《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称为“三玄”，玄学也因此而得名。所谓玄，就是虚无玄远，高深莫测之意。玄学是对“三玄”的研究和解说。士大夫们手持麈(zhǔ音主）尾，辩论玄虚，称为“清谈”。玄学是清谈的内容和依据，清谈则是对玄学的阐发和表现形式。玄学是用道家的唯心主义思想解释儒家的《周易》，因而，它是一种杂揉儒、道的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玄学发端于曹魏末年，何晏与王弼是魏晋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何晏著《无名论》、《道德论》，王弼著《老子注》、《周易注》等，他们的根本思想是“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①而“无”又是神秘莫测不具物质属性的东西，“无”的别称是“道”。“无”派生“有”，即一切有物质属性的具体事

①《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

物。很明显，这种“贵无”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无和有的关系表现在自然和名教方面，则是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名教出于自然”。他们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政治上，认为人君代表“无”，“圣人体无”，应该顺乎“自然”，垂拱而治；臣下代表“有”，要“执掌名教”，积极有为。何晏、王弼于正始年间党附于执掌朝政的宗室大臣曹爽，他们的理论当时主要是为曹爽服务的，但是，这种理论也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提供了依据。

曹魏末年，司马氏集团控制了政权，大杀异己。一些士人心怀不满却不敢公开对抗，于是出现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反名教的玄学家。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因而对名教采取激烈的抨击态度。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①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称名教礼法是“乱危死亡之术”，讽刺那些遵奉名教的礼法之士只不过是一群“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②的裈裆里的虱子，是一群利禄之徒。阮嵇甚至认为，理想的政治应是“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在行动上，他们表现得放荡不羁，纵情任性，以此表示对儒家名教的蔑视和对司马氏假奉名教、杀君夺权行为的抗议。嵇康、阮籍的言行虽然有明显的消极颓废情绪，但他们对儒家名教礼法虚伪性的揭露，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他们通过注解《庄子》，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有”不待“无”而生，是自然存在，本身“独化”而成的。虽然向秀、郭象也宣扬“无为”，但他们的思想与先前的玄学家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了。在他们看来，礼法名教、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是必须遵循的“天理自然”，“从

①《嵇中散集·与山巨源绝交书》。
②《阮嗣宗集·大人先生传》。

小到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足矣”。①这种理论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者和门阀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也出现一些反玄学的进步思想家。孙吴时的杨泉，著《物理论》，以唯物思想说明了万物的本原。指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指斥玄学是"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西晋时的裴頠，也在其所著的《崇有论》一书中驳斥了玄学的"贵无"，认为"无"不能生"有"，"贵无"思想于事无益，无论是捕鱼还是射鸟，坐卧不动拱手默垂皆不能有所收获。因此，裴頠指出："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②在玄学唯心主义"贵无"思想泛滥的情况下，裴頠的"崇有"思想对哲学领域反玄学的斗争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两晋之际的鲍敬言，在他的《无君论》中，对门阀士族的统治进行了激烈抨击。鲍敬言认为上古时代本无君主，后来社会上出现了"强者凌弱"、"智者诈愚"的现象，"君臣之道"才随之产生。有了君主官僚后，便有了赋税徭役、战争刑法、贫困富有。因此鲍敬言认为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理想的社会应是无国家、无君主，百姓"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鲍敬言的思想，是对儒家"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揭露了魏晋以来政治黑暗、社会纷争、豪门奢侈、百姓穷困的社会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鲍敬言当时不可能正确认识阶级、国家产生的根源，他的"无君"思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佛教和道教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是统治阶级又一

①《庄子·秋水记注》。

②《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

重要的精神武器，当时，佛教和道教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内地开始修建寺院翻译佛经，但政府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故传播范围有限。佛教教义的主旨是神不灭论，宣扬人的肉体之外有一个能独立存在的灵魂或精神，只要人们信佛修行，忍受苦难，死后灵魂就可升入“天堂”获得来生的幸福，反之将入“地狱”受熬煎。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为佛教的逐渐盛行提供了条件。永嘉乱后，社会分裂，许多文士死散逃离，玄学受到重大打击，统治阶级需要新的精神支柱，从思想上麻痹劳动人民。社会分裂和长期战乱也使人民饱受苦难，渴望获得解脱，佛教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希望。这样，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佛教迅速得以传播。

当时，西域许多僧人来中国传教，著名的有：后赵时的龟兹僧人佛图澄，深得石勒、石虎信任，尊为“大和尚”，有门徒近万人，后赵境内修建的佛寺近900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研究精深，他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又到东晋的襄阳（今湖北襄樊）传教。在那里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后移居长安，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释道安的弟子释慧远，在庐山传教，使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他本人是东晋名僧。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后秦时到长安传教，翻译了大量佛经，介绍了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学说，译出佛经300多卷。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僧人西去求经。最著名的是东晋僧人法显，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西行，赴印度求经，公元412年回国，413年至建康。归国后除了翻译携带回来的梵文佛经外，还将求经途中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这部书成为研究5世纪初亚洲佛教发展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南亚各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佛教的传播对人民起了精神鸦片的作用，但是，伴随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西域、天竺的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唯心主义哲

学，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汇、新的文体和音韵，同时，使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及医学中都渗入了印度与中亚的新成份。

道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开始主要是在下层贫苦百姓中间流传。黄巾起义和张鲁起义都曾利用原始道教作为组织发动的手段。晋以后道教开始分化，统治阶级在严禁民间道教活动的同时，对原始道教进行了改造和利用，使之朝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方向发展。两晋之际的葛洪，是封建统治阶级御用道教的奠基人。葛洪早年学儒，西晋末年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东晋时退居罗浮山学道，归宗道家，著有《抱朴子》一书。葛洪将原始道教称"妖道"、"鬼道"，骂利用原始道教起义的农民是"奸党"，应该"犯无轻重，致以大辟"。在《抱朴子》中，他一方面宣扬采药炼丹，养生延年之术，为大官僚的腐朽生活服务；一方面强调君臣上下、设官分职是不能变易的天理自然。葛洪对道教的改造，使道教完全变成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宗教。

北魏时期，寇谦之再次对道教进行改造。他自称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要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①这就是说，他要变原始的道教为贵族道教。要人们"不得叛逆君王"，"勿怨贫苦"。他的改革，实质上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这种新道教得到北魏统治者的赏识扶持，拓跋焘尊他为国师，并为他在北魏都城平城设立道场，使道教在北魏很快发展起来。道教成了与儒、佛并列的一大宗教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佛教、道教广泛流传，与儒学形成并行之势，但总的来说儒学思想仍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主要的指导思想。尽管儒、道、佛三家在争夺正统地位上不断发生矛盾斗争，

---

①《魏书·释老志》。

可是本质上它们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的工具。

范缜与《神灭论》 在佛教流行的同时，反佛思想也在发展。刘宋时的虞愿，斥责宋明帝搜刮百姓钱财修庙建寺"有何功德"，①北魏杨衒之见洛阳内外遍布佛寺，王公贵豪借修寺"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②在反佛斗争中态度最坚决，批判最深刻的是南朝齐、梁间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约公元450——515年）。

范缜对"浮图害政、桑门蠹俗"的现象深恶痛绝，著《神灭论》,对佛教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首先提出形神相即思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③认为精神与肉体是互相依存的，精神随形体的消亡而亡。继而又提出形质神用思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认为肉体是精神存在的依据，精神是肉体所表现的作用。他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比喻，指出神犹如刀刃的锋利，形犹如刀刃本身，"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是对神不灭论的有力批判。此外，范缜还指出精神是人质所特有的属性，木头与人同是物质，但木头没有知觉，人有知觉。这就是说只有活人的质才能产生精神作用，知觉是人的独特属性，所以精神属性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

《神灭论》从理论上冲击了佛教思想，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梁武帝萧衍组织了60多人写了75篇文章围攻范缜，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有人用利禄诱惑范缜,要他放弃神灭论观点，保证官至中书郎。范缜答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④由于他坚决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终于被流

---

①《南史·虞愿传》。

②《广弘明集·王臣滞惑篇》。

③《梁书·范缜传》。

④《南史·范缜传》。

放广州，不屈而死。

《神灭论》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光辉篇章，它的唯物主义思想超过了此前所有的思想家。但是范缜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的差异，是由天赋的形质不同决定的，穷困、富贵都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等。尽管如此，范缜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论者。

二、史学、地理学与文学艺术

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很发达。主要是因为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汉族统治者需要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经验作为借鉴，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求寻找历史根据以证明其正统地位；门阀士族为维护自身特权重视谱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加上政局变化打乱了官府控制史学的格局，纪传体、编年体的史书形式突破了，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史学繁荣的局面。

当时，私家撰史之风盛行，出现了一批史学名著。宋范晔的《后汉书》和晋陈寿的《三国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史，共120卷，其中90篇纪传是范晔所撰，30篇志是司马彪所撰。《后汉书》叙事简明而周详，文笔生动，记载有重点，其中增立了一些新的类传，如党锢、文苑、宦者等，这是范晔的创新。

《三国志》是关于魏、蜀、吴三国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65卷。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它取材精当，文字洗炼，书成后便受到时人称赞。但由于《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刘宋时裴松之遂为其作注。裴注主要是以史注史，注文中引书多达150多种，使不少佚著的部分内容和三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得以保存。《三国志》和裴注都是研究三国的重要史料。

这一时期，著晋史者多达20余家，后来唐修《晋书》，就是

以南齐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国均有国史，北魏崔鸿集其大成，撰成《十六国春秋》。唐修《晋书》时，取《十六国春秋》记事以为"载记"。由于《十六国春秋》及诸国史后皆失传，《晋书·载记》遂成为研究16国历史的主要资料。南北朝史，隋以前近20种，今存者仅《宋书》等三种。《宋书》是梁沈约所撰的刘宋一代纪传体史书，其中"八志"记述了部分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史料价值颇高。《南齐书》为梁萧子显所撰纪传体断代史。《魏书》为北齐魏收所撰，也是纪传体断代史。书中的《释老志》是研究古代宗教源流的重要史料，《官氏志》则反映了胡族贵族们的门阀化和北方民族融合的某些侧面，《食货志》记载了有关均田制的史实。

除正史外，还有人物传记和地方志等史书。梁释慧皎的《高僧传》，记录了250多名佛教徒的生平事迹，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晋常璩（qu渠）的《华阳国志》，记述了巴蜀、汉中、南中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的历史，是地方志的初始，也是研究汉中及川、贵、云地方史的重要资料。

地理学 这一时期的主要地理著作是北魏郦道元（约公元466或472—527年）的《水经注》。《水经注》全书40卷。它以前人所撰的《水经》为纲，①通过搜集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在注释《水经》所载的137条水道时，补充记述到1252条水道。详尽地叙述了水道经过地区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建筑名胜、历史传说等，内容丰富多采，文笔绚烂，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名著，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另一部地理学名著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书中在记录洛阳的佛寺塔庙的同时，详细记录了洛阳的城市建置，里坊衙司布局，工商产业状况，历史掌故及僧俗地主、达官贵族的奢侈生活等，是研究北魏

①《水经》的作者说法不一。或说为东汉桑钦，或说为晋郭璞，亦有认为是三国时无名氏所作，今人有认为是郦道元所作。

历史特别是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地理方志的发达促进了地图绘制方法的提高。西晋裴秀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历代地理沿革图）18篇，并在《序文》中总结了前代制图学的理论，提出了"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为地图绘制确立了科学的原则，使制图技术提高了一大步。

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使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又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活基础；当时的君主贵族亦多崇尚文学，注意招揽文士；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则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是诗歌和文艺理论。

五言诗在东汉时已趋于成熟，这一时期，在语言和技巧方面又达到了新的水平。建安（公元196—220年，是汉献帝的年号）时期，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平、陈琳、应玚）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以当时的社会战乱和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的诗歌篇章，形成了建安文学特有的风骨和力度。

曹操不仅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第一流的诗人。史称他"登高必赋"，其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内容苍劲雄健，慷慨激昂。著名的如《蒿里行》，描述了汉末战乱对社会的破坏，"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龟虽寿》的"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句，表达了作者统一全国革新政治的抱负。曹丕的《燕歌行》一首，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诗中"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摇落露为霜。”“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等句，反映了徭役征发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曹丕弟曹植，词采华茂。他的《送应氏》一诗反映了董卓之乱时对洛阳的破坏：“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壁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王粲的《七哀诗》描述了被因军阀混战破坏的长安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著名女诗人蔡琰（字文姬），以自己被掳往匈奴的切身遭遇为内容，用强劲的笔力，激昂辛酸的情感，写出了著名的长篇五言《悲愤诗》，倾述了自己渴望回归故国却又难以割舍亲生骨肉的愁苦心情，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建安以后，田园山水诗逐渐发展起来。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是田园诗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公元365或376—427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作过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南)县令，因受大族排挤，辞官归隐农村，消磨于田园生活，直至病死。由于他经常参加农业劳动，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因而诗中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歌颂，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归田园居》及《桃花源诗》等。《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现他不随俗沉浮，不追求功名利禄的情操。他的《桃花源诗》幻想有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的理想社会；他著名的散文《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虽然陶渊明的作品中有消极避世的思想，但他的作品隐寄着洁身守志，不与腐朽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积极一面，是值得称道的。

民歌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相当发展，出现了一些传世名作。建安时期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了庐江（今安徽潜

山）小吏焦仲卿和妻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全诗350多句，1700余字，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鲜明，艺术感染力很强，对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作了血泪的控诉。歌颂了主人公真挚的爱情和反抗精神。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自然环境和民族的不同，使南北民歌风格也有所不同。南方民歌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和经济的开发，显得清新绮丽，其中描写爱情的民歌占主要地位。而北方民歌则因胡汉杂揉而表现得质朴、奔放、雄健。著名的如《敕勒歌》，词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宛如一幅草原放牧的美丽图画。《木兰辞》是北方民歌的杰作。它叙述了一个热爱祖国，代父从军，不慕名利胜利归来的少女木兰的故事，词句通畅，层次清晰，脍炙人口。

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选集专著等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文学批评之风。其后文学批评著作不断出现。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名著。全书50篇，系统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是前人文学批评的总结性著作。刘勰反对以形式取胜的文风，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教，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要随时代而发展。这部著作把文学理论和批评推向一个新阶段。钟嵘的《诗品》是关于五言诗的总结，对汉至梁的120多名作家都给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是一部著名的文学选集，选录了先秦至梁的许多诗、文，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此外，由于佛、道教的流行，神话志怪小说也随之而起，如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和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是一部笔记小说，记载的是东汉至东晋的士族生活轶事，暴露了大族的清谈之风和腐朽的生活。

艺术 这一时期雕塑、绘画、书法都有较突出的发展，代表了当时艺术的最高成就。

由于佛教流行使石窟艺术得以发展，石窟艺术是雕塑与绘画的结合。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现存492个窟中有20个是前秦至北魏开凿的，由于这里石质疏松不宜雕刻，故佛像多为泥塑，洞壁则为佛教题材的大型彩绘，色彩明艳，绘制精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始凿于西秦建弘年间(公元420年—428年)。山西大同西武周山的云岗石窟，开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今存53窟，大小佛像51000尊，①最大的佛像高17米，气势雄健，古朴。其中开凿最早的是昙耀5窟，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特征。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有数千个洞窟和壁龛，其中造像的3/10是北朝时的，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宾阳洞中的“帝后礼佛图”是表现北魏孝文帝与皇后礼佛的浮雕，雕刻得十分精细，人物形象很接近生活现实。天水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现有洞窟194个，泥塑、石雕7000多个，修建于地势险峻的断崖绝壁上。这些石窟都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宝库。

这一时期的绘画名家辈出。三国时的曹不兴，善画佛象和人物，曾为孙权画屏风，将误落的墨点绘成一蝇，孙权竟误以为真蝇，抬手去掸，此即典故“误笔成蝇”之由来，可见曹不兴写实技艺的高超。他的弟子卫协也名噪一时，与西晋张墨并称“画圣”。卫协弟子东晋顾恺之，擅长人物画、山水画，是当时最杰出的画家。其画人物重在点睛传神。曾为建康瓦棺寺画维摩诘像，画成后光照一寺，参观施舍者蜂拥，瓦棺寺日得钱百万。现存顾恺之遗画《女史箴图》，是后人临摹的，但仍保存了真迹的技法风格，是古画中的珍品。梁时张僧繇对绘画有独特创造，画山水不以笔墨勾勒，史称“没骨山水”，自成一家。

---

①《文物》1976年4期：《云岗石窟》。

我国独特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创造性的发展。曹魏时，钟繇创真书（楷书），名盛天下。东晋的王羲之吸收汉魏书法诸家之精华，兼善隶、草、真、行于一身，世称“书圣”，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① 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造诣亦深，人称之为小圣，父子合称“二王”。北朝书法另具特点，字体雄厚古朴，属于汉魏隶书的变体。由于北魏碑文多用此体镌刻，故称这一书体为“魏碑”。著名的书法家有郑道昭等。

三、科学技术

数学 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数学的黄金时期。魏晋之际的著名数学家刘徽，注释了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并撰写了《海岛算经》一书。刘徽首创割圆求圆周率的方法，求出圆周率为3.14，并将此数值化为分数$\frac{157}{50}$，后人称它为“徽率”。宋、齐之际，杰出的大数学家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艰苦的实践，求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准确地推算到小数后第七位数的人。他还用两个分数来表示圆周率，$\frac{22}{7}$称约率，$\frac{355}{113}$称密率，用上下两限来规定数值的有效范围。这个密率值要比欧洲人早发现1000多年，直到1573年，德国人鄂图才达到这个水平，因此，密率又被人们称为“祖率”。

天文历法 发现“岁差”，是这一时期天文历法方面最重大的成就。晋以前不知有岁差存在，认为太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总是在空间的某一个固定点上，即太阳走完了一周年，也就是走

① 《晋书·王羲之传》。

完了一周天。东晋虞喜通过观测发现，冬至点是缓慢移动的，一周年不等于一周天，周年与周天间之差就叫岁差。虞喜的发现得到后秦姜岌、宋何承天和祖冲之的证实。祖冲之曾“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①证实了岁差的存在，并将“岁差”首次应用到他制定的《大明历》中。《大明历》规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1481天，与近代科学测定的日数相差不到50秒；并将古历法19年7闰调整为391年144闰。《大明历》的编制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前后沿用了80多年。

机械制造 三国时代的马钧是一位“巧思绝世”的发明家。他改造后的提水工具翻车（龙骨水车），功效较前提高了百倍。他将织绫机由五、六十蹑（nie聂）改为12蹑，效率提高了5倍。他还用差动齿轮机械构造原理改进了指南车，用12个复杂装置的齿轮，使指南车上的木人所指的方向不变。晋时杜预发明了水转连磨，祖冲之继续改进，结合水碓水磨，发明了水转连碓磨。不仅如此，祖冲之还创制了利用机械发动的“千里船”，可日行百里。

农学 北魏末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性著作。该书共10卷92篇，汇集了自周秦至北魏北方人民的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土壤整治、施肥选种、防旱保墒、果树、蔬菜的种植栽培、畜禽的饲养、食品的加工、野生植物的利用等。《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许多技术至今仍被应用。

医学 晋代的名医王叔和，著《脉经》一书，对脉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脉象归为24种，并分别阐述了各种脉象的状态及

①《南齐书·祖冲之传》。

其所生症候。这部书奠定了我国古代脉学理论的基础。王叔和还收集整理了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将其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使这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得以保存，并成为后代从医者的经典。

与王叔和同时的皇甫谧擅长针灸，著有《针灸甲乙经》12卷，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书中将秦汉以来针灸学的成就加以整理，又结合自己的临诊经验，详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厘订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部位，介绍了操作方法。这部书对以后针灸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东晋葛洪在医学方面也颇有成就。他著有《金匮药方》100卷，后又从中择出实用性强的部分内容作为简本，名曰《肘后备急方》，共3卷。书中详析了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及治疗方法，并对一些传染病的危害有所认识，如说肺痨病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梁时，陶弘景又对《肘后备急方》作了增补，著《肘后百一方》。陶弘景还将汉代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注释增补，著成《本草经集注》，所记药物由原来的300多种增至700多种，同时对药物的性味、采集、形态、鉴别等方面的认识也较前有了提高。他还首创了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为标志的药物分类法，成为后来中医药物的标准分类方法。

重要名词：

侯景之乱　宗主督护制　均田制　户调制　三长制
顾恺之　河阴之变　府兵制　葛荣　王羲之　祖冲之
法显　刘勰　范缜　《水经注》　《齐民要术》　《敕勒歌》
龙门石窟　云岗石窟

思考题：

1．试述南朝时南方经济开发的原因及其表现。

2．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哪些主要内容？历史意义怎样？

3．试述北朝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情况。

4．周武帝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如何？

5．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史学、自然科学方面有哪些著名的著作？写出它们的作者姓名。

第八章　隋朝的统一和隋末农民起义

（公元581—618年）

第一节　隋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隋朝的建立和统一中国

隋朝的建立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北部中国，又击败了陈朝，夺取了淮南地，北周的疆土，直抵长江沿岸。周武帝病死后，皇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周宣帝是位荒淫的皇帝，即位后就大兴土木，把人民每年服一个月的劳役增至45天，驱使数万民伕修洛阳宫，立了五位皇后，嫔妃不计其数，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①十天半月不临朝一次，整日在宫中寻欢作乐。他多疑，猜忌大臣对己不忠，动辄诛杀宗室与大臣，弄得“群心崩骇”，②“人不自安”。他嫌周武帝制定的法律《刑书要制》在量刑定罪上太轻，制定了峻苛的《刑经圣训》，遂使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580年，纵欲过度的周宣帝死，年仅8岁的周静帝宇文阐继位，外戚杨坚辅政。

①《周书·宣帝纪》。
②《隋书·刘昉传》。

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出身于高门士族五世祖杨元寿为北魏武川镇（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武川）司马，属六镇军人集团。父杨忠，是北周开国勋臣，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出任泾川(今甘肃泾川)总管。妻是鲜卑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第七女，是关陇集团的中坚分子。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先后出任定州、亳州总管，其女杨丽华是周宣帝皇后，他也因而被调入京师为大司马，总揽军权。周宣帝死后杨坚自领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后杨坚又自称隋王。公元581年，受禅即位，改国号隋，改元开皇，都长安。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隋的统一　隋文帝即位后，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超过了南方陈朝，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两晋南北朝期间，我国北方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已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共同体。南迁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一道开发江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消除隔阂，造成南北分裂的民族矛盾已不存在。这种民族的大融合，是促成全国统一的重大因素。同时由于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削弱了封建割据的基础，而南北的敌对状态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统一全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勤于政事，即位初就派具有文才武略的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驻庐江(今安徽合肥)；派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驻广陵(今江苏扬州)；隔江牵制陈都建康。同时，派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战舰，积极准备伐陈。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掉了割据江陵的后梁萧琮统治，扫除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公元588年秋，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统帅，高颎为长

史，统率50多万大军，八道出师，水陆并进向陈朝发动总攻。统治陈朝的后主陈叔宝，是一位荒于酒色，不理政事的昏君。陈朝国力虚弱，而他却役使民伕，在光昭殿前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窗、门、栏、槛都是用沉香木和檀香木做成。微风吹来，满院生香，供他享乐。他与张丽华、孔嫔妃、宰相江总、大臣孔范等在阁中饮酒赋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隋军临江，守将们一再告急，他却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孔范附合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①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韩擒虎、贺若弼率军过江，攻占建康，将藏在景阳殿枯井里的陈后主、张丽华和孔嫔妃活捉，陈亡。

后来，杨素率兵镇压了江南一些豪强士族的反叛，统一了全国。

隋的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分裂对峙的局面，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再建，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加强了民族的融合。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为唐朝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

二、隋朝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改革官制 隋文帝继承并完善汉魏以来的官制，中央设置三师、三公及内史（中书）、门下、尚书、秘书和内侍（宦官）五省。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只参加议事，无人则阙，名份虽高，并无实权，是给受宠大臣的荣誉衔。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三省职同秦汉时代的丞相。内史省是决策机关，长官是内史监、令，各一人；门下省是审核机

①《资治通鉴》卷176祯明二年十二月。

关，长官是纳言（侍中），二人；尚书省是执行机关，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民部（户部）、工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分别掌管选拔、考核官吏，礼宾朝仪，军政要务，定刑司法，户籍钱粮，营建工程等项事务。

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细密，把相权一分为三，既可相互牵制，又可相互补充，使皇帝握有绝对权力。它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统治机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三省六部制对唐朝以后的王朝职官影响很大，尤其六部制一直到清朝仍然沿用。

隋以前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重叠，职官紊乱。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十一月诏书中指出："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出现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①的现象。隋文帝本着"存要去闲，并小为大"②的原则，对地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整顿，把原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大业三年，又改为郡、县两级）。州设刺史，佐官是长史与司马，县设令。合并州、县，裁减一批冗官，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又废除了地方官自行选用佐官的旧制，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吏部对地方官政绩进行考核。这一改革，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创建科举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寒门地主参政的要求，隋王朝废除由门阀士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令诸州每年举三名贡士。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长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③隋炀帝时，"置明

①②《隋书·杨尚希传》。

③《册府元龟》卷645《贡举部》。

经，进士二科”。①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做官三者结合起来，使一般地主子弟也能通过读书参加考试做官。这无疑扩大了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科举制的创立，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标志着封建社会选官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兵制 为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保证封建国家的兵源和财源，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②这样，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现象，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

改革法律 隋文帝针对北周刑政苛繁的情况，制定了《开皇律》。《开皇律》分十二篇，有死、徒、流、杖、笞五刑，废除前朝枭首、轘裂、孥戮、宫刑等酷刑，删繁就简，只保留了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有冤者可以逐级上诉，直到中央，凡被地方判为死刑的囚徒，必须呈报中央核准方可行刑。但所制订的“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条，仍属不赦。隋律充分体现了严酷镇压人民，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职能。如盗一钱以上者，三人合偷一个瓜均处死刑。贵族官吏犯罪，只要不是犯“十恶”罪，可以减刑一等，甚至可以用铜赎罪。隋炀帝时，又颁布了更为苛刻的《大业律》。

三、隋初发展经济的措施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推行均田制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新令规定：凡18岁以上的男丁受露田80亩，受桑田或麻田20亩。一妇受露田40亩。奴婢受田与编户齐民相同。牛一头

①《大唐新语》卷22《厘革》。

②《隋书·高祖纪》下。

可受露田40亩，限4牛。同时规定：自亲王至都督受永业田，百顷至30顷。京官从一品到九品，皆领职分田五至一顷不等。税收制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纳半，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役一月。后来将成丁年龄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成丁服役期限减少10天，调绢减为二丈。后又规定丁男50岁以上可以输庸代役，每日以三尺绢计算，纳六丈。

隋初的均田制与租调制虽然存在农民受田不足与官僚地主占田过多的弊端，但政府把一部分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使农民多少得到了一点土地，赋税较前朝轻，特别是把成丁纳租服役的年龄提高，年老者可以纳"庸"代役，给农民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大索貌阅与输籍法 南北朝以来，户口隐瞒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地区的农民苦于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为了生计，不是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就是依附豪强地主作属民，摆脱封建国家的控制。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户口。首先，整顿建全地方的基层组织，畿内（首都长安及直辖县）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五保以上为里，设里正；里以上为党，设党长，命他们负责检查登记户口。其次，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令各州县官吏进行清查户口，大索貌阅。州县官吏按照户籍簿所登记的性别、年龄和本人的体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相符，如发现隐漏者，把里正、党长发配远方。同时还规定：堂兄弟以下，必须分居，各自生产，以防隐漏。为了保证清查工作，奖励百姓互相检举。隋代的大索貌阅，是我国古代大规模的、认真的一次户口清查，清出40多万壮丁，164万余口。隋炀帝时，又清查一次户口，得24万余丁，64万余口。

隋文帝在推行大索貌阅的同时，采纳了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

输籍法（“输籍定样”），与豪强地主展开争夺纳税户的斗争。政府将各等人所纳之税，依每家财产多少，定出纳税标准，写成定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再进行复查。输籍法的实行，削弱了豪强地主势力，防止地方官吏舞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

统一钱币 隋以前的钱币极其紊乱。南朝有五铢、六铢、鸡眼钱，岭南则不用钱，而以盐、米、布交易。北朝北齐有常平钱，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钱等，而河西诸郡则用西域的金银钱，各地还混杂私钱，钱币大小轻重不一，民皆不便，影响了商业的发展。

隋文帝即位后，统一钱币，改铸五铢钱，每千文钱，重四斤二两，严禁私人铸币。至此，钱币始得统一。同时，统一了度量衡。

隋朝是继秦以后又一个统一全国的短命王朝，仅存在38年，但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社会经济曾一度出现了短暂繁荣的现象。这是因为，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对峙，完成了国家统一，战争减少了，社会秩序基本安定。隋文帝即位后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隋初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 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人口激增、耕地面积扩大和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几个方面。

隋初，政府掌握的户口约有410万户左右，人口约3千万，到了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户口已达到890多万户，4600多万口。在短短的20多年间，户数增加480多万，人口增加1600多万。人口激增，固然与隋初清查户籍有关，但社会安定也是个主要因素。人口激增，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不少荒地被垦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记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耕地1900多万顷，到炀帝大业年间，增加到5580多万顷。

在耕地面积扩大的同时，还改造与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粮食生产显著增加，隋政府从农民那里搜刮的粮食和布帛堆积如山。为了存放这些粮食，从长安到洛阳沿黄河和渭河两岸的城镇修建了许多仓廪，其中主要有长安的太仓、华州的广通仓（后改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和洛口仓、洛阳的含嘉仓、汲州的黎阳仓等。每仓储粮多至千万石，少则数百万石。公元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新城发现了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建造的含嘉仓遗址，面积极为广大，仓城内已发掘259个粮窖，其中160号粮窖还保存着已经碳化了的谷子约50万斤左右，这一窖并不是最大的，隋代仓库储粮之多是封建社会仅见的。

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纺织业、瓷器业、造船业等技术的提高上。

纺织业：河北是古代丝织业的中心，北齐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设绌绫局。相州(今河南定阳)生产的绫纹细布，十分精美。蜀郡(今四川成都)生产的绫锦，做工极细，“殆侔于上国”。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盛产蚕丝，妇女勤于纺织，夜浣纱而旦成布，俗称“鸡鸣布”。

瓷器业：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发展的重要阶段，窑场倍增，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和浙江等地。除生产青瓷外，开始生产白瓷，如近年在李静训墓和张盛墓出土的白釉瓷器鸡首壶、白瓷罐等，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美观。

造船业：隋代造船业很发达，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督造五牙大船和黄龙船，五牙大船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宽，可容纳800人。隋炀帝为游江都制造了许多种船。他所乘的“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分层，上层仿宫殿式，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舱房，船身饰以丹粉，金碧辉煌，极

---

①《隋书·地理志》上。

为豪华，可见制作技术的高超。江南是我国造船之乡，隋文帝为防止人民反抗，不许江南诸州和民间造船超过3丈以上，否制没收入官。从隋文帝这一诏令，也可以看出民间造船技术是很高的。

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全国统一，为各地商品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开皇初，隋文帝采取了许多有利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统一钱币与度量衡、弛山泽之禁、取消入市税、罢酒坊、废除禁止百姓开采池盐、盐井的法令。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商业也活跃起来。

那时商业都市十分繁荣。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商业都会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城内有东西二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占地两坊，是手工业与商业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①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丰都，南市大同，北市通运。丰都市方圆八里，通十二门一百二十行，三千多个肆，四百个店铺，“重楼延阁，互相辉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②丹阳（今江苏南京）、蜀都、江都、京口（今江苏镇江）、宣城（今安徽宣城）、荆州（今湖北江陵）、南海（今广东广州）、歧州等，商业也很发达。

隋代商业发展了，管理市场的机构也日趋严密。长安、洛阳等五个市设立市署，长官称“令”，署下设肆长。州县的集市设“市令”，边境设互市监。

隋对外贸易分陆路与海路。陆路主要在西北，隋炀帝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派黄门侍郎裴矩坐镇张掖，掌管通商事务，以厚利吸引西域及中亚地区的商人东来进行贸易，西城和中

①《隋书·地理志》上。
②《大业杂记》。

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隋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海路主要是对日本和南洋贸易与友好往来。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及随员携带大批礼品乘船出使赤土国，受到国王的欢迎。国王派王子那邪迦随常骏来中国答谢，受到了隋炀帝的接见。

日本古称倭国，远在东汉光武帝时，中日两国报使通聘，魏晋以来不绝。公元607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率沙门数十人来中国学习佛法。公元608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回访日本。中国赠日本衣锦线冠，从此日本人民开始穿戴汉人的衣冠。

营建东都 隋炀帝继位，嫌都城长安地处关西，“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难以控制全国各地，不利于统治，加之关中物资缺乏，无法满足中央政府庞大官僚群的需要，决定营建东都洛阳。“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交通便利，便于运输。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尚书令杨素为将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设计营建洛阳，经过一年建成，洛阳成为隋炀帝统治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开凿大运河 隋统治者为了控制江南调运粮食等物资以及巡游的需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杭州），利用天然河道和原有的旧渠道开凿运河，分为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邗沟）和江南河。

通济渠：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政府征发河南、淮北百万民伕开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通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沟通汴水、泗水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

山阳渎：在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又疏浚从淮安到扬子江(今江苏仪征)入长江的邗沟。邗沟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开。公元587年隋文帝为了伐陈，下令疏浚这条水道。公元605年，隋炀帝对山阳渎又进行整修、扩大。水面宽阔40步，两岸为大道，种榆树和柳树，树

荫相交。

永济渠：公元608年，征调河北百万民伕，利用沁水河道引沁水入黄河。南通黄河，入口处与板渚夹岸相对，北到涿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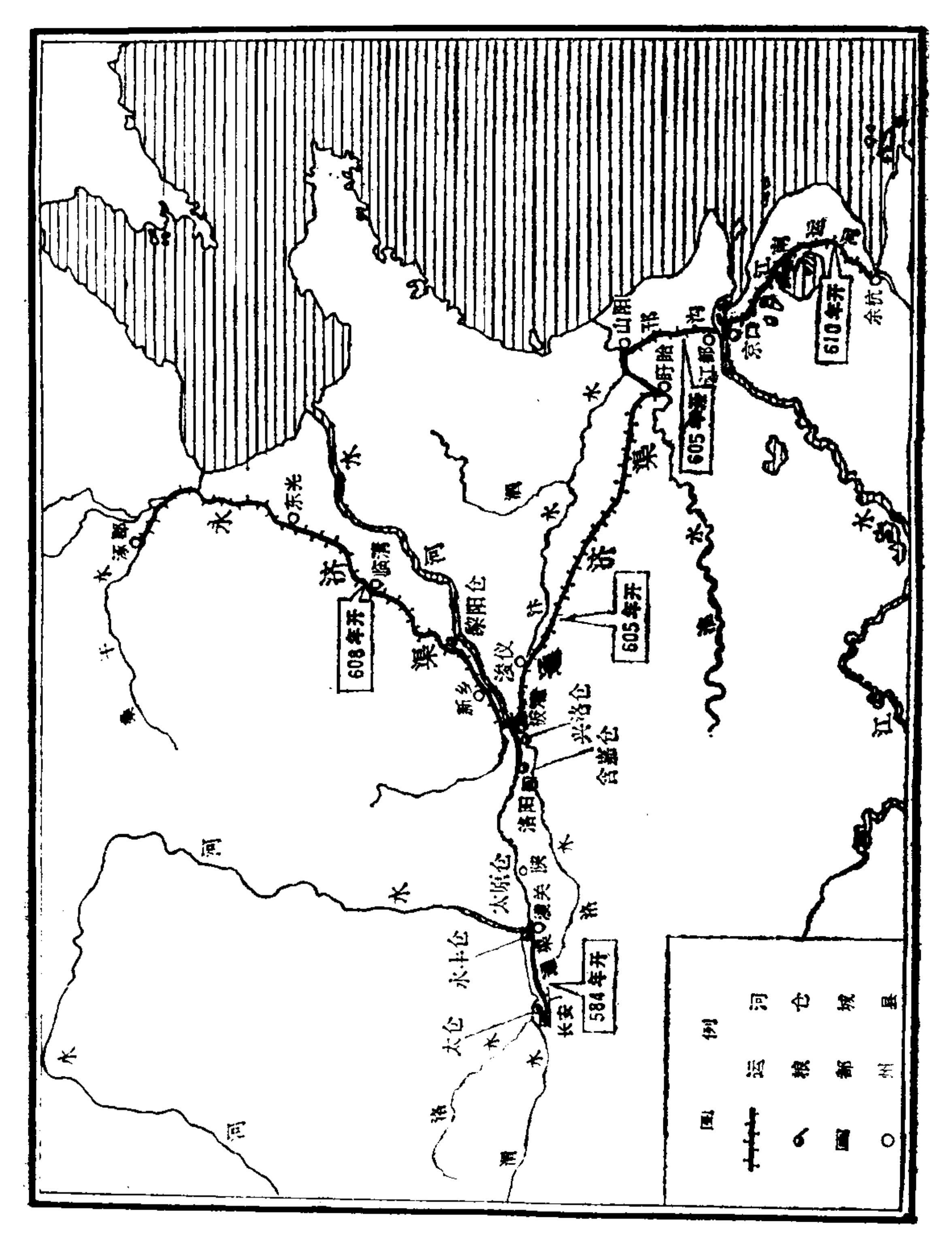
江南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接广通渠（大兴城到潼关）通八百里秦川，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南北贯穿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四、五千里，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结晶。大运河的开凿，虽然记录了隋炀帝的残暴，不惜民力，但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河中"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①大运河对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着极大的作用。

四、隋与边疆各族的关系

突厥 突厥族是匈奴族的别支，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六世纪时，突厥势力逐渐强大，公元552年，首领阿史那土门称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木杆可汗统治时，突厥领有东起辽海（辽河）以西，西到西海（里海），南控大漠，北达北海（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控制着丝绸之路。突厥汗国在它的统治区分设了许多可汗。隋初，突厥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籍北周曾把千金公主嫁给他，他要为北周报仇为名，公元582年，纠集40万大军南下攻隋的武威、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天水、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延安等地，大肆杀掠，把这些地区弄得"六畜咸尽"。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

①《通典·州郡典》。



长安
584年开
太仓
永丰仓
潼关
太原仓
陕
洛阳
含嘉仓
兴洛仓
新乡
浚仪
黎阳仓
临清
608年开
东光
涿郡
605年开
山阳
盱眙
江都
京口
610年开
余杭
图例
运河
粮仓
都城
州县

隋朝运河图

文帝派河间王杨弘等进行反击，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军事上的失败，促进突厥内部分裂，阿波可汗与达头可汗占据西域地区，称西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统治地区称东突厥汗国。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降隋，隋封他为启民可汗，并嫁义安公主与他。此后，双方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往也更加频繁。

吐谷浑 西晋末年，原居住在辽西的鲜卑贵族吐谷浑率领一部鲜卑人西迁青海高原，逐渐征服当地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吐谷浑与北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北齐静帝将宗室女嫁吕夸可汗，而他则纳吕夸可汗从妹为妃。吐谷浑职官多仿北魏、北周，有三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服装也略同汉族服装，政治上始终受北朝管辖，称臣受封。隋文帝时，把光化公主嫁与吐谷浑统治者世伏，后世伏为部下杀死，其弟伏允立，又将光化公主嫁伏允为妻，"自是朝贡岁至"，双方关系日益密切。

炀帝时，为了经营西域，保护丝绸之路，在吐谷浑设置了河源（今青海湖南境）、西海（今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若羌东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并遣内地人到这里屯田，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

台湾 隋时，台湾称流求。早在三国时期，诸葛直、卫温奉孙权之命到达台湾，此后，大陆不断有人去台湾进行贸易。公元607年和608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到台湾"求访异俗"。①公元610年，又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带领1万多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达台湾，与台湾居民进行贸易。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日益增多，大陆与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

①《隋书·东夷传》.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一、隋炀帝的暴政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他早就觊觎帝位，以各种欺诈手法骗取父皇的信任，又培植私党，施展阴谋，使文帝废掉太子杨勇，改立他为太子。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卧病宫中，太子杨广与杨素合谋，派张衡杀隋文帝，又杀死兄长杨勇，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元大业。他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

滥用民力 隋炀帝一上台，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民伕200万，由于“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①修西苑，木料都是从五岭以北，长江以南运来的，每根大木柱需要二千人共拽，仅一根大木柱运到洛阳就需要几十万个民工。同时又征调几十万民伕修环卫洛阳的长堑。长堑起自龙门(今山西临津)，经长平(今山西晋城)、汲郡(今河南濬县)、临清(今河南新乡东)、浚仪(今河南开封)，到上洛(今陕西商县)，沿堑设置关防。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05—610年），炀帝强征男丁300万开运河，丁男不足，又征妇女。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征丁男100万修长城，限在20天内完成，民工在东西千余里的长城线上日以继夜劳作，死于此役的民伕竟达五、六十万之多。在炀帝统治的14年中，征调的民伕不下1千万，以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最高户数890万户计，平均每户有一点一三丁应征服役，人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不惜自残手与足，称为“福手、福

①《隋书·食货志》。

足”，“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骄奢淫逸 炀帝自恃才高、富有，把劳动人民艰辛创造的财富任意挥霍浪费。在东都洛阳西面，修建200里的西苑，苑内有人工海，方园十里，在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有许多亭台楼阁，海北又修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龙鳞渠”，由北面注入人工海，蜿延的龙鳞渠两旁建有16院，院内堂殿楼台，极其华丽，每院有宫女、美人数十人，由四品夫人统管。宫内广种奇花异卉，饲养着各种珍禽异兽，以供炀帝观赏、射猎。每到秋冬季节，百花凋落，宫女们用彩绢剪成花叶装饰，旧了再换新的，保持四季常绿。夜里，炀帝带着数千名宫女、美人骑着马，奏《清夜曲》游西苑，常常是通宵达旦。

隋炀帝好大喜功，自登位以来年年出巡。在帝位的14年中，居留西京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人民遭受无穷尽的灾难。

炀帝在第一次出游江都时，带领后妃、王公贵族、百官、僧尼和道士，分乘几千艘大船，船头船尾相接，长达200里，仅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两岸护卫人员有二、三十万人，巡游所经之处，既要整修道路，又要缮治离宫别馆。炀帝与后妃、臣僚们则天天饮酒作乐，每到夜晚，灯火通明，丝竹鼓乐之声闻于数里之外。500里内的百姓被迫献上山珍海味佳肴。吃不完，在出发前就埋掉。许多郡守县令乘机敲诈勒索，为了讨炀帝欢心，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租调，民不堪命。第二年炀帝从江都返回洛阳时，不乘船走水路，而乘舆走陆路，遂命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等，为装备3万6千人的仪仗队，“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浊禽兽殆尽，犹不能给”，①竟出现一根羽毛价值15匹绢的怪现象。炀帝第三次游江都，更不知浪费多少人力与物资！

---

①《隋书·食货志》。

炀帝又是一个虚伪浮夸、讲排场的君主。大业五年，他西巡张掖，为接见西域使者，"皆令佩金玉，……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示中国之盛"。①大业六年正月，在洛阳大街上设立戏场，演出百戏，戏场周围5千步，执丝竹者1万8千人，演出员及乐队达3万人，"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②为了向少数民族夸耀隋王朝富有，炀帝"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籍以龙须席"，用绫绢把树缠上。酒店饭店人必须用最好的酒、饭、菜招待西域商人，分文不收。有的西域商人发现这是个骗局，指着衣不蔽体的穷人对市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绢绸给他们穿，却用来缠树呢？炀帝的穷奢极侈，可以想见，

党同伐异，滥杀无辜 杨广继位后，为了巩固帝位，对亲信一律加官晋爵，给以重用。杨素在废立太子及杨广称帝问题上出过大力，晋升尚书令，弟杨约先任内史令，杨氏一门垄断三省大权，权倾内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③在长安与洛阳都有他的华丽住宅，又在各地广占邸店、水硙和田宅。宇文述"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之。"屡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深得炀帝的欢心，故"言无不从，势倾朝廷"。④内史侍朗虞世基与妻孙氏"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⑤御史大夫裴蕴本是陈的降官，善于窥炀帝微意，为了讨好炀帝，他建议把天下周、齐、梁、陈的乐户子弟都编入乐户，并把六品官以下，懂音乐的人统统送到洛阳供炀帝享乐。这些佞臣朋

---

①《通鉴》卷181，大业五年六月。
②《通鉴》卷181，大业六年正月。
③《隋书·杨素传》。
④《隋书·宇文述传》。
⑤《隋书·虞世基传》。

比为奸，把持朝政，与炀帝干尽了坏事，把刚刚统一不久、开始富足的王朝又推进毁灭的深渊。

炀帝是一位自作聪明、刚愎自用、凶险残暴的君主，只要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对劝谏和反对他的大臣，不管其功劳与才能如何，一律贬斥、谋杀。高颎是隋朝开国功臣，文才武略，朝野推服，深受隋文帝的信任。伐陈时，高颎任杨广的长史，规劝杨广不要纳陈后主妃张丽华，并将张丽华处死，炀帝一直怀恨在心。大业三年六月，炀帝征百万民伕修筑长城，出榆林巡边，会突厥启民可汗，高颎和贺若弼等私下议论炀帝纵情声色，“近来朝廷殊无纲纪”，被人告密，“帝以为诽谤朝政”，①将高颎、贺若弼和礼部尚书宇文弼诛杀，苏威也被免官。薛道衡后来说了一句怀念高颎的话，也被以“谋反”罪杀害。朝中的大臣不是怕招来杀身之祸，咸默不语，偷安高位，就是揣摹上意，阿谀奉承，聚敛财富。炀帝无所顾忌，纵情欢乐。

隋炀帝不仅诛杀大臣，对人民的镇压更为残酷，他规定凡是起来对抗的，不管罪轻罪重，不用报告，地方官吏可以处死，并籍没其家。在杨玄感起兵后，他又规定反抗者诛杀九族，把隋文帝早已废除的“轘裂、枭首、磔”等酷刑又恢复起来。炀帝对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②炀帝以苛法酷刑滥杀来维护反动统治，结果是“百姓怨嗟，天下大溃”。③

进攻高丽 高丽原名高句丽。早在两汉时期，就臣服中国，经常遣使朝贡，东晋南北朝时，高丽向北扩展，辽东地区遂为其所据。北齐时，废帝高殷封王阳为高丽王，始去“句”字。高丽

①《通鉴》卷180，大业三年七月。

②《隋书·裴蕴传》。

③《隋书·刑法志》。

与中国为邻，汉化程度深，以农业立国，城池坚固，是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高丽三个分立国家中最强的一个。隋文帝时，高丽派兵进攻辽西，文帝派军队30万进行反击，因运粮不继、军中疾病流行，双方讲和，高丽亦遣使朝贡。

炀帝继位后，以高丽王不肯入朝觐见为名，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隋炀帝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向全国下动员令，以东莱(今山东掖县)和涿郡作为进攻高丽的两个基地。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负责督造战船300艘，工匠被迫日夜在水中工作，自腰部以下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命全国的陆军不论远近一律到涿郡集中，征调江淮以南的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充作水军。命河南、江南造成兵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以供应送衣甲幔幕。又征发大量的民伕运粮、甲杖等，仅山东一地被征的民伕就有60万，“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①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出动113万军队，号称200万，由炀帝节制。分成24军；每日出发一军，40天才能走完。队伍首尾相接，长达千里，浩浩荡荡，根本不象作战的样子，结果是惨败而归。宇文述所率30万士兵渡过鸭绿江，在平壤遇到伏击，生还辽东者仅2700人。第二次进攻高丽，因负责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攻打洛阳，隋炀帝慌忙从高丽前线撤兵而回。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因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只好与高丽讲和而告结束。

由于徭役、兵役和赋税的繁重，特别是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在全国实行大征调，“扫地为兵，逆折十年之租”，出现了“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的凄

---

①《通鉴》卷181，大业七年七月。

惨景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劳动人民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爆发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农民大起义

王薄起义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十月，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聚众起义，自称“知世郎”，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歌词说“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①这首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战争和反对隋王朝的统治，许多逃避赋役的农民纷纷参加义军，王薄首义揭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各地响应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响应王薄首义的主要有：占据豆子䴚（今山东阳信东）的刘霸道；聚众在高鸡泊（今山东恩县东北）的孙安祖；活动在鄃县（今山东夏津）“河阻”中的张金称；往来于蓨县（今河北景县）一带的高士达。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杜彦冰、王润、郝树道等在平原（今山东平原东北）起义；孟海公在周桥（今山东城武）起义；郭方预在北海（山东益都）起义；韩进洛、甄宝车在济北（今山东茌平）起义；格谦、孙宣雅在阳信（今山东阳信）起义；孟让在齐郡（今山东济南）起义；白瑜娑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起义。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多系逃避兵役和徭役的贫苦农民，漳南人孙安祖家被大水所淹，妻儿活活饿死，他又被选为“征辽”的士兵，按照隋的府兵制度，战士衣粮以及大部分用具均需自备。孙安祖生活困难，请免去他“征辽”士兵资格。县令不仅不准，反将其毒打，

①《古今风谣》（出自《类说》卷6，刘仁轨：《河洛记·知世郎》）。

他怒杀县令，在窦建德的协助下到高鸡泊聚众起义，走上了反抗隋王朝的道路。

这些农民起义的范围不够广泛，除白瑜娑在西北，高士达在河北外，其余都集中在山东地区，大者十万余人，小者有数万人，各自为政，比较分散，而活动地区则主要在乡村，虽有攻城略地，都得而复失，未能对隋王朝构成大的威胁。

杨玄感起兵反隋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六月，隋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反隋。杨玄感是权臣杨素的儿子。隋炀帝第二次进攻高丽时，命他在黎阳督运军粮。杨玄感看到到处都是农民起义的烽火，炀帝又一意孤行，“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与诸弟潜谋作乱”。①他在誓师时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②且不论杨玄感起兵动机如何，他举兵反隋，在客观上有利于正在山东苦斗的各支农民起义军，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每天都有几千人投到他的部下。一些贵族官僚的子弟也参加杨玄感反隋的队伍，贵族李密成为杨玄感的谋主。

杨玄感毅然起兵反隋，但对以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却估计不足，又未接受李密长驱攻蓟的建议，而是率兵攻打坚城洛阳，围城三月不克。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消息传到前线，正在与高丽争战的隋炀帝，十分恐慌，立即回军镇压杨玄感，杨玄感兵败自杀。

正当杨玄感起兵反隋时，江浙地区有刘元进、朱燮和管崇分别起义，韩相国在河南商丘起义，大业十年二月，扶风人唐弼率10万之众起义，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四月，张大彪在鼓城(今江苏徐州)起义，大业十一年二月，朱燮率领十余万人转战于

---

①《通鉴》卷182，炀帝大业九年四月。

②《隋书·杨玄感传》。

荆、襄、汉、河南一带，自称楚帝。起义军活动地区由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多达数百万。隋王朝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三、隋的灭亡

起义军在同隋军作战的过程中，由于力量分散，孤军作战，不少起义队伍被隋政府军所镇压。农民军首领如张金称、高士达格谦等也先后在战斗中牺牲，面对这种不利的局势，农民军领袖们逐渐认识到"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①于是分而复聚，纷纷投奔到较强的义军里去。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汇集成以翟让、李密、窦建德和杜伏威为首的三个强大的军事集团，使隋末农民起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瓦岗军　瓦岗军是翟让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境)创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翟让，韦城(今河南滑县)人，原是隋的东郡(今河南滑县）法曹，因犯法入狱，后越狱逃到瓦岗聚众起义，参加起义的还有单雄信、徐世勣（李世勣）、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翟让沿运河"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曾帮助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李密参加了瓦岗军。李密说服了附近一些起义军归入瓦岗军，并协助翟让攻取金堤关(今河南荥阳东北)，占据荥阳附近的一些县。炀帝急命张须陀率两万官军去镇压瓦岗军。翟让采用了李密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荥阳大海寺北林中埋伏，最后围而歼之，杀死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张须陀。"河南郡县为之丧气"。②瓦岗军不断壮大，闻名天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李密的谋划下，瓦岗军7千人奔袭离东都只有百里的兴洛仓(今河南巩县内)，"开仓恣民所

①《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年十二月。

②《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月。

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①由于李密对瓦岗军的贡献，而且才能出众，翟让主动把瓦岗军的领导权让给了他。李密称魏公，建元永平，封翟让为司徒、东郡公。他在兴洛仓附近筑洛口城，方园40里，作为瓦岗军的根据地。接着，瓦岗军攻破回洛仓，进逼东都洛阳城下，李密发布讨隋炀帝的檄文，数炀帝十大罪，“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②，把斗争的矛头直指隋朝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参加瓦岗军的人络绎不绝，达数十万之多，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中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河北起义军 河北起义军是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由高士达、张金称、窦建德等人创建的。后来高士达、张金称先后战死，窦建德收合他们的余部，以高鸡泊为根据地逐渐发展起来，兵力达十几万人。

窦建德，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有胆气，有勇力，为乡党所附。隋王朝“扫地为兵”，命他做200人的队长。后因官府怀疑他和起义军有联系，捕杀了他的家属。窦建德率从征的200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他作战勇敢，“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③士达牺牲后，被推为首领，大业十三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南献县)称“长乐王”，改年号为丁丑，建立农民政权。同年七月隋炀帝派涿郡留守薛世雄率3万官兵南下，围歼瓦岗军。窦建德率勇士千人乘大雾在河间(今河北河间)七里井奇袭了薛世雄的大营，隋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自相踏藉，死者万余”。④薛世雄率领几百残兵败将逃回涿郡，不久死去。河间大捷，有力地支援了瓦岗军，同时，河北大部皆为窦建德所有，大业十四年，窦建德改国号为“夏”，改称夏王。把都城迁

①《通鉴》卷183，义宁元年二月。
②《旧唐书·李密传》。
③《通鉴》卷181，大业七年十二月。
④《旧唐书·窦建德传》。

到洺州（今河北永年）。后来，在聊城擒杀了已称许帝的宇文化及，威震河北。

窦建德生活俭朴，布衣素食，妻子曹氏也不穿绸衣，所得资财都分给部下，他在境内劝课农桑，修复水利，发展生产，甚得民心。“夏氏为国，……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加而胜，令所到而服”。①

江淮起义军 江淮起义军是杜伏威与辅公祏领导的。杜伏威，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大业七年，参加了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军，作战在前，撤退在后，深得同伴的爱戴。大业九年，隋军围剿长白山的义军，杜伏威率领农民军突破隋军的阻截，南下淮南，兼并了其它两支义军，以六合为根据地，进逼江都。大业十三年，杜伏威大败隋将陈稜统率的禁军。乘胜占领高邮（今江苏高邮）、历阳（今安徽和县），攻克丹阳（今南京），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犯奸盗罪及为官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包围了江都，控制了江淮间广大地区，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三大军事集团之一。

隋的灭亡 在各路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王朝的政权已土崩瓦解，各地官僚贵族和豪强，乘机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纷纷打出反隋的旗帜，称王、称帝，建立割据政权。主要有：涿郡虎贲郎将罗艺，自称幽州总管；朔方（今陕西横山）鹰扬郎将梁师都，自称皇帝，突厥封他为“解事天子”；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尉刘武周称帝，突厥封他为“定杨可汗”；榆林的左翊卫郭子和，自称永乐王，南连梁师都，北依突厥；金城（今甘肃兰州）府尉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武威扬府司马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后又称帝；梁宗室后代罗川令肖铣在巴陵（今湖南岳阳）称梁王，

①《全唐文》卷744《窦建德碑》。

不久又称帝；沈法兴据吴兴，称梁王；李渊占据关中，在西京称帝，建国唐；王世充也在洛阳称帝。

到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3月，隋王朝势力只剩下江都和洛阳两座孤城，隋炀帝这个暴君，已经处在“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①的极端孤立境地。统领侍卫部队的司马德戡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宫廷政变，用巾带将隋炀帝勒死。隋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了。

农民起义的失败和历史作用 李密参加瓦岗军之后，对瓦岗军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他在取得瓦岗军领导权后，杀害了瓦岗军的开创者翟让，因而使人心散离，相互猜疑，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攻打东都虽给隋王朝造成很大威胁，支援了其他义军；但久攻不下，只满足于守住粮仓，而不能继续开创新局面。尤其是他接受了在洛阳隋残余势力皇泰帝的招降，公开背叛起义军，为皇泰帝攻打宇文化及，使瓦岗军损失相当严重，许多精兵良将相继战死。接着，龟缩在洛阳的王世充对瓦岗军突袭，李密战败，众叛亲离，遂入关中降唐，瓦岗军起义失败了。

河北起义军领导人窦建德是一位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在后期活动中日益暴露出来。他对于士人和隋降官不加区别，一律奉为上宾，参与机要。唐朝滑州刺史王轨为其家奴所杀，家奴携王轨首级投奔，窦建德却说：“奴杀主为大逆，我何可纳之”。②遂下令把这个来投奔的家奴斩首。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后，他痛哭不已，并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如何？”③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窦建德统兵在聊城（今山东聊城）消灭宇文化及，谒见隋炀帝的肖皇后，对她称臣，并把她送

---

①《隋书·炀帝纪》。

②③《旧唐书·窦建德传》。

往突厥去依靠女儿。他还派使到洛阳朝见皇泰帝，奉表称臣，受封为夏王。王世充废皇泰帝。窦建德才称帝表示自己是隋的继承者。他的这些行动，严重地背离了农民军的立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应王世充之邀，亲率大军迎战唐军，在武牢（虎牢，今河南汜水县）被唐军击败，被俘遇害。

杜伏威在隋炀帝被杀后，向皇泰帝称臣，接受了“皇泰帝”、“楚王”的封号。第二年，又投降了唐朝，受封吴王。之后，他打败了李子通与汪华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他亲到长安朝见唐高祖李渊。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辅公祏在江南起兵反唐，他受到猜忌，暴卒于长安。至此，农民起义都失败了。隋末农民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首先，这次起义摧毁了隋王朝的腐朽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士族门阀的势力，农民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使大批农民和残存的奴隶、部曲、佃客、杂户得以解放，有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其次，隋末农民起义给唐初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使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①使之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对人民过分榨取。唐初又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四、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唐朝的建立　李渊窃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唐朝。李渊祖先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李虎曾帮助宇文泰建立关中政权，被封为柱国大将军，赐鲜卑姓大野氏，死后封唐国公。父李昞袭爵，官至隋朝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李渊7岁

①《贞观政要》卷1《君道》。

时袭唐国公，先后做过刺史、郡守、中央卫尉少卿等，是隋文帝独孤后的姨侄。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为太原安抚大使，绞杀了毋端儿起义，第二年被任命为军事重镇太原留守，又镇压了甄翟儿起义。李渊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看到隋朝的主力军大部分已被农民起义军所消灭，隋王朝只控制江都与两京三座孤城，而隋炀帝又被困在江都，无力控制全国，隋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便采用了次子李世民起兵反隋的策略，秘密发展自己的势力，积极准备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李渊利用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王世充无暇西顾，关中空虚的机会，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亲率三万军队，从太原起兵，长子李建成为左路，次子李世民统右路，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为争取民心废除了炀帝的苛法，为取得官僚地主的支持，对于投奔他的三秦庶士，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都亲自接见，分别授予官职。十一月，占领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自领大丞相，进封唐王。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李渊废掉隋恭帝，自立为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统一全国 唐高祖在巩固关中统治之后，便与次子李世民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采取政治诱降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针。首先李世民率军平定了割据在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和马邑的刘武周，解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秋，李世民统大军出关进攻盘据在东都的王世充，李世民在武牢关大败前来援助王世充的窦建德，消灭了割据在鲁南的徐圆朗和割据在幽北的高开道。早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幽州总管罗艺归降了李渊。这样，河南、山东、河北地区，为唐所有。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军消灭了割据江陵的肖铣和割据江西的林士弘。同年，江淮起义军首领杜伏威降唐，后辅公祏起兵反唐，武

德七年（公元624年）被镇压下去，至此，江南之地尽为唐朝所有。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灭掉了依附于突厥割据朔方的梁师都，除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外，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唐朝的重新统一，建立了比隋朝更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重要名词：

大索貌阅　　输籍定样　　大运河　　隋文帝　　杨玄感　　韩擒虎　　太原起兵　　瓦岗军　　兴洛仓　　《开皇律》

思考题：

1. 简述隋文帝统一的原因及意义。
2. 简述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
3. 简述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第九章　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

（公元618年—907年）

第一节　唐朝前期的政治

一、唐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唐代前期的政治、军事、法律、科举等制度，基本上承袭了隋制并加以改进和发展，比隋制更加完备和周密，对后世影响较大，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种制度的基础。

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　唐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军国大事，任免重要官员和草拟诏敕等。其长官称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查中书起草的诏敕。其长官称侍中，副长官为门下侍郎。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国家政令。其长官称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因李世民曾任尚书令，在他即位后此官便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领其事。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有关各项事务。六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各部下又分设四司，共二十四司，各司的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

唐代三省六部制的特点是宰相名额的增多和政事堂的设立。

唐初，三省长官名位较高，都是宰相。唐太宗为了防止相权过重，往往指定品位较低的官员，加上“参知政事”或“参议朝政”等名义，作为实际上的宰相。唐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行宰相之职。政事堂是宰相的议政之所，一切军国大事都在这里讨论商定，最后由皇帝裁决颁行。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后移到中书省，唐玄宗以后，又改称中书门下。

唐朝实行三省制，并没有分散皇权。将宰相之权分而为三，又起用一些较低级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体现了集体的智慧，约束了个人的专横独断。三省互相牵制，职责分明。政令要经过不同部门的起草、审议和颁行，有利于集思广益，减少失误，同时防止和纠正君主的失误，从而保证皇帝个人的意志尽可能符合其所代表的地主级阶的利益，极大地提高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职能。

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台下辖台院、殿院、察院，主要负责监督和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吏违法行为，参预大狱的审讯。

另外，中央还设有五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九寺（光禄、太常、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等机构。

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置县令。边远地区设都督府，兼管军民行政。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时依据山川形势，划全国为十道，唐玄宗时改为十五道。道是监察机构，设巡察使（后改为按察使），皇帝经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对州县进行监督。以后道逐渐成为行政区划。

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里下设保，保下设邻；州、县城廓内设坊，廓外设村；乡、里、保、邻和坊、村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里正、坊正、村正主要负责检查户口、督催赋税、摊派徭役、防止人民起义和逃亡等事项。

府兵制　唐朝前期沿用了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府兵的中央机构是十二卫，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亦称兵府、军府）。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所领府兵叫作卫士。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1200人，中府5团1000人，下府4团800人。

府兵是从兵府所在地按照资财、体格、丁口三项标准选征的。原则上选取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及富裕农民。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平日务农，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府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轮流宿卫京师与戍边(称“番上”)。遇有战事，卫兵要应征作战，服役时，可免本身租调，但要自备兵器资粮，负担极为沉重，到后来有钱有势的人，就把兵役负担转嫁给贫苦农民。

唐代的府兵制造成了内重外轻的形势，加强了中央集权。全国所置折冲府最多时634个，而中央所在地关中一带就有261个，约占40%，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便于控制全国。同时它又可防止将帅拥兵跋扈和割据势力的形成。府兵平时散在各地，凡有战事，由中央统一征调，临时命将统兵。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和士兵只是一种暂时的结合，防止了将领专兵擅权的发生。另外，唐代府兵仍推行了隋朝“寓兵于农”的制度。

唐律与《唐律疏议》　唐律从唐高祖时开始制定，到唐太宗时完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布。以后，唐高宗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成“律疏”三十卷。“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共12篇502条。

唐律第一篇“名例律”是唐律的总称。它的主要内容是五刑、十恶和八议。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等。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

乱，重点打击危害封建统治和伦常关系的行为。犯十恶罪的人皆处以重刑，遇大赦一般不予赦免。八议有议亲、议政、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是关于封建官僚贵族违法犯罪时，减轻刑罚的规定，它充分说明了法典的特权性质。

唐律的主要内容是从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冒犯皇权，就要被加上“谋反”、“大逆”的罪名，不仅本人处斩，而且父子皆绞，母女妻妾没为官奴，其他近亲流放三千里。为了保障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唐律对于隐匿户口、谎报年龄、逃避赋役者，都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刑罚。唐律也体现了封建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了各阶级和各等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唐律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统治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

唐律还用法律保障均田制的实行，用法律控制各级办事人员推行政令并规定了行政办事的各种时限。这对促进生产发展和提高行政效率，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律继承和总结了秦以来的立法经验。把礼与法完整结合，内容周详完备，定刑宽严适中，司法机关职权范围清楚，办案人员职责明确，集前代法律之大成，同时又承前启后，是后期修律的蓝本和封建法典的楷模。它不仅是“中华法系”的代表，而且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封建法典，大半是摹仿唐律制订的。唐律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举制　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唐时进一步完备。唐朝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有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制举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一般人及官员均可应试，科目较多，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辞清丽、博学通艺等科，但不经常举行，在科举中不占重要地位。

常举应考的考生有两种来源，一是国子监（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州县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的人，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考中以后，再被举送来参加考试，称为“乡贡”。每年应试者达八、九百人，多者超过一千四、五百人。主持考试的机关，最初是尚书省的吏部，后来改为礼部。

考试科目，最常设的有进士、明经两科，以进士科最受人重视。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墨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全靠背诵，作诗须有真才实学。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明经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但进士及第后仕途优越，易于飞黄腾达。所以，进士科竞争激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考中进士以后，还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做官，叫作“释褐试”。这和宋以后中进士就能做官的制度不同。

科举制度在本质上是笼络知识分子、禁锢思想的手段，是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一些热衷功名的士大夫埋头读书，钻研诗赋儒经，很难产生反抗封建统治的异端思想。正如唐人诗中所说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但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科举制优越于“九品中正制”，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入仕的门径，有利于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同时，通过科举确实也选拔了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从而提高了封建官僚队伍的素质。其次，科举制度的推行，对唐代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 在唐王朝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之后，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政治危机。这次政治危机的出现，是

由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引起的。李渊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李世民在策划、经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李世民不仅握有军政实权，而且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属下谋臣猛将也很多，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等著名的一时俊杰，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非常骁勇之士，形成很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按封建嫡长制，李建成却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者。这对功勋卓著、野心很大的李世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李建成在建唐和统一战争中有一定功绩，以后又长期留居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出谋划策，颇具才干。他也很注意收罗人才，魏征、王珪等一批智谋之士和薛万彻、冯翊、冯立等勇猛善战的将领均为他的属下。为了巩固太子地位，他便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结成宫（东宫）、府（齐王府）集团，力图削弱李世民的秦王府势力。于是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夜，李世民经过同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密议，在原为太子心腹，后为秦王暗中收买的中郎将常何的配合下，伏兵千余人于玄武门内外。六月四日清晨，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毫无戒备地路经玄武门时，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杀李元吉。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带甲进宫，要挟李渊发布“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史称“玄武门之变”。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次年正月，李世民正式即位，改元“贞观”，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注意从隋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他勤于政事，用人唯贤，虚心纳谏，轻徭薄赋，严明执法。在他统治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我国封建统治比较清明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尖锐。东、西突厥和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军事势力威胁着唐朝；国内人口流亡，土地荒芜，全国在册户数不到300万，不及隋朝时的1/3；局部地区小规模农民起义仍未停息，唐王朝的统治并不稳定。

为了解决唐王朝面临的各种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统治措施：

第一，在政治上，大力精减机构，裁汰冗官；重视选贤任能，提倡谏诤之风；适当宽简刑法。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①量才授职，务省人员。唐初，高祖为了安抚一些降唐的地方割据者，曾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形成"民少吏多"之弊。唐太宗即位后，坚决予以并省。另外，又并省中央机构，只"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②在并省机构、减少冗员的同时，唐太宗还对三省和州县官员提出严格的要求，要他们"徇公忘私"，③各尽其责。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力地发挥了唐王朝统治机构的作用，使唐朝的统治机构比隋朝更加有效。唐太宗还认为，隋炀帝嫉贤妒能，拒谏饰非，杀戮直臣。因此他特别重视选举贤才和鼓励臣下"直言极谏"。魏征曾跟从李密、窦建德，以后又是李建成的谋臣，唐太宗不仅重用了他，升他为宰相，而且多次听取了他的直言劝谏。魏征死了，唐太宗伤心地说从此他失去了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公元630年，唐太宗派人修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以隋炀帝修洛阳宫殿劳民伤财的教训劝谏，他不但下令停工，还赏赐了张玄素。由于唐太宗真心纳谏，贞观朝廷谏诤成风，以至宫中嫔妃也敢直言谏诤。唐太宗还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赏了有功的人，无功的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作恶的便能悬崖勒马。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其刑罚比《隋律》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192。

减轻了一些。死刑去掉了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它变重为轻者也有不少。对于死刑判定也特别慎重，规定京城五复奏，诸州三复奏，以杜滥杀。他与臣下讨论如何防止人民起义时，有人提出用重法严禁，他却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是因为赋役繁重和官吏贪求使人民饥寒切身造成的，如果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余，老百姓自然就不会为“盗”了。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唐太宗所采用的“举贤”、“纳谏”、宽减刑罚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在经济上，重视农业和商品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注意减轻对人民的赋役负担。唐太宗认为，要“安人宁国”，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农业与解决衣食问题上，“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公元631年，皇太子要行“冠礼”，主管官准备用军队作仪仗在2月举行。唐太宗认为有违农时，影响春耕生产，坚持把“冠礼”改在10月举行。贞观元年，山东诸州大旱，同年关中也有男女自卖者，唐太宗不仅派人进行“赈恤”或“慰抚”，还先后令免山东诸州租赋1年，关中租赋2年。贞观二年，唐太宗采纳臣下建议，于各州县遍设义仓，以储粮备荒。另外，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均田制的实行，曾亲自到灵口（今临潼东）检查过均田制推行的情况。这些措施，对保障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唐太宗在注重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对商业贸易也给予了一定注意。他认为商业贸易也是人民的常业，不应妨害。公元626年8月他即下令开放了高祖时实行的关禁政策，使关东、关西商业来往畅通无阻，从而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也注意适当减轻对人民的赋役负担。他认为如果君主不能抑制奢侈的欲望，无限制加重对人民的赋役剥削，就必然要造成隋末那种“民愁”、“国危”、“君丧”的下场。因此贞观时期唐太宗基本上实行了一条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政策，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缓和了阶级矛盾，成为贞观

时期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也为唐朝后来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文化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李世民在作秦王时，即喜欢与士大夫交朋友，秦王府有著名的“十八学士”。他即位之后，又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儒、释、道并用，而以兴儒学为中心的政策。唐太宗精选天下文士为弘文馆学士，招聘天下名儒为国子监各学的学官。又令孔颖等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试用教材。他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重视学校教育。在他的支持下，增建学舍1200间，并积极接收外国留学生，使长安成为国内文化教育中心和国际文化传播基地。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但他十分重视读书，是一位文武兼备、多才多艺的君主。他还特别注意培养书法人才，唐代科举取士有“明书”一科，这与唐太宗的重视书法艺术有关。唐代皇帝的文化修养普遍较高，大都重视发展文化，一定程度上受了唐太宗的影响。

另外，在民族关系上，唐太宗推行较少歧视少数民族的开明政策；对外关系上则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由于唐太宗君臣同心求治，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开始，社会经济迅速好转，人民流散者渐回乡里，农业连年丰收，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行人出门不必自带粮食，可以取给于路，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①的景象。与此同时，西北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原的军事威胁也得到了缓解。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

①《贞观政要》卷1。

贞观初年，他充满朝气，表现了一位年轻君主的活力。到贞观后期则志骄意满，渐恶直言，走上了一个封建帝王难以摆脱的淫奢道路。他不仅大征徭役，到处兴建离宫别墅，而且和许多封建帝王一样，也幻想长生不老。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五月，终因食金丹中毒而死，时年52岁。

尽管如此，唐太宗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他统治的20多年中，不忘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多少能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力量，注意到掌握剥削人民的限度，适当调整统治政策，并力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唐王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固然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卓越创造的结果，但无疑也是与唐太宗君臣的赫赫功业分不开的。

三、武则天的统治

永徽之治 唐太宗死后，太子李治即位，改元永徽，是为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唐王朝保持着强盛局面，史称“永徽之治”。由于高宗多病，在其后期，皇后武则天逐步参与朝政。

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其父原为木材商人，太原起兵后，随李渊进入长安，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则天聪明机智，“兼涉文史”，姿色出众，颇有报负，14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中，立为“才人”，赐号“武媚”。太宗死后，26岁的武则天入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高宗继位后，又把她接回宫中，封为“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在徐世勣、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开始参与朝政，“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① 武则天生有四子二女，长子李弘早死，次子李贤被害

①《旧唐书·高宗纪》。

死，三子李显立为中宗，四子李旦立为睿宗；一女因陷害王皇后被掐死，一女是太平公主。永淳二年（公元683年)高宗死，武则天先后废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天授元年（公元690年)67岁的武则天自立为帝，称则天大圣皇帝，改国号为“周”，以洛阳为神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位15年。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82岁的武则天身患重病，宰相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政变，拥兵入宫，杀死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迎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朝国号。武则天在这年11月病死于洛阳上阳宫。

武则天登上帝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高宗李治秉性懦弱及身体多病，与唐朝统治集团中官员之间及后妃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与武则天的个人素质和杰出的政治才能等，都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掌权的实例，唐代比较开放的社会风尚，当时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为唐太宗“才人”时在宫中所受的影响和锻炼等，则为她称帝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武则天的政绩　武则天在当政、称帝期间，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唐朝仍在向前发展。她的主要政绩有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发展科举制度，广泛搜罗人才。武则天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使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了广泛参政的机会。在整个贞观时期的23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期增加一倍以上。同时，武则天还创立了“殿试”，开创了“武举”。武则天鼓励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并且允许自荐，只要有才能，都给官做。她善于选拔人才，同时又严密控制，发现不称职者革免或杀掉。在她的统治时期，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期少。她前后任用的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

等，都是当时难得的人才。

第二，武则天还多少保持了唐高宗的政治风度。在武周政权巩固以后，有人劝她罢告密、宽刑罚，得到她的赏识与采纳。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河北武安县人苏安恒上疏，批评武则天贪位不让，无颜见唐家宗庙和高宗陵墓，要她退位，她都不怪罪。甚至有的大臣当面揭露她的隐私，她也能容忍和嘉奖。武则天能适当接受不同意见和建议，就不致使她一意孤行，有利于统治的稳定。

第三，武则天很重视农业生产，她执政期间，均田制还在继续实施。她经常发布诏令，劝课农桑。规定各州县如果耕地增加，家有余粮，官吏就要受奖。反之，为政苛滥，户口减少，便要受罚，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户口显著增加。如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380万户，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已增加至615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

第四，巩固了唐帝国的边防，国力强盛。武则天统治时期，一度与吐蕃、突厥、契丹等少数族的关系比较紧张。武则天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兵源，同时又大兴屯田，解决粮源问题。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命大将王孝杰进击吐蕃，大获全胜，恢复和重建了"安西四镇"。巩固了唐帝国的西都边防，确立了唐朝对天山南北的统治，重新打通了通向中亚西亚的商路。武则天较好地处理了唐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她统治期间，唐朝东西两端的版图都超出了唐太宗时期。

第五，重视文化建设，促进学术文化发展。

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文化的重视；又征召大批文人为"北门学士"，作为决策顾问；对佛、儒、道三家的思想，兼收博采，三家思想在斗争中有融合的趋势。所以，当时的思想界是比较活跃的，文化界创作是旺盛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专著——刘知几的《史通》、第一部國

家药典《新修本草》、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文馆词林》等出现在这个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另外，唐代的散文、诗、小说都在这个时期逐步成熟，产生了一批名家。武则天14岁时，即“兼涉文史”，后来，她精通诗歌、书法和音乐，可谓多才多艺。她不但亲撰《臣轨》一书，而且还有《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惜已经失传了。她还大胆创造了数十个字。武则天进一步促进了唐代文化走向繁荣，初步改变了曹魏、北朝以来的尚武风气，对中唐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

武则天的统治也有消极的一面。她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任用酷吏，消灭异己，滥捕冤杀，其中也包括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劳动人民。她大批录用官员，造成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她生活奢侈，大肆崇佛，广造佛寺，大修宫殿，造明堂，建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她放纵武氏亲族集团，侄儿梁王武三思把持朝政，与张易之、张昌宗等勾结，把朝政搞得混乱不堪。中小地主地位上升后，同士族门阀地主一起加紧掠夺农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口大量逃亡，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武则天统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些社会问题正在消失，后期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正在萌发。

总之，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封建女皇，也是世界中世纪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唐代前期开放型的社会创造了她，她又推动了唐朝社会的向上发展。她从公元655年做皇后时开始参决政事，直到公元705年退位时为止，前后参政和当政达50年之久。在她当政时期，贞观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唐王朝仍保持着强盛的局面，保持着贞观时期辽阔的疆域，对于后来玄宗“开元盛世”全盛时代的出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和封建社会许多杰出的统治者相比，武则天的消极面是十分突出的。

应对她进行全面评价。

四、唐玄宗与“开元盛世”

宫廷事变 武则天死后，唐朝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短短8年之中，发生了7次宫廷事变。唐中宗即位后庸懦无能，大权落入皇后韦氏手中。韦皇后为了临朝称制，便和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她的野心暴露后，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起兵杀死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等，拥睿宗复位。但睿宗却昏庸无能，太极元年（公元712年）让位于李隆基，是为玄宗(或称唐明皇)。当时太平公主不可一世，阴谋夺权。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先发制人，铲除了太平公主一党，才结束了纷乱动荡的政局。

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唐朝进入极盛时期；后期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5年），唐朝由强盛转入衰落时期。

开元盛世 开元初，唐王朝面临着重重困难，长期的政局动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边防危机，唐中宗以来的弊政，积重难返，百废待兴。28岁的唐玄宗，正视现实，励精图治，大胆进行改革。

选贤任能，虚心纳谏。为了进行改革，玄宗首先起用进行革新的人才。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他相继擢用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姚崇、宋璟为宰相。姚崇吏事明敏，多谋善断，处决政务迅速，深得玄宗信任，在执政期间，朝政为之一新。宋璟为人刚直，对玄宗敢于犯颜直谏，对下能刑赏无私，他们“协心辅佐”，对开元之前的弊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终于开创了开元初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①的新局面。开元年间的其他宰相，如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

①《资治通鉴》卷211。

韩休、张九龄尚直。这些人均能尽力辅政，直言进谏。唐玄宗在开元前期也颇能纳谏，基本上能虚心听取并采纳大臣们的意见。

整顿机构，裁减冗官。自武则天、中宗、韦后以来，官员冗滥现象十分严重，使国家财政开支大量增加。玄宗裁减冗官，“大革奸滥，十去其九”。并下令停废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精简了庞杂的官僚机构，提高了行政效率。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房、礼房于政事堂之后，以加强宰相办事机关的效能；增置翰林学士，参预机要，草拟诏敕，加强政权中枢机构的统治权力。在整顿中央机构的同时，玄宗很重视地方官人选，经常召见地方官员，每年对地方官政绩进行考核。

开元年间，任人唯贤，赏罚分明，吏治清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唐玄宗为挽救人口逃亡及国用不足的危机，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实行括户、括田政策，以巩固自耕农的经济；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组织兵民，扩充屯田；督促地方官吏注意农业生产；抑制食封贵族分割国家租调；抑制兼并，打击豪强大族；实行赈灾免赋；漕运江淮物资，以富关中；打击佛教，扩大封建国家的税源。唐玄宗采取的这些经济政策，使开元时期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

重视教育，繁荣文化。为了学术文化的繁荣，玄宗首先重视发展教育。当时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学、律学、医学、书学、算学。唐玄宗创建的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书院）是官办书院的创始。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有乡学，甚至还有里学。据统计，开元、天宝时期国子监所属学校各科生徒及州县学生共6万余人，文教科技人员3 700余人。学校教育空前发达，是出现开元盛世的原因之一。其次，玄宗指定专人，在丽正书院搜集整理图书，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一月，图书整理

工作完成，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48164卷。这是开元时期唐代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成就。再次，玄宗重用提拔文学之士。开元年间为相的张说、张九龄等人，在当时文坛颇享盛名。特别是张说为开元时期的文坛领袖。在他执政时期，唐玄宗"崇儒重道"的思想得到较好的贯彻，文化事业得到极大发展。玄宗还注意征召和培养各种人才，天文学家张遂和大诗人李白都曾得到玄宗的征召。唐玄宗也多才多艺，不但是政治家，同时也是音乐家和戏剧家，又精通诗歌和书法艺术。这一切都使盛唐文化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

总之，李隆基即位后，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使唐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农业生产发达，公私粮仓充溢，米价低廉稳定，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交通发达，中外交往频繁，社会安定，天下殷富，唐代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段唐朝高度发展的黄金岁月，史称"开元盛世"。大诗人杜甫曾在《忆昔》诗中，形象地反映了开元盛世的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尽管诗中不免有所夸张，但所反映的基本情况还是可信的。"开元盛世"的出现，固然与唐玄宗实行的政策有关。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繁荣景象是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唐初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并不是唐玄宗君臣一时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没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女皇武则天的政绩，也不可能有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第二节　唐朝社会经济的繁荣

唐朝经济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基地空前扩大；其二，西晋南北朝以来江南地区的逐步开发以及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为唐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势力，生产关系得到部分调整；其四，唐朝前期政治清明，社会秩序安定，使各民族有了更广泛的交往和融合，从而为社会经济长时期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五，唐代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使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生产积极性也相应提高；其六，唐朝前期统治阶级注意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特别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自耕农增多；其七，唐朝继承了前代的生产经验和经济成果，劳动人民大力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提高耕作技术。这些都是形成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

均田制　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争破坏，人口死亡流散，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要稳定政权，保证赋税收入，就必须控制劳动人手，继续实行均田制。而唐初存在着大量荒田，人少地多，就为均田制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户籍是封建国家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依据。唐朝规定：民始生为黄，8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玄宗时又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成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

唐代均田制从武德年间起到开元末年止，曾颁行三次诏令。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1．一般人受田的规定：丁男、中男各给田100亩，其中20亩

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老男及残废者，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给口分田30亩，若为户主者加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和尚、道士各给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20亩。工商业者给田为丁男之半，若在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则不给。凡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死后交还官府。

2. 官僚贵族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和五品以上的官员授永业田5至100顷。各级官吏和官府，授以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吏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为官署的办公费用。

3. 土地买卖的规定：百姓的永业田，在人死家贫无力埋葬时可以出卖；由狭乡迁往宽乡，准许出卖口分田，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也可出卖。凡买田者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田的限额。

唐代均田制的特点：其一，取消了奴婢受田，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后，大量奴婢、部曲获得解放，同时也限制了地主广占田地。其二，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主要是为了解除妇女的赋役，是进步现象。其三，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都可受田，等于承认了寺观和商贾兼并土地的事实，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其四，官僚贵族受田的规定较前完备，特别是各级官吏永业田的增多，说明大土地所有制仍在不断发展。其五，唐朝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为土地兼并打开了方便之门。

唐代均田制的实质及意义：唐代均田，并不触动地主的私有土地。所谓"授田"，不过是在荒地较多的情况下，由政府限以数额，允许地主及农民占荒，这便是"授田"。另外，封建国家对地主、农民原有的土地加以承认，也算是国家"授田"了。在均田制下，地主实际占田往往超过限额，而农民多半达不到定额，普遍受田不足。尽管如此，均田制的实施，垦辟了不少荒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有利于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均田制使

农民获得部分土地，唐王朝的剥削对象不断增加，国家逐步繁荣富强起来。

租庸调制 唐朝前期，广大农民的主要负担是租庸调。租庸调制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唐朝妇女不授田，因而租庸调改为按丁征收。唐初规定：每个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叫作“租”。每年交纳绢 2 丈，绵 2 两，或交纳布 2 丈 5 尺，麻 3 斤，叫作“调”。此外，每丁每年要服徭役20天，如果不服役每天折纳绢 3 尺或布 3 尺 7 寸半，叫作“庸”，所以也叫“输庸代役”。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超过30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设最多不得超过30天。

唐代租调较之隋代为轻，并把隋以庸代役的办法进一步制度化，同时又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这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租庸调制的推行，对唐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农具的改进 唐代耕地的主要工具犁有了很大进步，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曲辕犁。这种犁的结构已相当完备，共由11个部件组成。操纵灵活轻便，耕地深浅可自由控制，用一牛即可牵引，提高了工作效率。灌溉工具也有进步，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外，还创造了水车和筒车等新工具。水车出现在北方，系“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①筒车出现在长江流域，形似纺车，四周缚有竹筒，利用水力旋转，能昼夜不停地汲水灌田，并能把低处的水引至高处，是唐朝灌溉工具的一大进步。

水利兴修 唐初统治者重视水利建设，中央设有水部郎中，管理全国灌溉及航运事务。又有都水监和都水使等，管理河渠的修

---

①《太平广记》卷25.

理及具体灌溉事宜。唐朝的《水部式》，就是有关水利等事的法规。整个唐代修水工程264项，其中前期130年内就修了160多项，占总数的60%。这些水利工程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以关中地区最多。在北方多是开渠引水灌溉，在南方则多是排水和蓄水等工程，东南地区则是堤、堰、陂、塘等工程。有的灌溉面积数百顷，有的灌田数千顷，甚至上万顷。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农业丰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人口和耕地的增加 由于社会长期安定，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迅速增长。武德初年全国总户数仅200余万，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户数增至890余万，人口总数达5290余万，比唐初增加了数倍。这是唐代户口统计的最高数字，当时实际户数远远超过此数。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① 据今人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②

府库充实 唐代社会生产力提高，到开元时连年丰收，百姓殷富，公私粮仓充实。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国家仓库的存粮有9600万余石。1971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唐代洛阳的含嘉仓，探明仓城的总面积约为43万平方米，发现有291个仓窖，每窖储粮多者万石，少者数千石，并在一个粮窖内发现了许多炭化的谷子。政府仓库储粮如此之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的确有很大发展。

三、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占重要地位，中央政府设立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来经营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官奴婢和刑徒、官户(每年服役3个月)、

①元吉：《元次山集》卷7．

②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第67页．

杂户（每年服役两个半月）、短番匠（每年服役20天）。其次是少数的“和雇匠”。①官奴婢和刑徒被发配服役，没有任何劳动报酬。官府手工业作坊虽然条件优越，但强制性的生产关系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提高。

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来源，除了政府直接掌握的自然资源外，也有向地方州县征调的土特产品。官营作坊技术精良，分工细密，主要生产供给皇室官府及贵族官僚使用的军器、铜钱、丝织品、瓷器、金银器、纸张、酒糖等产品，基本与市场没有联系，排挤和压抑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私营手工业包括民营和个体农户的家庭手工业两种。作坊主有的是独立生产者，称“师”（即师傅）或“长老”，带领工匠学徒或家属劳动。产品除官府征收外，主要在市场上出售。家庭手工业分散在广大的农村里，其产品除了自用和纳税外，也到市场出售。

唐代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是织染业、冶铸业、瓷器业等，粮食加工业已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

织染业 唐代纺织有毛纺、丝纺和麻纺。有绫、绢、布、帛、罗、絁、锦、纱、绮、绸、褐等几十种产品。1987年5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唐代丝织品，其数量之巨，品种之繁多，堪称唐代皇家的一座地下丝织品宝库，其中就有女皇武则天赠送的金丝绣裙。这批丝绸织物，就其质地和织造技术说，超过建国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所有唐代丝织品。数量众多的织金锦则属首次发现，锦上的捻金丝最细的直径仅0.1毫米。这种捻金丝是以丝线作芯，用比头发还细的金丝一圈圈缠绕而成，加工技术高超卓绝，前所未有。这些织物刺绣品的加工技术多种多样，有蹙金绣、蹙银绣、贴银绣、贴金

①和雇匠：指政府出资招雇的匠人。它分为两种：一种是明资匠，大概是短期雇工；另一种是长上匠，属长期雇工。

加绣等。印染技术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绘花、木版人物画等。这一批几乎涉及唐代全部纺织物品的发现，可以看出唐代织染技术高超的艺术水平。

冶铸业 唐代冶炼技术有新的成就，全国有168个铜、铁、锡冶炼所。金银器物以锤击与浇铸制为主，运用切削、刻凿、焊接等技术。在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珍贵文物中，蔚为大观的金银器皿，不仅数量多，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金银器中等级、规格最高的。这批金银器群共121件(套)，其中以法器迎真身金银花十二环锡杖最为重要。此杖通体涂金刻花，杖首用金丝盘曲成两个垂直相交的桃形外轮，轮顶的抑莲流云束腰座承托智慧珠；杖身中空，錾刻十二体身披袈裟，手持法铃，立于莲台之上的缘觉僧。器形制作之宏伟，花纹錾刻之精巧，反映出唐代金银做工的最高水平。这批金银器，从各方面显示了唐代高超的冶铸技术成就。

瓷器业 我国制瓷业至唐代时技术更加成熟。在瓷器生产中，需用摄氏1300度以上的温度烧制而成，对控制火候，调配釉料，掌握化学技术，都需有较高的水平。当时最著名的瓷器，在北方邢州的邢窑所产白瓷如银似雪，南方越州的越窑产的青瓷如玉似冰，江西昌南镇（宋时改为景德镇）产的白瓷有假玉器之称。还有一种秘色瓷，过去只见于史籍，是专供朝廷的贡品，其釉药配方和烧制工艺秘不示人，故称“秘瓷”。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16件秘色瓷，以绿、青色为主，制作工艺先进，堪称瓷中精品，揭示了所谓秘色瓷之秘密。著名的唐三彩则标志着制瓷技术的高度发展。它用黄、绿、青三色釉涂于陶坯上烧制而成。有马、骆驼、人俑等，造形生动，色泽艳丽，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

此外，唐代的造船、造纸、矿冶等手工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四、城市、商业、交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商业的兴旺，交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唐代全国出现了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我国封建社会强盛时期的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布局规整、繁华兴盛的大都市。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西安旧城的10倍，大于现在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恢宏，由宫城、皇城、外廓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廓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有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纵横交错，把全城划分为2市109坊。①所有大街宽畅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行政管理，由京兆府下辖万年、长安两县，共治城中。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把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街东归万年县，街西属长安县。东、西两市是专门的商业区，各占两坊之地。两市各有220个行业，是全城经济的中心，店肆繁多，商业兴盛，中外商贾云集。不但民间交易，就连皇宫也仰给两市。长安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有100多万人。为满足众多的城市人口的需求，长安的粮食加工业已作为独立的手工业赫然出现。长安周围的磨坊（当时称碾硙业）很多，主要是水力磨坊，还有部分畜力磨坊和人力磨坊，基本上满足了百万人口的需要。当时旅居长安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数量相当可观。尤其是来自西域的波斯、大食商人最多，“胡风”、“胡俗”很盛。“胡化”成为长安社会的时髦风气。这充分证明唐代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城市，是各国人民互相学习和友好交往的中心。

东部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扬

①隋唐长安城坊里之数前后不同：隋初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为108坊；龙朔二年至开元二年（714年）为110坊；开元二年后为109坊。

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繁华异常，是东南的最大都会。成都是西南大都市，盛产锦缎、纸张、茶叶等。南方最大的贸易都会广州更是十分繁华。

唐朝商业发达的另一表现是统一了货币，扩大了货币流通范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除了隋朝五铢钱，使用新铸的“开元通宝”，通行于全国各地。但有些地区，仍然使用绢帛或白银作为交换的媒介。

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很多城市都设邸店，专门从事接待客商、存货、交易等事务，为商人服务。为了适应大宗贸易和远方贸易的需要，出现了原始的汇票“飞钱”或称“便换”，就是商人在京城存入钱币，可到地方官府去支取。又出现了信用机构“柜坊”。“柜坊”是存款、借款之处，具有后世钱庄的性质，是古代银行的雏型。

随着商业的繁荣，富商大贾十分活跃，出现了家资巨万的大商人。如巨商王元宝，唐玄宗问他有多少家资，他说家中所有的绢，要比南山的树还要多。这些声势赫赫的大商人，不仅结交官僚权贵，出入官府，有的甚至参加宫廷宴会，社会上把经商视为人们的重要职业。传统的轻商、抑商观念在唐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地位也有所提高。

唐代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草市和墟市，进行定期贸易，其中一部分草市逐渐发展成为小城市。

不过，唐朝前期，封建政府限制商业自由发展，市场交易必须在正午以后进行，禁止夜市，商店只能开设在固定的市内。到了后期，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坊市制度，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夜市，政府已无力禁止。

商业、城市的繁荣，又进一步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非常重视交通。当时陆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有宽广的驿道，东可以到河南东部和山东半岛；西到

四川；西北可达甘肃，以通西域；北可达山西、河北，乃至辽东；南可至两湖和两广。驿道上每30里设一驿，驿有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沿路都有店肆，接待商旅，交通非常便利。

水路有大运河纵贯南北，内河航运四通八达。

唐代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东与新罗、日本有繁盛贸易；西与中亚、西亚诸国通商；南与印度洋诸国都有商业往来。中外通商路线，陆路方面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水路由广州、明州、扬州、登州出发，进行交流。唐朝在广州设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可见当时对外贸易十分兴盛。

第三节　唐朝民族关系的发展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当时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靺鞨及西域各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民间的迁移频繁，各民族间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也加速了。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建立了一些都护府和都督府，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使唐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一、唐与东、西突厥的和战

突厥族是匈奴的别支，在五、六世纪时，游牧于金山（阿尔泰山）南麓。因金山形似兜鍪，突厥人称兜鍪为突厥，该族即以此得名，姓阿史那氏。六世纪中叶，突厥强大起来，发展成为一个管辖南自大漠以北，北至今贝加尔湖，东自今辽河上游，西至今里海的强大汗国，并创立了突厥文字。

东突厥　隋朝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唐朝建立之初，国力虚弱，东突厥连年骚扰边境，甚至进逼长安。唐高祖曾准备将都

城南迁，以避其锋，幸赖李世民劝谏而止。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秋天，唐太宗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直逼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岸，距长安近在咫尺。唐太宗亲至渭桥，隔渭水痛斥颉利可汗的背信弃义。颉利见唐军刀枪耀眼，军容齐整，胆怯而退。东突厥连年侵扰，使北方人民深受其害。唐太宗决心要打败东突厥。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绩、柴绍、李道宗等，统率十余万大军，由李靖统一指挥，分道进击东突厥。第二年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太宗将10余万突厥人民，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设立四个都督府来管理。任命突利等突厥贵族为都督，统其部众。100多名突厥贵族被封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和汉官同列朝中，待遇完全一样。在唐太宗这一开明政策下，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近万家。从而提高了唐朝的威望，各族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进一步加强了唐与边境各族的联系。

西突厥 西突厥以新疆西部的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控制着东自阿尔泰山，西到里海，西南到兴都库什山的许多西域国家，势力强盛，有数十万骑兵，丝绸之路被阻绝不通。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进击占据青海的吐谷浑（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举国降唐。唐朝控制了河西走廊的通道。由于西突厥内部分裂，力量削弱，西域各小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统治，归附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各部，自称沙钵罗可汗。西突厥又强盛起来，同唐朝打了几年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阿史那贺鲁被唐大将苏定方战败擒获。西突厥灭亡。

突厥族是隋唐时期创造北方草原历史文化的主要兄弟民族。唐朝和突厥虽然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从未间断。唐朝初年突厥人用马、牛、羊等畜产品，和汉人交换丝织

品，有助于解决唐初牲畜不足的困难。武则天时，赐给突厥农作物种子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铁器4万斤，促进了突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古代北方各族中，突厥是第一个创造了自己文字的民族。突厥的文化与汉族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的设置

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域和突厥故地的管理，曾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灭高昌后，以其地为西州，并于交河城（新疆雅尔和卓）设立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至龟兹，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的设置，起着维护西域统一的作用。西突厥灭亡后，唐出于控制中亚地区的需要，在中亚碎叶川（中亚楚河）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蒙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位于碎叶川南岸的碎叶城，地处中亚交通要冲，商业发达。唐朝以碎叶代替焉耆，划入安西四镇，即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作为经略中亚的基地。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在庭州（新疆吉木萨尔）置北庭都护府。碎叶镇和昆陵、蒙池二都护府从安西都护府分出，改属北庭都护府。

这样，唐朝在西域最高统治机构是两个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下设16个都督府，管辖天山以南直至帕米尔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北庭都护府下统两个州和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23个都督府，管辖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使唐朝在西域地区有效地行使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都护府的各级官吏都由唐政府任命，对于巩固西部边防，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促进西域的社会发展和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唐与回纥的经济文化联系

回纥是古代丁零人的后裔，喜乘高轮车，所以南北朝时称高车，又叫铁勒或敕勒。铁勒分布很广，回纥是其中的一个部落，活动在贝加尔湖以南的广大地区。"回纥"是团结、联合、协助的意思，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自请改汉字译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所以又称回鹘。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吐迷度正式建立回纥汗国，自号可汗，促进了回纥社会的进步。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他攻灭突厥汗国，建立起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控大漠的大汗国，成为唐朝北方最大的奴隶制国家。

唐与回纥关系密切，新立的可汗都要经过唐政府的册封。安史之乱发生后，应唐的请求，回纥曾两度出兵参与平叛。唐为了笼络回纥贵族，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这种政治关系，促进了两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回纥经常用马匹交换唐的丝织品和茶叶，每年都用几万匹马，从唐换回几十万匹丝织品。唐朝中期以后国力衰落，吐蕃占据了河西、西域。唐与西方经济交往只通过回纥。回纥一时成为东西方往来的必经之路，在唐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促进了回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九世纪中期，回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变乱，同时又出现了瘟疫和少有的大雪，人畜死亡极多，日益衰落。就在这时，居住在西北边疆的黠戛斯人（今吉尔吉斯人），因受回纥统治者的压迫，出兵10万灭掉了回纥汗国。除少数回纥人依附黠戛斯外，大部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和西州、轮台（今新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市）等地，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从元朝起改称"畏兀儿"，发展成为今天的维吾尔人。回纥人在唐朝时信奉摩尼教，西迁后改信佛教，最后才改信伊斯兰教。

四、靺鞨族与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的建立

靺鞨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先秦时称肃慎，西汉时称邑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长期以来居住在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靺鞨族最初分为数十部落，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二部实力最为强大。粟末靺鞨居南，在今松花江上游至长白山一带；黑水靺鞨居北，在今黑龙江中下游至东海滨一带。粟末靺鞨即以所居粟末水（松花江）而得名。黑水靺鞨即以所居黑水（今黑龙江）而得名。

黑水靺鞨以狩猎和农业为主，武德时期唐在其地设燕州，任命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首领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勃利即伯力（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在黑水靺鞨设黑水军，第二年置黑水都督府，作为管辖黑龙江流域的机构，任其首领李献诚为都督，晋封云麾将军，并领黑水经略史，任诸部酋长为各州刺史。唐中央派长史监领其地。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

粟末靺鞨势力最强。由于接近中原地区，所以其文化发展水平比其它靺鞨部高。圣历元年（公元698年），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叫作振国（或震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在其地设置忽汗州都督府，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名。渤海国的疆域，北至黑龙江，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东至苏联滨海地区，西至吉林西部，有5京15府62州。以上京龙泉府（黑龙江龙安县境）为都城。

渤海国与唐关系密切，政治文化都受唐的影响。官制大体上摹仿唐朝。经常派人到唐朝学习，贵族中不少人娴习儒家经典，汉文学的造诣很深。《汉书》、《三国志》等书传入渤海。渤海

经常以貂皮、海东青（鹰）、麝香、人参等土特产与唐交换锦、绢、金银器和手工艺品。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积极的作用。公元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黑水靺鞨也成了契丹的附庸。

五、唐与吐蕃关系的发展

吐蕃族是藏族的祖先，很早以来就劳动、生息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系由我国古代的羌族迁移到青藏高原后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六世纪后半期，在今西藏南部的穷结、泽当一带，已经出现了吐蕃政权，首领叫作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此后成为吐蕃君王的尊称。七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或称弃宗弄赞）即赞普位，吐蕃更加强大，统一周边各部，定都逻些城（拉萨），南降泥婆罗，西臣西域诸国，势力不断向外扩大，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

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文化，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出第一批使臣访问长安，唐朝使臣也很快到吐蕃回访。这是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此后，松赞干布几次遣使到长安求婚，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又命大相（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和珍宝来求婚。唐太宗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第二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松赞干布按照唐朝的建筑，特地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城廓和宫室。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锦帛珠玉和农作物种籽以及手工业用品，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地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松赞干布进行改革，制定法典，创立文字，采用历法，提倡佛教，不断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把纺织、刺绣技术，传授给吐蕃妇女。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发展藏族的经

济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唐高宗授给松赞干布附马都尉的官职，又封他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和唐朝长久密切往来的甥舅亲谊的基础，确立了吐蕃对唐朝的臣属关系。此后，吐蕃新赞普即位，都要经过唐朝政府的册封才算合法。

唐高宗以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日益发展。中宗时曾以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尺带珠丹。金城公主入藏，带去绫罗绸缎数千匹和大批手工业产品、各种工匠、龟兹乐等，唐初三大乐舞之一《秦王破阵乐》传到吐蕃，汉文典籍如《毛诗》、《左传》、《礼记》等也在此时传入吐蕃。吐蕃的土特产如马、金器、玛瑙杯等传入唐朝。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有较大发展。因此，尺带珠丹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如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①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防空虚，吐蕃乘隙进扰，曾一度攻占长安。但唐德宗时，大食国在西亚的势力日益强盛，吐蕃兵大半西御大食，和唐朝的冲突减少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与吐蕃会盟，盟文写道："患难相恤，暴掠不作"。双方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完好地树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这是汉藏两族团结友谊的历史见证。虽然，唐和吐蕃统治者之间也进行过多次战争，但那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而两个兄弟民族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友好相处。

六、唐与南诏的关系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主要是白蛮和乌蛮。白蛮居住在滇池和洱海中间一带，受汉族影响较深，经济文化比较先进，是现在白族的祖先。乌蛮居住在云南东部、贵州西北部，很少同汉人接触，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是现在彝族的

①《旧唐书·吐蕃传》。

祖先。

唐朝初年，乌蛮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六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部落。其中蒙舍诏居地最南，称为南诏，国王姓蒙。唐朝为了牵制吐蕃，扶持倾向唐朝的南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首领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各诏，建立了南诏国，定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市南）。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此后，南诏又征服了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成为唐朝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和唐关系密切，国王即位都受唐朝册封，在唐朝的影响下，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

政治制度方面，中央设清平官 6 人，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下设六曹，也类似唐朝的六部。土地制度实行授田制，类似唐朝的均田制。军事制度与唐朝府兵制相同。

南诏的洱海和滇池湖畔，农业很发达。已普遍使用牛耕，水田一年两熟，一季种稻，一季种大麦。手工业方面，冶炼技术精良，生产的浪剑、郁刀都十分锋利。建筑技术也学唐朝，至今矗立在大理的崇圣寺三塔，主塔有16级，高58米，建筑精巧，巍然壮观。此塔是汉族工匠恭韬和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文化方面，南昭不断送子弟到成都学习，50年中，总计不下千人。唐朝的诗文、书法，在南诏广为流传。南诏王和清平官都能写汉文诗。可见唐文化对南诏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南诏立国之初与唐关系甚好，开元以后，朝廷腐朽，关系处理不当，与南诏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在唐朝逼迫下，南诏臣服吐蕃，但又遭到吐蕃贵族的沉重压迫，人民痛苦不堪。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重结盟好，配合唐朝共击吐蕃。此后，终唐之世，双方时战时和，都逐渐衰落。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为权臣所灭。南诏立国，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和云南各族的融

合，对边疆和中原的联系，都起了促进作用。

总之，唐王朝统治时期，是各民族经过长期的战乱、分裂而趋向融合、南北统一的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唐朝的民族政策和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则是唐太宗时奠定的。唐朝初年，尽管曾通过战争征服了东西突厥、薛延陀和高昌等部落，巩固了边境，打通了丝绸之路，维护了国内的和平环境，沟通了西域及与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但唐初统治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并不以战争为根本目的，而是在战争之后，能采取较少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因而唐初统治者，能及时正确处理民族间的矛盾，无论是被征服的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能够尊重他们的习俗，让他们原来的酋长负责统治其原来的地区和人民。此外，允许部落首领留在京师任官，有的被任为重要军事将领，有的甚至在皇宫中负责警卫工作。他们受到了与汉族官吏同样的待遇。唐朝还以宗室女嫁给各部落酋长，结成亲戚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联系。唐朝在西北地区畅通丝绸之路；在北方开"参天可汗道"；在西南多次修筑蜀道，进一步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唐朝前期民族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各族人民共同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做出了贡献。盛唐时期，国力强大，疆域辽阔，东接日本、朝鲜，西接伊朗、印度，北到蒙古大沙漠以北，南到南洋群岛，大大地超过了前代。

---

①《资治通鉴》卷198。

第四节　唐朝的对外关系

一、唐朝的对外政策

公元七、八世纪时的唐朝，是世界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国力最为强盛、文化最为发达和繁荣的封建大帝国，是我国雄冠世界的历史时期。唐帝国这种显赫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必然导致世界各国对它的仰慕和向往，于是，便迎来了自西汉以来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周边各国纷纷遣使来访和学习，进行经济文化交往。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勉励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因此，有许多国家都派人到唐朝学习。日本更把中国视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象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①所以，日本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国直接学习中国文化。唐王朝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对外关系遵循着所谓"远夷存抚"的方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外采取了较开明的开放政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鼓励对外交往，气度之恢弘前所未有。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国家有70多个，来中国的外国使节、学者、艺人、僧侣、商人很多。在长安还有外国的常驻使团。唐王朝的信使甚至远及地中海、东罗马。其中与唐朝来往密切的国家有日本、新罗、大食、波斯、天竺、泥婆罗、骠国、真腊、林邑、狮子国、护密国等。

唐朝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包括政治上友好交往、经济上互利、文化上交流和人才上开放等几方面。在人才开放方

①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7—18页

面，不但欢迎外国人来唐学习，而且外国学生有才干者即可受到唐政府的重用，国内许多文人、学问僧、官员也可相继出国传播唐文化。唐与各国、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相互往来、相互影响的加强，对于促进唐朝和各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最大特点是：敢于伸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富于刷新精神。高度昌盛的唐文化，既不排外，也不自大，而是以巨大的聚集力吸引外来文化，又以极大的消化力，融合外来文化，并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国外大地上开花结果。当然，文化交流并非一片光明，也有阴暗面，一些糟粕时常随着开放也流出和传进。如胡僧的咒术、宗教中的迷信、婆罗僧的骗术等，在当时无疑起了消极作用。唐初的对外政策，尽管有些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中最值得称道的。它是中华民族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唐初的历史表明，由于较为开明正确的对外政策，才促使唐政府与各国进一步保持友好关系，更加深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才使唐朝前期的经济更趋繁荣发达，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才能使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唐和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鲜 很早以来，朝鲜和中国在地理及经济文化方面就密切相连、息息相关，双方互相移民，文化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唐代初年，朝鲜半岛上仍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并立，它们和唐朝的关系颇为亲密。唐朝后来曾与高丽发生过一些战争，影响到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丽灭亡，新罗统一半岛。此后，唐朝同新罗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次数频繁，人数众多，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新罗商人以人

参、牛黄、朝霞绸、海豹皮等特产和手工业品输入唐朝，把中国的瓷器、茶叶、书籍带到朝鲜。为了接待朝鲜商旅，唐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有“新罗坊”，供新罗侨民居住。

新罗十分重视唐朝文化，广泛研究和学习唐朝各种典章制度、文史经典、天文历法和医学。新罗曾派大批子弟到长安学习，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时称“宾贡进士”。如崔致远在唐朝考中进士，又在唐朝做官，著有《桂苑笔耕集》一书，其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史料。这些留学生在吸收和传播唐朝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极大。新罗的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修建而成。新罗人还改穿唐人服装，根据唐朝的法制改订他们自己的礼仪和法律。七世纪末，新罗人薛聪创造的“吏读”，借用汉字标注国音，把新罗语言和中国文字密切结合起来，对朝鲜人民的文化普及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新罗的中央和地方官职，也大体是仿照唐朝设置。又仿效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中国的文化典籍如《左传》、《文选》等，大量传入新罗。新罗人民尤其爱好唐诗，白居易的诗歌很受欢迎。唐末雕版印刷技术传入朝鲜。佛教、佛经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当然，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代文化也有不少影响，唐宫廷十部乐曲中，高丽乐即居其一。

日本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上早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时期，日本积极致力于中日交往。日本以极大的热忱学习中国文化。有唐一代，日本所派“遣唐使”有13次，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6次，合计遣使入唐共有19次。每次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人数多时一次达到500余人。成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及阴阳师等，还有众多的学问僧、留学生和各种文化技术人

员随行。

遣唐使在中国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回国时将中国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一些生产技术带回日本。尤其在日本天平时代(公元724—781年)，是唐代文化输入的极盛时期，据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当时自都城制度至服饰几乎使人兴起一种彼我如一致的感想。"①

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在政治方面，唐朝初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中国回去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旻做国博士，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内容包括官制、田制、律令等方面，如根据唐朝的均田制，实行班田制度，并且实行租庸调法，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史称"大化革新"(大化是孝德天皇的年号)。在文化方面，日本古代曾使用汉字作为表达和记录的工具。后来利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逐渐发展形成两套"假名"(即字母)。留学生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利用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这两者合起来使用，便形成了日本文字。同时，日语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日本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有"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也都与唐朝相仿，学习制度和书籍都是由唐朝传去的。在建筑方面，日本八世纪的国都平城京（京都），完全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修建的，那里街道的宽度及排列方法，几乎和长安城一模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在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也受到唐朝的影响，如五月五日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七月十五日的孟兰盆会，九月九的菊酒等，都是唐朝传去的。可见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等无不受中国的影响。

---

①《正仓院考古记》第5页。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留下了不少可供回忆的珍贵文物。如日本奈良有八世纪建造的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的唐朝文物，一直保存至今。在日本还曾出土了很多唐初铜钱“开元通宝”。在我国西安何家村，也发现了日本八世纪的银币“和同开珎（宝）”。这些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与中国鉴真和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唐玄宗时来中国久居，官至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与诗人李白、王维有深厚的友谊。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他在回国途中遇到风险，船只漂流到越南，误传遭难。李白为此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诗，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长安，老死在中国。吉备真备的学术造诣很深，留唐达18年，在此期间，他全面考察了解唐代社会情况。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回国时带去许多重要文物典籍，对中日的文化交流贡献很大。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扬州人，是扬州大明寺高僧。他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先后经过五次失败，有一次遇风飘到海南岛，因受暑热双目失明，但仍然不灰心，终于第六次渡海成功，公元753年到了日本，时年已66岁。从此他便定居在日本奈良，参加了唐招提寺的建筑，公元763年去世后葬在该寺，他在日本定居10年，除传播佛教外，在传播汉文字、医药、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唐与印度的关系

唐时，印度称天竺，共分东、南、西、北、中五天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天竺和中国交往的历史也很悠久，唐朝时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唐太宗贞观年间，天竺多次遣使到中国通好。唐太宗也派梁怀敬、王玄策等出使天竺。两国的

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我国的麝香、纻丝、色绢、青瓷、铜钱、樟脑等不断传到天竺，由天竺输入我国的物品有胡椒、棉花、沙糖及奢侈品等。

七世纪末，我国的纸已由中亚陆路传到了印度，以后又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贝叶写字的时代。天竺文化对唐也有一定的影响。贞观年间熬糖法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经典的传入和译注，产生了与佛经有密切联系的变文。我国敦煌、云岗及麦积山石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这里的雕刻、壁画和塑像，都直接受到了印度犍陀罗或笈多式艺术的影响。唐代十部乐中，天竺乐居于重要地位。大唐境内有天竺医生行医，当时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及解剖学对我国医学影响很大。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著书中引用的天竺按摩法，一直保存到今天。

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玄奘俗姓陈名祎，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离长安西行，取道中亚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国。在此期间，他游遍了天竺各地，主要是当时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印度伽雅城西北），跟从佛学大师戒贤学习，后曾一度代戒贤为众僧讲经说法。后历游天竺各地，与当地僧众切磋辩论，名震五天竺。成为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佛学家之一。他带回梵文佛经657部。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他又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印度半岛和中亚等国的历史、地理、交通、风俗人情提供了资料。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播者，在长期居留异国期间，也曾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天竺。如有名的《秦王破阵乐》成为天竺人民所喜爱的音乐，又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流传该地。

在唐高宗时，义净从广州乘船去印度留学，并在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地方搜求佛经。前后25年，经历30余国，带回梵文经书400部。他回国后，在洛阳译经多年，又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传》等书，记述了当时南亚若干国家的情况及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事迹，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史料。

四、唐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

汉代以来，丝绸之路是长期连结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纽带。唐代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衰落，海上交通兴起，又出现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洋、波斯湾到达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唐代与中亚、西亚以及北非各国的关系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起来。

吐火罗（今阿富汗）是中亚的重要国家，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与唐朝的关系极为密切，双方使者互往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如吐火罗曾给唐朝输来汗血马、鸵鸟、玻璃、玛瑙、药品等物。

西亚的重要国家有波斯和拂菻等。波斯（今伊朗），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自六世纪以来，波斯始终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波斯商人大批地来到唐朝做生意，如长安、扬州、广州便是他们集中生活的地方，有许多"波斯店"。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如菠菜、波斯枣等。唐朝人爱打的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波斯湾上的港口也常有中国商船停泊。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等物品，更是大量输入波斯，并通过波斯传到西方，在吐鲁番、西安、太原、洛阳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都说明唐朝和波斯的经济文化交往是很繁盛的。

拂菻即东罗马帝国，也和唐朝往来不断，多次遣使入唐。唐朝的丝织品大量输入东罗马。东罗马的吞刀、吐火等杂技和医术也传入唐朝。在西安、咸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这是唐朝和东罗马经济交流的物证。

大食（阿拉伯）是西亚、北非一带的大国，和唐朝的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唐朝来经商的很多，分布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其中不少人定居在中

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造纸术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传入大食，后经中亚，渐渐传入欧洲，从而代替了欧洲原来质地脆弱易碎的草纸和价值昂贵的羊皮纸。这对阿拉伯和西欧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将高仙芝与大食在怛罗斯（今苏联江布尔）作战失败后，被俘的杜环后来回国，著有《行经记》一书，书中提到大食都城亚俱罗（今伊拉克境内）市内，有中国丝织工及其他工匠用中国工具在工作，说明中国的丝织技术等也传到了阿拉伯。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出土了唐朝的青瓷器，这是唐朝和阿拉伯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在唐与中亚、西亚诸国的友好交往中，这些国家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传入中国。景教(基督教的别派)、袄教社会基础薄弱，逐渐在我国失传。摩尼教（波斯人摩尼所创）对中国后世影响较深，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组织群众的工具，伊斯兰教逐渐在中国生了根，成为兄弟民族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

第五节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形成

唐兴一百多年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空前增加，而统治阶级的生活更为奢侈，对农民的盘剥日益加重。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许多农民丧失耕地，四散逃亡，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到玄宗天宝年间，隐伏的社会危机便日益显露出来。

统治集团的腐朽　玄宗时，上起皇室贵族、官僚，下至一般地主，莫不竞相兼并土地，扩充田宅。如刑部尚书卢从愿因占有良田数百顷而被称为“多田翁”。①唐政府的赋役，也是名目万

①《新唐书·卢从愿传》。

端，多方盘剥，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天宝年间，唐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连吃败仗，弄得天下骚然，国力虚耗。而统治集团却更趋奢侈荒淫，政治越发腐败。玄宗宠爱贵妃杨玉环，整日沉溺酒色，不思进取，怠于政事。他将政事外委李林甫、杨国忠，内付高力士。而李、杨等人，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排斥异己，递相夸尚。国力空虚，阶级矛盾加深，这些都为安史之乱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节度使势力的增强 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节度使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唐玄宗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度也难以维持，因而募兵制开始兴盛。由于府兵番役更代，多不按时，士兵须自备粮饷器械，负担过重；服役士兵又受到种种奴役，番上宿卫者，早在贞观时，就已是“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①玄宗时，“卫佐悉以假人为僮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②府兵饱受虐待，再加上农民失地逃亡，造成兵源不足，征兵制只好让位于募兵制，府兵制亦随之瓦解。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因卫士耗散，宿卫人数不足，在张说的建议下，招募宿卫之士12万人，号“长从宿卫”，次年改称“彍骑”。在外征戍兵士亦行召募，称为“长征健儿”或“长征兵”。这样一来，兵士与均田制和农业生产相脱离，结果，“自天宝以后……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③出现了大量的职业兵。边将由于长期手握重兵，很快就造成了内轻外重、武人跋扈的恶果。

公元749年，折冲府无兵可交，府兵制名存实亡，方镇兵代之而起。所谓方镇兵，本源于边防兵。高宗永徽以后，统兵都督带使持节者开始称为节度使，而作为固定的武职名称，节度使

①吴竞：《贞观政要》卷10《论慎终》。

②《新唐书·兵志》。

③《唐大诏令集》卷65《叙用勋旧武臣德音》。

最早出现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节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①十节度经略使共统兵49万，辖州42个，其中兵力超过5万者，有河西、朔方、河东、范阳、陇右五镇。诸镇兵力相当于中央彍骑的4倍，唐初那种举关中兵以制四方的优势彻底丧失。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致使"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②节度使权力的无限膨胀，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的经过及影响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本姓康，父为西域胡人，母乃突厥人，再嫁胡将安延偃，故冒姓安氏。史思明，营州人，也是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二人生同乡里，幼相友善，俱通六蕃语言，后同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任捉生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因作战勇敢，累功升任平卢节度使，后又兼任范阳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近20万，实力雄厚。他曾多次入长安朝见玄宗，对唐廷的腐败和京师兵力的空虚有着清楚的了解。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促使着他在范阳招兵买马，储粮治械，并以蕃将取代汉将，以失意文人高尚、严庄等为谋士，阴谋反叛。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他打着诛奸臣杨国忠以"清君侧"的旗号，在范阳起兵，发动了一场反对唐中央的武装叛乱。安禄山率15万人南下，沿途郡县，纷纷瓦解。次年春，叛军攻下洛阳，安禄山自称皇帝，定国号大燕。唐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攻河北；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也率地方军民抗击叛军，冀、鲁一带15郡纷纷响应，从后方牵制叛军。

公元756年5月，潼关失守。玄宗带着杨玉环及其亲信仓皇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境内)，护卫亲军发动兵变，杀死杨国

①《唐语林》卷8。
②《新唐书·兵志》。

忠，逼迫玄宗缢杀杨贵妃。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位，是为肃宗，遥尊在成都的玄宗为太上皇。叛军入长安后，纵兵戮掠三日，城内一片火海，人民陷于极大的苦难中。饱尝战祸的冀、豫、关中人民纷纷起来，打击叛军。肃宗也在灵武调集军队，准备反攻。

公元757年，叛军内讧，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唐将郭子仪乘机反攻，当年九、十月，收复长安、洛阳二京。安庆绪败退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兵包围邺城，史思明从魏州驰援安庆绪，大败九节度之兵，复陷洛阳。公元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旋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唐军于公元762年再次收复洛阳，并乘胜追击叛军。次年初，史朝义为部将李怀仙诱杀于范阳，安史之乱方告结束。

长达近 8 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首先，广大人民（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河南洛阳一带，战争异常激烈，“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仓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一片凄凉景象。其次，唐为平叛，曾借回纥之兵，回纥兵在中原大肆杀掠，更加重了战争的酷烈。战争中，唐抽调大量边防精兵回内地平叛，留在边疆者，人数既少，又多为老弱残废。吐蕃趁机进犯，“安西四镇”尽失，唐的国防及在西域的力量大大削弱，甚至连关中亦难确保无虞，唐中央集权统治大为削弱。安史部将降唐后，多被封为节度使，尽领大镇，平叛有功武将也纷纷授予节旄，结果列镇相望，互相攻伐，从而形成了藩镇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

---

①《旧唐书·郭子仪传》。

藩镇割据 公元763年，史朝义被杀后，安史部将薛嵩、张忠志（唐赐名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等人率部降唐。唐为求得苟安，遂“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①分任他们为相卫及成德、魏博、卢龙四镇节度使，后田承嗣兼并了薛嵩的相卫镇，史称“河朔三镇。”平叛中，唐统兵高级将领、内地掌兵刺史也多加以节度使之号。藩镇各拥强兵，跨州连郡，专擅地方财赋、司法、军政大权，飞扬跋扈。或互相混战，或联兵反唐，其职位多为父子相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事后追认，而不得更改，稍有不满，即联名上表，要挟辱骂朝廷。“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②唐政府因自身力量虚弱，只好一味姑息迁就，以求苟安。

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长期的战争，动荡的政局，使人民横遭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唐朝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极度缩小，而兵饷赋役，日益繁多，因而控制区内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各藩镇在其辖区内，更是增兵增饷，生杀由己，人民遭受“暴刑暴赋”的统治。它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

二、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

宦官专权 唐初，宦官人数不多，一般没有多大权利。贞观时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直到高宗去世，宦官基本上没有大权。及至玄宗后期，将宫廷事务交于高力士，“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③宦官权势开始见重。肃宗在位六年，一直受制于“持权禁中，干预政事”的宦官李辅国。代宗时，曾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叛国子

①《新唐书·藩镇魏博传序》。
②《新唐书·方镇表序》。
③《旧唐书·高力士传》。

监事”，兼统禁军。他们名义上是全国的军事统帅，实质上专典禁军，即掌握中央军权，但尚未制度化。其后，到唐德宗时，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管左、右神策军，宦官掌握禁卫兵权成为定制。专权宦官除侵夺土地、霸占民田、以“宫市”掠夺人民之外，在政治上更有种种恶劣的表现：一为监军。从玄宗时开始，唐中央在藩镇将帅身边无不置有监军，多以宦者充任。宦官权力外移，在地方上也可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二为统军。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宦官后来多统率中央神策禁卫军，手中掌握有军队，使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有了武装力量的保护。三为执掌机要。唐中叶后曾设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其职务是执掌机要，承受奏章，传宣诏令，从此扩大了宦官在政事上的权力，使其更加擅作威福。四为进退大臣。宦官操纵把持朝政，可直接影响官员的进退黜陟，甚至于可以举荐或罢免宰相。五为废立皇帝。唐朝中、后期诸帝，几乎全由宦官拥立，新皇帝往往尊称宦官首领为阿父或尚父，凡对宦官专权不利或对宦官稍有言行不满的皇帝，大多遭到废黜或杀害。如顺宗、宪宗、敬宗、文宗皆死于宦官之手，昭宗也曾遭长期囚禁，几乎丧命于宦官之手。

宦官的专横跋扈，必然要同皇权及朝官发生直接冲突，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唐后期朝官曾与宦官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朝官衙门多设在长安城偏南的皇城内，宦官机构多在偏北的宫城，故这一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影响较大、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顺宗及文宗时期。

永贞革新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唐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其主要内容有：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方镇割据势力；打击宦官势力，罢宫市及五坊小儿，剥夺宦官兵权；严明赏罚，任人唯贤；停止苛征，缓和对民众的剥削；进行宫内整顿，释放宫女及教坊女乐，裁

减宫内闲杂人员等。这一改革，革除了许多弊政，打击了藩镇及宦官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具有进步意义。但这些措施却遭到宦官、藩镇及保守官僚的激烈反对。当年八月，宦官俱文珍等拥立太子李纯为帝（宪宗），顺宗遭幽禁并被杀害。二王外贬，王伾死于贬所开州，次年，王叔文被赐死。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均被贬为边州司马，时称"八司马"，此即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革新运动失败。

"甘露之变"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重用李训、郑注等人，图谋消灭宦官势力。李训任相后，鉴于宦官控制着禁军，必须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与之抗衡，乃以同谋郭行余、王璠分任邠宁、太原节度使，以罗立言权知京兆尹，韩约为左金吾卫将军，并召募军队，同时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以为外援。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十一月的某天，韩约上奏，右金吾卫衙门后院石榴树上降有甘露，请文宗前往观赏，实欲诱宦官到那里，围而杀之。文宗欣然同意，至含元殿，先令仇士良、鱼弘志率宦官前往探视。仇入金吾卫厅，发现设有伏兵，慌忙逃出，急拥文宗还宫。然后发兵反攻，李训、郑注及同党均遭屠戮，史称"甘露之变"。

朋党之争 唐朝中央官僚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一为门荫出身，多属士族，思想较为保守；一为科举进士科出身，多为庶族，倾向于改革，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两类人因各自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投，极易结党树派，以门户之见互相斗争，是谓"朋党"。这两派互相排挤倾轧，明争暗斗，由来已久，而历时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当属"牛李党争"。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科考试时，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宰相李吉甫认为是攻击自己，向宪宗哭诉，且言考试有舞弊行为，结果，主考官遭到贬黜，牛、李

等人不予升迁，从而引发了历时近40年的朋党斗争。

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杜牧、柳宗元等，李党以李德裕（吉甫子）、郑覃为主要代表。双方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通过什么途径选拔朝廷官员，牛党主科举，李党主门荫。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牛党主张姑息忍让，李党主张坚决镇压，平息叛乱。三是对改革持何种态度，牛党倾向革新，而李党则较为保守。在几十年时间内，两党相互攻击，沉浮不一，连唐文宗也慨叹："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①最终以牛党取胜而渐息。

三、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 唐后期与前期相比，封建经济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二是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均田制本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时期实施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荒地，丧失这个先决条件，均田制必然无法继续执行下去。

唐初推行的均田制，对贵族官僚所授永业田和赐田，不仅规定全面细致，而且数额很高。唐代官员人数越来越多。一般地主和广大农民也需要授一定数量的永业田，而唐朝前期的人口增殖极快，均田令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又比较松弛，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均田制的持久推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不断向各类地主手中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农民耕地被侵夺，遂使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

此外，在土地兼并浪潮的冲击下，丧失耕地的农民，因生活所迫，或沦为雇农、佃客，或成为流民。由于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不断加重，沉重的负担又落到了现有农户的身上，结果又逼着

---

①《旧唐书·李宗闵传》。

未逃的农民逃亡，于是逃户益多。武周、玄宗时，已是“天下户口，逃亡过半”。①安史之乱后，人口死亡流徙，“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均田制存在的条件之一是封建国家把农民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随着这一条件的丧失，均田制度完全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租庸调赋税办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是以国家能控制大批占有一定数量田地的农民为前提的。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批逃亡，租庸调制也遭破坏而无法维持，造成了国家严重的财政困难。

刘晏理财　刘晏（公元715—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为了解决唐政府的财政困难，他针对唐朝财政面临的种种危机，结合自己在中央财政部门任职20年的实践经验，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其主要措施有：（一）改革盐法。取消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仅在产盐区设之，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其运销各地，又取消州县加收之榷盐钱。禁止征收过境税，以保持盐价平稳，便利转运。既避免了多设盐官滋扰民众的流弊，又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二）推行常平法。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官员任知院官。知院官每月每旬将本道各州县雨雪、丰歉、物价状况申报中央，政府据此在丰收地区高价籴粮，在歉收区低价粜粮，对当地物资，官府遇贵则卖，逢贱则买。它有利于平稳物价，政府也从中获利。（三）整顿漕运。刘晏疏浚汴水，训练漕卒，制造了坚固的运船，分段转输，避免了运输途中的大量损耗。

刘晏理财达20年，初步改善了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紊乱状况，增加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稳定唐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两税法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瓦解后，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经

---

①《旧唐书·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

济困难。加上藩镇割据，截留财赋，从而形成了"王赋所入无几"的情况。①唐为弥补财政亏空，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税目，加重对人民的榨取，又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为了增加赋税收入，缓和阶级矛盾，政府不得不进行税制改革。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推行"两税法"。其主要内容为：（一）量出制入。唐政府根据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确定赋税征收总额，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赋税总额为准，分摊到全国各地征收。（二）不分土著户和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确定其户等。（三）税分户税、地税。户税据资产多少定出户等，确定纳税数目，地税依田亩征收，租庸调及其它杂税全部废除。（四）无固定住处的商贾，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税1/30。（五）无论户税、地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不得迟于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两税之名，即源于此。（六）地税征米粟，户税纳钱，而实际上钱大多折算为绢帛，纳钱仅一小部分。

两税法的形成，除了在政治方面唐要对付方镇反叛和农民起义，而不得不增加自身经济力量之外，在经济方面，也有两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一则由于唐前期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引起税法也随之改变。再则，唐初行租庸调法，又以地税和户税作为补充税收。地税由义仓纳粟而来，即上起王公百官，下至地主、农民，按垦田顷亩，每亩纳粟三升，以备荒年。其后，税额渐增，每亩多者达一斗，少者五、六升；税物也由粮食变为轻货，再变为折钱交纳，征收方式也逐步变为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户税在高祖时，量产分天下户为三等征税，后改为九等。代宗时规定税额从500文至4000文不等，官吏按品级纳税，一品税同上上户，九品税同下下户。唐初，户税、地税数

①《旧唐书·杨炎传》。

量轻微，到天宝年间，已占唐朝税收的很大部分。租庸调制破坏后，唐不得不加强对户税、地税的征收，并在此基础上，汇总各项税收，整理以前的征收办法，从而形成了“两税法”。

两税法在实行之后，曾起了一些积极作用。首先，征税标准除丁壮外，又增加财产一项，比较符合当时财产占有悬殊和客户大量存在的实际情况，多少改变了过去那种产少税多，产多税少，产去税存，户逃邻摊的不合理状况，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其次，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纳税面。不论土户、客户，不论农民、地主，还是贵族官僚，有产即须纳税，这无疑增加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的经济实力。推行两税法之前，唐每年税收为1200万贯，其中盐税占一半，实施新税法后，“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①税收实际增加了一倍有余。史载实行两税法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②虽有夸张，却表明两税法实施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最后，赋税征收的标准，由以丁口为主开始向以财产为主转化，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具有进步意义。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大变革，并对后世税收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两税法仍是封建地主政权剥削人民的税法，而且该税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所以，实行不久，即弊端丛生。第一，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政府关心的只是征收地税，并不在意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谁手中。故此，几十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③“富者兼地数万

①《旧唐书·德宗纪上》。
②《旧唐书·杨炎传》。
③《李文公集》卷3《进士策问第一道》。

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的现象随处可见。唐宋之际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这一变化，使得以后封建政府不再对土地兼并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宋以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反映。第二，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以后，钱价越贵而物价变贱，农民负担无形中加重。“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②第三，两税总额实际上并非固定不变。公元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外，每千钱增收200文，唐政府不但不加制止，反命各道照此办理。公元792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税2/10。因而税额在不断提高，地方官往往借机大肆搜刮，中饱私囊，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第四，两税法本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统一起来。谁知后来，“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③法外苛征纷至沓来，盐税、茶税、竹木、漆税、借商钱、间架、除陌诸法，不一而足。“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④简直无物不税。广大农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转死逃亡者，比比皆是，这种“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的苛政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唐末的农民大起义。

四、经济重心的南移

自东晋南朝以来，江南地区由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努力开发，社会经济日趋发达。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

---

①《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②《新唐书·食货志》。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唐德宗》。
④《旧唐书·食货志》。

依赖江南地区，两税的收入，几乎全靠江南八道："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①南方经济迅速超过了北方，在唐代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向南方转移。

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有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和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第一，南方有利的自然环境具有深厚的潜力，它为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古代人民开发最早的经济区主要在北方，因而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在早期一直处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后期，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区域性变化，其时，中原人口大量下降，江南人口普遍上升，新开发的经济区如扬州、荆州、成都平原、太湖流域等地，正在迅猛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为南方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北方的战乱、天灾，压迫着人民向南方迁移。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而南方地区高温多雨，气侯湿润，土壤肥沃，河湖密布，为这些工具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第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及生产斗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为南方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中叶后，袁晁、方清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唐的封建统治，对江南地区生产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南方劳动力的增长，也是促进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外，从东汉到隋以前，向南方的大量移民，隋唐时期南方人口的猛增，为江南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人手。从公元589年隋灭陈到公元978年北宋统一南方，在不到四个世纪时间内，南方户口就增加了四倍多。隋初开皇时，南方户口数仅占全国总数的1/8，发展到唐末五代时，竟已与北方平分秋色，可见隋唐时，南方劳动力发展之迅猛。隋

①《唐会要》卷84《户口数杂录》。

唐时期，北方各州郡户口普遍大幅度下降，南方却不断增长，南北人口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既是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也是造成南方经济赶上或超过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政治、军事因素对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初以来，南方基本上处于和平环境，而北方因战争的破坏（尤其是安史之乱），城邑残破，人口逃散，四野荒芜。唐后期北方的长期动乱与南方的相对稳定适成强烈对比，当时人普遍认为："今天下方镇，东南最宁"。①所以，南方经济在稳定中前进，而北方却在混战中衰败。北方藩镇林立，节帅们自擅财赋，"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②一方面使得北方经济难以得到恢复，朝廷收入锐减；另一方面也迫使唐王朝全力转输江淮粟、帛、钱币、轻货至长安，以供应京师。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③在这种格局下，唐政府为了从南方榨取更多的租赋，就不得不略为关心南方的社会生产，一些地方官吏也能注意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如常州刺史孟简，对常州40里长的孟渎重加修浚，可灌溉农田4000顷；江西观察使韦丹，曾发动百姓筑堤以扞江水，修陂塘598所，灌溉田地12000余顷。这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第五，安史之乱以后，从长安到西亚、欧、非的"丝绸之路"因兵燹和吐蕃的强盛而逐渐衰落，南方同外国商人的海路贸易活动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后期，江南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农业方面，北方民众的南移，使得劳动人手大增；牛耕、灌溉、纺织生产的技术经验也传入南方，耕犁、耙、砺礋、碌碡、劳、耰等农具的大量使用；大量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戽斗、辘轳、桔槔、翻车、筒车、机汲等

①《全唐文》卷417。

②《旧唐书·田承嗣传》。

③《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

灌溉工具的普遍应用，使得南方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亩产量提高，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纺织业中分工细致，如丝织业，“凡织纴之作有十（布、绢、絁、纱、绫、罗、锦、绮、繝、褐），组绶之作有五（组、绶、绦、绳、缨），细线之作有四（紬、线、弦、网）。”①这有利于技术的提高。棉织业也在南方开始发展起来。这时的造船业更为发达，仅扬州便有10个官办造船场，所造大船可载粮千斛。造纸、制瓷、制茶、制盐、冶铸等行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商业方面，南方地区商贾活跃，都市繁华，邸店、柜坊、飞钱普遍涌现，反映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扬州一带，“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也有大量外商在此活动，对外贸易极为兴盛。广州、成都、杭州、苏州、明州、越州等城市商业贸易也非常兴盛。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汇兑文券的“飞钱”也在唐后期大量出现，显示了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唐后期南方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迅速的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相比之下，北方黄河流域就大为逊色，不但往日经济的繁荣景象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起来，而且从发展的趋势上来看，正在缓慢地走向衰败，因而南方社会经济就迅速赶上了北方，并在以后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唐人所说的“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②正是对这一变化的高度概括。诚然，唐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南方尚未取得绝对的优势，但南盛北衰的发展势头却是不可遏止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东汉开始，至南宋最终定型，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后期无

①《唐六典》卷22《少府监》。
②《新唐书·权德舆传》。

疑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环。

第六节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一、唐末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统治集团的腐朽　唐朝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使统治集团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统治集团的腐朽，促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从唐穆宗（公元820—824年在位）到农民大起义的50多年间，晚唐的皇帝们一个个在奢侈腐化中消磨时光。唐懿宗李漼，“好音乐宴游”，“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①每逢他出游，护从十万余人，殿前供奉的乐工多达500人。每月举行大型宴会不下十余次，耗费巨大。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时，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银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②为了借助神佛的力量巩固统治，他大力进行宗教活动。公元873年（咸通十四年），为了把法门寺佛骨迎入宫中，下令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皆饰以金玉、绵绣、珠翠。自京城至法门寺300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长安时，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官僚富室，夹道结彩楼及举办无遮大会，竟为侈靡。懿宗自己降楼膜拜，涕泪交流，丑态百出。从而使其唐代的崇佛活动发展到最高潮。他不仅昏庸靡费，也极为残暴，同昌公主因病不治而死，他滥杀韩宗劭等榆林医官20多名，并将其家属300多人投入京兆狱中。僖宗以童昏继位，称宦官田令孜为

①②《资治通鉴》卷251。

阿父，田令孜乘机专权纳贿，国库所藏，耗费一空。

唐末的官僚更是贪污成风，专以搜刮百姓为事。懿宗时的宰相路岩及其下属，贪污纳贿，生活腐化。至得令陈蟠叟上书说，请破路岩亲吏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懿宗不但未惩办边咸，反而把陈蟠叟流放外地。各方镇节度使“暴行暴赋”，祸害人民。定边节度使李师望，“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后派来代替李师望的节度使窦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①州县官苛虐百姓，有如狼虎。公元869年（咸通十年），陕州大旱，人民向官府告灾，观察使崔荛指着庭院中的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②竟把告灾的老百姓乱棒打出。唐末诗人杜荀鹤在《再经胡县城》一诗中说：“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日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暴露了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

繁苛的赋役剥削 唐朝后期，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和统治集团生活的腐化，边患和内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也不断增加，统治者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官僚地主加紧了对土地的掠夺。河南许州长葛县令严郜，咸通中罢官后，在本地兼并“良田万顷”，③大置庄园。地主官僚的大小田庄，遍布各地。《旧唐书·懿宗纪》说，当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当时土地集中的写照。唐末的赋税征收也不断加重。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政府不断加强两税法的税额。两税法公布三年后，每千钱加税二百文。公元792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征十分之二。两税法初行时，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但绢帛与钱的比价却经常变动。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宰相陆贽上书说：“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近者万钱为绢

①《资治通鉴》卷251。

②《旧唐书·崔宁传》附《崔荛传》。

③《新唐书·食货志》二。

六匹，价贱而数加”。①这样，由于钱重物轻，万钱原纳绢三匹，十五年后就得纳绢六匹，百姓负担增加了一倍。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唐武宗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所种田亩，征税素有定额，由于“近年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致使力农之夫，转加困弊。”②再加上官僚、地主利用权势逃避租税，“十分田地，才税二、三”，两税的负担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除两税之外，统治者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对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粮食、布帛、牲畜等物品，勒索交税。在杂税盘剥中以盐、茶、酒的专卖最为严重。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唐肃宗为了扩大税收，对食盐进行专卖经营，各地生产的食盐，由政府统一收购，收购价每斗10文，而售出时每斗110文，后来售价竟高达每斗370文，“至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者”。③由于盐价昂贵，贫苦农民只好淡食，或买价格便宜的私盐。由于盐利大增，出现了一批武装贩盐的人物。政府在全国设立13个巡院和大批盐官，缉查私盐商贩，并订出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仍难以禁绝。政府对茶叶也征收重税。公元793年，唐德宗时正式税茶，收税十分之一，对茶叶实行专卖，以后又不断提高税额，到宣宗时，几十年间，茶税也增长一倍以上。

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 官吏横征暴敛，繁重的租税徭役，逼得农民无法生活，这又为地主、豪商兼并土地提供了便利。农民失掉土地，倾家荡产，官府仍要照旧征税，迫使农民逃亡他乡。地方官把逃亡农民的赋税，转移到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赋税负担的加重，迫使更多的人流落异乡，农民逃亡不断增加，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严重的危机。公元818年，官员李渤给宪宗的

①《新唐书·食货志》二。
②《唐会得》卷84，《租税》下。
③《唐大诏令集》卷112，《减盐铁价敕》。

上书中说："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有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它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均摊逃户。"这种情况唐末时更为严重。士人刘蕡在科举对策中，也沉痛指出百姓"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严重社会问题。①宣宗在诏书中已经指出，由于农民逃亡，耕地"因致荒废，遂成闲田"。②懿宗咸通末年大臣的奏议中，也有"户口逃亡，田畴荒废"的记载。③唐末，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给僖宗皇帝的《直谏书》中说，唐朝国有九破：即终年积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税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又说天下百姓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办事官员）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④这个《直谏书》是对唐末社会危机和人民痛苦生活最生动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有冤莫伸，无法生存，最后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二、农民起义的发生和经过

大起义的序幕 在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公元859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领导人民在浙东象山县起义，义军迅速发展到三万多人，屡败唐军，义军以剡县为根据地。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立政权，年号"罗平"，铸印"天平"。

①《旧唐书·刘蕡传》。
②《唐会要》卷85，《逃户》。
③《旧唐书·懿宗纪》。
④《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表达了群众要求平均的愿望，义军“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唐政府用开仓赈济的办法瓦解群众，又调优势兵力赴浙东镇压，公元860年6月，裘甫兵败牺牲。

公元863年，唐政府在徐泗地区招募800人戍守桂林，防御南诏，约定三年换防。可是过了六年，仍不许回家。公元868年，戍卒在庞勋领导下，杀死将领，打败阻拦唐军，北归徐、泗地区。沿途饥民纷纷加入，义军发展到20万人，攻下徐州，占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控制江淮漕运，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唐朝统治者派重兵镇压，又勾引沙陀贵族、吐谷浑等军队一同围攻，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奸细，最后庞勋兵败，公元869年在蕲县（安徽宿县）被围，与义军一万多人壮烈牺牲。

裘甫与庞勋起义虽然失败，但他们的余部仍在山东、徐州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后来农民大起义的火种。

大起义的爆发 公元873年（咸通十四年），关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第二年又逢大旱，自虢州（河南灵宝）东到沿海，麦子半收，秋粮几乎颗粒无收。人们只能以蓬子和树叶充饥。州县照旧催逼捐税，人民被迫起来反抗。

公元874年（僖宗乾符元年）年底，濮州（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和尚君长、尚让等领导农民3000人在长垣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指斥唐政府“贪沓、赋重、赏罚不平”。②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第二年六月，攻下濮州和曹州。在王仙芝起义时，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黄巢也率数千人起义。两支起义军共同向唐朝封建统治发起进攻。这标志着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

王仙芝和黄巢都以贩私盐为业。为了抗拒官府的缉捕，他们在贩盐活动中曾有严密的组织，积累了斗争的经验，走南闯北，

---

①②《新唐书·黄巢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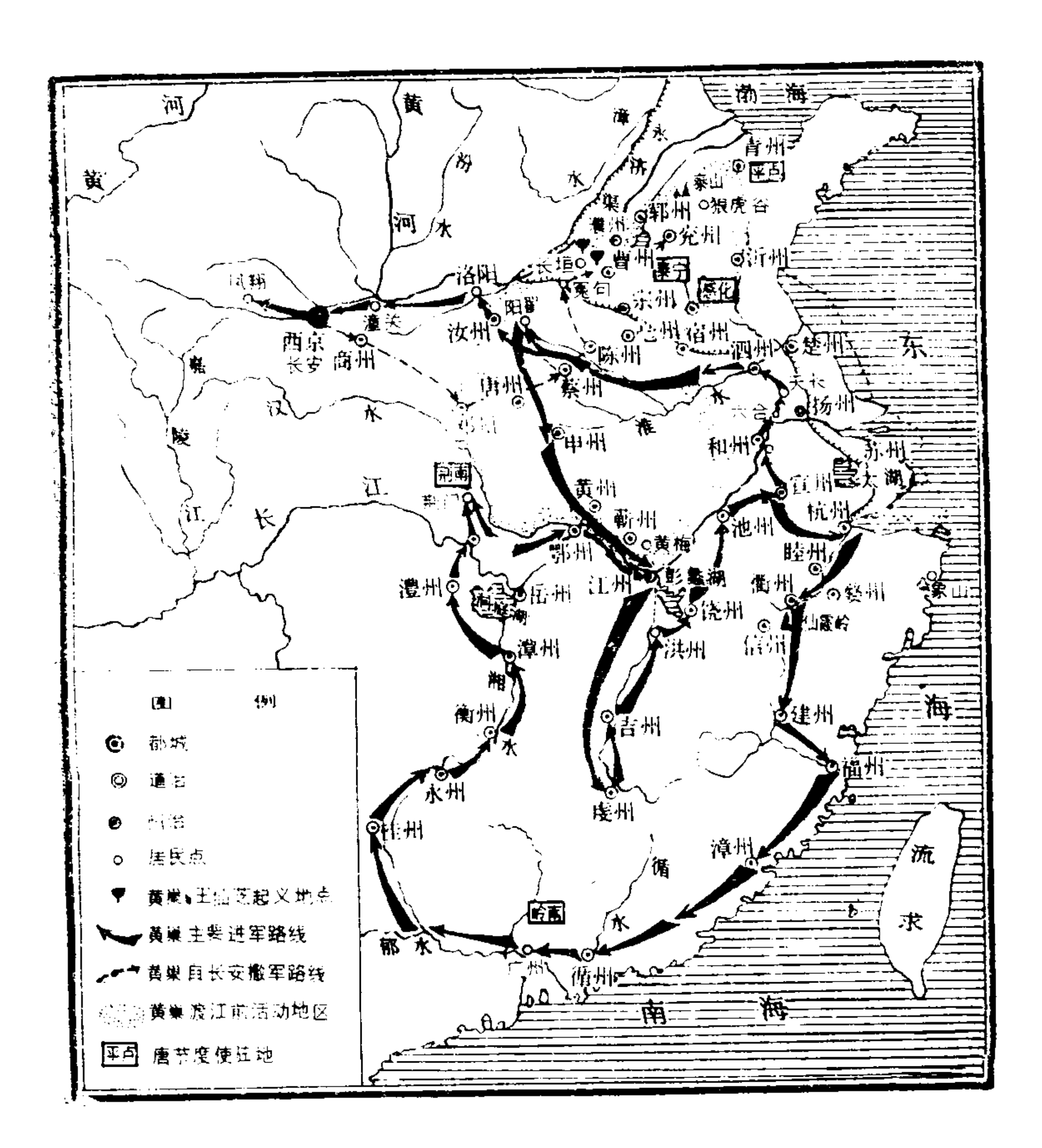
接触广泛，与各地群众有比较多的联系，成为起义的领导者。黄巢又粗通诗文，善骑射，曾几次到长安应试不第，对唐王朝的统治愤恨不满。这两支起义军在山东一带配合作战，“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面对起义的迅速发展，唐政府派宋威领兵镇压，义军机动作战，大败唐军，又从山东转战河南、湖北，围攻蕲州。唐政府见镇压无效，对义军进行诱降，派特使至蕲州（湖北蕲春），授予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号，王仙芝动摇，准备接受，但在黄巢等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实现。此后，黄巢领兵回转河南、山东。王仙芝继续在湖北一带活动。公元878年（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一带遭唐军包围袭击，被俘牺牲。

王仙芝死后，其主力由尚让率兵，北上到亳州投奔黄巢，两军有众十万余人，共推黄巢为统帅，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年号为“王霸”，表示了坚决推翻唐朝封建统治的决心。从此以后，义军有了统一的行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流动作战和攻占长安 尚让领兵与黄巢在亳州会师，唐朝调动军队向亳州围攻。黄巢率大军回转河南，准备夺取东都洛阳，唐政府调集江淮兵力，联合藩镇，加强对洛阳的防卫，并准备在中原合击起义。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阴谋，黄巢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实行流动作战，向藩镇势力比较薄弱的江南地区进军。公元878年，黄巢率义军渡过长江，进入江西、浙江，为避免与唐镇海节度使（驻江苏镇江）高骈决战，起义军从仙霞岭开山路700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又沿海岸南下，攻占广州，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同时又分兵西取桂州（桂林），控制了岭南大部分地区。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揭露唐王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科举失才等弊政，向贪官污吏发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①的严厉警告，再次宣布推翻唐朝统治的决心。

①《新唐书·黄巢传》。



唐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公元879年10月，黄巢率义军从广州北伐，义军由桂林北上，乘湘江大水，编大木筏顺流而下，进入湖南，在潭州消灭唐军十多万，攻占江陵，又顺长江东下，席卷江西、浙江。公元880年10月，义军渡过长江，进入安徽、河南，接连打败唐军。为了利用藩镇与

唐政府的矛盾，减少进军阻力，黄巢在河南通牒藩镇，要求他们"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义军纪律严明，沿途百姓从者如流，迅速发展到60万人。义军逼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文武官员投降。十月，义军攻占潼关，直逼长安。统治者乱作一团，官僚富室纷纷逃窜，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挟持下，逃向四川。公元880年12月，义军"甲骑如流，辎重塞途"，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群众夹道欢迎，义军首领尚让抚慰群众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②义军入城"路遇贫民，争相施与"，深得群众的欢迎。

大齐政权的建立及其措施 黄巢率领义军进入长安，公元881年元月，举行开国大典，在大明宫含元殿正式登基，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黄巢被尊为"大齐睿文宣武皇帝"。为了巩固政权，起义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大齐政府的高级官员，都由起义军首领担任。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孟楷、洪盖为左、右军中尉，朱温、张言、李逵等为诸卫大将军。皮日休为翰林学士，王璠为京兆尹。同时规定，唐朝三品以上的大官停职，四品以下的官员留任原职。通令逃亡官员进行登记，报名衔者复其职，抗拒者从重治罪。

第二，坚决镇压与农民政权为敌的反动势力。对那些伪装投降，暗中继续顽抗的李唐宗室和反动官僚，坚决给以揭露和镇压。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众迎降，却在家里窝藏着驸马、宰相、公卿等贵族官员一百多人，被起义军全部查获处死。

第三，没收大官僚的府第作官署，没收官僚、富豪财物以充军资，有的财物用以救济贫苦百姓。被镇压的官僚贵族，财产全部充公。

---

①《旧唐书·僖宗纪》。

②《资治通鉴》卷254。

第四，颁布法令，整顿纪律。新政权规定任何人不得私藏武器，民间所有刀、枪、剑、戟、弓、矢等一律登记上交。任何人不得随便杀人，需杀者，必须经过批准。

第五，救济贫弱，关心百姓疾苦。即使在起义军极端困难的时候，还"出太仓粟以支食夫，剥榆树皮以充御房"。

在大齐政权统治下，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没逃掉的唐宗室，几乎全被杀掉，长安富家相率出逃。逃不出去的，也失去以往的威风和权势。"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①"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②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三、农民起义的失败和历史意义

农民起义的失败 大齐政权虽然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起义军在长安也发生许多失误，遇到严重的困难，以致造成形势的逆转，逐渐由胜利走向失败。

第一，进入长安后，没有派军乘胜追歼唐朝的残余势力，给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喘息的机会。凤翔节度使郑畋，得以重新纠集力量。唐僖宗在四川站稳脚跟，利用蜀中财富，通告各地藩镇，出兵围攻关中。同时，农民政权的建立，引起各地节度使的仇恨和恐惧，他们也暂时停止了相互间的攻夺和对唐朝廷不相救助的态度，重新联合起来，向义军反扑。

第二，唐朝统治者除联合藩镇势力外，又勾引沙陀李克用骑兵参与内战，向长安反攻。在反动势力联合攻击下，义军虽英勇战斗，在战略上却难以摆脱反动势力的围困。公元881年，郑畋率军进攻长安，尚让领兵反击，误中埋伏，损兵二万多人。唐军进入长安，烧杀抢掠，黄巢又从灞上反攻，几乎全歼入城的唐军。义

---

①何光运：《鉴诫录》卷1《金统事》。

②韦庄：《秦妇吟》。

军虽有不少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形势。

第三，义军多年来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自已的根据地，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缺乏巩固的后方，作战时无法保证粮饷的供应。最后，义军在长安坚守三年，孤城坐守，粮食问题无法解决，“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①严重缺粮使战斗无法延续。

第四，唐政府在军事围攻的同时，加紧对义军的分化、诱降活动。公元882年9月，义军重要将领、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唐僖宗如获至宝，赐名“全忠”。朱温叛变使义军腹背受敌，黄巢在数战不利的情况下，放弃长安，向河南撤退。

义军在河南，进攻陈州（河南淮阳），大将孟楷不幸牺牲，黄巢报仇心切，感情用事，围攻陈州300天，旷日持久，坚城难破，不但消耗大量兵力，失去了及时向有利地区转移的宝贵时机，反而在中牟被李克用打败，损失惨重。最后，黄巢败退山东，部众丧亡殆尽，公元884年夏天，在泰山狼虎谷（山东莱芜）自刎而死。历时十年的大起义，终于失败。

历史意义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十年，波及全国十多个省区，义军从几千人发展到60多万，他们采用避实击虚的方针，实行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先后攻下洛阳和长安，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首先，这次起义给唐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打击。义军在战斗中歼灭大量唐军，攻破州县，使许多藩镇和官吏受到惩处。削弱了藩镇的统治势力，也削弱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大大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其次，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门阀士族地主，在起义的扫荡下“丧亡且尽”。宋人王明清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

①韦庄：《秦妇吟》。

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故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①都说明门阀士族地主势力被彻底摧毁，成为历史的陈迹。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打击的同时，田宅资财也遭到扫荡。大权臣李德裕在洛阳的园亭被扫地以尽。②洛阳附近一个“岁种良田百廛”（每廛合二亩半）的地主，家产一半被农民没收，另一半被唐军劫掠一空，迫使这个地主四处流亡（《秦妇吟》）。由于大地主所有制削弱，自耕农民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的状况有所缓和，佃客的地位也得到一些改变，对宋代经济的发展很为有利。

再次，在这次起义中，起义军提出了“冲天”、“均平”的战斗口号。“冲天”就是要推翻唐朝的腐朽统治；“均平”就是要割富济贫，均分财富。“冲天”、“均平”思想，表达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统治，要求实现社会平等的愿望。特别是“均平”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在反封建压迫中要求均贫富、均资产、均平赋税负担的平均主义思想，从而反映了农民反封建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提高，说明农民战争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③尽管平均思想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私有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个口号不仅对当时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号召和鼓舞作用，而且对后世农民起义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唐末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它的斗争实践，为以后农民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唐朝的灭亡 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唐朝的封建统治更加衰落，各地藩镇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宣武镇节度使朱温（朱全忠）

①《通志》卷25，《氏族志》。
②《旧五代史·李敬义传》。
③《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

占有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领有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占有陕西，控制唐中央政权。公元902年，朱温打败李茂贞，控制了唐昭宗。公元907年代唐自立，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唐朝灭亡。

第七节 隋唐时期的文化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发达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文化交流，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隋唐文化的成就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极其辉煌的一页。

一、宗教与哲学

宗教 外来宗教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随着这一时期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陆续流入中国。主要的宗教流派分别有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等。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唐初由波斯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得到唐太宗诏准，允其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后唐高宗又诏准其在各州建寺，其寺初称波斯寺，后由唐玄宗诏改为大秦寺。今陕西周至出土的明代《大秦寺景教流行中国碑》就真实记载了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故名摩尼教。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由波斯僧人拂多诞传入中国。安史之乱时，回纥助唐作战，从洛阳携4名摩尼教僧西还，该教遂传入中国西部地区，以后又被回纥立为国教。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唐代宗准该教在长安建寺，赐额“大云光明寺”。至大历六年，回纥又请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寺，可见其在中国南部地区也拥有相当数量的教徒和一定的影响。唐武宗时，兴道抑佛，摩尼教也在禁止之列，尽管寺院尽毁，但社会下层信奉者仍为数不少。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所共同信仰的宗教。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和开元初年，大食国多次遣人从海上来唐，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并吸收中国教徒。后大食国来唐经商者日众，其教徒进一步增多。唐中期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就曾在广州等处传教，广收教徒。据说当时的长安就已建有清真寺。

祆教又名拜火教，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曾为波斯萨珊王朝国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其在中国广泛传播则在唐代，当时的长安、武威、敦煌等处均有祆祠，唐中央还专设管理该教的机构萨宝府。

以上各派宗教，当时主要在所谓的“胡人”中流传，汉人信奉者甚少。汉人中流传的一直以道教和佛教为主，其中佛教人数最众，影响最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尊中国古代思想家李耳为教主。李唐为巩固统治,借助神教,大力扶持道教。从高祖李渊始，唐朝皇帝多以李耳后裔自居。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下诏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以后玄宗李隆基又令人画老子像，遍布天下，并亲为《道德经》作注，勒碑为准，令王公以下学习，以状大道教势力。唐朝在科举中也增设老、庄、文、列子四科。由于政府大力提倡，道教势力发展很快。最多时全国道观竟达1900余所，道士约15000人。

唐高祖以后的一些皇帝，抑佛崇道。武则天即位以后，出于政治目的，一反先朝惯例而贬道崇佛，佛、道两教斗争甚为激烈。唐武宗为打击佛教势力，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灭佛。宣宗继位后再下令崇佛。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当时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影响，成为各自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因而彼此势力有消长，但谁也无法代谁。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尽管曾经历过北周武帝宇文邕等禁

沸，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发展的。隋炀帝十分笃好佛教，使之再度兴盛。至唐时，大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唐高僧玄奘西游归来，长住慈恩寺，专事翻译佛经工作，共译佛经75部1335卷。后另一高僧义净又取经归来，先后在洛阳等地译注佛经，共译佛经61部239卷。大批佛经及其译注的流行，一方面使佛经传播更为广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对佛教的经典教义理解出多种看法，唐时佛教有许多派别，但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在诸多派别中，尤以天台、法相、华严和禅宗影响最大。

天台宗以智顗为代表，主张"皆由心生"，认为世界本体原是空无的，故又称为空宗。法相宗以玄奘为代表，以"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本旨，故又称唯识宗。华严宗以法藏为代表，认为"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而合，幻相方生"。即客观世界依赖主观世界而存在。禅宗以惠能为代表，主张静坐沉思。至武则天时禅宗分化南、北两派。北派创始人神秀，认为人只要经过长期苦修，排除万般杂念，即可渐悟渐彻，修成正果。南派创始人慧能，反对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一个人只要本心清净，妄念俱灭，不必背诵大量经卷即可"顿悟"成佛，升入天堂。这种速成佛法，易为下层忙于生计者所接受，又为统治者和剥削者求得精神寄托，指出一条升入天堂的捷径，因而得到广泛传播。故唐以后，南宗几乎已垄断了佛教。

韩愈的道统说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站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立场上，认为佛教有三大害：一者耗费巨大，加重百姓负担；二者为夷狄所创，使之凌于儒学之上，有以"以夷化夏"之忧；三者佛教"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①，有悖儒家纲常伦理。因而韩愈主张毁灭佛道，以儒家道统取而代之。在反佛同时，韩愈又对佛教的哲学

①韩愈《谏迎佛骨表》。

思想予以吸收，结合传统的儒学，创立了道统说。

韩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都是天命圣人，他们之间的思想体系有一个承上启下的道统，这一道统犹如佛教有传法的法统一样，只是这一道统至孟轲而中断，现在则是“使其道由愈而粗传”①的时候了。这个道的核心就是要以“仁”、“义”为具体内容，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来划分人的品级。上品的人生来就能按封建的道德标准行事；中品的人则需要通过修心养性方能达到上品人的地位；而下品的人是生就性恶，“畏威而寡罪”。②韩愈的这一道统说，天命论占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生来就是“上品人”，而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下品人”，这是天命，是永恒不变的圣道，因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③天是一个有意志的灵物，人不可违背其意愿，只能逆来顺受，否则，就会招来天的惩罚。如果劳动人民敢于“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④韩愈的弟子李翱，续承了他们的性三品衣钵，提出了“复性”说。他们的论点，实际上发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先声，成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县）人，主要著作编为《柳河东集》，其中《天论》、《天对》、《答刘禹锡天论书》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和运动的，是由浑沌的元气构成的。世界上的一切自然变化，诸如昼夜交替、季节转换、山崩地裂等都是这一元气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地间并

---

①韩愈《与孟尚书书》。
②韩愈《原性》。
③韩愈《与王中行书》。
④韩愈《原道》。

无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神灵，更无意志可言。人类如果希冀得到它的怜悯和仁慈，则是十分可笑的事情。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自然灾荒和社会动乱，“其事各行不相预”。①认为天命论存在的社会根源是“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耳”。②至于封建统治者宣扬天命论的目的，不外乎是“力不足者取乎神”③的虚弱表现罢了。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彭城(江苏徐州)人，主要著编为《刘梦得集》。其中《天论》是他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主要阐述了天与人的关系，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其主要精神在于说明，自然界(天)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各自都有自己的职能和规律。而人类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揭示和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就是说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胜天。

刘禹锡的这一唯物主义观点，为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治万物”提供了认识基础。

二、文学与艺术

诗歌 唐代是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从内容、体裁和作家人数上看，抑或从作品的质量、风格和数量上看，都是旷古未有的，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即收入2300余诗人的作品48900余首，这是辗转流传下来的，还有一部分优秀作品仍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唐代诗歌获得空前发展，除得力于当时繁荣的经济外，还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变革。有唐一代，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极大地冲击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制度及其空洞、浮靡绮丽的创作风格，以崭新的政治面貌和富于表现力的

①②柳宗元《时令论》上。
③柳宗元《断刑论》下。

创作技巧活跃于政坛和文坛。隋统一后，为南北方迥异的创作风格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唐代科举制度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这就为当时文人的诗赋创作提供了表现的机会与场所。

唐代诗歌发展，大体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历史时期。初唐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和诗歌的革新者陈子昂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对于冲决齐梁浮艳颓靡的形式主义诗风，开创唐一代独特刚健的新诗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盛唐以王维、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他们之中王维、孟浩然等长于写优美动人，淡泊宁静的山水田园诗；高适、岑参擅于写悲壮豪放的边塞诗。中唐以李贺、元稹、白居易、孟郊、贾岛、韩愈、张籍、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代表。这一阶段可谓唐代诗歌多种流派、多种风格交相辉映、促进发展时期。晚唐以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诗人，喜欢追求艳丽和淡泊情思，优秀诗篇不多。较之初、盛、中唐时期，继承多于发展，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尾声。

在众多的唐代诗人中，成就最为卓著的当推李白、杜甫、白易居。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甘肃天水附近)，生于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后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青莲乡（今绵阳），因又号“青莲居士”。他的诗歌，想象丰富，挥洒自如，豪放不羁，笔法奇特，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一位深受人民热爱的伟大诗人。

李白早年颇受儒、道文化影响，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身上兼有多种气质。一方面他崇尚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总想干一番经邦济世的伟业；另一方面又企羡道家宁静淡泊的隐居生活，追求个性的绝对自由。这些复杂的个性和生活阅历，在他的诗风中多有反映。他一生作品颇丰，著名的有《蜀道难》、《行路

难》、《将进酒》、《远别离》、《梁甫吟》、《丁都护歌》、《长干行》、《子夜吴歌》、《秋浦歌》等篇。这些作品，从体裁上看，又多为歌行体和绝句。其中某些作品，如《客中作》、《独坐敬亭山》、《赠汪伦》、《静夜思》等就写得十分动人。与他不朽诗作齐名的则是他不事权贵的高尚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①就是他自我品质的真实写照，后人称他为“谪仙人”、“诗仙”，实无丝毫夸张。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动乱时代。在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中，常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种长期生活阅历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才使他能够写出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诗作。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中，无情揭露了统治者奢侈、残暴和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②这样的千古绝句。安史之乱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的作品，如《羌村三首》、《北征》、《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名篇。在杜甫的其它作品中，也无不体现他系念人民疾苦，热爱国家和民族的炽热感情。如《望岳》、《春夜喜雨》、《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的作品，内容深刻广泛，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极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因而被誉为“诗史”，他本人被称为“诗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隐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原籍下邽（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是晚唐

---

①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②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新乐府诗歌运动的代表和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在总结《诗经》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与元稹等人开辟了隋代新乐府诗的创作道路，提出了系统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① 他的诗作，大体可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其精华主要是讽谕和感伤诗。

讽谕诗的目的在于“惟歌生民病”，②广泛反映下层人民疾苦，嘲讽“一人荒乐万人愁”的社会不平等，借史咏怀，颂扬人民的爱国精神。此类诗作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观刈麦》、《上阳白发人》、《重赋》、《卖炭翁》、《杜陵叟》、《新丰折臂翁》、《红线毯》等。诗人的感伤诗，一般都是感史感事而发，兼有讽谕作用，著名的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

白居易的诗作，不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且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经验。诗人晚年官场失意，意志消沉，寄情山水，所以他后期的作品较前期作品大为逊色。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针对骈体文而发起的。骈文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来掩盖其高阔的空虚无聊。该文体逐渐成为文坛主体。骈文讲求排偶、辞藻、音律和用典，作为一种文体的存在，本无可厚非。然而至隋唐时期，其萎靡的文风，空洞的内容，僵化的表现形式，与当时社会发展实际格格不入，既无法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又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古文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所谓古文运动，就是要以质朴无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古散文来取代骈文。

---

①白居易《与元九书》。

②白居易《新乐府序》。

首开古文运动先声的是隋初的李谔，而初奠此运动之基者则是初唐的诗人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现在应力扫晋、宋、齐、梁"采繁竞丽"、"逶迤颓靡"的文风文体，恢复《诗经》风雅和汉魏古散文的优良传统。此后经李华、萧颖士、独孤及、元结等人的努力，初步开创了古文在思想内容上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在体裁上和形式上，以汉魏散文为楷模的理论基础。但真正在古文运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则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倡导古文，目的在于学习古道。他在《答李秀才》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道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里所言的道，实际上是指儒家的经术和政治主张。作家要通此道，则要具备一定的人格修养，"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①对于文学语言，韩愈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②"唯陈言之务去"。③对于文章中的遣词造句，他主张要准确流畅，合乎自然语气。韩愈的这些文学主张，对后世影响较大，"后学之士，取为师法"。④

柳宗元也主张文以载道，反对重形式而轻内容，以粉饰空说为能事的颓靡文风。认为"褒贬"和"讽谕"是文章应有的社会功能，文学评论作品应重视自身的思想价值而不是徒具空洞的表现形式，充实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应该是互为依辅的。柳宗元一生所著各类古文约400余篇，思想性较强的有《天说》、《三戒》、《捕蛇者说》等，另外还有一些文笔流畅、清新秀丽的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等都是古文的代表作。

古文运动经韩、柳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使唐以后的文体从骈文的桎梏中开始解放出来，有力地促进了唐代诗歌、散文和传

①③韩愈《答李翊书》。
②韩愈《答正夫书》。
④《旧唐书·韩愈传》。

奇小说等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至北宋，又经欧阳修等人的再度提倡，散文才真正确立了它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音乐与舞蹈 隋唐时期音乐和舞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乐舞的有益成份并予以创新，优美和谐，风格多样，极具民族特色。

隋初的宫廷音乐即杂有“胡声”。隋统一后，定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支康伎）。隋炀帝时又设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此时的乐器如曲项琵琶、竖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其它民族中承传过来的。著名的音乐家有朱弘、郑泽、万宝常等。

唐初仍沿用隋代九部乐，太宗时方定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这些音乐演奏时，乐队规模宏大，各类乐器竞相争辉。乐队成员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当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曹保善琵琶，米嘉荣善歌唱，李龟年善笛。就连唐玄宗李隆基本人亦颇通音律，选坐部伎300人和宫女数百人教于宫廷梨园，时称“皇帝梨园弟子”。足见当时音乐发展的盛况了。

唐代舞蹈主要分健舞和软舞，健舞姿势雄劲，刚健有力，有剑器舞、胡旋舞、胡腾舞。当时的许多舞蹈都是从西域等处传入后渐与中原传统舞蹈相结合，几经改进，演变成软舞。皇宫中流传的舞蹈是《霓裳羽衣舞》，舞者身着华服丽饰，雍荣华贵，翩翩起舞。唐王朝为祭祀、朝宴和外宾来朝等，又自制三个大舞，即《七德舞》（又名《秦王破阵舞》）、《九功舞》和《上元舞》。

书法 隋唐书法艺术成就空前，书体繁多，人才辈出，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隋朝著名的书法家有房彦藻等人。唐初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们的行体书法潇洒飘逸、遒劲有力，颇具“二

王”父子（羲之、献之）风格，世称“欧虞褚薛”。唐中期书法名家有颜真卿、怀素、贺知章、张旭、李邕等。其中贺、张、怀以草书见长，颜以楷书见长。颜将楷、篆、隶、行四体笔法相融，创造出了方正敦厚、沉稳雄浑的新书体，人称“颜体”。后人练书法者无不以他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多宝塔碑》等帖为蓝本。怀素的草书柔中见刚，奔放流畅，似游龙走蛇，龙翔鹤舞，属于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典范。唐后期书法家有柳宗元、柳公权等。特别是柳公权的楷书，融诸派之长，自成一家，世称“柳体”，其代表作有《李晟碑》、《唐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

绘画与雕塑　隋朝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当时绘画的内容主要以道、释人物故事为内容，山水画也渐成独立画科。其中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传至今，是国内现存的古名画之一。

唐初绘画内容，多以反映王公贵族生活和宗教佛相为对象。其大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二人。现存代表作有《太宗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盛唐以后，绘画题材大为广泛，人物画逐渐以世俗人物及其生活为对象，画技有了更新，山水画日益兴盛。吴道子(道玄)工于人物山水，有“画圣”之称。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壁山水著名，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则首创水墨山水画，寓诗于画，为山水画南派之祖。

寺院、石窟、陵墓中的壁画在唐代画坛也占有一席之地。敦煌千佛洞中保存的壁画。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广泛，在世界绘画史上实属罕见。尽管壁画题材以佛教故事为主，但仍有许多关于播种收获、射猎逐鹿、拉纤运输和格斗角觚等方面的场景。解放后陆续在陕西乾县发掘的唐陵墓中出土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壁画。这些作品场面宏大，构图独特，施色艳丽，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的《出外图》、《游猎图》、《仕女图》、《客使图》、《马球图》等都是具有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稀世珍品。

隋唐时期的雕塑艺术，主要以石刻和泥塑为主。敦煌千佛洞

现存的492个洞窟，其中隋代有95个，唐代有213个，内有很多塑像很能代表当时的雕塑水平。各种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与洞中壁画相映生辉，融为一体。唐墓中出土的“三彩俑”、“三彩马”及“马球俑”、“仕女俑”等，形象逼真，充满活力，是唐代泥塑艺术的珍品。洛阳龙门奉先寺，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刻雕像，技法细腻，造型优美，是唐代石雕的集大成者。奉先寺的卢舍那坐塑，高17.14米，头部就高4米，耳长1.9米，十分庄严雄伟。昭陵六骏石质浮雕，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传神，宝马名驹，极具神韵。乾陵和昭陵前的巨大石雕群，也极为壮观、精美，很有“大唐雄风”的时代特色。中国目前最大的石雕佛像乐山大佛，高71米，是此时雕塑杰作之一。这一时期著名的雕塑家是杨惠之，据说他曾为京兆府艺人留杯亭塑像，行人从背后一看塑像背影，即知所塑为何人，足见其雕塑技艺已达到神龙活现之境界，时人誉之为“塑圣”。

三、史学与经学

史学 唐以前各朝，史书多为私家修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诏设史馆，指定专人编纂先朝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而开官修史书之例，并衍为制度。

隋代私家所撰史书计有魏澹的《魏书》、宋弘的《国史》、许善心的《梁史》、王劭的《隋书》、《齐志》、《齐书》等。

唐代编成的史书有房玄龄监修的《晋书》、魏征监修的《隋书》、姚思廉等修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等修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修的《周书》。私家修撰后获政府认可的是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这时期编成的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两部对后世史家有重要影响的私家史学专著。一部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一部是

我国第一部论述历朝典章制度的专史《通典》。

《史通》是作者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倾注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成书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共20卷。该书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和史事记述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评论。他大胆地批判了宿命论和是古非今的观点，他指出修史者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他主张良史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对已往“隐恶扬善”的诸史逐一进行抨击和否定。在中国史学史上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杜佑(公元735—813年),所撰《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共200卷。记载了从上古到唐代宗时的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此书不但极富史料价值，而且为后代典章制度专史的分类创造了先例。

经学 经学历来是儒士视为经典的必修课，隋唐时期仍沿袭了这一风气，并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有所发展。隋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有牛弘、刘焯、刘炫、王迪等人。

唐朝建立以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规定应试者皆应博通儒学经典,故举凡开科取士之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①唐太宗以儒经“文字多讹谬”，不利于学习，令当朝经学大师颜师古考订“五经”(《礼》、《易》、《诗》、《书》、《春秋》)文字，撰《五经定本》，颁布全国，作为学习蓝本。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另一经学大师郑覃以“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②为由，请求再为修订，勒石为则，得唐文宗允诺，刻成《开成石经》一部，计114石，650252字，大体上消除了“五经”中的奇文异字。但统一的“五经”蓝本并未消除儒学多门、

①《旧唐书·儒学传序》。

②《旧唐书·郑覃传》。

章句繁杂的现象。故唐政府又令孔颖达等撰疏“五经”，写成《五经正义》180卷，与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一并颁布天下。从而一扫汉魏以来经学门派林立、众说纷纭的混乱现象。但到唐后期啖助开创了新的解经风气。他弃传统的《春秋三传》于不顾，借注《春秋》宣扬个人政治主张，“凭私臆断”，牵强附会。其弟子赵匡、陆质录袭他自由解经之风，不拘泥于旧说，常逾汉魏经学规矩。这一派经学开了后来宋学之先声。

四、科学技术

天文历算 隋代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第一次指出《周髀》中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存在舛误，测定岁差在75年差一度。耿询发明了利用水力转动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制造了计算时间的“马上刻漏”。①

唐代天文历算在隋代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唐代历法就更换了10次，越来越精密。这时期最著名的天文历算家是张遂（法号一行）和李淳风。

开元十七年(公元724年)，张遂与梁令瓒等人合作铸成一架观测日月五星位置及运行规律的黄道游仪，通过长期观察，认定恒星位置有移动的现象，比英国人哈雷的恒星自行说早了近一千年。他还在刘焯研究的基础上提倡实地测量子午线的长短，根据在河南等地实测结果，算出子午线每一度长为351.27唐里，与现代实测的111.2公里虽有较大误差，但毕竟是世界上第一次利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

李淳风撰著《法象志》，“备载黄道浑仪法”，②用铜铸成黄道浑仪，后来李淳风又制定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麟德历》。

---

①《隋书·耿询传》。
②《旧唐书·天文上》

"术者称其精密"，①张遂以后编定《大衍历》，吸收了其中不少内容。

医学 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隋代著名的医学家很多。巢元方长于诊断病源，著有《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详论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医学专著。许智藏长于诊脉。甄权长于针灸，著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等。甄立言长于药理，著有《本草音义》、《古今珍方》等。

唐代的医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分科治疗和一些著名医学家及其著作的问世。此时的中央医署中云集了许多医学家，分有医师、针师、按摩师等职。医师部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儿（儿科）、耳目口齿和角法（针炎）五科。当时名医辈出，其中医术和成就最高的是"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他十分重视个人的医技、医德，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②故将个人两部医学著作称为《千金翼方》和《备急千金要方》。后人通称为《千金方》。这两部书共收药方5300多个，记载了800多味药物的性能，并对其中的200余种药物的采集、炮制、使用、功能作了专门论述。此外，还出现了苏敬等人奉敕命编修的《唐新本草》53卷，收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则是活字印刷术的开端。玄奘曾用雕版印刷术广印普贤菩萨像散发众人。八世纪末，又出现了用以作为商人纳税凭证的"印纸"。宝历元年(公元824年)，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提出有人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这里的"模勒"就是模刻，

①《旧唐书·李淳风传》。
②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亦即是较早的刻版印刷。唐文宗时，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有每岁“以版印历日”的传说，一些人将所印历日在市场上出售，以至“其印历已满天下”，①可见唐后期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印于咸通9年（公元868年）的七张装成的卷子本《金刚经》，1907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盗往英国。国内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1944年在成都市晚唐墓内出土的《陀罗尼经》。

建筑 隋唐时期的建筑艺术和就成是非常突出的。隋开皇大业年间由工匠李春监造的“安济桥”（赵州桥），就很有代表性。该桥位于河北赵县南洨河上，全长50.82米，宽10米，跨度37.37米，拱围矢高7.23米，单孔两边各设两个小拱，既可减轻桥身重量，又可节省人力、物力，亦便于排水导洪。这一创举，在当时居世界桥梁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唐朝的城市、宫殿、寺塔等建筑，均有重大成就。如都城长安，规模空前，极其雄伟，廓城范围，周长达36744米，面积达83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明清西安城面积的9.5倍，这在古代中外都城中是少有的。全城在建筑上格局严整，分宫城、皇城与外廓城三大部分，使中央衙署与居民住宅彼此彻底分隔，这是古代都城建筑中的创新，打破了以往历代都城仅有内城（宫城）、外城（廓城）的传统格局。全城结构严谨，市坊有序，殿阁宏丽，错落有致，外形如星斗，内部似棋盘，十分壮观，长安城闻名于世。唐代现存的木结构建筑有山西五台县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砖结构建筑有西安大、小雁塔等，均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建筑艺术精品，表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技艺。

---

①《册府元龟》卷160。

重要名词：

玄武门之变　三省六部制　《唐律疏议》　贞观之治　安西四镇　武则天　松赞干布　遣唐使　鉴真　玄奘　安史之乱　永贞革新　牛李党争　两税法　古文运动　三大诗人　孙思邈　莫高窟　僧一行　《通典》　雕版印刷术

思考题：

1．何谓“贞观之治”？试从唐太宗的政治经济措施来说明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

2．试述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内容并评价其作用。

3．试述科举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历史作用。

4．唐代经济繁荣的主要表现和主要原因是什么？

5．依据史实说明唐与吐蕃的友好关系。

6．用事实说明唐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及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7．试分析安史之乱的原因及历史影响。

8．略述两税法出现的背景、内容、及推行的结果。

9．唐朝后期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有哪些变化？

10．试述唐末农民起义的特点、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第十章　五代十国、辽、北宋、夏的并立

（公元907—979年；公元916—1125年；
公元960—1127年；公元1038—1227年）

第一节　五代十国和辽的建立

一、五代更替和十国割据

五代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经黄巢起义打击，唐朝元气大伤，名存实亡，更加速了它的崩溃。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他们利用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互相倾轧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控制了唐朝大权。藩镇既掌握着土地、人口、财政，又有军事实力，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唐朝末年，各地藩镇据地称雄，连年混战，互相兼并，在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

后梁　唐末农民军叛徒、唐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原名朱温），在强藩割据环境里，长于谋略，逐步消灭了许多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公元907年，朱全忠用禅让形式，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建都开封，史称后梁。当时盘踞在山西的河东节度使沙陀贵族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与后梁政权之间，互争霸权，

鏖兵不已。朱全忠奢侈荒淫，公元912年被其子杀死，后梁政权更加混乱，公元923年，为后唐所灭。后梁统治历17年。

后唐 公元908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勖继晋王位。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自立为帝（唐庄宗），国号唐，史称后唐，建都开封，后迁都洛阳。李存勖昏暗无知，骄奢自矜。他亲信宦官和伶官，疑忌功臣，任用孔谦管财政，重敛急征，致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①他却赐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弄得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926年魏州兵变，李克用养子李嗣源联合魏州士兵夺位，李存勖死于兵乱，政权落入李嗣源之手，是为唐明宗。他废除李存勖的一些弊政，杀孔谦，废苛法，削减宫女，关心农事。明宗死后，统治集团内部攻杀不已，934年为后晋所灭。后唐统治历14年。

后晋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沙陀族人）以割地、纳贡、称臣、做儿皇帝为条件，取得辽兵援助，推翻了后唐，取得政权，迁都开封，史称后晋。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辽以石重贵只称孙不称臣为借口，946年，出兵攻入开封，后晋亡。后晋统治历12年。

后汉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族人)，乘辽兵攻入开封之际，在晋阳(今太原西南)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他下令禁止为辽搜刮钱帛，还拿出宫中钱物收买军心。辽兵北撤后，刘知远乘虚进入洛阳和开封，并以开封为都城，不久死去。其侄儿刘承佑继位后，忌杀大臣，天雄节度使郭威起兵，杀刘承佑。后汉统治历4年。

后周 公元951年，郭威在开封称帝(太祖)，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出身贫寒，知道民间疾苦。他虚心纳谏，搜罗人才，革除弊政，严惩贪官，奖励生产，废苛捐杂税，社会生产得到发

---

①《旧五代史·唐明宗纪》。

展。公元954年，郭威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他继续革新政治，发展生产、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周世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死后，政权被赵匡胤取代。后周统治历10年。

与五代同时，在南方和山西一带还先后存在十个较大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吴和南唐 吴的开创者杨行密，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公元902年被唐昭宗封为吴王，建都扬州。杨行密死后，公元919年丞相徐温立杨溥为帝，国号吴，政权被徐温控制。公元937年，徐温养子徐知诰（原称李升）废杨溥，自立为帝，国号唐，建都金陵，史称南唐。到后主李煜时，公元975年亡于宋。

吴越 创建者钱镠，唐镇海节度使，公元902年被唐封为越王。907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都杭州。拥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一军之地。978年降于北宋。

楚 创建者马殷，唐武安军节度使。公元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都于潭州(今长沙)，割据湖南二十余州。公元927年，马殷称帝，国号楚。马殷死，诸子争位，政局混乱，公元951年，被南唐攻灭。

闽 创建者王审知，唐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09年，后梁封他为闽王，据有泉、汀等五州之地。他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奖励生产，开辟海港，建立学校。王审知死后，公元933年，其子王延钧称帝，国号闽，都福州。公元945年，被南唐攻灭。

南汉 创建者刘隐，唐岭南东道节度使，公元911年，晋封为南海王。917年，其弟刘龑称帝，国号越，建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971年为北宋所灭。

前、后蜀 公元891年王建据西川，后又取东川和汉中，成割据之势，公元903年被唐封为蜀王。公元907年王建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都成都。公元925年，后唐攻灭前蜀，以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

史称后蜀。公元965年被北宋攻灭。

南平（荆南） 创建者高季兴，公元907年被后梁任命为荆南节度使。924年被后唐封为南平王，都江陵。据荆、归、峡三州，是十国中最弱小的一国。它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963年降于北宋。

北汉 创建者为刘崇。公元951年郭威代后汉，刘崇据河东并、汾、忻、代等十一州之地，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它遣使通好契丹，自称"侄皇帝"。公元979年被北宋攻灭。

此外，在边疆地区，东北有辽（契丹），西北有回鹘，西南有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二、中原社会生产的残破和南方经济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势力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厮杀和吞并，尤其是在中原地区，战争激烈而频繁，给中原地区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兵燹所及，"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①混战中有的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制造黄河决口事件，如后梁朱温父子为了阻止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以水代兵，曾数次掘开黄河堤防，使山东、河南一带变为泽国。军阀们还强拉壮丁为其卖命，并用文面（在脸上刺字）的办法，以防士兵逃亡。朱全忠首创此法，"下令文面健儿"，②其他军阀也相效成风。

军阀们为了筹集军资，又加紧经济搜括，除沉重的田租外，附加税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后汉在征收田赋时，每斛粮食征加"鼠雀耗"2斗。各种杂税名目更是难以枚举，如身丁钱、农具钱、棉帛钱、鞋钱、盐钱、酒钱、牛皮钱、过桥钱、鸡鱼鹅钱，甚至家禽生了双黄蛋、杨柳结絮等都得交税。

与经济上的残酷掠夺相辅而行的是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军阀

①《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正月。
②《五代史补》卷1《太祖文面健儿》。

们随意设立刑法、草菅人命。如南汉有灌鼻、割舌、刳剔、炮炙、烹蒸，或聚毒蛇于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后汉有决口、断舌、斫筋、折胫等刑，并规定"窃盗一钱以上皆死"，"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①

在战祸、重敛、苛刑的重压下，加之契丹兵屡屡南下骚扰，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浩劫。特别是中原地区，赤地千里，僵尸遍地，甚至洛阳城也是"城邑残破，户不满百"。②失去了起码生存条件的农民，在死亡威胁下，到处"义军蜂起"。各地起义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都打击了割据势力，为后来统一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因受战乱较少，各国统治时间又较五代各朝要长，社会比较安定；各国为维护其统治，都较重视发展经济；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不断南迁，他们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又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加之南方气候温和，因此，南方经济这时仍能继续向上发展，从而促进了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

在吴和南唐先后统治下的江淮地区，由于人民的辛勤开发和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政事宽简"③的政策，出现了"旷土尽辟，桑柘满野"④的景象。太湖地区，东晋南朝以来创造的圩田有了发展，人民大量修筑堤堰和闸门，控制水流，旱可浇灌，涝可排水，农业生产得以旱涝保收。各国都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楚修建龟塘，南唐修安丰塘、白水塘，最著名的是吴越在钱塘江修捍海石堤，改变了"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⑤的局面，对杭州

---

①《资治通鉴》卷290，"后周纪"，广顺二年秋七月。
②《新五代史·张全义传》。
③《旧五代史·杨行密传》。
④《资治通鉴》卷270，"后梁纪五"，贞明四年七月。
⑤《旧五代史·钱镠传》。

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主要有：两湖地区的制茶业，吴越的制瓷业，两湖地区的织染业，成都与金陵的印染业，蜀的织锦业，都驰名全国。闽的福州和泉州，南汉的广州，吴越的杭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商业城市。南方海运也很发达，对外贸易活跃。

三、契丹的兴起和南侵

契丹的兴起 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分支，原居住在辽水上游的潢水（今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过着以畜牧渔猎为主的生活。自北魏以来，契丹共分八个部落，各部酋长叫“大人”。八部大人又共推一人为王，即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叫做“可汗”。可汗每三年一换，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军事的首领，称为“夷离堇”（qin勤）。唐朝以来，契丹族与汉族交往日益密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物质财富的增加，契丹社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各部的酋长逐步由显贵的家庭成员或特权阶层充任，可汗的职位也突破了三年一选的旧规。从战争中得来的俘虏多转化为奴隶，法律和监狱等国家机器开始萌芽。这时国家的出现已是历史的必然，耶律阿保机便是完成这个历史转变的英雄人物。

阿保机建国 阿保机（公元872—926年）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姓耶律。公元901年，阿保机继承了父祖的“夷离堇”职位，907年他被推为可汗。916年，他打败了邻近各族的敌对势力，废除了推选可汗的制度，自立为皇帝（辽太祖），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年号神册，都上京（即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附近），建立起奴隶制国家。他任用汉族读书人，制定典章制度，创制了文字，代替刻木记事。阿保机对契丹的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阿保机建国后，便不断向外扩张和掠夺。926年，阿保机灭掉渤海国，至此，契丹统一了蒙古和东北地区。阿保机在征渤海班

师途中去世，次子耶律德光继位，是为辽太宗。

燕云十六州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反唐，为了夺取帝位，他乞求契丹出兵相助，以割让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十六州，岁贡绢帛30万匹作为交换条件并向契丹称臣，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耶律德光发兵助石敬塘攻灭后唐，建立了后晋。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对其本身的发展和中原地区的联事防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十六州相当于河北、山西北部，南北约三、四百里，东西长达千里，在军事上是中原地区的屏障，契丹据有后，中原无险可守，门户洞开，契丹步骑从此长驱直入，北方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以后的宋王朝带来极大的不利。

南侵灭后晋 公元942年，石敬瑭死，石重贵继位。耶律德光以其称孙不称臣和破坏双方贸易为借口，在后唐降将赵延寿的导引下，多次率兵南侵。947年初，攻陷开封，灭后晋。耶律德光在开封举行即位仪式，打算久据中原，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是为辽太宗。耶律德光为搜括钱粮，他纵容部下四出抢掠，"日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①不堪其蹂躏的中原人民，纷纷起义，攻占州县，杀契丹守将。同时，契丹人民也因连年用兵，倍受其苦，反战情绪日增，内外交困的耶律德光占开封不满三个月，就被迫撤军。他临走时对左右说："我不知中国之人（指中原人民），难制如此！"②同年病死于北撤途中。

契丹的封建化 耶律阿保机所建的契丹国，开始是一个奴隶制的政权，自合并渤海，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汉人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对其影响极大，这个时期的契丹政权已成了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包括大量汉族地主在内的封建政权了。辽国最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

②《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二月。

强盛时期，领土东到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南到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北至克鲁伦河、色楞格河。辽国在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对统辖地区的掠夺，也曾使中原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

四、周世宗柴荣的改革

周世宗（公元954—959年在位）是五代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郭威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革新措施。政治方面，求贤纳谏，广开言路。他连连下诏要求臣僚们指出他的过失和政治利弊，着意改善吏治，严明赏罚；调整州县行政机构，整顿里甲。经济方面，他鼓励垦荒，均定赋税，颁布“均田图”，作为征收田税的标准，连曾享有免税特权的曲阜孔氏也要交税。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奖励耕织，重视农业。他“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①告诫群众，要“厚农桑，薄伎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辈”。②他注意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治理黄河。抑制寺院经济，在全国废除寺院三万三百多所，限制出家人数，令八万多僧尼还俗，使后周控制的土地和劳动力大量增加，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军事方面，他申明军纪，提出“凡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裁减老弱军士，招募强壮士兵编成禁军，这使后周军容大变，“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③。

经过周世宗改革，使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混乱的北方，开始显示出澄清的景象，后周的力量增强了。周世宗顺应人民的要求，开始了统一事业。公元955年，柴荣伐蜀，取地四川。公元955—958年，对南唐用兵，取得长江以北十四州。公元959年，北伐辽国，

---

①《资治通鉴》卷294，“后周纪五”，显德五年十月。
②《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务农》。
③《资治通鉴》卷292，“后汉纪五”，显德元年冬十月。

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莫、易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所谓“三关”之地。正当他想乘胜进军燕州时，却突然因病去世。柴荣的改革和统一之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北宋的统一及其与辽、夏的关系

一、“陈桥兵变”与北宋的建立

陈桥兵变 公元959年，周世宗病死后，幼子柴宗训继位。960年正月，统帅中央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借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报警、北汉侵辽南下为由，率大军出京御敌，行至距开封40多里的陈桥驿时，部将赵匡义等为赵匡胤黄袍加身，拥戴他为帝，并重回京师，夺取政权。赵匡胤称帝（宋太祖），建都开封，史称“陈桥兵变”。因为赵匡胤原任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归德军节度使，遂建国号为“宋”，史称北宋。

赵匡胤即位后，先后用武力镇压了昭义节度史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等的反抗，巩固了统治地位。

割据局面的结束 赵匡胤建国后，经过一番准备，于公元963年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北方辽国强大，南方的割据实力薄弱，且所占地区又比较富庶，所以他采取了“先弱后强”、“先南后北”的用兵方针。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在强大军事压力下，也上表献地归降。到公元978年，南方的割据政权全部被消灭。公元979年宋太宗（太祖弟赵光义）亲率大军，出征北汉，灭掉“十国”中最后一国。至此，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时北方并立的还有辽国和党项族建立的政权。

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北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杯酒释兵权和整顿军队 宋代兵制分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种。在这四种军队中，宋统治者主要加强对禁军的直接控制。公元961年，宋太祖借举行宴会的机会，解除了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统领禁军的权力，皇帝直接控制了禁军。又废除了总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副点检之职，另设“三帅”，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禁军。“三帅”握有兵权，但无发兵权。发兵权由新设立的文官机构枢密院掌管，这是一种以文抑武的政策。三帅和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北宋又将全国禁军分成两部分，京城开封和外地各驻一半，叫做“内外相制”，即内外互相牵制。为防止士兵和将帅长期结合造成割据局面，推行“更戍法”，经常调动和轮换士兵，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便于皇帝控制军队。北宋还推行养兵政策，就是每当灾荒之年，大量招募饥民当兵，用以缓和阶级矛盾。

调整行政机构和权限 为防止宰相权重危及皇权，增设了参知政事，以分相权；设枢密院，与宰相分管文武，分别向皇帝奏事，并称“二府”；设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又设审刑院，为刑案最高复审机构。同时提高谏官地位，使其成为皇帝耳目，实行差遣制。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官僚制度中有“官、职、差遣”的区别，这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官名只是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没有实权；职只是作为有“名望”的高级官僚的荣誉头衔；差遣才是实际管事并掌握实权的职务。担任某官职的人，只有皇帝在其官职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头衔，才能管本部事务。用朝官控制地方，朝廷

派出朝官管理州、县事，称知州、知县，剥夺了原先节度史和州县地方官的权力。后又设立通判一职，通判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共同管理州事，并监督知州行动。所有上述作法的根本目的，是人为地在官僚中制造矛盾，彼此牵制以便皇帝驾驭群臣，加强皇权。并规定地方官“三年一任，任满他调”，不能在原籍做官。宋代在科举选拔官吏中，也同样反映了皇权的集中。规定举第人不得呼主考官为“恩师”，严禁谢恩于私门。最后一道考试由皇帝“亲临试”，称为“殿试”，录取之权由皇帝亲自掌握。这样，考生就变成天子的门生了。还采用“特奏名”法和免去“释褐试”，来笼络知识分子。

集中财权　为了消除藩镇割据之害，公元964年，根据赵普“革除其弊”的建议，宋廷命令各州的赋税收入，除度支给用外，其余全部送到京师，上交中央政府，地方不得留用。为贯彻这一决策，宋王朝在各路设立转运使主管其事，其结果，“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① 这就使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

北宋通过上述集权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对彻底消除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过分集权，以致使军队虽多，而战斗力却大为削弱；官员虽多，但职责不清，吏治败坏；财政虽集于中央，致使地方财源枯竭，难以办成什么事。同时，人民遭受到更残酷的搜括和勒索，以致阶级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三、北宋与辽的关系

高梁河之役　公元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立即移师河北，准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一路势如破竹，易、顺、蓟等州不战而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归降，当地汉族人民“以牛酒犒师”①，支持宋军。宋军围攻辽的南京（今北京）达半月之久，城里“民怀二心”，辽军几乎不能支。但因宋朝将士厌战，行动迟缓，而这时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却带领骑兵来援，在高梁河（约在北京前门外至右安门一带）与宋军大战，辽军直冲太宗卫队，宋军大败，死者万人，宋太宗乘驴车仓皇逃归。

雍熙北伐 高梁河战后，辽兵经常南下骚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以辽主年幼，母后专权，认为是北伐的好机会。这年正月，北宋分三路大军攻辽：东路军以曹彬为统帅，出瓦桥关，直逼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攻打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云中，三路合围，拟攻取燕京。战争开始，宋军节节胜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东路军到涿州时，遇到了辽军主力，军困粮缺，且又争功冒进，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被辽军打败。东路的溃败，影响到整个战局，于是，宋太宗下令各路撤军，退回原防。并命令潘美、杨业所部护送云、应、朔、寰四州人民内迁。在退军过程中，潘、杨相约，在陈家谷会合接应。杨业所部掩护边民，且战且走，至陈家谷时，潘美失约，临阵退走。杨业孤军无援，被辽军包围，几经激战，将士大都战死。杨业身受数十处创伤，仍英勇搏斗，后中流矢坠马，为辽军所俘，绝食三日，不屈而死。以后杨业的子孙杨延昭、杨文广等，都是抗击辽和西夏的名将，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

澶渊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败，暴露了宋军的腐败。从此，北宋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信心，遂对辽采取守势，直到真宗时期，依然如故。宋军的退守防御，却不能阻止辽兵的不断南下掠夺。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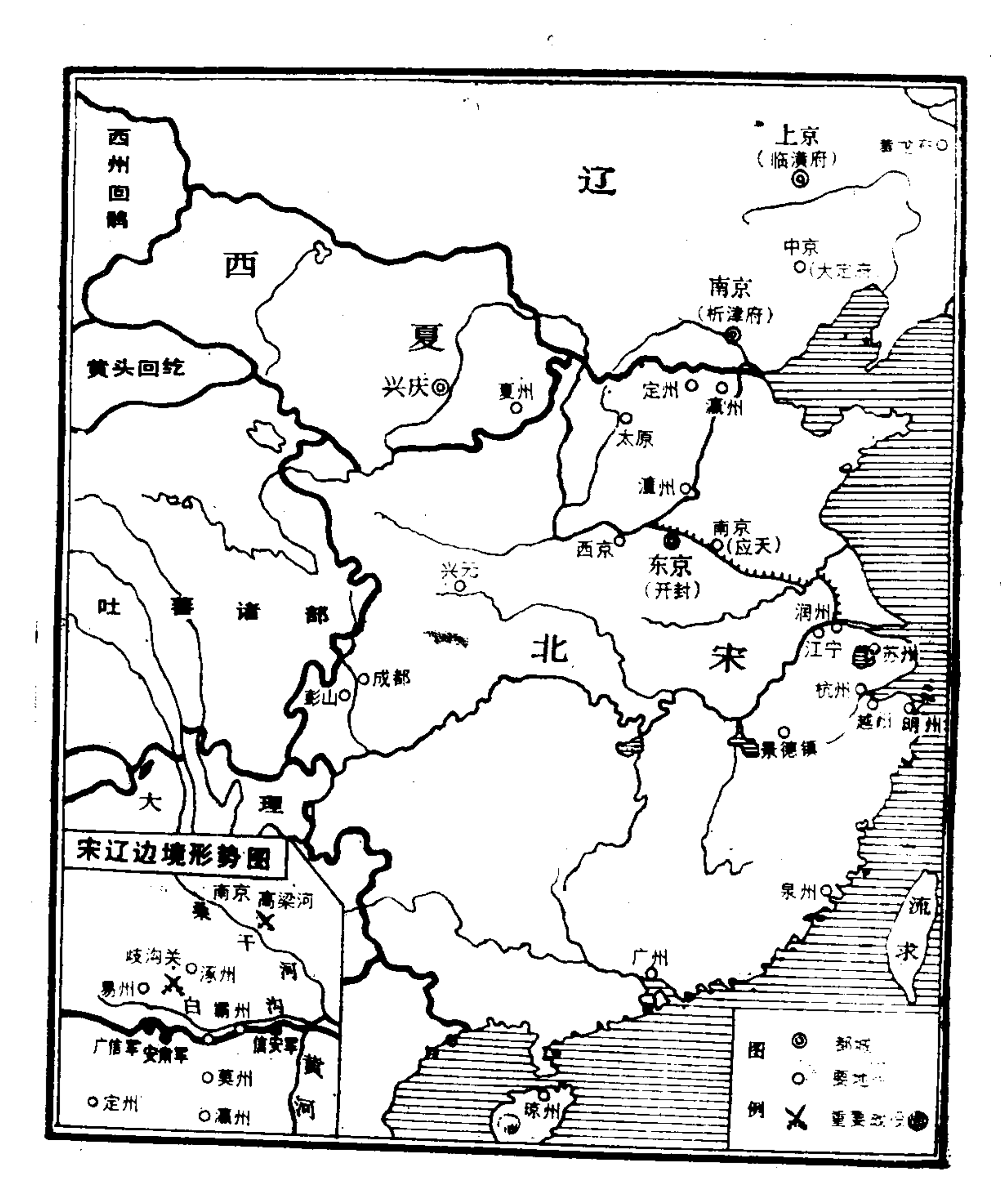
①《宋史·太宗纪》。

侵，沿途虽遭到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但因朝廷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地孤军作战，于是辽军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这时，北宋朝廷惊慌失措，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避难。宋真宗不知所措，问计于宰相寇准。寇准坚决主张抵抗。他说：谁主张迁都逃跑，就砍下谁的头。因为如果迁都逃跑，人心涣散，敌军乘机深入，宋朝就完了。他力劝真宗渡河亲征，以鼓士气。真宗迫不得已，随军抵达澶州，士气大振。辽初战不利又失大将萧挞览，加之孤军深入又有后顾之忧。而宋军士气高涨，辽主遂有退兵之意，这正中无心抵抗的宋真宗下怀。几经交涉，双方签订盟约，约定宋辽双方以白河沟为界，宋每年给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虽然没有割地，但从此以后，"岁币"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因澶州也称澶渊，所以盟约又称"澶渊之盟"。

宋辽和平交往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处于相对稳定时期。1005年，宋朝在河北的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徐水西）；辽在新城（河北新城）、朔州（山西朔州），分别设置榷场，互相贸易。北宋输出香料、茶叶瓷器、漆器、药材、缯帛、稻米和书籍等，辽则输出羊、马、骆驼、盐等。民间贸易也很发达，双方经济文化交往频繁。

四、西夏的建立与宋、夏关系

西夏国建立 西夏国是党项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和吐蕃族原都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散住在青海、四川边境，过着游牧狩猎生活。唐初，党项族各部酋长率众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在其居地设都督府州管辖，并赐最强的拓跋部酋长李姓。唐朝中后期，党项族由于受到吐蕃压迫，逐渐北迁到今天的陕甘宁地区。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军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唐朝复赐李姓，晋爵夏国公，遂占有陕西夏（横山）、银（榆林


上京
（临潢府）
辽
西州回鹘
西
夏
中京
南京
（析津府）
黄头回纥
兴庆
夏州
定州
瀛州
太原
澶州
南京
（应天）
西京
东京
（开封）
吐蕃诸部
北
宋
润州
江宁
苏州
成都
彭山
杭州
越州
明州
景德镇
大
理
宋辽边境形势图
南京
高梁河
桑
干
河
岐沟关
涿州
易州
白
霸州
沟
广信军
安肃军
信安军
莫州
定州
瀛州
黄
河
泉州
流
求
广州
琼州
图
例

辽宋西夏形势图

东南）、绥（绥德）、宥（靖边县境）、静（米脂）等五州。五代时，各朝对党项族多采取笼络办法。这时党项族已发展到河套地区，并占有河西走廊，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在汉人先进技术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向农业，处于半牧半农的经济状况。

宋太祖时，党项李氏曾经入贡，遂赐姓为赵。宋太宗图谋消灭夏州割据势力，引起李继迁起兵反抗。后来，李继迁利用宋辽矛盾，委蛇于他们之间。李继迁死，其子李（赵）德明仍利用宋辽矛盾，从中渔利。宋封他为西平王，辽则封他为夏国王。1032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继位。

李元昊经过充分准备，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朝西部，故史称“西夏”。李元昊是党项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通蕃汉文，常读宋朝典章、法律、兵书，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励精图治，根据本民族特点，吸收汉族统治者的经验和汉族先进文化，制定官制、礼仪，创西夏文字。这时，西夏已向封建制转化。西夏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北控大漠。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元昊称帝后，宋朝不予承认其独立，从此宋夏连年战争。战初，宋军屡败，史载：“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①公元1041年，宋兵攻夏，大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大将任福等战死，将士死伤万余。1042年，宋军攻西夏，战于定川(今甘肃平凉北)，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等战死，近万人马全军覆没，西夏军大肆焚掠而去。宋在多次失败后，虽采纳了知延州事范仲淹的主张，对西夏采取清野固守的政策，在边境多修城寨，增调禁军防守，加强军队操练，按抚边民，依靠兵民共同对付西夏，但宋朝仍趋向对西夏的妥协。西夏对宋战争虽不断取得胜利，但士卒伤亡甚多，人民厌战，财政困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乙巳。

难，加之天灾人祸，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同时，西夏与辽的关系破裂，受到辽的威胁。于是，宋夏开始议和。公元1044年，双方签订了“庆历和约”，规定：西夏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赠给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恢复民间商贩往来。此后几十年间，双方基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第三节　北宋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阶级关系与赋役制度

主户与客户　北宋政府为了征发赋税和徭役，把户籍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

居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叫坊廓户。坊廓户主、客户的划分，以有无房屋和其他产业为依据。凡有房产和其它产业的叫主户，反之则为客户。主户中，又以其产业多寡划分为十等。

在农村，主、客户的划分，以有无土地财产为依据。主户是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户。主户中又按土地财产多寡分为五等。大体说，其中一、二、三等户称“上户”，是大、中、小不等的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下户”，是占土地不多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可见，宋代主户包括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客户除少数侨居外地的小工商户外，大多数是农村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人户，也称佃户、佃客、牛客、旁户等。主户中的四、五等和佃户相加，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是宋代的主要劳动者，又是主要的被剥削对象。

地租和赋役　宋代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有分成制和定额制两种，比较普遍的是分成制。分成制规定，有耕牛的牛客户要以收获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无耕牛的小客户要把收获物的六

成交给地主。定额制是不论年成好坏，佃户要照契约规定交纳。此外，佃户及其家属必须为地主服役。但是，北宋的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唐代有所减轻。公元1027年，仁宗下诏佃户在每年交清地租后，可以离开田主，更换田主，原田主不许阻挡。这一变化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北宋农民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为二税，又称田税，即按土地数量好坏，分夏秋两季征收之税。中原一般按亩产1石，税1斗；江西、福建等地仍按十国旧制，亩税3斗，后来改为夏税钱，秋税米。宋政府将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以类合并"，有以牛皮、盐、曲为对象的"杂变之赋"，又叫"沿纳"。有以身丁为对象的"丁口之赋"，凡20岁至50岁的男子，不分主户和客户，都要交纳。不仅如此，纳税时农民还要承受支移、折变的剥削。支移，是政府以供军需、或借口以丰补歉，移此输彼，移近输远，强迫农民把赋税交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否则就要按里程付脚钱。没有支移任务的地方，要加纳"道里脚钱"。折变，是政府借口需要，将征收的固定物品，折成其他钱物征收，几经折变，官吏和商人从中渔利，农民负担平白地增加数倍。

宋代役法有差役和徭役两种。差役即职役，是主户轮流到官府当差。因为地主千方百计逃避，差役几乎全部落到贫苦农民身上，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徭役又叫夫役，不论主户客户，均"以人丁户口科差"。①因贵族官僚享有免役特权，地主又可雇人代役，实际上服役的也都是劳动人民。

科敷，又称科配、科率，这是北宋政府加在城市人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它是一种无固定时间、品种和数额的临时性赋税，或泛指摊派杂税。北宋初期，科敷由坊廓户负担，中期以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佑五年二月甲辰。

后，逐渐由城市扩大到乡村，成为城乡居民的共同负担。

二、王小波、李顺起义

起义背景 北宋初年，宋廷忙于统一和集权，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又加速了土地兼并。北宋军队数量多，官僚队伍庞大，政府开支浩大，对辽、夏战争失利，贡献“岁币”，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北宋初年的四川，是个阶级斗争浪潮的巨大旋涡，是农民起义斗争中心。四川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天府之国”，但这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地主官僚们的避风港，从唐朝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到五代十国军阀混战，陕西和中原地区的皇室、官僚、富豪纷纷逃到那里重建家园。这里又没有直接受到重大的农民起义的冲击和战乱影响，该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更为落后，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全境人口有百分之七、八十沦为佃客，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北宋统治者在四川实行专买政策，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盐酒专买权，造成大批手工业者和商人失业。公元992年前后，四川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殍(Pĭao漂)满野，而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不能自存”①。起义时机成熟了。

起义经过和意义 公元993年，四川青城(今灌县)茶农王小波，因“贩茶失业”，率领失业茶民、旁户举行起义。他紧紧抓住贫富两个阶级对立的突出问题，鼓动群众，组织起义。王小波当众宣布：“吾疾贫苦不均，今为汝辈均之”。②这一主张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起义军迅速扩大。一举攻下青城、彭山。同年底，王小波在率军进攻江原(今崇庆东南)的激战中，重伤牺牲。

①王称：《东都事略》卷42《石普传》。
②《宋史·樊知古传》。

王小波牺牲后，李顺成为起义军首领。他继续高举“均贫富”的旗帜。义军每攻取一地，便勒令“富人大姓”如数呈报家中所有财物，除按人口留给必需份额外，其余就地分给广大贫苦农民。李顺率起义军取蜀州（今重庆）、邛州（今邛崃）等地。公元994年初，起义军攻取成都。李顺即位称大蜀王，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两种货币，这是我国农民政权所发行的最早货币。这时，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攻下四川许多州县，北起剑门，南达巫峡的广大地区，大都为农民军所控制。

起义军的声威震撼了整个四川。北宋统治者非常恐慌，先后派宦官王继恩及其副将雷有终等率重兵两路入川镇压，主力从陕西经剑门南下，偏师沿长江西上。成都十万农民军，在李顺领导下，奋起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三万多起义军英勇牺牲，李顺在城破后下落不明。义军退出成都后，又推张余继续领导，转战四川各地，公元995年，张余被俘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迫使北宋政府取消了“博买务”，旁户的名称也不再出现了。这次起义发展了黄巢起义的“均平”思想，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战斗口号，说出了广大贫苦农民对贫富悬殊的愤恨，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剥削要求夺回劳动成果的强烈愿望。它标志着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已从反对人身奴役进入反对财富不均的新阶段。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宋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招抚流亡，奖励生产；提倡节俭，惩治贪污，减轻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加以割据局面的结束，社会相对安定，这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北宋的经

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农业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生产工具改进和推广、农作物品种增加等方面。

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农民开辟了大量圩田、山田、沙田、淤田、架田等，其中以圩田、山田开垦最为可观。北宋中期以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江宁、芜湖、宁国、当涂等地，都兴起大批圩田。这是一种在江边或低洼地四周筑堤防水流入的耕地。单是从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万春圩有田12万7千亩，圩中有大道长22里。圩岸上又植桑若干万株，以便养蚕。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山西等多山地带，劳动人民根据山区特点，缘山开田，称为山田（即梯田）。北宋的耕地面积，975年为295万顷，到公元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全国实际垦田估计约为1000万余顷。

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推广。犁铧有尖头、圆头两种。耙、锄、镬、镰等铁制工具普遍有所改进，轻巧耐用。开垦荒地时用来破除杂草根茎的銐刀，平整土地用的拉板，以人力代替畜力的踏犁，都已在大江南北普遍使用。北宋中期，鄂州农民创制的“秧马”已用于插秧，翻车和筒车等灌溉用的水车，已在南方普遍推广。

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在气候炎热的岭南，已种植豆、麦、粟一类的北方作物，黄河南北也栽稻谷一类的南方作物，特别是原产越南中部的占城稻，这时已从福建地区向长江、淮河、黄河流域推广。占城稻耐旱，成熟期短，产量较高。宋真宗时还派使臣到西方取得绿豆新品种，称为“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经济作物种植也有了发展，棉花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盛行，茶叶种植已普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输送给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达一千四、五百

万斤。桑麻作物，在全国已普遍种植。

亩产量普遍提高。北宋时期，一般农田，大约亩产一石，南方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景每亩可收二石至三石，明州广德湖灌区，每亩收谷六、七石。“苏常熟，天下足”①的谚语，反映了太湖流域农业发展水平。

手工业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北宋手工业各部门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矿冶业随着社会对金属需求量不断增加，有了新的发展。唐代仅有采矿区168处，到宋英宗时发展到271处，采煤尚不在内。北方煤、铁开采最多，南方有色金属矿比较发达。矿业中的煤，称为石炭，开采量很大。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陕西、江西等省均有开采。河南鹤壁发现北宋晚年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约2.5米，井深46米，四条较长的巷道总长500余米，从巷道及采煤遗址看，矿工当有数百人之多。②山西的一部分农民已转为采煤工人，“仰石炭为生”③。山西、开封一带的百姓已经用煤作燃料。著名的江西萍乡煤矿，这时已经开采。矿采量增加，以铜矿为例，公元997年的税收是400多万斤，而到公元1078年，就已上升到1400多万斤。徐州的利国监铁矿，宋仁宗时只有八冶，神宗时发展到“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④是当时最大的采炼矿区，年最高产铁154万斤。这时用煤炼铁已较普遍，还出现了冷锻技术，提高了铁的质量，经过冷锻的铁甲，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⑤

纺织业以丝织最为发达。丝织业产地形成了两浙和四川两个

---

①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犇牛闸记》。
②《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3期。
③《宋史·陈尧佐传》。
④《宋文鉴》卷55，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⑤《梦溪笔谈》卷19，《器用》。

中心。宋神宗时，两浙地区每年“上供”的绢帛就达98万匹之多，四川的蜀锦和定州（今河北定县）的缂丝，颇享盛名。此外，麻织业也很发达，棉花亦成了纺织原料。

制瓷业在北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瓷器成了倾销世界市场的产品，象过去我国被誉为“丝之国”一样，这时又被誉为“瓷之国”了。定窑（今河北曲阳）的白瓷，钧窑（今河南禹县）的天蓝瓷，汝窑（今河南临汝）的青瓷，官窑（开封）的粉青、月白和大绿瓷，浙江龙泉哥窑和弟窑的青瓷，这些产品都畅销国内外。北宋兴起的名窑中还有江西景德镇官窑。景德镇原名昌南镇。由于这里高岭土质好，用它烧制的瓷器质地洁白薄腻，色质透明滋润，青白瓷佳品晶莹如玉，素有假玉器的美称。据记载，宋真宗于景德年间下令把昌南镇改为景德镇，并且在此设置官窑，派遣官吏，专替皇帝烧制各种瓷器。真宗命进贡的瓷器底部都要写上“景德年制”的字样，于是统称景德镇瓷器。它远销海外，享有盛誉。

北宋时期，漕运已成为“建国之本”。由于水上交通及航海贸易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发达，荆湖、江南、淮南、两浙及陕西等地，都设有大型的造船场。宋太宗时，各地每年所造漕运官船达33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荆湖地区最大的内河航行船叫“万石船”，可载钱20万贯，载米12000石，载重量约为660吨。徽宗时能造载重量为1100吨的大海船。大多数海船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底部贯穿龙骨，有隔离舱，船桅有转轴装置，还配有指南针。这种船坚固稳定，吃水深，抗逆风、战恶浪、辨方向能力强。北宋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北宋的造纸业也很发达。纸的产地扩大，技术也大为提高。四川、安徽和江浙许多地方，都是名纸的产地，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原料。北宋纸还被用来制造大量的纸衣、纸袄、纸被和纸甲。纸衣、纸袄、纸被的出现，既反映

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同时也反映了纸的质量好。歙州的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达50尺，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城市经济和商业比前代更趋繁荣了。

全国著名的城市很多，大多分布在水陆交通要冲或沿海港口。唐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约有十多个，到北宋增加到40多个。杭州、苏州、江宁（今南京）、开封、洛阳、成都、广州、太原等，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和商品集散地。特别是都城东京(今开封)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中店铺林立，计有6400余家；还有娱乐场所，叫做“瓦肆”（又叫瓦子），内有演戏的，讲小说的，耍杂技的，踢球的，表演武艺的，真是热闹非凡。现存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面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密集，就是北宋末年东京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盛况的写照。北宋的大城市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商业店铺不象唐朝限定在“市”里，店铺可以随处开设。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同行业的店铺组成“行”。营业时间也取消了限制，东京出现了天明前营业的晓市（又称鬼市）和半夜三更才散的夜市。

唐代农村中一些定期的草市、墟市、集市，到北宋时更为活跃，粮食、布帛、牲口、陶瓷器皿等，都在集市上买卖。很多集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小市镇，这既促进了商品交换，又成了城市和乡村联系的桥梁。

北宋商品交换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唐代每年铸钱只30万贯上下。北宋前期每年在100万至300万之间，神宗时达到五、六百万贯。铜铁钱是这时的主要货币。由于商品贸易量大，“每一交易，动即千万”。① 这样，货币的需要量就大为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

增加，经常发生钱荒。四川是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而通行的是铁钱，当时铁钱十才当铜钱一，金属货币在流通上的弱点更为突出。于是在“飞钱”的基础上，宋真宗时，由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交子”，代替铁钱在市场上流通。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①但是，这十几户富商解决不了伪造交子的问题，又因经济薄弱，难以维持交子的信用，到宋仁宗时，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论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将交子收归官办。到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以致引起通货膨胀，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但铜钱铸造量增加和纸币的出现，反映了北宋商业的发达。

北宋对外贸易也很发达，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唐代仅广州一处。北宋则有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密州（今山东漆县）等地。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商品经济基本上还局限于城市中，没有动摇自然经济在广大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第四节　王安石变法

一、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冗官　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北宋政府用“分化事权”，“名与实分”的办法，防止文武官员专权，结果使机构重叠，官职混滥。宋代扩大科举名额，而且去掉唐朝的吏部考试，及第后即可做官，还通过恩荫制度等途径，大量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

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卷90《钱币考》。

政，使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1063年，官吏“十倍于国初”①。

官员素质差，办事效率极低。宋代官员三年一磨勘（考核），只要无过错，照例都可升迁。神宗元丰年间，一位70余岁的特奏名进士，在试卷上只写了“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字，竟然获得“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的优待②。欧阳修曾上书说：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病重，腰腿行动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内，州政极坏。后来接替他的刘依，亦是七十多岁，昏昧不堪，他问欧阳修：“中书有一个王参政，名甚？”③北宋十之八、九的官员，只知其官，不知其职。

冗兵 北宋推行灾年招兵的养兵政策，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太祖时，全国禁军、厢军总共不过38万，到宋仁宗皇佑（公元1049—1054年）初年，竟达140万之多。养兵之费竟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养兵政策，使士兵成了终身职业。将领又变换无常，造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队缺乏训练，兵不知战。因此北宋军队虽多，而战斗力很弱，所以中朝以后出现了“积弱”的局面。

冗费 北宋官吏待遇优厚，有俸禄（绫、绢、钱）、禄粟（粮食）、职钱、元随（侍从）、傔人（承差）、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马料、米面等，对官员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所以有人言：“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④加之每年庞大的军费开支，向辽夏奉献的岁币、岁赐。这庞大的开支，只能靠加重赋税，搜括百姓来解决。这就必然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更使其财政危机加重。于是

①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8《论进贺表恩泽札子》。

②朱彧《萍州可谈》卷1。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④《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

又出现了“积贫”的局面。

“不抑兼并”之祸 北宋初期，统治者为缓和中央集权与贵族官僚地主分权之间的矛盾，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放手让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借此以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北宋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以至造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①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起来造反。

农民起义与兵变 农民不堪忍受官府、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士兵不堪忍受官吏克扣军饷和苦役。他们被迫揭竿而起，反抗斗争连绵不断，“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②当时，影响较大的起义有如下数起。

公元1043年5月，中央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兵变。附近许多“平民”纷纷参加。王伦起义队伍攻占沂州、密州、海州、扬州、泗州、楚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起义者都在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字，王伦衣着黄衫，意为等同皇帝。这些都表示义军要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希望。同年7月，在官兵严酷的合击之下，王伦被俘牺牲。

陕西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公元1043年，张海、郭邈山率饥民千余人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义。他们攻打城池，所向披靡，活跃在河南、陕西、湖北交界一带，每到一地即开府库，济贫民，深得人民拥护。宋廷极为惊慌，急调曹元喆等率上万禁军前来镇压，后又以韩琦宣抚陕西，年底起义被镇压下去，张海等牺牲。

湖南桂阳监(今桂阳)是瑶族聚居区。宋政府在该地区控制食盐出售，且质差价贵，瑶民严重缺盐，只好结队贩运私盐，常与官军发生冲突。公元1043年唐和等率众起义，屡败官军。斗争持续了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
②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五年之久。

公元1047年，河北贝州(今清河县)驻军中的下级军官王则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士兵和农民起义，王则被推为“东平郡王”，设官置署。战士面刺“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一定要推翻赵宋王朝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次年，宋廷派文彦博、明镐等率重兵围攻，王则被俘牺牲。

北宋中期的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庆历新政 北宋中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使统治集团中很多人深感不安，认识到决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官僚，于公元1043年进行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因这件事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改革方案主要有：一、明黜陟。政府要根据官员政绩的优劣，决定对其晋升或降职，改变“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恶习。二、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削减恩荫人数。三、精贡举。避免只以诗赋取士，强调注重品德和实际能力的考核。四、择官长。派官员巡视地方，根据政绩选择知州、知县。病老不能工作或不称职者罢免。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在外做官，都分给公田作为职田，“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①六、厚农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让老百姓都能得到皇帝的恩泽。十、重命令。取信于民。

这次改革的着眼点是在改革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新政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就被迫离职，新政失败。但它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借鉴，揭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

二、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号半山，曾被封为荆国公，因而人们又称他为王荆公。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的各种矛盾有增无减，特别是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到英宗时，入不敷出，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面对当时严重激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以汉唐五代的乱亡为教训，告诫宋仁宗，如果不改革，农民就要起来造反。边事危机，农民起义震撼了宋王朝的统治。为了挽救宋王朝的政权，进行必要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宋神宗即位后，出于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统治危机，先后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宰相，从公元1069年开始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理财和整军两大类。

理财是整个变法的关键。主要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

均输法。由政府设立发运使，总管东南财赋，统一采购物资，运往京师。要求发运使周知各路产品和国都需求情况，避免"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①要做到"徙贵就贱，用近易远"②，节省国家购价和运输费用，减轻人民负担，限制商人投机倒把。

农田水利法。即《农田利害条约》。其中规定了鼓励垦田、兴修水利的各种办法。如各地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按户等高低出资，民力不足，可向政府借贷，取息一分，并可延长借期，一州一县不能胜任者，可由若干州县联合举办。仅六、七年间，兴修水利共达1万多处，灌田36万多顷。

青苗法。每年正二月和五六月，青黄不接时，由民户自愿请

---

①②《宋朝诸臣奏议》卷109。

贷，政府放贷钱物。放贷数量根据户等高低有所不同，到夏秋收获时随税归还，出息二分。当时高利贷利息是五分以上。其目的在于抑制豪强兼并之家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为农民解燃眉之急。

免役法。亦称募役法或雇役法。废除以前的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改为当差的人户可以出“免役钱”代役，过去不当差的官户也要按等减半出“助役钱”。由政府用征得的这些钱募人应役。差役变成了雇役。这有利于农业生产，但触犯了官僚大地主的特权。

市易法。在京城和重要城市，政府设立“市易务”，由国家出资收购滞销物品，到缺货时再抛售出去。商贩们可用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赊购货物进行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加息一或二分，归还“市易务”。其目的是限制大商人操纵市场，囤积居奇，稳定物价，调节市场需求，政府也可增加一些收入。

方田均税法。政府每年丈量土地，按土质、数量向政府交税。过去官僚大地主大量隐瞒田户，现在也得纳税，其目的以求改变豪强之家“有产无税”和贫苦之家“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多少也可减轻一些农民负担。

整军措施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设军器监。

将兵法。又称置将法。针对“冗兵”现象，精简军队，裁汰老弱，节省军费开支。针对“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弊病，把军队固定在一定的辖区，有较固定的将领统率和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全国分置92将，每将统兵三千到万人不等。此法增强了边防力量。

保甲法。把民户编制在保甲中，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选有物力、才能的人，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当保丁，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在保内巡逻，维护治安。其根本目的是

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镇压，并可使壮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

保马法。亦称保甲养马法。即由民户代养官马。河东等五路的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户养一匹，有能力的户也可养两匹。政府给马或给钱由民户代买。养马户免征差役、折变、沿纳和杂徭。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内外的防御力量。

设军器监。负责军器的设计、改进和制造。

此外，在学校和科举制度方面也作了某些改革，以《三经新义》作为太学和州县学校的主要教材，并以它作为科举应试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培养实用人才。

总之，王安石变法，是从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前提出发的，限制官僚豪绅地主和富商兼并土地和高利贷盘剥等权利，为政府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一些农业措施，改进了农业经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缓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解决政府财政的困难。随着新法的推行，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初步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新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十多年，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新法却触犯了大官僚地主集团的特权和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猖狂攻击和反对；同时变法主要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能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因而支持力量单薄；加之顽固势力强大；保守官僚们营私舞弊，使旨在利民的法令，有的反而产生扰民的弊端，使变法最终不能不遭到失败。王安石两次被罢相。公元1085年，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废止。此后不久，王安石也忧愤死去。

王安石在变法中，面对顽固势力的反对和攻击，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这种勇敢挑战精神，同那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消极、保守、无所作为的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三不足"口号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列宁称"王安

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①变法虽然失败，但勇于改革的王安石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

三、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北宋晚期，政治腐败，皇室和官僚都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宋徽宗时（公元1100—1125年），是北宋统治最腐朽的时期。徽宗生活荒淫至极。他迷信道教，大造道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先后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李彦、梁师成和朱勔等六人，时人称为“六贼”。蔡京一伙为了讨好宋徽宗，一个个丑态百出，如宰相王黼以及蔡攸之流，侍宴时，自己“短衫窄袴，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②以此取宠于昏君宋徽宗，他们不断怂恿徽宗追求淫乐。“六贼”行奸，“皆托御笔”。童贯更是“专请御笔行其私意”，他为了供宋徽宗造花园和玩赏，在苏杭设“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工匠几千人为皇室制造各种奢侈品，并借机大肆搜刮。朱勔在苏州置“应奉局”，强取民间奇花异石和珍奇物品，用船运往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六贼”公开卖官求利，官位各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③宋徽宗肆意挥霍，一年财政收入只能供九个月开支。为此，“六贼”滥发纸币“钱引”，增加赋税。为了增加实物收入，又让杨戬等主持设立“西城括田所”，疯狂侵夺民田，成千上万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宋徽宗的腐朽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迫使南北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

方腊宋江起义 方腊，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人民受应奉局、花石纲之苦，无法生活，方腊便利用摩

---

①《列宁全集》卷10，第152页注②。

②《宋史·奸臣传》。

③朱弁：《曲洧旧闻》卷10。

尼教(即食菜事魔教)发动群众。于公元1120年10月起义，四方农民纷纷响应，几日之间，义军发展到十万人。五个月内义军连续攻占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今安徽歙县)、杭州等六州五十二个县，短短几个月内，参加起义者竟达百万之众。东南大震，威胁京都。

北宋统治者慌恐万状，立即派童贯率15万大军南下，会同南方官军，合力镇压起义。同时北宋政府又施展阴谋，瓦解义军。义军因缺乏作战经验和物资，又贻误战机，后虽与官军英勇搏斗，最终被镇压。方腊被俘牺牲。

当方腊起义之际，北方黄淮平原上也爆发了宋江领导的起义。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转战于河北、京东、淮南一带。这支军队人数虽不很多，但武器精良，作战勇敢，战斗力很强。特别是他们战斗在离北宋都城不远的河北、京东、淮南地区，对北宋政府威胁极大。所以，宋廷称其为“河北剧贼”。公元1121年起义军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中了知州张叔夜的伏击，损失很大，后又转战到河北。宋军镇压方腊起义后，抽调折可存部，移师北上，围剿宋江起义。经过近一年的激战，宋江等人被俘，起义失败。但宋江起义在民间留下深刻的影响，后世许多戏曲、小说把宋江等起义者作为神奇式的人物加以传诵，至今山东梁山还保留着宋江起义的传说和古迹。

第五节　金的兴起和北宋灭亡

一、女真族的兴起和金朝的建立

女真族的兴起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它是肃慎的后裔，隋唐时称为靺鞨，辽统治时称为女真，世居“白山黑水”之间。辽为了削弱女真族，将其中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女

真人迁往今辽阳以南，编入户籍，被称为“熟女真”，留住原地不编入户籍的称为“生女真”，人数最多，有部落几十个，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其中以完颜部为最大。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约10世纪末期，生女真定居按出虎水（意思为金，地在今阿什河即黑龙江省阿城县东）一带，过着半农耕、半渔猎的生活。11世纪中期，生女真完颜部的农业和冶炼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和战斗力迅速强大起来，在乌古乃为部落酋长时，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咸雍八年（公元1072年），乌古乃因助辽有功，被辽封为生女真部节度使。当时，女真族的生产早已有了剩余，富有的家族已占有奴隶，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奴隶制开始出现。

金的建立　公元1113年，勇敢善战的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那时，辽王朝向女真榨取珍珠、海东青、人参、貂皮、生金等各种贡品；辽的官员和使者对女真贪残凶暴、百般勒索，甚至竟以女真妇女“荐枕”（陪伴睡觉）；辽在与女真交易中，压低物价，甚至强取。对此种种，女真人愤恨不已，要求摆脱辽的统治和奴役。完颜阿骨打顺应了这一要求，“为农积谷，练兵牧马”，做抗辽准备。公元1114年秋冬，他乘辽军不备，先发制人，以少胜多，攻占了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东南)，又取得了出河店(今吉林扶余县境)大捷。抗辽战争节节胜利，大大提高了阿骨打的地位，为女真族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正式称帝(金太祖)，国号金(此后女真人亦称金人)，改元收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女真奴隶制国家正式建立。金建立初年，创制了女真文字。

猛安谋克　阿骨打称帝后，进一步扩充和整顿金朝军队。阿骨打对猛安谋克制度加以发展。猛安谋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组织．谋克是氏族单位，猛安是部落单位。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八至十谋克为一猛安。后又对女真人和归附各族同

样按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制，实行“壮者皆兵”的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编制，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在其管辖下的各户壮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既节省军费开支，又能保证有效的战斗力。这种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制度，在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辽的灭亡

正当金崛起的前后，辽天祚帝奢侈享乐，统治日益腐朽。对内沉重剥削，对外残酷掠夺、奴役，“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①各族人民反辽起义日众，使辽的实力日益削弱。

公元1115年，金兵攻占了辽的政治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公元1116年春的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县西)之战，阿骨打以两万金军大败辽天祚帝亲率的号称70万大军。至此，辽再也无力组织大军抗金了。辽的东京辽阳、上京临潢府等地区，相继被金兵全部占领。

辽兵屡被金兵打败，北宋君臣看到辽国必然灭亡的趋势，想乘机收复五代时丢失的燕云十六州，以缓和国内的尖锐矛盾。从1117年起，宋先后数次派人浮海赴金，相约夹攻辽朝。公元1120年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县西），宋兵攻辽的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灭辽以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宋将原来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献给金；双方不能与辽单独讲和。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公元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但均被辽军所败，伤亡惨重。公元1122年阿骨打如约攻下辽的中京和西京。当年12月，金军攻破燕京。1123年，金辽战争接近尾声时，阿骨打去世，其弟吴乞买继立，即金太宗。

---

①《辽史·食货志下》。

阿骨打所领导的女真建国和反辽两件大事，都是适应历史要求的。1125年，金兵俘获了辽天祚帝，辽亡。

辽亡前一年（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兵到伊犁和锡尔河流域间活动，后建立西辽，1211年，为蒙古族的乃蛮部所灭。

三、靖康之变与北宋灭亡

收复燕云的交涉　在对辽作战和与金交往过程中，女真贵族对北宋的软弱腐朽，看得一清二楚。宋既未完成盟约规定的军事任务，于是金便向宋提出了苛刻的条件。经双方多次交涉，金才于公元1123年，将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等六州归宋。但是北宋除了每年要把给辽的岁币50万两匹照数给金外，还要加纳燕京赎城费100万贯。当金兵退出燕京时，把该城的职官、人口、财物全部掳掠一空，宋所得到的只是座空城。

1123年，金太宗即位时，金正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富于掠夺性。金灭辽后，吴乞买又想夺取中原，于是，金立即出兵南下，对宋进行掠夺战争。

金兵第一次南侵和汴京保卫战　公元1125年底，金军分两路侵宋，准备包围汴京。西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统领，从云中（今大同）攻到太原，宋守将王禀率军坚守太原，金军受阻。东路金兵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直取燕京，又在燕京降将郭药师带领下，长驱直入，包围汴京。北宋君臣慌作一团，宋徽宗一面忙下"罪己诏"，取消"花石纲"，令各地勤王。同时，又急忙下诏禅位其子赵桓，是为钦宗，改元靖康。徽宗自己带领亲信，逃往镇江。

面对危急形势，北宋政府内部形成两派。以宋钦宗为首的主和派认为金兵难以抵抗，主张投降。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今日之计，当整军马，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

师”。①广大军民也坚决主张抵抗，反对投降。宋钦宗被迫同意让李纲负责开封防务，抵抗金兵。但又悄悄遣使求和。

孤军深入的金兵，在汴京附近一再受到李纲率领的宋军沉重打击。李纲亲临城上督战，多次打败金军。这时河北、山东等地“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金兵已处包围之中。但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宋钦宗仍坚持向金妥协求和。金方提出议和条件：犒军费黄金5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万匹，牛马各万匹，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宋钦宗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康王赵构和少宰（副宰相）张邦昌被送往金营，并答应罢免李纲。消息传出，北宋军民义愤填膺，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上书，军民从者数万，请罢李邦彦，复用李纲，上下齐心，抵抗金兵。宋钦宗被迫复李纲等职。由此，金方看到宋士气大振，“勤王”援军和民兵到达20多万，于是不等取足金银，便于公元1126年春被迫撤退。

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见金兵北撤，以太上皇身份回到汴京，投降派又重新得势，“勤王”之师和民兵被遣散，李纲被迫离开京师。北宋统治者仍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公元1126年秋，金以宋不履行割三镇之约为借口，再次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同年底，汴京二次被围。宋军民主动出击。宋钦宗不相信军民的力量，却相信无赖、骗子郭京能用“神兵”退敌。公元1127年1月，郭京声明“神兵”出战，尽撤城上守军，结果“神法”不灵，“神兵”立即溃散，金兵乘机攻破汴京。金军入城后，一面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一面进行大肆掳掠搜刮。因为金人兵力有限，无力占据汴京，更无力统治中原广大地区。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127年5月），被迫撤兵北去。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公主、宗室及官吏三千多人被俘，随同金银财宝、法驾仪仗、天文仪

---

①《宋史·李纲传》。

器、百艺工匠，一同运往金国，北宋灭亡。史称这次事件为“靖康之难”。

重要名词：

五代十国　　耶律阿保机　　燕云十六州　　陈桥兵变
主户和客户　　《清明上河图》　　王小波起义　　澶渊之盟
庆历新政　　完颜阿骨打　　海上之盟　　“靖康之难”
交子

思考题：

1．简述周世宗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2．试述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和影响。
3．试述北宋经济发展的原因和表现。
4．试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失败原因。

第十一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公元1127—1279年；公元1115—1234年）

第一节　宋金和战与“绍兴和议”

一、南宋的建立和宋高宗的投降政策

南宋的建立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人俘徽、钦二帝、后妃、宗室、百官等3000人北返，近支皇族，只有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康王在靖康元年正月曾为质金营，已惧金人兵威。是年8月金兵第二次南下，11月，康王再被钦宗派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营。当他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知州宗泽告诉他金兵已从附近南下，劝他起兵进援京师。他的副使王云被人们认定是奸细而处死。康王被迫留在磁州。不久他应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之邀到相州。12月，金军围开封事急，钦宗任命康王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进援开封。康王赵构建大元帅府，但他并不直援京师，而是带主力兵马绕向京师东南，经临漳、大名、东平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康王迟疑不敢进兵开封，只有副元帅宗泽率部队进援京师，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为时亦晚。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消息传到济州，黄潜善与一部分官僚拥康王为帝，康王不

允，认为时机不到；汪伯彦劝南逃宿州，由于将士激烈反对而不能成行。四月，金兵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更有一部分旧宋官僚和陆续到来的勤王将士逼使张邦昌退位，张邦昌遂开始向康王表示忠顺。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

高宗集团的政策 高宗即位后的头等大事是巩固皇位。他在政治上有三大忌讳：一、父兄还朝将使皇位不保；二、抗金将领功大难制必然功高震主；三、视抗金军民的力量为心腹之患。然而，南宋政权面临的现实是爱国军民抗战义愤高涨的形势和金军随时南下的威胁。因此，无论从巩固皇位出发，还是为了获得在投降中与金人有足够的讨价还价法码，高宗首先必须做的是标榜“中兴”，起用抗战派。他起用当时抗战派声望卓著的领袖人物李纲为左相，副元帅宗泽为开封知府，领兵进驻东京。宗泽以后升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根据李纲建议，任命“声震河北”的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两河人民闻风而动，士气大振。抗金、“中兴”并非高宗的真正目的，所以他在起用抗战派的同时，又起用投降派代表人物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不久又升他为右相，与李纲并列；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用黄、汪牵制抗战派。高宗、黄、汪结成一伙，对抗战派处处掣肘，使李纲的改革军制、整顿纪律、募兵买马、重新部署防御力量等一系列措施无法实行。

高宗利用黄、汪把李纲、宗泽的抗金活动压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中，是为了向金朝表示忠顺，适应当时金朝的“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政策。高宗政权稍趋稳定，就决心遣使赴金求和，遵守靖康原约，割地赔款，以黄河为界。高宗集团要投降就必须首先搬掉投降的障碍，先把张所、傅亮撤职，废掉招抚、经制两司，接着就指责李纲“狂诞”、“专制”，把仅当了

75天宰相的李纲罢职。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言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劝高宗还都、亲征，迎还徽、钦二帝，结果二人被斩首弃市。李纲罢相后的四、五天，他苦心经营的所有抗金措施一概废除。高宗、黄、汪投降派完全控制了军政大权，时刻准备放弃中原，逃往东南。

金军南侵和南宋定都临安 公元1127年8月，李纲罢相。9月，高宗谎听金兵南下，10月初就率文武百官从南京南逃扬州，并派王伦赴金求和。金朝听到高宗南逃的消息，根本不理南宋大臣，于12月兵分三路南下。这次军事行动，为宗泽和两河义军所阻，各路进展不大，不久被迫收军。此后，金朝集中兵力对付中原军民，巩固黄河以北地区。同时对如何对付南宋王朝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

公元1128年7月，金王朝决定派讹里朵、粘罕（宗翰）、兀术（宗弼）率军穷追高宗，消灭南宋王朝。同时派娄室率金军进攻陕西，以牵制川、陕宋军。10月，金军南下。第二年正月攻下徐州。粘罕派拔离速率5000骑兵千里奔袭扬州。拔离速部2月占天长军，距扬州仅百里。拔离速派马五率500精骑当晚赶到扬州，听说高宗于午前向江边逃窜，立即追到瓜州渡口，但高宗已带了王渊和康履几个人乘小船到镇江了。金军进扬州大肆杀掠，焚城后北撤。

公元1129年5月，高宗到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使金求和。7月，又派崔纵赴金求和。两批求和使还在途中，金朝已决定渡江南侵。8月，高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急派杜时亮赴粘罕大营乞求不要进兵，书中声称“今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①金朝对南宋求和根本不予理会，兵分四路南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记事。

侵。金兀术奉命穷追高宗君臣。高宗求和无望，率后妃、百官奔镇江、过常州，10月逃到杭州。金兀术部11月从建康附近渡江，宋军溃散，金军如入无人之境。消息传到已在越州（今绍兴）的高宗那里，南宋君臣急走明州（今宁波），窜到定海。金军一路跟踪紧追不舍，高宗君臣无奈，只好乘船在海上漂荡。金军乘船追击，遇大风雨为宋军大船冲散，退回明州，向杭州兀术大营汇报"搜山检海已毕"。①

高宗集团不敢抗金，丢掉千里国土。但爱国军民却纷纷自动集结，痛击金军。兀术深知孤军深入的危险，江南不可久留。公元1130年2月，兀术率10万金兵和掠夺的大批财宝人口从杭州沿运河北撤。3月行至镇江，与宋留守镇江的韩世忠军遭遇。韩世忠部只有8000兵，但士气高昂。其妻梁红玉亲自击鼓助威，把10万金兵阻截在黄天荡48天，金兵大败。兀术愿留下所有的财宝人口，乞求过江，遭到韩世忠严词拒绝。最后，兀术采纳奸细的献策，开老鹳河故道逃脱。黄天荡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

金兀术部渡江北撤后，调往西北战场，留在江淮的金军也几经损伤，一时无力南侵。南宋无意北进，江淮战场暂趋稳定，是年9月，金朝立汉奸刘豫（原宋济南知府）为"大齐皇帝"，都大名(后迁开封)，统治中原和陕西地区，成为金的属国，也是金和南宋的缓冲地带。

公元1132年，高宗君臣结束海上流亡生活回到杭州。"建明堂"，"立大庙"，定都临安，终日作乐。有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

①《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二、北方义军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金兵的残酷屠杀和掠夺，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愤怒，人民自行集结，武装抗金，写下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光辉篇章。义军主要由农民组成，同时有官兵、小商贩、僧侣参加，甚至原反宋的农民武装和各地的勤王兵也汇集其中。这支抗金的洪流，战斗在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有力地打击了金兵的侵扰。其中主要的有：

八字军 这是王彦所领导的抗金武装。王彦原为张所部下都统制。张所虽很快被罢官，但王彦早已奉命率7000将士渡黄河进入金兵占领区。这支部队英勇善战，收复新乡县，竟被金朝认为是宋军大举反攻，聚重兵围王彦部。王彦兵败后退往太行山区，为表示决心和仇恨，战士面部刺着“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故称八字军。八字军威震燕代，其他义军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部十几万归附，愿听王彦号令。八字军大大牵制了金军的南侵。

红巾军 战士以头包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初活动于河东泽、潞地区，后扩展到河北、陕西。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心怀力齐，奋不顾死”。有一次突袭金军大营，几乎活捉主帅粘罕。金军最仇恨红巾军，为捉真红巾军，往往屠杀整村寨的平民。红巾军得到人民支持，反而日渐发展壮大。

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县）义军 原北宋保州路廉访使马扩所领导，以五马山为根据地，组织抗金武装。大约10余万人，在河北、山西影响很大。

梁山泊水军 原北宋农民起义军，金陷中原后，张荣领导这支水军，转而抗金。

此外，还有中条山区的邵兴，吕梁山区和太岳山区的李宋臣等武装力量。北方人民的抗金队伍遍布山地平原，总计约有六、

七十万人。

宗泽任东京(今开封)留守，就是依靠北方义军坚守开封，并拟大举渡河抗金的。宗泽主动联络两河抗金武装，著名的八字军、五马山义军都和宗泽有联系。义军渴望宋军北上，共同抗金。更有大批两河抗金武装南下，云集开封周围。如河北杨进有众30万，河东王善众号70万，丁进、王再兴等有众数万。他们都愿听宗泽节制。公元1127年10月，高宗南逃扬州。金兵12月三路南侵，宗泽就是依靠北方义军使金不敢兵犯开封。也是这些义军勇猛作战，使金军这次军事行动不得不停止。

在这大好形势下，宗泽进行全局部署，拟订出全面反攻计划。他前后20多次上书高宗劝其回东京，主持恢复大业。可是逃亡扬州的高宗集团竟说宗泽在“发疯”，诬北方抗金义军是“寇贼”，责令宗泽将其解散。70多岁的老将宗泽既想依靠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南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忧愤成疾，公元1128年去逝。死前一日，泪如雨下，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叮嘱部将坚持抗金。死时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不忘抗金斗争。

三、钟相、杨幺起义

金军在追击南宋王朝的过程中，对江南进行了毁灭性的烧杀劫掠。繁华的苏、杭二州，金兵纵火，3日不熄；明州、洪州(今南昌)、潭州(今长沙)遭金兵屠城；名城建康在金兵过后，也“悉为灰烬”。宋官军在金兵打击下早已溃不成军，无有粮食，靠抢劫、敲诈为生，更有“游寇”、土匪的骚扰，已是官匪不分。战火中的南方人民大批的死亡和逃生，生产无法进行。然而，南宋王朝却是北宋腐朽政权的继续和发展。它国土虽只有江南一隅，但开支并不比北宋少。南宋政府往往借口大敌当前，巧立

名目，横征暴敛。正税之外，还有什么“和籴”、“均籴”、“对籴”、“补籴”等。所以有“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①甚至“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总之是：“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②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后，农民只有聚众造反。信州（今江西上饶）有王宗石起义，建州（今福建建瓯）有范汝为起义，吉州（今江西吉安）有彭友起义等等。其中以洞庭湖畔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深远。

钟相是鼎州(今湖南常德)武陵人。北宋末年就以行医为名，利用宗教秘密宣传和组织农民酝酿起义。他针对当时突出的贵贱贫富问题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③这一主张深得人心，洞庭湖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自备钱粮，求见钟相，络绎不绝，“谓之拜爷”。④经过20多年的宣传，钟相在鼎、澧一带已具备了发动起义的坚实的群众基础。

公元1130年春，金兵焚掠潭州刚刚北撤，南宋溃兵土匪10万在孔彦舟率领下窜到洞庭湖区，他们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占荆南和鼎、澧诸州，大肆杀掠，民怨沸腾。钟相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毅然树旗举兵，立时在鼎、澧、荆南、潭州等地有40万人参加。钟相自称楚王，建国号为大楚，改元天载。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⑤攻占洞庭湖一带19县，并宣布宋朝国典为“邪法”。义军“杀人”为行法，“劫财”为均平。所谓“行法”，“均平”就是“等贵贱，均贫富”。

南宋王朝命孔彦舟镇压钟相起义。孔彦舟屡战不胜，就利用义

①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
③④《三朝北盟会编》卷137，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137。

军组织松懈的弱点，派人以“入法”为名混入义军内部，里应外合，突然袭击，钟相被俘牺牲。杨幺成了义军首领。他整顿组织，清除奸细、叛徒，英勇战斗，逐步巩固发展了这支农民武装，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战斗。他们在洞庭湖周围创建大批能攻易守的山水寨，制造了新型车船，不仅高大而且进退迅速，战斗力很强。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取得显著优势。义军兵农合一，“陆耕水战”，根据地得到巩固。洞庭湖畔也出现了“田蚕兴旺，生理丰富”①的繁荣景象。

起义军在洞庭湖区的壮大，不仅使南宋王朝不安，而且也引起伪齐政权的注意。南宋王朝在公元1133年派6万官军镇压，结果大败。主帅被连贬三级。伪齐政权派人到杨幺大寨游说，封官许愿，联合攻宋，结果35人的大使团被灌醉沉尸江中。高宗亲自下诏招安，也为杨幺拒绝。杨幺领导的这支农民军，在民族和阶级斗争交织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反宋抗金，旗帜鲜明，表明了起义农民的革命立场和爱国精神。

南宋王朝认为杨幺义军这一心腹之患，甚于金、齐。1135年，高宗命宰相张浚督战，调江淮前线岳飞的精锐部队到洞庭湖镇压。张浚、岳飞虽与高宗集团在抗金问题上有矛盾，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立场一致。张浚和岳飞采用“剿抚兼施”策略，从内部分化瓦解义军。又命令部队封锁湖区，分割包围水陆大寨。经过激烈战斗，公元1135年，杨幺兵败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钟相、杨幺起义历时6年，据地千里，兵力达40万，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反映出农民要求否定地主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的意愿，表明宋代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

①《杨幺事迹》卷上。

四、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出身于农民家庭。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康王赵构在相州建大元帅府，岳飞从军。先后在抗金名将张所、王彦、宗泽部下作小军官。杜充代宗泽为东京留守，岳飞受杜充统辖。公元1128年底，杜充在退守建康时降金。岳飞却集合余部坚守建康附近静安镇。1130年正月，岳飞移屯宜兴，兀术军北撤，在镇江黄天荡遭韩世忠阻击，狼狈退至建康，岳飞又出奇兵袭击，再次给兀术以沉重打击。岳飞从河北转战江南，逐渐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到公元1134年，岳飞已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收复襄阳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宋叛将李成率部数万投降伪齐，占据襄阳。伪齐招降纳叛，又多次派人诱使农民起义军杨幺联合攻宋，给宋以极大威胁。岳飞建议进攻伪齐，收复襄阳、信阳、唐、邓、郢、随六州（军）。

公元1134年，岳飞奉命进兵。但同时，高宗命令只准收复六州（军），不准提“兴兵北伐”、“收复汴京”之语。是年5月，岳飞率军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首先攻下郢州，然后兵分两路，张宪率东路攻随州，岳飞率西路攻襄阳。伪齐守将李成弃城逃窜。岳军势如破竹，照预定计划3个月收复六州（军）。岳飞收复襄阳六州（军），是中原战场宋军第一次主动进攻，也是南宋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岳飞进军之快，获胜之速，震动了朝野。这次军事行动，使年仅32岁的岳飞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晋封为武昌开国侯，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列为南宋初著名四大将。岳飞所部被称为“岳家军”。

岳飞收复襄阳后，伪齐政权的虚弱无能已充分暴露。此后，伪齐几次南侵失败，一蹶不振，金感到这个傀儡政权无用。公元1137

年，将刘豫伪齐一脚踢开。

进兵中原　伪齐被废后，金熙宗听从实权派挞懒主张，决定将伪齐之地交南宋，要南宋称臣纳贡。高宗正求之不得，二者一拍即合。公元1139年正月，秦桧代高宗拜受金诏书，称臣纳贡，双方议和。此举遭到爱国军民的激烈反对。抗战派很多将领拒绝加官晋爵。岳飞为此上书讲："唾手燕云，终欲复仇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①高宗集团根本不理。正当南宋王朝为此事庆贺时，金挞懒一派失势被杀，兀术派掌权，决定毁约南侵。

公元1140年5月，金熙宗任命兀术为统帅，兵分四路南侵，企图一举灭宋。战线东起淮水下游，西到陕西，兀术亲率10万主力赴顺昌（今安徽阜阳），欲从此渡淮南下。高宗在急乱中命令抵抗。令岳飞援顺昌，出师中原。诏旨讲："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②不久，宋将吴璘在川陕挫败撒离喝，刘锜在顺昌以2万八字军主力击败兀术10万金兵，取得顺昌大捷，兀术败回开封。高宗、秦桧见金兵败撤，立即令各路宋军采取守势，准备乞和。派李若虚传旨岳飞"宜且班师"。但当李若虚赶上胜利进军的岳家军，却自愿承担违诏进兵的责任，支持岳飞进军中原。

不久，岳家军诸路告捷。张宪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牛皋等率军收复了陈州（今河南淮阳）和郑州，再克洛阳。岳飞仅带少数骑兵驻守郾城（今河南郾城）。7月上旬，兀术亲带精骑15000直奔郾城，妄图一举消灭岳家军指挥核心。岳飞亲自领兵迎战，大破金"铁浮图"、"拐子马"，兀术大败而逃。此即郾城大捷。中旬，兀术又带12万金兵攻颍昌，以图拦腰切断岳飞与前线郑州、洛阳各部的联系。颍昌驻军王贵、岳云等率部反攻，与金军拚死

①《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丙戌。

②《金佗粹编》卷2，《援顺昌诏》一。

血战，兀术又大败而逃。岳家军自北伐以来，对金作战有进无退，以少胜多。自郾城、颍昌战后，金兵被岳飞军打得闻风丧胆，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兀术自颍昌败回开封，不敢再战，下令“老少渡河”，准备北撤。两河义军早就和岳飞有联系。岳家军的胜利进兵，使各路义军乘势而起。他们在金后方截断交通，夺取粮食，攻取州县，给金军以极大威胁。

岳飞根据中原战场大好形势，请求高宗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前进，全线出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仅45里，全军待命渡河。高宗、秦桧坚持妥协求和的方针，令张俊从宿州、亳州、泗州撤退，从而迫使韩世忠也从淮阳撤往楚州。命刘锜军从顺昌撤到镇江。川陕宋军主力早已撤回，这样宋金前线只有岳飞孤军。高宗、秦桧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一天之内连发12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军7月间退回鄂州，收复之地全部丧失。岳飞悲愤交集，感叹“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五、“绍兴和议”与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高宗、秦桧的投降活动 高宗在位36年，其中一半时间用秦桧作宰相。高宗把偏安江南作为不变的国策。秦桧为相的策略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所以君臣二人自始至终，配合默契。秦桧是北宋旧臣，公元1127年随徽、钦二帝被俘到金，很快投降变节，成为挞懒亲信。公元1130年9月，金建伪齐政权，对南宋诱降，10月，秦桧离金营南归，欲在南宋王朝内部破坏抗金斗争。秦桧到杭州，自称逃回，经当时的右相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高宗讲：“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①可谓一见如故。3个月后，就代范宗尹为右相。他网罗

①《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月条。

党羽，积极投降，为相一年，遭群臣反对，高宗被迫暂且将其罢相。

公元1138年3月，秦桧再度被起用为右相，专办与金议和之事。

公元1139年，秦桧代高宗拜受金诏书，签定和议，宋向金称臣纳贡。此事因金朝内变，金毁约攻宋，宋金开战而暂罢。

公元1140年7月，岳飞进军中原，兵至朱仙镇，胜利在望。高宗、秦桧连下12道金牌迫令班师，断送了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

公元1141年正月，兀术再度南侵失败。密使告秦桧“必杀飞，始议和”。高宗、秦桧密谋以议和来解除大将兵权，以解除大将兵权促成和议。在收回兵权，促成和议的同时，可以防止骄兵悍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弊端，消除渡江以来的最大顾虑。以此，恢复以文抑武、重文轻武的赵宋祖制。4月，升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上解除了兵权。张俊此时已附合秦桧主和。7月，解除刘锜兵权。8月，罢岳飞官。9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父子谋反。10月，岳飞被捕入狱，韩世忠被罢官。兀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到长江边的六合。

“绍兴和议”与岳飞被害　金兀术驻兵六合，兵临建康城下而不前，说明当时双方和议已接近成熟。成熟的根本原因是金军经多年战争，已无力渡江作战，放弃了消灭南宋，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而宋高宗集团自建南宋之始就根本无意抗金。一个是至此无力，一个是根本无意，也就是说宋金统治集团都不愿继续战争，以免妨碍和议进行。金兀术在建康城外虚张声势，高宗、秦桧立即哀求“先敛兵，许敝邑拜表阙下。”公元1141年12月，高宗派魏良臣使金“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兀术准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为界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宋高宗向金帝进“誓表”中讲：“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

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25万两匹”。

杀害岳飞是宋金议和条件之一，所以当“绍兴和议”签定以后，迫害岳飞的活动加紧进行。秦桧指示其死党万俟卨(莫其谢)主审岳飞，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岳飞自落入奸贼秦桧手中，百般拷打，一言不发。韩世忠责问秦桧，桧讲：“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①公元1141年12月29日，岳飞被“赐死”狱中，岳云、张宪亦同时遇害，家属流放岭南。

岳飞20岁从军，39岁被害。他的一生主要战斗在抗金前线，是抗击女真贵族入侵的中流砥柱。他外对强敌、内对奸贼所表现出的勇猛无畏、决不屈服的坚强斗志和民族气节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使子孙后代敬仰不已。他虽然忠君，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后人能给他以历史的谅解。岳飞不愧为一代爱国名将，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杰。

高宗集团以杀害岳飞，残酷镇压抗战派，向金称臣纳贡的代价，终于换得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至此，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最后确立。

第二节　对峙局面下的南宋社会

一、南宋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明显地超过了北方。魏晋以来，南方经济在相对稳定的状况下，持续发展。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公元1130年以后，金兵虽数次南下，但遭到南北方爱国军民的坚决阻击，未能再过长江，因而南方社会相对

①《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安定；北方人民不堪战乱和凌辱，大批南下，他们和南方人民一起，交流生产技术和经验，辛勤耕耘，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宋政府为了偏安江南，也在经济政策上做了某些改变，如安置流民、扩大耕地面积和鼓励海外贸易，以增加政府收入。再加南方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等因素，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业 南宋政府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使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大大超过了北方。太湖、鄱阳湖、练湖、鉴湖重新修复，受益农田很多。潭州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百万亩。福建农民使用水车引溪水上山，“龙骨”之声，处处闻耳。四川眉州通济堰修复，使“前日荒野，尽为沃壤”，①“流渠汤汤，声震四野，新秧勃然郁茂”。②

南宋时圩田面积增大。建康永丰圩950余顷。宣州宣城县有官圩17万亩，私圩58万亩，占全县垦田面积一半以上。太平州官私圩田占全州耕地面积9/10。太湖沿岸圩田相望无际。圩田水足土肥，因而旱涝保收，产量高。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能看到“木架田丘”随水浮沉（在木筏上铺土作蔬圃）。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上山开田层如阶梯，称“梯田”。浙东、淮东、江西有“沙田”。理宗时，建康府 5 县有沙田16.2万多亩。

水稻在南宋种植普遍，品种繁多。著名的占城稻更为普及，成为早籼稻主要品种。同时又培育出很多新品种，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有籼稻、粳稻140多种，糯稻50多种。由于品种优良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创宋最高纪录：上田可收六、七石，次者也收二、三石。所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语。

---

①《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岁末。

②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由于南迁北方人的需要和官府提倡，江浙湖湘闽广地区种小麦“不减淮北”。

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过长江，到了淮河流域。茶的栽种面积大大超过了北宋。棉花和茶都成为农业中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

手工业 纺织业仍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主要是丝、麻、棉。丝、麻织物年产量达1000万匹以上，超过了北宋。浙东、浙西、四川是南宋丝织业中心。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百张，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品种繁多，织锦精美无比。广西、四川是麻织业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邕州麻布作夏衣，名扬海内外。棉纺织业的兴起是手工业发展史上的大事。南方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发明了一套扞、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从此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被服原料。广东雷、化、廉三州最先发展棉纺织业，以后从两广、福建扩展到大江南北，成为重要的农村家庭手工业。

南宋地处东南沿海，中西陆路交通几乎断绝，海上交通特别重要，因而造船业发达。南宋时，大的海船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大海船可载几百人，积一年粮，还能在船上养猪、酿酒。这种巨型海船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近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南宋时的深水远洋货船残骸，有13个船舱，可载重200顿以上。车船制造很普遍。车船船身两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快速如飞，进退自如。明州、泉州是南宋造船业中心。

制瓷业在技术和规模上都有较大发展。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大发展，成为瓷业中心。所产瓷器有“饶玉之称”。①其中福建建窑

①《江西通志》卷93，《经政略·陶政》，引蒋祁《陶记》。

黑瓷，江浙龙泉青瓷都是瓷器中的上品。

其它如造纸、印刷、制茶及火器制造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

商业和城市　南宋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沿长江经鄂州可达四川；南通泉州、广州又可达琼州。向北，宋金虽划定疆界，但早已形成的南北经济联系从未割断。宋金设立官办的榷场贸易虽不断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时罢时复，但民间走私贸易却作为补充日渐昌盛。此外，南宋初年因财政困难，鼓励海外贸易，所以沿海地区经济和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宋的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繁华的商业经济中心。临安襟江抱湖，内有运河通航，外接海洋商舶。内商外船到临安，络绎不绝。据《梦粱录》记载：大街小巷铺面连门皆是，无虚空之位。酒楼、茶馆、勾栏瓦舍，诸行百市，应有尽有，买卖昼夜不绝。临安人口多达124万，已经超过北宋东京。此外，平江(今苏州)、镇江、建康、鄂州、成都等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是商业贸易中心。墟市比北宋更为普遍，仅广州一路就有墟市80个。①成都商业贸易繁盛。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到过南方，称临安（杭州）为“天城”，说它“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②又到成都，称之为西南大都会，“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这足以说明南宋城市经济可以荣耀世界。

南宋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三大贸易港口是广州、泉州、明州。高宗时，闽广两市舶司收入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额一倍多。其中大部分是广州市舶司赚得的。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南宋更盛。据绍兴十年纪录，广州市舶司当年税收110万贯。阿拉伯商人多侨居泉州。日本、高丽商人多在明州贸易。秀州华亭县的青龙镇、上海镇南宋时商业逐渐兴盛，都曾设过市舶司。

---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之二十一。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

南宋商人的足迹遍及20几国，和南宋通商的国家多达50多个。南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织品、印本书。日本输入中国的有木材、沙金、手工艺品。高丽输入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从南亚、阿拉伯各国输入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象牙、药材等。

二、南宋的腐朽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南宋历时150多年，基本国策是偏安江南。因此，大部分时间是主和派掌权，对金投降，对内镇压、掠夺。官场腐败，政治黑暗。

高宗任用的亲信宰相是黄潜善、秦桧、汤思退、万俟卨；孝宗一度虽想中兴，但大半生受制于太上皇高宗，无所作为；光宗骄奢淫逸，在位6年就被迫退位；宁宗时，虽有韩侂（tuo托）胄北伐，但很快为投降派史弥远刺杀；理宗时任用的宰相是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南宋的宰相从秦桧到贾似道，一个比一个贪暴。秦桧开门受贿，家中私产超过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几倍。贾似道和理宗终日以奢侈享乐为事。度宗朝，贾似道继续专权，专横跋扈，君臣互拜，百官都称他为周公。贾似道在西湖边大建楼台馆阁，日夜与美妻、娇妾、馆客寻欢作乐。军国大事在他家由馆客处理，他只签名而已，朝中大小事，非经他手不行。官吏争相纳贿，贪风大盛。度宗死时，元军已是大兵压境，南宋呈土崩瓦解之势，王朝政治黑暗腐朽达到了极点。

南宋的土地兼并和租赋盘剥超过北宋。宋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利用权势财力掀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南宋初期大将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理宗时，甚至出现占田万亩的特大地主。南宋租佃关系有所发展，但佃客人身依附比北宋加紧。荆湖等路的地主买卖土地时，随田转让佃客，强迫佃客为新主人佃耕。地主甚至将佃客计口立契，"或典或卖"，称"随田佃客"。有的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地主对佃客"许役其

身”。地主打死佃客，南宋规定减罪二等（北宋减一等），发配本州郡。佃户在法律上没有人身保障。

南宋国土减少将近一半，然而统治集团的挥霍惊人，军费、岁币不断增加，财政收入需要量大，孝宗时高达8000万贯。南宋规定夏秋二税，表面上变动不大，但附加税和巧立名目的新税十分沉重。数额超过正税。例如官府收税时，加收“耗米”每石白米收耗米一斗，再加上“带收钱”、“縻费钱”等，又用大斗征收。纳税一石，起码要高一石五、六斗，甚至三石。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大官僚地主依仗权势不交纳赋税，或勾结地方官吏逃避赋税，所以，在南宋出现了比北宋还要多的“无税之田”，“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广大下户自耕农和佃客自然是赋税的承担者，因此，“民众力困，饿死者众”。有的被迫逃亡，甚而“毁伤肢体”以避役。①

南宋统治者腐败和剥夺的残暴，使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士兵、茶贩、盐贩、少数民族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孝宗以后90年间，抗租乃至起义有百余次，几乎年年不断。其中主要有公元1175年的湖北茶贩赖文政起义；公元1208年的湖南郴州瑶族李元砺起义；公元1228年的江西赣州陈三枪、张魔王起义；公元1229年的福建汀州晏彪起义等。这些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南宋王朝的统治。

第三节　金统治下的北方社会

一、金统治中原和女真族的封建化

金太宗病逝，其弟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金太宗灭辽

①林季仲：《竹轩杂著》卷3．

后，又于公元1127年灭北宋。此后数年，金兵连年南下，在西到陕西，南到明州（今宁波）广大地区大肆焚掠。公元1130年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宋金形成一条临时分界线。金在中原的统治形势基本确立。

金太祖、太宗在短短的时间内占领了辽宋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在这个区域内，不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历史、风俗文化传统，如何巩固它的统治是金王朝的重大问题。落后的征服者往往为被征服者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所征服。金朝的奴隶制政权逐渐封建化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

金初是奴隶主贵族专政。金太祖建立勃极烈制度，其官长皆称勃极烈。有谙版勃极烈，“谙版”乃尊大之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表示高贵，“忽鲁”是总帅意思；乙室勃极烈……等。金都会宁府有乾元殿，殿外四周栽柳，殿内砌火炕，金朝皇帝和他的勃极烈就杂坐在炕上议政。这时的勃极烈制度，仍然带有部落贵族议事制的痕迹。金太宗时，明令宣布，在汉族地区推行辽、宋官制。金熙宗时又作出重大改革，统一内地和汉地官制，即废除女真族勃极烈制，采用唐、宋汉官制度。中央设三省，地方设路、府、州、县。

海陵王时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海陵王执政不久，在天德年间就尊孔为圣，创设国子监，招收女真宗室、外戚、功臣子嗣受教。1153年，海陵王把金朝都城从会宁迁到燕京，使中央政府脱离故土而迁到已经封建化的内地。迁都之后，海陵王对中央官制作了全面改革，废中书、门下省，留尚书省。设尚书令主持政务。废都元帅府，设枢密院，由枢密使、副使主管军事。总听命于皇帝，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强化。这就是所谓的“正隆官制”。金朝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海陵王以后的历朝金帝，不再有重大变革。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女

真人的封建化。金世宗继承了海陵王的事业，在他统治的近30年间，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

自海陵王到世宗，女真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逐渐为汉族封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所代替。金王朝的这个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先进的中原封建经济关系即封建租佃关系虽经过奴隶制战争的冲击，但不可逆转，而且日趋稳定和发展并日益成为主要的剥削方式。

金初，女真人的基本组织是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女真人从部落氏族向奴隶制转化时形成的特有的军政、兵民合一制度。女真人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生产，战时出征。作战时原来的部落酋长成为军事长官，称猛安谋克。金太祖起兵反辽，统一为300户称一谋克，10谋克为1猛安。初时，对被征服的军队，照猛安谋克进行编制，后来取消，主要行之于女真人内部。对辽、宋降军，照汉军编制。金熙宗时，为了解决土地不足和监视、镇压中原汉族人民的反抗，大量猛安谋克户南迁中原，计户授田，“棋布星列，散居四方”，①金统治者称之为“屯田军”。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女真人、契丹人和汉族人民朝夕相处，互相融合，他们讲汉话，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很快封建化了。猛安谋克这种组织也失去原有的作用。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不再使用奴隶耕种，而卖掉奴婢，把土地出租，“取租而已”。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也不再耕种，而是把土地租给汉人耕种，自己收租。这些民户所得无几，又挥霍无度，落入贫贱者日众。金世宗对这部分女真人曾下诏签入军籍，每月发给米钱优遇。以后，甚至下令规定女真人不耕种者杖60，谋克40。从太宗到世宗、章宗，也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放免二税户”。公元1204年，金章宗曾有“屯田户

---

①《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自耕”的诏令，表明女真屯田户也变成自耕农民，又有“诏免二税户为民”的规定。①这些事实说明奴隶制不断瓦解，租佃制在女真人中间迅猛发展，不可阻挡。其实，何止这些一般猛安谋克的女真人，女真人的上层官僚，称之为“官豪”的，也是“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②金兵南侵占田最多的是金皇族，所占地称“官田”，此时也由官府出租给农户，朝廷成为收租最多的大地主。

女真人在租佃关系的发展中日益封建化。大部分女真人，特别是女真奴隶主贵族都转化为封建地主了。

二、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女真人的封建化和宋、金战争的相对减少，以及世宗、章宗都能制定一些减免租税，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使金统治下的广大汉族、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能够进行比较正常的生产。所以在金熙宗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北方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冶铁业在东北地区有所发展，铁制农具广泛使用。女真族在建国前已经炼铁，但规模小，技术粗糙。金初，把掳掠到有“百工技艺”的汉人，有计划地安置在东北各地传授生产技术，因此，也使冶铁业在东北有明显的进步，黑龙江五道岭地区曾发现一处金朝中期完整的规模较大的冶铁基地。有矿坑十多个，最深达40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四周散布着50多处冶铁遗址。初步估计，从这里已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另外，在东北各地都发现有金朝的铁器。其中有大量的铁制农具，种类繁多，结构复杂，

①《金史·食货志一》。又：这里的二税户，与宋代交纳两税的农户不同，指的是金灭辽时，把辽代寺院中那些依附农民变成的奴隶。

②《金史·食货志》。

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或一致。这些农具的使用，表明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细的耕作。

黄河流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不平衡。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率先恢复发展。这些地方"人稠地窄"，竟是"寸土悉垦"。由于水田产量高，所以在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阳上等水田亩产高达5石。农业的恢复发展，使金粮食丰收。全国常平仓年积粟1200多万石，米200多万石。

其它手工业如制瓷、造纸、印刷、矿冶等都有恢复和发展。熙宗时，北方名窑如河南均窑，陕西耀州窑都陆续恢复生产，临汝、泗州等新兴瓷窑，工艺各具特色。山西稷山竹纸，平阳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雕版技术可与南宋临安媲美。

金时，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宋、金除官办榷场外，中都大兴府，南宋开封府，东京辽阳府等都是商旅集结之处，中都"锦绣绢绮，精绝天下"。商税额在章宗时高达21.4万多贯。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金朝不得不增大铜钱和交钞的发行量 。

三、金的残暴统治与红袄军起义

随着女真贵族的封建化，租佃制成为主要剥削方式。女真贵族掠夺土地日益严重。他们依仗权势抢占民田，多占、冒占官田。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政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世宗时派括地官到各地查收政府土地，称"括地"或"刷田"。括地官根据"皇后庄"、"太子务"、"长城"、"燕子城"一类地名，皆括为官地。一些百姓民田和小地主的土地都被强占，官豪之家反而得免。经过这样的括刷，连"茔墓井灶，悉为军有"，造成小民无田可耕，百姓土瘠税重的局面。

金时对人民的赋税剥削也是十分沉重的。赋税制度和辽、宋基本相同。除正税夏、秋二税外，仍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如：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黄河夫钱等。特别是物力钱

是根据每户私产价值征收的税钱。权势之家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困人家仅有很少财产，却负担很重的税钱。金朝的财政受到严重的影响。世宗时，以“均赋税”为名，实行“通检推排”，勘查民产。执行的官吏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如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残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申诉，立即严刑拷打，重者立死杖下。每次通检推排后，赋税大增。辽东税额原为6万余石，通检后变为20万石。1187年，全国物力钱高达300多万贯。

此外，金对南宋和北方鞑靼等族的连年战争，兵役徭役十分繁重。章宗时，政府财政困难，竟卖官鬻爵，贪风大长；滥发交钞，通货膨胀，对各族人民的剥削更为残酷。人民不堪其苦，反抗斗争日趋激烈。金宣宗为逃避蒙古贵族的侵掠，从中都(北京)迁都到开封。山东、河北乘势掀起大规模的红袄军农民起义。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红袄军起义。规模较大的有三支：鲁东杨安儿；鲁南刘二祖；鲁中李全。起义军都身穿红袄，因此称红袄军。

杨安儿声势很大，金莱阳、登州守城官员望风而降。杨安儿建立政权，设置官员，改元天顺。杨安儿在金重兵围剿下，乘舟入海，为叛徒所击，堕水而死。其妹杨妙真号四娘子，智勇双全，率余部与李全军合，继续抗金。

刘二祖起义后不久战死，余部为霍仪、彭义斌率领投归李全。李全在宋、金、蒙古统治者纷争复杂的情势下，先降宋，后降蒙古，终为宋军所杀。彭义斌反对李全的叛卖行为，在与蒙古兵作战时兵败被俘牺牲。

金末，以红袄军为主的各族人民起义连绵不断地打击着腐朽的金政权，金王朝已是穷途末路，危在旦夕了。

重要名词：

黄天荡　　八字军　　“陆耕水战”　　郾城大捷　　绍兴

和议　　猛安谋克　　金熙宗改革　　红袄军

思考题：

1．试评岳飞。

2．宋金对峙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3．简述南宋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

4．试述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表现。

5．略述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

6．简述金代的社会经济情况。

第十二章　元朝的大统一

（公元1271—1368年）

第一节　元朝的建立和统一中国

一、铁木真和蒙古政权的建立

蒙古族的兴起　蒙古族的祖先蒙古部落属于东胡语系中室韦的一支，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游牧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约在唐末逐渐迁徙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在斡难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三河源头的肯特山一带放牧，政治上先后受制于唐、辽、金等王朝。

在蒙古建国之前的北方草原上，生息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其中较大较强的有：塔塔儿部、蔑儿乞部、克烈部、蒙兀部以及操突厥语的乃蛮部和汪古部等，其中塔塔儿部曾一度最为强盛，因此草原各部也被统称为“鞑靼”，后来蒙古统一后，也统称蒙古。

蒙古各部大多以游牧为主，牧场和牲畜是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公元10世纪时蒙古各部的私有制有所发展，当时的牧场虽仍为“库伦”（氏族）所公有，但牲畜已经为“阿寅勒”（家庭）所私有。到了12世纪中期，随着汉族、契丹、女真、畏

兀儿等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的传入，蒙古各部的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最终产生了阶级。当时各游牧部落中的广大牧民称作“哈刺楚”，这是平民阶层；还有战争俘虏和因债务沦落成“孛斡勒”的奴隶阶层。在这两个有差别的劳动人民阶层之上，便是各级贵族阶层，通称为“那颜”。蒙古草原上各部之间的战争，就是在这种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为了掠夺奴隶、牲畜和牧场，各部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争斗，使得蒙古草原处于混乱局面之中。因此统一、团结、强盛逐渐成为蒙古各部人民的共同愿望。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成吉思汗（公元1162—1227年）名铁木真，出生于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的贵族家庭，其先祖俺巴孩和父亲也速该都是这一部落的首领，后来也都死于金王朝统治者挑拨分化政策下的各部争斗之中，加之金世宗时实行残酷的“减丁”剿杀政策，更使蒙古各部流离失所。铁木真就是在这样的战乱动荡中渡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艰难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的胆识和谋略，使他在后来的军事、政治中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智慧。

公元12世纪末，铁木真联合克烈部的王罕和札答兰部的札木合，先后战胜世敌蔑儿乞部和塔塔儿部。随后又与王罕合兵击败札木合，降服札答兰、弘吉剌诸部。公元1203年铁木真率部在斡难河畔击溃王罕军队，战胜克烈部。此后又迫使汪古、乃蛮诸部归顺，从而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各部贵族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①从此结束了蒙古长期的分散局面，建立了统一政权。为了加强统治、巩固统一，成吉思汗开始着手把蒙

①关于“成吉思汗”一词的涵义，有不同解释，诸如海洋、强大、诸汗之汗等说。

古建成一个强盛的军事奴隶制国家。

成吉思汗统一的政治措施 成吉思汗打破原来氏族部落的落后组织形式，施行领户分封制，即按地域以十、百、千、万为单位重新进行编制，并把这些地区和人户分封给大汗的亲戚和功臣作为封地的领户，这些人便成为蒙古社会中的新兴贵族，其身份和职位世袭。领户分封制下的各级组织既是军事单位，又是行政单位，平时生产，战时出征。

在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下，成吉思汗规定蒙古男子凡年龄在15岁以上，70岁以下者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平常除设立左、中、右三个万户军外，成吉思汗还专门从各级贵族和平民中选拔出身体强壮并怀有技能的人，组织成一支一万人的"怯薛"护卫亲军，其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

蒙古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语，创立蒙古文字；这对于发布行政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断案、提高蒙古人的文化素质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成吉思汗下令把民间的许多习惯法和自己历年的训言，使用蒙文记录成卷，编成蒙古第一部法典，称《大札撒》。同时设管理行政和刑法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为最高行政长官，专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

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原来流行于草原地区的原始巫教——萨满教，得到成吉思汗的承认和保护，萨满教中的巫师"别乞"在政治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二、夏、金的灭亡

第一次西征和灭西夏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在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后，便积极地开展了对外军事战争，其军事行动大体上南下和西征穿插配合进行。第一次西征和灭西夏的战役都是成吉思汗在位期间发动的。

蒙古的第一个战争目标自然是长期压迫他们的宗主国——金王朝，以及金的附庸国西夏。从公元1205年至1209年，蒙古连续发动三次对西夏的战争，最后西夏战败，纳贡请和。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伐金，兵破长城紫荆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献公主、金帛请和，蒙军撤退。此后，金朝被迫南迁国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蒙军乘机于次年占据中都。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门经略中原汉地，木华黎逐渐改变过去肆行杀掠、得地不守的作法，招降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掠地，把金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逐渐压缩到沿黄河一线的狭长地带。

公元1218年蒙军在伊犁河流域攻灭被乃蛮贵族屈出律所篡夺的西辽政权，又被中亚地区繁华的工商业所吸引，遂借口蒙古商队在花剌子模（中亚阿姆河下游古国）被劫杀，在成吉思汗统帅下发动了第一次西征战役(公元1219——1225年)。蒙军攻占了中亚和波斯大片领土，其前锋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进入东欧，在迦勒迦河打败斡罗斯诸国联军，把领土扩充到今中亚细亚地区。

公元1227年蒙古在西征回师途中乘势攻灭西夏国。成吉思汗也于同年 7 月病死在六盘山南麓的清水县。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的统一和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以及对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民族文化的提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虽然扫荡了欧、亚地区的一些腐败政权，加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总的来说这些战争都是带有侵略性质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给当时征服区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

灭金和第二次西征　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他在位期间（公元1229——1241年）发动了灭金和第二次西征战役。

窝阔台即位后，遵照父亲遗嘱联宋伐金，公元1233年蒙军攻

克汴京，金哀宗（完颜守绪）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次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哀宗自缢，金朝灭亡。

窝阔台灭金后，一面积极筹划进兵南宋，派军队攻荆襄、四川等地，一面又发动第二次西征（公元1235——1244年），委任长兄术赤的次子拔都为西征军统帅，在这次西征中蒙军占领钦察地区（今里海北部）和斡罗斯，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亚利）及奥地利等地，整个欧洲为之震动。1241年窝阔台暴死，次年死讯传至西征军营中，拔都闻讯率军东返，暂缓了对欧洲的攻势。

对南宋的包抄攻势和第三次西征　公元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立为大汗，不久便于公元1248年死去，在拔都拥戴下，推举成吉思汗由被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汗。蒙哥在位期间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对宋实行战略包抄和发动第三次西征。

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在经营中原事务中采用汉法，颇有成效，得到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公元1253年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哈台经甘肃、青海远征西南地区，攻灭云南的大理政权，迫使吐蕃归顺。公元1257年又迫使安南（今越南）投降，从而完成了对南宋从北到西南的包抄形势。

公元1258年蒙哥命忽必烈南下攻鄂州(今武昌)，兀良哈台自安南北上攻潭州(今长沙)，自己亲率大军沿嘉陵江南下攻四川。三路军马在南宋军民的抵抗下，军事进展很慢。其中蒙哥汗的大军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遭到猛烈反击，相持达半年之久。次年7月，正是四川雨季，蒙古军中痢疫盛行，患病极多，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城下被宋军流矢射中身死，各路蒙军闻讯，纷纷撤兵北返。

与南下攻势同时，蒙哥派他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为统帅，组织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公元1253—1259年)。这次西征攻灭了木剌夷国(今伊朗境内)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今伊拉克），并进入

叙利亚地区。1260年旭烈兀得知蒙哥死讯后，兵撤波斯，部分西征部队在今耶路撒冷一带被密昔尔（埃及）军队击败，第三次西征遂告结束。

四大汗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生前曾将他征服的地区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后两次西征，最后终于形成了蒙古四大汗国，即术赤和拔都父子建立起来的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统治区域约当今东欧和中亚一带；旭烈兀西征建立起来伊儿汗国，统治区域以波斯为主，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察合台汗国的地域约为阿姆河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窝阔台汗国的区域在阿尔泰山地区。

在三次西征中建立起来的蒙古汗国，地垮欧亚大陆，由于它是军事征服下的暂时联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分裂是必然的。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后来的元王朝，实际关系也是若即若离。

三、元朝建立和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忽必烈建立元朝 公元1260年初，忽必烈从鄂州赶回蒙古，3月在开平(今内蒙多伦附近)宣布即大汗位，建元中统，采用汉法治国。同时他的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称汗，于是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战争，最后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并于此年改元至元。1271年忽必烈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将政治中心由上都开平迁往中都燕京，又升中都为大都，大都又称“汗八里”，意即大汗之城。

襄樊保卫战 忽必烈在北方局势稳定后，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绕开四川，先拔襄樊，浮汉水入长江，顺流而下直捣临安的建议，把襄樊定作攻灭南宋的第一个战争目标。襄阳是汉江中游的

一个军事重镇，与樊城隔汉江相望，自汉代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公元1267年到1273年元军包围襄樊达6年之久，两城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守城的南宋军民在断绝外援的情况下，与元军进行殊死战斗，他们拆屋作柴烧，缝纸作衣穿，抗战决心毫不动摇。最后到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又切断襄阳和樊城间的联系通道汉水浮桥，使两城不能相互支援，并使用从中亚引进的先进攻城武器"回回炮"，集中兵力猛攻樊城，不久樊城失陷。2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开城降元。

临安的陷落 元军拔下襄樊后，公元1274年9月，伯颜率元军顺长江东下，这时南宋度宗死，恭帝赵㬎即位，年仅4岁，由谢太后摄政。奸相贾似道迫于战争形势和朝野压力，亲自督率诸路军马13万，号称百万，战舰2500艘迎击元军。由于贾似道怯敌求和，宋军士气低落，两军在池州(今安徽贵池)遭遇，宋军未战即溃，将兵甲器杖、船舰辎重尽行丢弃。1276年5月元军轻而易举进入临安，将恭帝、谢太后及宋室臣官僚俘虏北去，南宋政权名存实亡。

南宋的抵抗与灭亡 南宋军民在临安陷落后，仍在各地坚持抗击元军，以张珏为代表的四川地区军民顽强奋战；李庭芝、姜才指挥扬州保卫战；李芾坚守潭州；马暨率各族将士死守静江(今桂林)，都表现出了南宋军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抗元斗争中，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所拥立的端宗政权，斗争最为壮烈。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进士出身，曾积极组织抗元义军，临安被围时，他以右丞相身份被派往元营谈判时被扣留，后于镇江逃脱后，南下福建拥立赵昰为皇帝，就是端宗，继续抗元。公元1277年他率军入江西，收复许多失地，不久被元军击败，退入广东。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拒绝元军的诱降，书《过零丁洋》诗以

明其志，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次年被押送到大都，在那里被囚禁3年，屡次拒绝元朝的威胁利诱，最后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被杀害，时年47岁，他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为南宋人民的抗元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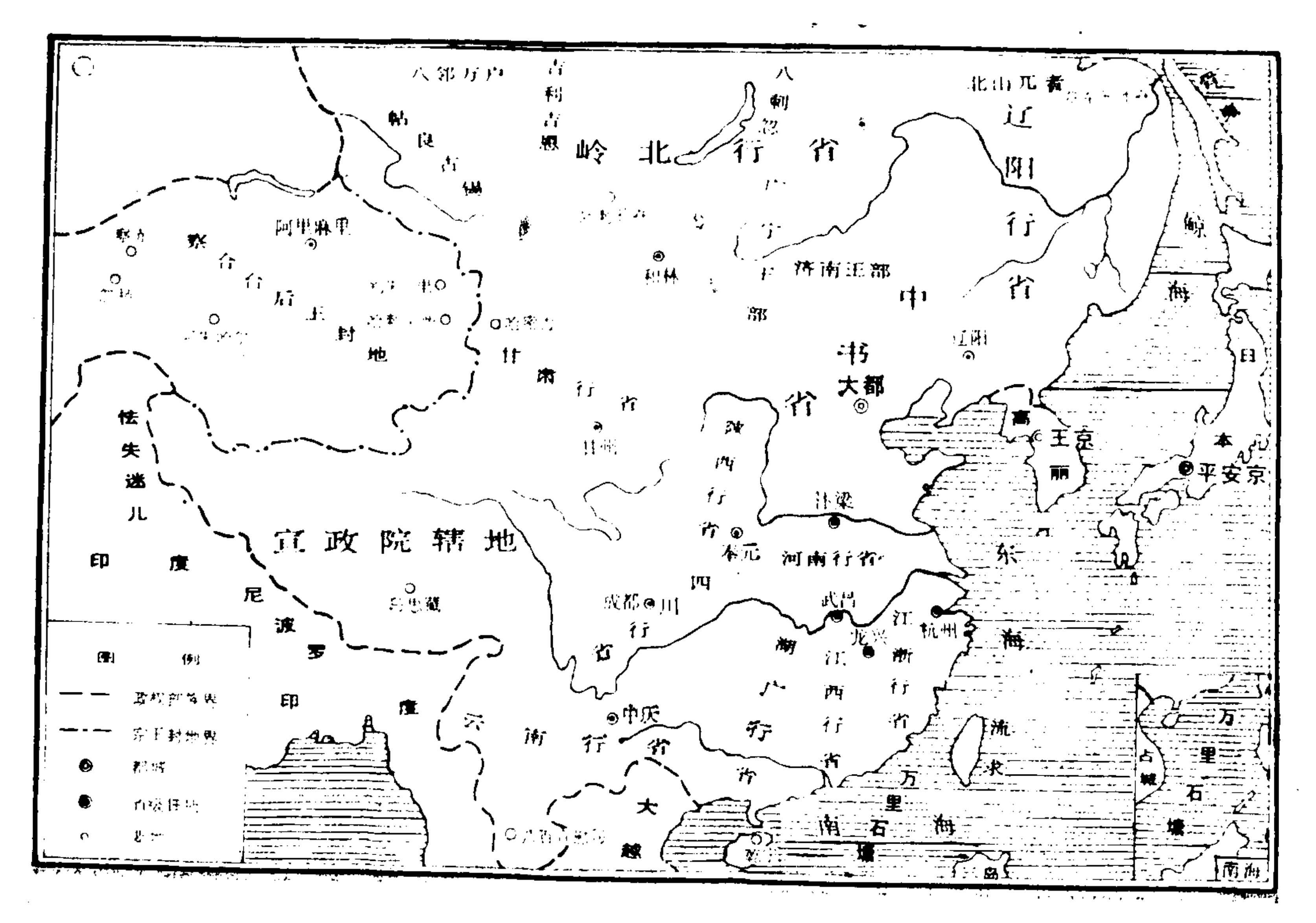
公元1278年在元军进攻下，端宗政权退守广东，次年端宗死后，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皇帝，坚守厓山(广东新会南海中小岛）。公元1279年元军集中兵力猛攻厓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殉国，军民从死者十余万人。张世杰突围后，遇大风舟船覆沉溺死。至此，南宋的抵抗力量被元军消灭，南宋灭亡。

四、元朝的疆域和大统一的历史意义

元朝的疆域 南宋灭亡以后，整个中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于统一。元朝的疆域版图比汉唐时期更为辽阔，其疆域东到东海，南及南海（含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西至今新疆；西南包括西藏和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正如史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

统一的历史意义 元朝的统一，首先是巩固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元王朝不仅加强了北方草原地区及西域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且把自唐宋以来就割据自立的西南地区也纳入了元朝的版图：中央专设宣政院，由吐蕃上层喇嘛任宣政使，负责管理西藏地区；在云南则设立行省加强管理。元王朝对东南沿海诸岛屿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把台湾划归福建行省，并

①《元史·地理志》。



岭北行省
辽阳行省
中书省
大都
辽阳
和林
济南王部
八部万户
吉利吉思
帖良古惕
阿里麻里
察合台后王封地
陕西行省
奉元
河南行省
汴梁
四川行省
成都
宣政院辖地
江浙行省
杭州
江西行省
龙兴
湖广行省
武昌
云南行省
中庆
高丽
王京
日本
平安京
东海
流求
万里长沙
万里石塘
南海
占城
安南
大越
缅
印度
怯失迷儿
尼波罗
图例
都城

元朝形势图

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直接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又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湖广行省管辖。

其次，加强了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元朝的统一为加强祖国各民族的交往，促进民族融合，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个时期，不仅蒙古民族自身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一些新民族的形成，其中以回族的形成最为典型。元代是我国回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蒙古在西征期间，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波斯、阿拉伯人进入中国，他们被统称为“回回”，①他们在中国定居后，经过长期同汉、蒙、维等民族的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蒙古统治区地跨欧亚大陆，从而打破了过去各地区政权相对封闭的状态，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得到迅速发展，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氛。各地政府的使团和民间的贸易商队络绎不绝的通过海路和陆路进出中国，他们把中国的科技文化带往西方，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也把当时西方科技文化的精华传入中国，尤其是阿拉伯文化中的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元王朝的统一，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元朝的统治政策和政治制度

忽必烈采用汉法　在蒙古南下进入中原的过程中，由于传统

①有人考释认为：“回回”系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回纥西迁后又回到中国，故名。

经济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统治和经济管理上，不免存在着蒙古传统和汉制两派，由于统辖范围多属汉族居住区，为了巩固政权，忽必烈主要以汉制作为统治手段，但也保留蒙古传统。

元王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是一位主张以汉法治国的政治家。1260年在他即汗位时就提出"祖述变通"、力行"文治"的政治纲领，①他在位时期，一方面对中央专制主义的政权改造建设工作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很重视，为此他制定了许多制度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巩固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 忽必烈因袭宋、金旧制，又结合蒙古自身情况，确立了元朝的官制。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主要是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

中书省是元朝的最高行政部门，设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及参议中书等职，名目繁多，统称丞相。表面上是"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②实际上是互相牵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掌管各项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负责军队的布防、兵籍、调遣等，设院使、副使领管。御史台是监察机构，设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职领管。此外还有院、监、寺、府等机构，其中较有特点的如：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事务；通政院，管理全国驿站交通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学校和道教事务。

行省制度 元王朝疆域辽阔，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最初曾设一些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机构，简称行省、行院、行台，这些措施起到了加强对地方管辖的作用。

---

①《元史·世祖本纪》。

②《元史·高鸣传》。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把行省作为地方一级的常设机构而固定下来。除大都附近的河北、山东、山西地区称“腹里”，直接归中央中书省管辖外，在全国其它地区分设河南、江西、浙江、湖广、陕西、甘肃、四川、辽阳、岭北、云南等行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总揽该地区政务，“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①行省遂成为最高地方行政区的名称而确定下来。行省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现对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行省制度历明、清两代，一直沿用至今。

达鲁花赤 元朝地方行政机构行省以下，基本承袭宋、金旧制，设置路、府、州、县，对这些各级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最高长官统称“达鲁花赤”（蒙语“镇守者”之意），一般由蒙古人担任，以保证蒙古统治者对全国行政实行监控的权力。同时又以汉人为总管、知府、知州和知县，以色目人为同知，使他们互相牵制监督，以加强民族防范和阶级统治。

元朝的军制和驻防 元朝的军事防卫分为两个系统，即戍守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是由蒙古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隶属枢密院。镇戍军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组成，其中探马赤军是木华黎镇戍中原地区时组建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参以色目人和汉人；汉军是灭金后改编的以北方汉人为主的军队；新附军是改编的南宋降军。镇戍军的驻防大体是：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主要戍守腹里地区，另外在华北、陕西、四川、东北各地分设蒙古军都元帅府，集中驻防，以利于监督和镇压。在南方地区的镇戍则以汉军和新附军为主。镇戍军平常受驻地行省管辖，但在战时或调遣换防间

①《元史·百官志》。

题上仍受中央枢密院的节制。

驿站 为了加强中央和地方间的联系，元王朝在全国各地遍设驿站，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国家签发民户为驿卒，将其户籍独立编制，称站户，也叫站赤。专门为过驿站的人员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当时的驿站有使用马、牛、狗等牲畜引车的陆站，和使船航运的水站。后来还设置过海站。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负责传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急文书。元代的驿站共有1400余处，以大都为中心，驿道辐射向全国各地。对元王朝"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驿站制度使元朝普天之下"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法律 元朝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断狱量刑主要根据以往案例，类推比附定刑，其司法的随意性较明显；行政立法也都是以诏制政令为依据。元朝政府曾把历年颁布的诏制、政令加以汇总，予以公布，象《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都属于这类性质的政书。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出，元朝法律带有明显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色彩。

宗教 蒙古政权和元王朝的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是因为蒙古的统治地域辽阔，统治区内的民族成份复杂，风俗和信仰各异，对各种宗教的优容礼遇，可以使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得以稳固自身的统治。元朝统治时期，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藏传佛教（喇嘛教）备受统治者青睐，这和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备受忽必烈推崇有关，他先后受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和吐蕃地区，并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在他的影响下，蒙古人大多都皈依了喇嘛教。道教的地位在元代仅次于佛教，成吉思汗曾在西征行营中召见道教全真教首领丘处机（号长春真

---

①《元史·兵志·站赤》。

人），其弟子李志常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记其事。此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也较流行，伊斯兰教徒在元代称为“答失蛮”，基督教徒称为“也里可温”。

二、元朝的社会经济

官地牧场的增加 元朝官地的数额很大，其中大部分是凭借军事或政治手段占据的大量无主荒地和侵夺的有主民田。官地的经营方式，在江淮以北多为屯田，在江南则多以宋代的皇庄形式，募民佃种。因此元朝皇帝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早在蒙古南下之初，就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空其人以为牧地”。①后来元王朝在中原地区开辟了很多牧场，除政府外，就连军队和各王公贵族也都纷纷圈占民田以作牧场。忽必烈时，赵天麟曾上疏：“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②这对于中原农业经济自然是一种人为的破坏。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蒙古入主中原后，原来社会上的土地兼并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趋激烈。元代的土地高度集中在贵族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普通民间地主的手中，他们占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元代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采取一般经济手段兼并土地外，其中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寺院地主更是凭借政治特权，强行霸占民间土地。此外他们还可通过皇帝的额外赏赐获得大量土地，这种赏赐数额有时是相当惊人的，如元顺帝时给大承天护圣寺（在今北京城西）一次赏赐田达16万2490顷。③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还控制着大量劳动人手，如佃户、工匠和驱口等。有些人还垄断了当地的山林、交通、盐铁之利，经营

①《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续文献通考》卷1。
③《元史·顺帝纪》。

商业、当铺等，身兼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重身份。他们与官府勾结，欺压剥削百姓，造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元初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忽必烈在位期间，在经济上曾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在政府机构中先后设置了劝农司、司农司、行大司农司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他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圈农田为牧场；招集流散逃亡人众，鼓励垦荒生产；减免灾区租税，赈济灾民等。他还派人编写《农桑辑要》，并向全国颁发，用以指导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技术和农业产量。

忽必烈对兴修水利事业也非常关注，中央设都水监和河渠司专管这些事务。他起用科学家郭守敬主管全国水利，疏浚河道，开凿运河，不仅对沿河农田灌溉有利，而且又便利了交通和漕运事业的发展。

边疆地区的开发 忽必烈对经济生产较落后的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也很重视，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把内地汉人迁徙或流放到这些地区，以军民屯田形式组织生产，通过这些人把中原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农具种子推广到边疆地区，使这些地区的农业从无到有，得到改进和提高。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也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在边疆地区的开发中，以刘好礼在吉利吉思（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哈剌合孙在漠北称海，赛典赤在云南滇池、洱海一带推行的屯田成绩尤其显著。

农业 农业在元代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元朝由于战火的破坏，农业曾一度萧条凋蔽。全国统一后，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以受战火摧残最烈的河南、两淮地区为例，到元代中期这里已分别是“民生日集，丛榛灌莽尽化膏沃”；①“烟火相望，鸡犬之声达乎四境，桑麻被野”。②

---

①《元文类》卷17。

②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

元代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仍领先于北方，每亩通常产量二、三石，有的地区达五、六石，尤其是江浙地区，每年税粮450万石，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成为全国的主要产粮区。在农作物品种的栽培方面，棉花种植由原来的闽、广地区向江南及北方地区推广普及。

手工业 手工业是元代社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元统治者十分重视手工业，用以满足各级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急需。

元代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远远超过以前各朝代，除政府经营外，连诸王公贵族名下也有手工业局、院。在官营作坊中从事生产的工匠，大多来自战争俘虏或来自政府向民间的强行征括，他们被编入匠籍户册，没有人身自由，子孙相袭，处于工奴地位。这种生产关系压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限制了生产效率和技术的提高。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生产原料，大多是以征调、和买等名义，廉价从民间搜刮而来的。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由于受到官府压制，不能充分发展，但因为生产者的身份相对自由，生产积极性较高，因而有些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也都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尤以棉纺业发展最为突出。

纺棉织布在元代成为江南农村普遍的家庭副业，这与黄道婆推广棉纺织技术的事迹是分不开的。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县)人，少年时期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学得棉花的纺织技术，约于元成宗时返回家乡。她对轧车、弹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进行技术改进，尤其是把过去的手摇式单绽纺车，改进成脚踏式三绽纺车，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她还使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提高棉织品的质量，丰富花色品种。黄道婆把这些生产技术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家乡人民，史载“人既受教，竞相作为”，①松江不久便成为全国棉

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

花纺织业的中心，周围苏、杭等地的棉纺织业，也由此发展起来。后来松江人民在乌泥泾立了一座“先棉祠”，岁时祭祀不断，以缅怀这位在历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劳动妇女。

商业 元代的商业活动很活跃，但这时期的海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官府、贵族、官僚和色目商人手里。在宋代纸币基础上，元朝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中统交钞”、“至元宝钞”等纸币，在使用初期，对统一币制，活跃商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统治者大肆滥发纸币，以此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形成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危机。

由于政府垄断商业贸易及货币经济的恶性发展，便产生了元代商品经济中所特有的现象——“斡脱”，也就是专门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斡脱”原是中亚地区的一种专放高利贷的团伙组织，蒙古统治者在征服这些地区后，便利用这些人（多为色目人）来为自己经商。元政府为他们专立户籍，设置办事机构（斡脱总管府、斡脱所），这些官商领有皇家颁发的令旨和驿券，可以自由来往于全国各地。他们不纳商税，不服差役，受到各种政治、经济上的优待。他们除了进行一般的商业贸易外，主要是以放高利贷的手段来盘剥人民。他们放贷利息很高，当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相加再翻一倍，一锭银子的本钱，10年之后就是1024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羊羔儿息”，这些高利贷的收入遂成为元代官府和王公贵族的重要财富来源。斡脱商人也在替官府、贵族的经商活动中，假公济私，乘机大发横财。

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在元代不仅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同时又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出现了一些新兴城镇。

中西交通的畅通 元朝时期对外关系空前活跃，当时的中西往来是靠陆路和海路来沟通的。

陆路分南北两路。北路是经天山北路，过中亚，到克里木半

岛，此路又称钦察道；南路是经天山南路，过伊朗，到土耳其，又称波斯道。这两条路主要是为了保持与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的联系，元政府非常重视对这些商路的保护，使其得以安全畅通。

元朝首先开辟近海航运线，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物资交流，减轻内河漕运负担。在对外贸易联系上，元代的海路则能远航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可直达非洲东、北岸。为促进海外贸易，元政府又在沿海一些城市，如泉州、温州、杭州、广州等口岸设置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

中外文化交流 元朝时期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大超过了前代，许多人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元丞相孛罗出使伊儿汗国时带去了中国的钞法，波斯人扎马鲁丁把波斯和阿拉伯天文历法带入中国，汉人周达观游历中南半岛后撰写《真腊风土记》，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为元大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另外还有汉人汪大渊两度泛舟漂海，游踪远到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归国后著《岛夷志略》；非洲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东来中国，归国后著《伊本·白图泰游记》。在旅行家中最闻名于世的，还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1275年随父亲、叔叔经陆路东来中国，在开平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被留任元朝官职，多次奉命出使各地。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1295年又经海路返回家乡，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根据他本人的口述，由鲁斯蒂谦记录，写出了不朽的《马可·波罗游记》。该书的传播增进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三、民族歧视政策和阶级压迫

四等人的划分 元朝统治阶级为保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和维护对人口众多的汉族区域的统治，进一步推行民族分化政策，根据

民族的不同以及征服的先后次序，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①汉人、南人四等。其中色目人指除蒙古人以外的西北各族人（包括中亚、欧洲民族在内），包括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吐蕃等民族；汉人指原金王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族，还包括云南、四川和高丽人在内；南人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

元代四等人在政治、经济、法律上的地位和待遇都是不平等的。政治上，国家各级重要的官职和军职，均由蒙古人、色目人充任，汉人、南人通常只能充任副职。法律上，蒙古人犯法归大宗正府审理，汉、南人犯法则归刑部审理；甚至明文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在经济上，政府向民间的征敛，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而汉人、南人则全取。为了防止汉、南人的反抗，又规定他们不得打猎、习武，不得私藏兵器，甚至禁止民间的祈神赛社活动和演唱戏文评说，在夜间实行宵禁等，以防止他们聚众闹事。四等人的划分，是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体现，反映了统治阶层中守旧贵族势力的强大和所谓“汉化”政策的局限性，这种政策的推行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激化。

阶级压迫 元代民族划分等级的现象，仍然掩盖不了阶级压迫的实质。在元代，蒙古族中的广大下层人民，仍然过着困苦的生活，甚至达到卖儿鬻女为奴婢的地步，其中有的被贩卖到海外，对此元王朝虽然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从这些诏旨刑律中却反映出这些现象在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存在。元代汉、南人中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仍过着剥削生活，其中有的在政治上依然受到重视，并且握有一定实权。如：汉人中的史天泽、张柔、董俊投靠蒙古，靠军功起家，受到元朝的优厚待遇。叶李、贺惟一（太

①“色目”源于前代的“各色名目”，色目人即一般指西域人或回回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族人和在中国的西亚各族人。

平）、危素等也在元朝官居高位。由此可见元王朝的统治集团是由蒙古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汉族大地主联合组成的，元朝政权的实质，仍然是蒙、汉地主阶级对广大各族劳动人民的封建统治。

在元代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是因战争掳掠、债务抵押、贫困卖身以及犯罪等原因而沦为驱口身份的。驱口在元代有官、私之分，官府所有的驱口大多是手工业工匠；私人拥有的驱口除用于家内服役外，大量用于农业生产。驱口世代相袭，可以被主人自由买卖。元代驱口数量相当多，一个中等官员往往就有数十甚至上百名驱口，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就拥有7千多驱口。

在元代的劳动人民阶层中，人数最多的还是佃户，他们承担着社会生产的主要任务。元代佃户也分官、私两种，分别承受国家和地主的地租剥削，这时期的租率一般是五、六成，高的达七、八成。元代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有的地主向佃户勒索鸡、鸭等实物，有的干预佃户及其子女的婚姻，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随土地转让出卖，有的地主甚至还私设刑堂，殴伤致残佃户。因此佃户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在元代日趋尖锐激烈，佃户抗租、夺粮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经济剥削 元朝的赋役制度，江南和北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元政府在北方地区征税是以科差为主，税粮为副；在南方则是以两税为主，科差为副，总起来看，江南地区的赋税征收要重于北方地区。

在北方地区征收的税粮科差，其大体内容是：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两项，丁税是每丁200，地税大体是每亩3升。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官府，叫“系官丝”或“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本位（受封于当地的食封贵族），叫“五户丝”。包银规定每户交银四两。俸钞

规定上户每年纳银一两，以作官府支付官吏的俸禄钱。在江南地区征收的夏、秋两税，其税额数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间的差别也较大。以上正税之外还设有各种名目的杂税和勒索，如：盐、茶、酒等税以及强买民间马匹的“括马”，以廉价强购民物的“和买”，强派劳役的“和雇”等。农民除负担这些沉重的赋税剥削外，还要承担兵役和各种劳役，诸如筑城、开河、运输、开矿等。

在元代除了一些大官僚地主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外，其他的地主也都以种种方法逃避国家赋税，把税役负担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农民头上，使农民的实际负担要比规定的数量超过许多倍，给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许多农民因交不起租税，被迫借高利贷，最终弄得家破人亡。

第三节　红巾军大起义

一、元末的腐朽统治和社会矛盾

政治黑暗　元朝自成宗以后，争夺皇位和权利的斗争持续不断，仅在1308到1333年间，就先后更换了8个皇帝。这种夺权斗争往往把整个统治集团的成员都裹胁进去，造成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动荡。这些皇帝又大多不理朝政，只图个人享受，大肆挥霍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权往往落于贵族权臣之手，他们把持朝政，横行无忌，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元武宗把官职当礼物赠送，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不经中书省而直接赠予官职的就有880余人。到顺帝时，权臣伯颜更是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元朝各级政府官吏的贪脏枉法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政治黑暗腐朽到了极点。

军队腐化　元末军队的腐化几乎达到丧失战斗力的地步。就

连最精锐的怯薛军也是白天宿卫，晚上抢劫。地方上的镇戍军更是不习武事，贪图享受，官兵“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①元顺帝时，集庆路（南京）的花山地方，有以毕四为首的36人起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万余名官兵。

财政危机 元朝中后期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是相当惊人的。皇帝对大臣的不时赏赐，金银钞币往往在几十万锭以上，土地达千万顷之多。武帝即位时，政府年财政收入为280万锭银，他登基5个月就花去420万锭，次年的开支又是820万锭，其中用于“作佛事”的开支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延袭了几代皇帝，造成元政府的严重财政危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除了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外，便是滥发纸币。元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政府发行“至正宝钞，”大量印行的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元世祖时的千文钱，50年后只抵40文，物价飞涨40倍。钞法败坏使得社会经济更加紊乱不堪。

自然灾害 元末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如公元1329年陕西久旱不雨，诸路饥民达120多万；公元1333年京畿暴雨成灾，饥民达40万；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和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两度在山东、河南决堤，两岸人民被淹，大批难民无家可归。大水之后又是大旱和瘟疫流行，使得无数灾民被夺去生命。在这样的情势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风暴即将来临。

二、红巾军起义

白莲教 由于元朝统治阶级对人民采取严加防范、监督的政策，所以元末的农民起义大多是利用宗教作掩护，来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的，其中以白莲教和弥勒教所起的作用最大。白莲教是

---

①叶子奇《草木子》卷3。

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始创于南宋，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因其教义浅显易行，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元初统治者也曾予以提倡，后因白莲教徒宣扬明王出世，屡次参与民间的抗元活动，被元政府明令禁止，白莲教的活动遂转入地下。弥勒教也属于佛教净土宗，宣扬弥勒转世，光明战胜黑暗等教义。两教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逐渐随斗争形势而合流。

北方地区的红巾军起义 北方红巾军的组织和发动者是韩山童和刘福通，他们利用白莲教在民间吸引群众，宣传反元复宋。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政府调集15万民伕治理黄河，刘福通等利用这次集中的机会，预先将一个雕刻好的独眼石人埋在治河工地上，然后到处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石人被挖出后，民伕们群情激动，大起义一触即发。但由于事机泄露，元军包围了起事地点颍州颍上，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众突围后，袭占颍州城（今安徽阜阳）。当地民众和挖河民伕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迅速壮大，接连攻下周围州县，他们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或"红巾军"，又因聚众烧香礼佛，又被称为"香军"。

宋政权的建立和北伐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安徽亳县）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沿袭元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刘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北伐，东路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攻大都，京师为之震动，但后来受挫，退返山东；中路由破头潘、关先生率领，由山西转攻河北，于次年底绕道塞北攻占上都，后又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大刀敖、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由荆襄出武关，进攻长安，再攻四川、甘肃等地。在三路出击后，刘福通自率大军于公元1358年攻克汴梁（今河南开封），然后接韩林儿迁都于此。这时红巾军起义进入鼎盛时期。

南方地区的红巾军起义　南方地区红巾军的主力是以徐寿辉与彭莹玉为首发动组建的，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8月，他们在湖北蕲、黄一带发动起义，10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徐寿辉在此称帝，国号“天完”（大字上加“一”，元字上加“宀”，意在压倒大元），年号治平，建立了南方红巾军政权。1353年彭莹玉在瑞州（今江西高安）牺牲，不久蕲水失陷。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天完政权迁到汉阳后，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部将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杀害徐寿辉后，在武昌称帝，建立汉政权。次年，徐寿辉的另一部将明玉珍也在重庆称帝，建立了夏政权。南方红巾军由于内部的分裂和分化，大大削弱和分散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响应红巾军起义的还有：布王三在公元1351年于南阳发动的起义，亦称“北锁红军”；孟海马于次年在襄阳发动的起义，亦称“南锁红军”；以及同年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发动的起义等。

此外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起义，有公元1348年在浙江沿海起兵的方国珍和1352年在江苏起兵的张士诚，他们在初起时，也曾给元军以打击，尤其是张士诚于公元1354年在高邮城下，击溃号称百万的元军，客观上支持了其它各地的起义军。但是方国珍和张士诚后来又都投降元朝，逐渐成为地方上的封建割据势力。

三、朱元璋势力的壮大

朱元璋的崛起　朱元璋（公元1319—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郭子兴红巾军，因作战机智英勇，渐得提拔和重用。郭子兴死后，他成为这支部队的首领，被韩林儿任命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在政治上军事上很有谋略，他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取得很大的成功。至正十六年（1356年），

他率军攻克集庆（今南京）后，改集庆为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并以应天为根据地，向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发展势力。他接受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①的建议，在占领区内兴办屯田，发展生产以解决粮食和财政问题；在政治上仍奉韩林儿为王，以龙凤纪年；他同时还注意延纳人才。

这时，随着北方红巾军三路北伐的失利，形势逆转直下。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军攻陷汴梁，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出奔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遭张士诚部的偷袭，刘福通牺牲，朱元璋率军将韩林儿挟至滁州（今安徽滁县）。

统一江南 朱元璋在巩固自己统治区域后，针对当时江南地区的割据形势，首先集中兵力解决上游势力最强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打败并击毙了陈友谅，次年兵临武昌城下，陈友谅子陈理出降，汉亡。朱元璋然后掉头来解决下游地区的张士诚。其战略方针是先取江北，再取浙江，最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围陷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被俘后自缢而死。同年底，方国珍在朱元璋军水陆合围下，被迫投降。至此，朱元璋已拥有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和长江中下游富庶的地区，具备了推翻元朝和统一全国的实力。

在江南用兵的过程中，朱元璋随着自身的势力的不断扩展，在大批地主儒士的影响下，个人的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逐渐背离了农民起义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就公开咒骂白莲教是“妖术”、“妖言”，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②同年底，他又派人以接韩林儿至应天为名，将其沉死于瓜步（今江苏六合南）江中，至此红巾军建立的宋政权结束。

明朝建立与元朝灭亡 这时北方元王朝的政治更加腐败，靠

①《明史·朱升传》。
②祝允明《野记》。

着镇压红巾军起家的几支地主武装集团势力，演变成为新军阀，他们和朝内贵族官僚互相勾结、利用，争权夺利，加剧了政局和社会动乱。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率军25万，开始北伐。朱元璋同时申明军纪，又发布了讨元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①的口号。第二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北伐军先取山东，又旋师取河南，扼守潼关，使西北元军不得东援，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大都，元顺帝闻风逃至上都开平。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日，明军进入大都城，这标志着元王朝被正式推翻（元顺帝北走塞外后的元朝，史称“北元”）。此后又陆续收复了陕西、福建、两广、四川、云南等地区，直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军平定辽东，朱元璋才实现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四、元末农民起义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各部队的分散作战，缺乏统一的号令和相互之间的配合，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根据地，再加上内部不断的矛盾和分裂，终于在元朝统治阶级的镇压和内部的分化瓦解下失败了。

元末农民起义的特点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使得元末农民起义具有以下的特点。从起义的发动形式上看，由于元朝的高压政策，农民起义开始不得不利用宗教，作为宣传组织群众的手段，白莲教、弥勒教就是这一斗争的工具；从起义的历史根源上看，元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元末农民起义军肩负着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任务；从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上

①《明实录》卷21。

看，元末农民起义持续16年之久，活动地域遍及黄河、长江，影响波及全国；从起义的组织形式看，北方和南方红巾军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对于有效地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起了积极作用。

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元末农民起义摧垮了元朝的腐朽统治，打击了元朝的阶级基础——蒙、汉地主阶级，从而缓解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而引起的尖锐紧张的阶级矛盾。同时，对元代一些落后的生产关系，也起了某种程度的调整作用，大批的驱口得到解放，佃农、手工业工匠等劳动者的地位也有所改善，为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元末农民起义在客观上起到了鼓舞和支持其它各蒙古汗国中人民的反抗斗争，在世界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节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与宗教

宋代的理学 两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理学也称道学，它是在改造传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思想一些观点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两宋时期的理学家很多，其中有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人者。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是理学的开山祖。他认为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变化，其根源均是“太极”。由“太极”的动和静产生出阴和阳二气，阴和阳的交互作用而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它们的互相推移转变，产生出人和万物。这本来有朴素的唯物和辩证法因素，但是，周敦颐所说的“太极”并不是物质，而

是超越物质的一种精神。他认为"太极本无极"，"有生于无"，"无极"才是宇宙的根源。在周敦颐看来，太极是万物运动的推动者。由此可见，周敦颐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周敦颐还认为封建道德范畴的"诚"是一种"纯粹至善"的境界，它来源于万物所由开始的"乾元"，又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本，百行之源"，从而证明封建道德是先验的，最合理的。他要人们通过"纯心"、"慎动"、"主静"、"无欲"等内省功夫，以达到"诚"这一最高境界，实际上是要人们安分守己，不要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放弃改善生活的要求。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程颐（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二人是亲兄弟，河南洛阳人，同受业于周敦颐，都是北宋唯心主义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程颢、程颐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道）或"天理"。这个"理"，无形、无声、无臭，无所不在，凌驾于万物之上，先于万物而存在，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永恒存在。二程认为"天下物皆可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①一物之理又是万物之理。"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他们用"理"来解释自然界；认为"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是第一性的，物质的气是从属于理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们用"理"来解释封建统治秩序，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②是万古长存的天理。人们的行动如果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就是伤天害理。因此他们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要人们放弃求生欲望，安于贫困，忍受剥削，去顺从封建统治的"天理"。为了保存"天理"，程颐甚至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残害妇女的封建教条。

---

①《二程遗书》卷18。
②《二程遗书》卷5。

程颢、程颐的言论和著作，后人编为《二程全书》。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子以后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朱熹认为宇宙间有两种东西，就是“理”和“气”。“理”是精神，“气”是物质。在二者关系上，他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永恒的、独立于客观事物而存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气则是第二性的，气依理而存在。

朱熹认为理是“超然于万有之上，广大无边”；理充塞于宇宙，无处不在。他把封建道德纲常与“理”相联系。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其意说明“三纲五常”是先天就有的，是天理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叫人们绝对服从，以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朱熹还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否则就会在行为上违背封建道德。朱熹宣扬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朱熹的学说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明清时期他的学说特别受到推崇，其《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朱熹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著述很多，除《四书章句集注》外，还有《周易本义》、《通鉴纲目》，后人把他的著作编成《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陆九渊（公元1139——1192年），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他认为作为精神、意识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是“心”这面镜子中的“花”。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①他不承认人心之外有物质世

①《象山先生全集》卷22《杂说》。

界，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心的产物。陆九渊还把孟子的仁、义、礼、智说成是人人固有的“本心”。他认为世间所以“乱”，是人们不明“本心”的缘故。为此，他主张“格心”，特别强调“明本心”，使自己心地清明，摒除私欲，这样就可达到“天心归心”。可见陆九渊的心学最终目的和朱熹一样，也是要人民安于忍受封建剥削的现状，放弃反抗斗争。

两宋时期，在朱熹、陆九渊的唯心主义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张载、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家。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因讲学关中，其所创学派称为“关学”。他虽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世界观有较多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天空）即气”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性的“气”，由于气的变化运动，形成了万物，而气的变化运动，则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气只有聚和散，而没有生和灭。他反对佛家和老子的虚无主义思想，批评当时流行的“灵魂不死”的谬论，认为人的生死是气聚和散造成的。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他认为事物变化有普遍规律与个别规律，分别命名为“道”与“理”。他还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即“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但张载把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运用于人类社会，说明人性问题时，则又产生谬误，他认为气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他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人在未形成之前，早已有天地之性，它是天地之气所固有的，先天至善的东西；“气质之性”是气聚成了人的形体之后才有的，它是后天的，并有善有恶。因此，他主张把“气质之性”返回到“天地之性”。这样，张载在社会观上从唯物主义又滑向了唯心主义。

陈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

永康县）人。他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①提出了“道在物中”的观点。就是说，任何道理或法则，都不能离开具体的事物。因此他主张要“因事作则”，即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去探索事物的规律或法则。陈亮还讲求“务实”，他认为行“道”就是要做到“无一民不安，无一物不养”，这才叫行道有功。他主张多研究有实用价值的学问，首先是研究富国强兵、报仇雪耻（指抗金）的学问，反对理学的空谈心性。

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他也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②有“物”的存在，才有“道”的存在。“道”不能离开“物”，“道”是依存于物的。叶适认为所有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和对立统一。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乃是由于事物内部有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认为仁义应表现在功利上，与功利相结合，否则就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

宗教 五代时，佛教的禅宗分为南岳派（又分临济、沩仰二宗）和青原派（又分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宋初，禅宗五宗并盛。宋真宗时编写的《景德传灯录》30卷是最早的一部禅宗史。佛教对宋代理学影响极大，可以说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儒内佛的。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景德传灯录》写成的。元代重佛教，特别尊重喇嘛，喇嘛信奉密宗。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

佛教早有藏经，自五代雕刻《九经》以后，到宋代，官刻、私刻的藏经共有五种版本。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依《开元释教录》所载藏经（1076部，5048卷），次第刊行，为刊印全部藏经之始，至今，蜀版被视为

①《陈亮集》卷10《经书发题》。

②《叶适集·水心别集》卷5《进卷·诗》。

世界珍品。辽金元时亦刻印藏经，宋元藏经约有七八种。大藏经的刊印，不仅是研究佛教的宝贵资料，也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

宋朝时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极其兴盛。宋真宗就非常尊崇道教，他曾利用道教，伪造所谓天书受命。宋徽宗更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把《汉书·古今人表》上原来列在第四等的老子，提升到第一等。当时在全国遍设道教宫观，一些教主被列为封建朝廷顾问，有的甚至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势极显赫。北宋还大力整顿道教文献。宋真宗命王钦若主编道教经典，赐名《宝文统录》，后由张君房增修，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凡4565卷。宋徽宗时增至5481卷，称《政和万寿藏经》，雕版印行，为藏经刊印之始。后来金、元各藏经均以之为蓝本。《道藏》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庞杂的书，它不仅是道教的文献总汇，而且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科技史及文化史的珍贵文献。

宋南渡后以至金、元，道教分为正一教、全真教、大道教（也称真大道教）、太一教四派。正一教是宋以前道教的旧派，也称天师道，是由东汉张道陵所创立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在南方流传最广。在北方出现的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它们都是北宋遗民在金人统治下，隐居不仕逐渐聚徒讲道而成的。元朝对道教四派兼容并蓄，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全真教教祖王喆的弟子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尊崇，元并江南后，正一教的张天师也被召入京城。

宋元时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祆教、（也称拜火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随着西域人的东来，也都有流传。

二、史学

通史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所编著。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

西夏县）涑水乡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从小就喜爱历史，"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编书的目的，一是想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历代史籍浩繁，统治者和学者都难以遍览的矛盾；二是为了"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①他写《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有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他们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历时19年完成。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赐名《资治通鉴》。这部书记述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1362年的史事。各王朝的治乱兴衰，按年编次，全书共300多万字，294卷。为了便于翻检又撰写了《资治通鉴目录》。为了明去取，别异同，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

《资治通鉴》取材广泛，考证严谨，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还征引杂史诸书320家。该书文笔生动，确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优秀编年体通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它是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籍。但由于《资治通鉴》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戒鉴的，故全书详于政治、军事，对于经济、文化则记载很少。

《资治通鉴》自宋元以来，一直为封建史学家所推崇，其体例成为后代许多编年史的典范。南宋仿《通鉴》体例的史学著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历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南宋高宗朝史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徽、钦、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这三部书材料内容非常广泛，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纪传两种。南宋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事件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从而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开创了我国史书中纪事本末体

---

①《谢赐〈通鉴·序〉表》第510。

的先例。

宋元时期的《通志》和《文献通考》，都是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著作。南宋郑樵的《通志》其精华所在，是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20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宋末元初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所记更为完备。这两部书是研究唐宋以前的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具有较大的价值。《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的《通典》，合称《三通》。

断代史 北宋修的断代史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元代的断代史有《宋史》、《辽史》、《金史》，都是在元顺帝时由丞相脱脱组织编写的。辽、金史与宋史并列，摒弃了以汉族王朝为正统的史学观点，体现了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当代史 宋政府设置专门的史馆，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类史书。宋会要残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现存的《宋会要辑稿》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制度沿革变迁的重要参考书。方勺的《泊宅编》和《容斋逸史》记载了北宋末年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记载了南宋初年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著述是研究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

金石学 宋代学者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金石器物，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金石学。欧阳修的《集古录》收集历代石刻跋尾400多篇，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著。赵明诚的《金石录》共30卷，搜集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石刻碑志拓本2000多种。这些石刻资料纠正了史书上不少谬误，补充了历史记载的不足。

地方志 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等，都是记述地理沿革的方志。

到南宋时，还出现了《吴郡志》（范成大撰）、《东京梦华录》（孟元老撰）等专记一州一县历史及风土人情的志书。两宋时期编印的地方志有200多种，至今流传的有20多种。宋代地方志的编纂为明清地方志的大量涌现，开了先河。

三、文学

词 词是唐代后期出现的一种配合音乐的新体诗，原是和曲子演唱的歌词，句子有长有短，又称“长短句”。词有固定的字数、韵律，叫做词调。每个词调又有名称叫词牌，有《浪淘沙》、《念奴娇》、《满江红》等名称。作词的人要按照各个词牌规定的格式和韵律去填写，所以又叫“填词”。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达到了词史上的黄金时代，故有“宋词”之称。宋词数量极多，仅《全宋词》著录的词人有130多家，作品20000多首。最著名的词作家有柳永、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

北宋前期的词沿袭五代“花间派”的余风，柳永的词摆脱一“花间派”的束缚，在题材、语言、表现手法上都有所突破，创作了长调慢词，能把写景、叙事、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音律婉转，形成婉约细腻的风格，对宋词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柳永被认为是婉约词派的开端者。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在文、诗、词诸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他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开拓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意境，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词风豪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人称其“以诗为词”。苏轼最享盛名的词，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笔力纵横，气势磅礴，脍炙人口，世世传唱。又如《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都是人们千古称颂的名句。

陆游（公元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大诗人，也是大词人。他生活在宋金对峙之际，始终坚持抗金主张，渴望祖国南北统一。其诗词多抒发抗金的抱负，反映人民的疾苦，风格雄浑豪放。在《诉衷情》词里写道："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洋溢着壮志未酬的爱国情感。他在临死前的遗嘱《示儿》一诗里，还念念不忘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反映出他渴望国家统一的炽烈心情。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将领，也是位独步文坛的词人。辛弃疾把词所表现的范围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他用词来咏物、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横竖烂缦"，无往不宜。他的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以及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的嘲讽和批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倾吐了对山河分裂的悲痛；"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抒发了抗金的豪迈气概及壮志未遂的愤懑情绪。直至晚年还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种英雄失意，无门报国的感慨。

辛弃疾的词豪放愤激，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推向了新的高峰，后世并称"苏辛"。辛弃疾传世的词有600余首，其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充满了爱国的民族呼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因此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

李清照（公元1084——约1151年），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南宋杰出的女词人。她善于运用白描手法，通过生动的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其词清新婉约，才气横溢，感情细腻

真挚，艺术成就较高，世称“易安体”。李清照的词以靖康之难为界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词多是表现闲情逸致、妩媚风流之作；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情调忧伤，其中也有反映南渡人士共同的亡国之痛和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元曲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歌剧。元曲通常指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宋词的成就，以金代诸宫调为曲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歌舞剧，杂剧一般有四折，在各折之前或中间有“楔子”。每折内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组小曲称作一套。演唱时除歌唱外，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它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后来的戏曲、小说等创作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仅有姓名可考的戏剧作家就有79人，作品500多种，现存作品有150种左右。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被称为元曲四大家，王实甫也是著名作家。

关汉卿（约公元1210——1300年），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市）人。医户出身，工词曲，亦擅长歌舞吹弹。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精神。关汉卿一生共创作戏曲60多种。《窦娥冤》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这个剧本不但通过窦娥这位普通妇女蒙冤而死的形象，指责了“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的黑暗政治，而且呵天骂地，以血泪控诉了被认为正义的主宰者的皇天后土，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关汉卿的作品，结构严密，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生动，语言形象活泼，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闪烁着灿烂的光彩，深受人民喜爱。1958年，关汉卿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元代著名杂剧优秀作品还有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

的《赵氏孤儿》等。

四、科学技术

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宋朝时候，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刻书多而又精致，并且出现了铜版印和彩色套印。雕版印刷一版能印数百册甚至几千册书，但存在着刻版费工、费料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以及有错字不易校改的缺点。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发明家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的活字印刷包括制字、拣字、排版、拆版全过程。用胶泥刻成单字，火烧变硬，便成活字，按韵目分类，放在木架上，用时依韵在架上拣取，然后根据文稿排版。排版时用一铁板，上敷以松脂以及蜡和纸灰制成的粘合剂，铁板上再放一铁框。当铁框里排满泥活字后，即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等物熔化，用一块平板把泥活字压平，凝固后便可印刷。印完后，再把铁板放在火上加热，即可拆版。为提高效率，铁板常备两块，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此板印毕，另板已具，如此交替使用，十分迅速。活字印刷克服了雕版印刷存在的缺点，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开辟了印刷史的新纪元，欧洲直到1450年前后才有活字印刷，比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已晚约400年。

劳动人民不断改进活字印刷术，元朝有了锡活字和木活字。木活字是王祯创制的，在他所著《农书》中对于写刻字体、排版、印刷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王祯曾用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在宁夏发现了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的西夏文木活字印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也发现了14世纪初年用维吾尔文刻的几百个木活字。

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埃及和欧洲，促进了人类科学文化交流和发展。它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就用磁石做成了一种指南工具——司南。北宋时候，又发明了一种指南仪器——指南鱼。不久，又发明了指南针。据《梦溪笔谈》记载："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关于指南针的装置方法，沈括提出了水浮法、指甲法、碗唇法、缕悬法四种。但水浮法多荡摇；指甲法、碗唇法的长处是"运转尤速"，短处是"坚滑易坠"。最好的是缕悬法。"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

大约公元11世纪，指南针已经应用在航海上。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指南针在航海上的普遍使用，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我国人民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

火药是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的。唐初孙思邈在《丹经》一书中记载了用硫磺、硝石、木炭混合在一起制成火药的方法，用来炼丹。宋元时期，火药的配方得到较大的改进，各种药物成份有了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火药并在军事上得到广泛应用，火药和火器制造，成为军事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宋朝特设军器监，有工匠近万人。北宋中期曾公亮编成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三种用途不同的火药配方和介绍了火药武器的名称及用法。宋元时期的许多史籍都有关于火炮的记载，其形制有纸制、陶制、铁制等。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火炮是利用抛石机把火药抛出远方的一种燃烧性火器。南宋时，于1259年又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① 后来用金属制作管形火器叫"火铳"。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

①《宋史·兵志》。

年）铸造的铜火铳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炮。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兵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为近代枪炮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火药和火器在南宋及元代传到阿拉伯国家。在14世纪初期，又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到欧洲，对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发挥了极大威力。

沈括和《梦溪笔谈》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翰林学士。他既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在科学和技术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成就。他晚年写的不朽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共30卷，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共计609条。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有200多条，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图、地质、气象、物理、化学、水利、建筑、动植物及医药等。《梦溪笔谈》反映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书中也记述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如毕昇的活字印刷、喻皓的《木经》、水工高超巧合龙门的三埽施工法等。还有沈括本人坚持实践，殚心竭虑，深入钻研的科学成果。

沈括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得出了北极星离北极三度多的科学结论；还改进与制造了浑仪、浮漏和景表等天文观测仪器，并写了《浑仪议》、《浮漏议》、《景表议》三篇著名的天文学论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沈括还主持编修了《奉元历》，曾在全国实行18年。他还发明了“十二气历”，以节气定月份，即以“十二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月31日，小月30日，大小月相间。“十二气历”是个纯太阳历，在科学上是个巨大进步，这种历法有利于安排农事。英国在8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类似“十二气历”的“萧纳伯历”，用于农业气候的统计。

沈括在数学方面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这一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向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新方向。

沈括也是地磁偏角的最早发现者，他还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石油的科学家，“石油”这个名称是沈括首先使用的。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创见和新说。他被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而他的《梦溪笔谈》则被称赞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针灸铜人 我国针灸学有悠久的历史，到宋代又有较大的发展。北宋针灸学家医官王惟一总结历代针灸学家的实践经验，统一了各家对腧穴的不同说法，设计和用精铜铸成了最早的两具针灸铜人模型，在上面刻划有359个穴位名称。共666个可针点，使针灸图象有了立体感和真实感，在针灸学的教学和医师考核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惟一并于公元1027年写成了《铜人腧穴针灸经》一书，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腧穴部位能有正确的认识。针图灸铜人的铸造是对医学上的一大贡献。

郭守敬和《授时历》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巧思绝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在天文历法和水利工程方面尤为精通。

郭守敬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①他创造和改进了近十余种天文仪器。主要有测定二十四节气的圭表、测定天体运行位置的简仪、测定太阳的坐标及观测日食的仰仪等。他重视运用仪器对实际天象的观测，在他主持下，由南海到北海（北纬15°—65°），在全国建立了27处天象观测所，观测了二十八宿及其他恒星的位置，测定了黄赤交角等。在对天象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和王恂等人对前代历法进行了研究，吸取了各历的精华，

①《元史·郭守敬传》。

加上自己的创见，编制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取“敬授民时”之意）。《授时历》定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时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现行公历①一年周期完全相同，但《授时历》要比它早300年。《授时历》先后使用364年，是我国古历中最精确的、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

在水利工程方面，郭守敬领导修复了宁夏银川一带的唐徕渠、汉延渠等，灌田9万余顷；主持完成了通州至大都（今北京）的通惠河工程，修复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

王祯和《农书》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元朝初年，他在安徽旌德、江西永丰任县官时，提倡农桑和改良工具，并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调查研究，综合了黄河流域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践，写成了《农书》。全书约136,000字，插图281幅，包括《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记载了当时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方面的创造。《农书》是我国第一部力图从全国范围对整个农业作系统全面的论述的农学著作。

重要名词：

成吉思汗　领户分封制　驱口　匠户　达鲁花赤　科差　行省制度　黄道婆　斡脱　红巾军起义　理学　三大发明　汪大渊　郭守敬　马可·波罗　伊本·白图泰　《梦溪笔谈》　《资治通鉴》　《通志》　《文献通考》　元曲　苏轼　陆游　辛弃疾

---

①指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时修订的历法，名《格列高利历》。

思考题：

1．简述南宋末年抗元斗争的著名人物和事迹。

2．试述元朝统一的历史意义。

3．说明元朝统治的主要特征及其实质。

4．元末农民起义的特点何在？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5．简评成吉思汗、忽必烈、文天祥。

第十三章　明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公元1368—1644年）

第一节　明朝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一、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

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　在轰轰烈烈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之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吸取了元朝倾覆的教训。出于尽快结束混乱局面、医治好战争创伤、全面恢复封建秩序、使新朝得以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他重建起庞大的官僚机构，强化国家机器，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朱元璋承袭宋元以来推行军、政、财三权分立的做法，使臣下"互相颉颃，互不相压"，①权力一统于皇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日益强固，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洪武初年，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置，依然沿用了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改元朝的枢密院为大都督府，

①《太祖实录》卷239。

以节制诸军。监察机关仍称御史台。在地方则设行中书省，管辖地方，事权很重。不久，朱元璋感到中央丞相权力和地方行中书省权力过大，妨碍皇权的提高，下决心予以分割。

首先，他从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入手，以“三司”取代了行中书省。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设承宣布政使司，掌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监督司法行政；地方军权则归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属，又互相牵制，直接听命于皇帝。公元1380年，又“定南北更调用人之法”，推行任官的回避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了地方官擅权。

布政司以下的地方政权，分为府、县两级，还有与府同级的直隶州，与县同级的散州。府、县的长官是知府和知县，被称为“亲民之官”。管理着地方的民、刑、钱、谷事务。

布政使司的行政辖区，大体上相当于元朝的行省。明初，全国定为十三布政使司和南、北直隶。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多承袭元朝旧制，由都指挥使司与宣抚司、安抚司等统管当地军民政务。

接着，朱元璋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公元1380年，他以谋反、通倭和向“北元”称臣等罪名，诛杀了左丞相胡惟庸等人，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度。这一重大变革，使自秦置丞相，已沿袭了千余年的制度；自隋、唐以来，推行了近七百年的三省制，均遭废除，皇权有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却又带来了内阁和宦官擅权，使明朝政治迅速走上腐败衰亡的道路。

皇权集中，皇帝“日理万机”。公元1384年，给事中张仁辅详细地计算了朱元璋上朝八天，处理政务竟多达3291件，平均每天要处理400多件。皇帝即使精力过人，也难以承受如此重负。于是朱元璋又不得不设置殿阁大学士，帮助他处理政务。明成祖正式设“内阁”。内阁与外九卿为平交，执礼持法，不相顾忌。宦

德以后，阁臣逐渐把持朝政，所谓“红本到阁，首辅票拟”，①内阁之权仍在六部之上，阁臣中之有力者，实际仍然是宰相，甚或成为权相。

明初，曾置御史台。公元1382年更置都察院，“职掌风纪”，是最高的监察机构。有都御史八人，分十二道代表皇帝巡视地方。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有所谓“台职与部权并重”之说。中央还设大理寺，负责案件的复审，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通政使司是明代创设的，是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联络机构，“关防奸党，通达下情”，还有资格参与“廷推”，为皇帝所倚重。

军事机构，初设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马。1380年改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的都司、卫所。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同掌军政，出师命将，由皇帝直接控制。五军都督府对军队并无调遣权，兵部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却不能命将统兵。每遇战事，由皇帝委派总兵官，统率卫所军士，按兵部的军令出征。皇帝还派有御史、给事中或宦官监军，战争一结束，总兵官立即交还帅印，军士回归卫所。

卫所制度 军队是封建王朝的基石，统治者历来都注重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仿唐府兵之制，寓兵于农，定卫所制度。公元1368年八月，“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②关系一郡安危的要冲之地，设一“所”，关系数郡的军事重镇则立“卫”。大体上5600人为一卫，设指挥使，1120人为一千户所，长官是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所，每所112人，所下设总旗两名，小旗十名，每小旗各领军士十名。

卫所军士之来源有四：即“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军人皆世袭，单独编户，称之为“军户”。明初无军

---

①《明会要》卷29。

②《明史·兵志一》。

不屯，平时军士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和屯种，一旦有事，则拨归兵部与五军都督府所派遣的总兵官统率出征。明初有军队约180万左右，保卫首都的“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①“土木之变”以后，于谦改京军为团营，嘉靖时虽又恢复京军三大营旧制，却以募兵制替代了世袭军户，卫所制度也就不是原来的面目了。

对人民的控制 明政府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制度，即人口和土地登记制度，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黄册是明代用来管理户口、征调赋役的重要依据。自公元1381年命令全国编制黄册起，直到1642年最后一次编制黄册止，历时260余年。它是从户帖制度演变过来的更为高级的封建性的户口和赋役管理制度，详细地反映了所有编入里甲人户的情况。它以一家一户作单位，将其乡贯、丁口、姓名、年令、田宅、资产，记录在册。每隔十年核实重造，开列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项目，反映出十年中消长变动的情况。此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由布政使司、府、县各存一份。上户部的册面用黄纸，故称《黄册》。②公元1387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度量地亩方圆，排以顺序字号，详细记述田主姓名、土地四至与数量，编类为册，形状很象鱼鳞，故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土地总登记簿。③黄册以户为主，鱼鳞以田地为主，黄册为纬，鱼鳞图册为经，经纬交织，使田土、赋役征调便有了定式。

黄册制度与里甲之制，关系密切；鱼鳞册与粮长制度相依存。里甲制度，是明朝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法。里设里长，下领甲长，负责乡民管理、赋役征解、签发、划分民户等级事务。里甲内人

---

①《明史·兵志一》。
②《明书·赋役志》。
③《太祖实录》卷180。

民要互保连坐，再加上关津制度的约束，人民不能任意迁徙他乡。

朱元璋前后用了三十年时间，编定了《大明律》、《大诰》和《大诰武臣》，不断健全法制来强化君主专制。吴元年（1367年），命李善长等制定律令，以后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公元1389年更定《大明律》。《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的重要律典，条例简于唐、宋、元律，精神则严于唐宋律令。明律所谓的“谋反大逆”，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虽常赦不原。凡“造妖言”、“劫囚”、纠结朋党，都要处以死刑，这些在前朝律令中是没有的。朱元璋颇为重视法制的宣讲教化，他令大理寺卿周桢编写了通俗的《律令直解》，让学校普遍诵读，于农闲和朔望之日，向百姓讲解。据洪武末统计，全国有律令讲解人员19万人。明朝还建立了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和镇抚司狱，“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厂卫是皇帝直接指挥、不隶属于任何一级行政机构的特务组织。特务制度化，是明朝君权高涨、专制极权的必然恶果，也是封建社会晚期政治更加腐朽的标志。

学校和科举 朱元璋创建新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需要大批人选。明初，学校与科举取士、诠选任官，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生员，学校生员作官则不一定经由科举。明成祖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独占了作官门路。生员纳粟、纳马即可入国子监，此例一开，学校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了。

明朝的学校有中央国子学和府州县学。公元1365年，朱元璋始立国子学，公元1382年新建太学成，改为国子监。生源有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有品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官生出自“特恩”，由皇帝指派分发。民生则由地方官保送。国子监生最多时近万名。学习内容主要是《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监生必作养十余年，然后拨

历”，记名听选，准备作官。①府、州、县学的生员，也要经过“岁贡”和考试，才能入国子监读书，或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八月，诏开科举。中间曾以所录多是后生年少，不能学以致用和解决实际问题，停科举数年。公元1382年重新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举行一次为定制。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地方学校的生员，逢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是八月在省城举行，中试者称举人；会试是明年二月在京城举行，中试者称贡士，再经皇帝出题策问，通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分一、二、三甲发榜，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所取人数更多一些，赐同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就是所谓的科第出身，可以做官。

科举命题的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作文章必须遵循严格的八股文格式（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②知识分子的思想被限制在程朱理学的框框之中，达到了文化专制的目的。

二、“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靖难之役” 朱元璋要仰仗家族的力量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在公元1369年初编《皇明祖训》时，就定下分封诸王之制，他陆续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重要地方为“藩王”。虽有“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的规定，但镇守北部边防要地的“塞王”如辽、燕、宁、晋、肃、秦诸王，坐拥重兵，雄视一方。藩王地位尊崇，可建府第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

①《明会要》卷25、卷47。

②《明史·选举志二》。

多者一万九千人。平时监视地方，战时可指挥驻军。《皇明祖训》还规定：朝中如有权奸，诸王可移文中央索取奸臣或举兵以清君侧。

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几经考虑后立仁柔的朱允炆为皇太孙。71岁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是为惠帝。诸藩王实力强大，使建文帝不安，他便与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计议削藩。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周、湘、代、齐、岷五王相继被废。实力强大的燕王朱棣见此，便在谋士僧道衍（姚广孝）的策划下，举兵反抗。这年七月，朱棣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率兵南下，号"靖难之师"。一场叔侄争夺皇位、历时四年的战争便开始了。朱棣打败了耿炳文、李景隆的军队，攻破南京，建文帝不知去向，朱棣取得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朱棣取得皇位以后，罢除建文帝的各项措施，诛杀支持建文帝的政治力量，齐泰、黄子澄、景清、方孝儒等，有的累及"九族之姻亲，门生之门生"，被称为"瓜蔓抄"。朱棣以反抗"削藩"而起兵，登位后却不遗余力地打击诸王，来巩固皇权。

迁都北京 明成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能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方根据地。国内有拥戴建文帝的势力反对他；削藩以后北部边防力量也随之削弱，蒙元残余力量的威胁，使他不能安心的留在南京当皇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起，改北平为北京。公元1404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改造城池，一直到公元1420年全部落成。也就是在这一年，正式下令迁都北京。①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的北京城，除去宫殿的营建以外，还涉及到全城平面设计的重新安排。主要是开拓南城和重建大内，也就是紫禁城。北京城更加严整、宏丽，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不朽之

①用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四的说法。

作。

三、明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七十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元末农民战争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伟大历史作用的体现。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蒙汉地主阶级，使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得以调整，使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对松弛，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民，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鉴于元末农民战争的教训，明统治者为自身的长治久安计，采取了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

明初发展经济的措施 奖励垦荒。连年战争使大片土地荒芜，明政府鼓励农民开荒种植。无主荒地，允许农民自行开垦，永为己业，免除赋税徭役三年。公元1394年，颁布诏令，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农民“额外垦荒，永不起科”。朱元璋又下令屯田，主要是军屯、民屯、商屯和罪废开屯。民屯是“移民宽乡”，使丁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能够得到足够的土地，全国耕地面积也由此而扩大。军屯收到的效果更为显著。军屯耕地有89.3万余顷；管理制度完善，立有《屯田则例》、《红牌事例》、《样田比较法》，整齐划一，超过了前代屯田制度。明太祖曾自豪地说：“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①

减轻赋税。明朝初期，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经济凋敝。朱元璋多次告诫属下，对百姓税收要“取之有利，用之有节”，下令减免赋税。对新附地区的赋税也给予减免，临濠地区是“兴王之地”，支持战争有功，多次下诏优免，对受灾地区实行赈济。但也有苏、松、嘉、湖“田赋独重之地”的问题。

---

①陆深：《同异录》。

兴修水利。朱元璋在初创南京政权之际，就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专设营田司，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修筑堤坝，专掌水利”。公元1394年八月，特派遣国子监生武淳及有关技术人才“遍诣天下，督修水利”。次年，综计全国府县开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堤、岸共计5048处。①修复了广西兴安古灵渠，可溉田万顷；命耿炳文疏浚陕西泾阳洪渠堰，灌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二百余里。这样就改变了元末水利失修、旱涝灾害严重的状况，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永乐时，工部尚书宋濂指挥30万人疏浚了会通河，使大运河贯通南北，加强了南北方的经济联系，减轻了劳动人民挽输之苦，促进了运河两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农田提供了灌溉之利。

鼓励发展经济作物。明初规定：凡家有田五至十亩者，必须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四年以后征税。不种桑者输绢，不种麻者输布。②而且还明令有关部门，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必须列入劝种农桑和建立学校的内容。

严惩贪污和抑制豪强。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来整肃吏治，据叶子奇《草木子》载：地方官吏贪污银六十两以上者，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充草，官府公座两旁，悬一填草人的皮袋，以示儆戒。户部侍郎郭桓等勾结浙西地方官吏侵吞税粮，事发后“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对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轻者没收田产，徙之于京师，重者处死。

朱元璋还下令解放奴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③废除元代匠户制度，允许以银代役，工匠在服役期限之外，都可以“自由趁作”，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

①《太祖实录》卷243。
②《明史·杨思义传》。
③《大明律》卷4。

性，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初，由于农民辛勤垦种，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从洪武元年到十六年(公元1368—1383年)，合计各地新垦田土达180多万亩，相当于当时全国耕地额数之半。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面积竟达到856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多。粮食总产量也在增加。公元1393年比1385年的税量增收三分之一还多，比之元代增长了两倍。经济作物扩种也有发展。棉花种植区域宋元集中在湖广、江南一带，明初已推广到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永乐年间，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明初的冶铁、造船、制瓷、纺织等行业，其生产量、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都超越了前代。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先进行列。景德镇的瓷器，工艺精良，造型美观，产量很高。宣德时，往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443500件。棉纺织业在农村是农民的主要副业，江南一带的纺织作坊，竟拥有工匠千人以上。松江、嘉定、常熟是棉纺织业中心，谚语说：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农政全书》记载了“松江绫布，远近流通”的事实。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等地，“商贩往来之所聚”，“四方百货，倍于往时。”①全国有30多座大中城市，南京和北京，人口密集，繁荣兴盛，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都会。

四、明政府与边疆各族联系的加强

蒙古族 元顺帝北狩以后，相当多的蒙古人留居于河北、山

①《永乐实录》卷125。

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和汉人共事农桑，逐渐融合；一些蒙古贵族据险抗明，失败后逃回草原；也有一些归附明朝，逐渐汉化。“北元”传五世，才放弃了元朝的国号与年号。以后，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雄踞草原。鞑靼居住在今天的鄂嫩河、克鲁伦河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瓦剌居住在今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地带；兀良哈部居住在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北元”、瓦剌和鞑靼与明政府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严重威胁。洪武时故有“塞王”之设，永乐皇帝四次北征，重创了鞑靼、瓦剌两部，也把愿意归顺明朝的蒙古封建主分封为王，如允许脱欢袭封顺宁王，脱欢后来统一了瓦剌诸部，每年向明朝奉贡。明太祖征服了纳哈出，设兀良哈三卫（即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又设大宁都司、营州诸卫所，封宁王朱权镇守该地，引兀良哈三卫为声援，以对付鞑靼。“靖难之役”中，兀良哈从征有功，明成祖把大宁都司辖地送给兀良哈“以偿其劳”。大宁都司辖地的放弃，不利于明朝控制漠南和支援辽东边防。

畏兀儿族　元朝灭亡以后，天山南北畏兀儿族聚居地区，形成许多以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地小者称地面”。哈密归附明朝以后，明政府在嘉峪关到哈密一线设立了八个卫。宣德时，畏兀儿族向明朝奉表称臣的“多达七八十部”。畏兀儿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哈密地区“皆务耕织”，园艺业也很发达；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则过着游牧生活。畏兀儿族人善于经商，往往以贡市而贸贩于内地。明朝时，也有许多汉人迁徙到这里，据记载哈密地区的汉人就有三千多。①他们和当地人民一起，为祖国边疆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藏族　明时称为乌斯藏。明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基本上承袭了元朝旧制。又进一步把官职纳入地方行政系统的体制之

---

①《正统实录》卷255。

内。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委派藏族上层僧侣任宣慰使、宣抚使。明朝敕封西藏各教派首领为“国师”、“佛子”、“法王”。永乐年间，修通了乌斯藏到四川雅州（今雅安）的驿路，通过茶马互市和贡使往来，加强了政治、经济联系。明政府承认了黄教（格鲁派）在乌斯藏的统治地位，永乐、宣德两朝，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到北京，被封为“国师”和“大慈法王。”

女真族 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明初，据女真各部所居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建州、海西和东海三部分。建州和海西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东海女真人则被称为野人女真。

明朝继承了元朝对东北地区的行政管辖，公元1375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招谕女真各部。永乐元年到正统七年（公元1403—1442年），陆续设立了建州三卫。永乐元年，设奴儿干卫；公元1409年，又在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址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东起库页岛，西至鄂嫩河，南濒日本海，北抵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设立184个卫、20个所。奴儿干都司的官员由当地各族头人担任，“抚绥部属”，“保境安民”。明朝也在当地驻军、置驿，中官亦失哈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十次巡视奴儿干地区，还在特林兴建永宁寺，先后立碑两块。碑文记载了奴儿干都司设置经过，它是明政府在该地实行有效控制的历史见证。

西南、东南各族 分布在云贵、两广、四川和湖广一带的苗、瑶、僮、彝等少数民族，到明代其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不同程度发展。明政府沿袭了元朝在该地区的土司制度，任命各族首领为宣慰使、知州、知县等官，称为“土官”，土官是世袭的，但要由明政府正式确认。有一些较为进步的地区，实行了“流官制度”，一如内地。也有实行“土流兼治”。一些土司反叛明朝，平叛以后，明政府便在该地“改土归流”。也有一些土司

一心依附明朝，如彝族女土司奢香，蒙冤受辱，赴京告状，朱元璋惩治了汉族官员，平息了民族冲突。奢香与中央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开通了贵州入四川的山路，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维护了安定的局面。

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等地，承袭元制，明政府继续在这一地区行使主权。设澎湖巡检司加强管理，春、冬两季派遣水师巡査警戒，实行了有效的管辖。这一时期，移居台湾的汉族人民日益增多。十七世纪初，在台湾的汉族人民就有数十万之多。他们与台湾高山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宝岛，并在抗击倭寇、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斗争中，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明中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与张居正的改革

一、宦官专权与明中期的政治危机

明代经过前期六、七十年的全盛以后，从英宗开始走了下坡路，此后的近二百年中，除有短暂的复苏外，到天启、崇祯时，便全面崩溃了。

宦官专政　就明代而言，宦官擅权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无论是“英主”还是昏君，也不管是对内臣干政有无认识，都必然程度不同地使用甚至依靠宦官进行统治。有明一代，宦官的权势虽然时有消长，但总的趋势是气焰嚣张，后果严重。

明成祖时，因宦官帮助他夺位有功，而建文帝在“靖难”之后下落不明，使朱棣积疑难释，更有不少勋戚贵胄对朱棣夺位不以为然，这便招致了永乐皇帝对大臣的猜忌和对宦官的信任，授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诸大权。宦官领东

厂，为皇帝作耳目，事权日重。到了明中期，皇帝昏愦无能，不思振作，宦官乘机弄权，内阁辅臣也依附宦官，遂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

朱元璋剥夺了相权，宫中司礼秉笔太监有机会弄权。以后，宦官可以代皇帝审批奏章，“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①大宦官传布政令，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口含天宪，连内阁首辅也不敢违抗。各级官吏升迁，甚至连大臣入阁，名义上虽是皇帝指派，实际上要中官首肯。英宗时，司礼监王振弄权，“跋扈不可制”。侍讲刘球上言，因语刺王振，振即指使马顺将刘球下狱“肢解之”。皇帝对王振以“先生呼之”，公侯勋戚呼振曰“翁父”。宪宗时，太监汪直权势日重，当时流传“只知汪太监，而不知有天子”。武宗时的刘瑾，权势煊赫，直接操纵内阁，首辅有时也要到刘瑾家中商量事情。大臣们的奏章，先写成“红揭”，投送刘瑾，号称“红本”，再送“白本”给通政司。刘瑾、谷大用、张永等人作恶多端，被时人称之为“八虎”。

宦官控制特务机构，残害臣民。宪宗时增设了西厂，宦官汪直控制，屡兴大狱，“权焰出东厂上”。西厂建立才五个月，就使“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

明代大宦官，穷奢极侈，公行贿赂，大肆搜括。王振柄政七年，死后家产有金银60余库；刘瑾被抄时，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两、白银500万锭又158,36万两。而矿监、税使的掠夺，更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的安定。

土木之变和北京保卫战 公元1439年，瓦剌部首领脱欢死，子也先嗣位“太师”，又自称“淮王”。不断出兵骚扰

---

①《明史·职官志一》。

北部边境，掳掠人口和财物，并企图以兀良哈三卫及沙州三卫分左右翼，包围明军，重进中原，恢复元朝统治。

公元1449年七月，也先兵分四路进犯明朝，自领主力军攻大同，明廷闻警举朝慌乱。宦官王振调动三大营京军50万人，挟英宗亲征。明军到大同，未及交锋就打算从蔚州撤退。王振祖籍蔚州，想借此机会炫耀于乡里。行军途中，王振又担心明军骚扰，便中途改变主意折往宣化。瓦剌军随后赶来，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南）袭击明军。明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军所杀。瓦剌军沿途劫掠杀戮男妇数十万众，进逼北京城。这一事件，史称“土木之变”。

兵败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但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皇太后采纳了于谦等人的抗战主张，朱祁钰监国，调兵勤王，晋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城。这年十月，也先挟持明英宗攻破紫荆关，兵临京城下。于谦、石亨整军22万迎战也先。激战五日，也先被迫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瓦剌部也先也从此一蹶不振。

夺门之变　瓦剌失败以后，英宗被送回北京，居南宫为太上皇。他勾结宦官曹吉祥等人阴谋复夺皇位。景泰八年（1457年）二月，乘景帝病危之机，总兵官石亨、副都御史徐埕和宦官曹吉祥等，拥英宗入东华门称帝，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以后，立即逮捕并杀害了于谦，为王振招魂致祭，立祠祀之，宦官重新秉政。

二、土地集中和农民起义

土地集中加剧　明中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尤以皇庄和诸王勋戚占夺民田最为厉害。明太祖曾赐给燕王宛平黄垡庄熟田作王庄，仁宗时有仁寿宫庄田等三处。到公元1489年，京畿的皇庄就增加到五处。武宗即位才一月，就置皇庄七处，后扩充到三百

余处。

王公、勋戚和宦官，更竞相掠夺农民土地。洪武时，诸王分封而不赐土，洪熙、宣德以后，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夺买和劫夺，“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①诸王都是大地主，蜀王、庄王占据了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沃土。

一般官僚地主、缙绅兼并土地也很严重。在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②。英宗天顺年间，首辅徐阶在苏松占田万亩，拥有佃户几万人。北方“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③弘治年间，马文升指出，天下屯田被“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军屯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激烈，两极分化严重，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赋役加重和农民流亡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赋役剥削也加重了。江南田赋折征银两，银粮比价不断变化，农民实际负担增加数倍。明初诏令，“额外垦荒，永不起科”，但到宣德时都征收赋役了。江南田赋奇重，民谚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赋役不均，地主买田不过割田赋，以“花分”、“诡寄”、“飞洒”等手段，隐瞒、转嫁租赋，致使“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④公元1502年，全国纳税田总额只有4228.58顷，比明初耕地减少一半，但税粮却维持原额不减，这是以农民的“包赔”来补齐的。

徭役繁重。黄册登录失实，佥派徭役常常“放富差贫”；皇

①《明史·食货一》。
②《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③《皇明经世文编》卷88。
④《皇明经世文编》卷81。

帝游幸侈糜，动辄要数十万人侍奉，造成“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①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大兴土木。斋宫秘殿，频繁兴造，役使人匠数万。徭役不断佥发，延误农时，加上水、旱、虫各种灾害，农民生活无着，纷纷离乡背井，流民几遍全国，造成“田地抛荒，租税无征。”流民在深山老林中结聚垦荒，过着“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的生活。②流民问题引起了社会危机。

农民矿工起义 明中叶发生了很多次起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正统时浙闽赣山区的农矿工起义；成化时郧阳山区农民起义；正德时河北平原的农民起义，还有广西大藤峡瑶族起义。

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矿工、农民起义。叶宗留，浙江庆元人。正统时，他聚集流民千人在闽浙交界处的明朝“封禁山”——铜塘山和建宁、宁德县宝丰场开采银矿，被官府指斥为“盗矿”而遭追捕，公元1447年7月发动起义，在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的交界地带进行斗争，声势颇大。

邓茂七，江西建昌人。因反抗封建剥削而杀死了本乡地主，逃亡福建沙县，为人佃耕。邓茂七号召沙县农民拒送“冬牲”与“送租”，官府派300人前往镇压。邓茂七率众打败官军，举行起义，自号“铲平王”。附近各地流民闻风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与叶宗留军相呼应。明政府以陈懋为镇南将军，宦官曹吉祥督神机炮，从南京出兵进剿邓茂七军，叶宗留设伏邀击，大败明军。邓茂七军乘机攻下福建20州县。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叶宗留战死，其部由叶希八指挥与明军继续战斗。同年，邓茂七军被叛徒诱入明军包围圈，邓茂七不幸中箭身亡，部众继续斗争。景泰年间，这两支义军才被镇压下去。

---

①《成化实录》卷33。
②孙原贞《孙司马奏议》卷1。

刘通、石龙、李原领导起义。以郧阳为中心的荆襄地区，位于鄂、豫、陕、川边境，山深地广，流民多入山开荒垦种。这一地区曾是元末红巾军的一个主要战地，明太祖在大将邓愈消灭此地红巾军后，封禁了郧阳山区。明中叶，河北、淮西、河南等地流民冲破禁令入山垦种。宪宗成化年间，这里已聚集各地流民达150万人。明政府屡屡下令企图驱散，但是散而复聚，聚众抗暴。河南西华人刘通在天顺八年(1464年)聚众数万起义，称"汉王"，建元"德胜"。起义军一面屯种，一面与明军作战。明军大肆围剿，刘通不幸被俘牺牲，由石龙率部转战到四川大昌、巫山一带，因叛徒刘长子出卖，石龙被俘杀，起义暂时失利。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余部李原、小王洪再次起义，荆襄、南阳为之震动。后来，起义军被明政府右都御史项忠率京营及湖广精兵25万所镇压。项忠大肆杀戮起义者，驱散流民百万，但流民"逐去复至"，"屯结如故"。明政府不得不开设郧阳府及竹溪七县，允许农民附籍耕种。

刘六、刘七、杨虎领导起义。河北霸州，境内皇庄交错，军屯密布，封建盘剥历来沉重，自洪武、永乐以来，令京畿计丁养马纳驹，岁免租粮之半。但豪右庄田日多，百姓没有牧地，马被饿死却要照价赔赔。"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①正德五年（1510年），文安人刘六、刘七率众在霸州起义。起义军活动于京畿、江北、山东等明朝的腹心地区，"倏忽来去，势如风雨"。明政府立即派大军围剿。起义军为了牵制敌人而兵分东、西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率领转战河北、山东；一路由杨虎、赵鐩率领转战山西、河南，协同作战，三次逼近京师，明廷震动。起义军历时三年，纵横八省，沉重地打击了朱明王朝与封建地主势力。

---

①顾武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5 。

三、张居正的改革

改革的时代背景及内容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明朝中期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公元1573—1582年任内阁首辅，进行了一系列颇见成效的改革，使明政府得到短暂的复苏。

嘉、隆、万三期，是明朝日益衰败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的晚年。政治腐败，宦官柄政，党同伐异，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激烈，赋役不均，加派早已超过税收之正额，“生民之骨肉已罄，国用之广出无经”，明政府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北虏”、“南倭”不断骚扰，社会不得安定，各种矛盾急剧发展，明朝统治岌岌可危。张居正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挽救明朝之垂危，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政治上，张居正针对“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的状况，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的主张。①他整饬吏治，裁汰冗职冗员，创立“考成法”，推进明朝国家机器的运转；重视人才的选用，“才有可用，孤远不遗”，用人标准为“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根据人员特长，委以重任，使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得以展现才华。

在军事上，他注意加强边防建设，起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一批名将，整饬军政，训练士卒，固守边镇。在东起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一线，重建“敌台”3000多座。另一方面他又重开马市，以经济相牵制，与蒙古俺答汗和平相处，使明与鞑靼蒙古之间二、三十年没有大战，为明朝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财政的好转，创造了条件。

经济上，张居正改革措施的收益最为显著。他整顿了驿站，

---

①《张文忠公全集》卷6、卷28。

减轻了对交通沿线农民的滋扰；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与漕河，除害兴利，有裨于民生。他下令重新丈量全国耕地，把豪强势要累年拖欠的税粮征收入库，充实国用。在“考成法”推行以后，规定各级地方官征收赋税不足额的要给予严惩，“抚按听调，府县听纠”。并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推进了赋役制度的改革。嘉靖初年宁国知县甘澧试行的条鞭法，经庞尚鹏、谢师严和海瑞等在江南和山东多年推行，取得了经验。张居正在万历九年奏请以诏旨颁行全国。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的赋役制度。明初，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夏税和秋粮；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佥发力役，是按户出丁，轮流应役。一条鞭法则是均平赋役，部分地将力役转入田亩中去，以解决力役问题为中心。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府。一年中所需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它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并为一项，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①总括而论，一条鞭法之要点有：1、把明政府向人民的一切征项，合并为一条征收，除繁就简，使地方官吏难以从中渔利。2、量地计丁，是核心内容。把部分力役转入田亩承担，将按户、丁派役的办法改变为按丁、粮派役，取消了“门银”。具体作法是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也有丁粮各半的。相对地减少了无地、少地而人口多的农民的力役负担。3、无论田赋或徭役，一概征银，以往徭役有力差和银差，现在以银代役。4、过去征粮，民收民解，现改为官收官解，即把银两交给官府，由政府去购粮或雇役。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它使农民不致因力役而延误农时，以比较灵活的办法调

---

①《神宗实录》卷220。

整了徭役繁重的问题；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人身依附关系已相对松弛的现实，把力役转向田亩，以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差役的佥发。它"一概征银"也与此时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加的趋势相适应。

张居正的改革，"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对于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改革不能彻底解决积弊，修修补补也会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坚决反对。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家被抄没，长子被逼自缢，本人也几乎被剖棺戮尸；各项改革措施，仅留一条鞭法，其余被罢除几尽。明朝统治已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不堪收拾了。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明朝中期，社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方面，根据几种农书的记载，宋元以来，农耕工具在不断地改进，明时已日臻完备并达到了新的水平，如耧荡、秧马等工具，使用起来力省而工倍。①耕作技术也有所进步，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懂得了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使粮食单产不断提高。

耕地面积在扩大，粮食总产量大有增长。水利工程的兴修进展较快，水能的利用也大有改进。不仅用之于碾磨和灌溉，而且

①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从东南的福建到甘肃的平凉，普遍用于造纸业了，江南则更是“水碓之法巧绝”。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大幅度提高，16世纪以后，山东和长江南北以至黄河流域，都已成为重要的产棉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松江一郡，官民军灶垦田有二百万亩。大半用来种棉花，超过百万亩了。甚至辽东南部地区的种棉，也在逐步推开。蚕桑业以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和四川的保宁，最为发达。福建、广东等地甘蔗生产居全国之冠，烟草从吕宋引进，在天启、崇祯年间，“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①其他如茶叶、杉漆、马兰草等经济作物和油料的产量，都有很大提高。

手工业发展迅速。如矿冶、纺织、制瓷、造船等行业，都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产量和质量以及制作技术，有进一步的提高，有的已具备了专门化的细致分工。矿冶最初由政府垄断，洪武末年才准许民间开采、冶炼，民办矿业数量增加，产量也很可观。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和福建龙溪都是著名的铸铁产地。遵化铁厂占地4500亩，有夫匠2500多人，炼铁炉可装矿砂2000余斤，每日出铁四次，一次可出铁200斤左右。此外，金、银、铜、锡、镍等矿也都有相当的发展。

明代，河北定州、真定，山西太原，河南的开封、禹州，福建的泉州，江西的婺源、景德镇都是闻名全国的陶瓷产地。景德镇是制瓷业中心，镇中官窑58座，民窑则已超过900座，官窑专为皇家生产，器皿的造型、质地、色泽都达到上乘。民窑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产量很高，质地精美，远销东南亚、非州和欧洲等地区。

棉织业已普遍成为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江南一带尤为突出。“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家纺户织，远近流通，”“凡棉布

①杨玉聪《玉堂荟记》下。

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①随着纺织业的发展，织机不断改进。弘治年间流行于福建的是“改机”；万历时，嘉兴濮院镇的机匠们放弃了“土机”而改用“纱绸机”；明末，在苏州的市场上，就有绫机等六种机具出售。当时还出现了脚踏纺车和“搅车”，比元朝时一般能提高工效三、四倍。

造船业以规模大、技艺高而享誉世界。制造的大型船只可容纳数百人。据记载：沙船的载重量是四千石到六千石（约合500吨到800吨）。郑和远航的宝船长约150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这是最大的沙船。福建和南京都是著名的造船业中心。

社会分工进一步明显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明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分地区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了。如嘉兴的一个小镇，因为丝绸能获利，居民就有上千家“不务耕绩”。②吴江的盛泽、黄溪居民，更是“尽逐绫绸之利”，把丝织业当做自己的专业了。有人又专门从事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有人又专门从事手工业，使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料产地和手工业生产中的区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钟化民《救荒图说》记载：“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棉花经过商人之手运销到南方，而江浙产的棉布也因此就源源北上了。这种区域性分工的加强，自然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也日见细密。据说社会生产行业竟有360行之多；行业之内，各道生产工序也是越分越细，如景德镇生产一个杯子，合计要经过72道工序才能完成。③其中还有很多

①《农政全书》引《松江志》《天工开物》卷2。
②万历《秀水县志》卷1。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卷7。

细节尚未计算在内。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是活跃的。江南人很多“弃本经商”“弃儒经商”。各地商人多设立会馆，组成商邦。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和关陕商。当然，他们大部分还只限于单纯的商业经营，并没有将资本转投入手工业生产。

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明中叶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的比重越来越大。地域性的商品交换已向全国范围扩展，如陕西自古是蚕桑养殖素称发达的地区，日久废弛，故陕西所需的绸帛要仰给于江浙，花布则来自楚豫。这一时期，粮食、棉花、庶糖、烟草、布、帛、铁器等产品，都已成为重要商品。

全国出现了三十多座大城市，多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同时还兴起一批城镇，工商业兴旺，颇具地方特色，如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细绢为生，为都会商贾往来之会”。① 明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相当规模。广州“嵯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漳州、福州、宁波都是重要的贸易港口。

白银的流通量日见增加。明政府的赋税、徭役、工商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大都以银两计算。民间大宗、小宗的贸易，也多用银。城市的钱庄、票号随之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西班牙银元流入我国，云南的银矿也在大量开采。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一些地方的个别手工业行业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

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有了资本较

①《苏州府志》卷7。

多的作坊主或商人；另一方面又要有失去土地、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两者在市场上相遇，在生产中结合，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

明中叶，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纺织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织布、织绢为生。最初，他们大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于生产的发展，激烈的竞争，市场需求量的增大，他们逐渐积累资金，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成了拥有织机二、三十张的“机户”，雇有数十名甚或更多的“机工”，为他生产商品，创造财富。张瀚在《松窗梦语》卷10中说的“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指的就是这种社会现象。

在竞争中破了产的小手工业者和离开土地的农民，开始组成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队伍。有记载说：苏州郡城之东，人们大都学习纺织技艺。工匠们各有专门技术。“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指的是长期工；“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的是短工。如果机房的工作减少，那么“此辈衣食无所矣！”①很明显，机工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万历时，松江地区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雇佣关系。松江的“尤墩暑袜”驰名天下，行销海内外。因之“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②暑袜店主向分散于各家的机工供应原料，包销成品，计件付酬，结成了一种包买商式的生产关系。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封建社会后期，即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它首先是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城市的部分手工业生产部门，然后缓慢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渗透到农业经济部门，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明中叶以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仍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确实已出现在

①《长洲县志》卷3《风俗》

②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沿海个别城市的个别行业中，它是非常稀疏的、微弱的、发展不平衡的，还不能够瓦解封建经济结构。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一经出现，不仅在物质生产而且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在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引起变化。这就预示着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离寿终正寝不远了，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三、城市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嘉、万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市繁荣，商品琳琅满目，白银流通量日益增大，刺激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贪欲，竞尚侈靡，日逐财货。“商困役扰，民不聊生”①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封建专制统治多方面阻挠和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对民营手工业实行种种限制和野蛮掠夺，如禁山治矿，制瓷业的“官搭民烧”，丝织业中的“领织”，对外贸易的桎梏——“禁海”和苛捐杂税盘剥商人，都严重地妨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万历时，税使、矿监对城镇居民的搜刮和迫害，激起“民变”大小不下数百起。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四出课敛诛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拆房掘坟，搜括钱财，“处处抽税”、“重征叠税”。②使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摧残，“穷富尽倾，农商交困……哭泣道途，萧条巷陌”。③矿监、税使的暴行，激起了城镇居民的抗争。

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湖广的荆、襄人民反对宦官陈奉的斗争，是各地人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税监马堂一到山东临清，“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睨良家子

①孙承泽：《山书》卷1。
②③《神宗实录》卷359、卷736。

富有力者，籍其产之半”，致使中人之家，破产者大半，远近罢市。临清人民纵火焚堂署，烧死马堂党羽三十余人。公元1601年，苏州民推举织工葛贤为首领导起义，反对织造太监孙隆，打死其爪牙黄建节、火焚汤莘等恶棍之家，将税官六、七人投入河中，孙隆死里逃生溜往杭州。北京西山窑工和运煤伕，曾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反对宦官王朝，在北京城中示威，“倾动畿甸”。江西景德镇也爆发了反对税监潘相的群众斗争，参加者有制瓷工人近万名。云南爆发了反抗矿监杨荣的斗争，投杨荣于火中，杀其党徒200余人，斗争如火如荼。

明中期以后的城市人民斗争是一个标志。它表明，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出现，落后的封建经济体制和腐朽的君主专政制度，已在不同的领域受到挑战和冲击，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内容和动向。“市民斗争”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汇合在一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极其微弱和缓慢的，封建势力则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更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使我国在明清之际，终于没能够迎来新的历史时代的曙光。

第四节　明朝的对外关系

一、郑和下西洋

郑和出使西洋　明初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宋元以来科学技术的成就，为明朝开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成祖为了宣扬国威，加强对外联系，派郑和远航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贸易和访问。

郑和（1271—1433年），原姓马，名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县）人。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祖父和父亲都曾朝拜

过回教圣地麦加城。明太祖统一云南时，三宝被俘为太监，后归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起兵，因“多建奇功”，成祖赐他姓郑，取名郑和，并晋升为内官监太监。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05—1433年)，郑和率领规模巨大的舰队七次出使西洋(“西洋”指今天的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东洋”指今天的菲律宾、日本等地），他们从苏州的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中国南海诸岛，先后到达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柯枝、琐里、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远航，加强了明王朝和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往来。

郑和的船队满载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金银等物品，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及海外奇珍异宝。因此，人们把郑和所率船队称之为“宝船”。郑和每到一处，就表示愿意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把中国出产的礼物赐送给国王，邀请他们派使臣到中国访问。郑和一行所到之处，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初次航行到占城，当地国王率领大小首领举行隆重的仪式，迎接郑和船队的到来。郑和的随行人员到达榜葛拉（今孟加拉）时，国王特地选派一千多人到察地港远迎，然后又用大象接到皇宫，由国王亲自主持欢迎仪式，互赠礼物，还特设盛宴款待中国客人，“礼之盛厚”。郑和的访问，曾给亚非地区的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国家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与古迹，在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城、三宝洞、三宝公庙；在

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城；在泰国也有三宝港、三宝寺等，这些都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0余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早87年。郑和远航的船队，有宝船60多艘。最大的宝船长44丈（151.8米），宽18丈（61.6米），张12帆，载重1500吨至2500吨。随行人员包括水手、船师、将士、工匠、医生、翻译等，有两万七、八千人，规模远远超过了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中国的远洋航海事业，直到明朝初年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出使西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了亚非一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产方面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郑和本人总结航海实践经验的《针位图》（已佚）以及《郑和航海图》，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航海技术资料。

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 郑和的远航，在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郑和所到之国，近至古占城，远至天方国，皆纷纷遣使来华访问，从永乐到宣德近30年中，东南亚的使臣来华者就达万余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南京一次就接待过古里等十六国使臣和商人1200多人。还有不少国家的国王，如满剌加、浡泥、南浡里、苏禄、麻林等，皆率其妻子、家属及陪臣来华访问，受到明政府的礼遇。浡泥和满剌加国王和王后来华，明成祖亲自设宴招待；苏禄国东、西、峒三王率340余人的使团，受到隆重的国宾待遇。到这些国家去的中国人，也同样受到热情友好的对待。远在东非的麻林国王还遣使送来长颈鹿一头。老挝在公元1403—1412年间，先后五次遣使入贡，带来象牙、马、犀牛和金银器皿等珍奇物品，明朝也派杨琳等回赠重礼，还把养蚕、缫丝、酿酒等先进技术传给老挝人

民。

郑和出使西洋后，移居南洋地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了明代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有十万人以上。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其辛勤的劳动，为当地的开发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贸易联系，永乐年间恢复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明朝同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倭寇之患与援朝战争

倭寇的侵扰 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为了掠夺财富，组织一批封建主、没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骚扰，历史上称之为“倭寇”。由于明初国力强盛，政府又重视海防，倭寇未能酿成大的祸患。正统以后，随着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侵扰气焰更加嚣张了。公元1439年，倭寇侵扰台州、宁波一带，屠杀人民，焚烧房屋，“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积骸如陵，流血成川”的惨状。①

至嘉靖时，随着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商大贾、豪族巨室以及地主官吏，如汪直、徐海、毛海峰等与倭寇相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掠集团，其中“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②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劫夺财物，屠杀掳掠人口，造成极大的祸害。公元1647年，明廷命令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以备倭寇。朱纨一面封锁海岸，一面击杀李光头等90名通倭的奸商，并上疏朝廷，指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③朱纨的措施，

①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朱纨传》。

触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纨擅杀，朱纨获罪，被迫自杀。至此，明朝“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公元1553年，倭寇进攻上海、苏州、南通及泰州各地。第二年又深入徽州、南京。他们在沿途烧杀淫掠，许多繁华的工商业市镇被兵火洗劫。倭寇的强盗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实行自卫。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民族英雄戚继光登上了抗倭的历史舞台。

戚继光抗倭 戚继光(公元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生于将门之家，青年时就怀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雄心壮志。嘉靖前期，任山东都指挥佥事，专事抗倭。公元1555年，受命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到任后，鉴于卫所兵丁缺乏训练，军纪败坏，特地从金华、义乌、处州一带，召募当地农民、渔民和矿工3000人，经过严格训练，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戚家军”。同时，又针对江南多薮泽，不利于大规模用兵的特点，创造出“鸳鸯阵”法，每12人为一队，长短武器配合，自成战斗集体。

公元1561年，倭寇数千人进攻台州，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九战九捷，扫除了浙东的倭寇。次年福建告急，戚继光又率兵入闽，在福建的兴化、横屿一带给进犯之敌以毁灭性的打击。接着，戚继光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一道，歼灭了广东的倭寇。戚家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欢迎，“牛酒慰劳不绝”。经过大小八十余战，至公元1566年，为害已久的倭寇终于全部肃清。戚继光是著名的军事家，著有《练兵纪实》、《纪效新书》，为我国古代军事著作增添了新的内容。

援朝战争 万历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关白”(丞相)丰臣秀吉，用武力战胜其他诸侯，统一了日本。丰臣秀

吉为转移国内政治集团的斗争目标，巩固自己的统治，积极向外扩张。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他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以10万军队在釜山登陆，很快攻占王京（汉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被占领。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不断遣使向中国告急求援。明政府为支援朝鲜，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4万渡过鸭绿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收复平壤、开城及王京，迫使日军退至釜山，朝鲜几千里国土大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又于公元1597年，发兵14万再度侵犯朝鲜，明政府派邢玠、麻贵统率陆军；陈璘、邓子龙率领水军继续援朝。中朝两国军队紧密协作，连败日军。次年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士气更加低落，中朝军队乘胜追击。这年，中朝两国的水军与日军决战于朝鲜南海面，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在这场海战中，朝鲜杰出的海军大将李舜臣和中国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先后壮烈牺牲。至此，援朝战争赢得了彻底胜利。中朝两国人民以鲜血铸成了万古长存的友谊。

三、反对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斗争

十六世纪，西方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它们靠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贩卖黑人奴隶等手段来积累资本。在这段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大力进行殖民活动，侵略亚、非、拉地区。中国自然成为它们侵略的主要目标。

葡萄牙侵占澳门 首先侵略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公元1511年葡萄牙以武力侵占满剌加（马六甲），随后闯入中国广东沿岸进行海盗活动。公元1517年九月，葡萄牙武装船舰八艘，炮击广州，并盘踞屯门岛，掠卖居民，剽劫行旅。公元1521年，广东军民英勇抗击，将其全部驱逐出境，接着又在新会县给

再次侵犯的葡萄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利用广州重开海禁的机会，买通海道副使汪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乘机上岸居住。他们得寸进尺，扩大居住地区，“非法移民”①，继而修建炮台、私立官署，澳门就这样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霸占了。

西班牙对华侨的迫害 西班牙是继葡萄牙侵略中国的第二号殖民势力。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吕宋（菲律宾）；因为经济上竞争不过华侨，对华侨进行凌辱和屠杀，以抢夺他们的财富。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谎称明政府“将取其国（指吕宋）”，华侨为内应，故设置圈套，用高价收买华侨的铁器，然后野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华侨2.5万多人。西班牙殖民者的屡屡暴行，曾激起了华侨的英勇反抗。如公元1593年兰，吕宋的西班牙殖民总督雷郎，率舰队与荷争夺印度尼西亚出产香料的岛屿，强征250名华侨为之驾船。这些华侨稍有倦怠，就鞭挞、刺杀，“苦毒备尝”。华侨水手潘和五等忍无可忍，发动起义，杀死西班牙总督和官吏多人，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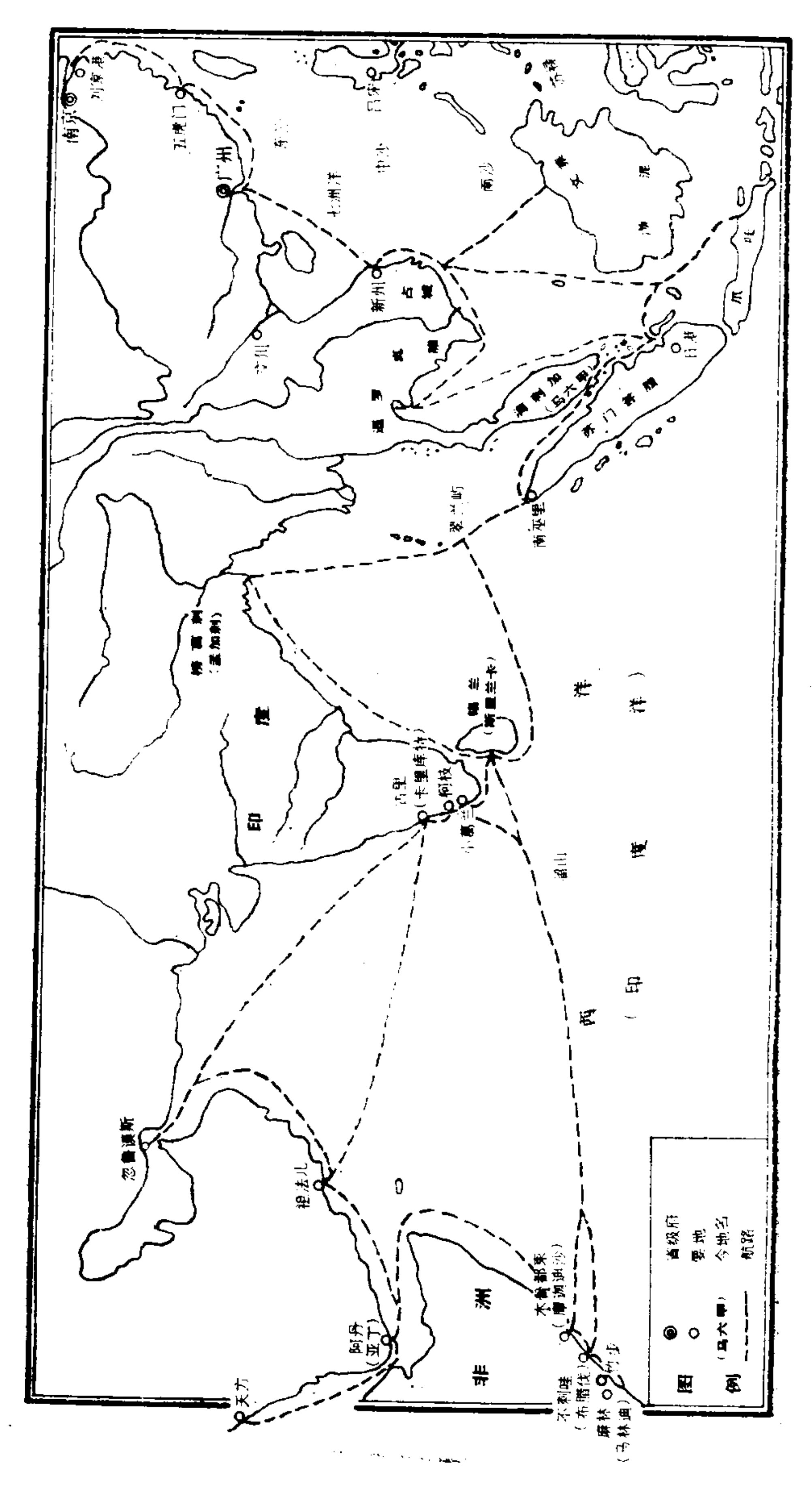
西班牙殖民者不但在吕宋杀害大批华侨，还直接于公元1626年侵占了我国台湾的基隆和淡水。

荷兰强占台湾 十七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衰落，荷兰势力发展起来，称霸海上。公元1601年，荷兰首次来到中国。公元1604年，荷兰袭击澎湖，到公元1622年，强占了这个岛屿，并以此为据点，不断骚扰福建沿海一带，“掳我妻子夺我男”，“戕我商渔不休息”。②公元1624年，在人民的支持下，明军打败荷兰，收复了澎湖。荷兰殖民者霸占澎湖的目的未能得逞，又

---

①《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2）4页，

②卢若腾：《岛噫诗》


南京
广州
新州
占城
暹罗
满剌加
旧港
爪哇
榜葛剌
印度
锡兰
古里
柯枝
忽鲁谟斯
祖法儿
阿丹
天方
非洲
木骨都束
不剌哇
麻林
图例
省级府
要地
今地名
航路

郑和下西洋航海图

于同年侵入我国的台湾南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台南筑赤嵌城（今台南安平镇）以为侵略据点。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

荷兰殖民者独占台湾后，对台湾人民强征高额的“人头税”，夺取台湾农民的土地，更为残忍的是把台湾人民掠卖到爪哇当奴隶。殖民者的野蛮统治，激起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爆发了以郭怀一为首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数万人，遭到殖民者的残酷镇压，死者达4000多人。清康熙元年（1662年），台湾人民在郑成功的率领下，把荷兰殖民者赶出了台湾。

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中国，从事宗教活动。他们名为传教布道，实际上是用十字架配合殖民武装，来“打破古老东方的大门”。①由于他们有一副伪善的面孔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因而比起凶残的殖民者更容易欺骗人民。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到广州，接着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也到中国传教。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于1581年经澳门来到广东肇庆。继而又到韶州、江西进行传道活动。为了减少阻力，他穿起僧衣僧帽，后至南京，又改穿儒服，表面上“尊崇中国的文明”，学习华语，研读儒家经典，与士大夫交游。公元1601年利玛窦买通宦官马堂，进京朝见明神宗，献上自鸣钟、万国舆图、西洋琴等物品，以此获得了在京居留、传教和建立教堂的特权。几年里，他发展信徒200多人，连著名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也先后入教。此后来中国的传教士愈来愈多，天主教在中国渐渐传播开来。至崇祯末年，天主教徒已遍布13省，信徒达十五、六万人之多。

①《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第204页。

明清之际，除利玛窦外，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较为著名的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德国人汤若望、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早期耶稣会士本为传教而来到中国，他们当中不乏西方殖民势力的急先锋，这一部分人飘洋过海，只是为了开展一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企图以十字架来配合坚船利炮。以“打破古老东方的大门”。而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主张了解中国，为了传教，应当向中国做出善意的表示。他们除传教外，还参加了明政府举行的天文测量、历法修订、火器制造等活动，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介绍了西洋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对中西文化交流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由于派别不同，或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或因当时中国的强大和殖民主义势力鞭长莫及；因而尚不能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服务。他们在华主要从事传教和著书立说活动，也未能进行有损中国主权的活动。许多人甚至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对当时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第五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一、满族的兴起和清的建立

满族是我国上古时期的肃慎、挹娄、勿吉，唐宋时的靺鞨、女真族的后裔。永乐元年（1403年），明在建州女真居住地区设立了建州卫，任命部族首领阿哈出为卫指挥使，赐姓李。1412年，又置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他就是后来清朝皇室的祖先。正统七年（1442年），明政府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遂有“建州三卫”之称。它们作为明的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由中央任命，允其世袭，并受到明统治者的信任，“与大明看

边，忠顺有年”；①但必须服从中央号令，“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②

建州女真的经济发展与后金政权的建立 女真各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东海部号野人女真，远离内地，与汉族来往较少，生产落后，以捕猎为业。“海西”部以畜牧、农耕为主，辅之以狩猎。“建州女真”在三部中生产最为发达，农业占据着主要地位，铁制农具和牛耕已普遍使用；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银、铁、革、木，皆有其工③”。

十五到十六世纪，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制阶段，奴隶主役使奴隶耕作，将全部产品据为已有。除剥削本族奴隶外，奴隶主又掳掠汉人为奴，驱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

女真族与汉、蒙、朝鲜等族向来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明朝建立后，女真与各族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明政府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等地开设互市。女真的人参、貂皮、牲畜、药物，汉人的粮食、农具、布帛、刀剑、铁锅等是互市贸易中双方交换的主要产品。在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帮助影响下，女真族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提高。

十六世纪末，女真逐渐形成了建州五部、长白山三部、扈伦四部、东海诸部等四个强大集团，各部“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④割据纷争，互相混战，女真社会呈现混乱、动荡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人民要求统一，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满族人民英雄努尔哈赤的肩上。

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

---

①《国学季刊》一卷2号天聪四年木刻《谕官军人等榜文》。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

③《建州闻见录》。

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其祖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忠于明廷，积极任事。努尔哈赤亲母病逝后，在继母虐待中度过童年。19岁娶妻自立，生活艰难，常携土特山货到抚顺等互市以谋生计，因此对辽东情况很熟悉。不久，他离乡从戎，投入了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正月，他的祖父、父亲在建州卫古埒城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愤怒诘责明朝；明政府给敕书30道，马30匹，让他回建州左卫袭职。以后，明晋升他为都督佥事、左都督，直至龙虎将军。同年五月，他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至1613年，基本上统一了女真诸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政权。

八旗制度 在统一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既是一种军事制度，"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也是一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前，建州部出猎时每十人设一首领，叫"牛录(大箭)额真（头目）"。1601年，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把女真壮丁组织起来，每300人编为一牛录，首领仍称"牛录额真"（汉译佐领）；五牛录组成一甲喇（队），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首领为"固山额真"（旗主)。每固山设一色旗，初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①每旗7500人，共约6万人。以后各旗人数增加，牛录、固山数目不变，只将甲喇加以调整，一旗可增至八、九个甲喇。八旗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②战利品，八旗均分，战时军需，旗丁分摊，这种兵农合一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八旗旗主均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作为氏族贵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政》一。

②《清太宗实录》卷7.

族，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奴隶和土地。在大汗之下，八旗分立，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各级首领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政治首领。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家长，最高的统帅。八旗制度的实行，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加速了女真奴隶社会的发展。

后金与明朝的战争 后金的崛起，对明朝的北部边疆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明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后金的发展，引起了努尔哈赤的强烈不满。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有“七大恨”，誓师攻明。后金军队大举进犯，攻占抚顺，明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于1619年2月分兵四路，进逼金兴京赫图阿拉。结果，因明各路军队步调不一，路程远近不等，无法很好地协同作战，加上军队素质低劣，指挥无方，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锐气大挫。后金势力更加强大，步步进逼，明在东北的统治开始发生动摇。

公元1626年，后金军队又攻陷沈阳，击破辽阳，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72城，全部为后金占领。1625年，努尔哈赤为加强对明的军事进攻并巩固已占领地区，迁都至沈阳，改称盛京。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指挥士兵坚守孤城，努尔哈赤在战斗中身中炮火，不久因伤重死去。其子皇太极（1627—1643年在位）继位，改元天聪，继续攻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11月，皇太极亲自统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闯入长城，攻陷遵化，进围北京。蓟辽督师袁崇焕从山海关星夜驰援，解北京之围。皇太极施用“反间计”，崇祯帝听信谣言，冤杀了袁崇焕，使明遭受到极大损失；辽东军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纷纷降金，更使明在北方的藩篱尽撤，关门大开。

清朝的建立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正式即皇帝位，改后金为“清”，改元崇德，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皇太极统治时，满族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迅速向封建制转化。皇太极称帝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效仿明室，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克服八家旗主共治时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早在公元1631年，后金就设立了六部，六部首脑由八旗诸王贝勒充任，不久，又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①把贝勒们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使皇太极与诸贝勒的关系，完全成为封建制度下的君臣隶属关系。该年12月，为抬高“至尊”地位又定朝仪。原来，皇太极即汗位初，汗国政体为八旗联合共治，大事由八旗诸王大臣会议共同决定，称为“国议”（议政王大臣会议），如果“诸王大臣签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国政由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共同执掌，上朝时三人并坐，定朝仪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余二人侍坐。次年正月，更定为“南面独坐”，于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公元1636年4月，皇太极仿明制，改文馆为内三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它们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咨询和办事机构，是行使皇权的直接工具。5～6月，又设立了都察院与理藩院，与六部合称“八衙门”。军事上扩大了军队编制，在“满洲八旗”之外，增设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皇太极把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收归自己统辖，开创了“上三旗”制度。皇太极在位的十七年，使满族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也使清政权从国体到政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时，清统治者日益成熟，富有朝气，而且国力强盛，拥有东北一带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雄踞关外，虎视中原，已完全成为一个可以与明朝抗衡的地方民族割据政权。

---

①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

二、明后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阶级矛盾的激化 明朝末年，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土地的集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首先是皇族、藩王的大肆兼并。嘉靖以后，皇庄名去而实存，宗藩外戚的庄田也急剧增多。仅秦王在西安府的庄田就有8990多顷，另有山场483段，山坡竹枝5坡，竹园3处①。楚王、韩王、肃王、黔宁王后裔在陕西平凉府属庄园都有良田数万顷，佃户数万丁；伊、徽、周、赵、唐、崇、潞诸王，均占有成千上万顷良田，以至河南一带的土地竟被瓜分殆尽。神宗皇子朱常洵"就藩"洛阳时，一次就赐田2万顷，熹宗时，赐给惠、贵、端王，湖广、陕西庄田每人3万顷。当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等地，王庄密布，侵占无已。其次，一些勋戚官吏、宦官太监也在畿辅地区通过请乞等手段大量攫取土地，建立田庄。宦官头目魏忠贤就占地多达100万亩以上；太监谷大用也"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②最后，一般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也同样是"求田问舍而无底止"。大官僚董其昌就曾强买腴田10万余亩。在土地兼并浪潮的冲击下，绝大多数农民纷纷丧失了自己的小块土地，或变成缙绅之家的佃仆，或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朝不保夕，这是导致明末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基本原因，正如时人所说："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③

明末赋役也很沉重。公元1618—1620年，明政府借口对后金用兵，向人民加派"辽饷"，强令每亩征银九厘，一年征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年总赋额的1/3以上。1637年，又令天下按亩加粮六

①康熙《陕西通志》卷9《贡赋》。
②《明经世文编》卷97贾宏：《乞正谷大用罪疏》。
③《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937页。

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280万两，称为“剿饷”。1639年，又以军费困难，加派“练饷”730万两。除加派“三饷”之外，天启时，又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费的征收，三项共加额银239万两。而封建地主总是千方百计，把赋税转嫁到小农头上，“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①为了交纳赋税，农民们只好卖牛、卖屋、卖田，以至卖妻鬻子。

佃农所受的剥削极为苛重。江南私租每亩高达一石八斗，甚或两石。正租之外，还有“批礼”银、“批赁”、“批佃”、“移耕”、“写礼钱”、“冬牲”、“豆粿”、“年肉”、“芒扫”等物的额外勒索。皖南，江浙、湖广一带，盛行佃仆制度，蓄僮养仆之风极盛，佃农累代相袭，丧失了人身自由，对田庄有着极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深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 明末统治阶级生活更加腐化，皇室的奢侈挥霍十分惊人。神宗平日深居后宫，不问政事，纵情声色，又贪财好货。1596年“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匮”。②仅他为自己营造坟墓，就役使工匠、农民、军卒数万，历时六年，耗银800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两年的全国赋税总收入。各地的宗室藩王同样穷奢极欲，福王朱常洵举行婚礼，竟挥霍了30万两白银；建造洛阳府第用银达28万两，一天到晚“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③大官僚、大地主也都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

明末的政治极其黑暗。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衙门长期缺乏主管长官，整个统治机构几乎瘫痪。而皇帝则依靠心腹太监实行专制统治，特务机构日益庞大，宦官专权愈演愈烈。熹宗时的魏忠贤，内结熹宗乳母客氏，外收一批无耻官吏为义子、走卒，有所谓“五彪”、“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

①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赋役前。
②《明会要》卷14。
③陈鹤：《明纪》卷55。

权倾一时。1623年，他又兼领东厂、锦衣卫，总揽内外大权，人称"九千岁"。门徒们在全国各地竞相为之建造生祠，宦官专横跋扈，使得政治更加腐败。

万历以后，明廷内外党派林立。浙、齐、楚、昆、宣诸党，仰阉党鼻息，"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①且彼此倾轧夺利，无有穷日。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革职回乡，与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失意士人"闻风响附"，并与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遥相应合"，②时人称之"东林党"。他们主张改良政治，加强皇权，反对宦官专权，以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为庶长子，当为太子，而神宗欲立宠妃郑氏子常洵为太子。东林党力争"无嫡立长"，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依违其间，各党派章疏竞进，或赞成或反对，不一而足。公元1601年，神宗拗群臣不过，勉强立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历时达20余年之久的"争国本"闹剧。公元1615年，不甘失败的郑贵妃指使一男子持棍打入常洛居住的慈宁宫，企图谋杀太子，事败后舆论大哗，史称"梃击案"。公元1620年7月，神宗死，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几天后，光宗病危，郑贵妃遣太监崔文升进泻药，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一命呜呼，史称"红丸案"。光宗死后，郑贵妃同伙李选侍（光宗宠妃）占据乾清宫不走，又紧紧控制了太子朱由校，杨涟、左光斗等大臣上疏要求其移出正宫，史称"移宫案"。在"明宫三案"、"争国本"、福王就国之争、李三才入阁事件等问题上，东林党人能够扶正抑邪，受到当时士人盛赞，熹宗天启初，一度受重用，但不久即因忤宦官魏忠贤而被斥逐、诛杀，朝政更加黑暗。

农民的反抗斗争 明末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使广大

①《明史·夏嘉遇传》。
②《明史·顾宪成传》。

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由于政治腐败，水利失修，自然灾害、瘟疫也频频出现。当时，“赋重则刑繁，复乘之以天灾，加之以饥馑；而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怨于天”。①广大农民因地主的剥削掠夺，已完全丧失了抗灾能力，致使农村十室九空，四野凋敝。从万历至崇祯间，全国几乎连年遭灾。公元1587年，“黄河以北，民食草木，”陕西“富平、蒲城、同官诸县有以石为粮者”。次年，“河南饥民相食”；②人民只能依靠吃树皮，“发瘗胔以食”，吃“观音土”来苦渡荒年，甚至“母烹其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被逼上绝路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了。

公元1588年，刘汝国在皖、赣、鄂交界地区起义。次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起义。1595年，苏州王森在北京领导白莲教秘密活动，分出教派达十六、七支，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公元1599年，浙江白莲教首领赵一平、孟化鲸在徐州起义。1606年，南京刘天绪密谋起义，事泄失败。公元1622年，山东郓城爆发了徐鸿儒起义。各地的抗暴斗争，南方的佃农抗租斗争，奴仆暴动以及兵变、民变，史不绝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势不可免。

三、明末农民大起义

起义的爆发 陕北一带，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而王公官绅的盘剥，朝廷的暴敛，“辽饷”加派又极为沉重，③农民承受不了，只好大批逃亡。逃亡农民或投为边兵或充当驿卒，而兵饷的积欠，工银的轻微均不足以糊口。更值崇祯时裁汰驿卒，使之流亡而无生计。万历以来，陕北灾荒不断，如1609年，全陕风灾，延安旱饥，

①文秉：《烈皇小识》卷4《皇陵震动疏》。

②《明史·五行志》。

③明廷三次加派“辽饷”，共增收白银520万两，其中陕西为26万余两，与山西、河南、湖广并称全国最重的四个省份。

民多离乡，次年，全陕大饥，陕北尤甚；水、旱、虫、疫、风、地震等天灾频仍。老百姓食蓬草剥树皮，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籍，臭气熏天”，①而官府催租，却急如星火。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澄城饥民在白水人王二和郑彦夫的领导下，冲进县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随之，府谷王嘉胤、安塞高迎祥、汝南王大梁、宜川王左挂、延安张献忠等相继起义，在战斗中义军力量日强。1631年，各支起义军纷纷渡河转入山西。

荥阳大会 公元1633年冬，农民军强渡黄河，入河南，声势更大。明政府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企图将义军聚歼于河南。为了迎击明军进攻，公元1635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会上决定采纳李自成提出的联合作战，“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东下，直捣凤阳，焚毁明朝的皇陵和龙兴寺，粉碎了明军的围剿计划。

义军力量的壮大 公元1636年7月，周至一战，高迎祥被俘遇害。李自成继称“闯王”，继续斗争。但在公元1638年春，于梓潼战败，伤亡惨重，以后率部长期转战于川、陕、鄂交界地带。这时张献忠实力最强，公元1636年7月，他联合罗汝才、马守应等部20万农民军，急攻襄阳，沿长江东下，会合江北贺一龙、贺锦等部，破六合、仪真、扬州，各地告警，南京大震。次年，明急忙起用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②，并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1638年，刘国能、马进忠、李万庆、罗汝才等降明，张献忠也在谷城“受抚”于总督熊文灿。

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再度起兵。崇祯大怒，逮杀熊文灿，令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②河南、陕西、湖广、江北四巡抚主攻义军，为“四正”；延绥、山东、山西、江西、江南、四川六巡抚分致义军，为“六隅”，二者合称“十面网”。

杨嗣昌统兵十万，专攻张献忠。张献忠偃旗息鼓，攻入四川，杨嗣昌入川堵截。起义军采用“以走致敌”的战术，快速流动，数月内驰骋大半个四川，拖得明军疲惫不堪。

公元1641年初，张献忠突然挥师东下，一昼夜疾驰三百里，攻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库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杨嗣昌以指挥无方，“失陷藩王”而畏罪自杀。

“均田免粮” 张献忠谷城再起后，各地义军纷纷重举反明大旗。明以主力集中围剿张献忠，河南一带防务空虚，豫北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公元1640年11月，李自成率部自陕南商洛进入河南，“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②。河南小股义军如老当当、一斗谷、一条龙、小袁营、李振海等部皆附于李自成，起义军“席卷河南，有众百万”。③一些读书人如杞县举人李岩，④卢氏举人牛金星，浪迹江湖的宋献策等也投入军中，被李自成用为谋主。他们劝说李自成收揽民心，以夺取天下。在李岩的建议下，李自成针对明末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灾荒不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它符合广大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和减免赋税的普遍要求，因而极能鼓舞人心和号召群众，在政治上发挥出了巨大的动员作用。具有现实意义的“免粮”口号尤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所以李岩作的免粮歌谣也就能风靡一时，迅速传播。

次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放粮赈济贫民，河南义军如众流归海，纷纷汇聚于“闯王”旗下。不久，罗汝才部、袁时中部、贺一龙与贺绵的“革左五营”相继来投，群雄归附，“李自成据河、雒，有众五十万，”⑤声势远远超过了张献忠。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4。

③《小腆纪年附考》卷1。

④李岩是否真有其人？是否李自成主要谋士？史学界分歧颇大，此处暂持旧说，以俟定论。

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7《张献忠之乱》。

农民政权的建立 公元1641年2月至次年4月，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屡次重创明军，声震中原，围剿义军的明主力基本上被消耗殆尽，为最后推翻明王朝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1642年冬，李自成进军湖广，克襄阳，襄阳人民“焚香以迎”，① 李自成部已是一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又“易得城，易得饷，易得人②”的百战强师；农民军与明军的战斗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中南、西北地区明军精锐已被大量歼灭，全国各战场农民军大体处于战略进攻的有利态势，因而建立农民政权，制定一些基本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次年5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建立了从中央到府、州、县各级政权机构。同年，李自成两次大败明军孙传庭部，乘胜攻占西安。公元1644年正月，改名长安，称为西京，正式宣布建国。定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并铸永昌钱，造《甲申历》，开科取士，又调整、扩大了中央机构。

明朝灭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军渡过黄河，攻克太原，发布了讨明檄文，历数明统治者罪状，“贿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公侯皆食肉纨裤，而恃为腹心；宦官悉吃糖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③”沿途义军又提出“五年不征”，“三年不上粮”，“平买平卖”等口号，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群众“或椎牛载酒以先，或预为大膳进食”。④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王朝宣告灭亡。

张献忠也于公元1643年5月攻克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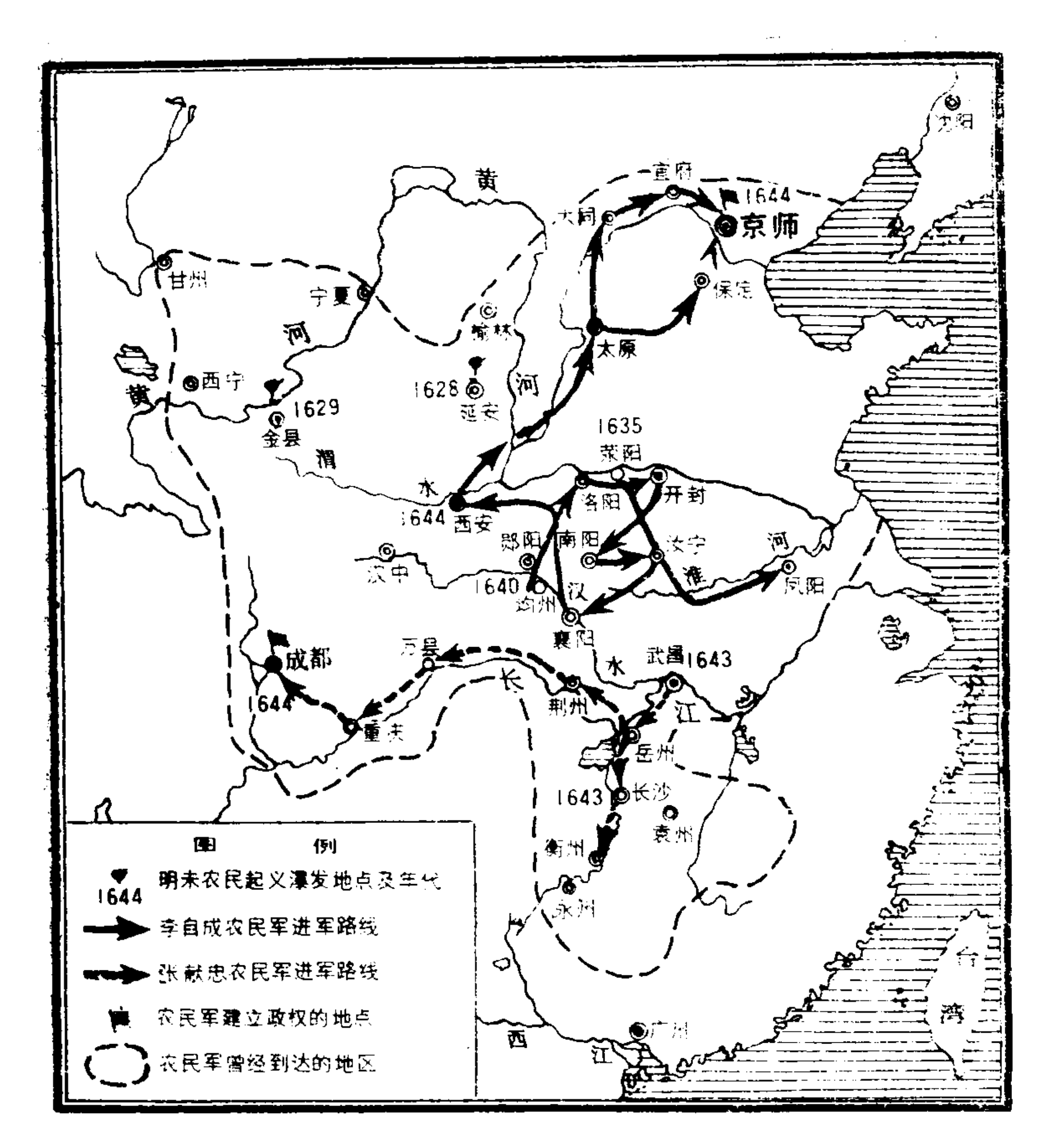
---

①彭孙贻：《平寇志》卷5。

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

③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④《甲申传信录》卷1。



明末农民起义图

改武昌为天授府，即“大西王”位，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有巡抚、知府、知县等职，同时开科取士。年底，大西军入川。公元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造《通天历》，铸“大顺通宝”。在中央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建五军都督府，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征将军。

失败原因　明末农民战争历时近20年，席卷了大半个中

国，参加起义的群众多达百万人，这次起义推翻了明王朝，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结果却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起义军领导集团在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和策略失误。

明亡以后，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虎视眈眈的清军对农民政权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残存的南明政权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敌对力量。如何迅速调整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李自成等人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很不得力。首先是警惕性不高，对清军入关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招降时也处理不当：仅派唐通去招降已属失策；刘宗敏夺吴爱妾，拷掠其父，无异于为渊驱鱼；李自成一怒之下，仅率六万义军轻率出征，又行动迟缓，骄傲轻敌，更犯了兵家之大忌。其次，拷掠明官，追赃索饷，这种不讲究斗争策略的简单偏激作法，扩大了打击面，客观上造成了促使满汉地主相互勾结的消极作用，致使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最后，对南明抱有幻想，只派少量军队征讨，致使义军南退时，不断遭到明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军事行动困难重重，一败而不可收拾。

第二、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是起义军全局战略上的一大错误。义军长期流动作战，从未建立起完整稳固的根据地为依托，难免在作战、军粮供应、伤员安置、兵员补充等方面发生困难，在形势不利遭受挫折的时候，更加难以应付。如果说在前期快速流动是义军的长处的话，那么在明亡以后，“流寇主义”的思想作风，长期流动作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弊端，使义军在狡悍善战的清军进攻下，无法应付，而一败再败。

第三、因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农民的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的落后观念，难以抗拒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农民军进入大城市后，封建的伦理思想、典章制度、风俗习

惯、生活方式扑面而来，起义军从上到下不断发生蜕化变节现象。追求享乐、贪恋金钱、美色的观念很快削弱了农民军将士的战斗意志，义军素质不断下降，战斗力迅速减弱。

第四、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思想为害不浅。明亡后，义军中普遍存在着小生产者的满足心理；居功自傲、太平观念，使义军领导人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力。大将刘宗敏轻重颠倒，整日忙于追赃事务；袁宗第、李过等醉心于追求享乐；谋士牛金星则终日“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①俨然太平宰相，连李自成竟也昏昏然，热衷于打听祀天大典的仪式程序。

第五、起义军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李自成之误杀李岩，刘宗敏之欲有报以牛金星，田见秀、李过等人对李自成的抗命不遵，都给农民军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大顺军均尚有几十万人，却因高级将领之间意气相争，各不相服，致使起义军后期群龙无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难以汇成一股强大力量，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

历史意义 首先，农民军经过长期奋战，终于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豪绅权贵于战乱中或死或亡，许多农民也通过暴力手段夺得了土地，大量奴仆获得了人身自由，猛烈地冲击了明代旧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秩序，也打击了清的统治，对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农民革命猛烈地打击了封建道德和纲常伦理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的产生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再次，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继承发扬了唐、宋以来农民革命的朴素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封建大土地所

---

①《甲申传信录》卷 6 。

有制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愤恨及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标志着中国古代农民革命进入了最高的历史阶段。

最后，农民军提出“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口号，保护了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重要名词：

黄册　鱼鳞图册　靖难之役　厂卫　郑和下西洋　奴尔干都司　土木之变　于谦　一条鞭法　戚继光　匠班银　援朝战争　葛贤　努尔哈赤　皇太极　八旗制度　三饷　宁远大捷　东林党　荥阳大会　“均田免粮”

思考题：

1．明初采用了哪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2．试述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3．试述明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的情况。

4．简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5．试评朱元璋。

第十四章　清代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1644—公元1840年）

第一节　清军入关和各地的抗清斗争

一、清军入关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清军入关　大顺军推翻明朝政府后，全国政局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农民军继续与明朝残余势力作斗争。他们追赃比饷，镇压地主反抗，委任中央及地方官员，释放奴婢、囚犯，推行“均田免粮”，做了不少巩固新政权、扩大胜利成果的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对清朝入关和亡明残余势力复辟及满汉地主阶级可能勾结共同镇压人民革命的现实危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得力的措施，结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很快陷于被动。

一直寻找入关时机的清朝统治者得知农民军入京、明室倾覆的消息后，纳范文程、洪承畴之策，以“吊民伐罪”为号召，率师直奔山海关。

当时，明将吴三桂统大军驻守山海关。吴出身辽东豪门，其舅父祖大寿、老上司洪承畴及其他一些辽东将领早已降清，其父

吴襄在辽东、北京等地广有田宅。吴三桂拥“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①稳定或招降吴三桂，无论对于清朝还是农民军都至关紧要。在这一历史关头，吴三桂面临着困难的抉择：或降清剿闯，或联闯抗清，或暂作观望，伺机行动。农民军曾以吴三桂的家资、父亲和爱妾为质，诱逼其接受招降。吴三桂迫于无奈，也曾接受了农民军的劝降。但当他得知家资被抄、父亲被囚、爱妾被占后，盛怒之下，反“乞师”于清。这就给清军入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本来，清摄政王多尔衮所率清军的进军路线，仍是皇太极时多次犯明的老路，即避开山海关，由长城沿线关隘突入。吴三桂忽然遣使“乞师”，使多尔衮喜出望外，遂对吴三桂百般抚慰，许以“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并日夜兼程，驰赴山海关。

李自成闻讯后，率师东征。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约6万大顺军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奋力战守，几近不支。次日，数万清军涌至山海关，使李自成的疲惫之师猝不及防，战局逆转。二十六日，李自成败退北京。二十九日仓卒行登基礼于武英殿。三十日，农民军退出北京。五月一日，清军入据北京。九月，清廷正式由沈阳迁都北京，定鼎神州。

民族矛盾的激化 清朝入主中原，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先的阶级矛盾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圈地”和“薙发”。

所谓“圈地”，就是将畿辅500里内汉人的土地强行圈占。皇家圈占的，叫做“皇庄”或“内务府官庄”；宗室圈占的，称“王庄”或“宗室庄田”；京畿各州县的八旗官兵圈占的，名曰

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史可法传》。

"八旗庄田";各地驻防八旗官兵圈占的，则谓之"驻防庄田"。原先在这些庄田上生活着的汉族人民，"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①他们有的沦为新地主的庄丁，有的"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②奋起反抗。

顺治元年，多尔衮进入山海关当天，就下令关内外兵民一律剃发。后因天下未定，出于策略考虑，曾收回成命，暂允"照旧束发，悉听自便"。次年夏，中原勘定，清廷重申"剃发令"，凡"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敢为此进谏者"杀勿赦"。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③的高压政策，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拼死反抗。

清廷还颁布和施行一系列"逃人法"、"投充法"等苛法暴政，意在扑灭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但是，这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抗清运动。

二、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抗清斗争

大顺军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北方各地人民抗清斗争纷起。有的直接加入大顺军与清军作战，如山陕地区；有的独立为战，如山东嘉祥、巨野间以官文彩为首的满家洞起义军，曾给南下清军以猛烈的打击。大顺军西撤途中，一面要对付尾追不舍的清军，一面又要与沿途地主武装斗争。大顺军且战且走，曾在河北望都、定州英勇还击清军，在真定大战中，重创吴三桂军。李过在陕北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集兵3万，打出府谷，渡河进逼大同，给清军以很大威胁。太原的农民军一度反攻河北，直指真定。但是，李自成急于返回西安固守关中，无心恋战，没能积极利用华北各地人民抗清斗争的形势而有所作为，清军将各支

①史惇：《恸余杂记·圈田》。
②《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1。
③《明季南略》卷9《续记》。

抗清力量各个击破，较顺利地从冀、鲁、晋、豫掩杀过来。

在此危难之际，农民军领导集团又发生了内讧。为了减轻陕西大顺军的压力，牵制清军力量，制将军李岩请命自率2万兵马，前去家乡河南镇压地主武装的叛乱，恢复大顺地方根据地。但李自成轻信牛金星的谗言，以叛离罪名杀害了李岩兄弟。而刘宗敏又欲杀牛金星。于是大顺军首脑集团发生了分裂，文武不和，将士离心，战斗力大为削弱。顺治元年八月，李自成退抵西安。

十月，清军兵分两路，直逼陕西。一路由河南攻潼关，一路由山西经陕北南下，然后会攻西安。1645年初，清军发动钳形攻势，大顺军虽亦经过激烈战斗，但终因腹背受敌，无力支持，遂一弃潼关，再弃西安，由蓝田、商洛出武关，入襄阳，旋至武昌。入夏，李自成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查看地形时，遭地主乡勇袭击，不幸殉难①，死时年仅39岁。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政权，虽凭剑阁之险，暂未受到清军的直接威胁，但张献忠比之李自成，更少治国长策，惯于流动作战，虽得天府之壤而无法立足扎根。川绅组络的地主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大西政权的威令所及，不过成都附近十余县而已。1645年秋，清王朝曾诱逼张献忠“率众来归”，被拒绝。次年秋，张献忠弃成都北上抗清。为了表示其决心，他亲手杀死幼儿，对部将说道：“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年底，驻军川北西充山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清军伏围于凤凰坡上。兵败牺牲，时年40岁。

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他们的余部继续抗清，成为西南抗清斗争的重要力量。

---

①一说李曾削发为僧，直至康熙年间才老死于湖南石门县的夹山灵泉寺。

三、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

清室入主北京后，亡明的残余势力无法在北方立足，于是江南的和由北京南逃的明遗臣们开始了重建明朝的努力。这里，遗臣们的忠君爱国热忱与统治集团中卑鄙肮脏的权力倾轧交织一起。先后出现的流亡小朝廷有：福王弘光政权，鲁王监国政权，唐王隆武政权，唐王弟朱聿𨮁之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等。历史上统称这些政权为“南明”。

福王弘光政权 1644年5月，经过一番权力倾轧，由阉党分子马士英等拥立世系较近的神宗之孙福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弘光。

弘光政权，君暗臣奸，十分腐败。政治上排斥东林，打击异己，如史可法就被挤出朝廷，遣往扬州督师。经济上借口兴复，滥征苛税，以至于卖官鬻爵，民谣讽刺说：“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生活上极为奢侈，大兴土木，遍选美女，纵情声色。面对清大军南下的严重威胁，不思战备，幻想以割地、赔款，求得偏安。

1645年4月，驻武汉的左良玉，发兵“清君侧”，朝中权臣马士英亦调集兵马反击，史可法在扬州疾呼团结抗清。不久，清军攻屠扬州，6月初兵临南京。福王挟妾逃走芜湖，为降将持献清军，后被杀于北京。弘光政权，“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残喘一载便覆灭了。

鲁王与唐王政权 福王垮台后，明一班遗臣又于1645年闰6月，拥立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太祖十世孙鲁王朱以海，建监国政府于绍兴，逃亡的马士英之流依附其中；一个是太祖九世孙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号“隆武”，主要由郑芝龙兄弟及黄道周等拥立。

当时东南沿海，义军蜂起，民心可用。但唐、鲁二王叔侄，

各揣心事，互相勾斗，而一班奸险人物又煽惑其间，二王“形同水火”。

公元1646年初，清军直逼浙江，鲁王被降臣挟献清军，后偶得机会逃脱，先后浪迹于舟山、南澳诸地，成为有名的“海上天子”。直至1661年，飘泊十余年的鲁王卒于台湾。

唐王朱聿键在艰难困厄中颇思有所做为。他诗书满腹，布衣素食，不好酒色，较得人望。但即使如此，亦无补于将沉之漏舟。鲁王败逃后两月，清兵入福州，唐王走至汀州终为清军所俘，后绝食死于福州。

唐王即位的同时，其弟朱聿鐭亦在广州建监国政权，改元绍武。但该政权更是势小力穷，挣扎不足一月而亡。

桂王的永历政权 唐王败讯传至两广，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便迎立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于梧州监国。1646年11月，又有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襄赞，立由榔为帝，居肇庆，改元“永历”。

永历帝在位13年，兵多将广，据有西南山川之险，维持时间较长。但他胆小如鼠，避战求安，四处逃身，成为一个扶不稳的“走天子”。

永历政权曾得到两个方面的大力扶助：一是瞿式耜、何腾蛟等忠臣义士的死力辅佐，一是李定国等骁将所率大西军余部的保驾，一度曾开创出抗清斗争的大好局面。但是，桂王的臣子们无休止的朋党派系之争，断送了反清的大好形势。瞿、何先后战死，桂王走南宁、匿土司，后遇李定国保驾，仍“走”个不停。居黔、入滇，最后逃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次年元月，缅甸政府迫于兵威，献桂王及其家属。四月，吴三桂用弓弦绞死桂王及其爱子于昆明。永历政权至此覆灭。

上述这些南明小朝廷本身极为腐败，它们是无力将广大军民

的抗清斗争引向最后胜利的。但它毕竟作为一种民族斗争的组织形式，使不同的阶级、阶层，在这并不光彩的旗帜下，进行了可能的民族反抗斗争。

四、江南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清斗争

史可法抗清与“扬州十日” 史可法，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清兵入关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弘光政权又加以大学士衔，尊称“史阁部”。因受阉党排斥，未能入阁办事而督师扬州。史可法一直以农民起义军为心腹大患，力主剿灭，甚至一度主张联合清军以剿杀农民革命。和当时许多明臣一样，因时势急剧变化，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史可法最后由联清立场转向矢志抗清。他誓以“恢复神京”为使命，被时人比做南宋李纲。多尔衮亲寄书信劝降，史可法的回答是：“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

1645年4月15日，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独力支撑，坚守城池。25日城破，史可法自杀未及，被清军所俘，豫亲王多铎备加礼遇，许以高官厚禄劝降。史可法断然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后从容就义。

扬州城破，明将刘肇基率军民坚持巷战，无一降者。多铎为施报复，竟下令屠城，10日后方才封刀。这10日里，几十万男妇老幼惨遭杀害，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渠，惨不忍闻，史称“扬州十日”。

屠城后，史可法的尸骨已无法辨认，人们只得将他生前的袍笏代尸葬于扬州梅花岭上。“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史可法的名字成了当时和后世人们反清抗暴的一面旗帜。

反剃发斗争与“嘉定三屠” 清军连克长江南北诸镇，每到一地，必厉行剃发令。1645年6月，清拿下南京，传檄江阴，

严令3日内剃发。江阴人民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并击杀了清派来的知县，共推典史陈明遇、前典史阎应元为城主，组织抗清守城。江阴数十万百姓自发聚其麾下，与清军展开决死战斗。至8月21日，江阴人民守城81天，杀死清军三王十八将，击毙清兵7万5千多人。21日城破，阎、陈力战殉城。清军入城，奉命"满城屠尽，然后封刀"。江阴军民战死、自尽及被屠者计17万2千余人，全城终无一人投降。

"剃发令"推行到嘉定，百姓即刻造反，公推侯峒曾等为首领，誓与城池共存亡。7月3日，清兵10万多，围攻甚急，守城百姓冒雨忍饥，坚持三昼夜。6日，清军入城，侯峒曾的次子问父亲该怎么办，侯峒曾说："有死而已，复何言！"①遂双双投河。清军入城，大肆屠杀百姓。百姓再度反抗，清军再度屠城。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至8月16日，嘉定人民共牺牲2万多人，是为"嘉定三屠"。

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和郑成功收复台湾 1645年，清军从南京进抵苏杭，松江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奋力反抗。夏完淳自幼饱读诗书，15岁投笔从戎，随父起兵抗清。其父、其师死难，完淳矢志以报家仇国恨，不幸很快落入敌手。夏完淳被捕后，直骂得洪承畴等一班降臣无地自容，后与岳父一并就义于南京西市，年仅17。死前留诗云："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可见其视死如归的抗清决心。

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原名森，字大木，后因忠勇，弘光帝赐姓朱，改名成功。其父郑芝龙，为拥立南明朝廷的功臣。唐王政权将覆灭之时，郑芝龙为保身家而降清。成功生母被清军奸污而自缢。1646年底，23岁的郑成功在泉州孔庙焚烧儒服，宣誓起义。其父曾派幼子劝降，被严词拒绝。清军挟其父为

①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

人质逼降，成功不为所动，攻战愈急。

郑成功招揽了各部抗清力量，并与张煌言等合作，多次挫败清军。1659年，郑成功与张煌言曾攻入长江，收复4府3州14县，东南大震。后中敌计，败退厦门。次年，清军攻入厦门，郑成功扼海门大败清军，后清军再也未敢贸然进犯。

1661年、大陆抗清形势已转入低潮。清廷又实行“迁海”政策，围困厦门。郑成功以势难持久，遂留儿子郑经守厦门，自率大军攻取台湾。当时，台湾为荷兰殖民统治者占领。郑成功多次击败荷兰侵略军，公元1662年正月初一，荷兰总督揆一被迫献城投降。台湾被殖民侵略者统治38年之后，又回归祖国。

农民军余部在西南的英勇抗清斗争 永历政权在西南惨淡维持10余年、全赖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全力支撑。

李自成死后，余部尚有四、五十万人马。这些力量分别由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刘体纯及高夫人等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何腾蛟、瞿式耜等明臣联合抗清。他们曾接受唐王、桂王封赠，英勇作战，一度除保全广西不陷，还连复湘潭、湘乡、衡阳等地，并进围长沙，湖南之地近乎全部光复。后因作战失利，辗转退至川东。他们屯田练兵，坚持抗清，与川东各支抗清力量被称为“夔东13家”。

大西军余部，为李定国等率领，先后进入云南，与桂王永历政权联合抗清。

李定国，陕西延安人。他智勇双全，忠义得人。曾多次于危难之际扈驾征战，转危为安。他率兵连克桂林，长沙等重镇，使西南抗清形势大有起色。他屯军之地，“军民相安”，人民甚至“不知有兵”。公元1662年，李定国闻知桂王死难于昆明，见反清大势已去，呕血死于滇南勐腊。死后，部下竟聚集不散，自称“桂家”，与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开矿、务农，一起

开发和守卫祖国西南边疆。李定国的抗清史迹，西南人民至今有口皆碑。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

清王朝的统治机构，是因袭明王朝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做法，并进行了适应本朝统治的改造。

中央机构设置 清朝因袭明制，设内阁、六部。内阁设满汉复职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形似历朝宰相。但由于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康、雍时又建"南书房"、"军机处"，阁权大受削抑，成为一个地位虽高事无实权的机构，政务执行由六部传达，有的也不经内阁。

"议政王大臣会议"，又称"国议"。"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王大臣"。①这是女真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残余。随着女真社会封建化的完成，君权与旗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皇太极时，改革八旗旗主联合主政制度，从削弱到废除四大贝勒共理朝政制，努力做到南面独听天下。但斗争还在继续。

康熙当政，厉行君主集权。他采取坚决措施，铲除权臣，整顿旗务，将八旗军政大权收归朝廷。他御门听政、乾纲独断，为排除来自"国议"的诸王大臣的干扰，另置"南书房"，顾问应对，草拟谕旨，成为一个特殊的内廷御用秘书班子。

雍正即位后，进一步摧抑诸王旗主势力，以法律手段，剥夺各旗主特权，甚至严禁宗室王公"交通外吏"。在对西北用兵

---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2 "议政王大臣"。

时，为紧急处理重要军务、严守机密而特设军机房，后改房为处，遂成定制。军机处设于乾清门外、隆宗门内，以便就近聆听圣旨，拟发诏谕。它承君命、备顾问，“综军国之要”。①凡军机处不经内阁直接发往各处的天子谕令，称“密发”，“廷寄”，多为机要重务；而内阁所传圣旨，称“明发上谕”，不过例行公事。内外重臣通过军机处上奏的文本称“密折”；而通过内阁上呈者叫做“题本”。所以，“迨军机设，题本废，内阁益类闲曹”②。而且，军机处设立后，满洲诸王旗主干政的机会完全排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徒拥空名，到公元1792年，就被明令裁撤了。

军机处权大职尊，但与历史上的相府不能同日而语。它既无官署，又无属吏；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一律实行满汉复职制，互相牵制，它们均无专品专薪，待遇一依本官；任命时，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章京上行走”等带有兼职和皇帝临时差遣的性质；它没有决策权，必须完全秉承圣意，“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③这实在是强化皇权再好不过的工具，它标志着封建君权已增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明代中央机构中有六科给事中之设，对应地察核六部，还多少保留着唐以来给事中的封驳之权。雍正时，干脆将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不再成为独立的机关，历史上的封驳之职不复存在。至此，屡被削割的相权，连残余影响都扫荡殆尽。

鉴于前朝宦官之祸，康熙废掉宦官诸衙门，另置内务府，专司皇家宫廷事务。从此，宦官不过供御膳洒扫而已，无法左右天子。历史上宦官干预朝政的祸患算是从制度上得到解决。

清中央又设“理藩院”，“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

①《钦定大清会典》卷3。
②《清史稿·职官志·序》。
③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

之事务。①对边疆少数民族所居广大边境地区“控驭抚绥，以固邦翰”。②这一机构的设置，是清代加强国家统一，打击分裂势力及致力于边防建设的重要手段。“理藩一职，历古未有”，③为清代政治制度中富有特色的创造。

地方政权设置 清代对内地和边疆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内地十八行省，设总督与巡抚。这时的督抚，不再是明代那种临时的差遣，而成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军政要职，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督抚官至二品，例兼兵部、都察院副职，全权处理一方军民大政。巡抚专辖一省，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不等。他们直接由皇帝任免，向皇帝负责，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对于边疆地区，清廷实行特别的行政管理办法。在蒙古、新疆、西藏、东北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掌该地区军政大权。凡地方一般事务，由地方上层教俗首领具体处理。而涉及重大事务，都得与所驻将军、大臣会理。这些将军、大臣与内地督抚一样为皇帝的特派大员，直接听命于皇帝。

内地督抚以下，有府（直隶州）、县（散州）、厅等政区，其职能大抵一如前代。只是在省与府之间，又设有“道”，情况较复杂。有分守道、分巡道、专职道之别，似兼有行政、监察或专职差遣的性质。

地方之基层，除沿用明朝的里甲制督课赋役外，另有保甲制度之设。规定城乡居民，十户为一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头；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凡户挂牌验身，户、牌、甲、保、上下联防，互相监视，连坐治罪，形成一个严密的基层控制网络。

---

①②③《清史稿·职官志二》。

二、军事制度

八旗兵 八旗兵本是满族的一种兵农合一的嫡系部队，后逐渐扩大，又有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约22万多兵丁。以“内重外轻”原则，半为京营禁旅，装备精良，拱卫京师；半为驻防军，分驻全国各军事重镇，监控天下。

绿营兵 绿营兵系由明朝降兵编制而成。后广募汉丁，兵员多至66万。因以营为建制单位，用绿色军旗而得名。绿营兵的“巡捕营”驻防京师，附隶于八旗步兵营。大部分驻防各省，由提督、总兵等率领，归督抚辖制。绿营与八旗互相配合，同时，又受八旗部队的监控。

八旗、绿营两系，构成清朝军队的主干。此外，做为补充力量，尚有地方团练、乡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兵、番兵等。连同旗、营兵计算，清朝武装力量不下百万之众。这些武装力量作为清朝统治的支柱，执行着对内镇压反抗，对外防御侵略的职能。

三、法律措施

《大清律例》 清入关初，法制未具。后依《大明律》为蓝本，“增损裁量”，于顺治三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简称《大清律》。以后，又经康、雍、乾三朝不断修订，公元1740年正式名为《大清律例》，颁行全国。

《大清律例》之实质，与历代王朝的律令一样，旨在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如“五刑”、“十恶”、“八议”等规定，一如前朝。不同的是它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法网更为严密。同时，带有突出的民族统治和民族压迫特点。如：旗人犯法不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由宗人府特审；如须处刑，亦可依例“减等”或“换

刑”。

清律内容分“律”与“例”两种。律436条，而例竟达1049条。律是原则规定，例是历朝积累的具体司法事例和经验。所谓“断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而变通”。①以例释律、以例补律甚至以例代律，是清代法律制度的一大特点。

《**会典**》 清王朝重视总结国家管理经验，加强统治机构的效能。从康熙始，制订《会典》详记国家机关行政的职能、事例与准则。清人认为“会典，乃当代宪章，与律令相表里”。②清《会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行政法典，值得认真研究。

四、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

清朝以一个少数民族“抚临中夏”，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与汉族相比明显的数量劣势及文化上的落后。故而清统治者十分注意学习汉族封建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通过拉与打的软硬两手政策，加强对人心的征服和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

所谓“满汉一家” 在确保满洲贵族在政权中优越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清廷极力造成“满汉官民，俱为一家”的局面，用以消除汉族地主士人的反抗意识。大多数公务衙门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即满汉官员人数对等，共理政事。其品位亦屡经调整，满汉划一。各部院衙门之印钥，官衔在前者执掌，“不必分别满汉”。凡奏章，须满汉官员联衔会奏，不得“只有满臣，不见汉臣”。此外，还通过满汉通婚等手段联络汉族地主阶级势力。这大大促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科举与学校教育 清于入关第二年就开科取士，录取举人1534名。清朝除正科外，还有加科、恩科；又有博学鸿词科，专门征举那些怀才不仕、隐逸山林的前明朝遗民，其中不乏民族意

---

①清《重修律例纂集成·序》。

②赵吉士：《万清阁自订文集》第1集。

识强烈的大学问家。这样，清政府为汉族的知识分子广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逐渐地冲淡其遗臣之志和故国之思，吸引他们加入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

清代科举，在雍正以前分满汉两榜取士，在录取名额和考题难易方面优待旗人。之后，满汉一同考试。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名跻"三鼎甲"者，共324人，其中汉人321人。清代科举形式大抵袭自明制，但科场案屡发，异常严格。殿试后，又加"朝考"，仕途的关卡增多了。

与科举发达相适应，清朝学校教育亦较历朝兴旺。传统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进一步健全完备，并将宋以来的私立书院纳入官办，一体做为科举储才之所。国家对学校教育在政治上严加掌握，教材内容是四书五经等纲常伦理。各省设提督学政，专司教育，加强管理。在经济上对就读学子设法扶助，"免其丁粮，厚其廪膳"。①在管理上，有学正、教谕、训导、教授、司业等学官，管教齐备，月课、季考，督责甚严。

文字狱 清廷对知识分子除了怀柔政策，还实行坚决的威慑镇压手段。清人作文写诗，稍有不慎，某文某字犯了皇帝的忌讳就惨遭迫害，此即所谓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二年。这年，河南乡试，某考生将"皇叔父"写作"王叔父"，两位主考因此被革职押送刑部治罪。

康熙时期，著名文字大狱有两起：一是"明史案"，二是《南山集》案。都因追记明代史事犯了皇家的忌讳，先后牵连被祸的江南江北名士达500多人。

公元1826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主考江西，用诗经中"维民所止"做考题，被人告发："维"、"止"便是去雍正之头。雍正恼怒异常，罗织罪名，将其下狱。查死狱中，又遭戮尸，儿子被杀，妻妾族人充边。

①《清会典》卷32，转引自《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乾隆在位60多年，兴文字狱70余次。内阁学士胡中藻写了一本诗集，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乾隆斥责其将"浊"字加在国号之上，又搜罗了些罪名，兴起大狱。胡被弃市，族人16岁以上者全斩。胡的老师，著名功臣鄂尔泰的灵牌也被撤出"贤良祠"。鄂的儿子，巡抚鄂昌因与胡有诗唱和，令自尽。

公元1778年，已逝扬州举人徐述夔被告，其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乾隆斥其思明仇清，骂清人为"胡（壶）儿"，遂下令：将作者并其儿子开棺戮尸，其孙解京正法，所在地方官坐罪。

清朝皇帝的这种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使士子文人"避席畏闻文字狱"。文人写作，只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恰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文字狱禁锢学者思想，窒息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其祸之烈，不亚于焚书坑儒。

清廷在大搞文字狱进行迫害的同时，也注意笼络知识分子，将一大批文人学者的精力吸引到修国史、编类书等整理文献古籍的活动中去。为身家性命计，许多学问家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将毕生心血耗费于古代经典的文字考据。虽然，这有背于经世致用，但确也在古籍整理、考订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乾嘉学派的考据成果，至今遗惠于我国文史界。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一、削平三藩和统一台湾

削平三藩　"三藩"是三个被封授王爵的明降将：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袭父、祖爵）。他们替清

王朝扑灭抗清斗争，统一南方，因功封王。吴据云贵，尚控广东，耿霸福建。他们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上各拥重兵，实行割据。

以吴三桂为例，他拥有近10万私属性很强的藩兵、绿营兵及其它名目的兵丁，云贵二省的督抚，都得听其"节制"。吴以势挟逼中央和地方，到处安插亲信，有"西选几遍天下"的说法。他拥有庄田700余顷，称"藩庄"。他控制四方贸易，因利作本，谓之"藩本"。其他二藩亦与吴藩类似，拥兵自重，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

顺治年间，天下未定，对于三藩势力，清王朝只得任其发展，姑息迁就。

康熙登极时（公元1661年），年方8岁，由权臣鳌拜辅政专权，朝事日非，藩祸一时还无法清除。公元1669年康熙设计一举铲除鳌拜，乾纲在握，便着手削藩。

公元1673年4月，尚可喜上书乞归老辽东，请求留子袭爵镇藩。康熙顺水推舟，即刻"恩准"其北归，却不许袭爵之请，令其尽行撤藩。吴、耿二藩闻讯，为探明朝旨，也先后奏请告老辞职。20岁的康熙力排众议，认为："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断然"从其所请"，下令"撤藩"。

吴三桂弄巧成拙，决定发动叛乱。公元1673年底，吴痛哭于被他绞死的永历帝陵前。并蓄发易服，诡称奉先王"三太子"，"兴明讨虏"，扯白旗发难。

吴氏在"反清复明"的旗号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浪潮。吴三桂在军事上曾连连得手，由云贵长驱湖南，席卷四川。一时数省响应：在福建有耿精忠，在广东有尚之信，在广西有孙延龄，在湖北有杨来嘉，在河南有蔡禄，在陕西有王辅臣。一时间，中国西南各省，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和西北一带全被波及，战火弥漫十数省。

年轻的康熙皇帝，面对危局，从容布置，决心勘定叛乱。在政治上，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一度停撤耿、尚二藩。对其他叛将也大开招抚之门。同时还大胆起用汉族将领，即使对反复不定的陕西提督、吴三桂的义子王辅臣一流，也总是晓之以义理，诱之以利禄，只论今功，不追既往，极力分化瓦解。在军事上，他以重兵扼荆州咽喉，阻吴军北进。在瓦解了叛军两翼后，集中全力，直取湖南。这样，吴三桂渐失外援，独困湖南。公元1678年3月，吴三桂于穷途末路，撕去"复明"面具，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历经明季清初长期社会动乱之后，人心思定。吴氏逆历史潮流而动，更使得众叛亲离。八月，吴忧疾而死。部下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退守贵阳。公元1681年2月，清军收复贵州，继而攻入云南。冬，昆明城破，吴世璠自尽，三藩之乱平定。

三藩之乱，历时8年，祸及10余省，年轻的康熙帝英明决断，化险为夷，削平了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无论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此，清王朝才有可能全面有力地进行一系列内政改革和经略海疆及边疆的活动。

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统治者，进驻台湾抗清。他视台岛为复兴基地，惨淡经营，政治、经济颇有一番新气象。一时"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①该年五月，郑成功感风寒而卒，时年39岁。

成功死，长子郑经嗣立。三藩叛乱，耿精忠许以漳泉三州乞师，郑经遂助耿藩攻清。后耿食言，郑耿又兵戎相见。耿降清后，郑经仍在东南沿海屡次发动对清军的攻势。三藩之乱平定，郑经病死，众臣僚袭杀其长子，拥立12岁的幼子郑克塽为傀儡。

---

①查继佐：《东山国语·台湾后语》。

郑氏政权上层分裂，内讧在即。康熙抓住了这一时机，决心统一台湾。

康熙用人不疑，他先后选用的两名汉人，对统一台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会稽人姚启圣，一个是泉州人施琅。

姚启圣极力主张统一台湾，并深谙海疆事务，被康熙破格擢为福建总督。姚设立专门机构，凡郑经父子那里来的人，特意给以华衣美食，让其"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①。不到一年，郑氏五镇大将全降。这为施琅攻取台湾创造了条件。

施琅，自幼熟悉闽台形势。初为郑芝龙部下，由抗清而降清，后又叛清附郑而后再背郑降清。对这样一个反复不定的人，康熙大胆使用，由知县、总兵，拔至提督、靖海将军、内大臣。公元1683年，施琅请得战舰300，水师2万，决定进攻澎湖、台湾。康熙允其独自率兵进发，不为节制。是年秋，澎湖、台湾克服归附。

康熙闻捷，赋诗贺功，封施琅为靖海侯，赏花翎顶戴。施琅又上书请封郑克塽等人，并禁止杀人，以安抚台湾父老之心。当时有人主张迁人弃台，施琅上书反对，指出台湾为海疆重地，4省要冲，务必着意经营管理。康熙纳其言，升台湾为府，下置3县，直隶福建省管辖，又置总兵统军驻守。及至雍正时，澎湖亦改巡检司为厅，置参将屯兵驻守。

台湾的统一及管理的加强，整肃了我国东南海疆，大大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殖民主义者接踵东来的形势下，它对于巩固我国东南海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与《中俄尼布楚条约》 沙俄本是一个欧洲国家。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一帮哥萨克匪徒越过乌

①全祖望：《结埼亭集》卷15。

拉尔山，开始建立据点，积极东进。经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它驱逐了西伯利亚各部族人民，将西起乌拉尔山东至太平洋沿岸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几乎全部占据。之后，沙俄势力乘机南下。崇祯末年，波雅科夫率哥萨克匪徒第一次闯入黑龙江下游，搜集情报，掠夺土产，并曾灭绝人性地吃掉我达斡尔人的50具尸体！

公元1649年，沙皇谕令哈巴罗夫再次入侵黑龙江地区，"进行侦察、征服"，"如新土地上有人难以制服……则可以战争和破坏他们的一些地方的手段来平定这些不顺从的人"。①第二年，哈巴罗夫一帮匪徒侵入黑龙江地区，他们抛江淹死所有男俘，"劈分"全部女俘，血洗了桂古达尔城。1651年筑雅克萨城堡。之后，另一头目斯捷潘诺夫先后领兵在黑龙江上下游往返了三个来回，把广大江北地区弄得十室九空，满目荒凉。

沙俄还通过外交手段对清政府进行讹诈。公元1670年，沙俄使节竟持信要求清皇帝"归依……沙皇陛下"。②1676年，沙皇派往北京的一个使团返国后宣称："只要有二千名陛下的正规军"，就能够进占到"中国的长城"。③

对于沙俄的侵略，中国官兵进行了坚决的还击。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国内正值多事之秋，中央政府不能全力北顾，才使沙俄侵略者横行黑龙江流域40余年之久。东北的"白山黑水"，系清的发祥圣地，康熙十分重视东北边疆发生的事变。他曾两次巡幸东北，特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练兵屯田，开辟水运，设立驿站，积极筹措军需物资。在解决了三藩、台湾问题后，

---

①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第1卷。
②《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
③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卷2.

公元1685年5月，清军向沙俄侵略军盘踞的雅克萨城堡发动自卫反击。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半月功夫，侵略军就举白旗投降了。但毫无信义的沙俄侵略者在清军撤退后，再次占据了雅克萨。公元1689年6月，清军再攻雅克萨，至第2年4月，城将克，沙皇遣使求和，清军遂解围等候谈判。

公元1689年中俄代表于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会谈，最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凡岭南一带的土地和河流，全属中国，岭北土地及河流，全属俄国。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也作为两国国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国。乌第河地区“暂行存放”，容待后议。条约又规定沙俄拆毁雅克萨侵略据点，撤走俄方全部人员。此外，还规定了两国边境人民贸易等事。康熙帝考虑到“鄂（俄）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①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尼布楚地区让给了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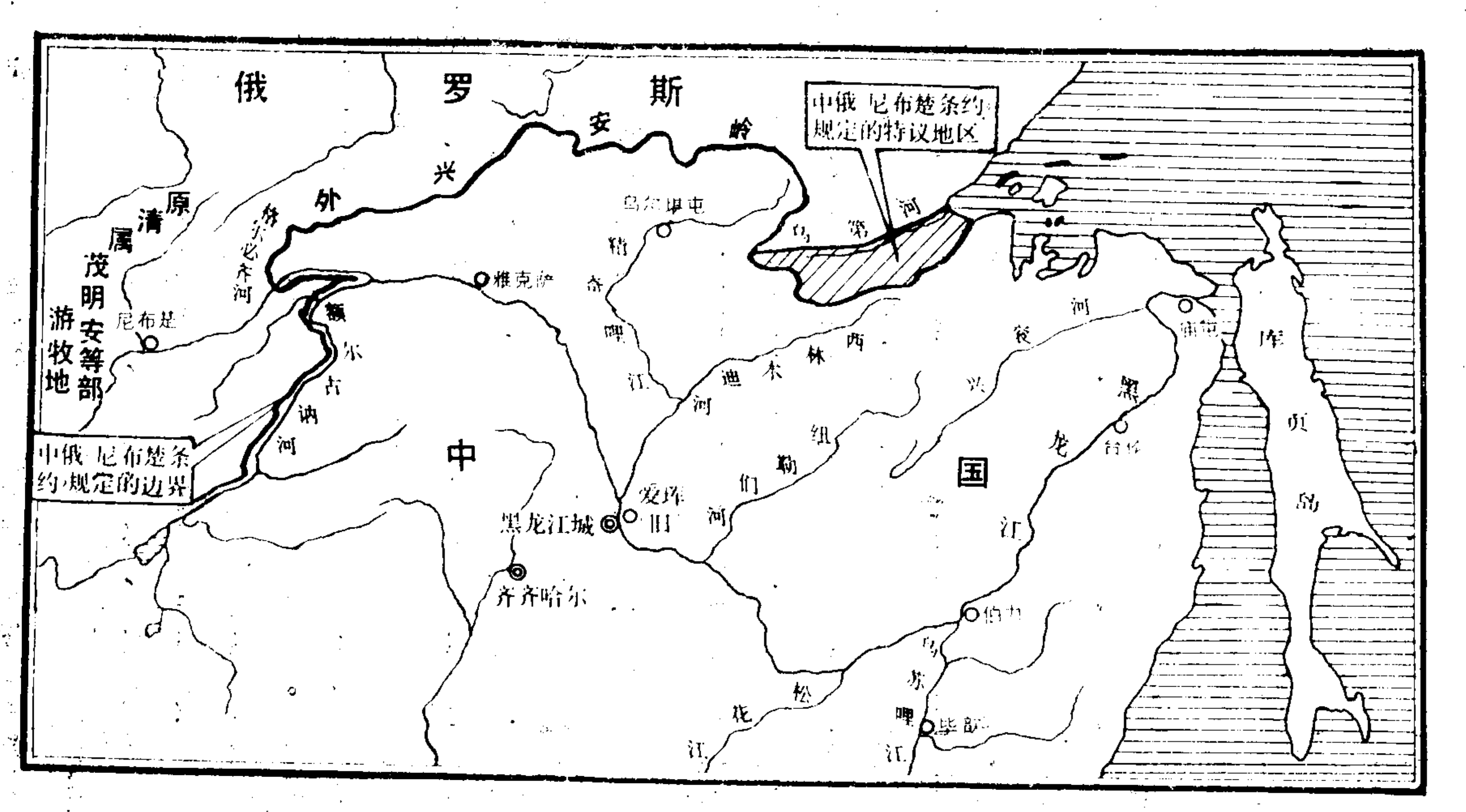
康熙帝以坚决的军事手段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阴谋，又通过和平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中俄中段边界的划定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东段边界上大体保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但历代沙皇侵华野心未死，一面继续做着南下中国东北寻找不冻港的美梦，一面在中俄边界的中段不断蚕食掠夺。康熙帝曾多次向沙皇提出抗议，并提出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要求。沙俄政府无视这些抗议与和平呼吁，继续侵吞渗透活动。康熙末年，清政府将俄国特使的代表及其所领商队驱逐出境。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新即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以祝贺雍正登基为名遣使团来华。要求缔结通商贸易条约。

---

①《清圣祖实录》卷140。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示意图

该使团在来华途中，与准噶尔叛军频繁联系，想通过插手内战对清廷进行要挟，同时又不断南移恰克图等处哨卡，造成领土占领的既成事实。在北京，又拉拢少数朝臣，收集情报。双方在京谈判无任何结果。

1727年，谈判改在离恰克图不远的布连斯奇进行，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又在恰克图正式订立《恰克图条约》。两约核心内容是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以恰克图为分界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为分界线，线南为中国领土，线北为俄国领土。

在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出于国内、国际具体局势的考虑，作了一些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如将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让给了沙俄，以及允许东正教在京设教堂传教等。但这毕竟是两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而签订的平等条约，它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遏止了沙俄对我东北、漠北的殖民势头，确定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

三、“改土归流”和对西南地区管理的加强

土司制度　“土”，即“土司”、“土官”，系指朝廷利用边疆土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充当地方政权机构长官的制度。汉武帝通西南夷后，就封归附了的王公、酋长为王侯，通过他们实现对西南边地的统治。唐代虽更其名为州县，但实质未变，史称“羁縻州县”。元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利用地方土著上层充任地方衙门长官。

明代承袭并改进了元代的土司制度，使之更加完备。中央对其授职、承袭、权限、隶属、贡纳、调度等有一整套规定。这反映了明王朝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深入和加强。清初，大体沿袭了明朝的做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封建王

朝通过这种统治方式，将历史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各民族联系在统一的版籍内，既保留了各民族地区的旧结构、旧制度不变，又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以一定影响，从而维持了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进步。这是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根源。

但是，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发展和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加强，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进步，这种制度就渐渐失去其合理性。"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土官，改由中央委派的官吏（流官）进行直接管理已势在必行。

改土归流 明政府从永乐帝开始，直至明末，曾多次进行改土归流活动。云、贵、川靠近内地的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同内地一样的管理办法。天启、崇祯年间，改土归流的形势仍在发展，但明朝势力已经衰微，剩下更为边远地区的改置，只有留待清王朝去继续进行。

清顺治时，吴三桂率军进入云贵，就顺势消灭了不少土司，改置流官统治。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在雍正朝进行的。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名臣鄂尔泰上《改土归流疏》，指陈土司已成为土皇帝，欺上虐下，搜刮聚敛不择手段，"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娶子妇，土民三年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鄂尔泰结论说："若不改土归流"，"纵使田赋兵刑，尽力料理，大端终无就绪"。①公元1728年，钦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厉行改土归流。至1731年，经鄂尔泰大刀阔斧的整顿，西南地区"蛮悉改流，苗亦归化"。②同时，慑于军威，感于恩义，两湖及四川等边远地区的一些土司头目也纷纷"撤司""纳土"。从

---

①《清史稿》卷288《鄂尔泰传》。

②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改流记（上）》。

此，西南大量土司衙门代之以府、州、厅、县，其土地、赋税、户口等管理一如内地。这就大大加强了中央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当然，明清厉行改土归流，亦有其民族压迫等历史局限性。同时，西南各省区及西北地区的僻远山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土司保留了下来，直至清末。

四、平定准噶尔叛乱，经略西北边疆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在皇太极时已全部归附清朝，清室赐其封建主以王爵，联姻结盟，并将其部属仿八旗编制。清能顺利南下夺取中原，曾得其大力援助。漠北喀尔喀蒙古原分三部，他们亦先后对清朝表示臣服。漠西，泛指大漠以西的广大地区，约当于今天的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西、直至巴尔喀什湖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辽阔地域。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四部，其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准部以伊犁河流域为活动中心。由于其游牧经济的特点及沙俄侵略者的挑唆，加上清初中原动乱，该部贵族统治者屡次掀起叛乱，祸及整个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及青藏高原。只有平定准部叛乱，清朝才能有效地对上述广大地区行使主权。为此，康、雍、乾三朝，费时70余年，劳师糜饷，数次西征准部，巩固了西北疆防。

西征噶尔丹与统一外蒙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噶尔丹杀侄夺位，自立为准噶尔部蒙古之汗。他趁三藩之乱，一面联合西藏上层集团，一面争取沙俄的支持，四出兼并掠夺，先后吞并了漠西蒙古其它三部，控制了天山南路和青藏高原。接着，于公元1688年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进攻。喀尔喀蒙古人民在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劝谕下，拒绝投靠俄国，结队内迁。一时，“南徙者蔽地而来，前后相望六十余里”，“遗弃牛马，

死者相枕”。①噶尔丹的军队一直追至科尔沁草原，扬言要“夺取黄河为饮马槽”，甚至向康熙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②清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的挑衅。

康熙屡次劝噶尔丹敛兵无效，遂决定御驾亲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大军北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先后取得了乌兰布通、昭莫多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噶尔丹在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窘境里忧疾毙命。准部叛乱遂被平定。

叛乱平定后，喀尔喀蒙古诸部返回故土。根据平叛期间清廷“多伦会盟”所定，在漠北亦如内蒙一样推行旗盟制度，其上层旧有称号一律改用清的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等爵号。这标志着清中央政府对漠北蒙古地区的管理，例同漠南而大大加强了。及至雍正十七年（公元1733年），清廷又专设将军驻乌里雅苏台，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代表中央政府会同地方僧俗统治者共掌蒙疆军民大政。

西征罗卜藏丹津与统一青海 青海，明以来为漠西厄鲁特蒙古之和硕特部移居。崇祯末年，已向清廷纳贡。康熙时，该部还协助清王朝对噶尔丹进行征讨。因此，康熙曾封其首领为和硕亲王。和硕亲王死，其子罗卜藏丹津袭爵。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纠合诸部头目，发动叛乱。叛军胁裹20余万部众，掠牛马、杀官军，掳走中央派赴青海的理事大臣，气焰甚炽。同时，还要联合准部，将叛乱发展到整个青藏高原。

雍正帝屡发诏谕，笼络招抚，全不见效。随派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率精兵5000、马队1万，日夜兼程，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座帐，斩、俘甚众。罗卜藏丹津乔装妇人出逃准噶尔部。

---

①钱良择：《出塞纪略》。

②《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7。

平定青海之乱，清廷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办事大臣，并增兵驻守。又依漠南漠北蒙古之例，分编和硕特部为二十九旗，加强对这里的管理和控制。

进军天山南北与统一新疆 雍正年间，噶尔丹的侄孙噶尔丹策零继汗位。他一面遣使来朝，一面收匿罗卜藏丹津拒献朝廷，而且，不时发动劫掠战争，威胁喀尔喀诸部。公元1730年，朝廷派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分率旗营劲旅征讨策零。傅尔丹恃勇少谋，中计兵败，叛军反乘势东侵至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山音诺颜部。该部首领策零，乃成吉思汗22世孙，康熙帝之额驸，智勇过人。协助清军大败叛军。岳钟琪与策零夹攻准部，噶尔丹策零被迫重新称臣乞和，获准仍居原地游牧。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准部内讧。后达瓦齐夺得汗位。另一首领阿睦尔撒纳不服，奔热河行宫朝见乾隆，受封亲王。达瓦齐割据自立，部众纷纷叛离。公元1755年，清廷决定由乌里雅苏台和巴里坤两路出师，大张挞伐。达瓦齐连同青海逃亡的罗卜藏丹津尽被擒获。阿睦尔撒纳因功受封“双亲王”。未几，这位“双亲王”反，清军再次征讨。公元1757年，准部痘疫流行，死亡相继，清大军直扫伊犁，最后平定叛乱。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国，患痘死。

康、雍、乾三朝，历时70余年，终于平定准噶尔蒙古的叛乱，这是有清一朝著名的“盛世武功”，它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粉碎了沙俄侵略阴谋，巩固了西北边防。

当时，天山南路称为回部或回疆。世居此地的维吾尔族，曾被准部征服，首领玛罕默特被长期执拘伊犁。玛罕默特死后，两个儿子仍被拘禁。清军平定准部后，释放了他们。这兄弟两人被称做大小“和卓木”，他们返南疆后，未思报恩，反“欲窃居回疆以自雄”。公元1758年清军开入南疆平叛。分裂活动不得人心，维

族人民不愿为叛首卖命，阵前倒戈者甚众，“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①次年，叛军土崩瓦解，大小和卓木败逃今阿富汗境内。迫于清军凌厉攻势，当地酋长擒斩和卓木兄弟，“函首以献”，②回部遂为平定。

公元1820年，逃亡中亚浩罕国的和卓木之孙张格尔返回南疆，借拜祖坟为名，煽动叛乱，并与受英控制的浩罕国约定：事成之后，割让土地，献民输财。这帮受英国殖民主义者指使的匪徒侵入南疆后，杀人放火，“尽得府库公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③清军再次入疆平叛，在维族人民的支持下，公元1827年除夕，清军追入阿富汗东部山区，生擒张格尔，械送北京处死。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再次被粉碎。

平定准部、回部后，清政府将天山南北两路合称“新疆”，由“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为总辖，又于北疆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乌鲁木齐设都统，巴里坤设领队大臣；于南疆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其它重镇驻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维族教俗事务，归各地“伯克”处理，但“伯克”不得世袭，任免升调，权归朝廷。从此，辽阔的西北边疆，完全为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中，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准噶尔部的侵扰，于明末离开原牧地塔尔巴哈台，经哈萨克大草原，辗转徙入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受沙俄控制、歧视。他们念念不忘故国故土，经常遣人与清廷联系，等待重返家园的时机。顺治、康熙时期，多次遣使进贡。公元1712年，清政府选派大臣，不远万里，前往伏尔加河下游看望他们。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隆重迎接皇朝来使，并设宴倾诉思乡之情。只是由于准噶尔

①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
②松筠：《西垂总统事略》卷1。
③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上层分子的长期叛乱和沙俄军队的阻挠，才使他们重返家园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

乾隆朝平定准部，为土尔扈特部重返家乡创造了条件。公元1770年冬，该部蒙古人民10余万众，在渥巴锡汗率领下，扶老携幼，突破俄军围追堵截，且战且走，历时8个月，行程万余里，于次年夏抵达伊犁。此行，艰难非常，牺牲惨重，人户仅存一半。清王朝拨银20万两优抚，安置他们在新疆等地放牧、生息。渥巴锡汗率本部首领赴热河行宫朝见乾隆帝，乾隆对他们大为嘉奖，分别授予封号和赏赐。土尔扈特部人民重返祖国的事迹，生动地说明我国兄弟民族间的血肉联系和爱国主义的巨大历史凝聚力，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破坏的。

五、平定西藏叛乱和对西藏管理的加强

西藏自古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清初，继承明代的办法，对藏族聚居地区分康（西康）、卫（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青海几部分治理。随着统一事业的发展和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巩固，清王朝对于西藏的管理较前代大大加强了。

确定达赖、班禅封号 清入关以前达赖五世曾遣使献书贡方物于盛京。顺治时，达赖五世又亲至京师晋谒皇帝，顺治帝封以“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①并为之修建了有名的白塔。康熙时，又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以金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封号正式由钦命方式确定下来，具有了中央王朝法定的意义。

设置驻藏大臣 康熙晚年，准噶尔叛军与西藏上层分裂集团

①《清世祖实录》卷74。

勾结，攻占西藏。康熙帝派军入藏平定叛乱，扶立达赖六世坐床。清廷留2000蒙古骑兵驻藏镇守，并任命亲清的康济鼐管理前藏、颇罗鼐管理后藏。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一小撮分裂分子又勾结准噶尔叛军作乱。他们杀害了康济鼐，接着攻入后藏。清政府再次派兵入藏平叛。在清军未到之前，颇罗鼐率后藏兵民及时扑灭了这次叛乱。清廷封颇罗鼐为藏王，总理藏务。又设置正副驻藏大臣，分别领兵驻前后藏，监理西藏地方军政。驻藏大臣之设，是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有效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

击败外国入侵和整顿西藏行政制度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1年），藏王朱尔墨特（颇罗鼐子）勾结准噶尔军再度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此后，清政府干脆废除了藏王制度。

乾隆中叶，侵入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两次派人进藏，要求订立不平等的通商条约。由于这一阴谋未逞，便唆使廓尔喀（尼泊尔）封建主两次举兵入侵西藏。公元1792年，朝廷派福康安等统兵两万由青海进藏，击败侵略军，剿平农奴主勾引廓尔喀入侵事件，巩固了边防，廓尔喀不得不遣使求和。清廷于公元1793年颁发了《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行政和宗教管理制度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

首先，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地位与达赖、班禅相同，全权"督办藏内事务"。凡地方教俗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奏补，"如达赖喇嘛循私不公，准驻藏大臣驳正，秉公拣选"。①其它如财政收支、对外交涉、春秋巡边、军队编练、钱币铸造等，统由驻藏大臣经管。

其次，是通过"金奔巴"掣签制度，对达赖、班禅的传位加以监督控制。"奔巴"，藏语意为瓶子，"金奔巴"即"金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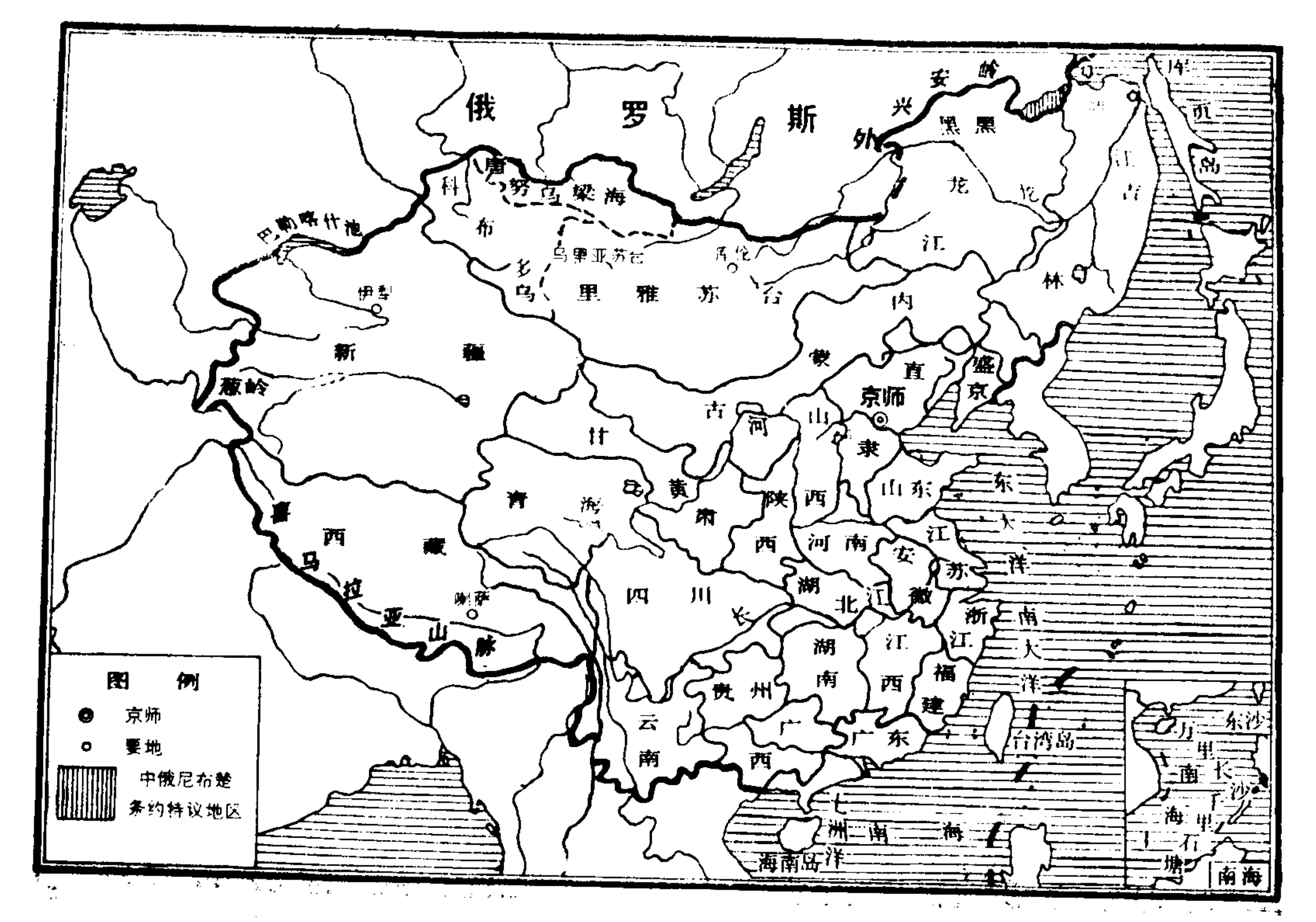
①《卫藏通志》卷6。

按西藏佛教说法，达赖、班禅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死后要“转生”。当他们“圆寂”时出生的男婴，便是转世了的“灵童”，即死者的化身，藏语称“呼毕勒罕”。这样的“呼毕勒罕”可能有若干名，地方大，农奴主们找来各自发现了的“灵童”，参与统治权力的争夺。乾隆帝独出心裁，特创“金瓶掣签”制度，即遇到达赖或班禅圆寂，便由驻藏大臣将“灵童”们的姓名写在签上，然后置大昭寺金瓶之中，经过庄严的宗教仪式，诵经抽签，确定合法继承人。写签、抽签、坐床等仪式，全由驻藏大臣主持。这种“金瓶掣签”制度，解决了达赖、班禅等高级宗教领袖们的职位继承问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最高教俗权力的监控。

六、清代的疆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经过所谓康乾盛世一系列的“文治”、“武功”，进一步巩固并开发了祖国的边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最后形成：西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岸，北及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拥有台湾、澎湖列岛、钓鱼岛及其它附属岛屿，南面包括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在这幅员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50多个兄弟民族。清王朝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将内地划为18省，又将边疆地区划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五个将军辖区和西宁、西藏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计全国25个一级政区。中央政府对各省区进行了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正是在这种政治条件下，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地区间的交流更加广泛，各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更加牢固。


图例
京师
要地
中俄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
俄罗斯
外兴安岭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乌里雅苏台
库伦
新疆
伊犁
葱岭
巴勒喀什池
唐努乌梁海
科布多
青海
西藏
喇萨
喜马拉亚山脉
盛京
京师
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甘肃
四川
湖北
湖南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贵州
云南
台湾岛
海南岛
东大洋
南大洋
七洲洋
南海
东沙
万里长沙
千里石塘
长江
黄河

清朝疆域图

清初，满洲人大量入关。做为统治民族，他们不得不学习、吸收汉文化。康熙和乾隆就是汉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富饶的东北，开初作为“龙兴之地”，划为禁区，不准垦殖。但华北人民还是大量地“闯关外”。他们建立了许多生活和生产点，名为“屯”。后来朝廷为加强边防，有组织地派军屯垦，如著名的“江东64屯”等。在各族人民辛勤开发下，东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采矿业、冶金业、伐木业等迅速兴旺起来。汉语、汉文，很快在东北普及。京师，为各族、各地文化荟萃之所，文化交流甚为频繁。

蒙古地区也一样，先是禁止汉人去垦殖，并禁止蒙汉通婚。但民族文化交流是无法完全阻隔的，仅康熙时，山、陕人民到蒙古地区垦殖为生者，就达10万之众。①那里生产的“口外米”，大量行销京师等地。归化、张家口等镇，已成为商旅云集的繁华闹市。蒙古人学习儒家经典，演唱汉戏、汉曲，还出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

清王朝重视新疆的边防和经济发展。康、雍、乾三朝，长期用兵西北，大批官军携眷住疆屯垦，称“军屯”；内地汉人也大批西去垦殖，称“民屯”；还组织当地人民垦荒种植，称“回屯”。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片片“绿洲”被开发出来。国防加强，治理改善，农、工、商、牧各业发展迅速。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乌鲁木齐、哈密等城镇，“店铺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婑”，“繁荣富庶，甲于关外”。②可以说自此以后，羌笛无须怨杨柳，春风已渡玉门关。

西藏、青海、甘肃与西南各省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汉藏互市的重要场所打箭炉（康定），“商旅满关，茶

---

①《清圣祖实录》卷230、卷240，

②《新疆纪略》卷71。

船遍河”。①湘黔山区的苗寨成倍增加。西南各民族的音乐、舞蹈，大大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清代，我国海疆地区也有很大发展。在汉族官民与高山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台湾大片荒芜田土“尽为膏腴”。光蔗糖年产量达5000余万斤，除供本地、内地外，还远销日本、吕宋等国。乾隆时，在澎湖创设了书院，人们读书应举，一如内地。清代人绘制了不少舆地图册，明确无误地将南海诸岛标入中国版图。康熙时，广东驻军副将吴升率兵由海南岛出发，绕南海诸群岛，“周遭3000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②这说明清朝注意对南海海疆的巡逻和防卫。

清代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全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既是清朝加强国家统一措施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清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恢复生产的各项措施

明末清初，40年的战乱使许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③不少城市“尽皆瓦砾，房屋全无”，④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为了稳定清王朝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现状，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清初

①《金川琐记》卷3。
②乾隆《泉州府志》卷56。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34，刘余漠《垦荒屯疏》。
④《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86页。

的统治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奖励垦荒 清初，“地亩荒芜，百姓流亡”的惨景随处可见。直到康熙初年，“各省荒地尚有400余万顷”。①地方官吏因此有“无民可役”、“无地可税”之慨。鉴于这种局面，清廷于顺治年间颁布了招民垦荒的政策。首先鼓励逃民开垦荒地，所开垦的土地由地方州县官吏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又规定新垦荒地免税 3 年（个别可免 5 年或 6 年）。但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于是地方官紧逼赋税，致使农民垦种的庄稼尚未成熟，而税吏已经登门逼讨了，因之垦荒政策虽“行之20余年而无成效”。康熙年间，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逐步结束，封建秩序日趋稳定，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开始，陆续放宽垦荒起科的年限，由 3 年、宽至 4 年、 6 年、甚至10年。并贷给耕牛和种籽。调动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因而成效甚大。又规定：凡垦田20顷以上，通晓文墨者授与县丞，不通文墨者授与把总；垦田百顷以上，能通晓文墨者授为知县，不通晓文墨者授为守备。这一作法刺激了地主有力之家以垦荒来求官。同时，也产生了地主利用农民垦荒而加速土地集中，但毕竟也达到了扩大开荒的目的。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湖广、四川、河南、山西、河北等地也出现了民间自发垦荒之举。到康熙末年，“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②百年之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达791万多顷，超过了明朝万历年间701万顷的垦田数字。

更名田 明末农民战争中，大批明代王室逃亡，王府庄田抛荒。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下令将明代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来的佃户，“永为户业”，史称“更名田”。当时，这样的“更名田”大约有17.8万顷之多。它的实行表明清政府承认了明末农民

①《清圣祖实录》卷22。
②《清世祖实录》卷249。

战争中农民获得的成果，使佃户变为自耕农，这对鼓励农民开荒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蠲免钱粮 蠲免钱粮就是免赋税。康熙帝把蠲免钱粮作为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恢复农业经济的经常性措施。从他登基之年开始，屡下蠲免之令，“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一省连蠲数年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又开始把全国各省分为3批，实行“轮蠲”，每3年轮免1次。据统计，康熙在位60余年“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①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雍正、乾隆时期。乾隆时因国家财力充足在全国实行普免。蠲免赋税最受惠者当然是地主，但对无地佃农和少地的自耕农也减少了一些负担，因此对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摊丁入亩 清朝的赋税制度沿袭明朝，以“田赋”和“丁银”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清朝前期的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复杂，亟需改革。公元1657年，编定《赋役全书》，是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明末的“三饷”和杂派。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为了适应户口和地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重修赋役全书，称之为《简明赋役全书》。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为了消除征收赋役标准的两重性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端，有必要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办法。这个办法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康熙末年，御史董之燧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康熙给予默许，“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②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经过半个多世纪，直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1年)，

①《清史稿·食货志》。

②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贵州省最后宣布实行，才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此后，“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①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丁多地少，人口密集的地区，地亩摊丁银率较高。

“摊丁入亩”是明朝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它实际上废除了从汉代以来的人头税。按土地单一标准收税，这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按土地多少收税，实际上就是按人们的财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不均的严重情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实行“摊丁入亩”名义上废止了“丁役”，但是，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总会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各地的徭役杂差仍很严重，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兴修水利，整治河渠 黄河下游河道，自宋以来是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由于河道年久失修，泥沙淤塞，尤其是河南、苏北之地连年泛滥，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自顺治、康熙以来愈演愈烈，据顺治年间不完全统计，大的决口达15次；康熙元年到十六年间，黄河决堤泛滥竟有67次之多。因此，整治河患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康熙很重视治河，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677年，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河。在水利专家陈潢的全力支持下，用11年时间，采取减水筑坝、引水冲沙等技术，成功地使黄河重归故道，漕运无阻，使“万顷汪洋无涯际者”变成沃野良田。与此同时，还修治了永定河。这条河位于北京附近，由于源出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含沙量大，易于泛滥，故叫浑河，也称小黄河。1698年，从良乡到东安（今河北安次），开掘长200多里的新河道，沿岸筑堤束

①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水，引河水流入渤海湾。从此，河水安定，改名永定河。康熙年间的治河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清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族人民辛勤劳动，使清初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 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殖上。据《清实录》记载，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的531万顷，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增至851万顷，60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60%，突破了明朝最高耕地面积，雍正以后达到890万顷。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我国人口统计额自汉代以来始终停留在五、六千万左右。康熙末年人丁数也只有二、三千万，但这只是丁数而不是全部人口数。由于“摊丁入亩”的实施，人们不再有添丁纳税之虑，政府统计人口的方法也有了改变，即不仅仅记录“丁数”，而且要统计“大小男妇”的全部人口数目。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全国人口增至3亿多。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已超过4亿。

其次，表现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上。在清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北到新疆、东北，南到台湾、云贵，许多荒地已被迁入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开垦。据记载，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仅北疆地区，各类屯田已有16.7万亩，乾隆以后还有增加；沿长城的内蒙地区，康熙时有数十万汉人进入。由于蒙汉人民的辛勤耕耘，使长城一带逐渐演变成半农半牧的经济，促进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奉天旗地，雍正四、五年有耕地8.5万余顷；吉林地区，由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的1538顷，到乾隆五十

四年（公元1789年）激增至1.1万多顷；①黑龙江东岸的江东64屯，由于土地肥沃，“每垧年终获粮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②云贵地区，人们“携眷依山依寨，开挖荒地。”③“久荒之土，亩收数倍”；④康熙收复台湾以后，大批汉人入迁，与高山族人民共同开发宝岛，使台湾西北“地利尽阙，久无旷土”，东部偏僻地区也“有汉人泛海至彼”。汉人修渠筑堰、铁制农具等先进技术逐渐被高山族同胞所掌握。

另外，农业产量的提高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表现了农业的发展。江南地区主要推行的是大面积双季稻，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北方采取区种法，把田地划分成行区，“种植时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既便于浇灌，又可通风，使一亩之收，多常年数倍。明朝引进的蕃薯，原种于南方，此时北方也掌握了育秧技术，并取得高产，“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⑤经济作物，如棉花种植已遍及全国。江苏、浙江、湖广、河南、河北、山东、奉天等地都是著名的棉花产地。甚至出现“种棉者多，种稻者少”的现象。种桑养蚕是我国经济作物的重要内容，浙江的杭、嘉、湖是著名的蚕桑产地，桑树之多难以计数，收益往往超过稻田几倍乃至十倍。所以种桑之户越来越多，“尺寸之堤，必树之桑”。⑥甘蔗种植主要在台湾、福建、广东沿海各省，广东是最大的产区，“白紫二蔗动连千顷”，“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⑦台湾的蔗田已达万顷之规模。烟草种植在

---

①乾隆《盛京通志》。
②《瑷珲县志》。
③道光《普洱府志》卷首，梁星源序。
④《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流记》。
⑤陆燿《甘薯录》引《金薯传习录》。
⑥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
⑦《广东新语》卷2。

明朝传入中国，清代已被南北各省广泛种植。主要分布在福建、山东、陕西、广西等省。福建汀州有30%—40%的肥田沃地种植烟草，收益“数倍于稼穑”。①陕西汉中一带“沃土肥田，尽种烟草”。②此外还有茶叶、兰靛、蒲葵、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并增加了农产品商品化的比重。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发展，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手工业专业区。传统的纺织业和制瓷业比明代有较大的提高，丝织业在清代的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成为丝织业的中心。从已发现的碑刻资料看，苏州在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有19家丝织作坊，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竟增至61家。③江宁的织机在乾隆、嘉庆时已有3万多台，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棉纺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苏州销售青蓝大布的著名的布庄字号，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是21家；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已有60余家。纺织工具也有显著的改进。如上海纺纱脚车，可“一斗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④棉产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江西景德镇是清代全国制瓷中心，除官窑30座以外，还有民窑二、三百处，“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⑤产品色彩鲜艳，精美异常。此外，采矿、冶铸、造船等部门规模都较大。云南铜矿的开采规模空前，乾隆时铜厂有300余处，“大者其人

---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36。郭起文《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36，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③段本洛：《明末清初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学历史教学》85年第六期。

④乾隆《上海县志》卷1。

⑤唐英《陶事图说》卷20。

数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①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至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云南铜矿最高年产量常在1000万斤以上。广东佛山镇冶铁，每炉一昼夜12次，每次产量300斤，铸造的铁锅和铁丝也享有盛名。清朝的造船业规模巨大，如上海所造“沙船”，大者可载三千石，小者亦五、六百石。“船主皆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②制糖、榨油、制烟、制茶等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也达到一定水平。

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的内部分工更加细密，出现专门行业和配套的工序。棉纺织业分为轧花、弹花、纺纱、织布、染踹等行业。织布一业，由于花色和品种的不同，又可分出不同的行业。如整纹、斜纹、高丽纹、七宝尖、飞花布等。不同的布则由掌握不同的纺织技术的人员来专门生产。③冶铁业分工也很细，从铁矿的采冶到铁器的制成，不仅分作采冶、铸造、炒炼、打制等行业。就连铸造铁锅一行业，也是“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④在台湾制糖业中，十几个人的糖场，就有糖师、火工、牛婆、剥蔗、采蔗尾、看牛等7项分工。⑤这种分工协作，是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它不仅有利于专业技术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生产组织的改变，其社会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商业的繁荣。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农业、手工业的区域分工、行业分工的加强使城市和乡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依赖关系大大加强了，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拿粮食来说，“福州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

①《续云南通志稿》卷44《矿务》引王松《矿厂采炼篇》。
②包世臣《安吴四种》卷1，《海运南漕议》。
③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史简编》370页。
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第8—9页。
⑤《台湾使槎录》卷3。

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①手工业品，尤其是名优产品，行销范围及于全国，甚至出口外洋。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有行销“遍天下之说”；②景德镇瓷器“行于九域，施于外洋”；③广东、台湾所产的白糖，行销华北、辽东，还“售于东西二洋”被称为“洋糖”；④南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不仅供朝廷之用，而且行销国内，享有“江绸贡缎甲天下”之美誉。各地商人建立会馆。作为了解行情和交流信息的地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大都市，它是一个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中心。如长江、汉水交会的汉口镇，“户口20余万”，是华中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四川的重庆、湖南的湘潭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码头。广东佛山镇，人口数十万，铺户、作坊林立，大小街道620余条，“实岭南一大都会”，⑤原来一些著名的大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此时更加繁华。另外，市镇也成为沟通农村和城市商品往来的重要环节。

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铜钱起着辅币作用。钱庄、票号也由此而急剧增多。这些商业组织的出现，虽没能在分解封建生产方式中起关键性的作用，但对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滋长，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明朝中期，东南沿海地区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由于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社会经济的凋蔽，一度也遭到严重破坏。康熙中叶

①《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函三册。
②《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吴阊钱江会馆碑记》。
③道光《浮梁县志》卷首。
④李调元《粤东笔记》卷14。
⑤《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

以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由恢复走向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缓慢地复苏。在江宁、江苏等地出现一些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开五、六百张机者”，①拥有工匠千人左右的手工工场。工场主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以赚取利润。例如“苏州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②机工有固定工和临时工。临时工“黎明立桥以待唤”。③这种不同于往昔的生产组织和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当时，在江宁、镇江、苏州等地也有一些大商人，他们开设“帐房”。“帐房”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有的自行设厂置机，雇用工人织造；有的将原材料，甚至织机分给小机户，由小机户去加工产品，按成品的数量和质量从帐房领取工资；也有的既“自行设机督织”，又“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④这种帐房老板既是大包买商，又是手工工场主。他们不仅支配着自己作坊或工场中的工人劳动，而且还控制着一部分独立的织工或小作坊主。

在苏州的棉布染踹业作坊中，出现了一种叫包头的人，由他提供踹石、房屋，招集踹匠居住，也由他向布商领取坯布发给踹匠。布商付给踹匠每匠布的工价银是1分1厘2毫，而踹匠则每人每月要交给包商银3钱6分，以偿其房租家俱之费。在这里布商拥有资本，踹匠是受雇佣的人，包头则是从中渔利的“经纪人”。这种经营方式，也可看作是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例。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云南铜矿有46个，是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矿”。⑤投资采矿者被谓之“锅

①光绪《江宁府志》卷15。
②《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
③乾隆《文和县志》卷10《风俗》。
④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
⑤《皇朝经世文编》卷26。

头”，从事冶炼者是“炉客”。他们用“米分”的办法，即产品按比例分成。铜矿中的矿工，大多数是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他们“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①这些工人与锅头、炉客之间的雇佣关系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以上例子说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较明代有所增长，特别是乾隆、嘉庆年间，有较大的变化。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晚期，经过了几百年，其发展速度仍是极为缓慢，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长期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顽强地抵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阻碍着商品交换市场的发育，使得旧经济结构解体缓慢，新的经济结构也难以“破土”滋生，郁郁成长。

其次，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的极端穷困和落后，使他们没有力量扩大再生产，只能进行简单、重复的劳动；而地主阶级的剥削所得，也主要用于生活上的消费和购置土地。高额地租的吸引力和耕读传家、读书求仕、以政治权势保护经济利益的传统模式，使他们的财富很少可能转化为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封建政府在“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指导下，对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实行种种限制。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多转而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不能及时转化为工业资本，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发展，很重要一点是由于封建制度是它的桎梏。

①《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此外，清初带有破坏性的战争，消耗巨额的社会财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使“生产凋蔽、百业俱废”，新王朝起点低，以及清中后期人口迅速增长，也给社会带来不少压力等，这些也是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第五节　清朝前期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一、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

清朝前期，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曾出现政治局面日趋稳定，社会经济从恢复走向发展繁荣的“康、雍、乾盛世”。乾隆后期，清王朝已明显地由盛转衰，整个封建统治已呈现出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局面。

土地高度集中　清朝后期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乾隆末年，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却有限，这就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人均耕地数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就在有限的可耕地中，“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清朝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一人即占有内务府田庄1千多个，占地393万亩；①宗室王公也拥有大批田庄，直隶和东北有宗室庄田133万亩。②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康在苏州占地3千亩，大官僚徐乾学田园遍布苏南沃土，仅在无锡就占地1万顷。乾隆宠臣宰相和珅占地80万亩。在地主阶级的疯狂掠夺下，大量自耕农民沦为佃户、流民，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③土地兼并，使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的动荡，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了。

①《大清会典》嘉庆卷76。

②《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卷135。

③《皇清奏议》卷3《杨锡绂奏》。

政治腐败 自乾隆中期以来，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日益奢侈，庞大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腐败。乾隆帝6次南巡，完全是为了寻欢作乐，沿途搜寻美女、聚珠宝、置离宫，用东南千百万人民的脂膏，供一个人享乐，还扩建圆明园，增建长春园、万春园等，又设置山庄72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的"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在苏州所建陵墓可与皇帝陵寝相媲。某河道总督举行一次宴会，历时3天3夜还未散席，奢侈腐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吏治败坏，不少官僚"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①。"三朝老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说他作官的秘诀是"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因此宦海一生"恩遇益隆，身名俱泰"。和珅当政20年"贪黩无厌，征求财货"。后和珅被赐死，籍没家产清单列有：赤金8万4千两，银元宝5万5千个，窖藏银子100万两，绸缎、皮张值银100万两，人参600斤②，嘉庆皇帝将其全部据为己有，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贪污赈灾银两案，自总督以下皆有份，因贪污2万两以上而被处死的案犯竟有22人，主犯王亶望家有金银逾百万两，被杀。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嘉庆年间，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宣布："凡选授州县官到省"的，如不给他行贿就不能莅任。四川有个道员，给上司一次就献出珍珠5斗，蜀锦1万匹。当时流传"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全国上下形成一个贪污行贿网，封建统治已经腐败透顶。

由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统治阶级挥霍无度，造成国库日渐枯竭，财政入不敷出。乾隆中期，国库存银尚有7千万两，而到乾隆末年，国库已一无所有。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清政府亏空白银已达900多万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只好加重苛捐

---

①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90。

②沤矶钓叟《查抄和珅家产清单》。

杂税，又实行官吏捐纳制度。花钱捐官，坐官捞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很自然了。

政治腐败，清朝的军队也日益腐化。“八旗劲旅”和绿营兵入关以后，生活优裕，不思操练，定期校阅已成故事，早已不是昔日剽悍善战的威武之师了。封建特权的腐蚀作用，已经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嘉庆年间，杭州大阅，演练射箭，竟是百发不中；演习骑术，更是人仰马翻。这种军队，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抵御殖民者入侵都会临阵怯战，一触即溃。因而，清后期不得不依靠地主出资招募、训练的“乡勇”、“团练”等地方部队来维持其统治了！

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

农民的抗租斗争　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进行了减租、抗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

清代地主除少数是雇工自行经营外，一般把土地出佃收租，地租有实物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分成租主要在北方流行，一般是“佃户分种，岁收其半”。①定额租多流行于南方，就是先确定地租数额，不论丰年，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期如数交租。可是不论哪一种地租，农民也都受到增租的威胁。分成租往往高于50%，有的甚至达到70%至80%。而定额租又定得过高，租额一般都在每亩1石左右，甚至有2石以上的。丰年尚可免强维持，灾年则根本无力交纳。农民一年劳动果实被地主夺走，同时佃农还时时面临着地主夺佃的危险，这是农民抗租“罢田”的重要原因。

农民的斗争往往以争取永佃权和抗租的形式出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江西兴国地区佃农数千人，包围县衙，迫使

---

①《光绪畿辅通志》卷71.

官府刻石立碑，承认永佃权，并推举自己的领袖为“佃长”，“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据抢”。①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福建上杭农民，在罗日光、罗日照的领导下，要求主4佃6分租，并“聚集千人”，对前来镇压的清军，“鸣锣放炮，掷石如雨”，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宁化县农民组织“长关会”，与地主“较斗减租”。③北方地区的佃农，以拖欠地租的形式进行抗租斗争，甚至“鸣钟擂鼓”，聚集起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④佃农的反抗斗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起了一定的扼制作用，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手工业工人的反抗斗争 由于清政府“重农抑商”和扼制资本主义萌芽，所以手工业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因此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封建的行会也在限制手工业的发展，因而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手工业工人靠工资生活，清中期以后由于城市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可工人工资却几十年不变，即使稍有增长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十分穷困。如踹匠工资，公元1720年规定：每踹1匹布工银1分1厘3毫，而当时米价涨到每石2两银子。踹布1千匹方得工钱11两3钱，只可买米5石6斗。一个工人日夜劳动，“所得工钱仅养一身，父母妻孥，仍然冻饿”。⑤反对粮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便成为手工业工人斗争的主要内容。就苏州一地为例，康熙年间，就有4次记载。公元1670年，苏州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⑥1692

①《同治雩都县志》卷13《文艺》。
②《乾隆上杭县志》卷12，《杂志》。
③民国《宁化县志》卷17，《循吏》。
④档案《内务府来文》转《简明清史》第二册。
⑤孙自务：《陆巢元先生验封矿洞纪略》第13页。
⑥《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3页。

年，在罗贵、张尔惠的领导下，苏州踹匠再次展开“齐行增价”的斗争，并“威胁罢市”，撕毁清政府的镇压告示。公元1700年4月，踹匠发起更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罢工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甚”。①斗争持续将近1年。公元1715年，苏州踹匠再次开展增加工价斗争，迫使布商不得不将每匹1分1厘的工价，增加为1分1厘3毫。米价高昂时“每踹布千匹，加银二钱四分”。②这类反抗斗争其他行业也时有发生。苏州的织工为反对作坊主随便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曾“聚众叫歇”，“迫使机户停织”。③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工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④此外还有城市贫民的聚众抢粮斗争遍及全国。城市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乃是新的经济因素在阶级斗争上的反映，城市人民反抗斗争已是整个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

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各族人民反清斗争连绵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清水教首领王伦在山东发动的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先后在甘肃、青海地区以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石柳邓、吴八月领导的湘黔苗民大起义；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聂人杰、姚之富、王聪儿等领导的川、楚、陕、豫、甘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嘉庆二年王囊仙领导布依族起义；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恒乍绷、腊者布领导的云南傈

①②③《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8页，第44页，第6页。
④《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527页。

傈族起义；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领导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最有影响的是公元1796年的川楚陕豫甘白莲教起义和1813年北方的天理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早在元代就已开始流传。清乾隆后期，白莲教很多支派在各地的活动很活跃。他们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宣传“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入教者可免清厄”。制造了一个“弥勒佛转世”，一个“牛祖”（牛八）来拯救被封建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清中期，大量失去土地、衣食无着的农民，逃亡到川、楚、陕3省交界处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中，“各省就食贫民，挈眷前来，依亲傍友，开垦山地，所在多成村落，五方杂处，良莠不齐”，①“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②。结棚以蔽风雨，他们或为佃户，或为佣工，白莲教的3个主要支派都在川、陕、楚3省交界处的“棚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及其鲜明的反清性质，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六、七、八月间，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甘肃等地卷起了搜捕白莲教的恶浪。这一疯狂搜捕和血醒杀戮，殃及数省，人民罹难，各地官吏“竞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③衙署寺庙，关押全满。富豪得释，贫民虽无证据，立刻施以酷刑：大铁钉钉人手掌于壁上，以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人犯解送省城，一船竟装一、二百人，“堆如积薪，……未至而就毙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殁狱中”。④在这种形势下，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举行起义。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密商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

①《钦定剿平邪匪方略》卷28。

②《三省边防备览》卷14。

③《清仁宗实录》卷22。

④《皇朝经世文编》卷89。

（即公元1796年4月17日）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准备中被清政府发觉，张正谟、聂人杰遂率众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七日在枝江、宜都首先起义。这一年的三月，姚之富、王聪儿聚众万人于襄阳起义。同年十月四川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冷天禄、王三槐也起兵响应，很快队伍发展数万人，清政府立即派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桓瑞，集几省之兵进剿湖北义军。还大力支持地方乡绅置办"乡勇""以资捍御"。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从一开始就给起义军以严重威胁。义军为突破包围，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分三路进入河南，转战陕南，会师于镇安。他们采取"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灵活机动的战术，狠狠打击了清军。清廷采取政治欺骗和武装镇压的策略。用处死乾隆宠臣和珅来推卸责任，以麻痹起义军的斗志，挑拨各支起义军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起义军。清政府还推行"剿抚并用"政策，以放下武器到深山老林开荒，三年免征为诱饵，解除农民武装。最后又采取"清乡"广设碉堡，割断农民军与各地人民联系，切断农民军的后方供应。起义军终陷于被动，清军在郧西设埋伏，王聪儿、姚之富身陷重围，虽奋勇杀敌，终因力量悬殊而壮烈牺牲。其余部战斗到1805年。这次起义历时9年，席卷5省区，抗击清政府调集的16省兵力，歼灭清提督、副将、参将以下400余人，一品、二品大员20多人。清政府耗银2亿两，相当其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最后依靠地主武装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白莲教起义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剥下了"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统治表面"升平""繁荣"的伪装。揭露了它的腐朽与虚弱，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理教起义　北方的天理教，又名荣华会，是白莲教的一支。因徒众按八卦编组又名八卦教，教中有文卦、武卦之分。文

弟子练气，武弟子学拳，入教者需纳“种福钱”（根基钱）。“事成之后得偿十倍。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①此举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深得人心，教众不断增多。他们活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天理教的领导人是河南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的林清。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在公元1813年9月15日，在直隶、山东、河南同时发难，因事机泄露，9月5日李文成被捕入狱，9月7日义军部将宋元成等率徒众攻破滑县城，抢出李文成，并决定提前起义。清廷得知立即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同河北总兵色克通阿由北面防御，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山东巡抚防山东境，徐州总兵徐洪北上。以“防堵”、“夹击”义军渡河。李文成受阻不能按期北上，林清按原计划行事，联络教徒200人，准备直冲宫禁。9月15日，乔装潜入城内，在皇宫太监的接应下，分东西两路夺门入宫，在隆宗门外与清军侍卫发生激烈的战斗，他们奋力拼杀，清近卫军死伤100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清被捕牺牲。今故宫隆宗门的匾额上还留有这次战斗射进的箭头。

李文成在滑县被清军包围40多天，率部众突围进入辉县山内的司寨，不久因寨破而自焚，“众数十人群相拥抱而死”，壮烈捐躯。其妻张氏顽强战斗，挥刀巷战，杀死清军多人，最后阖门自缢，天理教起义归于失败。但它给清政府以巨大的打击。特别是起义军直接攻打皇宫的战斗，使嘉庆皇帝“寝食不宁”，“心急如焚”。②惊呼这次事变“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③统治者哀叹这是一场“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奇祸”。

---

①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

②《那文毅公奏议》卷39．

③王先谦：《东华录》（嘉庆朝）卷36．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文化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至此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料，可资总结；另一方面，封建制度盛极而衰，封建统治日暮途穷，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起来进行自我批判；此外，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西方文化的逐渐输入，也给明清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异彩纷陈的局面。

一、哲学

程朱理学曾经比原来的儒家思想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但被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确定为皇家正统思想，尤其是被严格地教条化，钦定为科举取士的依据之后，它就与其它的统治设施一样，迅速地走向僵化，变得与社会发展难以适应了。于是，突破程朱理学的僵死教条成为当时思想界面临的一大课题。一些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清理、总结和发展。另外，极端的专制集权使封建制度所固有的弊病更加恶化，更引人注目，因而思想家们对社会政治的抨击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则使这些思想更有生气，并因而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观点。

王守仁　（公元174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曾带兵镇压过藩王叛乱和农民起义。失官后，在故乡阳明洞中讲学，人称阳明先生。他的思想直承宋代陆九渊，被后人合称为“陆王心学”。明中叶以后，王守仁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门人众多，号称“王学”。他不事著作，思想多在讲学中发挥而出，而后由门人根据记录整理成书。主要哲学思想集中在《传习录》和《大学问》里。

王守仁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但继承了陆九渊的主要观点，而且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他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并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更充分地阐述了心即宇宙本体的思想。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守仁提出了“良知”本体说。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①原来，“心”还可以更精确地区分为先天固有的本体之心和后天形成的人欲之心。只有先天的本体之心才是天理，是良知。后天形成的人欲之心则会使人丧失天理、良知，果真如此，那就要“致良知”，就要“格物致知”。所谓“致良知”就是恢复“良知”本体，其方法是“向里寻求”，②自我反省，而并非任何向外的努力。关于“格物致知”，他把“格”释为正，把“物”理解为心在事事物物中的显现。“格物”即正心，其关键不在考察各种具体事物，而在于格正心中的意念。“致知”即“致良知”，在这里意指把我心良知推行于事事物物。简截地说，格物是由物及心，致知是由心及物，二者同一过程，但方向正好相反。在“致良知”的功夫里，涉及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此，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合一的基点在于，二者都是致良知的功夫，而这种功夫无非是内心反省，复归良知天理。所以，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只要其中含有对良知天理的反省自觉，这种意识或行为就既是知也是行，否则既无知也无行。所以王守仁说：“一念发动处便是行”③。

王守仁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主体自觉的强调，使他客观上充当了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他的思想目的与朱熹一样，都是为了“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统治。他意识到程朱理学对牢笼人们的思想已经无能为力，企图提出一种比较容易

①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②同上书卷1《传习录》上。

③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3《传习录》下。

被人接受的统治思想取而代之，重新加强思想统治。

李贽 （公元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他的先祖几代航海经商，父亲教书为业。本人26岁中举以后，做了20多年的地方小官，总不得志。晚年厌弃官场生活，辞官退隐，专事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李贽的思想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反对朱熹"理生气"的观点，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心，"良知"生来就在心中，不必外求，等等，都有明显的王学色彩。

李贽的新贡献首先在于肯定"私"是人的天性，伦理道德与私利私欲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相反，"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①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②一切伦理道德正是发源于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中。程朱理学把天理与人欲对立，它的信徒既要天理，又事实上舍不掉人欲，结果便走向了虚伪，表面上"口谈道理"而骨子里却"思存高官，志存巨富"，"行若狗彘"，格外贪婪，卑鄙。其次，李贽用相对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真理，反对把周代制度当作万世楷模，把《六经》奉为百代经典。认为历史在变化，道也在变化。第三，李贽把王学人人都可以成圣发展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③的平等思想，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认为孔子并没有什么天生过人的地方。第四，李贽在王守仁"良知"说的基础上提出"童心"说，从王守仁反对"闻见之知"进一步发展为反对《六经》及各种封建伦理道德对"童心"的束缚。他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本心"，"童心"说包含着对人的个性的重视。

---

①《焚书》卷1《答邓石阳》。
②《藏书》卷32《德业功臣论后》。
③《焚书》卷1《复京中友朋》。

李贽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他继承了王守仁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且进一步把它们发展到极端，终于转向了王学的反面，成为震动当时知识界，也使当权者大为恐慌，认为是异端邪说。但他并不赞同农民的反抗行为，对鬼神迷信也半信半疑，他的“童心说”还有强烈的唯意志论倾向。

黄宗羲　（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早年曾领导复社反对宦官权贵，中年时参加过抗清斗争，明亡后，隐居著述，不仕清朝。著作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对王学的继承和发展，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心即气之灵处”，但是他又说“心无本体”，“心”的认识内容最终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此外，他还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黄宗羲的进步思想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他明确指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最初的君主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德才超众，因而受到天下人的拥戴。如今的君主却反其道而行，把天下看作自己“一人之产业”，不仅不为天下谋公利，反而屠毒天下以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他得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①的结论。他还直截了当地批判“君为臣纲”思想，以为做官不应为君主，而应为天下百姓；君臣关系不应是主仆关系，而应是合作关系、师友关系。对于封建法律，他斥为“一家之法”，只是体现君主一人的意志，用来“桎梏天下之手足”的。这样的法律愈严密，愈是意味着不合理，愈是加剧社会矛盾。真正的好法律应是为天下人着想的“天下之法。”②此外他还设想提高相权，在学校议决国事等等，用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

---

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黄宗羲的经济思想表现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此外，黄宗羲对中国学术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初步形成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把宋明理学作为认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总结。

反对君主专制，重视发展工商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先例，但黄宗羲比别人论述得更为集中、系统，尖锐、明确。这正是他的杰出之处。黄宗羲不愧为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不过他最终并不想废除专制权力，只是要对其作些限制而已；他所谓好法律也不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民主法律，只是要求君主在立法时出以公心，他重视工商，却又企图恢复井田制，实际上设置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些都是他的局限性。

王夫之 （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早年即以博学多识闻名，张献忠请他参加起义，被拒绝。明亡后，因积极抗清而受到追捕，流浪广西。1669年回到衡阳，隐居石船山，著书立说，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尤其精通文史哲。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宋论》、《姜斋诗话》。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思想，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①天地万物都由阴阳二气构成。而且物质的气永恒不灭，我们只能用“往来”、“屈伸”、“聚散”、“幽明”去形容它，不能说它有生有灭。气之聚即成有，气之散即是无。从而批判了来自老庄的无中生有论。他认为理也在气中，理是气在运行变化中显示的

---

①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条理节律，对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王守仁的心外无理，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道与器的关系就是一般规律与具体事物，物质实体与个别事物的关系，离开个别就没有一般，离开具体事物就没有作为事物发展规律的道，所以说“天下唯器”，“道在器中”。否定了程朱理学道（理）在器先的谬论。他正确地阐述了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把来自佛教的范畴“所”规定为外部世界中有待认识的对象，把“能”规定为作用于认识对象并能取得某种功效的认识能力，他说：“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① 意即认识产生于认识对象，并且必定符合于认识对象，从而把被佛教、理学所颠倒的心物关系重新放置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他提出行先知后、实践先于认识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王守人的知行合一论。

王夫之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即含动，动不舍静”。② 静是短暂的，静中也有动。运动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的“两端”互相作用。运动变化的结果导致新旧不断更替，互相对立的事物也会在运动中向对立面转化。这就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以静为本”的思想。

此外，王夫之还在历史观上具有历史进化思想，在政治上提出“趋时更新”的改革思想，等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顾炎武　（公元1613—1682年），初名绛，字忠清，曾自称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明亡时，他更名炎武，字宁人，奋起抗清。失败后，遍游黄河南北，考察山川地理，国计民生，准备再起。至死不仕清朝。他学问渊博，在音韵学上成就最大。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

---

①王夫之：《尚书引义·召诰无逸》。

②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修己治人”的“实学”，宋明理学家把“实学”变为“空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世之务，”① 是对孔孟思想的背叛。他们自居圣人门徒，国家栋梁，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只能坐以待毙，既无勇又无谋，是圣门的耻辱。真正的君子应当作些有益国计民生的真实学问。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按“经世”的目的进行实践的成功之作。

顾炎武在政治上与黄宗羲一样，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分权“众治”的设想。所谓“众治”即一方面加强地方郡县长官的权力，甚至可以允许他们职位世袭，另一方面加强宗法制度，使宗族首领“各治其族”。

顾炎武用“国”和“天下”两个概念来区别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和属于“匹夫”的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② 把民众作为“天下”的政治主体，这是民主思想的闪光。

戴震（公元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早年曾当过小商贩，后来主要以教书为生。他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大师。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

戴震通过考据“由词以通其道”，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对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是对“知”的考察，明确主张“有血气斯有心知”，肯定物质（肉体）是精神的本原。并且进一步认为，“理”就是物质世界运行变化的规则，人的认识是“心之神明”对这些“不易之则”的反映，从而既批判了朱熹“理得之于天”的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也批判了王守仁“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他对宋明理学“存天理，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②同上书卷13《正始》。

灭人欲”的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人的欲望是合理的，是人生一切作为的内在动力，“无欲则无为”，“有欲而后有为”，应当得到满足。理学“灭人欲”，是“以理杀人”并且是一种异常残酷的杀人方法：“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①这是当时市民进步意识的反映。

二、文学与艺术

由于明清政府推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也由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发展有一定限度，所以，在这一时期，侧重直抒胸臆的传统文学主要形式——诗文相对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崛起的小说、戏剧。

《三国演义》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约公元1330—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该书是在历史著作和民间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叙述了从公元184年到280年的政治军事历史。作者通过刘备、诸葛亮等正面形象寄托了自己的仁政理想，通过曹操等反面形象鞭挞了统治者的奸诈和暴虐，通过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场面昭示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也流露了自己的英雄史观和封建正统思想。作品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结构宏伟，人物形象鲜明，成为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功范例。

《水浒传》 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江苏兴化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也是在民间通俗文学基础上的再创作。现在流传的共有三种版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其中百回本较接近原作。它基于官逼民反的历史认识，歌颂了农民起义，塑造了上百个草莽英雄的艺术形象，勾画了一些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流

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露了作者的“忠义”思想。它的人物描写非常成功，语言洗炼、明快、准确、通俗。

《**西游记**》 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约公元1510—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今江苏淮安人。一生怀才不遇，为人傲岸放逸。该书是根据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创作而成的。书中主要叙述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到西天取经，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自由不羁、机智乐观、不畏权势，不怕艰难的人物形象，曲折地寄托了作者对反叛精神的赞赏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此外，书中也搀入了佛法无边，因果报应之类的思想杂质。在艺术上，它想象丰富奇特，格调幽默诙谐，语言明快多姿，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典范。

《**聊斋志异**》 是一部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字留仙，今山东淄博人。他一生热衷于功名，但直到71岁时才成为一名贡生。《聊斋志异》是他在激愤忧郁之中花了大半生时间。搜集民间故事传说创作而成的。全书共有491篇，有的赞美男女爱情，有的揭露社会黑暗，有的批判科举制度，使妖狐鬼怪故事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它的情节真幻交织，曲折多致，语言简洁传神，是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顶峰作品。但其中也带有宿命论、因果报应等封建糟粕。

《**儒林外史**》 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长篇杰作。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又号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官宦世家，他本人也很早就中了秀才，但一直未能中举。后来散尽家财，放弃功名，流落南京，为人豪爽傲岸。该书揭露了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对当时文人的腐蚀毒害，以及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但由于作者未能找到现实的光明道路，所以正面人物反而显得苍白。在艺术上，它以冷峻的笔调，典型的细节，因人而异的讽刺手段，纯净畅达的白话语言，以及形散而实不散的独特结

构，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到了顶点。

《**红楼梦**》 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也是中国最伟大的古典长篇小说。原名《石头记》，共120回，前80回作者曹雪芹，后40回作者高鹗。曹雪芹(约公元1724—1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满洲正白旗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豪华，青年以后，家道衰落，穷困潦倒。《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中心事件，以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勾心斗角，特别是以贾家的兴衰变化为背景，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作了深刻的概括和精确的表现，表达了作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末期封建统治者的堕落和虚伪的痛恨，客观上显示了封建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同时也流露了作者既想挽救封建制度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消极情绪。该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结构宏伟而又细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情节安排自然合理，语言洗练，简洁传神。从清朝末年起，它就先后被译成英、日、法、俄等国文字，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明清戏剧也有很大发展。

明代，杂剧趋向衰落，从宋代民间南戏衍变而来，并吸取了杂剧长处的“传奇”剧逐渐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主导地位。到嘉靖年间，传奇剧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四大声腔”：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腔。其中昆腔经过乐工魏良辅的改造，很快风行南北，成为传奇剧统一采用的唱腔。至万历时，传奇剧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创作上出现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其中以汤显祖最负盛名。汤显祖（公元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他不象沈璟那样死守音律，而是着重写情。其代表作《牡丹亭》，用浪漫主义手法描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情节曲折离奇，语言华丽优美，抒情

写景极其出色，充满诗情画意。它对此后的戏剧创作很有影响。

清中叶以前，传奇剧的创作继续发展，其中洪升和孔尚任成就最大。洪升（公元1645—1704年），字方思，浙江钱塘人。他的《长生殿》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真挚爱情，鞭挞了权臣叛藩借机祸国殃民的罪行，寄托了作者怀念明朝故国的情怀。剧作结构巧妙，语言抒情性强。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字聘之，山东曲阜人。他的《桃花扇》以秦淮歌妓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的爱情离合为主线，歌颂了抗清志士，抒写了民众对朝廷腐败的愤慨，揭示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它的构思极富匠心，众多正反面人物也各有个性。这两部戏当时都很风行，有“南洪北孔”之称。

清中叶以后，传奇的创作转入低潮，代之而起的是绚丽多姿的地方戏。其中，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要腔调，结合其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新剧种——京剧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它曲调丰富，表演细腻，结构紧凑，情节曲折，是空前完整的汉民族戏曲表演体系。

明清绘画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技巧方面。明代绘画以中叶以后出现在苏州地区的“吴门四家”成就最大，他们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其中沈、文属吴派，有浓厚的文人画特色，不事雕琢，注重写意，且融绘画、诗文、书法于一体。唐、仇属院派，追宗南宋院画，画法工细，但唐寅也兼有文人画画风。明末清初以“四大高僧”的绘画最为著名，这四人是：石涛、八大山人、弘仁，石谿。他们都是明代遗民，誓死不与清朝合作，隐迹丛林，画风也与正统派迥异，极有个性，强调笔墨逸致。清代画坛以“扬州八怪”最有特色，他们在清代中叶活动于扬州一带，名曰“八怪”，实际上有十余人，主要有金农、李鲜、黄慎、汪士慎、郑板桥、高翔、罗聘、闵贞等。他们都是在野的文人画家，诗画中常有对世态的感慨，艺术上以写意见长，注重独创，

不落俗套。

三、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汇编

中国有注重修史的传统；悠久的文明也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明清统治者一方面大搞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大兴文化事业，把文人的注意力导向故纸堆里；因此，这时的考据和史料文献的编辑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

考据学 即清代所谓汉学、朴学。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辑排比。它起因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对实学的提倡，正式发起则是阎若璩、胡渭。阎若璩(公元1636——1704年)，字百诗，他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求实。所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举把历来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证明为伪书。到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并形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迷信汉儒经解。皖派由戴震（著有《音韵考》）创始，后继者有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著《广雅疏证》）等，注重求实，不拘一家之言，成绩大大超过吴派。后来，乾嘉时期盛行的考据之风就被称为乾嘉学风，从事考据的学者也被归入乾嘉学派。乾嘉学者对中国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史学 在历史学方面，著述也很丰富。官修史书有《元史》、《明史》、《明实录》、《清实录》、《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明会典》、《清会典》等，其中《明史》是24史中编写时间最长、内容最完备的一部。它们是研究明清史的基本史料。私家著述也不少，尤其是清代前期，黄宗羲、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当代史的编写非常盛行。私家著述主要有谈迁的《国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编年体）；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野史笔记）；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学术史）；顾炎

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历史地理)等。乾嘉考据之风盛行时，史学领域也受其影响，出现了三部考史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其中《廿二史札记》着重系统辨析各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经世致用的力作。此外，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名著。他倡导编写地方志，对方志学很有贡献。

在文献汇编方面，成就极大。明清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成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 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明永乐时，解缙、姚广孝等奉命编著。编者多达2千余人，历时5年。初名《文献大成》，修订后改用今名。全书采集古籍七、八千种，装成11095册，分22937卷，共3亿7千多万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典等方面，按“洪武正韵”编排。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后来散佚的古籍。该书只有手写本，一共3部，分藏北京、南京两地。历遭劫难，现存300余册，在国内的仅约200余册。

《古今图书集成》 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等校补，前后历时20余年。初名《汇编》，后改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5千余册，1万卷，1亿6千多万字。采集范围包括13经21史的全部，其他子史著作的绝大部分。它体例完善，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篇，编下分典，典下分部，部下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使用方便。书成后用铜版印刷64部，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四库全书》 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年间，纪昀、戴震等160余人奉命编成，历时10年。共收录书籍3457种，装订成

2600余册，分为79070卷，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类下分目，查找方便。书成后，共抄录7部，分藏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6地，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4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是纪昀等人对《全书》内每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所作的考证和介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很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但由于缺乏全局的、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缺乏近代科学赖以发端的实验手段，因而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进步就主要表现为量的增加，少有质的飞跃。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今湖北蕲春人，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父祖世代行医，22岁时，因科举屡试不第，他自己也当了医生。自幼好读医书，但不盲从前人见解。曾几次建议政府修订《本草》，都被拒绝。于是从35岁起，用了27年时间，参考各种书籍952种，并吸收大量民间单方、验方、自己的医案及实地考察结果，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药物学著作。《本草》是中国古代药典的通称。李时珍的著作以每种药物的正名为纲，释名为目，故称《本草纲目》。全书52卷，190多万字，记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则，插图1126幅。它对中国药物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精细的分析，系统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用药经验和理论知识，并且收集了许多南洋及其它地方传入的药物。它对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地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也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曾被译为日、拉丁、德、法、英、俄等文字，成为世

界药物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曾任礼部尚书。他是最早通过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著成《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一部集大成的综合性农业科学著作。全书60卷，约60万字，采用文献229种，总结了明代以前的农业生产技术。与以前农书相比，它更系统而又集中地对屯垦、备荒、大型水利工程作了总结和研究，并且引进了西方的水利知识，从而使中国的农学体系更趋完善。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1年)，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末杰出的科学家。曾中举人，官至知州。平生重视生产实践，究心实学，并且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天工开物》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天工开物》是一部广泛总结明代生产技术经验的工艺学、农艺学著作。书名大意为：天地万物，自然化生，不假人为。全书3卷18篇，插图123幅，其中绝大部分篇幅被用来记述手工业生产技术。它系统而又细致地描述了各种产品的原料、生产设备、生产过程，记录了主要技术数据，其中不少工艺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书成后，迅速传入日本，后来又被译成英文、法文。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推崇它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在国内却被冷落，很快失传，直到1927年才从日本传回国内，重新印行。

徐宏祖和《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公元1586—1641年），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明末著名文学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厌弃世俗，不应科举，从22岁起到处游历，寄情名山

大川，自然风物。30多年后，根据每日游历记载，写成《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野外考察记录和优秀地理学著作。全书共20卷，约40万字。它对浙苏鲁皖冀豫晋陕闽赣粤桂滇黔湘鄂16个省区的山脉、河流、地质、水文、动植物特征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尤其可贵的是，它正确探明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考察了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特征，成为世界上有关石灰岩岩溶地貌的最早记载；书中还记录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此外，清代在数学、历算、地图测绘等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尤其是在地图测绘方面，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绘成的巨幅全国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最精确的一幅地图。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数学有着光辉的成就。明清时期，在整理散佚的数学典籍，研究和发展古代数学成就，介绍西方数学体系和新成果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康熙皇帝本人就精通算学，还对传入的天文、历算等西方现代科学，颇有兴趣。在他的推动下，数学家梅文鼎等编成《数理精蕴》一书，这是一部清代中国的数学百科全书。明安图所著《割圆密率捷法》一书，把我国古代的二等分弧和西方的三等分弧统一起来，将圆周分成尽可能多的弧段，使圆周率的近似值更为精确。历算学者王锡阐著《晓晦新法》、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对我国的历法、回历、西历都作了系统的研究。

重要名词：

军机处　文字狱　绿营　三藩之乱　《尼布楚条约》
地丁银　《四库全书》　《天工开物》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王聪儿　改土归流　《永乐大典》　《本草纲目》

思考题：

1．简述清朝前期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

2．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哪些表现和特点？

3．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思想领域有哪些重大贡献？

4．简述清朝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疆的主要经过。

5．从历史的发展说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6．试评康熙的政绩。

后　　记

《中国古代简史》是由陕西教育学院发起，有天津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山西教育学院、宁夏教育学院、江西赣南师院、青海民族学院、新疆喀什师院、河南教育学院、河北石家庄师专等十省区、二十多所兄弟院校参加编写的教材。其目的，在于解决高等院校文科、师专、教育学院等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需要。本书的编者，绝大部分是长期从事高校历史教学工作的同志，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也有近年来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后起之秀。这部教材，就是大家在历史教材建设战线上亲密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晶。

本书是在《简明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修订的，约50多万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同时，对在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战国、秦汉、隋唐及明清时期，又重点予以阐述。编写时，注意吸收了近年来古代史研究及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新成果。在适当减少历史发展过程叙述的同时，加重了对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知识的阐述；注意了与最新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的呼应配合。书中插有重要历史地图16幅，每章后附有重要名词和思考题，便于学习时掌握重点、难点和复习思考。

为搞好编写工作，特聘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育坤先生，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先生为本书顾问，指导编写、审阅和仔细修改书稿。

本书由张思恩主编，张中政、杨冬生、陈正奇、高长天任副

主编。参加工作的编委有：薄济源、强志华、艾光国、李柏录、邵伯其、原葆盛、江兴婉。参加编写的单位和人员有（以单位笔划为序）：山西晋东南师专于淑月、郭长庚；山西教育学院杨冬生、樊爱香、谢步成；天津师范大学李瑞兰、上官节；开封教育学院邵伯其；汉中师范学院强志华、梁中效；石家庄师专江兴婉；宁夏教育学院李淑娴；西北工业大学秦燕；西安教育学院陈正奇、田猛；西安联合大学李柏录、原葆盛、张中政；江西赣南师范学院罗勇；延安大学高长天、侯虎虎、张剑平；陕西工学院窦力、田竹艾；陕西师范大学关润鑫；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薄济源；陕西教育学院张思恩、刘东社、畅晓白、李岩；宝鸡师范学院薛学仁；河南教育学院张媛；青海师专陈青荣；青海民族学院艾光国、赵编；南京政治学院陈力；新疆喀什师范学院詹宗蕃。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对编写工作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西北电业职大副教授张万泉先生，协助校审了隋唐、明清等章节；陕西教育学院李亲民副教授为本书绘制地图，多费辛苦，相艳、王越群为本书的联络组织和校对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教材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环节之一，必须在吸收已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群策群力，经过多次的实践和总结，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师友们批评指正，以便在本书修订时改进提高。

编　者

1990年10月10日